

躁郁症少年一九六九年 夏的梦中江湖 (上下)



躁郁症少年一九六九年 夏的梦中江湖 (上下)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躁郁症少年一九六九年夏的梦中江湖（上下）

作者：【德】弗兰克·维策尔

译者：付天海；刘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ISBN：9787020182640

字数：558千字

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Die Erfindung der Roten Armee Fraktion durch einen
manisch-depressiven Teenager im Sommer 1969

躁郁症少年 一九六九年夏的 梦中江湖

[德] 弗兰克·维策尔 著

付天海 刘颖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文前辅文

从书名可以明显看出，本书中所有出现的人物形象皆由叙述者虚构而成。名字上的相似纯属巧合。

文前辅文

谨以此书献给阿希姆、亚历克斯、贝尔恩德、克劳迪娅和赖讷

文前辅文

一个人能否有所体验，最终是要取决于他以怎样的方式忘却。

——特奥多尔·W. 阿多诺

我辈皆为罪人之日，亦即民主到来之时。

——阿尔贝·加缪

我们只有把存在看作一个唯美的客观事实，才能承受它及其中的一切可怕。

——理查德·罗蒂

愤怒地回顾过去也是一种对当下的辩护。

——皮耶·布迪厄

旧有的尘埃不会以其他方式落定。在新的尘土找不到归宿的地方，它会不断被重新吹起。因此不该在最高贵的理智本应感到惊讶的场所，用往往相当蹩脚的判断力进行仅为讥讽目的的言说。就纳粹书写厚厚的书卷，但在阅读之后“影响了数百万人的东西究竟为何物”这一问题却比先前更加难以回答，这种情况也是不应该的。

——恩斯特·布洛赫

这个隐蔽的德国是一个巨大的、储藏过往历史的沸腾的容器；它从乡村向城市倾泻，针对无产阶级“同时”也朝着银行资本倾注，它适宜于银行资本所需的所有恐怖。已成为神话的土生土长性不仅制造了错误的意识，而且还通过潜意识和真正的暗流增强了这种意识。

——恩斯特·布洛赫

我们不知道人的命运的推动者是谁，甚至不清楚饥饿和经济的推手为何人，就像之前“文化”的主体和所有的欺骗一样，也包括一种在合适和不当之间来回摆动、隐藏本真意识的华丽外表。存在的心灵经常以最精确的方式在细微中升腾；这一点从那边那只笛子可能摆放的形态中就可略见一斑：但是只有极度的惊讶，即便是最后和最高程度的惊讶，才能使自己镇静下来。在没有概念明灯的指引下，存在的主体总的说来会完全陷入迷雾。

——恩斯特·布洛赫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卡尔·马克思

我们大家都确实在通过自己处事的方式，去选择给自己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自处空间。

——威廉·詹姆斯

夏娃之子，你的信仰。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七十年代已经结束。

——卢克·海恩斯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不让自己被抓获

那是一月份大雪纷飞的一天。我站在一处被大雪覆盖的狭长山丘上，望着山下熟睡的、同样埋在雪中的一个村庄，尝试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山下村里一间几乎没有家具和供暖的住房里度过了两个半月时光，所住的房子更像是一个仓库，它紧邻一条溪流，一半河面在许多年前类似于今冬的严寒天气里都冻住了。我站在山丘上，目送自己一呼出便凝结的气息，目光一直延伸到那只松鸦身上，它刚刚还蹲在一根堆满积雪的树枝上，转眼间便飞向灰色的苍穹，消失在下一个山顶后面。

那条乡间公路就像一幅儿童画所描绘的那样，从灰白色的地平线一直蜿蜒到我脚下的原野。这时公路上已经有一辆汽车驶近。它不是法拉利250高性能跑车（12缸4冲程发动机，汽缸容积2953立方厘米，功率240马力，最大速度230千米/小时），甚至连保时捷501也算不上（6缸4冲程发动机，汽缸容积1995立方厘米，功率120马力，最大速度200千米/小时），而仅仅是一辆NSU王子（2缸4冲程发动机，汽缸容积578立方厘米，30马力），它正以每小时120千米的速度驶出被大雪覆盖的村庄，在这个路段顺风上坡行驶。而此时我连轻型摩托车驾照也没有，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在车上大喊大叫，让我继续保持靠右行驶，以便躲过转弯处警察们的视线。但是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NSU王子的两个后轮轮胎几乎都瘪了，以至于我几乎无法使车体保持平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领先了一大截。塞满警察的大众T2型公务用车在我们身后追赶，车里的警察开始噼噼啪啪地开枪射击。子弹射入雪堆，从沥青路面上弹起，敲击着汽车挡泥板柠檬色的油漆。克劳迪娅在杂物箱里翻寻到一把手枪。它没有装子弹，我说道。什么，没有装弹？里面没有水。水？这是我的水枪。天哪，你发疯了？贝尔恩德喊道。豌豆枪到底在哪儿？不记得了，但是这把水枪的性能真不错，它前面有一个环圈，这样你就可以向拐角处射击了。你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地地道道的胡思乱想者，我心里想，你

们本想向阿希姆借气枪。他不在家，只有他祖母在场，而她不愿把气枪交出来。小心！我的身体向左侧倾斜，差一点儿我们就翻车了，但是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机智果断地把自己甩向车厢另一侧，这样我只是暂时脱离了行车道。积雪高高扬起，飞溅到挡风玻璃上。雨刷疯狂地刷个不停。或许我们应该干脆掉头，克劳迪娅喊道，他们做梦也不会料到我们会这样做。对，贝尔恩德也喊道，然后我们就从他们旁边飞速驶过，在他们意识到情况有变之前我们早已逃之夭夭了。不，别胡闹了，这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必须赶到下一个地方，它离这儿不太远了，此外前方就已经开始下坡了。是的，没错，我已经看到几栋房子了。我们必须甩掉他们。我驾驶汽车毫不减速、发狂般地驶进居民点，顺着白坪大街往下开，然后向右拐入池塘巷，从出售裹有巧克力糖衣的香蕉切块的福尔面包店旁边驶过，沿途又经过施帕尔丁卫生用品店、布赖登巴赫食品店、毛厄尔杂志和烟草店、勒尔食品店和歌咏协会，在快到道姆面包店门口的地方我停了下来。快点儿，我喊道，警察们还没赶到。我们下了车，跑到对面的院落门口，穿过院门来到后院。我们必须翻过院墙，那边就是校园，从那里我们可以继续跑向凯尔伯绿地。我们跳到垃圾桶上。你们在那儿干嘛呢？一个声音从后排房屋的一扇窗户里喊道。马上站住！我认识你们！马上站住别动！否则的话我去找你们父母！我很快转过身去。一名扎着长围裙的妇女从三楼的走廊窗户里探出身来，手里晃着鸡毛掸子在威胁我们。此时警车刚刚从敞开的院门口疾驰而过。他们没有看到我们，我说道，他们肯定开往高处的格雷泽尔贝格了。要是这样我们最好往反方向逃跑，贝尔恩德说道。赶紧。我们又从垃圾桶上跳了下来，飞奔穿过门廊。站住！那名妇女又大声吼道。我们小心翼翼地窥探外面的大街。街上看不到警察的一丝踪影。开溜，动作快点儿！我们向左沿着池塘巷一路飞奔下去，向右转入费尔德大街，跑到铁路路基处又向右朝韦德曼废品站方向继续飞奔。我们必须分开，克劳迪娅说道。对，我附和说，如果我7点钟还没有到家，无论如何都会惹麻烦的。我8点钟到家就行，贝尔恩德说。最好我们好几天都不见面。我们点头称是。如果警察到谁家登门的话，他要立即电话通知其他人。但是我们应当说些什么呢？干脆就说事由是周一的数学家庭作业。周一的数学家庭作业，就这么定了。然后每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出意外周六4

点在洛赫碾磨厂会合。周六我必须去教堂忏悔，此外在爵士音乐俱乐部碰面不行吗？那就说好5点半，可以了吧？

晚上8点20当我穿着睡衣、在放电视的房门口道晚安的时候，我尝试很快捕捉一下荧光屏上的画面，看到了在湿滑的马路上飞奔的男子们的模糊录像，心里感觉又紧张起来。不，那不是我们。但是他们好像并未放弃搜寻。一张罪犯的模拟像被公示出来，它是用铅笔画成的，但幸运的是画像上嫌犯的头发要长得多，因为我上周才刚刚去剪完头，现在头发连耳朵都没有盖住。但是前突的下颚，这一点可能会像我。然后又是下一张画像，这一次是女的。不，她也不是克劳迪娅。克劳迪娅长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画像上的女人一点儿也不像她，她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眼睛，嘴唇也没有那么薄。

然后电视上又讲了一些跟一封招供信有关的事情，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供认。从未有过，此前也没有。曾经有一次我们共同写了一些东西，但并未把信寄出，而且马上就把它烧掉了。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把信带在身上，在穿过亨克尔公园回家时路上正好没人，我就点着了信，把它扔到砾石路上，在信彻底烧毁之后我又把剩余的纸灰踩碎。但是奇怪的是，那些人说出了我们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们组织的名字“红军派”，尽管这个名字还根本未被确定，原本我们想再表决一次，因为克劳迪娅觉得这样命名不太好，只是她也想不出其他建议，只好说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命名，毕竟我们不是要成立一家俱乐部的孩子，她这话也有道理，尽管最好还是给组织起个名字，特别是如果以后还有其他人加入的话。尽管如此我在心里自问，播报新闻的那些人是从哪儿知道这事的，因为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此事，我没说过，就连阿希姆也不会。

克劳迪娅肯定会守口如瓶的，因为她也属于基层组织，这样成员们商谈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向外泄露的。贝尔恩德反正没有问题，因为他的故弄玄虚有时已经够让人心情烦躁的了。但是米夏埃尔·雷泽就不好说了，他总是可疑地待在我们附近，因为他想“偶然”听到我们都在谈论些什么，了解到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以便他可以仿效。但是恰恰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因为他的模仿让人神经紧张，所以我们

特别提防他，在学校里我们对这样的事情闭口不谈，这是我们事先商定好的，在课间休息时也不谈论。如果有事要商量，我们干脆就说今天中午在洛赫碾磨厂或者随便其他地方，如果情况紧急，就在回家路上的操场上，但是即使是在那儿我们也总是格外小心，因为有时会有老师在操场。但是雷泽真让人猜不透，贝尔恩德也认为，这家伙或许在我们背后刺探了很多情况，当我们课间在地下自行车车棚里匆匆地吸一支烟的时候，他会溜回教室乱翻我们的书包，因此我们从不在班级里放任何可疑的东西，而是始终把一切都装在外套里。雷泽也看

《士兵》连载小说，是班上唯一借助润发油把头发向后梳的人。这种发型使他看上去非常市侩，当他在体育课上被汗水湿透的时候，头发就会向前散落，长长的盖住他的整张脸。然后在一次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只是相互比画着各种拳击动作，在快要击打到对方脸部时就立即收手，而他却直接打到了贝尔恩德的鼻子上，声称他是不小心失手才这样的。但是或许当时他就是故意的，或许他真的跟在我们后面想报复，因为我们总开他的玩笑，原因是每当一支笔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笔之后，总会很快变得满脸通红，看样子仿佛是简单的弯腰都会使血液涌入他的头部。当然这样做很卑鄙，因此我偶尔也会同情雷泽，有一次甚至中午跟他约定见面，尽管贝尔恩德认为雷泽这个人不值得人们同情，所以我没有告诉贝尔恩德任何我和雷泽约会的事情，在那之后也没有。不管怎样这件事挺难为情的，我必须专程坐6路车出城去往卡斯特尔，因为我不希望他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就坐在雷泽的房间里，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单曲唱片，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他只有《士兵》连载小说和铅质小兵，他用这些小兵在一个自制的沙盘上模拟各种战役，沙盘上有山包、一条河流以及我们也有的法勒铁路模型的撒草粉。小兵模型分量都很沉，大约有火柴盒那么大。雷泽把其他人物称作平民，他们必须全部丧命，或者在逃亡途中淹死在河里，这些人物模型却要小得多，因为它们也来自法勒模型公司，这些人其实都属于火车站乘客，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提着箱包，某些甚至挥动着手帕，我觉得这样挺傻的，因为这与沙盘场景一点儿都不匹配。然而雷泽却认为，那些提箱子的是在逃难途中，挥手帕的是想要投降，因为人们在投降时会挥动一条白手帕。在游戏中我总是扮演那些法勒平民，提着箱子试图跨越河流登上山丘，但是雷泽的士兵已经站在那儿恭候了，于是我就把手里挥动手帕的派到前面，但是雷泽索

性把他们也一块儿射杀，这样一来我也不再打心眼里同情他了，特别是当他全神贯注的时候，总是把舌头怪怪地向外翻转。他在暴怒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当我让一个法勒公司造的小人模型干脆从一名士兵双腿间溜掉时，他随即生气地说道：这不公平，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我对这种蠢傻的游戏不再感兴趣了，想最好马上就走，见我这样雷泽让步了，给我看了一个大约有橡胶小球那么大的银色圆球，问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当我回答不知道时他说：这是真正的火车机车所用的轴承里的一颗滚珠。我说：搞错了，因为我尝试想象火车机车的滚珠轴承得有多大，因为我只熟悉挂有小珠子的细链。然后我们又闲坐了一会儿，雷泽问我觉得阿妮塔这个人怎么样，我回答说挺好的。然后我说我现在必须要走了，这也算是一半的理由吧。于是雷泽说道：好吧，兄弟。这让我觉得有点儿怪，因为我们班级没有人这么说过，我在思考还有谁说过“兄弟”这样的字眼，因为我曾经听到过有人这么说，但就是想不起是谁了。

现在他们在电视上展示那辆黄色的NSU王子，以及我们画在厚纸板上的车辆牌照。我觉得NSU这个名字很好，因为它是英国“奶油乐队”

（Cream）唱的一支歌。“开着我的汽车，抽着我的雪茄，唯一让我快乐的时光，就是弹起我的吉他，啊哈哈哈哈哈，啊哈。”此外那辆NSU停在那里，车门未锁，车上还插着钥匙。现在他们开始展示我的水枪，当时我们把它忘在车上的杂物箱里了，我心里在想：真让人恼火，因为这把水枪很独特，也因为肯定不再有售了。这时母亲问道：哎，你不是也有一把这样的水枪吗？我答道：不，我的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把枪不也能转向射击吗？是的，但是外观不一样。你的在哪儿？我把它借给阿希姆了。

我还在想：如果他们在水枪上找到指纹，然后去学校采集我们所有人的指纹，那该如何是好？我曾经读到过，有人专门为此把指尖磨平，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指尖总是马上就重新长出，而且带有相同的纹路。即便水枪上有我的指纹，也不足以说明那辆NSU就是我偷的。毕竟我可能真的把枪借给别人了。我也确实把水枪借给过别人，尽管不是这把，因为它是我最珍贵的，那一把是用透明塑料制成的浅绿色的，人们总能看出枪把里还剩多少水。我可能会说我把枪借给了雷

泽，然后他们将会驱车去雷泽家搜查他的房间，会在那儿找到所有的《士兵》连载小说和铅质小兵，还有那颗铁珠，他们或许会认为它是一颗用来装填武器的子弹，任由雷泽怎么解释它来自火车机车上的滚珠轴承，他们也不会信他的。他是怎么得到火车机车上的滚珠轴承的呢？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Berndt Andreas Baader,1943—1977），联邦德国左翼军事组织“红军派”的领导人。

古德龙·恩斯林（Gudrun Eusslin, 1940—1977），“红军派”创始人之一。

我还特别想知道，电视上那些用模拟像搜寻嫌犯的人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母亲打发我下楼回自己房间了。那里一直还摆放着我的骑士城堡，尽管我早已过了玩这种玩具的年龄了。去年我用我的“威望”模型的边角余料对它进行了改装，但是人们一直还能看出，它在改装前是一座骑士城堡。安德烈亚斯·巴德尔^⑧是我最珍贵的骑士，因为他身着一套乌黑锃亮的甲冑，现在他正忙于锯开吊桥，古德龙·恩斯林^⑨正把白人骑士中的一员推进城堡壕沟。古德龙·恩斯林是一个用棕色塑料做成的印第安女人模型，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她，因为她一点儿详细背景也没有，但是她是众多人物模型中唯一的女性。我是有一次通过抽奖在一个魔术袋里赢到了她，当时她正躺在一堆爆米花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禁不住一下子想起了去年复活节我得到的那个肥皂兔。当时人们必须把它从包装里取出放到洗手盆边缘。第二天它就长出了一层特别柔软的绒毛。当然人们不准用它来洗手，然后绒毛不见了，也没有再次长出。我从未用它洗过手，但是我的弟弟肯定用他沾水的手指抓过它，因为一天早晨它身上的绒毛褪得干干净净。接下来我又等了几天，看那绒毛是否再生，在确定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之后，我也开始用它来洗手了。我今年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的肥皂兔，但是并未如愿得到。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太大了，不适合获赠这样的东西，而我弟弟还年纪太小。我之所以想起那只兔子，或许是因为我在考虑我们怎样才能伪装自己，考虑可能在哪儿搞到一副假发。虽然我从克尔伯那儿得到了一副披头士乐队假发，但是它只不过是一种

简单的塑料头盔，而且对我来说也太大了。戴这样的假发会立即引起别人注意，此外我根本不喜欢当时的发型，就像老师们所说的“蘑菇头”，而是喜欢甲壳虫乐队自演唱Help（“救命”）以来所风靡的那种头型。长长的头发反倒更引人注意。盖尔就总是遭到别人的辱骂，被问及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把藏在柜子后面的那个标准A4笔记本拽出，本子上写着所有与红军派有关的事项。比如里面写着，谁是我们组织的成员，我们什么时候碰面，谁带来了哪些单曲唱片，还有我们的标志，尽管它还没有被完全设计好。起初我尝试把它设计成类似于体操协会的标志那样。比伯里希体操协会的缩写是TVB，这正好也是三个字母。在一个七角形的红色的骑士盾牌里，首先自上而下写着一个长长的字母T，在T的纵向笔画上写着小一些的V，V下面又是字母B。然后标志上还写着该协会成立的年份数字：1846。在字母T的纵向笔画的左侧是18，右侧写着46。于是我用透明纸描印了这家协会的徽章，自上而下分别把T、V、B改画成R、A和F，其中A跟原先的V一样要小一些，然后把左、右两侧的年份数字分别换成19和69。我觉得这种设计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克劳迪娅不喜欢。她认为这样的标志太庸俗了，毕竟我们不是体操协会。她的话有道理。我也很久没有去过体操协会了。每次都必须穿黑色的体操裤和滑稽的汗衫，首先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无聊。而且我们谁都不允许穿毛巾布袜。

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数字（1969）还是挺好的，我也建议不要在标志上写上我们俱乐部成立的真实年份，而是干脆写上一个更为久远的年份，就像我也在组织名单上罗列了一些根本不属于我们的成员一样，因为每一家协会都有自己的名誉会员，他们并不真正参与体操训练或者在体操馆出现，但尽管如此也是协会的一员。在我们组织约翰·列侬、斯蒂夫·马里奥特、金格尔·贝克还有其他几个人都是名誉会员。因此我们也需另想一个成立日期。不一定非要是1846年，但是可以久远一些。所以我收集了关于野孩帮、新护卫队，也包括圣星唱派的所有可能性历史。在收集到的资料中我碰到了小马克斯·雷格尔这个人。他于1913年3月19日出生在威斯巴登。我觉得1913是一个不错的日期，因为我十三岁，准确地说是十三岁半，也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十

三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这个小马克斯·雷格尔虽然没有直接成立过团体、帮派或者俱乐部，但是我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俱乐部，而更像是一群单独的斗士，正如克劳迪娅所说的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员。这些乌拉圭游击队员的标志是一颗恒星，跟比伯里希体操协会的标志一样，恒星上自上而下也印有三个字母：M、L和N。令我不解的是图案上根本没有出现字母T，要是这样TVB也可以叫作比伯里希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或许我们干脆就应当这样命名。贝尔恩德也许会赞同，但是克劳迪娅不会，因为她觉得“比伯里希”太俗气，在这一点上她也是有道理的。我也认为“红军派”这个名字要更好。

确切地说小马克斯·雷格尔是一名刑事犯，就跟于尔根·巴尔奇或者蒂莫·林内尔特的劫持者一样，而且他还虐待过男孩，所以我从圣星唱派那儿无法得到他的历史，因为那里讲述的都是些做善事的男孩，比如给一名垂死的妇女送去一块圣饼，就像当时罗马人当中的那名男孩一样，那个时候基督徒们还在遭受迫害。那个男孩在某一个地下墓穴里从一名教士那儿得到了圣饼，必须非常小心地把圣饼带给那名妇女，因为它是我主上帝的圣体。男孩也照吩咐做了，尽管没有说他是把圣饼装在圣体匣中、圣餐杯里还是其他器皿里，或许最好都不是，因为这样会更惹人注意，但是他也不可能把圣饼握在手里，所以我认为他是把圣饼放在一个盒子里，如果当时还没有盒子的话，也可能是把它裹在一块布里。天色已晚，原本男孩早就应该到家了，当时的街道没有路灯，就跟鹰徽后面的阿道夫小巷一样昏暗，但是整个城市哪儿都一样。当男孩揣着圣饼拐进一条街道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一帮非基督教罗马青少年在那里闲荡，就跟福德贝格人一样，因此他也马上知道，无论他说些什么都会有麻烦的。但是他也不能索性掉头，因为那帮人已经看到了他，那样他们就会立即跟在他身后。因此他把圣饼藏在外袍下面，这让我回想起另外一个我们在拉丁语课本中读到的故事，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斯巴达人，他在一名富有的古罗马贵族那儿偷了一只活的狐狸，狐狸是主人当作某种宠物来饲养的，在接受一名卫兵检查的时候，他也把狐狸藏在外袍下面。整个检查期间他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狐狸用利爪把他的整个胸脯都抓破了。斯巴达人非常顽强和坚韧，而罗马人则显得有些娇弱，因此一方面我更愿意接收斯巴达人加入我们组织，另一方面荣格博士总说，我

们的长头发令我们缺乏阳刚之气，可我的头发甚至连耳朵都没有真正盖住，因为我根本不允许留长发。如果披头士乐队，甚至滚石乐队或者更像斯巴达人的谁人乐队也因为他们的长发而显得女里女气的话，那我也情愿跟他们一样。不管怎样那些非基督教罗马青少年非要查看一下，这个基督教男孩在他的衬衣底下到底藏着什么。当然他不想把圣饼交出来，因为它是我主上帝的圣体，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想玷污圣饼，以此讥讽和诽谤整个基督教。所以他们把他撞来撞去，开始往他身上投掷石块，直到他的头部被严重击伤他们也不停手，最终男孩倒地死亡。但在临死前他把圣餐施舍给了自己，虽然他还未满十岁，也就是说还根本没有参加过第一次圣餐仪式。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么做不算罪孽，因为通过此举他保护了我主上帝的圣体不被诋毁，他甚至会被敕封为圣徒，因为他像一名殉难者一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个小男孩身上，他在米勒同志的指引下做出自我牺牲，那个男孩1937年出生，据说1943年就实施了一起暗杀行动，尽管那年他还不到六岁，甚至连写字都不会。人们不清楚他后来怎样了，不知道他还活着还是在那次暗杀中丧命，或许他在1957年才被射杀的小马克斯·雷格尔之前就已经死了，那一年我们大家才刚刚出生没几年，我指的是我、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

明爱会，一个天主教组织。

生活中当然我们永远也不会让别人抓获。或者也不会像小马克斯·雷格尔那样在被人跟踪时逃往东区。至少我不会那样做。克劳迪娅说，人们在那边更容易搞到武器，因为还在十四岁的时候人们就必须每天中午放学后去参加军事训练。训练中可以用旧式俄制机枪来回扫射。此外人们对东区的孩子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期许。他们可以携带刀具、弹弓和气枪，可以检举或者暗中监视自己的父母。或者也可能是老师。如果发现比如像荣格博士那样只会讲述斯大林格勒的老纳粹，那么孩子们可以告发他，允许自行在地下司炉间审讯他并扇他耳光。如果在这之后他竟然被允许继续留在学校任职，那么学生们可以自己决定他们的家庭作业。但是在东区人们不许留长头发，也不许听音乐，只能听国际歌和进行曲。而且饭菜也不好，比我们战时的伙食还要更差。他们没有铁路和有轨电车，因为他们必须把一切都拆掉运往俄罗斯。

每一枚生锈的螺丝他们都必须运往俄罗斯，但是为此他们却得到了机枪。他们也没见过口香糖或者糖果之类的东西。巧克力在东区就是撒上可可粉的陈面包。可可粉他们有的是，因为可以从古巴那儿得到，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做不出巧克力，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机器。一旦机器坏了就没有备件，所有的问题他们必须自己解决，就像当初我们去罗滕堡郊游的时候，那名来自全德汽车俱乐部的男子用明爱会那位女士的紧身连裤袜替换了破损的三角皮带，而我总是禁不住在想，现在那位明爱会女士在她的裙子下面可是什么都没穿呀，这让我觉得很恶心，因此我宁愿要一份拿在手里吃的冰激凌，尽管它在分量上比坐在桌边吃的那种要小得多，但是我就是不想跟那帮人坐在一起，而是走到前面的露台上，仿佛想再仔细观赏一下外面的城堡，其实我对城堡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现在那位明爱会女士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对此我父亲没有丝毫的介意。他可以挨着她坐着吃他的蛋糕。而我弟弟反正年纪还太小。在东区人们也可以告发那位明爱会女士，因为她没有穿紧身连裤袜。假如她说那是不得已的情况，她也是不情愿才在灌木丛后面脱掉连裤袜，把它交给那名来自全德汽车俱乐部的男子的，那么人们可以说她在撒谎。也就是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但是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她也总在说谎。人们终于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来指控她，因为不穿连裤袜来回乱跑，这在东区是被禁止的。总而言之不穿制服来回乱跑都是不允许的。要是在东区我就不只有一把塑料三刃尖刀和一把橡胶匕首了，还会有一把真正的带角柄和血槽的旅行刀，用这把刀我就可以在她脸前挥舞了。但是如果我们去东区，那位明爱会女士对我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因为这样的女人只在我们这儿才有。如果在这里我告发她不穿连裤袜到处乱跑，那么他们只会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因为他们肯定在想这里反正所有的人都在半裸着身子到处乱跑，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必穿校服，不必放学之后去参加军事训练。但是我可以说她是一名帮助逃跑的胁从犯，她用自己的欧宝大尉车从东德拐骗年轻的姑娘，紧接着让她们在西德这边不必穿连裤袜而到处乱跑。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真的感到愤怒，或许我会接到任务去劫持那位明爱会女士，然后把她送往东德。为此人们不仅会给我一把旅行刀，还会向我提供其他武器和一部美乐时相机，这样我就能够偷偷拍摄任何东德可能感兴趣的建筑或者人物的照片了。一部美乐时相机要比我的柯达傻瓜相机好上千倍，后者只能拍正

方形的照片，要想取高大的景物就必须斜着拿相机拍照，因为这样才能照到更多的景物，如此拍出的照片就像一个菱形方块，尽管它在相册里看上去很傻，此外也相当占地方。另外美乐时相机的体形要小得多，比一个火柴盒大不了多少，只是要稍微长一些，颜色是银色的。阿希姆希望过生日的时候从他祖母那儿得到一部这样的相机，或许我可以把相机借给他用，然后我们就不必去东区了，因为他们在那边除了武器根本什么也没有，就连玩具都没有，尽管我其实对玩具不再感兴趣了。但是也没有唱片和收音机，就算有收音机，里面播放的也只有广播通知和国歌，而且就像我们音乐老师伯恩哈德所说的，那首国歌还是由一个名叫汉斯-阿尔贝斯-施拉格的人抄袭的。电视他们那儿也没有，因为人们不应当知道在其他地方有很多糖果出售，不该知道人们甚至在房管员施文克那儿就能买到巧克力王子、韦伯蛋糕和膨化食品，也不该知道巧克力和撒上可可粉的陈面包事实上完全不一样。

有人在敲门。我很快把标准A4纸笔记本塞到枕头底下。敲门的是那位明爱会女士。你还没睡吗？她问道并站到门框里。不，我说道。她穿着一件装饰有花朵图案的浴衣。这就意味着她又在这里过夜了。你母亲也已经上床睡觉了。我点了点头，把脚从拖鞋里拔出。是这样的，明爱会这位女士说道，我刚才在电视里看到，一些二流子或者无政府主义者想来这里把比伯里希镇的百货商店炸掉，他们（警察）正在搜寻这些家伙。在电视上他们展示了那辆逃跑用的汽车以及他们在汽车杂物箱里找到的武器，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炸药的东西，它的形状一点儿也不大，而是装在一个黄色的鸡蛋里，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我在你这儿也曾经见到过。橡皮泥，我说道。是的，可能就是这个。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是塑像用的黏土。那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像橡胶球一样蹦跳，人们可以把它拉得很长，可以把它撕开，也可以用它从报纸上印制图片。怎样印制呢？如果人们把橡皮泥放到一张报刊图片上狠压的话，照片就会被印在塑像黏土上了。那样的话那帮家伙可能使用了橡皮泥来印制传单？不，这不可能，要是那样人们将需要上百块橡皮泥，要知道橡皮泥很贵，每一块都要花费将近五马克。给我看一下你的？我把它借给阿希姆了。是吗？那好吧，反正这事也不太重要。如果阿希姆把橡皮泥还给你了，你再让我看一下吧。行。那就晚安。晚安。

明爱会那位女士预感到些什么，但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当然把橡皮泥带在身上并把它遗忘在汽车杂物箱里，这也是非常愚蠢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我所有珍贵的东西现在都没了。但尽管如此这些也不足以构成证据，因为百货商店里至少有十把那样的水枪，橡皮泥在赫尔提百货公司也能买到。这时又有人敲门了。我很快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还是我，明爱会那位女士边说边把头探进门来。现在她浴衣的上端一下子敞开了，我可以看到她的胸罩。我还有一些事情忘记说了。他们在电视上还谈到了一种蜂鸣器，那也是他们在车里找到的。它难道不是那种你曾经给我看过的小型装置吗？人们给它上好发条，把它藏在手里，当你把手递给我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动起来，我着实被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过电了呢。没错，是那玩意儿。你能让我再看一下吗？它好像还真挺危险的。她往屋里又迈了一步，身子也往前倾了倾，以至于我看到了整个胸罩以及胸罩下面的一块肚皮。蜂鸣器我也借给阿希姆了。什么？把它也借给阿希姆了？是的，我把整个宝物盒都借给他了。但是你的宝物盒却在那边的架子上放着。我指的不是宝物盒本身，而是里面装的所有东西。橡皮泥、蜂鸣器、不能用来饮酒的白兰地酒杯、魔术肥皂、冰水，还有那把能够转向射击的水枪。啊，水枪也借给他了？是的，也借出去了。你最后一次见到阿希姆是什么时候？昨天在学校里。不是在今天中午吗？不，今天中午没有。阿希姆可是留着长头发，不是吗？嗯，大概半长吧，盖过了耳朵。他也有女朋友吗？不，我觉得没有。好吧，如果他把那些东西还给你，你要都给我看一下。

如果那位明爱会女士现在怀疑上阿希姆，或许还会给他母亲打电话，这种情况当然令人很不愉快。不管怎样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她总是提一些令人讨厌的问题。当初在我们尝试用打火机在高处白坪大街的口香糖自动售货机上烧一个洞，或者当糖果自动售货机坏了的时候（因为我们同时按下了所有四个电钮），她也是这么做的。同时按下所有电钮会出来很多糖果，这是沙普尔告诉我们的。但是最终我们连投完币本应出来的那块糖果也没得到。再比如当我们把那栋空置房屋的窗玻璃打碎的时候，那位明爱会女士又一次古怪地向我提了“是否到那儿去过”之类的问题。我必须跟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讨论一下这种情况。本来我就讨厌那位明爱会女士。如果我们绑架她，把

她关在一间地下室里，我就可以强迫她脱掉上装，也包括胸罩，当然是在其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戴上面具，这样她就不知道是我了，因为我会用一种很高的嗓音说话，就好比我是一名美国人，然后我就能看一看是否自己真觉得那样很恶心，因为胸罩已经让我感到恶心，但或许胸脯不是。

我起身重又把那本标准A4纸笔记本塞到柜子后面。明天我会继续编写有关红军派的故事。在小马克斯·雷格尔和米勒同志之后登场的是埃坦·龙德科恩。他正好在那一年出生，当年那个男孩就是在米勒同志的建议下实施了暗杀行动并可能也已死亡。他是美国人，大概十二或者十三岁。然后是来自南美的米盖尔·加西亚·巴尔德斯，但都被称作费利普。他年纪要大一些，因为他已经上大学了。更多的人物我们也不需要，这些对于一个组织的故事来说就足够了，就像人们在真实的故事里也能看到的那样：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然后是我们。至少是类似于那样，因为说到底故事描述的是我们自己，描述的是红军派。我坐回到床上，跟每晚睡前一样从钱包里取出那张约翰和小野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偷偷剪下来的。

照片上的约翰·列依脖子上戴着镶有狐狸脸的项圈，旁边站的是小野洋子。亚历克斯说，小野和约翰全身赤裸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小野的胸脯，而不去注意约翰脖子上镶有狐狸脸的项圈以及他具有魔力的双眼。但是我注意到了这些，相信自己也因此患上了病。古多说，在与统治力量的强硬斗争中我们也须牺牲紧挨在我们身边的，即我们爱上的那个姑娘。我们绝不允许出卖组织，约翰也没有出卖组织，这一点人们从他脖子上戴的狐狸项圈就能看出。因为如果定睛细瞧，人们会看到那两只白色的眼睛变得生气勃勃。我还听不到它们在说些什么。我还看不到它们给我指的路通往何方。

弗莱施曼教士说，我应当登上飞机，将尽可能多的人击毙。我应当站到一只带窟窿的水桶下面淋浴。我应当在思想上预见并接受我同伴们的死亡，因为所有的先知、圣徒、殉难者和使徒终究都会死去，就连那位复活者也不例外。虽然复活之后在我们当中附体，但却不能留在尘世，这与死亡并无二致，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亵渎神明。被钉上十字

架而死是真正的死亡，如果人们在床上、疗养院或者学生宿舍往脖子上套上了些什么并用力拉紧，那么这样的死算不上真正的死亡。第一人们无法使自己窒息而死，因为上帝在人的体内安装了机关，使得人们在自缢之前先变得昏厥，失去对自己双手的控制而不得不松开双手，因此尝试以这种方式追随上帝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必须想出其他办法，也须重新分析和解释约翰脖子上套的狐狸项圈。第二，不用衣物裹住身子，而是赤裸裸地展示上帝的身体，确切地说是展示上帝给予他人的身体，这样做是一种罪孽，只有上帝才知道人赤裸着身子看上去是怎样的，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上帝之外谁也做不到这一点。鉴于所有其他人都视衣物为人不可或缺的东西，比如摇摆裤、毛巾袜、毛绒套衫、运动衫裤和松紧带，因此人们必须注意恰恰不穿所有这一切，因为这些把人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灵魂上引走，而人们必须向世界展示的真正灵魂虽然不是赤裸的，但也因此不能是随意伪装的。所以他（弗莱施曼教士）穿的是一件不分散人注意力的法衣，就像每一个向上帝做出承诺的人只穿一件朴素的法衣漫步在尘世那样，法衣通过它的遮盖使人注意到的是纯粹的赤裸，即虚拟裸露，而摇摆裤、毛巾袜、毛绒套衫、运动衫裤和松紧带则使人注意到犯罪裸露，因为人们打扮自己并使自己个性化，正如只有个性化的身体才会产生性刺激效果，而总是按照相同和由梵蒂冈确定的规则描绘出的圣母玛利亚的乳房却不会那样。因此无信仰者经常把神圣因其千篇一律感受为单调乏味，相反却因为被打扮出的个性化以及形态各异的妖魔鬼怪而认为邪恶是刺激和有趣的，是否神圣使人感到无聊，邪恶使人感到刺激，这在考察良知方面能够提供帮助。只有这样人们也才能理解制服的功用了。或者囚衣，那种带条纹的，因为大自然不识条纹，之所以带条纹是因为人们要以此说明囚犯被分成两半，他失去了完整性，不再只属于自己。

迈尔克林博士就狐狸项圈向我做了如下解释：他说尽管我还是个孩子，我也必须回忆自己的童年。我必须把我现在所处的时刻回忆成一些逝去的时刻，这样做就好比是我从将来回顾现在的我，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察觉，是什么卡住了我的喉咙，为何我总想谈起那位明爱会女士，但却不说出她的名字，而不是谈论我的母亲。为什么和为何？我能辨别这两个疑问代词的区别吗？“为什么”不在“为何”之后提问，

反之亦然，我能认识到这一点吗？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套在脖子上的带有两只白色眼睛的狐狸项圈。其中一只眼睛在问为什么。另一只在问为何。我能分辨出两者的差别吗？

您好，迈尔克林博士，在我进屋时我用尽可能低的声音说道。它听起来像一句普通的问候，实际上意思却是“颂扬耶稣基督”，这是我在进入弗莱施曼教士的房间、在踏进忏悔室时所说的。然后弗莱施曼教士会说：这不必要，尽管我喜欢你这么说不，因为这向我证明了你是个正派的小伙子，因为我知道你以后会有出息的，你之所以干出所有这些恶作剧，是因为有人唆使了你。但是现在你坐过来，把你回想起的简单讲出来吧。在迈尔克林博士那儿我也应当简单讲出我回忆起的事情，但是在他那儿我回忆起的总是另外一些事情，因为他对我说的话跟弗莱施曼教士说的不一样。现在比如我在想，弗莱施曼教士所说的“整个恶作剧”可能是什么意思，他说“只是有人唆使了我”又是什么意思。这些情况他是从谁那儿获悉的？谁跟他谈起了这些事情？他所说的“自由讲述”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告诉他是谁唆使的我吗？他想说的是多肉植物？抑或贝尔林格夫人？他指的是蜂鸣器和水枪？橡皮泥？他暗示的是那包塔林牌香烟？

为了简便起见，我套用弗莱施曼教士的语句说道，是的，有人唆使了我。是的，我太软弱了。是的，我屈服了。他们对我说他们是殉难者和圣徒，他们给我看了他们的伤口和鞭痕，其中一人甚至瞎了一只眼睛，另一人只有三根手指，我不知道这些是酞胺呱啉酮所致，所以我就相信了他们，当他们在自行车地下车棚里问我，我能否为他们做些事情，能否参与他们的活动，夜里从家里偷偷溜出来，经过明爱会那位女士和我母亲的房门，从我父亲的书房门口溜过，穿过庭院，当月亮正好处在工厂烟囱的上方，就像以前我已经两次夜里从家里溜走的那样，为了跟阿希姆和亚历克斯在贝尔林格夫妇的房子四周游荡，然后躺在那里的草坪上，在那儿我也不小心使自己受了伤。

弗莱施曼教士在慢慢点头。这种情形就好比一次忏悔过程，只是我在看着他，只是我没有按照第一、第二、第三的顺序把摩西十诫逐条诵读一遍，然后想出自己犯下的罪孽，把想出的罪孽整理成短句，为了

不必对真正的罪孽进行忏悔。与此相反，我在虚构一个前后关联的故事，它解释了我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但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像沙普尔那样完全堕落，他是个无可挽救的坏家伙，偷窃别人东西，骑着轻型摩托车到处闲荡，逃学旷课，不再去教堂忏悔。弗莱施曼教士清楚，不被诱惑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们经常无法分辨谁好谁坏，在耶稣重现之前会出现一些先知，他们都说自己是耶稣，但实际上不是，这也是耶稣重现的一个征兆。那么人们该怎样区分这种情况呢，如果他突然自己成了耶稣，而不久前其他人也同样声称如此？

毛刷堆放间和圣像

八月

持续降雨。身穿训练服的男孩周日中午在红色的沙石场地上。农庄前面侧视图里的霉菌。在挖好的沟渠旁边摆放着一些管道。一小片杉树林被圈了起来。

取消承诺

没有人经过。在走廊尽头打开淋浴。他穿着防弹背心跑步穿过住宅区。途经公共汽车站。这个时候他为何不在学校？

交通线路

坐在最后排绿色的皮垫上。车票被卷成一团握在手里。两脚之间放着装有保温瓶和餐具的旅行背包。

一个奇迹

出现在我眼前的砂石天使们站在空荡荡的摇篮旁边，用早期哥特式手势指向窗帘的蓝色。两脚之间有一股涓涓细流，左手握着一块面包，右手攥着一块木楔。人们肯定也会迷失方向。然后是位于橡树和槭树之间的孤寂的花园桌椅布置，它的周围一片昏暗。

前夜

装有三个啤酒瓶的购物网线袋。在一块小木板上放着一块香肠面包。他用脚把带有血迹的套头毛衫推到抽屉柜底下。在浴缸里烧毁了一份

剪报。在殴打她之前他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抽着烟躺在沙发上。把零钱整理成几小堆。不抽她费尽周折给他弄到的带过滤嘴的香烟。（听到了。）

钳子

他向扫帚间的天花板上望去。他父亲保存在棚顶挂钩上的那些工具在晃动的手电筒光线里闪着亮光。他不准在扫帚间里玩耍，因为锥子、螺丝刀、丝锥、钳子、锤子和带尖头的铁锯都是头朝下悬挂的，因为一个不小心的动作，比如不经意间碰了壁架一下，这些工具就会从夹具里脱落坠下。（听人讲述的。）

圣像1

圣徒们伸出的手上放的是自己的内脏，在涂成白色的木板上印着深裂开来的血淋淋的伤口。过来看一下这个蜥蜴人。耶稣受难像上的这句话在一天下午让人联想起那张受伤人的图片，那是他在母亲的医疗参考书上看到的，当时他在书里翻寻裸体女人的照片，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能只会找到处于乳腺炎状态或者梅毒变异期的乳房，然后他又会通过模糊的端详刻意不去考虑这样的图片。受伤人连带那些使他受到大量损伤的刀、剑、木棒、戟和长矛，俨然殉难者的化身，对自己遭受的痛苦他显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情，公然展示自己的伤口，为了能够让他人查看，以帮助他们实现精神上的解脱。这样看来受伤人要强于尼克、福尔克、蒂伯或者西格德，他们只知道通过巧妙的格斗动作避免自己受伤，而受伤人则在身体的损伤当中保持自己不被伤害。（抄写别人的话。）

色彩学1

橄榄色：美国佬的手电筒带有可折叠的弹簧钩，电池盒下面有用以发送信号的色板。紫色：今天参加了清晨祈祷，然后明天过复活节之夜直到弥撒颂歌，之后是白色。

拜访

汉斯-于尔根：还在人们踏进带有总是刷着深褐色油漆的护壁镶板的狭长走廊之前，房门背后紧接着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圣水盆。房子里所有的屋门都紧闭着。（亲眼所见。）父母卧室里经过装饰的、挂有流苏和缨穗的织物华盖是天国的象征。儿童房间天花板上刻着拉丁铭文“小心！上帝看得到”。铭文下面画着一只眼睛，它从一个三角形里向四周放射光芒。（听人讲述的。）

一条狗死了

三月初又下了一场雪。雪花通过走廊里狭窄的折叠窗落进来，沿过道留下了一条细细筛过的雪带，它从厨房一直通向带浴缸的浴房。早晨他还天棚灯的灯光下躺在浴房的浴缸里。饱含雨雪的云朵不断从房子和花园上空飘过，像是给天空安装了一道拱顶，这样的拱顶在夏天又会消失不见。不多的几只鸟儿就像在鸟舍里一样，在穹顶下面滑翔而过，不敢完全展开它们的翅膀。在我入睡之前一只手向我伸了过来。它顺着一条腿的小腿肚抚摸我，掠过我的脖颈，轻轻拍了拍我的头：这是一场梦境开始的信号。那个穿黑色大衣的老妇人从外面关上院门，一动不动地在小巷里站了一会儿。害怕走小桥旁边的那条路，因为当那三个男人从我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没有看我一眼，也没有挡住他们的脸，就像人们通常当着陌生人的面所做的那样。城市发生了变化，仿佛城市内部的一些东西正在设法暴露它们的平面图。某些商店的橱窗空荡荡的，仅仅是为了伪装才矗立在那儿。人们不需要特别的展望，只需不加选择地观望，如同呈螺旋形缓慢前行的脚步那样。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在鸟笼里。我兄弟在其中一只鸟笼里，我母亲在另一只里。父亲被装在一个木箱里。我几乎一直都在不由自主地等候着小山丘上空再次透出绿光，就跟父亲把那条被射杀的野狗从树林里扛回来的那一天一样。当时野狗的一只爪子悬在麻袋外面，父亲把麻袋扔在柴堆旁边。我兄弟紧紧抓住父亲的胳膊去踢野狗的胫骨，而我则转过身去走开了。夜里我们的房子在狭长的山谷里显得更加孤寂。我从羽绒被上拽下被套，头朝前钻了进去。风拂过野狗的那只爪

子。月光在它利爪的死皮上按压了一幅模糊的彩印画。花园大门旁边那两棵梧桐在跳动的阳台油灯灯光面前向夜色中后退了一小步，灌木丛的圆锥花序和细枝在野狗的毛皮呼出的最后一口热气中垂下了头，与此同时野狗的毛皮也瘫软松陷了下去。至少在动物们死亡的时候，它们应该能够开口说话，作为对它们长期沉默的补偿。（抄写别人的话。）

借助于三个被咬过的桃子成功地向象征意义转移

在服务窗口对面是物品保管柜。我随身带了三个桃子，事先我最好把它们统统吃完才对。就好比当人们不会使用打字机，但是却尝试去使用，尝试跟会用打字机的人一样以相同的速度敲击键盘，这样写出的单词在字母顺序上就会乱七八糟。当我说话的时候，字词自己会变得无法辨认，句子相互混杂，行列来回颠倒，直到我说着说着就连自己也不再清楚到底想说什么。

我把每个桃子都咬上一口，然后把它们放到我保管柜旁边的存放架上。在寄存之前还要办这么多麻烦的事情，我说道，为了给自己的迟疑辩解。尽管是周四，窗口前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寄存处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接过外套，把它们挂到衣帽间里。他们把寄存衣物的号码牌连同登记表当面交给顾客。他们解答应当怎样填写登记表之类的问题。他们发放圆珠笔，带有一家医疗保险公司印刷字样的蓝色圆珠笔，这家医保公司在此期间已经不复存在。偏偏在周四快要下班的时候到这里来，这或许不是一个好主意。或许我们在其他时间来就好了，我说这话是希望我们干脆离开这里。

是否存在一种理论，来说明在什么位置字母、确切地说是音节，其次是单词正好相互混淆？这种情况是否跟舌头、咽腔和喉咙有关，还是在之前从思想到言语的转换过程中就已开始？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因为一个身穿粉红色浴衣、头发凌乱的女人倒退着从我身旁跑了过去。人们想象中的疯子就是这样的，我说道。但紧接着我想起自己没有穿浴衣，甚至连一件浴衣也没有带，因为我也没有带睡衣，因为我连一件睡衣也没有。当人们必须去医院或者紧急寄存处的时候，人们应当拥有一件睡衣，最好人们像临产期的孕妇那样在浴室门口备放一个装有各种应急用品的提包。我觉得人们太长时间对什么都感到无所谓。人们坐在电视机前，总是听到女人们往一个提包里装了各种应急用品，因为她们有了身孕，或者听到他们给自己的丈夫往拘留所里送了

一个装有必需品的提包，但是人们就是觉得这跟自己无关。人们感觉跟自己有关的事情太少了。其实人们既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时间。

三个桃子不属于必需品，这一点就连我也清楚。它们首先粘住双手，然后是我保管柜旁边的存放架。纸巾属于必需品。我在考虑说些什么，如果被问及是否随身带了一个装有必需品的提包。我不想做错事。格尔妮卡抚摩了一下我的头：我真的可以撇下你一个人吗？她问道。我点了点头，因为我不想说错话。格尔妮卡站起身来注视着我。

真的就这样定了？

我第二次点了点头。

你是不是还有一些难言之隐？

我犹豫不决。

有什么就直说吧。

明天就是周五了。

还有什么？

我嘴里异常干涩。我的目光移向那三个被咬过的桃子。它们现在正是我需要的。但是我不敢迈出这两步。

说吧。

我从未告诉过你，但是我周五7点总要帮着做晨祷。

什么？

我一直还是辅弥撒者。

每个星期五都去？

是的，每周五都要做。

但是，这样有多久了？

已经五十四年了。

这样看来你是现有人员当中年龄最大的辅弥撒者了。

我点了点头。

缺了你晨祷肯定也能进行。

是的，一名修女将会帮助神父分配水和葡萄酒，并回答弥撒经文。

以前有过那样的时刻，那时候感觉不断滋生，一切都还是混沌无序，人们不打针不吃药，也没有相应的设施，而是一切都显得荒凉和空旷，个人恋爱也才在形成阶段，对上帝的信仰还相对较新，还没有被考虑完整并被细致入微地解读，而是显得不明确并被错误观点所危及，因此人们紧紧抓住最近旁的东西，把全部剩余的希望都寄托在它上面，在有疑惑的情况下放在保管柜旁边存放架上的那三个被咬过的桃子也能够充当这样的东西，然后它们成功地从实物转化成象征。因为人们还没等自己稍稍平静下来，就在想数字“3”可能意味着什么，被咬过的桃子和桃子作为桃子本身又会是什么意思，桃子的存在在这一刻好像指向超越其自身存在以外的东西，因为人们在这一刻变得更加平静和几近和睦，当人们于忙乱中和在最后紧急时刻向那边看过去、发现在保管柜旁边存放架上的那三个被咬过的桃子的时候。

我明白了，三位一体肯定是在一个这样的时刻里产生的，并且我有这种感觉，即三个漫不经心地被咬过和被放在一旁的桃子会从自身出发发生一种意义，这种意义甚至会令咬过它们并把它们放在一旁的那个人感到吃惊，更有甚者，这种意义会安慰把它们漫不经心和毫不必要地带到紧急存放处、在那里咬了它们并把它们放在一旁的那个人，向他传达他自己在几秒钟之前还一无所知的信息。奇迹恰恰就在于，一些事情一下子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从现在开始没有想到这一刻的情况下，我再也不会看到一个被咬过的桃子。这样一来桃子成了

象征和我个人形象的标志。其他人手里握着的是人们用以砍去他们头颅的宝剑，或者是他们创办的教堂，或者是他们抢劫的银行，或者是他们用来把自己吊死的窗棂中的十字槌架，跟他们一样我将把三个咬过的桃子握在手里，类似于上帝的魔术师唐博斯科所做的那样，他在《上帝喜欢的人》一书的扉页画上使四个小球在左手的手指间保持平衡。

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自我发展并导致死亡。我们并非死于生命，而是死于象征意义。谁若是不懂象征意义，他就会变得长生不死。寿命是根据占象征意义的比例计算出来的。比如说机器因为对自己的象征值一无所知，所以它们活得比人长久。被人类置入象征领域的东西也会相应地被人类所谋害（植物、动物、其他人）。

年表1：那些年剩下些什么

1957年

我父亲决定修缮工厂左侧的厂房。一名工人在拆除一座高炉的时候丧生。我母亲在前一天夜里做了个梦，预先梦到了这起不幸的发生。二月份宫殿花园里的一棵橡树倾倒在结冰的池塘上，砸伤了正在那里滑冰的一对儿兄妹。在通向克内藤布莱希废纸收购站的小街上一栋房屋的阁楼失火了，一个家庭里熟睡的父亲在这起火灾中丧命。洪水今年并未如期发生。

1958年

在夏季的三个月里，一位心理学家在不来宁克梅杰尔商场门口为进进出出的顾客进行免费治疗，方法是他让他们讲述一段童年的经历，让他们解释涂鸦图片。圣心耶稣教堂的神父为自己堂区牧民的灵魂得救而担心，但是并不公开或者在布道坛上对这一话题表态，因为据称那位心理学家来自美国，或者至少是由美国人花钱雇用的。其他人认为他是商场的一名员工，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广告宣传理念。八月份，尽管是假期，商场门口还是聚集了蜂拥的人群，人们叫来警察才把人群驱散。人们跟商场管理层达成一致，让那位心理学家每周只在两天下午给顾客治疗。在随后几周里商场顾客反正也对这种新的吸引力失去了兴趣，因此人们终止了和那位心理学家的合同。与此相反人们在商场门口设置了一个玻璃箱，里面是一个由玩具猴组成的乐队，如果人们投入十芬尼硬币，它们就开始演奏音乐。

1959年

拉丁文：智慧。

拉丁文：镜子。

施朗根巴德（Schlangenbad）在德语中直译为“蛇浴场”。

为纪念工厂新建侧翼厂房的落成典礼，我父亲想给位于工厂附近的圣心耶稣教区捐赠一件具有宗教内涵的艺术品，我们家也属于这个教区，艺术品应当被陈列在教堂的圣堂里。艺术家可以不按规定自行设计，但是他的作品里必须包含“镜子”这一主题，如有可能要把一面镜子设计在作品中，以此指涉我父亲的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之一。因为镜子作为虚荣的象征在教堂里名声不好，我父亲就在仓库楼梯旁被称作“茅舍”的小房间里安顿了一名神学系学生。在膳宿全免的情况下这名神学院学员必须在两周之内从《圣经》里找出所有的段落，相比人们唯一熟悉的来自《哥林多前书》里的记载，这些段落要更加积极，尤其是更为清晰地对镜子做出解释。《哥林多前书》里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透过一面镜子看到的是一句昏暗的话；但是然后就和镜中的自我面面相觑了。那名神学系学生给自己挣得了我父亲为成功找到相应记载而悬赏的五百马克，他查明智慧（sapientia）^①能够被描绘成女性，她左手执一面镜子（speculum^② sapientiae），右手握着一条蛇。蛇援引的是《马太福音》中的记载，里面这样说道：你们要像蛇一样聪明，而按照神学系学生的解释，镜子则让人回忆起《哥林多后书》里的话：现在我主的明净映照在我们所有人心里。一名来自美因茨的艺术家用两年前倾倒的橡树的木料雕刻了一座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智慧女神像。智慧女神左手执的那面镜子是由我父亲工厂的专业人员生产的。但是智慧女神右手里握的那条蛇却被一个圆规所取代，它是有远见规划的象征，跟通常对圣母玛利亚童贞女受孕的描绘一样，蛇则被踩在智慧女神的右脚底下。这样的设计考虑了很久以来人们对三十公里开外的施朗根巴德^③表现出的对抗心理，这种考虑应该让许多教区成员对蛇的地位的上升感到诧异才对。值此艺术品完成十周年之际，我们后来在艺术课上拿烙铁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仿制了智慧女神雕像。

1960年

我母亲生了个小弟弟或是小妹妹，但是他（她）刚出生没多久就在医院夭折了。紧接着母亲被送往波罗的海地区疗养六个星期。一名年轻的、被我父亲称作“姑娘”的工厂职工搬进小屋里，料理家务并照管我。当母亲疗养结束返回的时候，她依然跟我们住在一起，为了给母亲打打下手。

1961年

据说又有一个男孩在施朗根巴德因为被蛇咬了一口而丧命。因为被蛇咬的全都是来自其他城镇的儿童，因此这样的谣传持续了很久，说那些咬人的动物都是被训练过的，为了阻止游客的涌入。施朗根巴德当地人则拒绝接受此类指控，他们的理由是作为疗养浴场当地丝毫没有把游客吓退的兴趣。最后一条野生蛇是50年代初在疗养地的疗养大楼前被看到的，此外“施朗根巴德”这个名字并非涉及可能生活在那里的蛇，而是源于“施林根巴德”这一名称（名称中带有“缠绕”的意思），该名称是要让人们注意那些通往施朗根巴德的弯弯曲曲的盘陀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盘道于1941年被帝国交通部改直，并被那条一般叫作“鳗鱼坡”的连接主干线的路所取代。

1962年

我弟弟出生了。当一天下午我父母不在家、那个女孩也在去采购的路上时，我把他关到厨房和餐厅之间的递菜窗里，在炉子里烧掉了他的尿布。他撞开去厨房的门，在那里跌落到地上，面无血色地在地上躺着。我从递菜窗旁吧台上的玻璃瓶里倒出白兰地，喂了他一小口。喝完他睡着了。我们为出发前往伯特利整理衣物。在暑假前来了一名传教士。人们在教堂堂厅里陈列了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上面摆放着平板巧克力。谁要是连续一周每天早晨都参加晨祷礼拜仪式，他在最后一次弥撒结束时就可以拿走半板巧克力。

1963年

无事。

1964年

我在自己的生殖器上发现了两个特征。一个是我的阴囊上有一小块瓢虫大小的、无法被去除的黑色凸起。它的样子就仿佛一只甲壳虫像吸血扁虱那样紧紧地咬在那里。我不断尝试用手指甲清除掉这个东西，但却没有成功。第二个我注意到的特征是我阴茎底面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它呈红色，样子跟我膝盖上的伤疤很像。然而当我回忆膝盖上的伤疤是怎样留下的时候（我绊了个跟头，摔倒在厕所地板木条垫上突起的那块铁片上），我肯定是不小心伤到了自己的阴茎，当时我年纪比现在要小得多。或许我从生下来开始就已经带有这道疤痕。

1965年

那只甲壳虫不见了。我已经把它忘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我意识到它不再长在那里了。我养的仓鼠死了，这种情况我也是在第二天才注意到。然后发生了那起事故，从此我母亲无法再开口说话。一位明爱会女士定期来家里探视。但她并不住在那个小屋子里，而是晚上总要坐车回家。

1966年

我父亲给奇幻公园捐赠了一座桥。那是一座横跨一条深谷的吊桥，模仿的正是在巴特·泽格贝格举行的卡尔·麦音乐节期间演出《在巴尔干大峡谷中》所使用的那种吊桥。为庆祝吊桥竣工我应该穿着印第安人服装从桥上走过，并演唱雷巴娜的歌曲。尽管我们在前一天晚上把这首歌曲练习了两遍，而且我不用扶栏杆就能从摇摇晃晃的桥上走过，一个委员会还是在表演即将开始的时候取消了我的登场。我父亲大为光火，而我则不仅有些失望，而且也感到心情放松，因为我在记歌词方面总有困难，总记不清跟在“我在你的眼神里看到了悲伤”这句歌词后面的是什么。相反我总是想起那句“一颗小星星把她引向约旦河”

滩”，它出自彼得·科尼利厄斯的歌曲，我在三王来朝节那一天在教堂里唱过这首歌。

1967年

我看到了我的第一个死者。此外我有两次夜里从家里偷偷溜出去，在外面到处闲荡。我有过不知羞耻的想法。独自以及和其他人一道。我躲在花园篱笆后面，企图偷看贝尔林格夫人穿着泳衣的样子，但是她在这天中午并未从房子里出来。而且在另外三天中午她也没有出来。我把赖讷的堂兄弟借给我读的一段文字抄写了下来，文中一个女人在讲述，她是怎样等候丈夫的归来并且在连衣裙下面什么也没有穿，然后她丈夫是怎样从她的肚脐里喝香槟酒的。我们把一根针刺进手指，让鲜血滴到一杯水里，把这杯水分喝掉，通过这歃血之盟我们结拜为兄弟。

1968年

我尝试伸出手去拨弄溪流中的那株多肉植物，为了看一下是否它在什么地方被绊住了，是否它或许还真是一颗头颅。两个男人出现在桥上，他们在注视着我的举动。他们倚靠在桥栏上，但是一句话也不说。傍晚的黑云浮现在他们身后的房屋上空和修剪过的梧桐树枝之间。两天之后在傍晚时分我发烧了。尽管我身上发烫，但我一直还有双手在冷水里漂浮的感觉。一个裸露的膝盖。一颗甘蓝叶球。我弟弟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给我看一匹红色的小塑料马，我骑着它朝着望不到尽头的沉睡疾驰而去。

1969年

暑假前我进了一家疗养院。我留级了，截止到秋季一直在上寄宿学校。

1970年

我站在一处相对平坦的地形前面，背景是大黄种植地段，左前方有一条布满尘土的田间小路。一匹马在拖拽它的挽具。一只鸟儿飞起，往我放在双腿间的书包上投下了它的影子。在栽有两棵楸树的围墙后面出现了一些小点，那是手里握着三角彩旗的幼儿园的孩子。

询问圣母怜子图和圣心耶稣教堂

您曾经是比伯里希圣心耶稣教堂的辅弥撒者，并且准确地说是女恐怖分子比尔吉特·霍格费尔德从1969年到1973年上过管风琴课的那家圣心耶稣教堂，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

请您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

是的，也许吧。

霍格费尔德女士生于1956年7月，过去和现在都比您小将近一岁，是真的吗？

如果她确定是1956年7月出生的，那么这种情况是正确的。

尽管比尔吉特·霍格费尔德过去和现在都比您小将近一岁，但是她是红军派的成员，而您据说不是。对此您能给出任何一种解释吗？

一种解释？我.....

太胆小了，您是想这样说吗？

胆小？对，肯定也是。但是当时，当红军派.....

您说的是第一代红军派？

是的。没错，我总是只谈及第一代。也就是说，在他们当时开始，更有甚者，当他们后来在施塔姆海姆坐牢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您就干脆直说吧，当时您被自己一种常见的青春期冲动所侵袭，带着这样的多愁善感您直到今天一直在使自己的整个人生复杂化。您把一张关于霍尔格·麦恩斯死讯的海报挂在房间里，海报上写着“一位同志牺牲了”，挂在它旁边的是一幅“谁人”乐队的招贴画，当时该乐队早已过了它的巅峰期，但毕竟也曾经有过年纪轻轻就死去的想法。乐队成员当中只有一人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您当然不会真正与这些来自伦敦郊区的面孔达成共鸣，而霍尔格·麦恩斯，就像他当时被捕时只穿了一条黑色的内裤那样，这让您立即回想起在客西马尼园里的拘捕情况.....

据我所知当时耶稣浑身上下穿得很严实。

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当然后来，在绝食之后，整个圣像学之于基督的葬仪才起了作用。

当时有关霍尔格·麦恩斯的照片令我回想起两幅绘画作品，一幅是荷尔拜因创作的《墓中基督》，严格地讲，不管怎样它也是一幅渎神的画作，画中那绝望和受到惊吓的身体被囚禁在一个狭窄的箱盒里，关在里面是不可能逃出去的，那情形就是被活活埋葬，仿佛荷尔拜因想用这幅画否定耶稣的复活。另一幅当然是曼特尼亚创作的《哀悼基督》，当这幅画被尸体剖验处公开的时候，它也同样从透视技法来看显得太短和扭曲变形。

所有恐怖分子的脑浆都会被取出，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没有脑浆被埋葬的，这一点您知道吗？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随便问一下而已。

就是通常纳粹所干的勾当：测量脑浆，为了从中断定无价值的生命。

那是为了搞神经塑化研究。

当时？

当时还没有。因此所有的脑浆都被保存这么长时间。

因为人们想证明当时还无法证明的事情？

“瞧这个人”，彼拉多看到戴荆棘冠冕的耶稣，对众人所说的话。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第19章第5节。

我们最好再回到“瞧这个人”^②的象征意义上来，这一象征使您对恐怖主义产生了如此深的印象，因为您实际上好像没有任何过渡就又重新找回了基督教教育的圣像语言，而当初您是尝试（当然是徒劳的）去反对这种语言的。

这些也都是令人难忘的图画，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可以与我交谈，它恰恰是美学层面。

美学？

是的。

一个涉及恐怖主义的奇特概念，您不觉得吗？

您这样认为吗？

我们还是回到比尔吉特·霍格费尔德的话题上吧。鉴于您也频繁地在教堂周围闲荡过，您不会向我讲述您从未遇见过比尔吉特·霍格费尔德吧。例如当她在去教堂上管风琴课的路上，或者在上完管风琴课返回的路上。

我回忆不起来。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即您作为年长者给比尔吉特·霍格费尔德塞了一张小纸条，我根本不愿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囚犯间的秘密通信，或者从我来说也会亲自和她交谈，为了和她站在位于教堂侧门入口旁边的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画像前面，人们上完管风琴课之后都会向右绕过教堂，或许为了在那儿亲吻她，向她灌输在此期间在您的

头脑中逐渐形成的、尚未完全成熟的思想。因为那个姑娘绝不会自己产生这样的思想，她更愿意弹奏巴赫的赋格曲。即便是后来在单人牢房里，当人们给了她一支竖笛而不是管风琴的时候，她说起的也是巴赫赋格曲中她的悲痛……

演奏管风琴是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这一点没错。

乐器中的女王……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和自己进行多声部演奏，用双脚和双手，用两个手键盘，这确实是一些特别的事情，它总能使我的头脑冷静下来，因为演奏过程占去了我全部精力，这种情况在我的一生当中也没有几次。

您也弹奏过管风琴？

很晚以后才弹。很多年里我都无法忍受它的音调。

因为这种音调让您想起了比尔吉特·霍格费尔德？

不，因为我禁不住会想起那么多星期天，什么叫想起，因为我在听到第一声管风琴音调的时候就又意识到了那种星期天的感觉，那种焚香和面条汤的气味。

这么说比尔吉特·霍格费尔德就是这个克劳迪娅了？

不，不，根本不是。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此外克劳迪娅年纪要大一些。

年纪大一些，年纪小一些，所有这些人们都可以相应地虚构。

不，在这方面您完全想错了。

那么那则故事呢？涉及池塘巷道姆面包店斜对面的庭院入口的那则？

有什么问题吗？

在庭院入口、确切地说是在那栋房子里有一位女士被杀害了，您知道这个吗？

我觉得您把一些事情搞错了。在那栋房子里住的是那位被害女士的母亲。那位女士本人已经结婚，和她的丈夫搬到了格雷泽尔贝格，然后这个男人有一天杀害了她。您误以为住在那栋房子里的是被害者，后来她的母亲对我母亲说，她也不想再见到那个男人的父母了，尽管两家父母此前相处得很融洽，而且也已经有了孙子孙女。但是如她所言，她不愿和杀人犯们有任何来往。

相反我不得不断定，您倒是乐意和“杀人犯们”有瓜葛，如果不是和一起甚至多起谋杀事件有牵连的话。否则您为何要提到那栋房子呢？

不，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那您为什么要提到那栋房子呢？

随便说说，没有原因。

在您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原因的。

您这么认为？

我是这么认为的，好了，您就如实说吧。

我们有一次往庭院入口处扔了爆竹。

当时，1969年？

是的，然后从院子里出来一个女人，开始破口大骂，于是我们就跑了，但是后来几个男人截住了我们，说我们应当赔礼道歉，当我们随他们进入房屋走廊的时候，他们抓住我们并报了警，声称我们用一把刀威胁了那个女人。

你们那样做了吗？

当然没有。

那么那个女人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

不知道。我们身上带了一把刀，是一把随身带的小折刀，因为人们必须把小爆竹从一根引线上割断，但是我们没有威胁她。

然后呢？

然后警察来了，开车把我们每个人都送回了家。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不，第二天我们必须去派出所，在那里做笔录，当然人们不相信我们。

为什么不相信？

那您相信我吗？

这要看具体情况了。

正是这样。当时人们也不相信我们，因为男孩子普遍撒谎，而穿长罩围裙的女人一般讲的都是实话。但是人们想迁就我们，于是那名警官说道，我们干脆就往笔录里这么写：我一时冲动感情用事。

这挺有意思的。那您是那样做的？

做什么？

感情用事？

我根本就不清楚什么叫“感情用事”。但是那名警官坚持认为，这样说能够起到减轻处分的效果。

是的，这一点您应该始终牢记，有一些事情确实能够起到减刑的效果。

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呀。我们是无辜的。

即使是无辜的，人们也总能用得上一些有助于减刑的事由。

如果您这么认为的话。

那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不，我们上了法庭。审理在上午进行，我们不得不对学校说：我们必须出庭。我刚刚才意识到，这其实挺奇怪的，即法庭审理、预约看病，还有诸如……

您指的是审讯？

是的，也包括这个，所有这些总是在上午进行，仿佛人们同时应当被公开曝光，因为人们必须总要额外向单位和学校请假。

因为您没有从事固定的工作，这件事对您也不会有其他影响。

是的，只是在当时有影响，但是无所谓了。不管怎样我们被判处五马克罚金，这笔钱我们必须支付给红十字会。

在宣判的时候是您一个人吗？

我和阿希姆，因为我们俩是唯一年满十四岁的。

我指的是您的父母？

不，他们不在场。

这似乎就是红军派的诞生时刻了？

从战后使用的去污剂到犹大的历史形象的结合

原文为拉丁文，又译“圣母无原罪始胎”。

人们必须对战后使用的去污剂写点什么。例如K2R去污剂，这个名字完全沿用了纳粹的用词风格，不仅是因为名字里也隐含了“集中营”的发音。此外它还让人联想起一种炸弹，就像纳粹的秘密武器V2型导弹那样的，尽管这种去污剂的软管本身显得并无危害，尽管人们在给它起名的时候据说是想到了Kappa Due牌家用清洁剂。但是必须像征服一座山一样战胜污渍，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想象。污渍和它的清除在战后德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人们怎样才能清除墨水、烟灸、红酒污渍等等，这方面的说明应有尽有。污渍是从不受监控的工作过程到不断发展的官僚主义的最后一道交通连接。此外它还令人回忆起过去，当时为了剔除很大一部分民众，人们就往他们的衣服上弄上污渍。因为身上一旦有了污点就无法再被取消，所以人们尝试至少让自己尽可能不被玷污。通过无玷始胎^①使整个新建联邦共和国受孕，没有历史，也没有原罪。人们相互开具贝西尔（洗衣粉）许可证，使化学洗衣法趋于完美，把所有人们能回忆起的否认罪责的行为都纳入化学洗衣法的范畴。但是人们并未意识到，对犹太人的系统化根除其实也能被描述为化学洗涤，甚至可能已经这样描述了。于是在城市的任何地方都出现了作为无意识回忆场所的化学洗衣店，为了忏悔人们每周都要去这些地方朝圣。这就是我的理论。一方面。

如果我不是从社会视角，而是从宗教层面加以观测的话，那么我的理论的另一方面是，去污剂应当有助于对抗经常是非常残暴的奴役人的天意，人即使尽最大努力也无法逃脱这种天意。自愿似乎是一个骗人的幽灵，因为即使我尝试用一条餐巾并带着格外的谨慎保护自己免受天意的支配，可还是无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相反，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弄脏和玷污自己。如果仔细审视一下个别人的传记，人们会发现他们的生平好像都是按照一种内部模式在运行，而当事人自己却对此

一无所知，他们盲目地依循这种模式，但却无法对它进行任何改变。跟由人想出的那么多洗涤剂和技术设备一样，去污剂也应当把这种宿命论从我们身上洗刷掉，因此它不断被继续完善，最终也包括洗涤方法自身，也就是说去污剂的应用，它的应用包含了一种宗教仪式的作用。但是溅上污渍是必要的，因为罪孽而被事先确定的玷污的象征，虽然玷污看似象征了某个人的罪过和责任，但尽管如此它对于历史的进程也是必要的，因此罪人总在通过毫无意义的努力尝试不去犯罪。他希望通过这种努力能够逃脱即将到来的惩罚，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才认识到，他犯下的罪行构成个人存在和他人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他还认识到，他的努力和忧伤都是徒劳的，因为既然他的罪孽是世界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那么通常意义上的罪责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为我们的人生之路跟犹大的没什么区别，他是来自耶路撒冷的西蒙的儿子，但他却不使用父亲的名字。相反他是根据伊莎里奥特这个地方被取名的，在那里他在自己用灯芯草编织的篮子里被冲到岸边，他父母在犹大出生后不久就把他丢弃在地中海的芦苇丛里，因为母亲还在怀孕期间就梦见，这个孩子将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不幸。从表面上看不幸是被祛除了，但是伊莎里奥特岛的女王在海岸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了小犹大，长期以来她一直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孩子，于是她把犹大偷偷带回家，让人暗地里把他养大，同时她自己假装怀孕的样子，为了在以后让他冒充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遮盖骗局，女王的孕戏演得如此投入，以至于她没过多久真的生了自己的儿子，并把他和犹大一起抚养长大。但是还在当时犹大就已经是个坏孩子了，并恶意戏弄女王的亲生儿子，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觉察到弟弟比他更受宠爱。女王毫不留情地惩罚他的过失，因为其实这时候犹大已经变得多余了，令她天天回想起自己不仅对丈夫，而且也对全体民众撒下的谎言。终于有一次她愤怒地告诉犹大，他只是一个被冲到岸边的弃婴而已，于是他在绝望之中掐死了弟弟并逃往耶路撒冷，在那里他投靠了彼拉多，后者恰好在寻找一名伶俐的年轻人给自己当助手。

犹大和彼拉多之所以相处得那么好，是因为彼拉多也杀害了自己的异母兄弟。彼拉多的父亲是泰鲁斯国王，他与一名普通磨坊工人的女儿

有男女关系。磨坊工人叫阿图斯，他女儿叫彼拉，因此为了简单起见国王就把他的私生子称作彼拉多。彼拉多起初在母亲身边成长。三岁时他来到国王的宫廷，在那儿和国王的儿子一块儿接受教育。因为他的异母兄弟在各方面都比他强，满腔羡慕和嫉妒的彼拉多最终杀害了他。但他并没有像犹大那样逃走，而是被他父亲作为纳贡而非人质派往罗马，在那儿他和另一名人质、一名来自法国的年轻人相遇。两人结为好友，但即使在这里彼拉多也又开始嫉妒同伴的品性，最终也杀害了他。于是人们把他打发到本都岛上，因为那里有一个野蛮民族，经常杀死罗马总督，不能容忍别人的统治。但是彼拉多如此机敏，也因为他比这帮坏人和野蛮人更坏更野蛮，以至于他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暴力统治之下，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称他为本都·彼拉多。他的名气这么大，乃至希律把他请到耶路撒冷与自己共谋，并委托他担任总督一职。也就是在那里谋害自己兄弟的两名杀人犯犹大·伊莎里奥特和本都·彼拉多碰面了。

但是犹大不知道，他的很多弯路和恶行只是听从命运安排，重又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一天本都·彼拉多从他的行宫向外张望，看到在一个园子里一棵树上结着精美的苹果。一直以来就饱受羡慕、嫉妒和贪婪的折磨，他认为自己没有这些苹果就活不下去，于是派犹大去把那些苹果给他取来。犹大遵命照办。但是还没等他摘几个苹果，房子的主人从里面出来了，他不是别人，正是犹大的亲生父亲西蒙。为了能够把苹果带给彼拉多，犹大砸死了他的父亲，出于感激彼拉多把西蒙的田产赠送给犹大，让西蒙的遗孀（她可是犹大自己的母亲啊）做他的妻子。当她有一天向他抱怨自己的苦楚，讲述她以前丢弃了她的孩子，现在又失去了她的丈夫，这时候犹大才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然后他跑到耶稣那儿，为了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耶稣接纳了他，很快犹大就成为他最喜爱的门徒，耶稣非常信任他，把所有的财务事项都交由他来管理。可是犹大总是欺骗他的主人，从他管理的钱箱里私吞钱财。到最后他少了三十枚银币，为这他出卖了耶稣，以便重新弥补赤字。当他认识到自己行径的荒唐和残忍时，他走向一片田野，在一棵树上上吊自尽。但是就连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事先给他安排好的，因为他通过自缢表明了，他既不属于天上的天使也不属于地球上的人类，而是作为撒旦的牺牲品悬在两者之间。正如约翰所言，撒旦最终进入

他的体内，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把一小口面包浸入葡萄酒里并递给他，因为圣餐仪式不仅能够使人摆脱罪孽，如果天意希望的话也能够招致邪恶，这要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了，因为任何行为都不是作为一目了然的行为出现的，而是只在各自的关联中才得以实现。就如同摩西以跟犹大相同的方式在一个用灯芯草编成的篮子里被丢弃在尼罗河的芦苇丛里，就像犹大被丢弃在地中海的芦苇丛里一样，但却带着相似的命运成长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当犹大上吊身亡的时候，他被上帝赐予的灵魂却无法通过他用以犯罪的咽喉逸出，因为他是用他的话语出卖了上帝，因此犹大被从中间撕成两半，而向外掉落的不是他的灵魂而是他的内脏，因为出卖上帝的想法在他体内是从这些内脏开始向上升腾的。

但是当时，当犹大·伊莎里奥特出卖了耶稣，本都·彼拉多判处他死刑的时候，罗马皇帝提比略身患重病。医生们都帮不了他，但他听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位医生，他仅凭话语就能治愈疾病。于是他派出随从去寻找这名医生。当随从得知这名医生就是耶稣本人，得知耶稣已经被本都·彼拉多判刑和处死，他吓得不得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幸亏他遇到了圣徒薇罗尼卡，在她的汗巾上印有耶稣的画像。随从请求薇罗尼卡陪他去见提比略皇帝，情况果真如此：皇帝一见到耶稣的画像就恢复了健康。但是当皇帝现在获悉，本都·彼拉多判处了耶稣死刑，他勃然大怒，让人去把总督叫来，为了惩处他这种罪恶的行为。然而当本都·彼拉多穿着耶稣没有缝制的外套出现在提比略面前时，皇帝已经不再感到生气了，而是变得非常温和，又让本都·彼拉多走了。还没等他走远，皇帝又变得愤怒起来，再次派人去叫他回来，以便这一次真正惩罚他。可是彼拉多又穿着我主上帝的外套出现，而提比略又一次对他无可奈何。就这样反反复复了三次，直到皇帝突发灵感，命令彼拉多脱去外套。现在提比略终于也能够在彼拉多在场的情况下感觉到对他的愤怒了。他让人把他打入地牢，然后和他的法官们商议，对他来说最不体面的惩罚是什么。但是本都·彼拉多通过刺死自己逃脱了审判。现在人们取了他的尸体，在上面捆了一块磨石，把它沉入台伯河。但是因为彼拉多完全属于撒旦，所以撒旦跟死者玩起了游戏，让他连带磨石从河里飞向空中，制造了一种无比喧闹的场面，直到人们把死尸又拽了出来，把它送到罗马城门前面。但是在那儿情况也没什

么两样。人们探寻了三个不同的地方，直到最后把本都·彼拉多扔到一处偏僻的山谷凹地里，在那里他今天还和捆在一起的磨石一道被魔鬼在空中旋绕。

但是犹大不仅因为他的背叛而显得有意思和非同寻常，因为在他身上再次汇聚了从偷食禁果的原罪到该隐杀弟再到乱伦的全部邪恶，而且也因为他在《圣经》题材领域里犯下了唯一的弑父罪。圣经里没有关于弑父的记载，它记述的都是父亲杀死儿子或者父子相互残杀的故事。但是去污剂和化学洗衣法属于父辈一代的产物，他们尝试用这些东西去掩饰他们明显的行为缺陷，同时却让儿子们首先相互攻讦，最后畏罪自杀。

为了发现罪孽的原理，那名青少年撰写了他个人的自白书

我把我主的名字塞进一栋用纸板做成的小房子里，用彩笔在房子上画了门和窗，仿佛他可以随时进出并照管这个世界，而事实上他却被关押在最深度的黑暗当中。此外纸板是潮湿的，闻起来有一股特别的味道。

我用啤酒杯垫添加了三杯一体，相应地用圆珠笔画的线条代表啤酒，用圆珠笔画的圆圈代表小杯烈酒，或者让来自高年级的其他人对它们做相应解释。

我用圣徒和殉难者的名字来命名小型塑料制品，然后一气之下胡乱使用这些制品。

我用一把蓝色的塑料铲讥讽了表现为一座沙垒的上帝的创造，因为我想象自己在这件粗劣的作品里居住和统治，穿过狭窄、原本是为弹子设计的隧道和水渠追赶所有令我不快的人，直到他们喘不过气——而且是永远。

我不小心把内裤穿反了，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并未更正这样的疏忽，而是从一时疏忽当中产生了不知羞耻的想法，这样做就仿佛我是个女孩，因为女孩子的内裤上是没有洞口的，现在我可以自我渴求并把自己用作淫秽想象的模型了。

我从树上扯下树枝，用这些树枝不停地抽打折磨其他树木，直到从树皮里冒出树脂，即使这样我也不通情达理。

我抵制住了夹心巧克力糖、周末和《新周刊》里那些裸体女孩的诱惑，但却对阿希姆的母亲和贝尔林格夫人有了不知羞耻的念头，而我事实上仅有唯一的一次去过游泳池，但是那一次我在年龄比我大的男

孩子们的唆使下，跟其他人一道在浅水区向女孩子扑去，并尝试去抓她们的胸脯。

我把人们不应该含在嘴里的东西放入口中，比如弹子和我动物园里的塑料动物，也把像豌豆和半圆形石子之类的东西塞进其他身体穴孔，即耳朵和鼻子，但是下体的除外，紧接着我用灰色的黏土塑成一副伤员器具，它有一个十字架和一个配有三只小碟的托盘，我把盐、水和橄榄油倒进小碟，在自己身上试验了这种患者涂油。

我把自己也不太明白的事情悄悄讲给其他人听，比如一位农夫，他想把一头活猪装在一个袋子里运到市场上去，结果袋子扯裂了，再比如一种药物，女生使用之后会脖子僵硬，因为它其实是为男士准备的。

我用不计其数的谎言背叛和污辱了上帝的创造，因为我编造了那么多谎言，仿佛我自己和造物神很像，能够为了自己低微的目的而使上帝的意愿和我主的深刻意旨失效，同时我跟他完全一样在他创造的世界旁边也创造了一个世界，从而使自己表现得就像他的替身一样，在我创造的世界里家庭作业被完成，二十芬尼丢失了，而不是事实上被用来买巧克力王子了，祈祷既不被停止也不会废话连篇，矛盾被调解而不是被挑起，体操用品包被窃，而不是早晨在去上学的路上自己把它扔到灌木丛后面，等等等等。

我朝拜了偶像，和着她的音乐跳了舞（夹子布鲁斯舞曲）。

我在弥撒期间和别人互换了恐怖图片，偷偷看了不良照片，在化体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一直都在脑子里背诵流行歌曲排行榜，在“感谢上帝”部分时心里在想：感谢上帝。教堂仪式结束了，我翻开赞美诗集，把第517首指给我的邻座看，因为作者叫劳伦修斯·封·施努菲斯，并嘲笑了这个名字。

通过给我的仓鼠戴上一顶纸做的主教冠冕，我讥讽了神圣的权力象征物，仓鼠戴着主教冠冕在笼子里瞎跑了将近半分钟，之后才得以抖落主教冠冕，接着在夜里把它啃坏，因此没过多久仓鼠就死了，我感觉对它无辜的生命负有责任。

在作为辅弥撒者乘出租车去参加一个葬礼期间，我从香炉里取出焚香，把它塞进嘴里并咽了下去。

我在弥撒即将开始前还偷吃了巧克力，因此我的嘴巴和我的身体是不纯净的，但我仍然参加了圣餐仪式，接受了圣饼并由此侮辱了它。

即使是在忏悔的时候我也撒了谎，因此每一次忏悔都是无效的，每一次赦免都是无效的，每一次宽恕都是没有价值的，这完全归咎于我自己，因为我滥用了上帝的无限善意，没有认识到善良的价值，尽管如此周六傍晚使自己得到暂时的解脱，感觉自己得到了净化，而这跟所有其他事情一样也同样是一个谎言。

世界是一座迷宫，我们被困在一只伏虎里

米勒同志坐到我身边，摊开图纸，向我透露秘密，尽管我才刚刚算是个小男孩。

“这让您很吃惊？”他问道。他是唯一用“您”来称呼我这个孩子的人，而且毫无嘲讽的意思。他面带微笑把我的汽水推到一边，把它放到图纸的右侧边缘上，这样图纸就不会再卷起来了，同时他在另一侧上放了个烟灰缸。

“您往这儿看！”他说道。我屈膝蹲坐到长椅上，把两肘支起来，第一次见到了迷宫。

“一座迷宫。”我说道。米勒同志赞许地笑了笑，打开他旅行刀手柄四周的保险扣环。我用伸出的食指探寻迷宫的路径，但却找不到起点或者终点。米勒同志吹掉老板娘放在他柠檬汽水旁边的灰色吸管上的纸片。一小片云沿着大街飞渡，先是反射在黑色的汽车上，然后又映在雨后潮湿的石块路面上。

“最高保密等级。”米勒同志在我的左耳边悄悄说。

“最高保密等级。”我重复了一遍。米勒同志拔出匕首，先在他自己的、接着又在我的食指上划了一个小十字形。一滴血向上涌出，停留在指尖。我们相继把手指浸入剩余的柠檬汽水里，每个人都喝了一口饮料和血的混合物，父母在家里坐在收音机前，倘若人们还有父母的话，他们在听带有轻快音乐的广播，这些音乐是由一个饭店酒吧转播的。战争在城外和河流的另一侧激烈地进行着。一艘汽船驶过，船上有人在跳舞。投弹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烟火。

“成年人的世界究竟是什么？”米勒同志问道，目光从我身边扫过，投向挤满了人的餐馆。我尝试提醒他还不会正确地书写，甚至连自己

的名字都还写不对，一旦我应当在什么上面签字的话。我把书包推到弯曲的双腿下面，为了能够用胳膊够到桌子。原本我只是在等我妹妹。后屋的门被撞开，有人抽着雪茄吞云吐雾地冲了出来，摔倒在酒吧间的地板上。因为他用两只手提着解开的裤腰，所以他在摔倒时无法用手支撑身体，结果首先下巴撞到了地板上。在一只手风琴上快速奏出的几声活泼放纵的和弦与人们的哄堂大笑交汇在一起。门再次荡开，在关上之前它又一次把躺在地上的那个人撞到一边。

“人们想放声大笑和轻松愉快。他们不希望战争。他们需要命令和规定，否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会变成一座唯一的迷宫。他们想乘坐汽船航行、跳舞娱乐，他们所有人、他们全都不想去死，因此他们转得越来越快，叫喊声越来越大，站到板条箱上去，在向下跳的时候还尝试用脚去踩踏身边人的脑袋。宁肯进监狱，宁肯上前线也不回家，这是唯一的理由，您明白吗？”我摇了摇头。他笑了起来，用手掠了一下我的头发。“您对我来说已经算一个了。不，我是当真的。”他朝着我弯下身子，以至于我能够闻到他呼出的柠檬汽水味道，“您没有问题。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男人。迷宫只是一种隐喻，至少在某一层面上。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它的内涵要大于真正的迷宫。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悟出这个道理。它具有一些超验的东西，几乎跟死亡一样。既然已经在谈论没收财产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必须要断定的是，人们剥夺了我们死亡的权利。太久以来我们的死亡一直都是其他人的死亡，这一点甚至被称颂为我们的哲学认识。死亡不属于垂死者个人，据说他根本无法应对死亡。垂死者就那么死去了，他再次猛然直起身来或者半睡半醒、结结巴巴和大声喊叫，但是无论他说些什么，他对自己的死亡都一无所知。连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因为人们想象垂死者对自己的死亡一无所知，所以死亡成为一种对哲学提出的挑战。在思想上深入探究死亡的根源，揭露它的秘密，这成为一门科学所要解决的任务，这门科学迄今为止只关心初始元素是由水还是由火组成的。尽管所有的努力，那些前额布满皱纹的思想家们最终只想到交易这一伟大的主意。不是把死亡归还给我们，现在的说法是作为对自己死亡的回报我们将得到很多其他人的死亡。一种折扣优待券系统。原因是：只有在其他人的死亡中我们才能够理解死亡等等。在此期间不断有人死去，生命在一种剥夺死亡权利的状态中被丢掉，通过在战场上死亡、为祖

国阵亡的方式，当然我们从不把它称作阵亡（我们还能怎么做呢？），而是叫作倒毙，因为当我们在城外、在村庄、在河边、在跳舞娱乐和乘汽船航行中呼吸最后一口气时，我们就像牲畜那样倒毙了。我们是那些使这种乘汽船航行和跳舞娱乐成为可能并得以保留的人，说心里话它们是一种相当可疑的文化财富。但是无所谓了。”就跟他先前抓住我的后脑勺相类似，现在他也抓住他自己的头后部，闭上双眼把它向前按，仿佛他想要回忆起什么似的。

“迷宫的道理就在于此。如果您曾经、就像我或者我的同志们一样，连续好几个夜晚四处瞎荡，穿过的树林如此茂密，以至于在里面永远都不会有白天，如果您在四周看到了沾满血的双手、被擦伤的面孔和开裂的制服，那么，只有这样您才会突然和一下子明白，这种其他现实、即死亡的现实是什么意思了。根本不用浪费思想，您就理解了迷宫的原理。您不再怀疑由人和公牛所生的杂种，相反，恰恰相反。您知道，而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放心，您知道一切由人想出的东西在现实中都会拥有一种反响，这种反响通过思想才得以产生。粗树枝像受伤的动物一样吼叫，当它们被割断的时候，细枝条奋起反抗，撞击它们的胸口和腹部。不，在那外边人们不再知道哪儿是前面、哪儿是后面，人们不再知道向何方运动，寻找谁，保护谁，更不用说对抗谁了。我在那外边跟自己做斗争，除此之外不与任何人为敌。但是将在我们坟墓上跳舞的却是孩子们。”他开始笑了起来，让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像玩具小娃娃的双腿一样从迷宫图纸上走过。

“你们也应该跳舞，否则为何会有那些坟墓呢？请您不要让别人把自己搞糊涂，无论人们向您报道什么。所有的事情都仅仅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整个围绕死亡的小题大做，勋章，庆典，所有这些都应当夺去死亡与生命的联系，这就是死亡的超验，如果您能明白的话。那边是死者，那边是生者，位于他们之间的是坟墓，一道沟渠就是坟墓，两者之间不允许有联系，人们没完没了地在喷洒圣水和发表演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超验。”

通向后屋的门又开了片刻。在成团的烟雾之间我看到一个半裸的女人躺在其中一张桌子上。米勒同志从他的旅行刀上拭去细微的血迹，把

它插回到别在腰带上的皮鞘里。”亲爱的朋友，迷宫的意义可要远大于一个简单的隐喻，它是一种内在的现实。这种现实我们必须承载在我们心中。那边是公牛和人生出的杂种，我们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就像是来自童话世界的一个幻象。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幻象呢？他们被另一个大的幻象即上帝强加给我们。如果存在上帝，也就会有一种索要祭品的、由公牛和人组成的混合物。但是上帝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我和您以及所有其他人一起，必须在小房间里长大，和那些到处惊吓我们的人一道。但是我跑题了。”米勒同志中断了一会儿，从他的左侧裤兜里取出一条白手绢，用它把嘴唇擦干净。我感到疲倦了。夜晚在灰色的单行道上和自己玩起捉迷藏。

“幽殿或者迷宫，如您习惯于正确表述的那样，”米勒同志重新开始说道，“和我们一起成长。如果人们相信能够走出这个迷宫，那这是一个谎言。我把它称作父辈的谎言。他们把不能用的工具交到我们手里，以此欺骗我们说有逃出迷宫的可能性。但是这应当是哪种可能呢？不，这与我们想要的太多、飞得太高毫无关系，这些都是父辈科学的谎言，散布这些谎言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有理的一方。从我们让人把翅膀捆住那一刻起，我们的死亡就被事先确定了。到底是谁设计和让人建造了迷宫，并把自己锁在里面呢？这里涉及的是社会理论，但就跟所有的理论一样它也是一种极其不顶用的工具。”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穿过饭馆把我拽到外面，那里正从运河方向沿街道吹来一阵微风。他把头垂了片刻，然后又镇静下来继续说道：“人们应当让世界远离我们。这是父辈们、准确地说是那位父亲的思想，因为他，伟大的上帝，开始在我们面前掩饰世界，开始用话语、解释、阐明、理论和论点来包裹世界，我们在这些东西里长大，但却没有意识到它们。在无法满足的对于死亡的渴望面前，我们想起的没有别的，只有设计新的理论。瞧这儿！”他弯下身子，用右手食指从开裂的铺路石块中间抠出一些黏土。“泥土。再看那儿。”他向前迈了一步，再次弯下身子，用张开的手拍打一个小水坑，“水。还有空气。”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挥动左手示意。一辆黑色的汽车未开车灯，从两棵榆树之间的夹空里驶出，一直开到我们跟前。后门开启，米勒同志拽着我和他一道进入车内。

“我妹妹……”我说道。

“是一个轻浮的少女。”米勒说。我们沿运河行驶，轮胎在铺石路面上发出轻轻的摩擦声。我感觉饿了。我们朝市政广场方向驶去。我在考虑今天那儿是否有跟往常一样的集会，在这样的集会上他们用焰火射击天上的星星，我们的父母会发出一片“哇、啊”的惊呼声，会短暂地重温当年热恋的感觉，会预感到一种反对成堆的啤酒箱和发出尖叫声的麦克风、反抗上帝的迷宫学说的欲望，为了紧接着用不断大声喊出的“我们追随！我们追随！”来赞同这种学说。

“炸弹存放在一个伏虎里，”米勒同志向我解释说，“但是我们在起爆方面还有困难。为此我们需要您。您必须待在舞台附近。当他赞赏那些连成环形的身体，并且就像他迄今为止每天晚上、仅仅在今年就已经做过二百三十次那样，身子前倾做出一种和蔼的问候时，您就将操作起爆装置，与丧失人性地被关锁起来的他儿子的身体一道，他、领袖、理论之父将会被撕成碎片。”他把一个正方形的小盒子塞到我手里，盒子上一只红色的小灯在不定时地一闪一闪。灯下面安装了一个摇杆开关。“您只需使开关一直朝上，您要做的就是这些。”

“我会死吗？”我问道。

“也许。”米勒同志抓住我的手，表情严肃地握了握它。

“我们将会以您的名字命名我们在集体活动中制作的轮船模型。”他说道。

如果他仅仅是眼瞎了，就像童话里的那样，并且只会摸索你的话，那么我就索性穿上你的长睡衣，你穿上我的。她笑着站到我身旁。我几乎和你一般高了。我点了点头。仿佛我们是双胞胎。然后呢？我会咬他。你会咬他，我坐在塔楼里，当我回到家时，发现你死了，鲜血从你的嘴里淌出，然后他会打我，尽管我压根儿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树木把婆娑的树影通过厨房窗户投射到瓷砖上。我脱掉衬衫。你看上去比我更裸露。来吧！我不喜欢。只脱掉衬衣就行。我不喜欢。我知道你身上的斑痕。尽管如此。两颗、三颗纽扣，就好比

我们跑过草地，手里还拿着刚刚沾上血的布巾。你穿着我的剪开的睡裤站在工具棚棚顶下面。雨水从檐沟经由你的前额滴进脖子里。一次，她弯下身子，为了把头躲起来，我把一切都缝拢了。也是一个主意。他撕扯缝合处，在此过程中他的一片手指甲折断了。她忘记了母亲的针线盒，每当她缝上一颗纽扣时，她都跪在他面前，手里拿着小剪子和线。事后我在腹部和腿上数了十八道刮痕。剪刀破损了。为此我没有吃晚饭。给我看一下刮痕。已经没有了。你的头发跟我的一样短，他什么也不会注意到的。变味的鸡蛋汤从他的嘴里淌出。我从工具棚里取来锤子。锤子仅仅是用木头做的。无所谓了。我们把他拖到湖边。不去湖边。那么进地下室。无所谓。我们让他躺着。你为何哭了？你太愚蠢了。他会注意到的。他会注意到一切。我不傻。我从塔楼跑回家，能多快就多快。我竭尽全力地奔跑。什么也拦不住，什么都不。她撕破衬衣，一件和我的一样的汗衫，只是有鼓起的地方。我这么认为，这个，这一点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马上就注意到了，在你能够踏步之前，在你终究能够思考之前，还在很久以前。

调查问卷（二元选择）

1. 有时候雨下得太大了，以至于推迟暗杀是合适的做法。

正确☐ 错误☐

2. 石块路面在四周餐馆的灯光照射下会引起虚幻的妄想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人们对世界采取一种可疑的非理性态度。

正确☐ 错误☐

3. 一个被遗忘的书包在取证过程中被允许作为物证，一般情况下它都会导致判决。

正确☐ 错误☐

4. 历史的脚注不为不充足的当代的眉批辩解。

正确☐ 错误☐

5. 损坏一个公共伏虎会导致无法补偿的国民经济损失。

正确☐ 错误☐

6. 对于十岁以下的儿童来说，他们的判断能力如此欠缺，以至于他们绝不应当敢于去干预政治事件。

正确☐ 错误☐

7. 谁要是不会比例法则运算，他就应当谨防使用炸药包。

正确☐ 错误☐

8. 指环譬喻把世界描述为不可逆转的一个循环，人们最好使自己加入这样的循环。

正确 ☐ 错误 ☐

9. 三角帽强调的是统治者尖尖的脑袋形状。

正确 ☐ 错误 ☐

10. 孩子听命于父母，夜里不在集会广场上四处游荡。

正确 ☐ 错误 ☐

内衣哲学

还在学校关闭和我们被解散到特别空虚的日子里之前，这样的日子既不像假期或者节假日那样有限，也不像患病期间那样无限，生病时人们并未丧失一切正常的感觉，尽管人们的身体状况处在正常范畴之外，还在这之前那则谣言就一直在流传，我不知道是谁首先把它讲给我听的，甚至回忆不起来是否真的有人给我讲过，谣言说我们的家具即椅子和斜面桌，也包括学校提供的学习用品如直尺、铅笔和计算尺都是用棺材木制成的。棺材木是一个特殊的概念。虽然在我头脑里会立刻出现成堆木材的画面，用这些木材人们制作了棺材，但是我再怎么仔细思考也无法说出，棺材木和普通木料的区别在哪儿。难道是预先被规定用来生产棺材的木料，但是然后，可能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人死亡，或者是因为死亡的人买不起棺材，又被用于生产其他器具了？如果那样棺材木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带有纯粹意向的名字，它很难为在我们身上几乎是条件反射般产生的那种厌恶感辩解。或许它是那种木料，人们原先已经用它制成了棺材，因为墓地上的空间变得狭小了，尸体反正也腐烂和消解了，那些棺材现在又被挖出，得到了新的用途？据说有提示和得当的检验方法，为了确定一种木料是否为棺材木。如果人们把手指弄湿，用湿手指沿桌面或者椅子被摩擦，倘若是棺材木就会有小的颗粒脱落。那是腐蚀到木材里的死人灰。如果人们坐在一张用棺材木制成的椅子上，那么无论人们穿着什么以及外面正好是什么样的气温，他都会感到身上发冷，此外他的屁股也会麻木。使用棺材木材质的直尺人们设计不出任何角度，此外人们在把玩这样的直尺时不允许把它们推到袖子里，因为否则的话胳膊会疲乏和坏死。如果人们定睛细瞧，会发现木头里有小的空隙和窟窿。那是所谓的死人眼睛，因为死者的眼睛是最先腐烂的，在消解过程中会在木头里留下痕迹。死者越年轻，他的眼睛就越深陷，通过这样的眼睛据说人们在夜里能够看到一切。

如果说围绕棺材木的谣言很久以来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话，那么在学校关闭前不久其他推想开始增多了。比如学生练习本的纸张是用少女亚麻做的。在这一点上我也不敢肯定，这种东西是指少女的头发，还是仅仅涉及叫这个名字的一种材料而已。但是装订练习本所用的线是由老鼠尾巴构成的。粉笔是用牙骨做的，黑板不是用页岩，而是用颅骨片制成的。狭长的走廊里闻起来都是地板蜡的味道，它是用洒过香水的猪血做成的，我们书包的原料是充过气的狗胃。自来水笔取材于空心骨，我们往笔里灌注的墨水是一些如此令人恶心的东西，以至于谁也不敢说出它到底是什么。与此相适应，我的各种猜测和推想也是混乱的，从未产生过一个值得一提的结果，因为我想不出任何足够可怕的事情，来为这种仅为预想的感觉辩解。我们的教学楼夜里也被用作秘密会议和聚会的场所。总而言之，在我们真的被解散之前，我们感觉自己只是一个被死亡象征所确定、濒临死亡的环境里的客人。

内衣哲学是唯一将会继续存在的哲学。它在自己的肉体上被感受。它浸透在汗水里。随汗水从两肋排出。它不是体操鞋的学说，不是橡皮垫的学说，甚至连伏虎的学说也算不上，后者永远为领袖旋转，作为其完美的象征。一切都在它里面汇聚。内衣是纯粹的系统。它的内涵要大于化体仪式。比后者要大得多。仅仅是它的外形、裁剪式样和简化后的无袖款，就不禁让我们问道：它原本的意义何在？是什么在支撑着它？它隐藏了什么？它有能力做什么？这就是男士内衣的悖论，在它里面所有的形式好像都变得更加女性化了。

为了提前说出自己的观点：内衣就是无意识。它具有雌雄两性和排他性特征。身体在它里面表达自己。它把自己印入内衣。内衣不允许被看到，但我们还是看得到它。它自愿使自己居于从属地位。它接受另一个名字，即它所处地方的名字。它在衬衣底下。它的名字由此而来。它通过使主体服从于地方，尝试解决主体与主体所处地方之间的矛盾。变色龙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每一个民族主义者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这就是内衣。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体操队穿着内衣让人给我们拍照。内衣不会区分性别。在它的设计中体现的出人意料的坚固不是因为克虏伯钢铁的硬度，而是源于双面织物的褶皱。内衣作为信号

旗在哲学前面飘扬，向人们指出知识的进步，如果我们将来抛弃束缚我们的灵魂概念，把在我们头脑里不能被理解的东西改名为下体。

患者必须认识到，他的跌落好像是不允许被赦免的

患者说：您认为，人们无法简单地做出让自己发疯的决定。但是我必须这么决定，这对我来说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因为不这样的话我会变得精神错乱。

患者说：我尝试通过克尔凯郭尔，也就是说通过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来理解在我自己身上产生的恐惧，也就是说找到一种真正解决这种恐惧感的方案，但却没有成功，一点儿也没有成功。我极度失望。我甚至哭了，因为我在他描写的作品里没能感觉到恐惧。

患者说：我知道，您把我看作只是假装精神错乱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仅仅是装出来的。但是我请求您，我只能不断地重复这一点，您说的或许是对的，我根本不想反驳您，但是请您不要把这一诊断当作是把我排除在治疗之外的理由，请您不要再一次对我说，我抢走了其他人的治疗名额，他们比我更加急需治疗。我请求您的就是这些。还有谁比只是假装发疯的人更需要治疗的吗？还是您想说这种情况很正常？

患者说：我知道，我使您陷入一种迫不得已的境况。它是一种走投无路的境况。您还能够使什么变得了不起呢？您必须对我做出诊断，如果您把我诊断为装病者，那么这就自动意味着，我来这里是不恰当的。但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生病或者装病，难道只有这些可能吗？不，假装生病不是疾病的症状，它本身就是疾病。

患者说：但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无法信任您，因为我知道您将会说些什么，知道您将会怎样反应，因此我才不得不使自己变成治疗医师，给人的印象是仿佛我要对自己进行治疗。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就跟我的装病不是欺骗一样，我的治疗也不是狂妄，这两种情况都是

同一种疾病的组成部分，这种疾病没有得到您的察觉，因此也就不被认可。

患者说：臆造这个概念对您来说意味着一些轻松容易的事情，但是再没有比必须臆造疾病、疗法、生活也就是说臆造一切更加痛苦的过程了。您无法想象这种努力。我也更愿意过一种不是被臆造出来的生活，更愿意像您一样处理日常生活事务，而不用去考虑这些事务的含义，不考虑人们究竟是怎样发现它们的含义的，以及为什么我就是无法成功地做到同样去发现它们的含义。

患者说：因此更令我感兴趣的是我的伙伴们以前的关系，而不是我自己跟这些伙伴的关系，我和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存在，这种不存在引发了一种额外的屈辱，尽管我必须把这种屈辱完全归咎于我自己。我想知道和我的伙伴们来往过的那些人的情况，为了最终理解人们怎样过我无法过的生活。但是在这方面有这么多的误解，因为他们不理解，无法理解。

患者说：我知道，我也想到了，我精神错乱的原因可能在于，认为自己的精神错乱从未被当真和重视。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不在乎，我只是认为，我不坚持任何事情，我认为您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对的，也包括这件事，在我看来。

患者说：当时的情形就好比是坐在长餐桌旁，面前摆放着主人提供的面包，而我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切第一片面包。为了终于能够详尽讨论黑板这个问题，您必须这么想象，我不知道怎样握住粉笔，当我站在黑板前面的时候。这只是一个人们能够理解的例子，我不知道怎样握住粉笔，因此那个被问到的公式问题根本就没有被提给我。我一直还在跟所有其他那些问题打交道，它们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是不言而喻和早已被回答过的。您明白吗？

患者说：糟糕的，在这一点上您说得完全对，不是这一事实，即您或者其他（无论病友、医生、家属还是朋友们）认为我在装病，而是我自己这么认为。

患者说：或许您说的有道理，嗯，是这样的，您没有这么说，没有直说，但是我认为您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或许很简单我的问题就在于，我把简单的问题……但是这样当然不行，这是不可能的，我应该从哪儿开始呢，在这一点上您说得对，它是不可能的，一个美妙的思想，但也仅此而已。

患者说：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我通过这样的陈述接近主题、我的主题的话，那么就必须形成一个解决方案，无论以这样还是那样的方式。人们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我的情况一直都是，我会失去所有的感觉，如果我就跟现在一样较长时间地致力于这个主题。我什么也感受不到了。我对我自己都无所谓和不感兴趣了，然后，如早已承认的那样，痛苦也减轻了，也就是说通常使我的生活变得不可能或者至少限制我生活的那种痛苦，一切都只是令我感到难堪了。

患者说：这太乏味了，所有这些。请您把这些删去吧。

患者说：我真的也感觉好多了。您现在完全可以把我支走，也就是说让我出院，真的。一切正常。

患者说：我想向您道歉。您说的当然是对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激动。请您原谅我。这件事令人不快，让我觉得很难堪。我羞愧得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患者说：我知道，这也只是我通常的反应之一，它属于常见的表现形式，因此什么也没有发生变化，而是一切仍按老样子在继续发展。我觉得非常难堪。但是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事情不会有变化。我感到很抱歉。

患者说：我觉得，完全有意识发病的人在数量上比人们设想的要多得多。这种情况肯定不适用于某些精神错乱类型，但是有些形式具有缓慢的过渡，在此过程中人们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患者说：您无法想象，真正发病的人还能以其他疯子为导向，为了以这种方式使他的精神错乱变得可信。对您来说这样的人是装病者和江

湖骗子，但是您认为这肯定是对的吗？请您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人，他站在深渊前面，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他让自己不受控制地跌落，要么他目标明确地往下跳。他站在悬崖边，这是前提条件。有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注意到那边是悬崖，就索性跳了下去，还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悬崖，就索性纵身跳下，又有一些人，他们把悬崖不看作是悬崖，等等。但是他站在那儿，看到这些人跌落，那些人跳下。因为他在那儿站着，所以一开始他认为，他也会反对让自己跌落或者跳下，但这是个错误，这是一个重大错误。一段时间里他安慰自己说，他不属于那些跌落者之列，这样做仿佛他有掉头折返的可能性，有把脊背朝向深渊的机会。就这样他反复徘徊了一阵子，直到他认识到自己没有折回的可能性。人们能责怪他还想抓住最后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吗？但是这种选择的自由也不是什么自由，因为他能做的只有往下跳，他的跌落早就不允许被赦免，通过他的中断，通过他对深渊有意识的凝视。这时候他意识到，他之所以开始这种凝视，仅仅是因为他缺乏往下跳的能力。

患者说：他意识到，他的停住，他的中断，他的注视和反省，这些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这一切都仅仅是一种推迟，因为他缺乏往下跳的能力，因为跌落不允许被赦免。由此产生出他的症状，同时这种症状一直以来就蕴含在他体内，只是在觉察过程中才清楚地形成。因此您应当理解，所有的疗法不可避免注定要失败，因为所有的疗法都只是要求人们有意识地去做一些事情，而他的疾病恰恰是在这种意识过程中自己产生的。但是意识过程是不能够被翻转的。人们不能有意识地使一些事情变得无意识。医学把这种对绝对无选择性的认识状态、正好是这种状态称作装病。

格尔妮卡回忆不起来那个已提到的秋日傍晚

格尔妮卡？

是的，怎么了？

你不是真的在那儿，不是吗？

不，不是真的。为什么要问？

没什么。只是随便问一下。我不禁在想，我们从前怎样一起.....

那不是我。

不，当然是了。此外你根本就不知道，我.....

我对这个也不感兴趣。

但是，我只是想.....

你干脆自己留着受用吧。你不可能再用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来对待我了，我上的当已经够多的了。

上当，这样听起来很别扭。

是吗？那应该听起来怎样呢？

其实我只是想.....

再给我演示一下你用我的名字命名的这种想象的一个示例。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

是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你从不知道到底出什么事了，从不知道围绕着你都发生了什么，为何人们会突然逮捕你，拿走你的房门钥匙，把你送到精神病院，最好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

送到精神病院，这听起来真滑稽。上一次可是你自己把我送去的。

当你又一次跟往常一样精神崩溃时，你半夜三更打电话把我叫出来，我不那样做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吗？

非常抱歉。

这样对我也不会起任何作用。或许你干脆给自己另寻他人，或者出于调剂你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这样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人们就不会简单地把责任推卸给其他人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一下子怎么了。

一下子？在阿斯特露台街、中央路和新乌鸦大街之间的三角形草坪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此我也感到非常抱歉。

重要的不是这个。

我不知道，我简直绝望了。

你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不是一般。这不是真的。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时间。

是那次无聊的会议。还有那次失败的专家论坛，在论坛上他们对我喝了倒彩。这一切真让人生气。

那为什么你也去参加了呢？

人们邀请了我。

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我觉得，这些活动可能会很有意思。

你觉得？第十万次谈论红军派。

他们给我支付了住酒店和乘坐火车的费用。

没有报酬？

没有，他们没有钱。此外我认为，我们可以见面。

我们也的确见面了。

是的，我知道。我也为此感到抱歉。

我是专门从伦敦赶来的。

我知道。我真的很抱歉。

就为了在上臂落下紫斑……

不好意思。我不想把你抓得那么紧。

这不是最糟糕的，这一点我已经告诉过你一千遍了。

够糟糕的了。

不要自我同情。

我不是在自我同情。

你一直都在自我同情。

但是你注意到，你听起来是怎样的吗，现在？

我不是真的在那儿。这一切都只是你在你的想象中表演出来的。

但是这一点无论怎样我不能全信。

问题恰恰就在于此。

为什么我应该幻想出一些折磨我自己的东西呢？

是的，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么问的。解决你全部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这个问题里。

使自己从所有的事情里抽身而退，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太容易了？

我等了太久才这样做的。

怎样做？

抽身而退呀。当我想起那么多被浪费的时间.....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我的意思是，当时，我正想给你讲述什么，我正好想起什么，当我们.....

就像已经说过的那样：请你还是自己留着受用吧。

我只简短地说一下：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我觉得是一个周日，当时天气出奇地热，像真正的夏季一样，我们穿过市郊的小菜园，炎热再次从傍晚的园子里升腾起来，然后我们来到一块草地旁边，当时空气已经变得潮湿和凉爽了，一些男孩子在草地上踢足球，尽管草长得太高了，然后我们走进那处住宅区，它的车库和房屋立面跟五十年前的完全一样，空气里有火味儿，但是闻起来不像是烧烤，而是地道的烧土豆的味道，那条狭窄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你.....

那不是我。

不，是你，我非常肯定。

这就是问题所在。

什么问题？

你总是很肯定。但事实上你可是什么都不明白。

好吧，就算是吧。我感到抱歉。

不要总说你感到抱歉。

但是我是感到抱歉。

我不再相信你这么说了。

抱歉。

大斋节周六纸炮的味道

在大斋节周六，当空气中弥漫着纸炮的味道时，我从那片高层住宅区的后面走过。在两堆汽车残骸中间，一个在带衬里的滑雪衫底下穿了一件紧身连衣裙的女孩和一个脸上画着髭须、高举的手里握着一把左轮手枪的男孩在绕着自己转圈。在水洼表面和农田犁沟里还结着一些冰。天空犹豫不定地裂开了口子。新陈代谢病是对精神病的一种委婉表达，这种精神病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在退休前侵袭处于市民家庭环境的这个或者那个人。孩子们是多么孤独，他们现在站在周六下午的空气里。或者仅仅是我孤独？我独自一人沿着道路朝小树林方向走去，在复活节前后的一个周日我和格尔妮卡曾经在那里散步。当时我们是从另一个方向来的，天气也比现在更暖和。现在年长的人都是骑轻型摩托车或者也开着车来到这里，他们飞快地驶过场地，扬起一片尘土。而且他们也是孤零零一个人，当他们把车窗摇下来时，为了让所有的人都听得到低音炮的隆隆声。孤独的儿童钦佩孤独的青少年，而孤独的青少年仇视孤独的父母，没有看到我在溪流另一侧光秃秃的榆树后面。空中飘来纸炮的气味以及甜面团和覆盆子果酱的味道。周六的下午似乎那么长，然后到了大斋节的时候又那么短。喝着苹果汁，吃着撒有盐粒的棒状糕点，听着歌曲《让我更强，金凤花》

(Build Me Up Buttercup)，在5点钟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再去一趟乡镇公所。这样做是因为担心会错过一些事情。年龄稍大的男孩子在排练室，他们的演奏听起来就跟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样。或许像帝王乐队的演奏。在他们吸烟休息的时候，我可以摸一下吉他和放大器。将来我也要弹奏吉他，在乡镇公所这里和其他人一道排练，不用再给自己化装。为什么不再化装？为什么不再用手指擦划纸炮？因为演习用的空包弹要更好？那两个孩子，那个在带衬里的滑雪衫底下穿了一件紧身连衣裙的女孩和那个脸上画着髭须和鬓发的男孩，我很想随便给他们点什么或者至少对他们说点什么。告诉他们不必担心会错过一些事情，因为人们反正在不断并且肯定会错过所有的事情。告诉他们应该

在这里转圈，能转多久就转多久，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不要去听父母、电视机里和其他青少年所说的话，他们全都一无所知。但是这不是那个男孩手枪里装的火柴，因为这是一把激光手枪，它能发出特别好听的声响，这也不是那个女孩穿的紧身连衣裙，而是德国下一代超级模特穿的一套服装。但是这也无所谓。因为道路也根本不是我和格尔妮卡在复活节前后的一个周日走过的那条路，尽管是从另一个方向，当时我们步行穿过这个小地方的街道，看到了那个贴有旧的辅弥撒安排的玻璃橱窗。在星期天：我和亚历克斯帮助做祭坛礼拜仪式。在圣灰星期三：我让圣灰十字圣号留在前额上，直到它自行消失，还是在上学之前把它拭去？圣灰对圣灰，泥土对泥土，纸炮对纸炮，紧身连衣裙对紧身连衣裙。这片高层住宅区，这片天空，这些光秃秃的榆树，这条通向小树林的道路。我可以对孩子们讲什么真话呢？或许告诉他们，人们最好不要给事物命名，不要把疾病称作癌症，走路不是散步，在两堆汽车残骸之间的旋转不是游戏，格尔妮卡不是格尔妮卡，爱情不是爱情，未来不是规划，过去不是回忆，隐藏不是隐藏，追随不是追随，意义不是形式，形式不是意义，意义也不是意义，形式也不是形式。只有纸炮的气味。只有具有独特氛围的星期六下午，这种氛围源于犹豫不定地裂开了口子的天空，源于因雨水冲刷而褪色的高楼，而且就是因为它是星期六，这个在所有的日子里最犹豫不定的一天，在这个于所有的世界中最犹豫不定的世界上。

询问被驱使的人和不幸的灵魂

这么说您参加了汉堡红军派代表大会，该会议的缩写形式为HaRaTa？
是的。

您是以何种职务在那儿出席会议的？

我被邀请参加一个专家论坛。

以何种职务？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以何种职务？您肯定是以某种身份被邀请去那儿参会的？

就是作为普通的与会代表。

不是作为专家？

作为专家？我不知道。我不是专家。此外人们向我喝了倒彩，这已经表明我不是什么专家。

专家也能够被喝倒彩。

有这种可能，但是一般情况下在这样的论坛上人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啊哈，挺有趣的。

您什么意思？

没什么。也就是说您是作为专家在那儿参会的？

不，就像已经说过的，就是作为普通的代表，人们邀请了我。坦白地说具体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但是您在那儿只是作为客人，不是比如说作为协办方？

您怎么会想到这个？谁给您讲述的这件事？不，天哪。通常情况下我从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但是您去过那里？

是的，我是去过那里。并且我对此很后悔，这一点您可以相信我。这种活动，整个会议……

发生什么事了？

整个过程都疯疯癫癫的。

疯疯癫癫？

是的，疯疯癫癫。

您被邀请去那儿开会，不会是因为您是红军派的创建成员吧？

创建成员？这话怎么讲？

您没有创建红军派？

创建？不，当然没有。

您不反对我把您连接到一台测谎仪上吧？

当然反对。此外这在德国根本是不允许的。这在庭审中是不能被使用的，您自己知道这种情况。

但是这可以开脱您的罪责。

对此我表示怀疑。

为什么？您有什么要隐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上臂上的紫斑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

您很明白我说的话。

不，很遗憾。

我指的是您的女伴上臂上的紫斑。

女伴，这听起来多奇怪啊，您这么说，就好比是犯罪中的同伙一样。

怎么了？这样说不对吗？

您不要把格尔妮卡牵扯进去。她真的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但是她也在场。

因为我们想见面。

也就是说，您一直还未把暴力问题单独搞清楚，而只是把它去政治化、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私有化了。这完全符合我们时代的潮流。

您到底想听什么？

我不知道。

是的，没错。我也不知道。

这些照片上的人您认识吗？

这有什么用呢？

请您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的问题：这些照片上的人您认识吗？

可能认识吧。

能具体一些吗？

您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请回答。

左边那张不是照片，而是一幅红铅笔画，画的可能是小马克斯·雷格尔。

也就是说您在这张被您称作红铅笔画的图片上辨认出某个叫小马克斯·雷格尔的人？

是的，这个人可能是他。这张图片，我的意思是，当时我在《野孩帮》里见过这张图片。

野孩帮，这是另外一个恐怖主义协会？

这是在五六十年代发行的一种青年杂志。

借助这样的杂志青年人应当被洗脑？

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是吧。在有疑惑的情况下美国佬当时支付了一切费用。

那就是说这个小马克斯·雷格尔是红军派的创始人之一了。

不，这是在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这是一个被别人驱使的人。一个不幸的灵魂。

尽管如此您也很钦佩他？

钦佩，这听起来有些夸张。就我来说是的，但不像您认为的那样。

我是怎样认为的呢？

其实我钦佩每一个信守自己变态的人。

变态？

您想怎么称就怎么称它吧。

既然您这么钦佩他，您没有以他为榜样、按照他的模式来筹办红军派？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从未以他为榜样。

您钦佩他，刚刚您这么说过。

钦佩，人们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如果人们自己在某个方面有欠缺，那么他就会钦佩那个他认为没有这种欠缺的人。

这与那种反精神病学运动有关系吗，您自己也感到对这种运动负有义务？

反精神病？这又从何而来呢？

美丽的疯子，您能回忆起来吗？

我能回忆起来，但是您的目的是什么呢？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些疯子？对我来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

您想把他们判为对自己行为不能负责的人？

对自己行为不能负责？宣判？

其他的呢？

什么？

其他照片。

第二张照片上的人，这是克里斯托夫·冈斯塔勒。

又名克里斯？

又名克里斯。

也是您们的一名成员？

胡说，他跟我们从未有任何联系。

下一个呢？

埃坦·龙德科恩。

美国人？

是的，美国人。

旁边那个呢？

米盖尔·加西亚·巴尔德斯。

又名费利普。

又名费利普。

阿根廷人？

这我不知道。他来自南美。

继续，第五张照片呢？

弗兰克·维策尔。

德国人？

是的。

您知道他死了？

是的。

您知道吗，我们在一间由一名土耳其公民租住的住房里找到了他的尸体，这名土耳其人被怀疑与伊斯兰教圈子有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

这令您感到惊奇吗？

坦白地说是的。

现在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照片。在这儿，请看。

这是克劳迪娅。

其他情况呢？

我不知道。

也就是说她是克劳迪娅。

是的，这一切反正您都知道了。

谁是米勒同志？

米勒同志？我不知道。

您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记不起来了。

您再仔细想一想。

想不起来，这会是谁呢？听起来像是一名纳粹。

您与纳粹组织有联系？

您肯定已经做出决断了：我创立了红军派还是我是一名纳粹？

对我们来说两者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浓郁醉人的苹果、包装油纸和皮革的味道

学校就像一座黑色的塔楼位于两棵高大的橡树之间。校园因为雨水的冲洗宛若一面光滑的镜子。今天她的石膏绷带可以拆掉了。肯定会天晴出太阳。我必须赶在父亲之前到家。距离湖边还有太远的路程。你坐到自行车后座上。来吧。你也可以穿着我的睡裤不必脱掉。她把一条更苍白和更纤细的腿伸进水里，两条鱼儿游了过来，阳光透过细雨照进五颜六色的彩纸里。把衣服脱掉吧。不，只露腿就行了。我知道她的后背上有紫斑，胳膊上也有紫斑，还带有一些淤青。颜料一个接一个地从我的颜料盒里消失，直到只剩下白色，她皮肤的白色。我不想再看着她早晨在水槽边洗漱，在此期间母亲把咖啡放到他的肚子上，还有就着咖啡吃的角形小面包和香肠。我让自己从单杠上掉下来，但是一点儿也没有摔伤。他的公务用车雾气腾腾、气喘吁吁地停在房子前面。我用刀去捅右前轮胎，但是刀刃拿实心橡胶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时他出现了，让我来驾驶汽车。我装出很傻的样子，想开车撞到树上去。他给了我一记耳光，用靴子狠狠地踩到刹车上，在靴子和刹车之间还夹着我的脚。在城里的某一个地方，他把我连同我的书包扔到大街上。她的腿一直那么纤细和苍白。见的光太少了。她坐在房管员儿子的摩托车跨斗里被送往集市广场。一次我看到她和所有其他人一同喊叫，然后晚上她就不想再出门了。

黎明从打着哈欠的树林空隙里缓慢爬出，越过橙色的喷水池跃进路面铺有石块的小巷。书包的皮革上带有裂纹。人们扯拽我们的头发和耳朵，就连下颚也不放过。还没有到学校，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身体部分就只有人们扯拽过的部位。练习本被装订在彩色的塑料封皮里。黄色的是上宗教课用的。书本被包在蓝色透明的薄膜里。读本里撕破的页码被粘上了透明胶带。图画簿里的纸页因为擦刮而起了褶皱。在带有金色拉链的绿文件夹里装着空的有弹性的笔座，旁边是自来水笔和一支折断的铅笔。每当检查书包里被忘在家里的作业本时，里面都会散发出浓郁醉人的苹果、皮革和包装油纸的味道。改作业，小包裹，应

用题，听写。一只被砸死的小动物的颌骨在班级座位间被传看。被踩坏的地毡上反射着棚顶灯光。一只白色的瓶子里装着汽水，瓶口上套了一个蓝色的杯子充当瓶盖。小画册被藏在黑色布料玩具狗的纤维质的肚子里。它的车轮是用刷有红漆的木头制成的。当人们按它侧面的时候，它不再发出吱吱的尖叫声。从盛装可可粉的袋子上刮掉的石蜡残留在指甲盖下面。被固定在夹座上的地图在空气的对流中轻微摇晃。船只从陆地旁边驶过。在每一块大陆上都站着三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他们在招手示意，仿佛那些船只也应当把他们捎上，而不是只装载黄金、热带水果和咖啡。一辆自制木车在围着那棵老橡树兜圈子。空中悬浮着一个侧面被钻了窟窿的鞋盒。它在身后拖拽着一根绑有三角旗的绳线。

曾经有过根本性的变革期。街道看上去好像都被掘开了一样，房屋无人居住，墙面满是窟窿，房顶被重物压坏。家具都堆在后院。煤尘从敞开的地下室里涌出。拍毯机放着未用，工具棚里空荡荡的。如果我需要一件干净的衬衣，我必须很早就要下楼，在堆叠的椅子和沙发之间用力把镶有镜子的柜门推开一道缝，为了从用纸缠绕和用蓝色的复写铅笔题字的包裹堆里抽出一个。但是然后，可能是因为冬季来临，钱花光了或者是因为人们更愿意每晚都在集市广场上聚集，为了仰着通红的面庞观看讲演者们是怎样在摇晃不稳的讲台上对着尖锐刺耳的麦克风大声喊叫，然后就业开始不景气，窗户被应急性地用木板钉死，梯子上的板条被抽去，家具又被挪进房间，摆到遮篷和水桶之间，路面上的坑坑洼洼也被盖上了厚木板。晚上成年人按照性别划分去开各种会议，这样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房间就属于我们了。

在漫长、孤独的夜晚，当会议在后屋、大厅、帐篷和地下室里持续进行的时候，我们沉浸在一种自由当中，这种自由好像只有通过一场灾难才能被加强。如果我们的母亲正忙于缝制制服和旗帜，我们的父亲正想开着坦克和吉普车轰隆隆地从原野上驶过，那么生活就是一场唯一的游戏，一种在空旷的街道和房间里的飘荡而去，夹带着裂开口子的密封大口瓶和涂抹了果酱的双层面包。我们渴望夜晚的到来，那时候房屋、小巷和庭院就将属于我们。我们在牲口棚碰面，吸烟，生火，大呼小叫地侵入住宅区，在那里我们长时间地把垃圾桶踢来踢

去，在拍毯机上荡来荡去，直到我们因为疲倦在走廊里堆放的杂物中间打起了瞌睡。

我和米勒同志开着他那辆涂着黑色油漆的公务车穿过夜色。从远处我们就看到了人们在集市广场四周悬挂的灯光链。街道上变得更热闹了。夫妻们胳膊挽着胳膊就像是去参加民间节日一样，人群里还有成群的青年男子和一排排的姑娘们。我放在引爆装置上的手出汗了。人们能责怪米勒同志想把世界压缩为是/非、开启/关闭原则吗？生命中有一次要把一个意义重大的开关扳倒。米勒同志在含笑注视着我。“我们马上就到了。”他说道。街道现在被照得通亮。车辆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街，在那里驶进一个位于生锈的集装箱之间的院子里。米勒同志从他制服夹克的内兜里掏出一个扁平的烧酒瓶，拧开瓶盖喝了一口，然后把酒瓶递给我。我不敢用手去擦拭瓶口，而是马上就把酒瓶伸到嘴边。烧酒就像在我的嗓子里燃烧一样，辣得我直流眼泪。

“对表。”米勒同志说道。

“我没有表，因为我还没有参加过圣餐仪式。”我说道。

“也好，”他点了点头，“您自己会看到。我们的人在他体操服的右侧戴着一根黑色的条杠。当他推着他的伏虎从领袖身旁经过的时候，您就扳倒引爆装置上的开关。明白了吗？”我点了点头。“祝您一切顺利。”他从我旁边探过身子，打开车门，轻轻地把我往车外推。外面闻起来有一股炒杏仁的味道。空气热得令人吃惊。我手里捧着小盒子，在深色的天空下站了一会儿，看着米勒同志的车辆是怎样消失不见的。他沿着狭窄的铺石路面行驶，然后向左转弯，仿佛他想开回到酒馆。或许他在那儿忘了点什么。周围静悄悄的，我担心他们在错误的地方让我下了车，离集市广场还远得很，但是还没等我穿过一条小街，我就已经听到了不间断的嘈杂声，直到我最后又穿过两条交叉路，被吸进列队前行人群的旋涡当中。

“什么也没有。”第一次在忏悔中进入到我的意识层面。当我周六下午在教堂逐条对照那些清规戒律，看我是否在从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里违反了它们中的一条时，我会从第一条一直说到第十条，然后是所对应

的罪孽，或者当我认为自己没有触犯那些戒律时，我就说“什么也没有”。这种“什么也没有”从一开始就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谎言，其二是真相。这种“什么也没有”是值得去做的，因为在每一条戒律之后说“什么也没有”就意味着，让自己从罪孽中解脱出来。同时这样做又显得不可信，因为谁能没有罪孽呢？所以除了上帝，谁能够保证自己一点儿罪孽都没有呢？这种“什么也没有”已经隐含在了十诫当中，只是被他创造出来而已。戒律先于“什么也没有”而形成，“什么也没有”在戒律中才能得以发展。也就是说戒律超越了“什么也没有”。在忏悔临近结束、当我说出这个词语的时候，我听到了轻微的嘶嘶声，同时又感到紧张——无论我在说谎还是自认为在说实话——，神父心里更清楚，可以随时用一种可怕的内涵来填补这种“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是复活和生命，它超然于所有矛盾之外，令人无法置信。这样一来“什么也没有”在许多忏悔过程中成为我对下述问题的回答：我想了些什么，感觉到什么或者做了些什么。对于罪孽的恐惧是这种“什么也没有”的对立面。任何存在都是罪孽。但是戒律是数字的循环，它不依赖于我自己的时间观念，总是围绕着我的生命循环往复。怎样逃脱这种循环呢？在我心中不断增强的不是某一个念头，而是一种确信：这种情况只有通过一种行为才能发生。它必须是一种行为，一种唯一冲破这种循环的行为。一种不可原谅、令人难忘、无法得到忏悔、不能被抵赎和宽恕的行为。只有当宽恕终止的时候，罪孽才得以停止。只有当我拒绝上帝该死的善良、这种永恒和无法估量的善良、拒绝我主万能的束缚时，宽恕才会终止。

我的脸庞通红，当我们夜里碰面、蹑手蹑脚地穿过亨克尔公园的时候，为了一头扎进灌木丛，让荆棘划破我们的脸和胳膊。然后我们一路奔跑，冲上长满矮树林的山丘，让树枝迎着我们的脸庞扎刺。我们扯拽自己的头发，彼此紧紧抓住对方的胳膊，以至于我们不再知道哪只手是谁的。在这种紧张之下暂时产生了摆脱戒律循环的自由，那种“什么也没有”真真切切地涌入我的脑海，它不太一样，与在忏悔室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于一种行为的渴望被唤醒，它将使我掠过那些我必须每天路过的灰色的、被精确测量过的街道和路途，掠过那些无异于挑战的相遇，这样的挑战要求人们去犯罪，牺牲和放弃神圣的虚无，为了存在，存在一次，仅仅是存在。有时候我对着夜空大声喊

叫，令其他人大吃一惊，他们着实惊恐地看着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我们抓住自己人其中的一个，让他站到一边并殴打他，把他和一只猫一道关到一个箱子里，直到两个生命几乎窒息而亡。这样的折磨持续的时间必须越来越长，我也越来越可怕地重新掉回到戒律的循环之中。最后我们搞到刀具，用刀切割树身，然后又割划自己的皮肤，互相用鲜血涂抹对方的脸，赤裸着上身、胳膊上带着刺痛的划伤在凉夜里奔跑，直到上气不接下气地不得不呕吐为止。归途变得更加吃力。周六在忏悔室里所说的“什么也没有”只能是撒谎了。但确实什么也没有发生，尽管从周一到周五戒律充满了不漏过任何事情的存在，没有违法，没有罪孽。忏悔结束之后我坐在教堂暗处的长椅上，无法祷告“你好，玛利亚”和“我只信仰天主教教会”，而是只向玻璃窗那边瞅，窗外的夜幕面无表情。窗前摆放着圣饼。没错，是圣饼。把事情颠倒过来，被钉上十字架而死，这种情况只成功过唯一的一次。全体殉难者都割伤了自己，他们无法通过死亡逃脱循环，只有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周六下午我不再回家。我从院子门口跑过。我沿着街道跑出了市区。我跑向原野，想要死亡。

房屋没有紧锁，就连宾馆的大门也是敞开的，接待大厅里空无一人。空荡荡的还有火车站和餐馆。孩子们找到许多由警卫人员和穿蓝色上衣、头发向后扎的女士们播撒的星章。那个男人想去港口，但是港口被封锁了。装载货物的船只在远处的海湾抛锚停泊。到处都是彩带和横幅标语。今天是胜利日。远处水手们越过甲板把木箱扔到船外。他们肚子很饿，但却不能上岸。先行派出的一名水手被人们逮捕了。木箱裂开，里面的木棉和铁钉被冲上海滩。广场上人群在轻声哼唱。有人在通过麦克风演讲。星章对于我们的手来说太大了。我父亲先是飞行员，后来死了。那片原始森林围在他的尸体四周。我母亲只剩下她的厨房、那边的灶台和我在上面用粉笔画圈的瓷砖。星期天她把切好的鸡块放进汤里。穿西服的男人们庄重地从我们房子前面经过。他们中的一人住在我们家客厅。他抽着雪茄烟，官派十足地在审讯那些水手。母亲把蛋花汤盛在一个瓷杯里端给他，他没有在沙发椅上直起身来，而是把汤放在自己的肚子上。报纸从他的手里滑落。我父亲的照片被从相框里取了出来，散落在床垫弹簧和床褥之间。夜里从那里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母亲稍晚才躺到炉边长凳的另一侧上。在广场上

所有的人都手拉着手，并把手高高地举向空中。空中一架飞机呼啸而过，为了向轮船上投掷炸弹，瞄准蒸汽船和那列极其缓慢沿山坡向上行驶的火车射击。我只闻到了书包、黄油面包和在皮革上蹭来蹭去的苹果的味道，还有你放在我面颊上的手。

被染成褐色的秋叶像旋绕的花环一般在城市上空飞舞。它们掉落在狭小的水洼里，朝港口方向又慢慢滚动了几米，然后被汽车轮胎挤压碾碎在人行道的边沿。米勒同志坐在那辆黑色汽车的后座上吸烟，车辆在距离集会广场大约五十米远的地方穿过狭窄的小街向北移动。他闭上双眼，只感觉到车辆向旁侧的摇晃和减震器猛烈的撞击，当轮胎从铺石路面的坑洼里跳跃而出的时候。两三家还在营业的小酒馆里闪烁着稀疏的灯光，光线透过涂色的车窗玻璃以奇形怪状的光斑照在他的脸上，也照在他旁边好像在睡觉的那个姑娘垂摆的白皙手臂上。仿佛是不想叫醒她，他面对姑娘的左侧身子一动不动，而只用右手在他的制服兜里寻找一包药粉。他们一直还没有开到城市环路上。小街在一面未抹灰泥的围墙前面向左转弯，因此米勒同志几乎在担心司机会朝广场方向驶去，而实际上司机是在沿着一段坡路向东绕过广场，为了重新驶向最初的方向。半高的栗子树现在立在街道和私人地产刷有不同颜色油漆的篱笆之间。尽管车窗紧闭，而且米勒同志已经让第三支香烟在他的手指间渐渐熄灭，他还是自认为能够明显地感到车内的空气变得更好了。街道照明变得黯淡了，最后完全没有了路灯。铺石街面变成了一条林间道路的平整的柏油路面。在睁开眼睛之前，米勒同志慢慢地数到五十。然后他把姑娘的胳膊从自己身上推开并且转过身去。人们能够看到学校的两座塔楼像麻木的宣誓指一样黑咕隆咚地矗立在夜空里。最终树林也延伸到了尽头。“停车！”他命令道。司机在刹车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向右急打方向盘，以至于车辆碾过侧方的小斜坡，斜冲着被前几天的雨水冲刷过的、已经被收割完毕的甜菜田的犁沟停了下来。发动机还在继续轰鸣。米勒把手从姑娘身上探过去，打开侧方车门。然后他下到车外，绕着车辆转了一圈，把姑娘毫无生气的身体靠在自己肩膀上拖出车外，放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天空浮现出一片白色椭圆形的云朵。姑娘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条男式睡裤，裤腰处因为做工马虎而缺了一块。裤腿插在沉甸甸的黑靴子里。米勒同志在她身旁蹲了下来。从正在冷却的发动机那儿人们可以听到短

促、清脆的噼里啪啦声。按照先前交代的一项命令，司机把手放在膝间坐在方向盘后面。四周一片沉寂。

一件粗呢大衣，我说道，一件大衣，它能够使人看不见你。否则就干脆把眼睛闭紧。外面门口是真实的表现主义，青肿变形的嘴巴，布满血丝的眼睛，被拖上舞台、当着民众的面被宰杀的猪崽。电影日日夜夜都在放映，这样我就能知道，谁是朋友谁是老鼠。

一群狗精疲力竭地站在广场上并急促地喘息。它们中的每一只尽管疼痛和抽搐的肌肉都尽可能表现得很安静，因为最细小的动作都会促使其他对手重新开始搏斗。

爆炸的压力迫使我紧贴在纸板盒子的内壁上，在我四周的这些纸板盒子好像要折叠起来一样。我猛地扭过头去向后看。广场上人群的惊呼听起来就像是厨房排水管道里发出的汨汨声。那个鞋盒飞向空中，沿纵向裂开。我看见下面舞台铺的厚木板上被炸出了一个洞，洞口上端倒塌的帐篷顶在来回飘动。洞口前面空无一人的伏虎还在旋转。民众好像缩着头跪在原地。爆炸冲击波渗入我的口腔和肺里。广告柱上的两个孩子用手指向天空，因为他们认为终于又看到了失踪的父亲驾驶的银白色的飞机。他们挥舞着红布，作为识别记号我把那个狭长的带起爆装置的金属盒扔了下去。一阵狂风卷起纸板盒子，好几次把我吹过相邻房屋的屋顶，然后吹进一条小街，吹过一个拐角处，在那儿我掉落到一条溪流里。因为前几天下了雨，溪水里的浊流立即把我拖往大海的方向。大海。

缸砖建筑和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周六下午，在人满为患的湖边，在人海当中，仿佛我已经感觉到自己患了夏季发热病，以奇特的方式被隔离，让其他人接触不到，稍晚我独自一人、在还摆放着床的清理后的住房里陷入不眠之夜，在这样的夜晚湖泊一再显得没有睡意，同样无眠的还有波浪，湖水吞没了我，躺在游泳圈上的身体在我身边漂浮，一个皮球穿过天空掉落，肩膀擦过下垂的树枝，长有苔藓的木板小桥摇晃不稳，白色的天空在我身下渗透，在我上面伸展着海藻，在阳光之间透过一阵带有秋意的微风，被折断的黑颜色的塑料天鹅，在老旧的、过于老旧的缸砖建筑物里淋浴，一栋儿时破旧的缸砖建筑，内置的信箱有邮政专用信箱那么大，上面有浇注的商标，即两个字母及其上方的黑鹭，那是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大写花体字母，我不由得想起了你，想起你黑色的泳衣，它在一个秋千上放着晾干，而我则以独特的不被接触的方式站在赤裸的孩子们和他们拿着杯装冰激凌的父母中间，在那儿站着并想起花园和花园大门，它在放学之后被漫不经心地撞开，想起树木和道路，仿佛那是你的童年，仿佛你正穿着针织背心从米拉别里李子树旁边走过，而不是脖子上挂着胸口钱袋的我，你在拉紧的窗帘前面脱去衣服，窗帘后面的房顶上覆盖着第一场积雪，街道上刚刚轧过的轮胎印记，你背朝着我，地面供暖的地方热烘烘的，从浴室里透出灯光，床在晃动，紧闭的双眼，以后每当我和你睡觉的时候，我总能看到雪落在窗帘后面的房顶上，小心翼翼的雪花，房子的入口处，几天之前在后院、楼梯上、街道上、有轨电车和咖啡馆里的拘谨，然后当你站在我面前，赤裸着后背朝着我站在圆桌上摆放有用巧克力制成的天使的狭小房间里时，你的保暖腕套是灰色的，你的束发带是红色的，雪花，窗帘，房间，你的呼吸，你的呼吸，总是空荡荡地通向电梯的走廊，我周围全是雪花，即使是夏天在缸砖建筑前面，为那些赤裸的孩子以及成群的女孩和扔皮球的男孩们所围绕，而我站在他们中间，却让其他人接触不到，就像在那个不眠之夜里，在清理后的住房里躺在未铺

被褥的床上，外面的炎热渐渐冷却下来，屋里头晕目眩还在继续，从凌晨三点开始风一阵阵地通过敞开的窗户吹进屋里，书页被吹得犹豫不定地来回翻动，阵风巡视了一番被清理过的住房之后又消失了，在炎热的夏季周日再次来临之前天下了一些雨，空气就跟你的呼吸一样轻柔，我因为发热而在床上翻滚，仿佛你先是伏在我身上，然后躺在我旁边睡着了，手还放在我的腰上，就像我们站在狭窄的木桥上，注视着桥下溪边沿着石块间隙奔跑的那条狗，我们沿着墓地围墙穿行在低垂的树木枝条之间，我们来到两栋房子前面，山丘位于它们身后，从这里开始再不通行了，一个男孩朝我们走来，右手高高举起，为了让手里握着的一些长长的黑色的东西不至于拖到地上，在走近时我们才看清他手里握的是鳗鱼，它还活着并且一直在动，尽管几乎让人觉察不到，我们看到的动物首先是狗和鳗鱼，然后在宾馆咖啡馆的露台上，当一只大山雀出乎意料地在夕阳中撞到其中一扇窗户上、躺在其中一张未刷油漆的桌子上一动不动时，我把它张着嘴急促喘息的小身子放到面包筐里红色的餐巾上，从你的杯子里一滴一滴地喂它水喝，把它举向去往火车站的方向，直到它在建于六十年代的行列式住宅前面（在半开的栅栏后面栽着浓密的冷杉）从我的手里向上飞到一根树枝上，在枝叶的半掩下一直蹲坐在那里，与此同时夜幕逐渐降临，清晨复又黄昏。风、雪、鳗鱼、狗、山雀，还有总会出现的白色，当记忆断裂的时候，当我醒来时不再发烧的时候，精疲力竭和内心空虚，在湖边能够让人碰撞到，不再无老年迹象，仿佛我可以一直不衰老地站在你面前，或许明年，正如我想象的那样，明年没有你就不会再有夏日，但是我今年站在湖边的时候还是没有你，尽管炎热但天是灰蒙蒙的，一个男人站在那栋老旧的缸砖建筑前面，在用胶皮管喷洒路面，我已经看到人们为秋季准备的脚手架，为了拆毁这栋老旧的缸砖建筑，或者更为糟糕的是，对它进行修缮和翻修，你现在或许见不到这栋建筑了，新的事物对我来说如此可疑，变革对我来说如此不可信，我更愿意带着夏季发热病躺在床上一夜不眠，然后在两天的时间里身体虚弱，这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种病情的发作，为了让自己得到休息，为了再一次一幅画面接一幅画面、一块石头接一块石头地在我心里把那栋缸砖建筑重新盖起来，让它像博物馆一样，并且把我的通道建进去，这样我光着脚在四十年前，不，很快就是在五十年前，

光着脚独自一人走进黑暗，从地面砖上走过，赤裸着双腿和胸膛，对你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跟现在一样。

在汉堡红军派代表大会期间私事再度超越了政事

因为我事后为自己感到遗憾，我对我自己，正如格尔妮卡一语中的那样，不是其他事情或者她，而总是我对自己感到遗憾，所以我并没有同样启程，而是在格尔妮卡出发后按计划又坚持多待了一天，尽管我必须更换房间，无法凝视她在我身旁躺了一夜所用过的枕头和被子，无法凝视她放衣服的椅子，无法凝视她从柜子里挂到外面的那个空衣架，也无法凝视她拉紧的窗帘等等。相反我坐在躺在一个与我的心情更加匹配的阁楼间里，只是房费便宜不到哪儿去，但却带有独立楼梯（不是电梯）和镜子破损的浴室，确切地说是位于楼梯顶上的淋浴房。

可能跟所有的宾馆客人一样，此前我对独立楼梯一无所知，这样的楼梯令我回忆起许多梦境，在这些梦里我返回父母家，就在那幢挨着工厂的郊外寓所里，只是为了在那儿惊异地并且跟在这儿非常相似发现第二道楼梯。有时候这条走廊会通到地下室，并继续通往其他地下通道，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会沿着楼梯上楼，一直在寻找一条过道通向正确的楼梯间，这样就能找到我父母的住房。第二个楼梯间里堆满了家具和旧货，上下楼的人群不停地从它们旁边挤过。这些人很穷，或者说得更恰当一些，他们就像是电影里被描述的那些穷人，二十或者三十年代的穷人，他们一方面吃得胖胖的，但是又在不断地淌汗，仿佛天气很热，而其实天气一点儿也不热。男人们穿着汗衫，女人们穿着褪色的晨服，孩子们用吃完东西尚未擦干净的嘴在哭闹纠缠。他们不停地上上下下，但却从未消失在任意一扇屋门背后，这些屋门或许只是摆样子而已，难怪我无法找到通往正确楼梯间的通道。这种不断的上下楼好像是他们真正的工作，同时也好像是他们徒劳和绝望的象征，因为当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出口的时候，他们早已放弃了这样的寻找。

可是在宾馆这儿的第二个楼梯间里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人，尽管在每一层楼都有许多屋门和通道。带有深褐色菱形图案的壁纸保存得非常完好，与楼梯平行向上悬挂的图片都已失去了光泽。尽管如此用水彩颜料画的面具画仍会产生咄咄逼人的效果，看到那些深陷的眼窝我禁不住再次想起格尔妮卡当着我的面所声称的虚无，这种虚无存在于我们之间，是由我一人导致的，现在我不得不跟它做斗争。为了使这种斗争具有具体的形式，但是或许也仅仅是出于通常那种极度的自我同情，我打算在我们本想共同度过的这么一个第二天外出散步，散步过程中我想把那些地方再巡视一遍，它们是我们在专家论坛结束后的晚上和昨天在她启程前的几个小时里共同走过的地方，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使我回忆起我无法再回想起来的事情，可能是为了经历我不曾经历过的事情，因为我太激动而不能自己，只注意到了街上的管道入孔盖和井盖而没有关注格尔妮卡，其实这件事也可以变得很愉快，因为她专程从伦敦赶来，肯定是不无理由而来的，但绝对不是为了被抓住，或许是为了被抓住，但无论如何不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是在阿斯特露台街、中央路和新乌鸦大街之间的锐角三角形草坪上，因此我必须正好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始，最好必须重新开始巡视所有的地点，以便彻底探究这件事情的原因，把所有的构成因素都考虑进去，比如说考虑给那个鄙陋的停车场起名的人到底是谁，该停车场是以“韦德尔斯”的名字被命名的，韦德尔斯这个人先是作为犹太人接受洗礼，然后又更名为“韦德尔斯”，它读起来比原名“韦德勒斯”要糟糕得多，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让他的基督教兄弟们后来能够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鄙陋的停车场，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也有这个原因，所以我乘车去了奥尔斯多夫墓地，以前我和格尔妮卡曾经到那儿去过一次，当时她还叫格妮卡、奥尔妮卡或是阿尔妮卡，我必须查看一下，或许我在日记里记过她的名字，尽管我不写日记，不写狭义上的日记，但是有时候我会在日历上记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会在一张纸上写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会想起一些跟一张照片有关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尝试让格尔妮卡站在“告别大厅”的题字字样旁边给她拍照，结果照片上只有“告别”字样能够被看到，以及她在这两个字前面低着头、头发散落在额前的样子，她在伦敦的一位理发师那儿剪了一个新发型，或者她当时根本就没有去过伦敦，而是那位斯图加特的理发师，在我看来他每次都给她把头发剪得太短，尽管这种“太短”事后又显得很合适，如果我从侧面

和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来观察她的话，但是接着她又不再相信我的判断了，她已经满足于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把事情办得合我心意，尽管她不是因为我才去理发师那儿，但也确是因为我，就跟我也是为了她的缘故才乘车去奥尔斯多夫墓地一样，在那里我尝试回忆，是否每次当我来汉堡的时候，她都特地从伦敦旅行到此，仅仅是因为两地的距离显得那么近，当然这是胡说了，但尽管如此人们也把它当成理由，为了在一个中立的或者至少一开始非常中立的地方碰面。

不，每次她并非专程从伦敦赶来，但是一年半当中总共有三次，这也算是比较频繁的了。当时在奥尔斯多夫墓地我们没有吵架，至少我回忆不起来有这么一次争吵，但不管怎样当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否则我不可能尝试在“告别”字样旁边给她拍照，因此我甚至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我们之间又闹了点儿别扭。这只是众多琐碎动因中的一个，每次我只能模糊地回忆起这些动因，尽管它们好像在蜂拥般纠缠着我，人们只需随便暗示些什么，随便谈及一个话题，就能重新激活我的回忆。就这一话题而言，我也不能使自己退回到一种神经错乱的状态中去，尽管有时候我倒是想这样，但是真正神经错乱的人会觉得不一样，真正神经错乱的人在谈吐方面也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在行为举止方面完全不一样。当然真正神经错乱的人也具有攻击性和容易激动，然后他们会把刚刚买来的水瓶到处乱扔，或者把门踹开，或者把短外套撕破，或者把电视机弄翻，但反正跟常人不一样，他们不那么半心半意，至少我这么想，另一方面他们的举动又不那么突然，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即使是他们尚未把任何东西乱扔或者把门踹开或者把东西弄翻，也已经出现过某种方式的精神紊乱，这并不意味着我此前没有过精神紊乱，但是至少我这么想，人们或许更能觉察到那些真正神经错乱的人，因此人们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例如不谈及某些话题，或者不打听用药情况，或者干脆悄悄地掌握主动权，不引人注目地指挥那些真正神经错乱的人，以使他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去乱扔东西、把门踹开或者把东西弄翻，尽管人们当然也可以毫无理由地去乱扔东西、把门踹开或者把东西弄翻，因此这样想或许是一个错误结论，也是构成我精神紊乱的一部分，即认为真正神经错乱对我来说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案，因为这样一来在我的生活中至少有一条路线，即精神紊乱的发展路线。

下意识的，有时也是直接的，我时不时地呼吁格尔妮卡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来指挥我，当然这很荒诞，当然这恰恰行不通，它之所以无法奏效，是因为我想这样，因为这更像是我并非真正神经错乱的标志，尽管我当然也可能是真正神经错乱，而且我的精神紊乱恰恰表现在我不感到自己是真正的神经错乱。也只有真正的神经错乱和不引人注目、在我看来也可以是完全直接和显眼的指挥才能把我从这种疑难问题中解脱出来，我是这么想象的。

当时和格尔妮卡在奥尔斯多夫墓地的时候，天气如夏天般舒适，比她从伦敦出发时要暖和得多，因此她穿着靴子，而我身上没带水瓶，尽管临近两点时天气甚至变得相当炎热，但是当时我也从未向她身上扔过水瓶，更不用说在墓地上了，尽管这说起来很容易，因为我当然也总在声称，通常情况下从未在阿斯特露台街、中央街和新乌鸦大街之间的三角形草坪上向她或者其他人身上的扔过水瓶，但其实我还是那样做了。当时我们有些漫无目标地在墓穴中间、在高高的大树底下走着，难怪我们，或者确切地说是我，没有注意到西格弗里德·韦德尔斯的墓碑，尽管它紧挨着无法被忽视的水塔，水塔就位于道边，这条路在这个地方叫科尔德斯林荫路，它是以景观设计师科尔德斯的名字命名的，科尔德斯先是设计了墓地，继而作为经理管理墓地，为了紧接着在自己设计和管理的墓地上被埋葬。就跟在内城一切都是按照阿斯特这个名字被命名一样，在墓地这里一切都是以科尔德斯的名字被命名：科尔德斯殿、科尔德斯泉、科尔德斯林荫路、科尔德斯区域、科尔德斯纪念碑，这一方面显得和蔼可亲，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些缺少创见，或者至少被过度渲染和策划，而没有注意到由此一来它跟那个鄙陋的西格弗里德·韦德尔斯停车场之间的落差变得更大了，对韦德尔斯的隐瞒显得更加清楚，更不用提数以千计的其他被隐瞒者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韦德尔斯的墓碑被野草遮没，遭受了塌陷的命运，几年前人们才对它进行了再次修复。墓壁不是很小，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看得到它才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偶然发现了它，因为在墓壁前半躺，安息在一种石棺或者衣冠冢上的那个女人跟格尔妮卡有些像，特别是下巴和嘴巴部分，但是也包括体形、双手，尤其是手指：纤细修长的手指握着两个杯子，其中一个在两膝之间，勉强保持着平衡，另

一个已经在背后倾倒，使得水从杯里流出，弄湿了整个右手，因为一切都从手里流出，一切又都流回到手里，如同死亡和生命，人的痛苦与快乐，就像墓碑下面所雕凿的铭文所言。我在想，或许那些被忘却的名字也同样如此，在过了一百年之后，它们又像水一样流回来，想被再次提及，既然这样人们也应当正确地使用它们，而不是急匆匆地给一个鄙陋的停车场更名，因为这样的更名还不到十年的光景，不是像我出于天真而认为的那样发生在另外一个时期，今天的很多地方都是从这个时期发展而来的，相反人们非常有意识地挑选了这个鄙陋的停车场，给它取名叫西格弗里德-韦德尔斯广场，就像韦德尔斯本人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圣彼得教堂接受洗礼那样，在此期间基督教科学家们在斜对面的一栋俗气的建于五十年代的办公楼（包括位于幻想十字架上方的标准钟）里创立了一个理想组织作为与圣彼得教堂鲜明的对照，1977年8月27日，就在施莱尔劫持事件发生的前一周，汉堡人汉斯·约阿希姆·博尔曼在圣彼得教堂里用硫酸腐蚀了汉堡画家戈特里德·利巴尔特创作的《神圣家庭》，就跟他三天前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博物馆里用硫酸腐蚀了鲁本斯的《阿尔布莱希特大公爵画像》一样，在前一周即1977年8月16日，他又在汉诺威国家博物馆里用硫酸腐蚀了卢卡斯·克拉纳赫创作的马丁·路德和妻子凯瑟琳·封·波娜的画像以及巴特尔·布鲁因绘制的一名三十九岁男子的肖像，博尔曼在这个时候还是三十九岁，一个月之后他才四十岁，此前他还用硫酸腐蚀了画作《两匹马，牝马和马驹》，在这之前他在波鸿圣彼得和保罗教堂用硫酸腐蚀了弗兰茨·伊藤巴赫的《戴十字架念珠的玛利亚》，在吕贝克圣阿吉迪教堂用硫酸腐蚀了《浪子归乡》，在多座教堂里纵火，在数百块犹太人墓碑上涂抹了纳粹标志十字钩，用纳粹标志十字钩划坏了数百块橱窗玻璃，在卡塞尔的一家教堂里点燃了一座圣母雕像之后，他又于1977年10月7日在卡塞尔威廉山宫殿里腐蚀了伦勃朗的《雅各的赐福》和伦勃朗的一幅自画像，他还腐蚀了伦勃朗的学生威廉·德罗斯特创作的《不要触摸我》以及伦勃朗的学生尼古拉斯·梅斯创作的《使徒托马斯》，之后他返回汉堡，于七点半抵达那里，买了一袋李子，坐到圣彼得教堂里，在那儿他六个星期前曾用硫酸腐蚀了《神圣家庭》，他在圣彼得教堂里坐着吃李子，然后才回到家里，观看侦缉节目《若干未侦破的案件》，一直等到十点半的时候有人敲门并将他逮捕，因为他在卡塞尔宾馆是用真实姓名办理入住登记的，所以他在作

案十七次之后也真的被抓获了，并被判处五年监禁，这十七次系列作案始于1977年3月27日他在汉堡艺术馆破坏弗兰茨·拉齐维尔的画作《易北河畔的百合石》和保罗·克利的《金鱼》，西格弗里德·韦德尔斯的艺术品收藏就被“融入”这家汉堡艺术馆，就跟由马丁·哈勒尔设计建造的韦德尔斯别墅被汉斯默克保险集团“一体化”一样，该集团用其办公区域包围了韦德尔斯别墅，为了以这种方式紧接着将别墅出租用以举办重大活动，尽管西格弗里德·韦德尔斯在他的遗嘱里只注明了唯一的愿望，那就是他的艺术品收藏应当被完整保存在他的别墅里并向公众开放，汉堡州政府对此并不感兴趣，它延续了纳粹的传统做法，蔑视了艺术创始人的愿望，让韦德尔斯别墅被汉斯默克保险集团“一体化”，而这幢别墅原本是应当面向公众开放的，公众在被一体化的别墅面前现在可以穿过一个名叫韦德尔斯的鄙陋的停车场，能够在汉堡艺术馆看到部分韦德尔斯的艺术品收藏，这些艺术品没有被汉堡州政府卖掉，就像人们又能看到原先被硫酸破坏、后来经过修复的克利的《金鱼》一样，就像一切又重新恢复了秩序一样，红军派的恐怖，汉斯·约阿希姆·博尔曼的恐怖，纳粹和汉堡州政府的恐怖，我的微型恐怖，一切都过去了，被雅利安化，被制度化，被充公，被调控，都结束了，只剩下回忆和灵魂，它们有时候在呼喊：“我没有死。”它们在呼喊：“我没有死，我只是换了空间。”它们在呼喊：“我没有死，我只是换了空间。我活在你们当中，穿行在你们的梦里。”就像后几排的一块墓碑上所写的那样。韦德尔斯像幽灵一般出没在行政区长官和保险公司职员梦魇里，向他们出示手里拿的洗礼证明书，他像幽灵一般出没在汉堡艺术馆里，手里还拿着他的遗嘱，他与汉斯·约阿希姆·博尔曼结伴同行，博尔曼在被捕和监禁之后一再、临死前还在用酸剂破坏绘画作品，为了再次破坏绘画作品他向精神病院请假，为了破坏绘画作品他从精神病院里逃出，在拘禁期间他仍在破坏绘画作品，破坏了五十一幅绘画作品，因为他对象征性的东西感到愤怒并精神失常，他精神失常，因为他对象征性的东西感到愤怒，因为每一次愤怒都是精神失常，特别是对象征性事物的愤怒，因为不疯狂的东西也不会怒吼，而是有计划地摧毁，使自己隐没在历史当中，甚至连空间都不换，甚至连名字都不换，有时会更名一个鄙陋的停车场，除此之外都会保持不变，保持不变。

在奥尔斯多夫墓地我故意走相同但还是不一样的路径，作为他精神病发作之后的第一次行动，汉斯·约阿希姆·博尔曼在这里拧掉水龙头，为了导致一场洪水泛滥，我从又重新完好无损的水龙头旁边走过，为了不断遇到我和格尔妮卡已经去过的地方，因为活着或许就意味着，在相同的空间里遇到总是同样的东西，因为活着就意味着，其他人穿行在我的梦里，其他人穿行在我的思想里，属于我的只有空间，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只有我无法更换的空间，因为我无法更换空间，所以它成了我的囚室，在这个无法被更换的空间里个人存在变成了囚室，我至少，如果我无法再离开这个囚室，至少有那么一次想穿行在别人的梦里和思想里，想拥有一次空间和时间，不想再被囚禁在我的牢房里，不想被遣返回我感受到亲密的地方，不想怒吼，不想无意义地对囚室愤怒，而是想从上面，即便只是从舞台上方的升降布景的梁格结构上俯视其他狱友，他们跟我一块儿被囚禁，跟我一样正不停地来回奔走和反复思考，他们安定不下来，不愿去想他们必须要想的事情，往往来来，来来往往，为了给你谋求幸福，只有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即你对我来说可能会死去。

是的，没错，格尔妮卡说得对，在所有多愁善感之余我总是忘却了时间性和暂时性，尽管恰恰是这种暂时性不断地把我抛回到一种忧郁当中，尽管恰恰是我总是做出这样的举动，仿佛恰恰我才是那个唯一克服了存在遗忘症的人，是那个在生活中随时意识到包围感的人，而不像所有其他人那样磨洋工和混日子，我对此感到扬扬自得，而事实上我总是忘记一切，忘记格尔妮卡和我自己，仅仅是因为我无法忘却某一个句子、某一句评论和某一个鄙陋的停车场，另一方面我又像瘫痪了似的，就如现在站在那个蹲伏的女人的墓碑前不能动弹一样，她微笑着注视着自己手里的玫瑰，人们能够看到雕凿在玫瑰下面的那句漫不经心的话语。

这是奇林费彦家族的墓碑，是卡尔·奇林费彦和他父母的墓碑。卡尔·奇林费彦1949年和马克斯·赫尔茨共同创办了奇堡新鲜烘焙咖啡公司，“奇堡”这个名称源于奇林费彦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和“豆类”这个单词的第一个音节，尽管奇林费彦不久之后就从奇堡公司的成功史里消失了，因为他“不善经营”，马克斯·赫尔茨就“买下了”他的股份，为了

以这种方式帮助他，但是这样做一点儿作用也没有，最终还是未能保护他这个亚美尼亚人免于破产，结果“他的甜食没有销路”，而赫尔茨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他早在第三帝国之前就开始做咖啡生意，因为纳粹者们“限制”了咖啡进口，为了“存活下来”他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不得不转而尝试“赌博”，因此他在第三帝国期间花五万马克买下了一家汉堡分类博彩公司的分部，它使他获得了足够多的盈利，以至于战争刚一结束他就和卡尔·奇林费彦共同创办了奇堡公司，尽管他“并非真的需要”奇林费彦，而只是需要一个“稻草人”，只是需要某人能够在他的仓库里安置烘焙机器，只是需要某人，为了能够从受限制和被分配的进口中搞到更多的份额，因为正如1962年10月17号的《明镜周刊》所继续描述的那样，赫尔茨“办事灵活”“严酷无情”“总是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对规定不加理睬”，而奇林费彦在这篇《明镜周刊》文章里仅仅被称作“亚美尼亚人”，这名亚美尼亚人“从他的先辈身上继承了太少的商人血统”，他先是作为一名有用的代理人，后来成为一个“令人厌烦的稻草人”，作为“令人厌烦的稻草人”他“被人抛弃”，而赫尔茨无须从他的企业身上动用一分钱，仅靠他自第三帝国以来一直运行的“博彩业”就能谋生，在令人厌烦的亚美尼亚人“被抛弃”之后，他才在上巴伐利亚地区买了一处庄园，它的面积有五百摩尔干那么大，还养了六十头奶牛，因为他“再也不想挨饿”，就跟所有的德国人再也不想挨饿一样，因此人们必须处于“领导职位”，必须“办事灵活”，必须“严酷无情”，必须“抛弃”“令人厌烦的稻草人”，即那个“亚美尼亚人”，他名义上继续存活，赫尔茨保留了他，就连赫尔茨的妻子英格博格也容忍了他，他把她称作奇堡丽娜，因为称呼这个名字不是为了回忆，而相反是为了忘却，就像韦德尔斯应当在命名中被忘却那样，就跟他最后的愿望、他遗嘱里的唯一愿望应当未加满足地被忘却一样，因为“单身汉”韦德尔斯没有后代，没有可以依照格言“能忍受苦难的人是值得赞扬的”来教育的儿子，就像赫尔茨按照这条格言来教育他的儿子们那样，与此同时赫尔茨购进了一个“种马场”，让人给自己在波罗的海岸边建造了一处“沙滩堡垒”，后来这座堡垒对他来说“俨然是帝国首相官邸”，他在“昔日的德国-东非殖民地”拥有一处咖啡种植园，但尽管如此他“仍对非洲发展中国家抱有一颗同情心”，对中美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他当上了“里里普特国（小人国）萨尔瓦多”的领事，为了让奇堡-座右铭得到践行，奇堡公司的座右铭是“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地

方都必须有奇堡商店”，从这样的奇堡-座右铭里命名奇林费彦已经无法预知任何事情，找不到自己的任何痕迹，从这样的座右铭里赫尔茨很快也将找不到自己的一丝影子，因为他在那篇《明镜周刊》报道之后仅活了三年，便于六十岁时去世，给他妻子留下了一笔财富，这笔财富使她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成为德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使他受过严格教育的儿子们成为德国最富有的儿子们，他们买下越来越多的公司，接着又转手卖出，对此他们的父亲已无从知晓，《明镜周刊》对此也一无所知，通过1962年10月17号的那篇未加粉饰的殖民主义一种族主义文章，借助于那篇遗忘过去的父权制文章，那种对过去、纳粹时期、殖民统治和种族屠杀的绝对否认，《明镜周刊》让我理解了，一下子又让我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向绘画作品泼洒酸剂，或者突然产生点燃一家商场的念头。

当我晚上回到宾馆的时候，发现接待处有一个给我的没有寄件人姓名地址的大信封。我希望它是格尔妮卡寄来的，但这怎么可能呢？我撕开信封，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封信和我的材料，材料是我在两个月前寄给汉堡红军派代表大会（HaRaTa）专家论坛举办者的，现在他们又毫无必要地把材料投递给我，或许是为了明确断绝和我的任何联系。我朝早餐室方向走去，然后向右转向厨房方向，为了在快到厨房的时候向左上楼回我的房间，这期间我在心里问自己，举办方是从哪儿知道我一直还在汉堡的，是否人们给宾馆打来电话进行了探询，因为否则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毫无必要地把我的材料寄到了这里——我注意看了看信封，发现信封上没有贴邮票——，也就是说送到了这里，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人们一直还在关注着我，这对我来说显得非同寻常、令人诧异和有些特别，仿佛人们不想把这件事情搁置一边，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人们想把它搁置一边，具体的做法是人们把我的材料寄了回来，为了恰恰相反不断让这件事情得到发酵，当然对于整个此次内容空洞的事件而言，这种情况又会让我觉得很有代表性，此次事件总是不断地在围绕自身发展，对每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喝倒彩并把他扔出去，当然不是真的把他扔出去，但也是相应地粗暴对待之。

这些材料虽然是我两个月前亲自打印并寄出去的，但它们现在突然感觉不太一样，仿佛它们在此期间又被装载了一种附加意义。特别是我的个人简历，它也是由我本人作为个人简历加了标题的，但却唤起了我的这一印象，即其他人把它持于我面前，充满责备地把它退了回来，为了用我自己的话向我证明，伴随我生平的那些数据是多么的可笑。一个可笑生平当中的可笑数据，这样的生平在他们看来已经永远停顿了下来，无论我现在是否真的、没有器官的、麻木的、对自己感到愤怒的、对其他人感到愤怒的继续活着，也无论我是否作为液态躯壳还在一个臆想的光束上做上这样和那样的记号。无关紧要。无所谓。

我在汉堡红军派代表大会专家论坛期间所提出的批评，即去往“某些历史发生地点”的所谓城市环游实际上是革命旅游，在这封信里同样被提及并遭到了以下声称的驳斥，即认为这样的城市环游更确切地说是对“城市问题”的调查，从中完全可以产生出“对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公开”，属于此列的或许也包括，人们一直还在打字机上敲写书信，这反过来又让我很感动，因此我在很短的一瞬间，也就是上两三节台阶的工夫，感受到了对他或者她的同情，不管他或者她到底是谁，因为我想象她或者他（首先是他）在一间充满“红汉德”烟味、塞满宣传册和传单的办公室里，这样的想象或许是不正确的，尽管相反的带有干净阁楼的设想也不可能正确，因为否则的话打字机就不再显得合适了，那些脏兮兮的、在字行上不均匀地跳来跳去的机器型号，为了再次感受这种美学，人们今天通常必须用相应的程序在计算机上费劲地仿制它，这种美学现在被免费给我送上了门，跟一些细微的手写更正一道，因为修正液现在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了，所以他或者她不得不把打错的字划掉，再用圆珠笔在上面复写。

我觉得这是一场唯一的悲剧，一切都是一场唯一的悲剧，特别是我可以说是让那些人把我的生命交还给我，可以说是让他人对我的生命进行估价，使我的生命失去原有的价值，使它贬值。我注意看了下叫人无法辨认的签名，看了下签名下面卷曲的字母A，在想它们即卷曲的字母A、像回形针一样的信文和红军派的缩写RAF是否相配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是派别，无论如何都是军队，无论如何都是红色而不是黑色

的。尽管我曾是红军派代表大会的参会者，我还是把我排除在自己提出的批评之外，“为了设计出一种对抗，这种对抗仅仅有利于阶级敌人……”，在此我对过时和脱离现实的事物以及对在梦中度过的自负的感动又转变成了愤怒，差一点儿我就要坐下来，为了用清晰的话语重新表述当初未加考虑和冲动之下、因此模糊不清冲口而出的话，最好是用自来水笔，为了使话语失去美学效果，最好是在漂亮的信纸上用自来水笔书写，但是相反，可能也是为了使自己再次意识到整个事情的荒唐，我又一次开始描述这种“地缘政治的公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城市环游，至少是描述折叠传单的下半部分，因为在专家论坛期间我一直在紧张地把传单的上一半折来折去，最终把它折下，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就在罗腾堡姆公路上的广播角咖啡馆里停留吧，”我读道，“在那儿，”我又读道，“在那个地方乌尔丽克·麦因霍夫，”我接着往下读，“1958年遇到了马塞尔·赖希-拉尼基，询问了有关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情况。那儿能够推荐给大家的是热奶油糕饼，可惜在这个季节我们无法再在宽敞的露台上享用它了。在我们通过丰盛的饮食恢复了体力之后，我们会朝巴伦菲尔德方向继续我们的远足，在那儿我们要参观位于和平大街39号的那栋房子，1970年9月斯特凡·奥斯特因为胆小而通过后院从这栋房子里偷偷溜掉了，当安德烈亚斯和霍斯特在外面按门铃的时候。从那里我们接着去只隔了几个住宅区远的斯特雷泽曼大街，1971年7月15日霍普和舍尔姆两名同志在那儿突破了一道街垒，然后我们继续去往位于附近的巴伦菲尔德教堂路，舍尔姆同志就是在那儿被处决的。我们乘车途经阿尔托那人民公园驶往施泰林根墓地，那是霍格被埋葬的地方。在那儿我们有机会瞻仰那幅著名的鲁迪举起拳头、预示继续斗争的照片。紧接着我们要前往东南方向的埃姆斯比特尔，为了探访霍格的故居。从那里我们一直向北行驶，在短暂的车程之后我们在哈威斯坦呼特下车。在这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步行勘察这个区域，参观所有的二十二个地方，在这些地方从1999年到2003年‘纪念乌尔丽克·麦因霍夫自治组织’发动了他们的恐怖袭击。大约半小时之后我们继续乘车前往温特呼特市场，在那儿的格罗肯药店里1978年1月21日11点15分库比同志（女）与两名警察陷入交火并被击毙，当她想要兑现一个假药方的时候。令人遗憾的是这家迄今仍然

存在的药店已经更名为温特呼特集市广场药店。我们计划在这里稍做停留，这样我们就能穿过市场闲逛，享用当地人提供的产品。然后我们经过大学区返回到内城，截止到1972年3月格拉斯豪夫和格伦德曼就在该区域海姆呼特大街82号的一套住房里策划他们的阴谋活动。在少女堤步行街我们可以看到那栋楼房，2004年之前里内特时装店还设在这里，1972年6月7日古德龙逃进这家时装店，因为她认为被一名出租车司机识破了身份。在她挑寻新款服装期间，一名女售货员在她脱下的皮夹克里发现了一把手枪并报了警，因此在安德烈亚斯、霍格和詹-卡尔被捕不到一周之后，古德龙也落入了警方的罗网。在威廉皇帝大街20号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大楼前我们将结束此次环游，1972年5月19日在这幢大楼里有三颗炸弹爆炸。（参观出版社大楼未在计划之内。）”

在这期间我躺在宾馆床上在想：格拉斯豪夫和格伦德曼，这听起来像是北德意志广播电台的一期名人访谈节目，仿佛这种幼稚的讥讽不管怎样会继续给予我帮助。当然有关奶油糕饼、通过饮食恢复体力和穿过温特呼特市场闲逛的情节，就连在施泰林根墓地瞻仰杜契克的照片也都是我另外想象的，或许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前天对我喝倒彩的原因，因为我不能始终实事求是，必须总要凭空想象些什么，必须总要谈到另外一些事情，必须总要把其他人区分对待的事物关联起来，必须总要冷嘲热讽，其实即便是没有我肤浅的讽刺想法也有足够多的事情可被指摘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措辞的选择和对被射杀官员的隐瞒不说，为什么在城市环游期间偏偏是位于波彭比特儿城区的黑格巴尔克13号被排除在计划之外？在汉内斯·瓦德尔不知情的情况下，红军派在他的住房里建立了一个武器库，在黑格巴尔克前面诺伯特·施密德被开枪打死，从那儿到阿斯特塔尔购物中心只有几步之遥，诺伯特·施密德是红军派制造的第一位死难者，汉堡城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广场，虽然这个广场并不直接就是他被射杀的那个广场，因为这个广场位于阿斯特塔尔购物中心前面，人们在阿斯特塔尔购物中心前面给它更名时的确在事件和名字、在地点和名字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但无论如何人们在同城区，不是直接在相同的城区，但却在邻接的城区，仅仅隔了几条街道，以诺伯特·施密德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广场，在这个广场上矗立着一个体现象征手法的带有绿锈的铁质人像，一个从

侧面看具有象征意义的人，他的一只胳膊向前伸展，另一只胳膊高高举起，看样子可能是他正在栽倒，正在倒下，正在死亡。在他身后又是同一个人作为剪影，它是用一面生锈的铁壁铣出来的，这面生锈的铁壁可能代表了他的一生，现在他从生命中被剪切出来，仅仅作为空洞的形式还存在着，作为一只胳膊向前伸展、另一只胳膊高高举起的摆臂动作中的空缺，在栽倒的那一刻被捕捉了下来，通过这一刻、这一毫无意义的瞬间永远从整体中被省掉了，同时这一瞬间又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和铁壁上的空洞形式意味深长地被定格了下来，如果不是地滚球的象征，它吸引人们在诺伯特·施密德广场上进行地滚球游戏，游戏场面也是在带有空洞人物形式的铁壁上被铣出来的，被掷的是球而不是诺伯特·施密德，他在相隔几条街远的地方被开枪打死，在玛格蕾特·席勒在场的情况下被射杀，二十年后她在古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给女孩取名乌尔丽克，给男孩取名叫霍尔格，原本她是想让男孩叫安德烈亚斯，但是因为“这个名字在那里是女孩名”，故而另选了“霍尔格”这个名字，因为她认为赋予孩子们“一段她的历史”是正确的，因为她想让孩子们特别记住那些“在这场斗争中被杀害的人”，因为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她“认为这样的传统很好”，但她并不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诺伯特，并把女儿唤作乌尔丽克，因为这样做并不在于那个古老的传统，不在于对名字的回忆，名字是随便起的，也被随便忘却，因为历史通过同时的取名和隐瞒来表现自己，命名经常也意味着隐瞒，因为每一个被称呼的名字都隐瞒了一个未被称呼的名字，遗产通过取名和隐瞒两次被继续传递，孩子们必须承载阵亡士兵的名字，孩子们必须承载他们母亲的名字，必须承受和容忍他们的母亲，这也是诸多不良习惯中的一种，那些习惯使格尔妮卡在我这儿心情如此烦躁，以至于我无法放过任何背后说母亲们坏话的机会，当然我很少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但是我在心里问自己，使我如此恼火的为何总是或者往往恰恰是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玛格蕾特·席勒在对古巴胡说八道以及在讲述安德烈亚斯这个名字的时候为什么会使我激动？为什么我脑子里总想着这样的荒唐事情？为什么我在这里躺在宾馆房间的天花板下面，在思考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女人的假想动机？为什么我尝试去想象，她为何要瞎扯这样的事情，而我只是又一次变得生气，如此生气，以至于我，不，不是对格尔妮卡生气，也不是为水瓶、把手、击打、女式衬衣和门框而恼火，我保证不是这

样，但是这种愤怒，总是当它必要的时候它就隐遁，总是在它不必要的时候它就现身，就像现在这样，我难道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吗？以至于我能够理解，这种愤怒，这种无力的愤怒，无论它产生于何种琐碎和平庸，这种愤怒，为了结束并不再感受到它，这种源于无能、在强势面前表现出来的愤怒，鉴于人们用其他办法控制不了它，人们应当继续培养和激励这种愤怒，为了终于用一种盲目的行为，终于使自己从退化中甩出去、弹射出去，为了终于，终于，为了至少一次，为了，为了然后，为了终于……结束一切。够了。结束了。向袋子里呼吸。吐气。吸气。吸入。吐出。电视机。打开。关闭。呼吸。吸入。呼出。电视机。袋子。吐气。吸气。电视机。打开。关闭。打开。关闭。打开。关闭。换节目。切换到一些无害的节目上。儿童节目。退化。有关武尔姆的节目。

武尔姆就是蠕虫的故事。武尔姆生活在汉堡，身份是恐怖分子。即使是在红军派解散多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如此。他的名字叫武尔姆，因为有这么多事情令他恼火。但是“武尔姆”（Wurm）这个名字也意味着蠕虫，因为他潜入敌人的内脏，从那里开始破坏它们。《武尔姆》是一部克内特-斯陶普特里克影片公司制作的动画片，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观看。我们从影片里经历到的是武尔姆在部长和总统们的肠子里的冒险行为。但是今天武尔姆必须经受一次特别的冒险：因为他要一直爬行到伦敦去找他的女友维尔姆（“维尔姆”这个名字不是按照巴伐利亚境内的一条河流或者相应的亚冰期而起的，而是以Yes乐队的一首歌曲命名的，准确地说是按照《星河战队》（Starship Trooper）第三器乐部分，按照《生命探索者》（Life Seeker）和《幻灭》

（Disillusion），这是一首武尔姆因其有些生硬的混杂而从未真正喜欢过的歌曲，在Yes乐队专辑里这种混杂在结尾处被附加了韦克曼的单调哼唱，因而听起来更加糟糕，但是维尔姆需要这个，反正她也不了解Yes乐队，甚至对它一无所知）。武尔姆想请求维尔姆的原谅。因此他带了一件礼物给她：它是一管深蓝色的眼睑膏，与维尔姆上臂上深蓝色的斑痕很相配。维尔姆一方面对武尔姆所送的礼物感到很高兴，更让她高兴的是武尔姆腹部着地（不这样又能怎样呢？），一直爬行到了伦敦，即使是在渡船上也一直继续爬行，但是她无法再做到让自己原谅武尔姆。武尔姆不知道向维尔姆发了多少遍誓要改进自己，但是

每一次他都又变得失去控制，把所有的事情搞砸。武尔姆能成功地再次使维尔姆回心转意吗？能够让维尔姆转变想法，这样做真的那么值得期待吗？武尔姆不应当学会更好地对待自己的侵略性吗？而不是一方面否认和诅咒这种侵略性，另一方面又转而不加控制地尽情享受这种侵略性。他不应当像娜奥米·坎贝尔那样去参加一期反侵略训练课程吗？在他再次接近维尔姆、请求她的原谅之前，他不应该先参加一期新的专家论坛吗？随便一种新的周年纪念日肯定会来到的。我们祝愿武尔姆成功。我们对维尔姆的坚定持赞同态度。维尔姆把那管深蓝色的眼睑膏又塞回到武尔姆手里，慢慢把武尔姆推出自己的房间。可怜的武尔姆。但是或许这会使他惊醒。或许武尔姆现在会停止虚伪的道歉，使自己振作起来。另外武尔姆，你恐怕忘记了这一点，有一次你也在愤怒之下撞翻了维尔姆的电视机，在荧光屏上留下了一道裂纹。你能回想起这件事吗？武尔姆点了点头。他正在去乘渡船的路上。也就是说他首先去乘火车，然后去坐渡船，然后去拜访一位罗腾堡姆公路上的女治疗医师，就在离位于阿斯特露台街、中央路和新乌鸦大街之间的三角形草坪很近的地方。勇敢的武尔姆。但是不要马上又变得目空一切。这才仅仅是开始。你最好先不要拜访维尔姆，在你坚持参加完一次有关红军派主题的专家论坛之前，而没有被喝倒彩，没有提前离开讲台，也没有不停地四处埋怨，即便是在玛格蕾特·席勒在场的情况下。是的，我很遗憾，武尔姆，即便如此。你在之前就考虑到这些就好了。此外医保公司在你这种情况下是不支付治疗费的，武尔姆。但是你可以使自己有一些创收，如果你附着在阿斯特河畔那些不间断的钓鱼者的鱼钩上，他们在下雨的时候也喜欢站在市府行政大桥底下，从泛白的市内水道里钓鱼，当然这仅仅是建议而已。你会成功的。如果不是和维尔姆一道，那么你自己也会胜任这的。作为蠕虫在不得已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分割开来。为了不再感到孤单，你不必像体形更大的生物比如人那样去听声音。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剃须刀片上面爬过去，马上你就会两个人在一块儿了。只是这么出一个主意罢了。因为不管怎样维尔姆已经另有他人了。另外那个人有一份高薪工作，看上去长得也相应不错，没有蠕虫的任何特征，具有良好的社交举止，而不是与发怒交替出现的恐惧感，因此仅从这一点来看从刀片上爬过去的建议也应当被推荐给你。

我一直还躺在床上，半明半暗中我注意到紧挨着衣柜旁边有一扇门，先前我还没有见到过它。或许穿过我的房间有一条通道直接通到宾馆的主楼？我起身下地。尽管窗户是关着的，但不知从哪儿过来一股穿堂风。此外它闻起来也很特别，有股说不出的气味。不是不好闻。它闻起来像是厨房蒸汽，但是也有焚香的味道。我原本估计门是锁着的，没想到它很容易就被打开了。令我放心的是它没有直接通进另一个房间，而是通向一条狭窄的没有窗户的过道，过道里时而闪烁着零星的应急照明灯光。过道的地面是用石块铺成的，墙上没有抹灰泥，因此当我摸索着穿过通道的时候，我感觉身上有些湿冷。过道尽头的门对我来说显得比通进我房间的门要大得多，几乎是一道大门，门上一片折叠的铁质橡树叶充当了把手，我握着把手把门的右扇朝我怀里拉开。如果说原本我期待会在门后发现另一条走廊或者宾馆的一个房间，那么现在相反，我处在一座甚至不算小的小教堂里，里面有十几排长椅和一个简陋的祭坛。透过富铅玻璃窗照进来一束奇特的漫射光线。光线并未染成缤纷的彩色，而是保持着灰色基调，向祭坛上投下一条阴影，在祭坛右侧类似挑楼的凸出部位我辨认出一座圣母雕像。我穿过教堂中跨的长椅走到前面，匆匆做了一个下蹲动作，直接跪在雕像前面。我见到过许多圣母雕像，但还从未看见像这样的。她的头部不是雕像的固定组成部分，而是松动地被安装在上面，就像用黑色金属或者塑料制成的、手里捧着募捐箱的黑人儿童的脑袋那样，他们立在教堂的出口处，当有人往募捐箱里投入一枚硬币时就会点头。眼前的这座圣母雕像也会这么点头。“圣母玛利亚，”我不由自主地说道，“圣母玛利亚，上帝的母亲。”玛利亚的头点得更加猛烈，她的微笑变得越发温柔。“圣母玛利亚，上帝的母亲。”我有些愚笨地重复着这句话，因为我实在是想不起其他的表述，因为我被过去几天搞得身心疲惫，当我跪在那儿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这种精疲力竭。回忆在我脑海里升腾，它们源自我作为辅弥撒者的那段时光，然后我又想到了格尔妮卡，想到了从前的一切。第三次不由自主地，我呼唤出了上帝母亲的名字，在我低下头期间，我听到她的声音在对我诉说：“我叫玛格蕾特·玛利亚·马格达莱纳，又名玛玛马。我诞生了救世主和拯救者，想给他一些我的历史，把他称作耶稣。但是‘耶稣’在古巴是一个女名，因此我无法把他称作耶稣，因此与耶稣钉死于十字架、当然也与救世有关的整个历史可惜都要取消，因为我儿子现在叫

奇堡，这是一个由‘奇林费彦’这个名字的第一个音节和‘豆类’这个单词的第一个音节组成的名字，因为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亚美尼亚民族的命运和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而不是咖啡豆。”“但是，如果没有最后解决的话，”我轻声说道，“那么我将怎么办呢？”我充满期待地抬头向上看，圣母雕像的头部只是在无声地晃动，但却什么也不说了。没错，为了关心其他人的命运，我确是很少想到亚美尼亚人，过多地专注于自身的纠结。我亲吻圣母雕像衣服上的贴边，并在胸前画十字。没有耶稣，就没有拯救。我说的是“拯救”还是“最后解决”，就在刚才？我再一次向不停点头的玛利亚看去，仿佛想从她的面容看出一种答案。“当然我指的是拯救，”我轻声说道，“如果没有拯救，我指的是如果没有拯救，而不是最后解决，尽管我会信守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没有随随便便就会发生的口误，更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了，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就跟奇迹（Wunder）和创伤（Wunde）在发音上非常相近一样，拯救（Erlösung）和最后解决（Endlösung）听起来很相近，在意思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当初纳粹们就已经故意想出了这一点。”

我站起身来，慢慢朝小教堂的出口处走去。没有耶稣。很奇怪这件事竟然对我造成如此大的触动。不再相信人们曾经相信过的拯救者和救世主，恰恰从拯救者和救世主的母亲那儿听到没有他这个人，甚至他根本不曾存在过，或许这两者本身就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人们不曾相信过的东西已不复存在，因为在这一刻很清楚，无信仰也是一种信仰，不仅因为无意识不会否定，而且也因为无信仰必须指向它不相信的东西，这样一来无信仰者与他不相信的对象之间的联系经常要比信徒与他信仰的对象之间的联系紧密得多，信徒不必过多地考虑怎样（形式）和为什么（原因），因为他凭借自己的信仰就已解决和办妥了这些事情。我感觉非常不舒服，继而又感到眩晕。在此期间我走到了小教堂的出口处，考虑了片刻是否我最好应当折回去，干脆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但如果那样或许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因为过去几天的劳累而在那儿虚脱，然后我就躺在那儿，躺在这座小教堂里，没有人会来这里，谁也不会发现我，一想到这些所有的一切就开始更加猛烈地围绕着我旋转起来。我必须索性走完剩余的几步路到达走廊，然后下楼去宾馆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想去埃彭多夫大学附属医院的

性格紊乱特殊门诊部，这是一家知名的医疗机构，能够让人产生信任感，在那儿人们已经治愈了完全其他类型的精神病患者。那里的医生只会嘲笑我，当然不是公开也不是暗地里嘲笑，但是他们会想，一切没那么糟糕，再大一点儿的侏儒我们也都见过了，是的，他们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给我开两副阿普唑仑（抗焦虑药），然后又把我打发回家，或者可能让我在医院待一夜，如果我告诉他们我住在宾馆，身边没有其他人，这听起来多奇怪：我身边没有其他人，但是也只有当人们问我是否我身边有其他人时，我才会这么说的，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被问及，是否身边有其他人能够照顾他，在这些情况下我总会回答“是的”，因为回答“没有”会让我很难为情，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说身边有其他人简直很滑稽，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会这么去说，会这么去感受，而事实上我可能很乐意就这么说或者感受，但是这也无所谓了，至少现在无所谓，关键是我能去埃彭多夫，在那儿他们也对博尔曼进行了治疗，那是1974年，还有两天就过圣诞节了，当时他们建议博尔曼接受一次立体定向脑白质切除手术，或许他们也会建议我接受一些治疗，但不是一次立体定向脑白质切除手术，这样的治疗不再特别时兴，在我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可以说是过于夸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好比是人们想用大炮来轰麻雀，大概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对博尔曼而言情况却不一样，他的痛苦程度完全不一样，手术过程是这样的，人们要在他的颅骨上钻两个窟窿并导入探子，为了使先前被精确计算、对他的神经错乱负责的大脑部分得到萎缩，因为最终他也应当过上正常生活，不再遭受苦难，丢掉他的恐惧症和强迫性精神紊乱，他不应当再有那些自孩提时代起就折磨他的恐惧感，然后他也不必再实施强迫行为了，以便遏制那些恐惧感，比如对水龙头的恐惧，他根本就见不得水龙头，因此他也请求那位女编辑，当时是1974年，距圣诞节还有两天，请求她坐到水龙头前面，当他和她一道在等候做手术的时候，女编辑满足了他的愿望，坐到水龙头前面，因为博尔曼平时也都会给她留下一一种安静和镇定的印象，尽管这次手术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她在为德国电视二台健康专题节目“实践”所撰写的报道中也描述了这一点，因为这件事涉及的不是博尔曼，1974年还没有人认识他，它涉及的甚至连立体定向脑白质切除手术都不是，而是仅仅涉及患者启蒙这一主题，因为当时人们开始在手术前向患者说明这样一种手术的可能性危险，那位女编辑为健康专题节目“实践”拍摄

了这一场面，她拍摄了医生是怎样向博尔曼列举可能性并发症的情景，医生向博尔曼讲述了可能会出现出血、记忆力丧失、运动机能紊乱或者循环系统问题，把这一切都详细地解释给他，但却不知这一切正合博尔曼的心意，不知他就算死掉也觉得这一切很合适，不知他之所以显得这么镇静，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他的痛苦程度如此之大，恐惧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便通过强迫行为也无法再被阻止，而且在此期间这些强迫行为自身也变得极为强势，因此博尔曼在进入手术室时显得非常镇定，因为他终于想摆脱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纠缠他的那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一直以来就在纠缠着他，其实它在他两岁时掉入一个粪坑时就开始纠缠他了，当时他母亲什么也没有觉察到，要不是是一位女邻居把他拽了出来，他几乎就已经溺亡了。所有这些当然我在宾馆接待处是不会说的，在接待处我根本不会多说一句话，或许只说我感觉不舒服，我想去埃彭多夫大学附属医院的性格紊乱特殊门诊部，不是因为一次立体定向脑白质切除手术，而仅仅是为了和能使我平静的人说话，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他给了我两片阿普唑仑又开了一种药，他根本不必向我解释为何我总是为无关紧要的琐事而激动，为那些人们随口说出的话而生气，除了我没有人会对那些话当真，因为那些话总是继续在我头脑里四处闪现，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去埃彭多夫大学附属医院的性格紊乱特殊门诊部，在楼下的宾馆接待处我也会这么说的，是否人们可以给我，不，不是要救护车，而是简单地只叫一辆出租车就行了，这样最终会更快，因为一辆救护车只能使我更加激动，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自己认为我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尽管一方面人们在用救护车送我去医院的路上就能给我服用些什么，就能使我平静下来，但是另一方面人们永远也不知道他会遇上谁，永远不知道来接他的是谁，不知道谁会做出哪些误诊，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济，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很快做出一种诊断，因为对他们来说做出诊断经常只是几秒钟的事情，而他们却无法知道我的病情可不是几秒钟就能诊断的，此外恰恰现在在我这种状态下，我将很难跟那种粗野的方式打交道，那种救护车司机必然惯有的粗野方式，那种粗野方式在话语上的表现形式比如有“首先是我们”“到底怎么了？”以及“毛病在哪儿？”这可不是我现在正需要的，当然在这件事上人们也可能会遇上纠缠不休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把收音机开得很大而不会把音量拧小，他们随意跟乘客交谈，不熟悉交通路况，不停地问路，想知

道性格紊乱特殊门诊部是否真的在埃彭多夫，仿佛我知道这个，仿佛我必须知道这个，仅仅是因为我想去那儿，然后他们把我送到任何其他一个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好或者更近，因为他们认为，或许把我交给目的地附近的某家医院要更好一些，或许他们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圣乔治阿斯科勒匹奥斯医院就在隔了几条街远的地方，那里的医生肯定也精通本行，但是这些医院被私有化了，这从医院的名字就能看出，医生们都来自美国，这从医院的名字就能看出，因为以前它们在这儿都简单地被称作埃斯库拉普医院，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古怪，尽管阿斯科勒匹奥斯听起来也不怎么特别，前者听起来像是一匹老瘦马，人们把它领到剥兽皮工人那儿去，“剥兽皮工人”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因为人们也可以给马身上覆盖些什么，“覆盖”和“剥皮”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像表面上那么大，但是“剥皮”作为委婉语也是不错的，它要好于“剥皮者”或者“冷面屠夫”或者“过放荡生活的人”，然而“草坪师傅”这个名字要更好一些，因为是他导致了动物的死亡，在这方面“阿斯科勒匹奥斯”也不真的就更好，因为他的名字，“阿斯科勒匹奥斯”这个名字暗示着希腊神话中的医神阿斯克雷比亚的出生，因为阿斯克雷比亚是从他母亲腹中被剪切出来的，所以人们可以认为，阿斯科勒匹奥斯医院的医生们更希望把我体内的一些东西剪切出来，也可能想让它萎缩，不管怎样相比在埃彭多夫大学附属医院的性格紊乱特殊门诊部，他们会更快地想到用切除这种治疗方法，尽管在埃彭多夫医生们给博尔曼实施了切除手术，但是紧接着不得不断定这样一来一切都只是变得更为糟糕了，至少对博尔曼的周边环境而言，因为在手术前只是博尔曼本人的状况很糟糕，但在手术之后情况也变得对他的周边环境不利了，可能对他来说不像在手术前那么糟糕，但也算是足够糟糕的了，或许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情况只是对他个人而言不利，为此那些艺术品却得以完好无损，相反如果他个人情况有所好转，他就会失去控制地四处游荡，像掉队的士兵一样到处抢劫，但是这一点人们事先或许考虑不到，因为否则的话人们就会考虑到它了，因此准确地说我要去哪儿可能是无所谓的事情，我只需下楼去宾馆接待处，他们就会给某个人打电话，最好是叫一辆出租车来，毕竟我已经来到了楼梯间，我自己的独立楼梯间，在此期间我对它已经很熟悉了，尽管它显得有些奇特，因为我是从我的房间穿过一条通道来到小教堂里的，现在我不必再穿过通道、一下子就从小教堂里出来

了，至少不必再穿过那条闪烁着应急照明灯光的狭窄通道，而是只需穿过一个小的门厅，如果人们可以把它称作门厅的话，因为它又小又暗，不像韦德尔斯让人在他的别墅里布置的那种门厅，而更像是在到达楼梯之前的一条昏暗的过道，我现在就在慢慢地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沿着这道楼梯往下走，让自己以他们整齐地挂在墙上的那些图画为导向，那些画一直还整齐地挂在那里，尽管它们看上去不知怎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但这只是因为我感觉不舒服，此外因为我刚从昏暗的小教堂里出来，因为我两天来没有吃任何东西，或者几乎什么也没吃，因为我也不感到饿，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也根本不足为奇，而且在我身上出现得比以前更频繁了，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使得

我周围的一切都在嗡嗡颤鸣，也包括这些图画，它们描述的不再是面具，而更像是相当僵硬地盯着我看的面孔，可能我此前从未注意到，现在我突然在上面楼梯平台的墙上看到了一块牌子，并尝试看懂牌子上都写了些什么，因为我本来也在心里问自己，墙上挂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图画，因此我把手从楼梯扶手上移开了一会儿，向墙边走了一步，为了看清牌子上写的是些什么，这样我就会终于知道，那些面孔都意味着什么，以及谁拼凑了那些面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因此我把身子从楼梯扶手边撑开了一些，但是只撑开那么远，以至于我总能退回到扶手处，我把身子向前撑，看清牌子上写的是：十七幅被切除脑白质的强迫性重复行为患者的肖像，看完后我又向后倚靠在楼梯扶手上，心里在想：这也是一句不可思议的话语，可惜它已经完全过时了，它听起来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就像是一个不能言语、嘴张不开的人说的一样，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在吞咽一个土豆，总是重复毫无意义的音节，重复幼稚型音节，像受到强迫一样重复音节，他指向一些东西，看似在结结巴巴地说出某些音节，但是谁也听不懂他的话，护理员听不懂，医生也听不懂：嗯，你指的到底是什么呢？啊，是那边的箱子？好吧，你想要那个箱子？你想用那个箱子做什么呢？他就这样一直在继续结结巴巴地说，因为当人们脑子里在考虑太多事情的时候，当人们为无关紧要的琐事而激动、而不是更应该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人们就经常会结结巴巴地说话，因为人们最后根本不会被当真，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只要他还能够考虑医院的事情，只要他还能够区分埃彭多夫大学附属医院的性格紊乱特殊门诊部和圣乔治阿斯

科勒匹奥斯医院，他的情况可能就没那么糟糕，只要他还在思考阿斯科勒匹奥斯，思考阿斯科勒匹奥斯是被赫尔墨斯从自己母亲的身体里剪切出来的，当他母亲已经躺在干柴堆上应该被焚烧的时候，因为她类似于圣塞巴斯蒂安，被阿尔忒弥斯用整整一箭筒的箭射死，因为阿波罗向阿尔忒弥斯抱怨阿斯科勒匹奥斯的母亲，说他是多么嫉妒阿斯科勒匹奥斯的母亲与另一名男子有染，尽管她怀的可是他（阿波罗）的孩子，正如乌鸦偷偷告诉他的那样，阿波罗派乌鸦盯住阿斯科勒匹奥斯的母亲，命令它如果发现她有可能的行为过失就毫不迟疑地啄出她的双眼，但是当时还长着一身闪亮白色羽毛的乌鸦拒绝执行命令，因此它遭到了阿波罗的诅咒和惩罚，从此带着一身黑色的羽毛飞来飞去，作为它道德完美无疵和自我意愿的象征，作为它智慧的象征，因此我觉得它也总显得有些孤独，觉得它显得令人惊奇的孤独，即使是成群结伙时不知怎的也总显得形单影只和闷闷不乐，就仿佛乌鸦们想得太多，仿佛它们因此无法像其他动物一样平平淡淡地生活，像其他鸟儿那样简简单单地四处蹦跳和飞来飞去，而是必须总要若有所思和面容悲伤地在圣乔治阿斯科勒匹奥斯医院前面的犬类游乐区僵硬地走来走去，就我来说人们也可以把我送入这家医院，在此期间我对这个也无所谓了，因为我真的感觉很不舒服，不仅是眩晕，还有心跳加速，喘气也很困难，然后还有那些被切除脑白质的强迫性重复行为患者的面孔，它们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算不上是被画得特别好，也就是说没有运用那些画技窍门，比如让画中的眼睛到处追随着人们，或者人们突然看到的一位老妇人转而又变成了一名年轻女子，或者两张面孔构成了一个花瓶造型，或者一群人摆出了一个颅骨形状，如果人们精通自己的技艺，那么在这方面的确有可能性，但是这些被切除脑白质的强迫性重复行为患者的肖像却显得极其平淡、单调，总是大同小异，但是相似得又不令人叫好，不像亚夫伦斯基的肖像画那样相近，也就是亚夫伦斯基的冥想画，它们也总是很相像，但恰恰是通过这种相似性而变得越来越细腻，通过那些细微的不起眼的变化，这些肖像我几乎每周都观赏一次，以前在威斯巴登州立博物馆，那个时候门票还是免费的，那个时候博物馆还没有被改造，还根本未被改造，就连一次改造也没有，而是一切都还很阴沉、昏暗，并被镶了木板，就跟这里的走廊一样也被镶了木板，这一点我刚刚注意到，其实它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走廊，一条让人感到亲切的走廊，尽管那些挂在

墙上的肖像，因为，我刚刚就是这么想的，或者我说我整个一段时间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在经历它的时候好像已经使自己置身于过去，这样的事情我经常做，我在心里讲述一些事情，尽管我才刚刚经历它，但是我讲述的方式仿佛是我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不再显得那么危险了，因为由此它就不再显得那么有威胁性了，因为我无法反思我刚刚经历的事情，无法思考这条让人感到亲切的走廊里的那些脑白质被切除的强迫性重复行为患者的肖像，我刚刚感到如此不舒服，现在不开玩笑，这种头脑里的压力，我也不知道为何我没有早就下楼去宾馆接待处，因为这家宾馆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楼层，通常我根本不必向下走那么多台阶，尽管它没有电梯，甚至连自动电梯都没有，甚至连一首《圣母悼歌》都没有，啊，现在听到了一首《圣母悼歌》，维瓦尔第的《圣母悼歌》，但不是由玛玛马演唱的，不是由玛格蕾特·玛利亚·马格达莱纳，而是由一名男子，现在是由安德烈亚斯·绍尔演唱维瓦尔第的《圣母悼歌》，“耶稣不是因别人的罪恶，而是因我的罪恶而死的”，在十字架上被切除了脑白质，尽管是我自己，但我只能，这确实挺奇怪的，只能通过别人的痛苦、通过玛利亚的痛苦来感受自己的痛苦，只能通过别人的欲望，也就是通过格尔妮卡而不是我所追求的，来感受自己的欲望，我刚刚想的就是这些，我想象看到了她，看到她站着，看到了圣母，她就站在那儿，“哦，她看上去如此美丽，哦，她看上去如此优雅，她的名字叫，她的名字叫，她的名字叫斯塔-巴-特，斯塔阿帕特，斯塔-巴-特，斯塔阿帕特，斯塔阿阿阿阿帕特，斯塔巴特斯塔巴特斯塔巴特斯塔巴特母亲斯塔巴特母亲斯塔巴特母亲伤痛她的伤痛她的伤痛她的母亲伤痛你们伤痛你们母亲我有一种疯狂的感觉感觉我是耐卡尔曼耐卡尔曼耐卡尔曼耐卡尔曼耐卡尔曼耐卡尔曼耐卡尔曼耐卡尔曼”。

踪迹把人们引向溪流小巷：一部共分十八章的施耐德青年读物

第1章：阿希姆的母亲赤身裸体

《忏悔镜》，即忏悔问答表。

阿希姆的母亲赤身裸体。不是像新歌舞剧或者周末画报中的女人那样呈黑白色调。也不像《他》画册扉页画上的女人那样在蓝色的背景前面，阿希姆有时从火车总站买来这样的图片，把它们藏在写字桌的左侧抽屉里，塞到《米老鼠》和《费克斯和福克西》后面。阿希姆的母亲赤身裸体。当我逐条对照《忏悔镜》^①上的罪过录时，我没有任何愿望，没有任何思想，回忆不起任何事情。因为，忏悔我当然必须还是要做的。阿希姆的母亲赤身裸体。这样的事情人们是不能说的。更不能把它写到日记里。顶多是写完之后再撕掉。和后面的一页一块儿撕掉，因为圆珠笔有挤压写过的痕迹。然后把扯下的纸张撕碎，紧接着把纸片烧掉，并把纸灰倒进马桶里用水冲走。仅仅是这个句子就已经让我很难堪了。不仅是难堪，它干脆就不正确。如果我说：我想看到阿希姆的母亲赤身裸体，这样说根本就不对。但是不这么说我又做不到。有一些事情是不正确的，当人们说起它们的时候。因为它们不是从中选择的问题。这跟三位一体是同一个道理。但是它也是不正确的，当人们说起它的时候。因为人们总是只能谈及其中之一，而绝无可能同时涵盖所有三个。每次人们只能说起圣灵或者圣父或者圣子。人们也总是只能想到圣灵或者圣父或者圣子。但是人们可以尝试，在不说话的情况下去思考。如果人们紧闭双眼，一言不发地在大脑最后面思考，那么在两眼之间的前方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的秘密。但是涉及阿希姆母亲的这件事当然和信仰毫无关系。有那么一些思想，它们产生于前额后面的大脑最前部。对于这样的思想人们不必有片刻的考虑。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如果

有人在列举这四个人的名字时先提到的是保罗或者乔治，那么人们就已经知道了：他什么也不懂。即使他把所有四个名字都说全了。女孩子们总是首先提到她们爱慕的那个人。排在第一位的是保罗，然后是乔治和林戈。约翰她们不喜欢。女孩子们要么喜欢长得漂亮的，要么喜欢她们同情的。对于滚石乐队来说女孩子们爱慕的是布莱恩·琼斯。这很简单，因为他是唯一长得可爱的乐队成员。对于滚石乐队成员的排名顺序我不清楚。首先是米克·贾格尔和基恩·理查兹，但是然后呢？或许是布莱恩·琼斯、比尔·怀曼、查理·瓦茨。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尽管如此滚石乐队仍位于我大脑的最前部。大约处在头脑中部的是那些人们也很熟悉，但又能很快忘却的事情。摩洛哥的首都是拉巴特。这个我知道，因为当初作为惩罚性作业我必须制作北非哑图。“最大限度地承受”。这句话我能记住，因为它听起来不错。但是暑假过后我就已经把它又忘记了。人们自己也不太清楚头脑最后面的思想是什么。比如弥撒仪式上的献礼经。这个我干脆记不住。我总是大声说道“愿主接受”，然后喃喃自语些什么，再大声地用“神圣的主”结束经文。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背诵献礼经。亚历克斯曾经学过经文，但是后来也忘记了。看到阿希姆的母亲赤身裸体，这一思想甚至连在大脑后部都不曾有。事实上我从未真正有过这样的想法。就算是紧闭双眼也没有想过。但尽管如此这一思想就在某个地方。

第2章：阿希姆得了严重的热带病

或许这也只是个玩笑。但是阿希姆不知什么时候说起过，他经常看到自己的母亲赤身裸体。他甚至说过：看到的次数太多了，他觉得那样令人恶心。我在想如果我是阿希姆，我会觉得那样很棒，根本就不令人恶心。我可以直接在我面前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当然我不知道，是否这样或许真令人恶心，因为我从未真正见过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有可能那样会让人感到恶心。特别是对阿希姆而言，因为那可是他的母亲。如果我是阿希姆，阿希姆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那么那种情景也会让我感到恶心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我甚至在头脑最后部都没有思考过这个思想。否则我也应该想象出任意一些情景才对。比如阿希姆可能会病得很严重。或者像蒂莫·林内尔特一样被绑架。但是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此外警察登门来找阿希姆的母

亲。阿希姆的祖母和其他人都将在场，以便安慰阿希姆的母亲。这样的话阿希姆的母亲或许不大可能赤裸着身子到处乱跑。但是阿希姆比如可能会得一种严重的热带病。得了这样的一种疾病人们必须要被隔离检疫。谁也不允许去探视他，因为否则的话所有的人都会被传染，疾病也会不断继续扩散。在这种情况下阿希姆必须住院，他的母亲则一个人待在家里。阿希姆的母亲会很伤心。她不再去上班，只是穿着长罩围裙在家里四处乱跑。然后我会给她打电话，说我应当去取阿希姆的教材。所有的教材都必须在学年结束时被交还。只有《迪尔克世界地图集》除外。阿希姆的母亲可以保留它不用还。甚至那些连续两次留级、必须退学的学生都可以保留它不用还。我和阿希姆的母亲会走进阿希姆的房间，一块儿搜寻阿希姆的教材。阿希姆的母亲会变得越来越伤心。我不像阿希姆那样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个子也没他那么高。我的头发不像他的那样，甚至连耳朵都没有盖住，因为我总是在头发盖住耳朵之前就必须去理发。尽管如此我会让阿希姆的母亲在看到时回忆起阿希姆。对于成年人来说所有的孩子看上去都很像。如果她们自己曾经有过孩子，而孩子现在又死去了，就像报刊店的毛厄夫人所遭遇的那样，或者如果她们跟贝尔林格夫人一样生不了孩子，那么对她们来说所有的孩子看上去就更一样了，因为当她们看到某个孩子的时候，她们总会想象她们自己的孩子。阿希姆的母亲也正好会这样看我。她会叹息并请求我为她做点儿什么。“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她会这么问，并把我带进卧室。在那儿她会说：“把鞋脱掉躺到床上去。”因为当阿希姆生病的时候，他是允许躺在她的床上的。卧室就在厨房后面。这样阿希姆的母亲就在附近，如果他需要点儿什么的话。阿希姆的母亲假装我就是阿希姆，假装阿希姆没有患严重的热带病，因为这种疾病他必须被隔离一年以上的时间，而仅仅是简单的肚子痛。她会脱掉衣服，为了在厨房的水槽边冲洗餐具。我从床上可以看到她在厨房里赤身裸体。紧接着她会做饭。做饭的时候她也赤裸着身子，或者穿着那件阿希姆给我看过的无袖短睡衣。那件无袖短睡衣在厨房椅子背上挂着。阿希姆把它高高地举起来说道：“我母亲穿这样的睡衣。真恶心。”我问道，她什么时候穿它，是否它是一件短上衣。“不，夜里，”阿希姆说，并把那件无袖短睡衣举到胸前。“下面呢？”我问道，因为那件无袖短睡衣只到他的腰部。“就这么长。”阿希姆回答说，“真恶心。”我不知道人们为何要穿这样一件无袖短睡衣，因为

我更愿意下面穿点什么而上面什么也不穿。因为我更容易下身感到冷而不是上身。但或许这对女人们来说是不一样的。尽管我更喜欢看到阿希姆母亲的胸部而不是屁股。不，也喜欢看到后面。以及前面。然后阿希姆的母亲心情会好一些，并且说：“下次再来。”然后我放学之后就可以总去拜访她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和她就像阿希姆和她一样变得如此亲密了。这样她赤裸着身子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就显得很正常了。

第3章：我对热带和热带病所了解的情况

热带存在于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必须要跟很大的空气湿度做斗争。即使天不下雨，空气湿度也会很大，以至于汽车和厨房用具纷纷生锈，两周之后就会报废。因为食品放久了会发霉，所以热带地区的人们总是立即吃完所有的东西。他们主要吃的是热带水果。热带地区的人们不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地上。他们没有床，而是睡在吊床上。因为气候如此单一，人们在热带主要是向天气神祷告，人们用热带木材雕刻了他们的造型。每一种气候都由一位神来负责，但是地位最高的神是雨神，根据他让天下雨还是不下，他能够淹没土地或者使之干涸。雨神的儿子是锈神。人们朝拜他，这样他至少能够让大砍刀完好无损，为了在热带丛林里给自己开辟出一条路，人们在热带地区需要这样的大砍刀。在基督教传教士所到的热带地区，雨神由基督、锈神被玛利亚以其“站着的悲悼圣母”形象所取代，因为土著人和海岛居民把圣像上象征玛利亚七大痛苦的那七把锃亮发光的宝剑看作是圣母统治铁锈的证明。以此传教士们也能够向土著人解释有关玛利亚贞洁的秘密，因为人们在热带地区认为，一个来月经的女人如果触碰了金属会使之生锈，因此月经期的女人只允许使用木质工具。她们必须用钝的木刀给甘薯削皮，用一把木剪给自己剪发，这经常会令她们感到很疼痛。这一信念源于铁锈和干燥后的血迹之间的相似性。对于铁锈和血液土著人只知道一句话。他们会说：某人在生锈，当他流血的时候，或者反过来：金属在流血。如果女人在月经期间用木刀切肉，在热带地区数量众多且无处不在的许多吸虫和蛔虫就会安然无恙，它们在人们的饮食过程中能够穿透胃壁，附着在生命攸关的器官如肝、肾或者脾上，为了在那里变得越来越大并破坏

人的身体。某些蠕虫也会向心脏方向游移，它们完全将心脏缠裹起来，最终使之窒息而死。德国医生特奥多尔·比尔哈茨发现，人们可以用一种电鳗的触须除掉这些在人体内快速繁衍的蠕虫。电鳗通过触须发射出350伏的电流脉冲，即使触须与电鳗的身体分离，它们也能将这种电子效应保留至一个星期。在这一周里触须必须通过皮肤被导入受到蠕虫攻击的身体区域。电鳗的触须立刻使自己与有害的蠕虫相连，并通过一种过程毁灭蠕虫，比尔哈茨把这一过程描述为焊接，也就是说蠕虫通过电压与触须融合在一起，几天之后和触须一道被从体内排出。生活在热带的画家高更给人们留下了多幅土著人的画像，他们都遭受过血吸虫的侵害。人们首先从略呈黄色的、发磷光的肤色和深陷的眼窝能够看出受害者的特征。高更本人曾遭受过梅毒的侵袭，因为他和不同的、年龄从未超过十三岁半的土著女孩在一起生活过。他服用砒自杀，请求土著人把他的死尸钉到一个十字架上，让它作为反抗愈演愈烈的欧洲化的标志在太平洋上漂流。此外他们应当把他的有着不正派名字的小屋烧毁，在它原先的地方建立一座小教堂。这两个愿望都未得到满足。

第4章：但是我当然不希望阿希姆得了一种严重的热带病

但是我当然不希望，阿希姆得了一种严重的热带病或者被绑架。反正阿希姆很少生病。跟我不一样，他甚至每年冬天连咽喉炎都不得。相反有时候他也允许待在家里，如果他说他感觉不舒服的话。尽管如此中午他也能出来。他从祖母那儿得到权限。当阿希姆的母亲去上班的时候，都是阿希姆的祖母在照看他。阿希姆的祖母给了他两马克。我们下楼去了施雷贝尔女士开的文具店。因为《米老鼠》和《费克斯和福克西》图册他已经有了，所以这一次阿希姆买的是《贝茜》图册。我觉得《贝茜》图册很无聊。“为什么你不买《喝彩》图册？”阿希姆对此不感兴趣。他觉得《贝茜》图册不错。贝茜是一只类似于《灵犬莱西》图册中的长毛大牧羊犬，它经历了某些我不感兴趣的事情。我也觉得《灵犬莱西》图册很无聊。我更喜欢看《弗瑞》图册。但是阿希姆也喜欢从米奇视觉绘制的《米歇尔·瓦容》画册。米歇尔·瓦容是一名赛车手。我无法区分画册中不同的人物形象，因为他们全都长得一模一样。“人们可以从前额上的一小撮卷发看出谁是米歇尔·瓦容。”

阿希姆说道。我们又回到楼上。阿希姆浏览《贝茜》图册，我看《费利克斯》复活节特别画册。我们边看边喝可乐。在我们家只有黄色的汽水。每周一次人们送一箱汽水，每两周送一箱麦芽啤酒。阿希姆的祖母在厨房里坐着。我们下楼到院子里。院门今天没锁。我们可以从后面出去到溪流小巷。我们站在栏杆边，看着溪流是怎样在隧道里消失的。阿希姆说，人们可以沿着与溪流平行的方向，从火车站大街、铁轨和埃培尔林荫路下面穿过去，一直走到宫殿花园。当然人们必须弯下身子。但是当人们到达另一端的时候，人们就走不出去了。那儿有一道生锈的栅栏。在生锈的栅栏上挂着零碎布片、旧报纸和女人们夜里扔到溪流里的绷带。女人们把绷带扔进溪流，如果她们没有汽车，或者没有人开车捎带她们，以使她们能够把绷带从敞开的车窗扔到大街上。女人们戴绷带，因为她们会月经出血。男人则分泌水分。因此栅栏边也会居住着老鼠。老鼠用栅栏边的垃圾给自己建了窝穴。然后它们用尾巴把自己挂在栅栏上，张嘴去咬在溪流上被冲过来的所有东西。有时候它们的尾巴在栅栏上缠成了结，这使得它们无法再摆脱栅栏。然后人们就听到一片尖细的叫声穿过隧道，因为它们也彼此害怕对方。我和阿希姆只往下跨道里爬了几米。爬到里面黑暗的地方为止。阿希姆把装口香糖的纸袋从中间撕开。我可以看到，当他今天早晨不必去上学的时候，他在道姆面包店都买了些什么。我首先取了两根扁平的OK牌条形口香糖，把它们剥开，完整地塞进嘴里，用舌头把它们折弯。然后我就开始嚼起来，一直嚼到它们几乎不再有味道为止。紧接着我又取了一块泡泡糖和两块泡泡胶。在中线处我把它们折断，把它们放在大腿上用手擀了一会儿。现在它们看上去就像半支口香糖卷烟一样。然后是那些在自动售货机上也有出售的圆形彩色口香糖。我把舌头从嘴里伸出来，舌头上放的是嚼过的面团，并在上面放了一颗弹子。在嘴里我把弹子完全缠裹起来并把它咬碎。我们就这样坐了一阵子，嘴里嚼个不停。阿希姆在仔细观赏泡泡糖漫画。我把左前臂上的糖分唾沫舔干净，用OK牌口香糖在上面压了一个花纹。花纹图案是带有披头士发型的一条蛇，它蜿蜒盘绕在吉他颈上。阿希姆撞了我一下，用手指向隧道远处在溪流另一侧的一些东西。它看上去像一个脑壳。但它也可能是一株多肉植物。原先长着鼻子、眼窝和嘴巴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大洞。因为它们首先被叼吃掉了。阿希姆把兜里还

剩的一马克二十芬尼掏了出来。“如果你把那个脑壳取回来，这些钱就归你了。”他说道。

第5章：凶手和失踪的孩子

有时候孩子们晚上玩完之后并没有回家，而是永远失踪了。他们并不总是遭到了绑架或者谋害。如果人们在这下面跌倒，摔断了腿并且无法再继续行走，外面谁也听不到这里发生的一切。从这里路过的人们会认为，那又是老鼠在细声尖叫。对于埋伏守候孩子们的凶手来说，这条隧道也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但是为了不暴露自己，他不能用火柴来制造光亮。因此他在其中一块松动的石板上绊了一下跌倒了。他的腿摔断了。不是像我以前胳膊骨折那样，而是真正折断了。他倒在那儿不能动弹。就连爬行几米到出口他也做不到。现在他感到害怕了。他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但是不敢喊“救命”，因为来人可能是正在巡查的看守农田的人。如果那样农田看守者会立即逮捕他并把他带走。对方是不会宽恕他的，因为他（农田看守者）非常熟悉凶手的特征。因为农田看守者的兄弟本人就是一名杀人犯。他是人们在战后处决的最后一名凶手。农田看守者的兄弟在宫殿花园用斧头杀死了一名妇女。他在没有路灯的夜莺路上的一片灌木丛后面埋伏守候那名妇女，尽管天下雨，那个女人打着一把伞，他也没有改变计划，而是用斧头击穿雨伞把她的头劈成两半。或许这名断腿的凶手甚至认识另一名凶手，也就是认识农田看守者的兄弟。或许他告诉他，人们在宫殿花园周围很容易找到牺牲品。但是现在这名凶手自己躺在那儿，听着那些尾巴相互纠缠在一起的老鼠从生锈的栅栏那边传来的细声尖叫，感觉到昆虫和蜗牛等小动物通过向外凸出的骨头碎片向上朝他的嘴巴方向爬动。凶手的胳膊因为支撑身体而麻醉了。他把头摇来摇去，为了摆脱小动物的纠缠。但是不知什么时候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的脑袋倒在松动的石头上。其中一条胳膊滑落到溪流里。现在在他的胳膊上挂着报纸、绷带和零碎布片。凶手死了，尸体开始腐烂。肉从他的骨架上剥离之后掉进溪流里，漂向栅栏处的老鼠那里，对此老鼠们当然会很高兴。最后剩下的只有脑壳。就是看上去像一株多肉植物的那个脑壳。

第6章：多肉植物

我用伸展开的手指抓住那株多肉植物。尽管如此它还是感觉松软令人恶心。软得就像婴儿脑袋一样。跟睡在摇篮里的我弟弟的脑袋一样。他的头还如此柔软，以至于当他把头枕在橡皮长颈鹿上睡着的时候，橡皮长颈鹿会在他耳朵上方的脑壳上压出一道深深的凹痕。那株多肉植物闻起来也几乎跟我弟弟脑袋的味道一样，一股乳臭和潮湿的味道。并且和他的脑袋完全一样，多肉植物的顶端也结了痂。每当我把他的脑袋捧在手里，我都会担心会把手指摁进他的头里。我担心我的手指会陷在他柔软的脑袋里，在他头颅里的某个地方卡住，这样我就无法再将手指拽出来了，就像我有时候出于开玩笑把一根手指插进瓶颈，然后手指就出不来了，那位明爱会女士尝试用皂液给我解围，迄今为止这种方法也一直奏效。万不得已时人们也可以把瓶子打碎。但是如果我的指尖卡在我弟弟的头颅里，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样的话人们无法使用皂液，因此我必须用力猛拽，最后不得不牺牲我的指尖。这种情况就好比发生在潜水员身上，他的胳膊钩住了一处珊瑚暗礁，满满的氧气也快要耗尽了。为了能够重新及时浮出水面，他也必须下决心用刀把胳膊截掉。或者就像那位医生一样，他在热带原始森林里得了盲肠炎，必须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情况对我来说也完全如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牺牲自己的指尖。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做法。紧接着我无法再正确地按住竖笛的笛孔，也不必再去上大提琴课了。我根本不必再做任何事情了。我只需抬起手来，让别人看到指尖的缺失，所有的人立刻就会明白为何我没有做家庭作业。他们会明白为何我来得太晚。为何我要在礼拜仪式期间闲聊。为何我会不知羞愧，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其他人一块儿，或者不听父母的话。为何我疏于祈祷或者只是满嘴废话。为何我要偷吃东西、训斥、谩骂、动手打人，为何我会发怒、忌妒、仇视、虚荣、骄傲和懒惰。所有这些人们都将明白，会像原谅那个来自七年级的患前列腺炎的男孩或者那个来自九年级的得了脑积水的小矮个一样原谅我。其他人会愚弄我，对此我不在乎。为了学我的样子，他们会用取自百利金颜料盒里的绯红色涂抹指尖。但是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也不在乎课间我必须和那个患前列腺炎的男孩以及那个得了脑积水的小矮个站在校园教师休息室门口的角落里，必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往面包上都抹了些什么：下

面垫有黄油的瘦肉香肠或者肝肠，血肠以及那种我叫不上名字、里面带软骨块的香肠。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我还是很正常的。就是除了指尖，它们现在什么都不能碰。因此我会像那个因服用酞胺哌啶酮而导致胳膊畸形的学生一样灵巧，我不知道他来自哪个年级，他年龄比我们都大，可能也是九年级的。我会完全像他那样用胳膊肘从包装纸里取出我的间食，用胳膊肘夹住它并把它吃掉。而我并不知道间食上抹的是什麼，因为我无法用胳膊肘把它掰开。没有人再会跟我玩耍，因为被擦掉表皮的指尖看上去很恶心。但是在课堂上我也不必边听边记录了。我将只是坐在教室里向窗外张望。我会将胳膊交叉抱于胸前，这样谁也不必看到指尖处的裸肉。只有当一位不认识我的实习老师给我们代课的时候，我才会很快地亮一下我的手指。这样他在整个上课期间就不会再提问我了。这样我就可以看窗外的白杨树了，而其他人则在写数学作业。如果老师在行列间走动，为了检查是否有人在抄袭或者使用夹带的小纸条，那么他的目光只会从我的头顶掠过。女孩子们会思慕我，因为我令她们感到惋惜。她们会给我写纸条，上面写着：我觉得你很可爱。她们会在我的座位上放上一块韦伯蛋糕。蛋糕已经拆开了，这样我就能用胳膊肘夹住它把它吃掉。她们会借给我唱片《麦当娜女士》（Lady Madonna）以供录制，还有《来自地下世界》（From The Underworld）。

第7章：半信半疑者的恐惧

我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在跌倒的过程中我把那株多肉植物紧紧贴在身上。历史作业我还没有做。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历史课正好上到哪儿了。明天我们到底有没有历史课？今天星期几？周二吗？周二不是放映《从云端跳跃》吗？我的手指下垂穿过多肉植物的结痂。水现在是黑颜色的。水面上浮动着小的光圈。我穿着风雨夹克靠在一处墙面的挑出部分上。多肉植物体内的蠕虫在我的指尖四周爬行。那边是装有口香糖包装纸的纸袋。阿希姆离开了。他肯定已经回到了家里。或许是他的母亲喊他，而我仅仅是没有听见而已。我跳到溪流的另一侧。然后继续沿右侧栏赶往斜坡上走。坡面很滑。隧道上面的路灯没有打开。灯光从火车站大街照进溪流小巷。但是我不想在前面转来转去。我不想再一次从施蕾贝尔夫人的文具店和英国石油公司加油站门口经

过。我从外面晃动院门，但是门已经关上了。7点钟的时候后院的门也被锁上了。阿希姆肯定已经坐在餐桌前吃晚饭了。有时他也允许喝半杯啤酒。不是麦芽啤酒，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啤酒。如果电视里正在播放《从云端跳跃》，那么他允许观看这样的节目。说好的一马克二十芬尼呢？这笔钱我明天肯定会得到。难道他想让我把这株多肉植物带到学校？作为证据？我顺着溪流小巷往下跑，向左拐进池塘小街。沿途从白坪大街、行政区小巷和原野大街旁边跑过。然后穿过教堂的墓地。如果这个时候钟楼还开着的话，我可以把多肉植物放在这里。门打开了。可能教堂司事正好在上面给钟上发条。或者他还没来。他来的时候人们能听到他的动静，因为他总是不停地吹着口哨。我钻到黑色的铁质楼梯下面，把多肉植物塞到第一个台阶下面的角落里。然后我很快走到外面。天现在已经黑了，玻璃橱窗里的灯点亮了。我可以查看一下，是否星期天我必须帮助做弥撒仪式。但是我更愿意很快回家。我穿着不清洁的衣服、带着不纯净的思想、怀里抱着一株多肉植物迈进了教堂。因为我只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恐惧。半信半疑者的恐惧。但是看啊，我主将多肉植物变成了一名凶手的脑袋，它直勾勾地盯着我，目光不再从我身上移走，尽管它根本就没有眼睛。因此我在入睡的时候也让灯继续点着。我这样做也是因为害怕劫匪。如果我把灯关掉，绑架蒂莫·林内尔特的那个劫匪也会出现。他会先杀死我的父母，然后杀害我弟弟，然后把我带走。他把我拖进一个山洞，在那里他脱去我的衣服，在我的脊背上刻一些东西。他在我的背上刻的是“拉赫·巴尔奇”这个名字，就像我在下面市政厅里的照片上所看到的那样。

第8章：逃跑计划

其实我有一个通道里的房间还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劫匪会首先继续前行，为了查看还有谁在过道后面的房间里睡觉。我弟弟年龄还太小，不值得被绑架，因此劫匪就把他杀害了。或许劫匪扼死了他，也可能是我弟弟因为惊吓而死亡，当他突然看到劫匪的脸出现在自己的小床上面的时候。在我听到楼梯上或者走廊里有动静时，我屏住了呼吸。我装作非常安静。尽管人们在睡觉时也要呼吸。但是我不想被觉察到。劫匪应当首先悄无声息地穿过我的房间，当他在我的弟弟的小床上

面俯身弯腰时，我就从房间里跑出去下楼。起初我考虑是否应当往楼上跑，以便藏到存放东西用的屋顶室里，或者我也可以跑到已经被劫匪刺死的父母的卧室里，在那儿躺到床底下去，但是劫匪可能会再次回来，因为他想带走点什么。比如我母亲的木制音乐闹钟或者她的轮椅。这样的轮椅劫匪正用得上。他绑架了某人之后无须亲自去扛着他，而是可以把他放在轮椅上推着走。如果人们走上前来，他们会认为轮椅上的男孩已经睡了，因为时间已经是夜里了，他们想不到他是被麻醉了。因此我沿着楼梯下楼，从房子里跑了出去。我最愿意向左朝车间大厅方向跑去，因为那里有灯光，但是向后出城朝原野方向跑去可能更好，因为那儿一片昏暗。我可以躲到木匠的工具棚里，或者藏到高速公路的下跨道里，或者最好继续跑向凯尔伯草坪，沿着溪流一直跑到最后面，跑到路尽头和大黄种植区开始的地方。那儿也是年轻情侣幽会的地方。但是在那里我必须注意不被人看到，否则他们会认为我想偷看他们，然后男方就会过来把我揍得半死。这样我就会昏迷不醒。随后劫匪还是会找到我的。然后我会从昏厥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他的山洞里。这就跟在扁桃体手术之后的情形一样，当时我在想一切都已结束了，我又可以躺在床上了，但是相反我仍然坐在手术椅上，面前的小桌上摆放着手术刀和两个血淋淋的扁桃腺。

第9章：论绑架儿童的不同形式

对我的逃跑计划我不是特别肯定，因为有不同的绑架儿童的形式。肯定不是每一个劫匪都好说话。如果他好说话，也就是说属于那些好商量的劫匪之列，那么我应当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最好说些什么呢？我是该恳求、乞怜、保持冷静客观、转移注意力，甚至以暗示的方式相威胁吗？即使我对劫匪的任何可能性性格特征都有所准备，但我还是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够了解闯入我们家的那名劫匪的品性。了解那名劫匪的品性究竟能否对我有所帮助，这一点也不得而知，因为我最害怕的是那种震惊，它在于劫匪杀害了我的父母，起初我还隐约预感到他们倒在血泊中，但随后就真的看到他们躺在血泊里，与此同时劫匪拖拽着穿着睡衣的我从半开的父母卧室门口经过。我只能料到一种逃跑的机会，那就是他穿过我的房间直奔我弟弟的房间，为了把他也一同杀害。也就是说我不允许警告我弟弟提防危险，我必须牺牲

他，因为在劫匪杀害我弟弟期间，我就能够一跃而起冲出房间，闭着眼睛从我父母半开的卧室门口经过跑到外面，到外面后大声叫喊，扯着嗓子叫喊，声嘶力竭地叫喊，以至于住在前面小房子里的房管员能够听到，打电话报警，并且亲自拿着手电筒跑过来相助。那两名睡在后面库房里的辅助工也会赶来，因为他们答应过要拯救老板的儿子，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老板和他的妻子躺在楼上，咽喉已被人割断。他们也不会害怕劫匪，劫匪只有在刺死熟睡中的人或者绑架儿童的时候才显得强大。他们将跑到楼上逮住劫匪，而我将会奖赏他们，因为现在我是他们的老板，至少是纸面上的。当然通常情况下我会有一名监护人，多年之后我才会得知，雇佣劫匪行凶的原来正是这名监护人。

第10章：对凶手和劫匪特征的简要说明

凶手会在不安全的地方停留。比如在夜莺路灌木丛后面的宫殿花园里，或者在阿道夫小巷里的房门入口处，或者在阿德勒电影院后门出口旁边。或者在下面位于莱茵河河畔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医疗保险公司门口，晚上8点之后，当保险公司已经关门的时候。或者在远处伊丽莎白大街宫殿附近，就在邻里活动中心后身的地块上，明爱会那位女士总是把车停在那儿，当她来业余演奏小组接我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灯，或者只有从邻里活动中心的窗户里照射到外面的光线。但是除了在地下室里上的烹饪课之外，当所有的课程都已结束时，外面已经一片漆黑，人们无法辨别，在后面的古墙边或者对面木门附近的壁龛里是否有人站着。行人或者车辆也很少从那里经过，因为路面上的坑洼太深了，里面甚至都有了积水。

凶手往往用一把刀来行凶。他们也可以使用一支左轮手枪，但是用刀第一动静更小，第二也更直接。凶手想感受杀死某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他想感觉到，他的刀是怎样刺进受害者的胸膛或者脖子上的，想感受对方的身体是怎样直接在他面前瘫倒和死亡的。有时凶手也会扼死某人，或者他们用一根绳索或者一条围巾勒死某人。劫匪最终也会杀害某人，但是他们首先将他绑架，把他拖到一个山洞里，在那儿他被链子拴住，必须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人们不知道劫匪到底想要什么。他

他们都是些丧心病狂、从艾希贝格越狱逃跑的囚犯，他们经常自己也不清楚想做什么。他们邮寄信件，信中他们索要钱财。他们从一份报纸上剪下写信所需的字母，把这些字母粘贴到一张纸上。后来人们也能够据此证明他们的罪责，因为人们在废纸篓里发现了那份缺少字母的报纸。但是这些都早已太晚，被绑架的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劫匪们是这样想的：我先把孩子带到我的山洞里，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办。如果孩子又哭又闹，他们就会发怒并杀死他。如果孩子不哭不闹，他们也会发怒，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一些娱乐，所以也会杀死他。然后他们想要钱，然后又不想要了。他们就是一些疯子。无论人们怎么做都是错的。一切都在挑衅精神错乱的劫匪。人们无法讨好劫匪。一旦劫匪把某人带到他的山洞里，所有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人们必须事先就要留意。例如当劫匪跟某人搭讪，给他一块“二宝”果汁糖的时候。幸亏我不喜欢吃“二宝”果汁糖。“二宝”果汁糖的味道就像儿童锌钙片+多种维生素咀嚼片一样，这样的钙片我也不喜欢吃。但是或许劫匪会向我提供橡皮鬼怪造型。他会把一袋只装有红色橡皮鬼怪造型的玩具递给我。带有黑色脑袋的红色造型。里面也会有两个绿色的。然后我会伸出手去，没有意识到他是用这袋玩具一点儿也让人觉察不到地把我引诱到一个院子里，在那儿把我麻醉。劫匪会向女孩子提供用巧克力做的瓢虫。他会给她们讲述他是魔术师，她们应当到树林里去找他。女孩子们当然很愚蠢，她们会真的到树林里去。那些用巧克力做的瓢虫尝起来一点儿味道也没有。特别是在夏天，当它们的表面已经有了灰白色的斑痕。至于魔术师，那都是逗孩子们玩的。但是在我母亲过生日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还在楼下的客厅里喝咖啡的时候，我在楼上的电视里看到了这样的场景。这令人感到不安，整个一周我的睡眠都很糟糕，因为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个又高又胖的劫匪。你接不接受巧克力瓢虫也无所谓，反正他都会绑架你。

劫匪们都会事先物色他们的牺牲品。他们刚一从艾希贝格越狱，就已经开始给自己随意挑选一个牺牲品了。他们偶尔看到一个孩子放学回家，于是便跟踪这个孩子。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孩子住在什么地方，随即藏到对面的一个仓库里。他们一直等到天黑。当父母比如说晚上外出，去参加学生家长晚会或者去听音乐会，他们就会从藏身之处出来，把孩子绑走。如果父母晚上不外出，劫匪就等到所有的人都上床

睡觉为止。然后劫匪首先杀害父母和兄弟姊妹，接着再把那个孩子绑架走。

第11章：焚林开垦

我拧下胶皮软管，在车库旁边的水龙头处洗手。我的头发都粘在了前额上。月光洒在冷杉上。冷杉的阴影落在房子前面那块部分光秃的草坪上，在地里烧出了一个黑色的窟窿，就跟洛赫碾磨厂后面耕地上的窟窿一样，阿希姆在摆弄手里的打火机，我们坐在那儿抽“丰收23”牌香烟。我担心雷贝因会从园圃里出来或者报警，但是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其他人已经收集好了枝叶，为了把火点得更旺。最后他们开始拔拽大黄，这些大黄肯定已经属于园圃所有，在拔拽过程中他们大声叫喊，并用树叶遮住下身。亚历克斯高喊“焚林开垦”，因为他在地理课上刚刚讲过这个。我禁不住在想，我们是怎样打碎高处火车站大街那栋老房子里的窗玻璃的，因为那栋房子应当被拆除，然后报纸上就会写道“一群小流氓拆毁了住宅”。现在这里的这些，这些肯定属于某人所为。

第12章：冷杉树荫和眼窝

我看见火光下面的黑色地面如同一个深洞，就像贝尔林格家房子后面花园里的冷杉树荫一样，也像是凶手头颅上空洞的眼窝，头颅从教堂的钟楼里跟着我爬了过来，想一直纠缠着我不放。这种情形也类似于那条牧羊犬，在施朗根巴德的时候它就一直跟在我和阿希姆后面。我们起了同情之心，到公共汽车站对面的肉铺给它买了一根肉肠。在喂它吃完肉肠之后，我们沿大街向上走了一段距离，为了能够把它甩掉。但是那条牧羊犬并没有走开，而是一直继续跟在我们后面。没办法我们掉头返回，又给它买了一根肉肠。现在更多的是出于害怕，因为我们担心如果不给它吃的它会把我们赶进一个胡同，然后在那里撕咬我们。可能是看到了外面狗跟着我们的情景，肉铺师傅说道：“它会一直大吃大嚼下去。只要人们给一条狗一些吃的东西，它就再也不会停止吞食。”现在我们既害怕又同情它。同时害怕和同情是最让人讨厌

的，因为人们什么也做不了。人们简直无法抵抗。这就好比在我母亲或者在和我们一块儿上德语课的布斯那儿一样。其他人人们可以进行划分：赖兴瑙厄、拉特维茨、普尔波和克劳斯哈尔让人害怕，伯恩哈德、施梅丽、豪斯和舍沃令人同情。但是布斯既让人害怕又令人同情，就像上帝是害怕和同情的合体一样，圣父让人害怕，圣子令人同情，圣灵是随便一些我无法与之打交道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何谓灵魂，我把这样的东西想象成元素周期系统上的缩写符号，除右侧序列那些彼此相连的稀有气体之外，这样的符号我也记不下来。圣灵和稀有气体，但是这和害怕与同情毫无关系。害怕主修专业，同情辅修专业，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上帝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之所以同情是因为他必须在十字架上死亡，而门徒们则在熟睡，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即使是圣父也让他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受难，尽管被撇下不管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因为人们终于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撇下某人不管的那个人会为此感到遗憾，所以我们最后进了一家商店，为了在那里东游西逛，直到那条牧羊犬最终走开或者跟在别人后面。因为我们在商店里闲站着，人们会认为我们打算偷点什么。当我们出去的时候，那条牧羊犬真的不见了，我们穿过马路朝公共汽车走去，我对阿希姆说：那些人肯定认为我们想偷东西。阿希姆笑了起来，从夹克衫里掏出一瓶蛋黄利口酒：唉、唉、唉，各种各样的蛋黄利口酒，他说道。我祖母喝这种东西，我说，因为我不想承认，我现在害怕商店里的女售货员会跟踪我们，因为她还是有所觉察，或者将会报警，阿希姆走进公共汽车站后面的小树林，把酒瓶迎着一棵树扔了过去。这比我想象的要更糟，当瓶子破裂里面几乎没有液体流出的时候，他这样说道，一下子我嘴里又充满了肉肠的味道，还有蛋黄利口酒和多肉植物上乳痂的味道，于是我笨拙地转过身去，滑倒在水龙头下面湿滑的地面上，地上被拧下的胶皮软管里的水已经流空了，滑倒时我的身子向前压在了右胳膊上，它就像林中矮树里的一根小树枝发出咔嚓声，就像我们踩到枝条上所发出的那种声音，当我们从背面悄悄接近老贝尔林格的别墅时，因为当月亮升起时他妻子会赤身裸体地躺在别墅里的躺椅上。但是躺椅上空无一人。于是我们就等着。阿希姆、戈特弗里德、格拉尔德和我。我们一边抽着一马克便宜包装的“塔林”牌香烟一边等着。戈特弗里德在晾衣架旁边发现了一件浴衣。格拉尔德看见卧室里有灯光。我们来得太晚了，现在他们已经在做事了。阿希姆点了

点头。月光洒在橡树上，那棵橡树还是老贝尔林格的父亲亲自栽下的，橡树树荫把空无一人的躺椅按照精确测量的比例深埋在草坪里，橡子落在阳台的雨篷上。我知道什么是死亡了：转动轮在夜里停止发出刺耳的咯吱声，早晨仓鼠伸展着粉红色的小爪子躺在草垫上。我知道什么是岳母了：一支填满得很蹩脚的香烟，它的前端只能燃烧到一半。但是我不知道格拉尔德指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没有说他们——老贝尔林格和他年轻的妻子——在做些什么，因此当月亮渐亏、悬钩子灌木开出近于白色的小花时，我独自一人又去了一趟贝尔林格家的别墅。躺椅被折叠了起来立在仓库门口。一片雨云挂在状如镰刀的云朵上，一道楔形光线从阳台后面的房间里斜落在地面砖上。金属丝网篱在位于灌木丛之间的地方能够很容易向下压开，因为这里的支柱比较少。尽管如此我的裤子还是挂在了上面，一时间我就像溪边铁锈栅栏上的老鼠那样无法动弹，我用力扯拽，终于把裤腿挣开，只是现在金属丝扎进了我的小腿肚，无论我把腿朝哪个方向转动，它（金属丝）都不依不饶。最后我倒向一侧，把腿蜷曲起来，用手掌边缘擦掉血迹，把袜子向上拽盖住伤口，为了不让裤子沾上血污，然后转过身去，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年轻的贝尔林格夫人，看到了她的一部分腰身和腹部，在她转过身去从阳台走回到屋里之前。

第13章：阿希姆没什么好说的

阿希姆的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外出搞装配工作。有时他周末在家，那样的话他就穿着汗衫坐在客厅里，听一张播放水手歌的唱片，抽“加长总督”牌香烟。阿希姆说，这种香烟对他来说太柔了：抽这样的烟你也可以马上把自己挂在火炉上方。赖讷的父亲抽“塔林”牌香烟。赖讷的母亲在一家肉铺工作。他哥哥在欧宝公司学徒，他抽的也是“塔林”牌香烟。戈特弗里德的父亲有一辆手推车，他推着这辆车收集报纸和木材。戈特弗里德的母亲已经死了。戈特弗里德和他的父亲以及兄弟姊妹住在艾希瑙厄废纸收购站旁边一间狭窄的阁楼间里。我父亲是一家工厂厂长。虽然他在那边有自己的办公室，但他也经常在家里的写字桌前办公。有时他会开车离开一两天，为了去拜访供货商或者客户。除此之外他一直都在家。阿希姆的母亲是牙医助手。厕所在走廊里。父母的卧室位于厨房后面。橱柜上躺着宠物“周末”。客厅录音资料柜

旁边堆放着录有水手歌的唱片。“沿海而下，去往西瓜生长的地方”。在阿希姆书桌的左侧抽屉里放着他用祖母给的钱买来的画册：《费利克斯》《贝茜》《米奇动画》《卢波现代》《费克斯和福克西复活节画册》，有时也有从火车总站买来的《他和路易》。一次阿希姆给我朗读他母亲在他父亲的物件里找到的信件。那些都是他父亲在外出搞装配工作时认识的女人写给他的信。其中一个女人写道，她如此惦念他，因此今年甚至都没有去庆祝狂欢节。在信的后半段她接着写道，她在狂欢节那天生病发烧了。读罢我们哈哈大笑，在脑子里想象这个女人和其他女人。然后阿希姆的父亲就失踪了。奶奶说，他带着他轻浮的少女私奔了。我们坐在裴斯泰洛齐学校对面的攀缘架上吸烟。几个星期之后阿希姆的父亲又回来了。他穿着汗衫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水手歌。对他我没什么好说的了，阿希姆说道。

第14章：一局小型高尔夫球

在打完小型高尔夫球之后，我们坐在书报亭前面的圆桌边，边吃带咸味的长条点心边喝苹果汁。阳光透过橡树枝叶照射过来。一辆白色的欧宝车在猎区围篱后面沿碎石路面行驶，停在自行车停放处的旁边。一台手提收音机正在播放。先是歌曲《昨夜在索霍》

(Last Night in Soho) 的尾声，然后是新闻。老贝尔林格和他妻子下了车。老贝尔林格根本没那么老。但是他妻子很年轻，这一点不假。她可以当我们学校的候补教师。她不像豪斯女士，豪斯女士也还年轻，但却脸庞宽阔、胸脯很大，这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更老成，只是有时她上衣的一个扣子会敞开或者裙子没有穿正。她更像是身材修长的赫尔梅斯女士，赫尔梅斯女士只有一次在上地理课期间坐在我们后面，并且边听边记些什么。但是赫尔梅斯女士的头发是棕色的，一绺一绺长长地垂在她的肩膀上。贝尔林格夫人长着金光色的头发，头型跟阿希姆母亲的头型一样，前额上有一绺鬃发。在休息日阿希姆的母亲有时会穿着晨服坐在厨房餐桌边，让宠物“周末”躺在她面前的油纸上。贝尔林格夫人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毛巾布裙，裙子刚刚盖住她的臀部。当她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母亲碰了我父亲一下。我父亲不知道我母亲是什么意思。我母亲把头稍稍向贝尔林格夫妇走去的方向动了动。我父亲耸了耸肩。这一对恋人真是令人无法置信，我母亲

说道。是吗？我父亲说。贝尔林格夫人的双腿修长，阿希姆母亲的双腿却比较粗，但是我说不出谁的腿我觉得更美。阿希姆的母亲必须经常站着工作，因为她在一家诊所做牙医助手。那位牙医上了岁数，有时给患者钻孔时会弄伤其面颊。这样阿希姆的母亲必须擦干血迹，往患者的嘴里塞棉花球，直到止住流血。直到伤口长住，阿希姆说道。老贝尔林格往正在抽一支香烟的HB烟草公司的广告卡通人物手里的支付托盘上放了一枚五马克的硬币，随即得到两副小型高尔夫球杆、两个高尔夫球、两张卡片和一个铅笔头。贝尔林格夫人笑了起来，摆出一副仿佛想要骑在高尔夫球杆上的样子，就像骑在一把扫帚上的女巫那样。我母亲摇了摇头。现在你再看看这个，她说。但是我父亲只是又一次耸了耸肩。我们想观看吗？他问道。我还没有喝完呢，我边说边指了指我杯子里剩余的苹果汁。马上，我母亲说道。她也想观看贝尔林格夫人打球，后者现在正尝试沿直线把第一个球打进球洞。老贝尔林格走到她身后，手把手教她。在教她的时候他把卡片咬在牙齿之间。贝尔林格夫人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男人是在出自己的洋相，我母亲说。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我母亲问道。他开了一家运输企业。赖讷的父亲就在他手下做事，不是吗？我点了点头：赖讷的父亲是长途货车司机。贝尔林格夫人一辈子也学不会打偏左弧线飞球。在打偏左弧线飞球的时候人们不能轻轻推球，而是必须真正用力击打。但是这反正也无所谓。她可以想尝试多少次就尝试多少次，最后贝尔林格先生在卡片上只记了5分。

第15章：和兰芹烈性甜酒和糖果巧克力

暑假期间阿希姆住在弗里茨-卡勒大街他祖母家里。雨水落在地下室入口旁边垃圾桶上面的黄色波纹铁皮棚顶上。我们站在院子大门进口处分一盒“塔林”牌香烟。卡车在石块路面上颠簸行驶。我们跑到圣玛利亚教堂对面的面包店去。我给自己买了一块长条薄饼干和一块糖果巧克力，阿希姆给他自己买了一杯和兰芹烈性甜酒和一块糖果巧克力。我们在教堂前面那棵橡树底下的长椅上坐了下来。谁是这里的神甫，对此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认识神甫助手鲍施。神甫助手鲍施很晚才被委以教会辅助工作，他有一份非常普通的职业，为了成为神甫，他还得首先学拉丁语。阿希姆信仰新教。仅仅是因为能得到手表他才

去参加坚信礼仪式的，尽管他现在已经有了了一块外面带环圈的防水手表，用这些环圈人们可以校准水深。我的“荣汉斯”手表甚至连日期显示都没有，但是它也已经被使用三年多了。上个月我给自己买了这根宽羚羊皮表带。阿希姆的手表上是一根带弹簧搭扣的金属表带，每当我被允许试戴他的手表时，搭扣都会夹住我的皮肤。比如在阿希姆跟两个女孩攀谈的室内游泳池，她们在游完泳后会在外面的吹发机那儿等我们。阿希姆给她们分发一袋辣味薯片，我们在室内游泳池游完泳后总吃这个，就着五颗鬼脸橡皮糖一块儿吃。我们登上8路公共汽车，站到汽车中间的平台，平台在转弯处会旋转，这样女孩们就被挤在我们身上，因为她们一只手里拿着泳衣，另一只手里拿着辣味薯片。她们俩都住在格雷泽尔贝格。怎么样？在女孩们下了车之后，阿希姆问道，你们约会了吗？我摇了摇头。你们呢？那还用说，就在明天。我可以打听你的那位叫什么，以及她住在哪儿。

第16章：第一次约会

时间是周六下午三点刚过。我坐在恩斯特-罗伊特大街旁边的小型儿童游乐场上。一座沙箱、一道滑梯、两个秋千、一副跷跷板。游乐场四周是高大的女贞树篱。我在等那个叫卡琳的女孩。卡琳是阿尼塔的女友，阿尼塔和阿希姆周四就已经在一起拥抱狂吻了。阿尼塔说过，卡琳的父母极其严厉。因此她不被允许做任何事情。阿希姆说，我应当索性登门，按门铃，然后结束。卡琳住在儿童游乐场的拐角处。她父亲开了门，喊她过来，卡琳说我应当在儿童游乐场等她。半小时之后她来了。她说她没有时间。然后她又走了。我一直在游乐场上坐着。天空就像是一个灰色的烫衣板。我没带香烟，身上也没有马克可往自动售烟机里投币。明天我必须去上拉丁文补习课。去完教堂之后直接就去，因为周一我们要写最后一次作业。埃里希在上高年级阶段。他会得到五马克零花钱。我对我父母说的是六马克。用多出的一马克我在去上学的路上给自己买了一小包“塔林”牌香烟。我穿过果园，途经大黄种植田，在那儿我可以不受干扰地边走边抽。在埃里希家里我也可以抽烟。有时我们也听平克·弗洛伊德摇滚乐队的歌曲。但是明天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阿希姆和阿尼塔来了。阿希姆搂着阿尼塔的肩膀。她没有时间，我说道。你别介意，阿尼塔说，她（卡琳）反正不

被允许做任何事情，而且晚上8点必须在家。阿希姆笑了起来。阿尼塔不明白他为什么笑。但是我知道他为何发笑，因为我也必须晚上8点在家，有时甚至提前到7点。两对小情侣，这真是太好了，阿希姆说。我要回家，我说道。别胡说，我们要坐车进城。我没带钱，我说。这无所谓，阿希姆边说边掏出一小包“万宝路”香烟。阿尼塔也抽烟。阿希姆吸了一下香烟，亲吻阿尼塔，然后吐出烟圈。阿尼塔一边吸烟一边嚼口香糖。口香糖和香烟，这根本就不配，阿希姆说，这样我还不如买薄荷脑香烟。它们配在一起很好啊，阿尼塔说道。真变态，阿希姆说。他们俩笑了起来，相互亲吻。我姑姑就吸薄荷脑香烟。或者抽“基姆”牌薄荷香烟。她和第一个丈夫离婚了，现在跟一名报业代理相识。自从她离婚之后，她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来看望我母亲了。人们不可能在离婚之后还继续参加教堂仪式，我母亲说道。一次那名报业代理送来了一个配有磁铁箭矢的靶盘。靶盘上印有他所代理的所有报纸。磁箭吸附得很牢，但立在三条木腿上的靶盘却总是倾倒。

第17章：没有带红烧牛肉汁的炸薯条

因为赫尔特商场已经关门了，我们总在那儿吃带红烧牛肉汁的炸薯条，所以阿希姆、阿尼塔和我去了拐角处的一家酒馆。阿希姆点了两杯啤酒。我想要一杯可乐。阿尼塔穿了一条短款的百褶裙。她的嘴唇和眼睑都化了妆，并用祛痘膏盖住了丘疹。阿希姆和阿尼塔在衣帽间旁边的弹球游戏机上玩阿拉斯加游戏，她站在右边，他站在左侧。阿尼塔不会玩弹球，但是这对阿希姆来说无所谓，就跟老贝尔林格不在乎年轻的贝尔林格夫人不会打小型高尔夫球一样。阿希姆吸他的“万宝路”香烟，喝了一口啤酒，亲吻阿尼塔，然后才把烟圈吐出。6点钟的时候他们想去看《英格兰空战》那部影片。这部电影时间超长，在阿尼塔上厕所期间，阿希姆这样说道，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尽情地长时间拥抱狂吻了。我又陪他们走到电影院，然后向左转向朝公共汽车方向走去。

第18章：返回到阿希姆的母亲那里

阿希姆的母亲所效力的那位牙医外出度假了，因此我们可以在周六一起到他的花园里去，那里有一个游泳池。阿尼塔也来，阿希姆说。你被允许这么做吗？当然了，我母亲在这件事上一点儿也不反对。阿尼塔穿了一件米色的比基尼泳装，用水把阿希姆身上溅湿。阿希姆的母亲在给花浇水。她穿了一件大开领的泳衣。她铺开一张桌布，在中间放上一碗带小香肠的土豆沙拉。尽管阿希姆在抽烟，我也不敢学他的样子，因为我担心阿希姆的母亲会在家长会上向我父母讲起这件事。她向前弯下身子，给我往一个纸杯里倒橙汁。阿希姆和阿尼塔在游泳池里拥抱亲吻。我必须起身上厕所，赤脚从别墅里的瓷砖地面上走过，别墅里的百叶窗是向下拉着的，照明的保险装置也是向外拔出的，因此人们无法开灯，只能靠从通往花园的门那里透过的亮光。我查看地面上的血迹，但是它们早已被拭去了。阿希姆把可乐瓶盖里的那张三维立体图片转手给了我。可能是因为他每天都能喝到可乐，也可能是因为三维立体图片现在对他来说显得太幼稚了。在阿希姆吃土豆沙拉期间，阿尼塔在我对面的草地上坐了下来并注视着我。或许她为我感到遗憾，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必须总要很早回家。克里斯蒂安妮和玛里昂在班级旅行途中觉得我挺讨人喜欢的，可能是因为我帮克里斯蒂安妮提了箱子，或者因为我像她注视高年级男生那样看了她，因为我有时在吃晚饭前骑自行车去狄尔泰大街，希望她或许还要出门买点儿什么。但是我在那儿只碰巧遇到过一次加比，她刚刚从克里斯蒂安妮家里出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加比用左手的两根手指提着一些东西。其实那也没什么显眼的。其实那些东西只是通过她的目光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或许就像她挨着克里斯蒂安妮和玛里昂站立的样子。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她心里很清楚，我不仅仅是偶然才出现在那里的。这令我很难为情。唉，你上完生物课了吗？我说道，因为我想不起别的话。是的，刚刚和克里斯蒂安妮一道。然后我掉头返回，途经主教堂和穿过铁路与公路的交叉道口，想象克里斯蒂安妮的房间看上去会是怎样的。但是我无法准确地想象。床上挂着一张布莱恩·琼斯的招贴画。或许她的床跟我的一样也是那种可以抽拉的。还有一台电唱机。但是更多的我也干脆想象不出了。

恩滕豪森上空的寂静

夏季的天空被云朵遮盖了一会儿，四周静悄悄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就像是来自很远、很远时代的一段回忆。当时还没有死亡，只有暑假？不，时间还要更早。房屋和街道没有变化。一切都停滞了，要一直这么存在下去。这就是我的恩滕豪森，那里有一位总是坐在同一张沙发椅上的叔叔，和一个位于二层的房间，我总要返回到那个房间，在两个彩色版和两个黑白版之间交替进行的冒险经历之后。

把椅子往桌边挪一挪。把床单叠好。把枕头抖搂干净。用刀把羊皮纸上的黄油残渣刮去。厨房门在户枢里无声地摆动。在用石块铺设的院子里有送货小卡车留下的冻得硬邦邦的黏土轮印，线材和大方木料堆成了一堆，背景处是篱笆，篱笆后面是教堂的钟楼、树木和细木工场。

我沿着升挂小旗的桦树林荫道行走，它从工厂厂区旁边经过，一直通向城外。从冲压成形的窗洞里戴着红色便帽的丑角形象在挥手示意。一辆自制木车在围着那棵老橡树兜圈子。空中悬浮着一只鞋盒，它的侧面被钻了许多洞，从这些洞口里伸出滑稽的面孔在看着我。

五月初一个男人躺在我们家门口。他没有喝醉，而是患了糖尿病。明爱会那位女士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那个男人说道：我还可以。他站了起来。他踉踉跄跄。他穿过花园大门，沿着昏暗的路径向走下去。我心里在想：他不会再来了。永远不会再来。

所有出乎意料涌现的事物好像都在宣告一种永远也不会真正发生的变化。米老鼠的两个黑白版指向的是过去，相反两个彩色版指向的是想象世界吗？无所谓我想让自己进入何种梦境，这是因为现实既不是无色的也不是被涂上颜色的？惯性在小房子里和狭窄的街道上占了上风，在那些狭窄街道上行驶的是像信号灯那样红色的、带有可抽出临

时加座的双开门轿车。克瓦马·维斯塔，文明的最后基地，和洪都里卡一样只存在于一张卡片上，这张卡片存放于达戈贝特叔叔可以行走的保险箱里。只有他才能获取进入世界的通道，在这个世界里他的邮政飞机坠毁了，他的工厂和铁路股票受到了威胁，爆炸性制动装置和黄瓜蠕虫之间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因此他也只有一种过去：作为生活在旧世界的苏格兰人，作为生活在新世界的挖掘状如花生的金块的人，或者作为最后一批把茶叶从中国运往英国的快速帆船上的见习水手。他因为偶然回忆起了这一过去，或者在催眠医师的帮助下让自己有选择地置身于过去，但是这一过去通常情况下赶上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侄子和侄子的侄子。他们必须去往他为他们创造的外部世界，他仍在继续创造这一世界，当他用一万亿买到了一个钋球，但却不知到底可以用它来做什么。这种东西必须低温存放，俄罗斯人想要它，对于这种橙色的圆球没有更多的信息。通过偶然因素他的侄子们发现，人们可以在圆球上舔舐，为了看似无休止地总能品尝出冰激凌新的口味。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叔叔创造的世界揭露为欺骗性假象，基于儿时的渴望他构建了这种假象，尽管我们万能的和经常超越我们自身的想象，儿时的渴望总是让我们继续充满希望，但却永远不必离开父母世界狭小的起居室，就好比是我们下午三点半能够站在儿童游乐场前面，让冰袋在我们手里转个不停，为了体验地球所有的味道。

这种情况就跟在海因茨·哈贝儿教授那儿一样，他凭借小型模型，在一间狭小的灰白色调的工作室里，展示了宇宙不可估量的广袤，并用一支书写时发出尖锐刺耳声音的彩笔在一张纸上画下了各种复杂的计算，或者跟在格雷兹梅克博士那儿一样，当他向人们讲述非洲时，他让来自远方大陆的动物蹲坐在自己的肩头和写字桌上。在我出生前不久他把第一只霍加狔带到了德国，它是一头名叫埃普鲁的雄性野兽。四年之后他又带来了雌性霍加狔萨法丽。在我弟弟出生的那一年，德国本土的第一只霍加狔基乌也来到了世上，它是以刚刚获得独立的刚果的一个地区被命名的。人们给那只从刚果被劫持来的动物起了殖民者外出掳掠的名字，而在德国出生的那只被起了它父母故乡的名字，它自己不知道也永远不会认识这个故乡。一只戴着手套、穿着靴子的小北极熊笑着把一个带槽纹的黄色铝质小碗递给我。小碗里盛的是冰茶点。冰茶点由椰子油和可可粉组成。那种冰冷的感觉通过口腔里的

热量损耗而产生，因为为了使冰茶点融化，人们必须耗费能量。海因茨·哈贝儿教授会那样描述，我们也相信他说的话。

在这个由汉斯·于尔根·普雷斯所描绘的世界里，人们能够使鸡蛋悬浮，使金属游泳，人们可以造火柴电梯和压缩空气导弹，用土豆和堆叠的硬币发电，穿过一张明信片上车，把一支香烟打成结。人们只需用铅笔把画报页面上纷乱的数字连接起来，马上就会产生一匹马和两个男人，他们把一架钢琴抬过马路。比以前的魔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本子，为了让一幅画产生，人们必须用铅笔给本子的空白页画上阴影线，对此人们永远也不是特别肯定，是否这些要归功于个人的能力。骗子和无赖把他们的赃物藏在房间、阁楼间和仓库里，而只装备了一个手电筒、一节4.5伏电池和一台自行车发电机的孩子们则要揭发欺骗行为，这些欺骗行为涉及一个被调包的皮箱、被伪造的邮票或者一个被偷窃的小提琴盒，它们必须凭借一张被撕开的影城的电影票或者不小心被扔掉的一块方糖的包装来加以破译。那些在破案之后才被召集过来的警察作为一种外部秩序的代表而出现，这种外部秩序借助精心打磨的程序和官僚主义规章，尝试在孩子们面前掩饰混乱，但是却不能真正取得任何成效，因为那些流氓已经在下一则故事里重新开始他们的胡作非为，以此一直对孩子们的嗅觉和求知欲构成了挑战，直到他们的嗅觉和求知欲被耗尽，他们长大成人，成为掩饰社会的一部分。这一逐渐消逝的世界仅仅是通过钥匙孔、篱笆缝隙、围墙裂缝和小翼翼地被抬起的老虎窗或者后备厢盖，部分地把自己呈现了出来，就连这一片段也重又潜入黑暗，仅仅是一道细长的楔形光线划破了黑暗，光线穿过院子，透过窗玻璃上的一道缝隙，正好落在被找寻的东西旁边。物质性好像不断被穿孔，这种经验作为恐惧转移到了自己身上，身体遭到了一些东西的威胁，这些东西被称为头脑中的空洞，看似无法被想象，直到人们自己一次在跌倒之后拥有了这种东西。但是正如在魔术袋里被物化或客观化的那样，这样的魔术袋在年集上和面包店里有售，奇妙的东西不是靠小型玩具和爆米花来实现的，而是表现在对相信一种真正魔法的无限希望，这种魔法的力量在尚未拆封的袋子从柜台上被递过来的那一刻达到了顶峰，即使在袋子被打开时也不会失去魅力。袋子里盛装内容的奇妙之处更多的是转移到了袋子身上，一段时间之后再由袋子继续传导给传递行为，直到历

经多年的成熟之后最终仅仅是一种愿望，它好像不再指向任何事物，除了指向在夜色降临的黄昏时分面包店里漫射的光线，面包店里的柜台已经清理干净，柜台后面的门是敞开的，它可以让视线进入一个幽暗的过道，人们能够隐约感觉到过道尽头从烘焙房里照射出来的楔形光线。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把明爱会那位女士引渡给国家人民军

在上物理课期间我们被副校长从班级里叫了出来，并被带到了棋牌室。克劳迪娅也已经在那儿了，坐在暖气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两名穿灰色长大衣的男子站在男像柱桌子后面。桌子上放着一台根德23型收录机，已经调到了“录音”和“暂停”位置，这一点我从发出绿光的电眼就能看出。收录机旁边是一个麦克风。这是来自刑事警察科的两位先生，他们要向你们提几个问题，副校长一边说一边站到装有各种标本的柜子旁边。是的，两个男人中个头稍高的那个说道，只提几个问题，说着他按下录音键，让磁带开始转动。然后他指向一张小茶几，茶几上摆放着我的水枪、黄色的塑料蛋、橡皮泥和蜂鸣器。你们熟悉这些东西吗？克劳迪娅站起身来，和我们一块儿走到茶几前面。不，她马上说道。不，贝尔恩德也说道。是的，我说。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把目光朝向我。我禁不住想起了关于那位牧师的故事，他在化体仪式之后举起圣餐杯，为了饮用里面盛装的东西，这时他看到正好有一只毒蜘蛛爬进杯子里。但是因为现在杯子里装的不是葡萄酒，而是我主上帝的血液，因此他没有考虑太久，就端起圣餐杯连带蜘蛛一饮而尽。他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但是上帝的血液使蜘蛛的毒性变得无害，把蜘蛛在牧师的肚子里变成一只美妙的蝴蝶，它在牧师做最后的祈神赐福时从他的嘴里飞出，振翅向上飞向耶稣受难像，在那儿它落到受难者的荆冠上，从那个时刻开始每个星期天它都会在那里出现，参加弥撒仪式。

是吗？两个男人中更为敦实的那个说道。这就有意思了。这么说来你是熟悉这些东西了。是的，我重复说道。我也曾经有这么一把水枪，水枪旁边的是橡皮泥，但是另一样东西我就不认识了。按顺序一个一个来，较为敦实的那个男人说，也就是说你也曾经有这么一把水枪？那你就再仔细看一看，或许这就是你的那把。不，我说道，我的意思

是，我也有这么一把水枪，只是现在它正好不在我手里，因为我把它借给了罗兰·格特勒。我之所以说借给了罗兰·格特勒，是因为他已经病了一个多星期，因为他的父母年纪太大了，以至于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怀疑到他身上。啊，罗兰·格特勒，他也在你们班级？副校长点了点头。那么橡皮泥呢？是的，我刚好认识这个，我见过这样的东西。过复活节的时候我希望能有这样的礼物，但却没有得到。我只得到了一块仿制的橡皮泥，但它不是装在一个鸡蛋里，而是在一个塑料靴子里，这很让人讨厌，因为它总是卡在里面，此外它也不像真正的橡皮泥那样管用。你到底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呢？有人告诉过我这些。啊哈，那么那边的第三样东西呢？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较为敦实的男人走向茶几，拿起蜂鸣器，然后他把脊背转向我们，但是我听到他是怎样在给蜂鸣器上发条的。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把右手局促不安地向我伸了过来。来，把手递给我吧，他说道，我们还根本没有正式问候过呢。我装出对他的伎俩一无所知的样子，向前迈了一步，鞠躬并把手递给他。因为他没有按正确的方法给蜂鸣器上发条，因此它只振动了一小下。尽管如此我装作吓得要命，“哎哟”大叫了一声。然后我开始揉起右手。这是电吗？我问道。不，不用害怕，这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机械装置，就跟要上发条的玩具汽车一样。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受到了惊吓，难道不是吗？简直害怕极了！

较为敦实的男人仔细打量贝尔恩德、克劳迪娅和我。克劳迪娅肯定什么也没说。我也只说了水枪的原委，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明爱会那位女士在幕后策划。人们看到了你们，较为敦实的男人说道。我们面面相觑。这前面有人在弹奏音乐，个头稍高的男人说。是的，人们看见你们怎样尝试在一个后院里爬上一道围墙。我们三个人都一句话不说。怎么了？对此你们没什么要说的吗？不允许这么做吗？克劳迪娅问道。这要看人们怎么想了。你们当时处在他人的地产上，这可以被评判为非法进入他人住宅。但是我们仅仅是在玩耍，贝尔恩德说。是的，我说，我们必须翻墙逃走，因为我们被人跟踪。有意思，较为敦实的男人说，被人跟踪？究竟被谁呢？被福德贝格人。对，没错，贝尔恩德说，是被福德贝格人跟踪。我意识到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就连克劳迪娅也说：是的，是福德贝格人。这件事跟福德贝格人扯在一起听起来还是可信的，因为福德贝格人真的会跟踪某人。当人们随便

在某个地方坐着或者玩耍，或者比如说在亨克尔公园滑雪，这时一下子就会过来一个小男孩，他甚至连七岁都不到。他过来找碴儿，谩骂某人，或者用脚踢雪橇，或者向人们身上扔雪球。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干脆捉住他，往他身上涂擦雪球，但这正是福德贝格人的诡计，因为他们总是派出一个小孩，一旦你对小孩有所动作，他们一帮人就会全都过来揍你。因此你不能对小孩有任何举动。但即便如此，福德贝格人当然也会找借口过来揍你。所以当小孩过来的时候，你必须马上逃走，不允许太过高傲，因为福德贝格人的确很残忍，他们会直接打人的脸。

个头稍高的男人转向副校长。福德贝格人，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来自净水厂旁边铁路定线附近无家可归者居民点里的儿童和青少年，战争期间东部劳工就被安顿在那里。啊，这么说你们是为了躲避这些福德贝格人而逃跑的？是的，我们一起说道。但是你们根本就不是真正逃跑，而是又折返了回去。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可以问一下的话？因为……，贝尔恩德说，因为我们意识到，他们根本就不再跟在我们后面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沿着菲尔德大街往下跑，当时他们还跟在我们后面，然后就看不到他们了，那么他们肯定是在高处转悠，如果继续跑下去我们可能会跟他们撞个正着，因此我们又折返了回去。有意思，你们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吗？注意到什么？比如注意到一辆黄色的NSU王子停在那里。但是那个地方总是停有汽车呀。那辆车停在哪儿呢？就在你们跑进去的那个院子对面。不，我们没有看到那辆车。我们一直都只在留意福德贝格人，看他们是否从某个地方过来。那些福德贝格人，他们年龄已经很大了吗？是的，他们年龄比我们大，尽管他们身边总要带一个小孩，让他挑起争端。他们当中也有一个女孩吗？我们三人都考虑了一会儿。通常情况下福德贝格人是从不带女孩外出的，但是因为他们也在找一个女孩，所以肯定的回答一定会更好。是的，我们说，他们当中也有一个女孩。那么你们过来一下，较为敦实的男人说道，仔细看一看这个。他从一个棕色的皮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并把它打开。在玻璃纸袋里塞着一些铅笔画，这些画我在电视里也已经见过了。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些图片，告诉我是否你们觉得某个人面熟。最好的方式就是现在干脆说，是的，我们认识这些人，他们就是福德贝格人，那个女孩也属于他们之列。但是这样

做不行，因为如果福德贝格人打听出是我们干的，他们就会置我们于死地。于是我们都说：不，我们不认识这些人。当较为敦实的男人说：你们再仔细看看。真的不认识吗？这时我说道：其中一个人看上去有点儿像洪堡学校的某人。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想把他们引向错误的途径。

只有那些在普通高级文理中学学习跟不上以及家境富有的学生，他们才去上洪堡学校。要是我再留级的话，我不会去上无聊的洪堡学校，而是去上寄宿学校。这个主意是明爱会那位女士出的，然后她又煽动了我父母。虽然她总对我说，寄宿学校根本没那么糟糕，但是当她恼怒的时候，她也会把寄宿学校称作教养院，并说我就适合去那样的地方。然后她会在周日，当我父亲有空的时候，和他开车去奥登瓦尔德，为了给我在那儿打探寄宿学校的情况，她肯定会只挑选那些带高墙和禁闭室的寄宿学校。他们会随身带一些广告单回来，然后再去吃冰激凌，那些广告单就放在我们家客厅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感到害怕，因为我不想上寄宿学校，因为我在哪儿谁也不认识，必须总得待在学校里，中午无法再出校外。人们也不允许听音乐，要把头发剃光，必须穿校服，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愿意去东区，因为在那儿我至少会得到一把旅行刀和一架美乐时相机，能够检举老师、父母和明爱会那位女士，或者把她（那位女士）引诱到东区，为了在地下锅炉房里对她进行审讯。我将这么说，我吞下了一颗樱桃核，现在在盲肠处感到无比疼痛，害怕盲肠穿孔，因为如果盲肠穿孔，人们就会立即死掉，因此盲肠部位的疼痛不能耽搁。如果明爱会那位女士问道，我哪个部位感到疼痛，我就会这样说：下面的任何地方都疼，因为有时候盲肠部位的疼痛也能够转移，恰恰就在盲肠快要穿孔之际，它有时会让人在完全另一个地方感到疼痛，也就是说是在下面，但是不仅仅只在侧面，而且也在腹部。我是从赖讷那儿知道的这些，他的堂兄弟差一点儿就死了，因为他一个月里三次由于疏忽吞下了一块口香糖，然后他的盲肠发炎了，还在他住院之前盲肠就已穿孔。但是赖讷的堂兄弟很走运，他并没有死，因为他所吞下的都是泡沫，泡沫在肚子里膨胀，将脓截获，因为否则的话脓会进入血液并使血液中毒，然后血液就会从毛孔里渗出，因此人们说有人出的不是汗水而是血液，实际上他是死于盲肠穿孔。随后明爱会那位女士将会搀着我，送我上

她的欧宝舰长车，因为我当然要等候片刻，当我父亲不在家、工厂的医务室也已经下班的时候。贝尔恩德和克劳迪娅已经藏在汽车的后座上，然后我们会沿着林荫路向北行驶，在其中一条并行的马路从别墅区旁边经过的地方，我会事先说自己感到很恶心，必须下车呕吐，问她能否驶进那边的小街，在她停车的时候我们就抓住她，捆住她的手脚，用东西堵住她的嘴，把她塞进后备厢里，因为在此期间天可能已经黑了，然后我们就驾车经过火车站，朝北驶向老酿酒厂。

那么我们就尝试一些别的吧，较为敦实的男人说道，他再次把手伸进公文包，又取出一个文件夹来。但是这个文件夹不仅仅只在中间有两个环，就像一个普通的利市档案夹那样，而是至少有十个环。总有一块纸板被固定在两个环上，人们能够翻转那些纸板，为了以此编排出不同的面孔。上面是头发，然后依次是眼睛、鼻子、嘴巴和下巴，人们可以单独变换其中任一部分。现在我们应当说出，福德贝格人的头发和嘴巴是怎样的等等，我们的做法总是这样的，我们中有一个人说些什么，然后其他两个都点头称是，或者也表示赞同，但是要勉强一些，就这样我们鼓捣了几分钟，直到我们说，这个人看上去大致是这样的，另一个人大致是那样的，以及那个女孩大致长什么模样。这种情形就类似于那种巧克力所遭遇到的情况，它被塞进一个栅栏里，栅栏外面被画上一些人物形象，人们可以移动这些人物形象的腿和上身，这样就能够改变人物形象，比如让一个女人穿上一件燕尾服，此外再长出两条鸭子腿，但是其实我的年龄对于这样的东西来说已经太大了，这仅仅是一些适合我弟弟的东西，尽管那种巧克力尝起来味道非常不错。

然后飞来一架直升机，它看上去跟一架非常普通的直升机没什么两样，人们可以乘坐它环程飞行，从空中俯视莱茵高地区，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伪装，因为它事实上是国家人民军的直升机，它将用搜寻探照灯在老酿酒厂旁边发现我们，然后紧挨着我们降落，士兵们将会从直升机里跳出来，抓住明爱会那位女士，因为他们会认为她是协助逃跑的人，那时我会对她说：现在轮到你上寄宿学校了，贝尔恩德和克劳迪娅会哈哈大笑，现在人们可以把一切都说给她听，因为她再也不可能从东德逃出来了，然后我还要对她说，我觉得她穿浴衣不穿紧身连

袜裤很令人讨厌，她在那里进监狱的时候肯定得把紧身连袜裤上交，因为东区的人们根本就不认识这样的尼龙丝紧身连袜裤，她们只穿厚厚的连袜裤，这样所有的监狱女看守们当然都要争抢这种紧身连袜裤，然后她们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明爱会那位女士不穿长筒袜，甚至连厚厚的针织长筒袜都不穿，而穿尼龙丝紧身连袜裤，然后她们就会殴打明爱会那位女士，甚至可能会枪杀她。但是在枪杀这件事上他们会做得非常巧妙，他们会索性对她说：好了，您又可以回西区去了。然后他们开车把明爱会那位女士送到离柏林墙很近的地方，并对她说：快点儿，您就下车跑吧，在我们改变主意之前。在她开始跑的时候，人们从后面开枪把她打死，因为人们可以说她想逃跑。我们会从同样乘直升机前来的穿便服的男子那儿得到一笔奖赏和一瓶伏特加，然后我们会干脆把那辆欧宝舰长车撇在那儿，但是事先仔细查看一下，以保证我们这一次真的什么也没有遗忘在汽车杂物箱里或者后座上，然后我们步行回家，在火车站的下跨道里把那瓶伏特加卖给一名流浪汉，换得了他在当日乞讨来的所有钱财，钱肯定不多，但足够买一小包“塔林”牌香烟和炸薯条，然后我们还要在赖辛格安兰根闲荡一会儿，因为现在明爱会那位女士已经不在这儿了，我也不必非要准时回家了。但尽管如此恰恰在那天晚上我还得准时到家，因为否则会引起注意，否则人们会认为我知道一些情况，因此我们又要很快出发。如果我母亲问道，我是否知道明爱会那位女士现在何处，我就会这样说：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因为她在傍晚时分开车走了，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回来。她会回来的。

迈尔克林医生和弗莱施曼教士争夺那名少年的灵魂

六月十八日早晨六点半我起床了。我从一个浅蓝色的梯形小盒里撒了一些干粉香波在我油腻的头发上，让它浸润了一会儿。然后我用梳子把头发里的粉末刷掉。我步行朝养老院方向走去，途经修道院入口处。里面闻起来有一股咖啡和未经通风的走廊的味道。在小教堂的更衣室里我穿上红色的法衣，外面再套上刚刚上浆的唱诗班成员所穿的白长袍，最后再戴上领子。“我要走向天主的祭台。天主赐予我年轻的喜悦。”这是天主教梯级祈祷的开场语。在诵读《悔罪经》时，白色的干粉香波残渣从我的头发里纷纷扬扬地落在赞美诗集上。早晨的空气中弥漫着略带酸味的葡萄酒的气味。耳际响起风琴的乐声。我们仅仅是人间的过客。

在水槽和冰箱之间有一道空隙。新买的炉灶周五送到。我父亲手里碰巧拿着一只他刚刚换下的旧白炽灯泡。他用力把灯泡扔到水槽和冰箱之间空隙的地面上。明爱会那位女士从水槽下面取出带柄小刷和铲子，把地面上的碎片清扫干净。我站在窗边。天又下雨了。时间又是上午。收音机被关掉了。送我去疗养院的不是救护车，而是一辆棕色的出租车。把后座间隔开来的扶手无法被收起。我蜷缩在后座的右半部分上，身上盖着一条带黄色方格的羊毛毯。车里闻起来有皮革和香烟的味道。出租车的计价表发出嘀嗒的声音。房屋和树木从我头顶斜上方驶过。在它们中间露出一块天空。我父亲和明爱会那位女士必须在诊疗室门口等候。我坐在检查卧榻上，它的表面有粒结，就跟体操馆里的蓝色垫子一样。我在做完转盘之后就躺在垫子上，而其他人则在搭建鞍马和跳箱。高高的天花板下面悬挂着吊环。在一旁的墙边安放着攀缘架，它们都是些很长的金属杆。透过用带槽沟的保险玻璃制成的天窗照射进来一些橙色的太阳光。

我待在医院里以供观察。生平第一次我穿上了一件长睡衣。我赤脚走过石板地面去上卫生间。洗手盆上面没有镜子。我用手感觉是否自己

的头发变得油腻。我摸索自己的脸部看它是否长出了丘疹。我在大腿的内侧感受到穿堂风。我在小便时不用手去碰阴茎，而是将髋部向前挺向小便池方向。还在将包皮向后褪的时候，我的龟头就会感到疼痛。那是一种隐隐的说不清楚的疼痛。每次都会有那种感觉。又回到病房里。其他人都在睡觉。他们的头上和胳膊上缠着绷带。在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碗，有时他们会往里面吐一些血。有人把那条带黄色方格的羊毛毯放在我床上。窗户前面没有安装护栏。窗户的把手被拆除了。床架上的白色油漆在某些地方已经剥落了，我用食指滑过这些表面粗糙的地方。一个男孩在睡眠中呻吟了起来。外面的走廊上有人走过。为了能够入睡，我想起家里我书架上的那些书籍：《凯不射杀大象》《阴森森的箱子的秘密》。它们都是带有白色亚麻布书脊的蓝色精装本。书的封皮上都有一幅插图。插在书籍之间的是一个写有魔术戏法的小本子。那是给男孩子看的小册子。从我父母的书架里我想起了席勒的诗集与叙事谣曲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本黑色精装书籍夜里必须从我的房间里被拿走，放在门口的熨衣机上。房间里的气味很独特。我无法入睡。看一下当铺女老板的房间吧。她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钱又太少了。这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只能看懂一半。书里的很多名字我都记不住。夜里当铺女老板的房间就跟我们家的电视房一样。左边是我母亲的沙发椅，右边是我父亲的。摆在两把沙发椅之间的是低矮的玻璃桌。桌子后面的墙上贴着壁纸，上面印有按照透视原理向内倾斜的菱形图案。从高处悬挂着三盏灯，样子像是被颠倒过来的香槟酒杯。沙发椅前面是放腿的凳子。凳子上分别放着一条毯子。带黄色方格的毯子是我父亲沙发椅前面凳子上的。他不说“毯子”，而说“毛毯”。“毛毯”听起来像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口吻。物品经常有两个名字。人也是如此。拉斯柯尔尼科夫遇见一个女孩。就在河边。我和父母在下雪天里开车去埃普施泰因。我们要横渡一条溪流，沿着山路向上开。我有些发烧。两天之前在看望完祖父母之后，我就已经生病了。跟以往一样我坐在壁橱前面的皮套子上，随手翻阅《电视收视节目》。我们家只有电视节目指南“Gong”。在每一档节目下面都注明了适宜收看人群的年龄。我喝白色的柠檬汽水。在我们家这种汽水只有黄色的。就着汽水我吃爆米花。幽默杂志的漫画家泽普·阿尔内曼出了一本书，人们可以订购这本书，它的价格是19.80马克。我往前翻页。一张两个孩子的照片。一名

男子的一张照片。一张有铁路线的照片。父亲无法再营救正在玩耍的两个孩子。我们也在铁轨旁边玩耍过，就在阿希姆家对面。一次阿希姆亲眼看到，一条狗是怎样被火车轧死的。就在这之前它还刚刚对着一根广告柱小便过。我们往铁轨上放了一些二芬尼的硬币。被轧扁之后人们一直还能够识别硬币上的数字。这些硬币是椭圆形的，就像嵌有圣母画像的椭圆形框子。在玛利亚·拉赫修道院里摆放着一台铸币机。花二十芬尼人们就可以往一块铁片上刻铸圣母的画像。我看到了那两个孩子。我看见了火车。然后我感到眩晕。我醒了过来，又重新入睡。我出了一身汗。那列火车。那两个孩子。终于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想起床。务必要起床。不想再把眼睛闭上。不想再睡着。测量体温。把温度计夹在腋下。小腿肚湿敷包带。连穿两件套头毛衫。蜷缩在汽车后座上。随父母朝埃普施泰因方向驶去。溪流边有一间扁窄的房屋。可能是一家碾磨厂。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干完坏事之后也会发烧。他无法从房间里出去。他会产生各种幻觉。我只能幻想《罪与罚》套封的味道和赞美诗集的气味：像是焚香的味道。那两个孩子。他们被碾碎的肢体。去往埃普施泰因的坡路很陡。我闭上双眼。我感到眩晕。我们的汽车向后翻了过去。

死亡。在铁轨上死去的两个孩子。拉尔夫喝醉酒的父亲，在夜里用一把刀追着他穿过吉布。他逃到教堂法衣室旁边寻求庇护。《体操运动员报》上报道的那个男孩，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昏倒了。不断有人在上厕所的时候昏倒死去。那个狭窄的厕所位于通往商业区的过道旁边，在出了一系列事故之后我不再使用那个厕所，因为我不想被女秘书们或者工人们找到。亚历克斯班里有一个男孩，在班级郊游的时候他就已经亲吻了一个女孩。或许他还吻过更多的女孩。突然血液从他所有的毛孔里渗透出来。他无法再被救活了。我们在细木工场的院子里玩耍。格拉尔德取了一根长梁，围着自己挥舞了起来。我们绕着圈跑，尝试避开长梁。我绊了个踉跄。格拉尔德无法立即停止挥舞。长梁击中了我的头部。天空。铁栅栏后面是教堂钟楼的尖顶。养老院的屋顶。高速公路的隆隆声。一条隧道。黑色。探照灯。又苏醒了过来。伤口不流血了。我头晕目眩。其他人站在我周围。他们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埃里希-奥伦豪尔大街。在这些新建住宅里住着霍斯特·莱希。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他在学校食用的面包上的干硬表皮被切

下。克赖茨大街，就在牧师住宅对面。沃尔夫冈的皮肤上长有夏季雀斑。他还从未揍过我。铁栅栏。那棵高大的松树。拍打地毯的竹竿。回到家坐在长椅上。一直还感到眩晕。一句话也没说。进入我的房间。《体操运动员报》上报道的那个男孩。被镶上黑边的照片。通向体操馆的走廊。向左去往餐馆。右边是卫生间。乘坐4路车回家。文具店在对面的支路上。那儿全年都有卖爆竹的。普遍害怕上厕所。厕所不再被锁上。或许只在锁上厕所门的时候人们才会死掉。因为他们找不到某人的踪影。因为他们无法进入。圣灵降临节营地被雨水糟蹋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淋湿了。总是只能待在帐篷里。就连做饭也是在圆顶帐篷里。周一晚上返回。我父亲不理睬我。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给某人打电话。等候对方回电。我母亲躺在床上。明爱会那位女士把那块大的浴巾递给我。把热水器调到第二挡。给我涂抹了一块面包。我坐在走廊里。第二天早上我父亲站在楼梯平台上。他往裤兜里塞了一块新洗的手绢。他拦住我。今天说话声音小一些，爷爷去世了。

养老院院子里挨着狗舍的地方是那栋狭小的小房子。死者被安放在那里的灵床上。暑假里的一天清晨，停尸间的门敞开了一次。我们在对面的大门入口处。一名修女背对着我们。她手里拿着一只碗和一块海绵。在她面前死者赤裸着双腿。我当时七岁，也可能八岁。两年前我还没有上学，那个时候我坐在我们家花园里。一个男人越过围墙向里张望。天空乌云密布。一片黑云把它的阴影投射到花园里那棵莱茵克洛德李子树上。我非常惊恐。那个男人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许多人都沿这条路朝克尔伯草坪方向跑去。一个男孩淹死了。那条溪流的水并不深。人们能够站在里面。或许他是在拦河坝那个地方溺亡的。在溪流于地下消失之前，那道栅栏就叫拦河坝。栅栏后面的水要更深一些。看上去黑黝黝的。我不知道那个男孩叫什么名字。我只和他玩过一次。一天上午。在幼儿园里。然后他就再没来过。他只是短暂来访。他母亲生病了。不知道他去哪里了。他信仰新教，不跟我们一块儿祈祷。他继续在一边玩耍，不知道什么是祈祷。那个男人。对了，是那个越过篱笆向花园里我这边张望的那个男人，是他谋害了那个男孩。他把男孩从桥上扔进溪流。就在流水在栅栏前开始淤积的地方。一块儿被扔进水里的还有树枝和垃圾。男孩躺在那道栅栏上。栅栏刺

穿了他的身体。那个男人先前在物色一名男孩。随便一名都行。他没有把我带走。取代我的是那个男孩。可能是因为他信仰新教。

目光扫过被掘开的教堂墓地，场地上有沙丘和成堆的新地面石板。教堂司事手执黑色的浇灌园地的长橡皮管，在给绣球花浇水。还有那具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雕像，雕像上圣子耶稣略微弯曲的右手少了两根手指。这只手正准备放松伸展，摆脱痛苦并安详死去。这一愿望实现了。雕像前面是两盏套在红色塑料灯罩里的长明灯。钟楼里的楼梯很陡。光线从洋槐树枝中间透过，照在客厅的窗帘上。院子里一名工人在用皂液清洗那辆深棕色的欧宝车。

晚上7点。晚饭时间。可可豆。黄油面包。夹巧克力薄片面包。钟声响了。教堂司事去给钟上发条。他是从移民区来的，边吹口哨边从我们家房子旁边走过。我们的房子没有安装避雷针。工厂的烟囱已经足够高了。在雷雨天气里我们就躲进储藏室。在黄色的五斗橱旁边摆放着配有明信片 and 乐高积木的汉高乐鼓。梯子。从客厅里搬来的旧地毡膜。那是带有黄色正方形和红色圆圈的黑色地毡膜。已经被撕破了。光线从洋槐树枝中间透过，照在踩坏的厚木板上。院子里一名工人在用皂液清洗那辆黑色的奔驰车。

两条纵向街道与铁路线平行伸展：火车站大街和池塘小街。五条横向街道：泉水小街、溪流小街、行政区小街、菲尔德大街和胡贝图斯大街。一所以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洛齐的名字命名的公立学校，一座以圣心基督命名的教堂，一家附属幼儿园和一家养老院。除此之外还有四家食品店、三家面包店、同等数量的肉铺、理发店和文具店、五六家餐馆以及一家卫生用品商店。还有我们家的工厂。我父亲的工厂。就在铁路路堤后面。

阿明·达尔站在新开业的商场楼顶。人们在林荫路上空拉了一根钢丝绳。它从范·蒂格伦咖啡馆一直延伸到商场。阿明·达尔就这样做平衡动作表演，从钢丝绳上走了过去。现在他笑着站在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处，向底下挥手示意。从高处那个地方他能够看到我的儿科女医生住的那栋房子。也包括我的牙医的诊所。许多气球升空。两名男孩从一辆手推车上偷了一棵多肉植物，然后朝里尔学校方向跑去。在一座桥

梁底下他们用打火机在那棵块根植物上烧来烧去。他们用随身带的小折刀在多肉植物上刻上眼睛和嘴巴。然后他们把嚼得不再有味道的口香糖粘在眼睛上。他们把现在看似头颅的多肉植物扔到溪流里。阿明·达尔现在借助一根绳索从空中向下滑落，在人群中间悬浮着。他胳膊上抱着一个装有抽签纸条的大桶。桶里盛装着被折叠起来的淡紫色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的都是欧洲各国首都的名称。如果没有空签的话。罗马对应的是一把螺丝刀。伦敦是一个发出颤音的哨子。巴黎是一副钥匙垂饰。钥匙垂饰是用透明塑料制成的，呈椭圆形，中间嵌有一位年轻女人的照片。我尝试用随身带的小折刀的刀尖，打开钥匙垂饰的背面。在钥匙垂饰的正面被冲压的椭圆形向外弹了一下。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其他照片被嵌入垂饰。或许那位年轻女人是一位流行歌星或者电影演员，只是我不认识她而已。一只探测用的系留气球从我的儿科女医生所住的房子后面升起，向上翩翩起舞。阿明·达尔伸手抓住从高空放下来的绳梯，在空中摆动摇荡。他向远处滑翔，飘过山丘，直到位于内城的保险公司大楼，在那里我母亲一直工作到她举行婚礼为止。

路易斯·特伦克尔站在一间农舍里。他穿着一件短上衣。他年纪大了，讲巴伐利亚方言。他想登上山巅。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他吃苹果核以增强体质。阿明·达尔穿过一间布置得很现代的客厅的玻璃门在蹦蹦跳跳地跑。他站在家用酒橱旁边。他很年轻，讲汉堡方言。人们永远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他沿着房屋立面往高处攀爬，悬挂在直升机的起落架上。他周边的一切都像周日下午那样明媚。不像周五晚上那么阴暗，当在一座光线昏暗的剧场的舞台上笼罩着体育比赛般的紧张氛围时。

我坐在屋门口。左边是工厂的院落。右边是被雷电击中过的莱茵克洛德李子树。那棵米拉别里李子树。那两棵洋李树。一只猫越过围墙走了过来。两名修女推着一辆婴儿车经过院门口去往教堂，车上坐的是科妮莉亚。她们在威斯特瓦尔德的一家孤儿院发现了科妮莉亚。她在那里和最小的孩子玩耍，尽管她已经三十岁了。她的个头比我还小，说话时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她在谈起自己时从不说“我”，而只说“科妮莉亚”。此外还有弗里德尔和那个驾着两侧有栅栏的马车的男

人。弗里德尔站在毛厄文具店旁边的大门入口处。以前他是农庄的长工，后来他继承了整个农庄。当我们从马路另一侧走过的时候，他在后面向我们喊些什么。那个驾着两侧有栅栏的马车的男人曾经是大学教授。在战争中一发炮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之后他就变得精神失常了。宫殿花园里的那名农田看护者只有一只胳膊。他的兄弟是战后被处决的最后一名犯人。他在宫殿花园里用斧头砍死了一名妇女。就在夜莺路上。夜莺路沿着右侧围墙一直通向莱茵河。路上光线昏暗，为生长繁茂的植物所遮没。那里是情侣们约会的场所。

我母亲必须住进医院。为期两天。然后我们开车去接她。我在汽车后座上等候。出来时我母亲胳膊上抱着一个婴儿。她没有坐到车前副驾驶座上，而是跟我一起坐到后座上。那个婴儿就是我弟弟。现在那只猫不能再进到我们的花园里来了。猫会杀害婴幼儿。它们会躺在婴幼儿的脸上，使他们窒息而亡。如果那只猫过来，我们就必须把它赶走。但是它不再来了。我从高速公路桥上走过。桥下躺着一只被碾死的猫。我无法辨认是否它就是我们家的那只。房屋被改建。我们有了燃油取暖设备。

我站在小摇篮前面。我母亲在大声喊叫。正在安装新暖气管道的工人们闻声跑进厨房。我也跟在后面跑了过去。我母亲站在厨房用桌的前面，在盯着她的右手。一些黄色的东西顺着她的头和脸往下淌。那是一种从天花板上滴落的黏稠的液体。学徒被打发上去探个究竟。桌子上放着敞开的新搅拌器。里面还有剩余的煎饼面糊。面糊向上喷溅到天花板上。我母亲没能按紧搅拌器的盖子。突然她的右手不再有力气了。手沿着侧身垂了下来，在那儿无力地晃来晃去。工人们都笑了起来。学徒把污物擦拭干净。人们必须重新给天花板抹灰泥。第二天我母亲连右腿也无法再活动了。她躺在客厅里。工人们在她周围走来走去。她用左手往腿上涂抹解痛剂。我们家里安装了新的屋门。在厨房和客厅之间要布置一道递菜窗。晚上我母亲对我父亲说，她不再想要递菜窗了。但是说这话已经晚了。墙里已经被钻好洞了。第二天明爱会那位女士来了。她背了一个大包，把它放在厨房里。我母亲又躺在沙发上。工人们运来了与递菜窗连接的柜子。明爱会那位女士往我母亲的腿上盖了一条被子。她给我抹了一片面包。她做了豌豆汤。我觉

得豌豆汤不好喝。豌豆都还很硬。医生来了。工人们必须从房间里出去。我也不例外。明爱会那位女士则可以待在房间里。工人们在厨房里安装给递菜窗配的门。医生和明爱会那位女士站在走廊里交谈。工人们又允许回到客厅里。他们把递菜窗推移进墙上的洞里。在客厅里递菜窗看上去就像一面柜子。在厨房里它倒像是递菜窗。明爱会那位女士把婴儿放到我母亲的左胳膊上。她检查了一下靠在婴儿腮帮子上的奶瓶。她把奶瓶递到我母亲的左手里。我母亲尝试用左手拿奶瓶给婴儿喂奶。她弯下手掌，但是还是够不到奶瓶。婴儿在哭喊。明爱会那位女士抱起婴儿。她挨着我母亲坐到沙发上，把奶瓶塞进婴儿嘴里。

明爱会那位女士晚饭时给大家煮可可粉。她没有用巧克力牛奶，而是使用真正的可可粉。真正的可可粉会在表面结一层奶皮。明爱会那位女士并未用调羹把我杯里表面的奶皮舀去，而是说道：奶皮的味道尝起来很好。奶皮是最好的。我对奶皮感到恶心。尽管我父亲不喝可可粉，而是喝啤酒，但他也对奶皮感到恶心。他不得不扼住咽喉，做出一副想要呕吐的样子走进浴室。明爱会那位女士见状直摇头。我用调羹把奶皮赶到杯子的内侧。明爱会那位女士把一片抹好的面包放到我眼前。面包上抹的是肝肠，下面还有一层黄油。这个也使我感到恶心。我拿起盘子站了起来。我说我想陪在母亲身旁吃饭。我走进客厅。我母亲睡着了。她的右胳膊毫无生气地向下垂着。

工人们在二楼铺设管道。那里是我和我弟弟的房间。我踩着满是灰尘的楼梯上楼。明爱会那位女士背对着我站在房间门口的走廊里。她面前站着一名工人。工人右手夹着一支香烟。他用左手把明爱会那位女士的百褶裙向上撩起了一块。他正用手摸她的屁股。明爱会那位女士没有穿紧身连袜裤。我赶紧向楼梯下面退了一步，为了不至于让他们看到我。

星期天明爱会那位女士和我们一道在教堂做弥撒。她坐在右侧，就在修女们的身后。在末尾的祈神赐福仪式中她并未站起身来，而是一直跪着。她把脸埋在撑起的手里。某些成年人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他们参加完圣餐仪式回来，还会长时间保持跪坐的状态。他们遭遇了一种

特殊的厄运。上帝考验了他们，但是现在他要帮助他们。他们祈祷得非常投入，而我从来就不十分清楚，我在圣餐仪式之后的时间里应当做些什么，作为尚未遭遇厄运的孩子，应当把手放在面前多长时间。如果在化体仪式之后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么情况就更为糟糕了。现在人们至少会走向受圣餐者坐的长凳，然后再折返回来。人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是怎样尝试在口中积攒尽可能多的唾沫，以免圣饼粘在腭部。

在母亲节那一天我们和明爱会那位女士玩汽车四重奏纸牌游戏和排七，直到我父亲回来。他去修剪丁香花枝了。纸牌是魔鬼的祈祷书，我母亲从沙发那儿说道。我们去歌唱家协会吃饭。服务员忘记了给我母亲点的肉排。尽管是母亲节，我母亲也必须等候。在其他餐桌就座的也都是母亲们。她们面前摆放着鲜花。当给母亲点的肉排终于上来的时候，我们其他人都已经吃完了。我父亲给我母亲把肉排切成小块，就像不久前她还为我把硬的面包末端切成小块那样。她用左手握叉。右手在她膝间放着。我父亲往自动赌博机里投了一枚十芬尼的硬币。吃钱机，我母亲说道。自动赌博机在一闪一闪的。数字开始不停地滚动。我可以按键了。我们开车去谢尔施泰因给天鹅喂食。我母亲坐在一长椅上。我父亲把装有干面包的袋子递给我。通常情况下我母亲会把这些干面包制成面包粉，为了把它们裹在肉排上油炸。回到家之后看电视。蒂尔是住在隔壁的男孩。他父亲是作家。晚上蒂尔会在他父亲的房门上敲五下。一次长敲，两次短敲，再两次长敲。他父亲用自来水笔在写字台灯上击打两下。这就是他父亲的回答。蒂尔把门打开。可以进来吗，父亲大人？他问道。可以，可以，父亲回答说。洞穴儿童令我毛骨悚然。他们独立生活在山洞里，身边没有父母。《特勒梅克尔和特勒敏辛》太幼稚了。我喜欢《施托弗尔和沃尔夫冈》里的客厅。从周一到周五播出的节目有：《长途货车司机》《水下冒险》《沙农破案》《水上警察局》《伊莎尔十二岁》。在二台播出的节目有：《54号车请报到》《联邦调查局不负责的案件》《塔米，房船上的女孩》《你听见南风了吗？它在向你耳语》。如果有人做错了事情，我们不再对他说“笨蛋”，而说“戴比·沃森”。他们都是来自示罗牧场的牧民。牧场位于蓝山脚下。我特别喜欢其中一名牛仔的声音。就是牛仔头领的声音。它和福里父亲的声音是一样的。只

是在没有祈祷的时候，我才可以看《伯南扎的牛仔》。我最喜欢亚当。亚当很快就不再和我们一块儿玩了。他和他的家人闹翻了，现在在某个地方独自生活。相比他我更为其他三个人感到遗憾。

在临近4点半的时候我尝试，第一次仔细辨别院子里的各种嘈杂声。从厨房里传来的声响具有独特的节奏，那时我在入住青年旅舍、膳宿公寓和宾馆时已经熟悉的声音，去年夏天我们在那家宾馆住了半周的时间。一种由盘子和其他餐具的碰撞声组成的混合音，其间夹杂着玻璃杯的叮当声，这些声响不断地起起伏伏，但却保持恒定的节奏，就像是一支管弦乐队在为合奏调音。光线变暗了，从内院慢慢升腾起灰黑的夜色，它看上去就像是我几分钟以来越来越明显地闻到的煎肉汁和甘菊茶的颜色，之后在傍晚时分，昏暗的走廊里弥漫着软膏和消毒剂的气味。

那一天肯定是星期四，如果不是我因睡过头而多耽误了一天的话。好事是我不必去音乐小组练习合奏，坏事则是我错过了流行歌曲交易会。

有时候我从医院厨房里听到一台收音机在播放。它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音量很小。可能是《深红的三叶草》（Crimson and Clover）那首歌。我今天甚至错过了流行歌曲交易会上的新曲介绍。我错过了所有的事情。

精神病院里有一名牧师和一名心理医师。牧师名叫弗莱施曼教士。心理医师名叫迈尔克林医生。周二我必须去弗莱施曼教士那儿，去迈尔克林医生那儿是在周四。见面的时间总是在上午九点半。两人给我讲述的都是相同的内容。他们谈起一块圆盘。至少我是这么想象的。一张纸片，一面平板，一块板材，一些光滑的东西，一些打磨过的东西。最好是厚木板，就是在圣诞节从仓库里取出修建铁路的那种。紧接着我应当介绍自己的生平。很快就十四岁了。人生的第十四个驿站。我禁不住想起了《蓝色力量》（Bluespower）专辑的那张白色唱片。马上我就为这种突发的奇想感到羞愧了。我身处一家疗养院，不是在贝托尔德或者齐默尔曼的庆祝会上。当其他人坐在班级里上课的时候，我却整个上午蹲坐在床上，尝试想象一些有别于《蓝色力量》

专辑的白色唱片的東西作為我生活的基础。我感到害怕，而且我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因為我覺得事情不只停留在那面平板、那块圆盘、那块光滑的板材上。一旦我的情况有所好转，各种补充和限制就会随之而来。弗萊施曼教士第二天就已判定我的状况有了好转。他在谈话中提到了原罪。他说每个人都受到了原罪的侵袭。就连他、弗萊施曼教士也不例外。同时我们又从原罪中解脱了出来。因为上帝为我们奔赴了死难。但是只有当我们接受他的建议，我们才算是真正解脱。我感觉仿佛自己从未听到过“建议”这个词。或许我也从未听到过它。不是真的听到过。不是从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那里听到过。“解脱”这个词我倒是经常听到。

我坐在弗萊施曼教士面前的一个高凳上。高凳有一个圆形，但并不平整的坐面。坐面上的漆都已经剥落了。这个高凳经常孤零零地立在弗萊施曼教士的房间里。它很少被使用。来这里的其他孩子都真正像是有病的样子，他们缠着绷带，往往压根儿下不了床。我也经常患咽喉炎。但我并非因此才来这里的。高凳就跟教堂法衣室里的长凳一样在这里立着。没有人把它从阳光下挪开。因为很少有人进入这个房间。教堂司事在工作日只是短暂地去一下法衣室。他在那里检查一下是否一切正常。他检查放在祭坛室出口旁边柜子上的那面锣。他检查锣槌上绑的毡布，目的是不让它发出太大的声音，在我们从祭坛室向外走之前他就要敲这面锣。管风琴弹奏开始了。全体教徒起立。我们必须撩起身上穿的法衣，为了不至于在台阶处把自己绊个踉跄。他检查门旁边的那个柜子。它是一个狭窄的柜子，里面只有电钮和保险装置。它们是给教堂钟楼的钟准备的。为了给钟上发条你必须登上钟楼。你得顺着梯子向上爬，一直爬到钟罩处。然后你得给齿轮上发条。大齿轮、中间的齿轮和小齿轮。教堂司事必须注意，当钟敲响的时候他正好不在上面。他从未镶玻璃的窗户向下面的教堂墓地望去。贴有辅弥撒者工作安排表的玻璃橱窗。修女们在修剪低矮的苹果树。落日余晖里的洋槐树枝。左眼下方裂开的伤口里的切屑。

我不停地从钥匙垂饰的双环上旋下那两把钥匙，其中一把是配我的日记本的，另一把是开我的小钱箱的。我仔细端详垂饰上我不认识的那个女人的照片。痉挛、疼痛、那两根缺失的手指，这一切或许在最后

才会慢慢减弱。它并不像麦克林火车模型那样绕圈，而是朝着一个终点运行。无论有无原罪。原罪就好比唱片上的一道划痕。人们不再愿意取出有刮痕的唱片播放。因为人们已经知道，这样的唱片马上又会弹回原处，或者卡住不动。人们必须从头播放。这就是原罪。唱针会陷入其中一个凹槽里出不来。在一个周五，当阿希姆在他祖母家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沿街而下去找他。五点钟我们去阿德勒影院看电影。那里上映一部黑白片。它是一部侦探片，十六岁以下禁看。但是在阿德勒影院人们不询问观影者的年龄。在正片之前没有电影新闻周报。也不播放动画片。也没有科教片。只加演一个小故事，讲的是一个总通过锁眼偷窥的男人。观众只能看到他所看见的东西。图像经常模糊不清，半遮半掩。一条裸露的腿。一只胳膊。没什么特别的。甚至还没有我和赖讷从贝尔林格夫人那儿偷窥到的多。但是这种感觉跟当时的很相似，当时赖讷的堂兄弟也在场，我们在一起抄写纸条上那段文字。然后侦探片开始放映了。一名死者躺在一间酒店房间的床边。五斗橱上摆放着一台电唱机。唱针卡在一个凹槽里。因此外面才会有其他房客敲门。其实人们只能看到死者的双脚。尽管如此我知道那个人死了。当然他也可能是在睡觉。但是谁要是躺在床边的地上，那他不是在睡觉。他是死了。唱片上有刮痕。他已经死了。这不再会对他造成任何干扰。如果我死了，明爱会那位女士就会找到那本被藏起来的标准A4笔记本。或许赖讷会问，他能否拥有我的单曲唱片。他们会把带推拉床的柜子和玻璃板下面压着披头士拼图的写字桌收起保存好，以供将来我弟弟长大时再用。录制在白色唱片上的《蓝色力量》专辑。唱片被划坏了。唱片套子上有烛蜡。上面刻有我的名字。在参加聚会前很快在唱片上写上名字，以免有人带来同一张唱片把它们搞混。

我不由自主地觉得为他人而死是那么的轻松，如此轻松容易的事情是值得去追求的。为他人奉献自己的生命总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这样做又把人们从那种闻所未闻的强制中解脱了出来，人们不必去看一些东西，却又无法对之提问。厨房地面上的血迹。落日余晖里的洋槐树枝。一直包含在愈合伤口的表皮下面的切屑。

我反复端详我钥匙垂饰上的那个陌生女人的照片。或许那个女人只比我大五六岁。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她既让人入迷又令人感到陌生。仿佛她来自另一个世界。但是即使是克里斯蒂安妮和玛里昂也令我着迷和感到陌生。原罪真的就像是唱片上的一道刮痕吗？正因为如此万物才会循环往复吗？即便是在疗养院这个地方？生命始于带有一道划痕的白色唱片。我主死去了，他是为了把我从划痕中拯救出来。我自己不能死。不能为他人，不能为我自己。我一直活到整张唱片都被划坏为止，活到白色唱片变成了黑色，活到我躺在床边的地上，而不再躺在床上。

阿明·达尔是耶稣还是基督之敌？我钦佩他是一种罪孽吗？我感到被他吸引是一种罪过吗？他会把我引向何方呢？我将通过圆盘跳跃，从桥上向下跳到行驶的火车上？我将逃离万有引力和班级记录簿里的过错记录？阿明·达尔把装有折叠好的淡紫色小纸条的签罐递到我跟前，我把手伸进去，抽出一个纸签，赢得了这个嵌有无名女人照片的钥匙垂饰。钥匙垂饰是一件稀罕东西。我的钥匙垂饰在背面有一道裂缝。原罪也是一道裂缝。

迈尔克林医生说，他作为精神病科医生无法直接为我开脱罪责，更谈不上为我开脱原罪了。迈尔克林医生很和蔼， just 却不善于跟孩子们打交道。他说话时使用的是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这样的一种语言自从上幼儿园以来我就再没有听到过。他跟我讲话时的措辞，仿佛我还在上四年制公立小学。好像是为了让自己能喘口气，他在谈话中间会用另外一种声区插入一些同样令我费解的短句。“强迫症”这个词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还有“反复”这个词。我觉得“神经病”这个词是我听错了。那些推动我想象力的东西都让我感到非常可疑。白色唱片，红色玫瑰。床边地上的死者。厨房地面上的血迹。在我们的就诊时间结束之后迈尔克林医生向他的女秘书口授了一篇报告。相反弗莱施曼教士只对上帝负责。同一名速记员只是把计时单递给他，然后他在上面不情愿地签上名字。反正他所挣的工资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更不是来自这家医院。那名女秘书名叫法尔勒。

迈尔克林医生想知道我是怎样想象时间的，比如当我想到下一周的时候，是否我把这一周看作是摆在我面前的小包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把它看成被划分成七个线段的一条直线，如果我想象的是这样的图景，是否我对月份和年份也有类似的想象，以及过去和将来在我的想象中占据何种位置。对所有这些问题此前我从未思考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不假思索地回答迈尔克林医生说，星期都是圆形的，准确地说略微椭圆形，其中星期天位于椭圆形的右侧，紧随其后的是呈逆时针方向排列的其他工作日。相反过去和将来位于一段笔直的路程上。过去在我身后，将来在我前方。整个路程合计需要走大约一百年的时间。迄今已走完了十三年半，它们已经在我身后了，剩余的在我前方，尽管我能够顶多清晰地预见五至六年的时间。空旷的田野就像在玩蹦跳游戏时那样向远处延伸。之后眼前的景象就变得模糊了。我出生之前的过去，也就是说之前的历史因其数千年的涵盖广度，以缩小后的比例被加以描述。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从现在至公元前三千年的这一间距不比我已经生活过的十三年半这一间距大多少。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在历史长河中要稍微清晰一些。基督出生前后的那段时间也清晰地显现出来，而在我们这个世纪和基督出生前后的那段时间之间则有许多模糊和空缺。

我注意到，我根本就没有看到将来在我前方，过去在我身后，而是从高处看到了中间的我自己，就像是棋盘上的一粒“哎呀—别—生气—了”棋子。但是如果我自己是下面棋盘上摆放的那粒棋子的话，那么谁又会从上面向下看着我呢？如果我是从上面向下看的那个人，摆在棋盘上充当那粒棋子的又会是谁呢？我问迈尔克林医生，其他健康的人是怎样想象时间的，以及总体说来哪一种对于时间的想象是最好的，但是他只是说，现在我们的第一次就诊时间结束了，我们在治疗初期就已经彼此非常熟悉了。

6点32分：我梦见自己骑着我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骑到了湖里，但却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从湖水里爬上一座浮码头。当我后来想要把这一经历讲给一个男人听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就住在那个湖边，我却无法再找到那座浮码头，因此他不相信我说的话。

6点37分：有人在走廊里叫喊，他称自己看到了一只睡鼠。我不知道什么是睡鼠，不知道在外面叫喊的那个人是病人还是职员。

6点41分：从后院传来餐具的碰撞声。窗户被打开又被关上。

6点53分：我又睡着了一会儿，感觉自己跟父母住在艾弗尔山的膳宿公寓里，就跟去年一样，当时整个夏天都阴雨连绵，我坐在带有坡屋顶的公寓房间的床上，尝试用手提收音机收听卢森堡广播电台的节目。

6点57分：麦芽咖啡和茶的味道。

7点02分：即使是在家里现在这个时候我也要起床了，因为那儿没有人现在这个时候起床，所以我为所有的人感到惋惜。我为我的空房间感到惋惜，为从我的房间里看到的外面的景象感到惋惜，为厨房感到惋惜，为从厨房里看到的仓库前面和天空下宽阔的院子里的那两棵洋槐树感到惋惜，当然也为我父母和明爱会那位女士感到惋惜。他们让我感到非常遗憾，以至于我想很快恢复健康。我想照人们所说的一切去做。我想做所有的事情。我也为阿希姆感到遗憾，他现在必须独自一人走在上学的路上，那条上学经过的路，我的自行车，课间休息时的校园，教室，我的座位，黑板，从我的座位眺望外面的景色，尽管我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我们的教室一直还被安排在教师停车场后面的亭子厅里。

7点06分：克里斯蒂安妮·韦根

7点09分：我必须给克里斯蒂安妮写一张明信片。我不会告诉她我在哪里，而是给她一种印象，仿佛我独自在某个地方度假。或许在这儿有那样的卡片，它们在正面上印的不是疗养院，或者里面印的也不是饭厅或者诊疗室或者长长的走廊。或许人们在卡片上看到的是花园。但是在花园的后面就会印有疗养院的名字，这会令人很难堪。如果明爱会那位女士来看我，我可以请求她给我捎一张我的披头士明信片来。或许还是不要披头士的明信片吧，因为她喜欢上了滚石乐队。

7点15分：洗漱。

7点28分：穿衣。我穿和昨天一样的衣服。我不是站着穿衣，就跟昨晚脱衣一样，而是坐在床沿上，这样做有点儿费力。如果我坐在左边的床沿上，我的对面就不会有人。这样我就能看到带有壁柜的那面墙壁。或许以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东西放到那里面。现在每个人都还是把自己的箱子放在床底下。我在想，我身后的其他人也在朝同一个方向看，因为这样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后背，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当所有的人向前方看去的时候，他们总是只能看到一个后背，除了我和那个男孩，他在我左侧坐在他的床沿上。他可能刚刚十二岁，让我感到遗憾，因为他在翻腾自己的箱子时是那样的笨拙，手在穿汗衫时会被卡住，仿佛汗衫太小或者有太多缝隙。或许他的妈妈还要帮他穿衣。在脱衣时也要帮他。有时在晚上脱衣时我会耐心等待，看能否听到外面明爱会那位女士的声音，她有时候会来照看我一下。赤裸地站在只点着写字台灯的房间里，等候明爱会那位女士再次把门打开，以便查看一下我的情况，这是一种让人激动兴奋的感觉。但是每次当我那样站着等候的时候，她都没有来。而在我穿好睡衣，或者甚至已经入睡的时候，她才会来。

7点32分：房间里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只有衣服的簌簌作响声能够被听到。有时箱子盖被翻开又被合上。它跟游泳或者做体操时更衣室里的情况不一样。许多人面色苍白，根本不能说话。在感到疼痛时他们甚至无法呻吟。他们的眼睛如此异样，仿佛它们在朝里看而不是向外看。在我穿袜子期间，我尝试让眼睛朝里看。它们做到了。我感觉眼睛好像在抽吸一些东西。然后我看到了我的自行车，看到它是怎样在湖上漂着。我还看到自己穿着短裤站在湖边。我浑身湿透，在那儿哭泣。天空变得黑暗了。

7点40分：早餐。一块果酱面包（草莓酱），一杯麦芽咖啡。

我必须服药。药片不允许被嚼碎，必须完整囫圇地下咽。药片卡在嗓子里很痛。我随后往喉咙里灌水，但是水的压力太弱。圣饼同样不允许被嚼碎。一旦圣饼被放在舌头上，人们就必须让它绕着自己旋转一圈，并用唾液把它弄湿，为了不让它向上滑梯并粘在腭部。如果圣饼

粘在腭部，人们只能费力地用舌头使之脱落。粘在腭部的圣饼就好比卡在肉里的刺一样。那样的话人们会不得安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去祈祷，而是尝试把手挡在脸前，用舌头使圣饼从腭部脱落。在艾弗尔山度假的时候当地就有厚厚的圣饼。它们不是白色的，而是具有范·蒂格伦咖啡馆里提供的薄饼的颜色，但是没有巧克力坚果馅。艾弗尔山地区的人们咀嚼薄饼。他们咀嚼圣餐饼。我把手挡在脸前，等着厚厚的圣饼在我嘴里溶化瓦解，为了最终能够把它咽下去。圣饼没有粘在腭部，而是固着在舌头上。

如果我闭上眼睛，阿明·达尔的北德语调就会和加略人犹大的沙哑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来自教士乡镇代表大会的舒尔茨先生在耶稣受难节那一天于三点钟在教堂里所说的就是这种混合音。教士和辅弥撒者赤脚从法衣室里出来，腹部朝下拜倒在祭坛前面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手摇铃铛被木质拨浪鼓所取代。管风琴的响声停止了。钟声飞向了罗马。一束光线透过饰有鹈鹕的窗户，鹈鹕用喙把自己的胸脯剖开，为了能够给它的幼鸟一些喝的。黑色的雨云朝铁路轨道方向漂浮。人们纷纷躲避到下跨道里。在马路对面的海姆德霍赫咖啡馆里，挂在通往后屋门前的珍珠门帘扯断了。布勒宁克迈尔商场玻璃柜里的陈列商品沉默无声。摆放在埃内舍音像制品店门旁边、插在透明薄膜里的单曲唱片封套在一扇摇头窗的穿堂风里晃动。对面是魏斯面包店，再往下是库恩自行车店，以及赛尔贝格食品店。

阿明·达尔站在房顶上，让我往很深的下面看。证明一下你的神圣，纵身跳下去吧。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从未说起过“神圣”二字。我只是违犯过教规。我的最后一次忏悔是在四周前。我之所以连续一个星期每天早晨在上学前都要去布道教士那儿做弥撒，是因为我也想得到一些教堂中跨里平放的木质大十字架上摆放的板状巧克力。在那种场合我并不理解他为何想向我们传教，我们已经相信自己并不是生活在位于德国北部的少数派宗教教徒聚居区，那里只有沼泽，没有工业和商场。那是阿明·达尔的故乡。阿明·达尔摆脱了离心力。他克服了疼痛感。他穿过玻璃门跳跃。穿过窗户。跳到火车上。他一直在运动。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他在欧洲所有的首都都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相反别人的目光却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的不仅有弗莱

施曼教士和迈尔克林医生的目光，而且还有我父母、我的老师、我的同班同学的目光，就连嵌在我钥匙垂饰上的那名我不认识的流行女歌手的目光、医院护士的目光以及其他患者的目光也全都压在我身上，那些患者还全是孩子，穿着睡衣和毛巾浴衣的胆怯的孩子们。

在星期天三点到四点之间的医院探望时间里，我和其他几名患者在走廊里闲荡，因为有人来探望我们会令我们很难为情。因为我们其实不愿意有人来探望。我们极力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我们不属于那些孩子之列，他们的胳膊骨折，患扁桃腺炎和盲肠炎。我们站在走廊里，希望不会有人来。同时我们又希望，还是有人来探望我们。如果有人来，那么我们希望他不要抚摩我们的头，不要把我们的头发弄得蓬乱，不要给我们带来任何让人难堪的东西，比如随便一本青少年读物或者一个印第安人造型。尽管有时候我很想把我的宝藏箱或者由棕色的塑料动物组成的小动物园搬到这里。我根本不会再玩那些动物，只是偶尔看看它们，或者为食肉类动物搭建通道，想象当老虎和狮子在通道里穿行，而人们就站在离它们很近的地方时会是怎样的情形，因为我反正从未真正透过狭窄的带栅栏的通道感受过那些塑料动物。我们在走廊里玩汽车四重奏纸牌游戏，与此同时陌生的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从我们身边走过，寻找他们要探视的房间。

我想到了星期天晚祈祷结束之后的游戏。有时候我母亲坐在附近，我父亲必须为她掷色子，就像明爱会那位女士替我小弟弟掷色子那样，我弟弟甚至连棋子也无法继续挪动。电唱机上正在播放一张威利·施耐德（Willy Schneider）的唱片，有时也会是我母亲喜欢的佩里·科莫（Perry Como）的唱片。像小矮人一样的棋子在一张德国地图上移动。当其他人掷色子的时候，我在仔细观看纸板盒上的那幅图片，一个湖泊，湖的前景是芦苇，对岸是不认识的一座城市。我父亲在喝一杯葡萄酒，他先是向明爱会那位女士，然后再向我母亲举杯祝酒，我母亲身旁放着一杯甘菊茶，但是她因为胳膊坏了不能自己把杯子送到嘴边。其实我的年龄已经太大了，不适合再玩这种游戏。我弟弟的年龄还太小。但是这种游戏好像令明爱会那位女士感到很开心。她熟悉所有的城市，给我们讲述那些引人注目的商店和风景名胜，以及她肯定已经品尝过的地方名菜。她说也有一种游戏，在玩这种游戏的时候

候人们旅行穿过整个欧洲，还说我在圣诞节或者过生日时可以指望玩上这种游戏。我无法拒绝，因此干脆什么也不说，只管埋头掷色子，结果没有得到数字6，而又是数字2。我父亲问道，那种欧洲游戏到底有什么好处，听他这话我就知道，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他已不会给我们买礼物，而是由明爱会那位女士代劳，就跟以前我母亲一样，也就是说我将会在圣诞节或者过生日时得到那种欧洲游戏，尽管我的年龄对玩那样的游戏来说已经太大了，然后我必须在星期天晚祈祷结束之后和明爱会那位女士以及我父亲一起玩这种欧洲游戏，还有我的弟弟，他从一开始就哭闹纠缠，想去找我母亲，但却被明爱会那位女士拦住，为了不让他过于迅猛地奔向我母亲，并尝试爬上她那条患病的腿。唱片上的威利·施耐德唱道：“你如此精疲力竭，你并非一无所有，把忧虑倒进一小杯葡萄酒里，把你的忧伤也连带倒进去，仰起头来，鼓足勇气，把满满的一杯酒一口气喝干，这是聪明之举。”我想象有这么一杯葡萄酒，人们把他的忧虑就像镁粉一样倒入酒中。人们不是真的喝这杯葡萄酒。它就像一个魔术。它就像化学课上的一次实验。它就像是神圣的化体。水变成了葡萄酒。忧虑被倒进酒里。忧伤也连带被倒入。然后唱片上开始播放《所有的日子都不是星期天》那首歌，这也挺合适的，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明天才又要上学。所有的日子里都没有葡萄酒。但是最糟糕的是他下面的唱词：“如果我以后死去，你应当思念我，也包括在晚上，在你入睡之前，但是你不许哭泣。”唱片上的威利·施耐德看上去就像我们的数学老师荣格博士，他在课上给我们讲述远征俄国的历史。为什么当有人死去的时候我不许哭泣呢？无论我觉得我父母有多讨厌，我都不希望他们死去。就我来说明爱会那位女士可以死去。并非我希望如此，但是这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母亲不能死。就连我父亲也不可以。我不知道如果那样的话，我在空旷的客厅里应该做些什么。然后女秘书们和工人们、坐办公室的先生们和教士就会前来，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给他们提供些什么，或者在正好有人死去的时候到底该不该提供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待到很晚，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让人给他们做点儿什么，比如面包配黄瓜和奶酪，外面天会黑得吓人，我不得不和我弟弟单独过夜，树枝将会以非常奇特的方式敲打窗玻璃，我会感到特别伤心，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独自生活，因为我宁愿在我父母之前先死，这样我就不必经历这一切，这样我就能把一切都保留在

记忆当中，就跟现在一样，即使德国旅行游戏对我来说太过幼稚，即使我其实不想在圣诞节或者过生日的时候得到欧洲旅行游戏，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存活于世，那么我也愿意在圣诞节或者过生日的时候得到欧洲旅行游戏，也愿意在星期天祈祷结束之后玩欧洲旅行游戏，听威利·施耐德或者可能更愿意听佩里·科莫的唱片，因为科莫更年轻，长得像给我们上德语课的候补教师布泽，因为科莫的音乐也没有那么悲伤，在听的时候我不必想到死亡，想到死亡和哭泣，但是我父亲不喜欢佩里·科莫，因此我们也只有一张佩里·科莫的单曲唱片，它插在我的儿童唱片专辑里，但是却有一张威利·施耐德的满转密纹唱片。我父亲说，威利·施耐德的歌也不是什么高品质的音乐，但用来消遣娱乐却正合适。这些我都无所谓，最主要的是在我父母死去的时候我不必看到他们，最主要的是我先于他们而死，因为我害怕看到他们断了气躺在那里。因为我不知道人们该做些什么，是否人们应该去吊唁或者最好不去，是否人们应该在胸前画十字还是先不那样做，是否人们应该哭泣还是不哭，或者人们究竟该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是否弗莱施曼教士知道我是辅弥撒者。他不向我打听这个，他不问我是否去教堂做礼拜，根本不问我是否信仰天主教，但是或许他什么都知道。他给我讲述童话和童话里的数字，童话里的那些特殊数字也是对耶稣基督信仰里的特殊数字，不会阅读和写字的普通百姓能够以这种简单的方式记住圣经里的那些特殊数字。迷途和平庸的灵魂不知道，来自《上帝启示录》里的那七处创痕或者上帝的七个精灵是什么意思，因此他们编造了《七只小山羊》或者《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为了让自己回忆起那些数字，并记住它们的含义。因此我不必感到羞愧，如果我想从疗养院图书馆里借阅童话书的话，因为我在书里总能重新找到一些我们的信仰。这时候他就会注视着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应当把那本童话书借出来，因为我自己觉得那本书挺幼稚和无聊的，就跟在星期天晚上玩的德国游戏一样。

主教堂里没有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雕像。它甚至在尖塔上连一个十字架都没有。它之所以叫主教堂，是因为它是这个地方最古老的教堂。如此古老，以至于它以前曾经是天主教教堂。教堂前面站着穿超短裙的女孩们，她们向我喊道，我应该出钱请她们每人喝一

杯。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家，坐在我的房间里，透过洋槐树枝看到外面附属建筑上淡红色的墙砖和黑色的石板。谁要是信仰新教，他就不必去进行忏悔。他也不必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他不可能是辅弥撒者，因为那儿没有辅弥撒者。大多数人仅仅是在行坚信礼之前信仰新教。之后他们就会退出宗教课的学习。阿希姆得到了一只防水手表，表壳四周有可调节的环圈。我们俩都不清楚，这些环圈是用来做什么的。据说在潜水的时候人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校准水深。同时人们为我举行了坚信礼仪式。我给自己选择了格奥尔格作为教名。施洗者约翰内斯，使徒保罗，屠龙者格奥尔格和鼓手林戈·斯塔尔。除了林戈，披头士乐队成员都信仰天主教。滚石乐队成员都信仰新教。普洛考·哈勒姆摇滚乐队：天主教。奇想乐队：天主教。小脸乐队：新教。很遗憾。谁人乐队：也信仰新教。很遗憾。冬青树乐队：天主教。门基乐队：美国教派。

为什么我父母每隔六个星期就要开车去另一个牧区忏悔？我父母犯下了什么罪孽？是因为他们阅读了《茉莉花》《两人生活》和连页未被截开的《性爱百科全书》？我看了《地下》，先于我父母把这些书册藏到衣柜后面。我父母先于我把他们看的书册藏在衣柜里的床上用品下面。我究竟是怎样想到那里去翻寻的主意的？我要搜寻什么呢？搜寻我父母的罪行？在化体仪式期间和在那之后的那段无比漫长的时间里，我随手翻阅赞美诗集，往前翻到供成年基督徒忏悔前反省用的《忏悔镜》章节处。我不熟悉这个世界。它对我来说很陌生。它不是人们作为孩子可以习惯的世界，而是一个完全异样的、遥远的和无法企及的世界。这个世界就跟我的第一本读物里的世界一样陌生。这本读物名叫《我的世界》。但是它也不是我的世界。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它不是我的世界。它是一个充满农家少年的世界，还有头和手都特别大、把金黄色的头发向两边分开梳的农家少女。他（她）们穿着短上衣和民族女装跑过一幅幅插图，观看农夫播种和铁匠给马上马蹄铁。他（她）们的母亲穿着一一直拖到脚踝的长裙。长裙上系着一条围裙。

某一名纳粹画了上述这些图片，美国军管政府教育和宗教事务办公室于1949年2月1日对外公布了这些图片。或许人们认为，除纳粹的审美

之外，人们起初无法用其他审美来苛求德国儿童。就跟图片上那些举着胳膊、围着沙箱蹦来蹦去、嘴里喊着“小声苏茜小声”的大脑袋大手的孩子们一样，成年人也必须借助于他的忏悔镜向自己发问：我轻率地（或者恶意地）吻过他人吗？——触摸过他人吗？——让别人触摸过或者吻过我吗？——我滥用了婚姻吗？——我通过不知羞耻的目光犯下罪行了吗？如果人们轻率地或者恶意地吻了某人，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在福尔克马尔·齐默尔曼父母家的地下室举行的聚会上，人们在拧开酒瓶时的接吻或许是轻率之举。或许那是人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相互亲吻，但在当时却无任何感受。既没有兴致也不感到恶心。既无好感也无反感。为了给其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人们必须长时间接吻，因此这种行为也不是短暂的感受。我感觉到那个女孩的舌头。感觉到她的嘴唇。感觉到她的鼻子。舌头对着舌头。嘴唇贴着嘴唇。一切都必须是这样的。埃米尔、米娅、里奥、丽洛，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或那样的。法西斯主义儿童。沉湎于不纯洁的想象和欲望的成年人。我们在地下室聚会上站在他们中间。天棚下方悬挂着彩带。有人偷偷往甜食里掺入了带芥末馅的夹心巧克力糖。

我们辅弥撒者站在祭坛室的右侧，紧挨着通往法衣室的门，能够看到专供女性就座的长椅，它们同样摆放在教堂的右侧。前两排是修女们的专座。坐在她们身后的是孩子们，从第六排开始坐的是年轻的姑娘们，在她们后面就座的是单身女性。在弥撒临近结束的时候人们排起了长队去往受圣餐者坐的长凳。如果女士们在那里下跪，那么她们仅仅是通过几级台阶与我们分隔开来。我们必须从眼角斜视，这会令我们感到费力。缓慢地朝受圣餐者坐的长凳迈步，在受圣餐者坐的长凳旁边下跪，双手合十在那儿等候，最后把头后仰，闭上双眼，吐出舌头，为了接受圣饼，女孩或者妇女们能够使用所有上述行为举止以表现自我，对此我不理解，在当时1969年夏天不理解，但是后来也不理解。修女们以不一样的方式接受圣餐，我把这种情况归结为她们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她们每天都要去参加圣餐仪式，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了天主。我从未思考过她们也有父母和朋友，甚至连这个问题也不曾让我考虑过，即是否她们只是把头发藏在了帽子下面，或者是否人们剪去了她们的头发。这些年轻女士们脸上的痛苦表情吸引了我，在她们垂下目光之后，她们小心翼翼、迟疑不决地张开

嘴，她们头部的运动就像是在刽子手面前所做出的那样，只是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已，她们的目光迷失在教堂半圆形后殿。

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在给克里斯蒂安妮·韦根写一张明信片。一个雨没完没了下个不停的夏季，我都在蹑手蹑脚地围着她家的房子转悠，在位于高楼之间的那块正方形的挤满了人的游乐场上闲荡。我的右胳膊上了石膏。它让我感到发痒。绷带闻起来有霉味，但不算令人讨厌。玛里昂用一支紫色的彩笔在绷带上画了一颗心，并在下面写道：保持微笑。托马斯画了一个基尔罗伊形象，加比在旁边写了“米克·贾格尔”字样。米克·贾格尔这个名字虽然只是写在边上，因此我在把胳膊稍微向内转动的时候没有看到它，但尽管如此这个名字还是使我卷入了一场冲突。现在我无法再写上披头士乐队或者约翰·列侬的名字了。这使整个世界颠倒了过来。披头士乐队曾经是排名第一的乐队。然后才是所有其他的乐队。它们是上下级关系。这种情况就跟天使的等级一样。所有的乐队都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儿，它们在榜单上时而名次上升，时而名次下降，但是总是保持在它们固定的世界秩序里。米克·贾格尔想要更多的东西。米克·贾格尔就是魔鬼。米克·贾格尔想像上帝一样伟大。甚至可能更伟大。因此布莱恩·琼斯在四天前淹死了。对此克里斯蒂安妮或者玛里昂可能会说些什么呢？或许现在滚石乐队的其他成员都感到害怕了。或许现在他们明白了，他们正在走向何方。米克·贾格尔就如同马丁·路德。他分裂了统一和秩序。加比把这个名字写在了我的石膏上。我带着这个名字走过了整个阴雨连绵的夏季，与此同时披头士乐队在录制他们最后的歌曲。为什么我没有反对加比的举动呢？为什么我表现得那么软弱？我背叛了一切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东西。为了一个我甚至都没有爱上的女孩。我爱上了克里斯蒂安妮·韦根。加比仅仅是克里斯蒂安妮的女友。

汉斯-于尔根来医院探视我半个钟头。他给我带来了一本书。它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写的《玻利维亚日记》。他现在有一辆小型摩托车，只不过不是“克莱德勒”牌的。阿希姆有一辆“克莱德勒”牌摩托车。使用说明书里这样写道：如果两个骑“克莱德勒”摩托车的人在街上相遇，他们会打一下近光灯信号相互问候。当弗莱施曼教士看到我喜欢阅读时，他也给我带来了一本书。书的名称是《上帝喜欢的人》。他

自己在看《每日祈祷书》和《黄金传说》。迈尔克林医生在我们的中午会谈结束之后，把我领到一条与他的诊疗室分开的昏暗的走廊里。那里立着两个狭长的书架。他打开天花板上的灯，说我可以在这里给自己挑选一本书。在市立图书馆人们禁止我进入成人阅览区，尽管我已读完了所有的青年读物。在州立图书馆人们甚至连借阅证都不想给我办理。牧区图书馆里有埃查德·沙普尔、赛珍珠、格特鲁德·封·勒富特、伊芙琳·沃、西格里德·温塞特、切斯特顿和格雷厄姆·格林的书。赛珍珠是一名传教士的女儿。其余的全都是改变宗教信仰的作家，我母亲这么说道，人们无法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企图比教皇更教皇。从扫罗到保罗。即使在晚年人们也能够皈依天主教，这对我来说一方面是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很奇怪，因为人们是以怎样的方式活到那个时候的呢？作为有罪的人？圣马林医院的教士是一个很晚才从事教会工作的人。很晚才从事教会工作的人不需要学希腊语，因为否则的话在他们结束学习之前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夏天在我们医院的教士要回他在韦斯特林山的家乡两个星期的时候，高级牧师就会作为代理来顶替他。高级牧师是一个小矮人，他曾经当过海军随军牧师。在一个星期天下午他来拜访我父母。我母亲烤了草莓蛋糕。我们坐在花园里。我和我弟弟在玩一个画有彩色条纹的新的可充气皮球。高级牧师特别喜欢那个皮球，于是我父亲从我们手里拿走皮球，把它送给了牧师。父亲答应说我们应当在周一得到一个新的皮球。但是到了周一那种皮球买不到了，我们得到的是其他一些东西。当我祖父在玩猎兔球戏时面临要输的危险时，他会把整个棋盘掀翻。我父母会说：老年人有时候跟小孩一样。在玩猎兔球戏时人们必须用一个6点骰子去射杀动物。

在切·格瓦拉《日记》的前言里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样写道：切把自己的死亡看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游击战过程中视死亡为可能的事情。他把自己看成是革命战士，丝毫不为自己的生命而担忧。我担心自己的生命吗？我不考虑自己的生命。过去已不再重要。未来有效的只有直接因素。什么时候我会再次获准出院？什么时候吻了第一个女孩？吻了谁？是克里斯蒂安妮·韦根吗？不久之后我确实被她吻过。在参加完一次庆祝活动之后，我们站在加贝斯波尔纳大街和沃尔克大街交汇处的拐角。当时刚好10点钟。她被一个朋友接走了。他是高年级

的一个男孩。是开车接走的。天气很冷。庆典期间我们没有一块儿跳过舞。在开酒瓶的时候她也没有帮忙。她随便问了一些关于英语或者数学方面的问题。然后那辆接她的汽车就来了。我说了声“再见”，就在刚想离去时她吻了我。是用紧闭的双唇。轻轻吻了一下。接着又吻了一下。汽车停了下来。克里斯蒂安妮上了车。为了理解这样的场景，人们会问自己，个人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以及是否人们最好蔑视构成其生命的尘土，转而献身于革命或者信仰。拯救一些事物。最好是拯救整个世界。通过变成人身。从前我就是人身。开始部分已经完成了。当我穿过寒冷的黑夜沿着加贝斯波尔纳大街向下走的时候，我感觉克里斯蒂安妮·韦根的双唇贴在我的嘴唇上，同时我也知道情况有些不对。我不能简单地享受那些亲吻，无法独享那些亲吻。但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克里斯蒂安妮年纪不比我大。可为何她比我更熟悉人情世故呢？我知道犹大之吻的含义。我知道，人们用一个吻也能出卖某人。但是克里斯蒂安妮的那两次亲吻要更为复杂。那些亲吻不是简单地表达它们原本应当象征的事物的反面，即背叛而非爱情，而是指向另一方向。指向另外两个方向。克里斯蒂安妮向开车接她的来自高年级的司机表明，生活中存在这样的场景，在这些场景里她是有经验的一方。她也向我表明，她能够吻我并在同一时间离开我。为了另外一个人。她那样吻我，就如同加比在我的石膏胳膊上写下“米克·贾格尔”字样。

费克斯和福克西在为优帕冰激凌做广告，如果他们特别喜欢某物，他们就会在故事里使用“优帕费达贝尔”这个词。优帕冰激凌的味道几乎跟和路雪的一样。道姆面包店里有优帕冰激凌出售，再往前走两个拐角会看到福尔面包店，那里卖的是和路雪冰激凌。我母亲在暑假外出购物时，有时会捎带买一份家庭包装的鲍克勒侯爵冰激凌回来作为正餐后的甜点。冰激凌盒包在报纸里，回家后被放入冰箱。我在吃的时候总要注意，把草莓、香草和巧克力一块儿舀在勺子里。我母亲取出茶匙，茶匙的前端是扁平的，就跟在冷饮店里的一样。有时候我也会就着冰激凌吃华夫饼干。面包师道姆的妻子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他。然后有一天她又站在柜台后面，向我们出售模拟香烟，人们不允许吸这样的模拟香烟，而是必须向里面吹气，这样香烟前端就会冒出一团烟雾，它看上去跟真正的卷烟冒出的烟一样。后来我母亲无法再自己

购物。明爱会那位女士从不捎一份家庭包装的鲍克勒侯爵冰激凌回来。有时我们会得到零用钱，以便给自己买一根冰棍。

在弗莱施曼教士送我的《上帝喜欢的人》那本书里，我读到了圣徒维尔讷这个人，他作为长工在一个农庄干活，是那里唯一的基督徒。当他在复活节想去教堂参加圣餐仪式的时候，其他长工对他说，他不应该自己把圣饼吞下去，而是应当偷偷把圣饼吐在一块手绢里给他们带回来。圣徒维尔讷当然没有这样做，因此其他长工把他头朝下绑在一根木桩上，让他在木桩上悬挂了三天，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可以让他把吃进肚里的圣饼吐出来。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于是他们把圣徒维尔讷的血管切开，让他流血致死。但是即使圣徒维尔讷早已死亡，从他的血管里一直还有鲜血流出。长工们现在尝试，把切开的血管重新堵上，但他们没有成功。他们站在已经没过脚踝的血液里，鲜血一直在不断流淌，最后所有的人都溺亡在血液里，农庄在血液中沉陷，人们根本看不出那里曾经有人生活过，因为它现在看上去像一个湖泊，鲜红的血液变成了蓝色，就像清澈的湖水一样。只是在每年的圣徒维尔讷纪念日，湖水才重新染成红色。

圣徒赫尔曼·约瑟夫以前是一个极度贫穷的男孩，他不得不总是饿着肚子去上学。一次人们赠送他一个外观漂亮的苹果，但是他没有吃掉苹果，而是把它送到教堂里的圣母雕像面前，把苹果递给了襁褓里的耶稣，圣婴伸出手来接过了苹果。还有一次是在冬天，圣徒赫尔曼·约瑟夫在去学校之前又来到教堂里的圣母雕像面前。这时候圣母看到他沒有穿鞋。她问他为何在严寒中赤脚行走，圣徒赫尔曼·约瑟夫回答说，他父母没有钱给他买鞋，于是圣母指给他看教堂里的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石头松动了。圣徒赫尔曼·约瑟夫发现石头下面有那么多钱，他终于能够用这些钱给自己买鞋穿了。但是我如果是他的话我不会接受那些钱的，因为如果人们带着钱从教堂里出来，那么这就意味着人们撬开了教堂里的柱形捐献箱，或者从别人忘在那儿的钱包里取了些钱财。父母也会问人们从哪儿弄到的这笔钱，并说他们当然不会用这笔钱买鞋，而是人们应当立刻把钱送回去，就像当初阿希姆过完生日之后，他把他的旧表送给了我，而我还在当天晚上就必须把表还回去。

但是或许人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是否某人是神圣的还是不是，是否他干脆接受钱财还是宁愿分文不取。

当迈尔克林医生把污渍画摆到我面前的时候，起初我不理解我应当在画里看到些什么。但是我预感到我不能简单地拒绝，不能说我索性什么也辨别不出来。随便想出一些东西，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不被打扰，这么做肯定也一样是错误的。迈尔克林医生会立即识破这一点，然后他会很生气，那样的话我就必须在这家疗养院里待更长时间了。因此我在考虑最好的做法是什么。这时我想起了鲍迈斯特明信片。原本我在舍费尔艺术品店总是只为我的艺术明信片收藏找寻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只是店里出售的此类明信片太少。迄今为止我只找到了四张达利的、两张马克斯·恩斯特、两张德·基里科的和唯一一张坦吉的明信片。最多的是维利·鲍迈斯特的，因此如果实在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也总会捎带一张他的明信片，尽管我不是真正喜欢他的画作。但是现在我第一次明白了，抽象派绘画艺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明白了鲍迈斯特其实什么也不想描述，明白了标题就是简单的标题，绘画就是简单的绘画，第一次我想念自己的房间和那两个插有明信片的纪念册。纪念册里有这么一张图片，它的名字叫《跳跃者》，它看上去很像迈尔克林医生递到我面前的第一张卡片。我经常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在纪念册里放置鲍迈斯特的作品，我把一张阿尔普的图片在纪念册里颠倒过来粘贴了好几个月。迈尔克林医生好像对此无所谓，因为他说我完全可以转动卡片，但我不会那么做，因为这或许仅是对我的一次考验。同时我也不能干脆什么也不说。因此我用手指着第一张卡片说道：跳跃者。跳跃者？迈尔克林医生反问道。跳跃者，我又说了一遍。迈尔克林医生取出下一张卡片，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想起了《热闹的山坡》，它是鲍迈斯特另一幅作品的名称。但是我不能这么说，因为它听起来很怪。于是我说道：一处有很多人的山坡。一处山坡？迈尔克林医生问道。是的，一处山坡，这是……我知道什么是山坡，迈尔克林医生打断我，把下一张卡片摆到我眼前。《焦虑》，我说道。虽然这是康定斯基作品的名称，但或许迈尔克林医生更看重内心感受。可惜的是他总共只有十张卡片，我只需在脑子里把我的两个纪念册过一遍，就能给他列举出大约二十多个名称。《未来之梦》，这又是鲍迈斯特的作品。相反我却说：下一个梦。然后是

《分手——童年》，我把它转述成“儿童的分手”，它又是康定斯基的作品。很晚之后我才想起了克利的作品：《高架桥的起义》《叽叽喳喳的机器》，但或许这样也好，克利作品的标题太显眼了，迈尔克林医生肯定也知道它们。因此我决定在面对最后一张图片时自己想出些什么。这张图片比先前所有的图片都更加色彩斑斓，图片上挤满了小动物和怪兽。但是这些怪兽不是恐怖画上的那种，而是看上去不太一样，它们身躯肥胖，长有很多条腿，几乎显得更加危险，尽管它们很快又会变回赋予它们形象的颜料渍。在图的上端我辨认出两只蓝色的螃蟹，它们分别握着一把绿色的大剪刀，剪向两个手执蜡烛或者导弹或者柱子的黑色精灵，而在画的下端，两个小矮人一左一右在挤压一个奇怪的红色形状，形状的中间被一些看似髌骨的东西固定着。如果人们不把那些红色形状看作腿，而是当作背景，相反把红色之间的白色看成是形状，那么就会产生一个身体，它系着一条蓝色的腰带，有一根阴茎，不，它更像是一个卵巢，因为有两条输卵管向内部伸展，此外一个半圆形也暗示出阴道口。这个身体叉开双腿，现在我也辨认出作为大开领的三角形，就是人们在两个乳房中间所看到的那种，那两个黑色精灵把图片上女人的头围了起来，把一个注射器从头顶插进她的颅骨，那两只螃蟹不再用剪刀去抓他们，而是兴高采烈，用它们众多的蟹腿鼓起掌来。我为那个女人感到遗憾，她张开双腿躺在那里，使一个孩子降临人世，一些绿色的东西顺着大腿从她的阴道里涌出，变成两只孔雀很快跑过一块草坪。我根本无法使自己从这张图片里挣脱出来，想一直不停地看下去。它要比鲍迈斯特或者克利的画作更好，或许不是更好，但跟他们的不一样。产褥期里的女人，最后我这么说，尽管我根本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产褥期，是否人们在产褥期才生孩子还是已经生了，因为人们其实是在医院的产房里生下的孩子，或许这里描述的也是一次流产，就像我的弟弟或者小妹妹那样，他（她）先于我弟弟两年出生，然后在医院里死去了。

每隔十四天，往往是在一个星期二，我都要乘4路车去火车站大街的“魔术国王”商店，观赏橱窗里新摆放的那些供人寻开心的小玩意儿。

霍夫巴尔特比我小一岁。他父母因工作调动来到我们这座城市任职。霍夫巴尔特一家住在位于富尔克大街的一栋大房子里。他家的房子不

比我们家的大，但总感觉要更气派一些。那是一幢别墅。在霍夫巴尔特家可以喝到酸奶。霍夫巴尔特有两个姐姐，她们都已经上大学了。此前霍夫巴尔特上的是寄宿学校。他的头发可以想留多长就留多长。他父亲几乎跟我祖父一般老。他很少在家，因为他要领导一家工厂。我父亲也领导一家工厂，但是他的工厂规模要小得多。因此他也几乎总在家和我们共进午餐。我父亲的工厂属于他个人所有，而霍夫巴尔特的父亲只是领导那家工厂，并且总是被调动工作。一次周六上午放学之后，我不必立即回家，就跟着霍夫巴尔特去了他家，当时客厅里坐着一个男人，客厅与阳台之间隔着巨大的玻璃立面。霍夫巴尔特上楼去他的房间里取皮球。那个男人招手示意我到他身边。他喝着法国白兰地。在长沙发茶几上放着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作证》。书名上方印着著者的名字“霍夫巴尔特”。你读书吗？那个男人问我。我点了点头。你想要一本吗？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但是不想显得没有礼貌，于是就又点了点头。他从茶几上拿起样书，起身走向他的写字柜，站着拧开自来水笔的笔帽，在衬页上写下他的名字。人们在学校里教你们的都不对，当他把书给我时他这么说道。霍夫巴尔特拿着皮球从楼上下来。我把书塞进书包里。回到家里我把它给了我父母。他们把书摆到书架里。周五我想去接霍夫巴尔特出去玩，但是他的课外补习老师还在家里没走。他母亲想领我一块儿去厨房，但是他父亲又坐在客厅里，招手让我过去。那本书你看了吗？我点了点头。情况的确如此。我翻看了那本书，但没看懂它讲的是什么。我阅读了书的目录，但是目录也没看懂。怎么样？他问道。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有些太难了。霍夫巴尔特点了点头。当然太难了，他说。但是我想给你讲述一些事情。到这边来。我来到组合长沙发跟前，坐在他指给我的那个沙发椅的边缘上。人们经常揪住阿道夫不放，霍夫巴尔特说道。但是对他的指责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美国人解放了我们的说法也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然后霍夫巴尔特的父亲给我讲述了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对这些事情我只能听懂一半。美国人当初开着坦克沿格拉德巴赫的主干道冲了下来。吉普车远远地跟在后面。他们显得特别害怕，对每一种声响都格外小心。走在最前面的总是黑人。在一个牲口棚里一头母牛撞上了厩门，于是他们纷纷跳进沟渠里隐蔽起来。当从铁路巡道工破旧的小房子里传出一声动静时，他们用机枪对准小房子不停地扫射，直到房子被子弹打得全是窟窿为止。事实证明那仅仅是一只猫

闹出的动静而已。而那只猫还活着，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它欢快地朝铁路路堤方向跑去，那里一直还停放着运输鞋子的火车车厢。然后美国佬们向孩子们分发口香糖和巧克力，向女人们分发咖啡。

在我坐在教堂旁边的围墙上嚼口香糖的时候，一位妇女问我是否我是一名美国佬。迈克来到我们班上二年级。他是一名美国兵的儿子。他母亲是德国人。她在一起车祸中丧生。因此他跟他母亲的父母住在一起。他至少比我大两岁，但是因为他德语讲得不好，人们把他下放到了我们班级。他有我没见过的连环画册，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会捎来从营区贩卖部买来的巧克力和冰激凌。

亲爱的切·格瓦拉：

请原谅我潦草的字体，但是我是在一张从算术本里撕下来的纸上写的这封信，并且是钻在被窝里写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我原本必须要睡觉了。其他人都已经睡了，但是我还醒着。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但是我也不想回家，因为那样的话我又要上学，可我不愿意再去学校。我倒是乐意见到其他的人，但是一想到克尼尔施的化学课或者舍沃的生物课，我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反正我都要留级，这一点很清楚。在这方面人们什么也做不了。你也无能为力。然后我会去另一个班级，和全都像我一样留级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当时还把我父亲征召入伍，那个时候他不比我现在大多少。当然我对武器一窍不通，甚至都不曾像阿希姆那样拥有过一支气枪，但是我认为，人们可以学会所有的事情。但我不能对准人开枪。或者向动物开枪。我一直都想自己有一只动物。我曾经养过一只仓鼠，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后来养过一只投奔我们的流浪猫。但是在我弟弟出生之后它必须离开，因为猫会坐在小孩的脸上，使他们窒息而亡。我不知道为何它不再到我们家的花园里来，尽管我一直还继续给它把牛奶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一次我从去往格雷泽尔贝格方向的高速公路桥上走过，看到桥下躺着一只被车碾死的猫。我相信它就是总是到我们家来的那只猫。我不相信我父母特地把它从桥上扔了下去。或许它只想穿过马路。我从书上读到，你们也过圣诞节。我根本就不知道没有父母的人们怎样过圣诞节。在分发完礼品之后牧师来到我们家做客，

我们则在一旁摆弄礼品。然后我父母去参加天主教圣诞子夜弥撒。客厅还没有被清理干净，我梦想能得到新的玩具。第二天早上去完教堂之后我就又马上能够玩我的玩具了。我最喜欢的是骑士盔甲和宝剑。当我夜里和赖讷想离开的时候，我把宝剑也打包装好。一个人行走在空旷的针叶林房屋大街上，那种感觉会很奇怪。当时的情景叫人感到阴森森的，就跟在野营地值夜一样。我还想说的是：我加入了童子军。但是我们没有学会怎样生火的正确方法，也就是说用石块和类似的东西生火。但是我知道了蒙古包是什么，能够在小溪边洗漱。

迈尔克林医生对我的出生感兴趣。我向他讲述，我是晚了将近三个星期才来到世上的，出生时皮肤黑得像烧炭一样，听到这里他给我讲了一个南美印第安男孩的传奇故事。因为担心母亲可能会堕胎，在他身体的四肢几乎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这个男孩就作为胎儿把包裹他的子宫膜刮破，把鲜血收集在他张开的小嘴里，为了每月一次在好几天里把血液再吐出来，以便以这种方式蒙蔽他的母亲，让她相信自己每月都有正常的例假。迈尔克林医生带着某种享受在讲这个故事，就跟弗莱施曼教士讲述殉难者的献身一样，只不过弗莱施曼教士紧接着会问我是否愿意死亡，而迈尔克林医生则想知道我拒绝出生的理由。我不明白他的提问。我有能力拒绝出生吗？我心里在想。我会吗？弗莱施曼教士的思想要离我更近一些。既然人们无法回避死亡，人们也可以有意识地将死亡运用于某一件事上。比如就像切·格瓦拉所做的那样。但是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弗莱施曼教士截获了我写给切·格瓦拉的信件。这是对神明的亵渎，他说道，因为人们只可给唯一的一位死者写信，这位死者已经复活成为天主。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察到了我初露端倪的良好意愿。他认为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这总体上不是什么坏事。关键在于人们怎样继续发展。然后弗莱施曼教士谈起了圣徒麦考瑞斯，他作为隐居者归隐沙漠。一天他难以抑制去往罗马的愿望，为了在当地医院里护理久病衰弱的患者。弗莱施曼教士停顿了片刻。我注视着他。那么，你认为这个主意怎样？我感到愧疚，因为我从未有过类似的想法。我只想着自己。我想从疗养院里出去，不想再回到学校，也不想再回到家里。我思考了片刻，或许我也可以去往另一个城市，为了在那里护理久病不愈的人，但是做这样的事情我年龄太小，也没有经验。此外我还有上学的义务。这个主意是他神圣的一

个标志，我回答说。弗莱施曼教士摇了摇头。不，恰恰相反，这是自私和高傲的一个圈套，它是魔鬼撒旦促使他想出的主意。他神圣的标志在于，他能够看穿这一诡计。他把自己捆在门梁上，此外又用两个装满石块的麻袋压在自己身上。带走我吧，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他朝撒旦喊道。这样的姿势他保持了三天三夜。埃及的苍蝇就跟我们这儿的蜜蜂一样大，它们用叮咬来折磨他，这样的虫叮比我们这里蜜蜂的蜇人要更加危险。最后他浑身布满了血迹和肿块。当另一位隐居者问他，他为何这般折磨自己，他给出的回答是：我折磨的是折磨我的人。我犯下了如此大的错误，这让我非常惊恐。我毫不犹豫地就把撒旦的灵感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如果照顾其他人不一定是善举，那么反过来杀害其他人或许也不一定就是恶行？

迈尔克林医生想知道，在我生命当中我最先回忆起的是什么。起初我在想，他的意思可能还是在指那个印第安男孩的故事，这样我就应该让我的回忆尽可能回到孕育在子宫里的情形，但是然后他又解释性地补充说，人们根本不可能回忆起出生后的头几年，如果人们真回忆起来了，那么它所涉及的仅仅是所谓的掩护性回忆。我喜欢“掩护性回忆”这个词。它令我回想起捉迷藏游戏。掩护性回忆是那样的地方，对于这个地方而言有相应的词，但我不知道怎样拼写它们。乌普或者霍拉。在这个地方人们不会被击退。我陷入思考。我想起了那个溺亡的信仰新教的男孩的故事，以及那个在这之前越过花园围墙向我这边张望的男人的故事。但是在这之前还有一些事情。我的自行车。我眼前浮现出我的蓝色的带有支撑轮的小自行车。它靠着原先洗衣间的门停着，门被人用砖砌住了。那是在复活节前后。水仙花都已经开了。我手握三张明信片站在我们家花园里的那棵莱茵克洛德李子树旁边。那些明信片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明信片上画的是米老鼠和唐老鸭，颜色鲜艳，很有立体感。突然我禁不住要呕吐。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就吐到了手里的卡片上。我母亲从房子里跑出来，拿着一粒几乎像手心那么大的淡绿色的药片，她把药片从包装薄膜里挤出来，把它塞进我嘴里。药片看上去就像是泡腾片，我父亲有时用它来洗脚。没错，迈尔克林医生说道，这是一种典型的掩护性回忆。这话怎讲？我问道。这就是说，这个故事，就像你刚才给我讲的那样，从未那样发生过。这种情况就好比是，成年人问人们一些事情，仅仅是为了紧接

着说人们所说的都不对。人们应当忏悔，承认所有的罪过，但是教士仍然继续追问，是否还有更多的罪孽，只是人们将它们略去未说而已。即便人们想起曾经犯下一宗可怕的罪过，人们也无论如何不能将之吐露出来，如果在这一刻屈服的话，下一次教士就会更加刨根问底，最后人们只得供认那些从未做过，甚至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人们必须保持坚定，否认自己有罪。跟教士们打交道我有经验，但是迈尔克林医生想从我这儿知道的却令我茫然困惑。您这话什么意思？我再一次问道。发生过其他一些事情，对那些事情你不能或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些其他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不愉快的。因此你让自己回想一个对你来说显得更加愉快的场景。但是呕吐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是的，肯定令人不快。但或许其他事情会更令人难受。或许那样的回忆来自你还不会说话的时期，或许来自你被断奶的时期。断奶？也就是说当你母亲不再给你喂奶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被哺乳过没有。你瞧，我指的就是这个。你不知道这件事。这很正常。但是你头脑里的一些东西对一切都非常清楚。哪怕是对过去很久的事情。

原则上迈尔克林医生和弗莱施曼教士两个人非常相似。弗莱施曼教士手头有那本书，我所做过的一切在书里都有记载。在迈尔克林医生那儿也有这样的东西，只是它存在于我的脑海里罢了。赖讷的父亲必须为他驾驶的卡车写行驶日志。一切都必须记得极其仔细，不能与事实有半点儿出入。迈尔克林医生指的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个药片，迈尔克林医生说道，那个药片是圆形的，类似于一枚5马克的硬币那样的形状，不是吗？是的，可能还要再大一些。没错。还有什么东西这么大这么圆呢？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这么大这么圆？我不明白他的提问。这就跟那些我从未搞懂过的应用题一样。为什么他不直接问他想知道些什么？我耸耸肩表示不知道。比如说是一位正在给婴儿哺乳的母亲的乳头。我的脸红了起来。我想起了那份折叠起来的剪报上小野洋子的乳头。没错，它们就这么大。但是她哺乳吗？她有孩子吗？或许女人的乳头总是这么大。约翰·列侬的乳头跟我的一样小。我不了解女人的乳头。但是药片是绿色的，我说道。不知怎么的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固执，尽管我刚刚还感觉不舒服。没错：药片是绿色的。因此我们也称之为掩护性回忆。为了不使人们回想起乳头，药片必须是完全另外一种颜色才行。但是如果它是完全另外一种颜色的药片，迈

尔克林医生怎么会想到乳头呢？正如圣徒麦考瑞斯所意识到的那样，是撒旦的主意让他去罗马，并在那里护理久病不愈的人。但是我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呢？什么是真正的回忆、什么是一种掩护性回忆呢？谁是圣徒、谁又不是呢？什么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什么不是呢？我想起了溪流边的那棵垂杨柳，我总躲在树上看那些小册子，它们是我偷偷从毛厄夫人的食品店对面的那位瘫痪的文具商贩那儿买来的，我把它们藏在衬衣下面，偷偷带到后面的旷野上来。我不知道，为何我禁不住正好想起了这个。法尔克、西古尔德、蒂博尔、阿基姆。

在我们的下一次会谈中迈尔克林医生问我，为什么我表现得如此不自信，对此是否有一个解释的原因。我不清楚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回答说，过去几天里这个问题总是在困扰着我，即人们怎样才能搞清楚一些话的真正含义，想了解某人情况的是魔鬼还是上帝。迈尔克林医生眯起眼睛看着我。这样下去人们无法生活，他说道。这样的问题人们必须交给哲学家们去思考，因为人们自己只会通过此类问题而得病，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受到迫害，揣测在任何事情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陷阱，人们把这种疾病称作妄想症，妄想症不容轻视，因为许多害了这种病的人最后都变得非常粗暴。虽然他们是出于绝望，但尽管如此还是充满暴力，因此谋杀案件就不是什么特例了。此外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因为现在病人真的会遭受迫害，这恰好证实了他对于世界的观点。治愈妄想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我来说不再继续思考这样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弗莱施曼教士总是问我，一名圣徒所做的这样或那样的事迹到底是上帝所愿还是撒旦所致，当我说起这个的时候，迈尔克林医生摇了摇头说，他会请求教士参加一次我们共同的会谈。

第二天下午和弗莱施曼教士的会谈就开始了。会谈时法尔勒夫人也在场。或许她应当作为证人出现，或者最后应当由她来决定谁是会谈双方赢的一方。弗莱施曼教士径直朝我走来，抚摸着我的头，这样的举动他此前从未做出过。我听到了些什么？他用亲切友好的声音说道，可是这声音听起来仍然带有威胁的口吻。你绞尽脑汁地在思考，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来自上帝的意愿什么是出自撒旦的主

意？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是……，这时候迈尔克林医生试图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弗莱施曼教士用一个手势迫使他不说话。我知道，我知道，他不耐烦地说道，思考这样的问题是值得称赞的，恰恰是在你这个面临抉择的年龄。人们为你举行过坚信礼仪式吗？我点了点头。你给自己挑选的是哪个教名？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就是那个屠龙者。这个名字很好。非常好。它也会帮助你去战胜疑惑和无知之龙。可是……，迈尔克林医生再次尝试插话，但是弗莱施曼教士又一次打手势表示拒绝。你必须知道，我的孩子，我们的信仰被打上了理性的烙印。人（也包括你自己在内）不是大自然的偶然产物。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给了他区分善恶的理性。理性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与我们的宗教信仰毫不相干，甚至与我们的信仰相对立的东西。恰恰相反，唯独在我们身上理性才会有家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它被赋予了我们，因此我们能够完全信赖它，而正好是那些自我标榜理性的人，却总是不断地质疑理性，陷入彻底的不自信和无知。但是现在请允许我说两句，弗莱施曼教士，迈尔克林医生接过话茬，如果您的评论应当着眼于心理学方向的话，那么我想极其严厉地驳回您所说的话。我可能不大明白您的信仰，但是我担心，您应该也不大了解我所信仰的科学。听到这话弗莱施曼教士只是笑了笑，接着说道：一种相比我们的信仰几乎还要拥有更多信仰原则的科学：无意识、恋母情结、神经病、精神变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坚信我的造物主及其耶稣基督形象。但是够了，尊敬的迈尔克林医生，我们不想忘却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也不愿对我们的小患者要求过分。我没有感到被苛求。相反，我第一次感到轻松和自由，跟通常一样，当成年人互相争吵的时候。这给了我一种平静和自信的感觉。对我们的小患者提出过分要求的是您，迈尔克林医生说道，是您让他感觉不自信，把他推入内心的矛盾。弗莱施曼教士把身子转向我：情况是这样的吗，我的孩子？我迟疑了片刻。我经常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我认为想要去做的事情是撒旦的主意还是上帝的意愿。撒旦，迈尔克林医生说道，从我所听到的情况来看。您大概是想否定这个世上的邪恶吗？弗莱施曼教士问道。但是不能把邪恶汇聚到一个人身上，说他威胁和诱惑他人。而是？而是，而是……这是一个阐释问题。但是人们不能使这样的事情个性化。我们不是在中世纪。但是，弗莱施曼教士用一种突然非常甜美的

声调说道，为了向一名年轻人、一名年轻的病人阐明，世上都有哪些危险在窥伺着他……这些危险当中的一种就是您！迈尔克林医生喊道。您跟撒旦的距离比他们想象的要更近。这……这样的言论……我绝不容忍这样的指责，弗莱施曼教士说道，让他迄今为止像保护伞一样在我头顶伸开的那只手垂了下来，然后冲出了房间。迈尔克林医生耸了耸肩。很遗憾。我应当知道这样的会谈不会有任何结果。

第一次有人把我描述为病人。于是我在思考，我可能得的是什么病。当我起床时我经常感到眩晕。早晨我什么也吃不下。总之我很少会感到饿。在我入睡之前我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奇怪的抽搐，那种感觉就像是穿透全身的触电一般。然后我醒着躺在床上，不知道自己是否睡过觉了，不知道那种电击只是幻想还是在自己身上真的体验到了它。此外我会做各种噩梦。我总是梦见自己在一处高高的山隘上，在一条长长的隧道前面，跪在马路中央，在玩一辆火柴盒小汽车。看样子我是不害怕突然会有一辆汽车从隧道里冲出来。炽热的太阳照在沥青路面上。突然我手里玩的玩具汽车滚向了一边，朝着路边的斜坡滚去。我跟在玩具汽车后面爬行。它越滚越快，一头栽下斜坡。我不敢向斜坡下面的深渊处探看，只是把手伸了出去。不知什么东西拖着我往下拽，就像是有一股吸力。我醒了过来。这样的梦我经常做，至少已做过十次了。此外我每年至少要患两次咽喉炎。原本扁桃体必须要被切除。我鼻子出血，后脑勺有一块去不掉的，但是人们看不到的结痂。我最希望的是人们不得不给我切除扁桃体。或许人们也只是在等候时机，因为如果扁桃体发炎的话，现在还不能做手术。但是目前我在吞咽时不再感到疼痛了。

你怎么会想到我们打算在这里给你摘除扁桃体？迈尔克林医生问我，当我在下一次接诊时间里向他讲述我的猜测时。我考虑过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因为我经常患咽喉炎……你知道这样的手术是怎样进行的吗？我的儿科医生克莱尔博士夫人说过，是通过全身麻醉的方法。不，在你这个年龄人们不太愿意这么做。你现在十四岁？我快十四岁了。你有过射精吗？迈尔克林医生总是提起一些通常情况下人们不谈论的事情。这让我感到难为情。但是这种难为情跟弗莱施曼教士问及第六戒律时的难堪不一样。我们在生

物课上有过短暂的讲解，也就是说射精，我也清楚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在辅弥撒者那儿有人曾经对我说过，到了某一特定的年龄女孩会出血，男孩会分泌水分。当时我充其量不过是无名小卒，甚至可能仅仅是屎壳郎而已。我从六岁就开始做辅弥撒者，一次当主教来我们这里参观并做弥撒时，他带着圣餐来看望辅弥撒者，也给我递了一块圣饼。但是我不想亵渎神灵，因为我还没有参加过圣餐仪式，所以我干脆摇了摇头，但紧接着我又害怕起来，担心主教会认为我犯过罪孽，将会充满罪恶地跪在祭坛前面。我担心他把圣饼递给我，是为了查明我是否无罪。我永远也不能完全确信自己无罪。给教堂司事做帮手的克莱门斯一次在更衣时取出两块圣饼，当着我们的面吃掉了它们。我们所有人都吓得要命。然后他说道，那两块圣饼没有被净化。尽管如此整个上午我一直都心有余悸。在圣餐课上教士谈起了那些在一起光着身子游泳的男孩，跟弗莱施曼教士一样他也问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对此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想象男孩们在一起光着身子游泳，这让人感觉很奇怪。在野营的时候我们从未赤裸着身子。我们身上总要穿点儿什么。游泳裤。内裤。那肯定是些信仰新教的男孩子，我心里想道。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教士的问题。最后这个话题也没有再继续下去。只是那些男孩在游泳时光着身子。但是这样做是不对的，这对我们来说显得太理所当然了，以至于它根本不必被提及。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是一种罪孽，但是我们猜到了这一点。关于第六戒律教士没有说更多的内容。剩余的我们在忏悔镜里读到过。我不太清楚，那名年龄稍大的辅弥撒者所说的“分泌水分”指的是什么意思。他指的不可能是一般的小便。我等到最后，以便观察一下自己。然后我在厕所里第一次仔细地端详了自己的阴茎。在阴茎底面伸展着一道细微的红色疤痕。疤痕从睾丸一直向上延伸到包皮顶端，我没有把包皮向后拉，因为这样会令我感到疼痛。或许在我比现在年纪小的时候，人们在那个地方给我做了手术，只是我把这事给忘了。我无法再回忆起那么多事情。那道疤痕让我感到害怕。可能因此在我身上不分泌水分。我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一下伤疤。它不再使我感到疼痛，就跟我膝盖上的那道伤疤一样。在包皮的前端处有一种舒适的感觉。我拿起阴茎，小心地用一件套头毛衫的袖子去摩擦龟头，毛衫挂在洗衣机上面以便晾干。那种感觉就跟抚摩一样，只是要更为强烈。然后我就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我感到眩晕，但却很舒服。之后会有一点儿疼痛感。生

物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述了在夜里发生的射精现象。这一点人们从睡裤上的污斑将会觉察到。但是我的睡裤上没有污斑。然后在来自九年制中学五年级的一名男孩死去之后，我们的体操老师跟我们坐到一起，给我们讲述了一些我听不大懂的事情。在此期间我知道了什么是手淫，即就是说用一件套头毛衫来摩擦包皮。但是我并不理解，为什么那样人们会死亡。但是那个男孩就是在手淫时死去的，哈根博伊默尔先生说道。因为他往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但是为何他要往头上套一个塑料袋呢？这就跟不穿游泳裤游泳一样奇怪。迈尔克林医生一直还在等我的回答。不，我说道，我还没有射精过。我在心里问自己，他究竟为什么想知道这个。或许这又是一次测验。但是我知道，女孩会出血，男孩会分泌水分，因此我又这么补充说。你说些什么？迈尔克林医生问道。出血？分泌水分？这难道又是一个弗莱施曼教士讲的故事吗？不，这是一个年龄大点儿的男孩对我说的。啊哈，那么你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吗？不是很明白。好了，这也没那么重要。血和水。最后几句话他更多的是说给他自己的。但是他说的有道理。这听起来就像是《圣经》故事里的话。在圣徒勃拉修斯的女人那儿血变成了牛奶，耶稣把水转化成了葡萄酒，为什么不能让血也变成水或者水变成血呢？当罗马军团士兵朗基努斯用一支长矛挑开了在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的侧腹时，血和水从耶稣体内流了出来。这里涉及的也是一种奇迹，对此人们应当做出证明。但是我从未明白，这种奇迹到底何在。或许奇迹在于，在耶稣身上水和血这两样东西都存在，他扮演了男人和女人两个角色，他集两种性别于一身，而在我们身上只有水，在女人身上只有血。要是我知道会出血的话，我就不会再在一件套头帽衫的袖子上摩擦我的阴茎了。我会更害怕去触碰我的阴茎了。我很想因为那道疤痕询问迈尔克林医生，但是我没有勇气。我害怕那或许根本就不是伤疤，而是一种疾病，那样的话人们就必须给我做手术了。我把这种情况想象得比切除扁桃体还要更糟。你知道扁桃体是什么样子的吗？迈尔克林医生问道。我摇了摇头。就像剥皮的鸡蛋那样。但是它们是肉做的，显得血淋淋的。它们看上去就跟睾丸一样。我们学过男人有两个睾丸，但是我可不愿去碰它们，可实际上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睾丸，又小又圆，但是或许它在里面分成两半，就像果核那样，然后它就成了两个睾丸。给处于青春期阶段的男孩切除扁桃体，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跟象征性的睾丸切除术没什么两样。

简直太残暴了。我不太清楚迈尔克林医生是什么意思。您的扁桃体还在吗？我问道。是的，谢天谢地。克莱尔博士夫人总说，摘除扁桃体根本就没那么糟糕。但是她也是一个女人。可能对女孩来说情况没那么糟。阉割术指的是人们被切下阴茎。这样人们的声音就会变得很高。我们总是模仿这种情况，当我们的睾丸被皮球砸中，或者当平日有人不小心踢到了我们的睾丸。起初人们会感觉很不舒服。那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疼痛。但是睾丸处一点儿也不疼，真正的疼痛更像是在头部。人们会感到眩晕，感觉上不来气。人们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之后人们就会模仿那种高亢的声音。

在共同会谈之后的第一次约谈时间里弗莱施曼教士来到房间里，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原本担心他会生我的气，但是他只是说道：我们今天想把那个问题再深入交谈一下，即人们怎样才能查明，那件事涉及的是上帝的意愿还是撒旦的灵感。他抽出三张纸递给我。纸上描述的是来自布尔戈斯的圣徒约翰娜·罗德里格兹的故事。现在你把这个故事通读一遍，紧接着我给你提几个问题。这三页纸用打字机密密麻麻地敲满了字。我可以在字句下面画线吗？我问道。是的，当然可以，弗莱施曼教士回答说，并给了我一支黑色的记号笔。故事很无聊。一个六岁的女孩把自己关在一座小教堂里，让自己扮演修女的角色。在表演过程中所有可能的圣人都显现在她面前。然后还有圣母玛利亚，最后是耶稣本人。耶稣问她：你喜欢我吗？在这里我第一次用笔做了画线标记。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是一个圈套。我从不向某人提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向克里斯蒂安妮·韦根了。但是上帝却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他可是无所不知的。这样看来它肯定是一次考验了。圣徒约翰娜回答得很巧妙。她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或者什么是喜爱，但是如果要我喜欢上谁的话，那他将是耶稣基督，即在这座小教堂里的那个小男孩。这样的回答我永远也想不到。现在都想不到，更不用说在六岁的时候了。六岁那年，当时我连学都还没上，但是我已经是辅弥撒者了。然后圣母玛利亚来到女孩身边，问她是否想嫁给耶稣。这也可能是撒旦设下的陷阱。人们能和耶稣结婚吗？修女们都是基督的新娘，但是她们也和他结过婚吗？这一次约翰娜的回答又很巧妙：我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价值，这个漂亮的小孩不会喜欢我的，她说道。我觉得回答此类问题的窍门在于，首先什么也不想，就

像人们所祈祷的那样：天主，我不配让你来到我的屋檐下面，但是请你只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变得健康。

迈尔克林医生问我，我对什么感到厌恶。我回答说：表皮。什么样的表皮呢？他想知道。可可饮料表面的薄层。他仔细地看着我。我父亲也对此感到恶心，我说道。甚至比我更厌恶。每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他都禁不住要作呕。很有意思，迈尔克林医生说道。你知道“包皮”这个词吗？当然知道。你对包皮也感到厌恶吗？为什么呢？我这是问你。当我把包皮向后拉的时候，它会让我有疼痛感。但是我不这么说的。我害怕人们也会发现那道疤痕，这样我就必须做手术了。在生物课上普尔波先生说，我们应当把包皮向后拉，并把它清洗干净。我试着那样去做，但却感到疼痛。因为包皮收缩霍夫巴尔特必须上医院。之后人们给他做了包皮环割手术。总归这样做更好，他说道。霍夫巴尔特的包皮少得可怜，阿希姆说道。那样你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在火车站售货亭买了《他》杂志。向弗莱施曼教士打听一下什么是圣包皮吧，迈尔克林医生说道。我试着记住这些话。

这个江湖医生，弗莱施曼教士说道，当我把迈尔克林医生的话告诉他的时候，总是煽动年轻人。他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我们谈到的是神圣的道德。那是天主的结婚戒指。但是你不应当用这些东西来折磨你年轻的头脑。这些都是事关信仰的神秘的宗教仪式。对你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找到正确的路径。

迈尔克林医生问我，我对幸福是怎样想象的。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应当索性说出我的想法。幸福就是内疚，我说道，因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但是为何会这样想呢？我不知道，不知怎的幸福就意味着有人不幸福。或者我很快就不再感到幸福，不知什么事情就会发生在我身上。这让我感到害怕。也就是说，你也不会去渴望一些东西？不，渴望是有的，当然有了。但是？我说不清楚，幸福是一个蠢傻的字眼。我不大明白它应当意味着什么。那么你更愿意不幸福了？不知道，可能是吧。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出任何事情了？是的，至少我不会感觉那么不自信了。

格尔妮卡得知，那个浅绿色的亚麻布面的盒子有何意义

我有一种印象，你更愿意让自己不幸福。

格尔妮卡？

怎么了？

你不是真的去过那里，不是吗？

不，不是真的。为何这么问？

随便问问而已。但是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想到什么？

想到我据称更愿意让自己不幸福。

我是怎么想到这个的？仔细看看你自己就知道了。

我指的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举止。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悲情和可怕。尽管如此你好像在整个戏剧性事件中感觉挺舒适的。一旦随便某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自行发生，你就会马上害怕起来。

你这么认为？我不知道。

不，不，你知道的。

可能是我太多愁善感了，总是沉湎于不复存在的事情。

或者事先就已为此悲伤，因为它将不再存在。

可能吧。

原来如此。

但是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仅仅是我一点儿也不相信自己。我简直太漫不经心了。因为粗心大意我已经丢掉或者舍弃了所有的东西.....比如那个装有拉威尔全套钢琴作品的浅绿色的盒子，作品全部由莫妮克·哈斯（Monique Haas）演奏。那是一个亚麻布面的盒子，盒子正面上有一幅特意贴上的卢梭画作的复制品，画是斜着剪切下来的，颜色浅淡，甚至不太清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画面上是一条河流的风光，尽管我当时不是特别喜欢卢梭，不知怎的我还是把那幅画和音乐联系在了一起，小船、树木、天上的云彩，仿佛曲子就是为此而谱写的。莫妮克·哈斯弹奏G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的方式是多么独特啊，演奏前十八个节拍时很少使用踏板，然后使用频率稍微加大，尽管有时候我也在想，一开始弹奏技艺不怎么对路只是特殊情况而已，因此乐音听起来那么压抑和苍白无力，就像卢梭画作的复制品那样褪了色，就像那个盒子的亚麻布面一样呈淡绿色，人们在轻声部位也会听到这种情况，就像弦乐器演奏者在拉动弦弓一样，这一切都合而为一，包括屋顶下的那个房间，在那儿我第一次听到这支协奏曲，总而言之第一次听拉威尔的作品，然后不知在什么时候我竟然把那张唱片给了别人，在某个地方为了区区几个马克，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因为我正好听了更多柯川（John Coltrane）的音乐或者是其他原因，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我自己意识不到，只是事后才意识到，这干脆让我感到不自信，让我在面对整个人生时缺乏自信，就仿佛我在关键时刻总在跟自己较劲一样。

行了，不要夸大其词了。反正人们也无法保留所有的东西。

是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保存下来，但是如此重要的东西还是应当保留的。为什么轻易就把它给人了呢？

但是在此期间你肯定有录制好的激光唱片了？

是的，但是那个盒子，那张唱片，和弦乐器演奏者拉动弦弓的声音混在一起的咔嚓声，连带失去光泽的卢梭印画，当时的冬天.....

确切地说此事涉及的不就是这个吗？

涉及哪个？

涉及当时的冬天。因为你无法留住冬天，你就紧紧抓住这么一张愚蠢的唱片，反正你也不会持续地欣赏或者聆听它。这样的唱片总归只会放在你的书架上闲放着。

是的，也许你说得对。但是人们必须要有所寄托才行啊。

现在问题又针对我了。

不，真的不是。不。或者也许吧。我也说不清楚。

你当然说不清楚了。

我该说些什么呢？

你什么也不应该说。但是或许你应该问一下自己，为何你一方面极度多愁善感，另一方面又总是显得不满。

我根本就没有表示不满意。至少没有总是不满。

但你对我确实不满。

我不知道：是不满吗？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为那样的一张唱片你可以流出眼泪.....

你认为我从未因为你.....

不，不，天哪，当然你会的，因为你受尽了我的折磨。

不，我根本不会那么做的。

当然你会那么做。

不，真的.....

况且那张唱片，那个浅绿色的、正面上贴有褪了色的卢梭画作的亚麻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拉威尔的钢琴作品，灌唱片的根本不是莫妮克·哈斯，而是弗拉多·佩勒米泰（Vlado Perlemuter）和霍伦斯坦

（Horenstein）。在莫妮克·哈斯录制的唱片的正面有一张拙劣的图片，图片上是一个被逆光照亮的喷泉，喷泉笼罩在一片黄色的光线之下，这喷泉让你回忆起当时疗养大楼前面的那些喷泉，让你回想起那些常见的俗气不堪的明信片，因此你总是把唱片套子背面朝上地随便放着。根本就不存在失去光泽的河流风光和法国。因为那个盒子你是在很晚之后才在某个地方买的。那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了。此外佩勒米泰一开始演奏时也很少使用踏板，在这方面他甚至比莫妮克·哈斯还要更坚决。五十年代的法国乐派就是这种风格。人们当时就是这样演奏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的。

是的，你说得对。

在哪方面说得对？

其实人们可以对一切不再拥有的东西感到高兴。

突然这样？

是的，因为这些东西在记忆中能够更好地组合在一起。要相配得多。

主要是更俗气。更伤感。

就我来说是的。你说出了这些话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知道，我在这件事上也一点儿不自信了。

哪件事？

在回忆方面。

那又怎样？这很不幸吗？

不，正好相反，这让我感到轻松了。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轻松。

汉堡的虚伪和嘲讽

韦德尔斯几乎还未接受洗礼，就陷入了改变宗教信仰者的困境，这样的人受以下错误思想的欺骗，即认为通过接受其他信仰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或许人们会憎恨信仰不同的人，但是改变宗教信仰者肯定会遭到人们的鄙视，因为他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这样他就总是受到嫌疑，也能随时背叛他新加入的宗教团体，或者只是出于卑劣的动机混入了新的教团。但是韦德尔斯错误地解读了这些符号，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皈依得还不够，未能足够远远地把原先的生活甩到自己身后，因此他四十二岁的时候又额外改了名字。他认为通过这一举措能够消除人们对他的最后责备，但事实上他却使自己受到怀疑，最终成为人们鄙视和嘲讽的对象，因为人们指责犹太人的不恰好是这种反复无常和机会主义吗？使他们改变信仰仅仅是托词，是一只为了迷惑人而伸出的手，其目的仅仅在于为现有的拒绝辩解，因为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即在耶稣受难节替背信弃义的犹太人祈祷时是不应当下跪的，这与通常代人祈祷时的做法不一样。对此给出的理由却是，犹太人在基督面前是下跪了，但是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讥讽他。为什么这是一个让自己不下跪的理由，显得不是很有说服力，相反却揭示了真实的反犹太主义背景，也就是说把犹太人的信仰标识为虚伪和讥讽，最终标识为无信仰（背信弃义）。韦德尔斯踏进了这一陷阱，他无法通过捐赠、注册转让、遗产，简直无法通过任何手段把自己从陷阱里解救出来。于是在21世纪初，就像是对韦德尔斯更名和洗礼的讽刺性模仿，那个鄙陋的停车场也被他名义上的基督教兄弟们重新命名，为了即使是在一百年之后也要向他表明，给一些东西重新命名和改名是多么的鄙陋，而且它们看上去确实多么鄙陋。因为那个韦德尔斯除了把他的财产、他的别墅、他的艺术品收藏和他的基金遗赠给汉堡人之外，他还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他是犹太人，一名被同化的、接受洗礼的、更过名的犹太人，此外他还是单身汉，一生未婚，对艺术有着敏锐的鉴赏力，因此可能有同性恋关系，除了这些他对汉堡人做

了些什么？作为唯一的回报他对汉堡州政府提出过什么要求？要求他的艺术品收藏要保存完整，并在他的别墅里对公众开放。但是即便是他的这一要求也遭到了拒绝。部分收藏品被出售，别墅被用作交际场所。然而即使是在1936年，当公立学校教师和汉堡州政府委员卡尔·尤里乌斯·威特（他在任职的前两年里解雇了六百多名不受纳粹欢迎的教师）在韦德尔斯的别墅里庆祝他的“社交文艺晚会”时，那幢别墅一直还叫“韦德尔斯别墅”。后来汉堡印刷工人和纳粹党同志弗兰兹·希尔佩特在给汉堡州政府的一份呈文里才使人注意到，“所谓的韦德尔住宅据说最初是以犹太人韦德尔或者韦德勒斯的名字命名的，这栋房子尚未被更名”。因为人们反正正在解散犹太人基金会，所以那幢别墅在“取消犹太街名的进程中”被更名为新乌鸦大街31号住宅，同年又完全不再对公众开放，这样威特就能够更加不受干扰地在那里庆祝他的“社交文艺晚会”了，为了以此从他的工作中恢复过来，他的工作除安排解雇事宜之外还在于，使汉堡各学校普遍走上纳粹尤其是反犹太主义路线，因此他从1949年开始领到了职业学校首席教师的退休金，两年之后又在一起诉讼中给自己争取到了教育局长的退休金，这样的退休金他一直领到1969年去世为止，因为正如他在诉讼审理中一再申明的那样，他“在内心不是纳粹者”，而仅仅是在外观、仅仅是在话语和工作方面是纳粹，在思想上不是，人们得到退休金安全是因为思想的自由，因为如果按照话语、工作和“社交文艺晚会”来评判人们的话，那么结果看上去就会很阴郁，因此人们更愿意按照思想或者良知来进行评判，尽管这种良知只能再次以话语形式来被表述，然后这些话语又与其他话语相矛盾，但是人们不要对此太过认真，因为最终还是真理获胜，卡尔·尤里乌斯·威特肯定“在内心不是纳粹者”，因为他1922年就已经是民族反犹太主义教师协会巴尔德尔的会长，两年后又代表德意志民族自由党（德意志人民党的“极端分支”）被选进汉堡州政府，在那儿他主要是发表反犹太言论，是黑—白—红阵线和黑色德国国防军的成员，1933年5月1日才参加德国纳粹工人党，因为当时是德国纳粹工人党掌权执政，所以在他1969年10月19日去世之前，他拿到的理所当然一直是教育局长的退休金，在1969年10月19日星期天，当纳粹者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作为联邦总理倒数第二天在位时，当商场纵火犯巴德尔、恩斯林、普罗尔和索恩莱恩等待对他们判决的复审时，当西格弗里德·韦德尔斯的艺术品收藏早已被拆散，因为早在

1952年西格弗里德·韦德尔斯艺术收藏中的“主要作品”就“出于文物保管方面的原因”被“转运”到汉堡艺术馆，出于“文物保管方面的原因”，就像人们把犹太人押往集中营那样，出于文物保管方面的原因，正如人们出于“德意志民族的考虑”将韦德尔斯的别墅重新命名并解散了他的基金会，正如人们后来出于“记忆文化的原因”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一个鄙陋的停车场，在那幢别墅被汉斯默克保险集团“一体化”之后，汉堡市先是摧毁了人们对韦德尔斯的纪念，最后再把那个鄙陋的停车场白白送给了他，反正那个鄙陋的停车场已经存在，对其重新命名不会花费任何代价，这一更名以极其玩世不恭的命名方式在一百年之后彻底毁灭了犹太人韦德尔斯，人们用了一百年的时间使其雅利安化和去除同性恋倾向，现在他只剩下一个可供人们安心纪念的名字，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跟他联系在一起了。但是一切现象都是没有自我和空洞的，不是生来就被创造的，它们没有持续的存在，没有终点，没有来去，它们无法用言语描述，显得无关紧要，它们就像肥皂泡，就像灯火的交织，就像水蒸气，影像，反射，一个梦，无法触及的放射物，水桶里的月亮，院子里的水桶，场地后面的院子，棋盘上邮票大小的分格，男孩房间里放在可抽拉床上的棋盘，房间的墙上贴着奇想乐队和谁人乐队的招贴画，房间作为一滴水里的反射倒影，水珠从一罐可乐里滴落，让所有的大海都漫过海岸。

再次闻到烧糊的可可豆味道

弥漫在行政巷上空的味道闻起来像是烧糊的可可豆。味道是从骨粉厂那边传过来的。街上现在一个人也没有。维尔贝克商店的院门被锁上了，冯克商店的卷帘门是放下的，邮局关门了，霍夫曼理发店里只有灰色窗帘前面那些套着假发的泡沫塑料脑袋，它们后面是三副空着的理发椅，角落里摆放着木质儿童座椅，这样的座椅我早就不必使用了，尽管红色的理发皮椅还太大了，以至于理发师不用额外撕下一张纸给我垫在头靠上。理个男士发型，我继续说道，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我学会了这么说，希望他不要剪得太短，不要剃去鬓角，要干剪不要湿剪，但是有时候他甚至连这个也不问，然后我会飞奔回家，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为了重新洗掉头上的臭味，看着镜中的发型我可能会号哭起来，尽管头发在我父亲和明爱会那位女士看来一直还太长了，而人们花钱理发就是为了把头发剪短，就仿佛我自己每个月都要请求理发师别那样做一样。

亚历克斯和戈特弗里德家陡峭的楼梯，狭窄的走廊，狭小的厨房，黑色的宫殿花园围墙，铁路路堤，带有广告柱的广场，下跨道，在马路另一侧是海默德霍赫咖啡馆，在晚上这个时候咖啡馆的门还是敞开的，尽管我不敢往里面看。对面是库恩自行车行，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新的自行车把手，那是白色的、配有长长的彩色塑料条带的把手，在哪儿也看不到车铃的踪影，这样的装置是被禁止的，所以只能在私下里销售了。阿希姆有一个车铃，但是它的声音令人心情烦躁，他这样说道。我们俩的都是向上转动的赛车把手。在我们骑车上学的路上，阿希姆给我讲述前一天晚上的电视节目，那样的节目我是不允许观看的。当他没有兴趣继续往下讲的时候，他就会说：剩下的你可以自己想象。我顶多可以在八点之后看“我是做什么的？”这样的节目。从不许看网球比赛和战争片，或者“伞、魅力和瓜皮帽”电视系列节目，就如阿希姆所言，尽管这些节目根本就不紧张刺激，而是幽默诙谐。

棕色的大众汽车。星期六下午。肥皂泡沫。绣球花。白色的。紫色的。淡蓝色的。那位先生伸出的断指的手。缺少的是中指和无名指。又闻到了从骨粉厂那边传来的味道。气味从我们家工厂上空飘过。火车从废料场旁边咔嗒咔嗒地驶过，朝莱茵高方向开去。穆斯小溪渗透在火车站大街下面。阳光洒在菲尔德大街上。行政区大街。溪流大街。池塘巷。白坪大街。黑暗中的教堂半圆形后殿。位于圣餐长凳和暖气栅栏之间的富铅玻璃窗反射出模糊的红光。耶稣基督的七处创痕配着柠檬汁放在略微烧焦的纸上。只有在圣烛的火苗上它们才能被辨认。星期六下午：电视连续剧《爵士俱乐部》。星期六下午：忏悔。可渗透修正笔。笔尖会被自身的毒素所腐蚀。谁要是用舌头舔一下，肯定就会死亡。舌头上有死亡的味道。莱茵胡特。迪克豪夫。卡勒。九点钟左右分发的课间可可粉。在大休息之前一直站在讲台上。讲桌旁边是装有钢笔水的墨水瓶。已经变得干涸了。自来水笔的墨水囊的后端被咬破了。蓝色的嘴唇。小书包里装的是充当圣人遗骨的珠子。带有备用墨水槽的自来水笔。透过可视窗可以检查墨水的容量。百利金钢笔：蓝色的。哥哈钢笔：绿色的。百利金钢笔：非常珍贵。哥哈钢笔：比较便宜。用手指甲刮去盛装可可粉袋子上的石蜡。装在白色纸套里的麦秆吸管。用白羊毛制成的短袖束腰内长袍。由教堂司事摆放好。做圣事用的圣带。披上之前牧师会亲吻它。摘掉之前会再次亲吻它。厨房橱柜上刷有粉红色和浅蓝色的油漆。橱柜是带推拉门的。厨房用桌前面摆放着两把椅子。那是给父亲和母亲的。设有长凳的屋角。蓝色的人造革。长凳的座部可以向上翻起。我弟弟的座位下面堆放着玩具。我的座位下面是换洗的脏衣服。电视报在两者之间的角落里。角落上方固定着罩有防滑膜的架板。架板上放着无线电收音机。那是一款狭长的没有长波的机型。喇叭口处没有布蒙。配有钢琴键钮。老款的收音机就归我了。根德牌磁带也归我所有了。TK 25型录音带。双声道。播速为4.75和9.5。可用摇杆开关进行调节。上端是电眼。左下端是可以按进去的压感按键。磁带的卷轴是巴斯夫公司生产的。磁带装在画有白色无线电波的红色纸板盒里。

升级是办不到了。放学之后穿过高速公路后身的草地。房车。开着房车四处卖艺的流动艺人。招募随同旅行的年轻人。为乘坐小车进入魔鬼宫铺设的轨道。啤酒瓶。香烟头。坐式双轮摩托车的金属板。旋转

木马座椅和包上钢甲的靠背。山岭和山谷。丘陵沟壑。

(Hully Gully) 稍晚站在高处的履带上。谁人乐队演唱的《莉莉的照片》(Pictures of Lily)。我希望在过生日时得到一张披头士乐队的专辑。用塑料制成的披头士假发。1.75马克一个。空心手掌里握着“塔林”牌香烟。三点钟刚过。还没有任何动静。不再有家庭作业了。反正对一切都无所谓。凉爽的高速公路下跨道。混凝土墙面上的乱涂乱写。偷来的学校粉笔。贝特霍尔德成功地升入高年级。施特凡反正没有问题。还包括克里斯蒂安妮和玛里昂。就连阿希姆也做到了。赖讷开始了一段学徒期。我们坐在坡屋顶下面的床沿上，仔细端详待售的披头士唱片的背面。

男孩房间里柜子和床箱的门没有上锁。相反使用的是磁铁。床上铺的是平整的泡沫塑料垫。晚上拉出来铺开，早上再推进床箱。床上用品都堆放在床箱里。家居打包运输工送货时家具是拆开的。柜门的内侧没有刷漆。司机不能中断他的行程。父母来学校接我和我弟弟。在回家的路上从弗里克尔海鲜店里买来了土豆沙拉和挂糊油炸鳕鱼。柜子各部件散放在院子里。天下着雨。应该把柜子组装好的那个男人站在一旁吸烟。上午早些时候。父母表示歉意。雨水淌落的纹影留在抽屉的内侧。清漆的味道消散了。装床上用品的抽屉上的磁铁吸力太弱。当我夜里在床垫上翻身的时候，床箱的门经常会自动开启。

我母亲一直尚未真正恢复健康。当我放学回家时，她有时还躺在床上。有时候她正在接受医生治疗。然后她会又站在厨房里削土豆。摆放在设有长凳的屋角上方架子上的那台新的狭长的收音机会播放心仪的音乐会节目。厨房窗前的洋槐树枝在阳光里晃来晃去。我养的金仓鼠在它的笼子里挤进我祖父在一个雪茄烟盒上锯开的窟窿，让自己躺在烟盒里睡觉。闻起来有一股新鲜的草垫子的味道。轮子到了夜里才又发出刺耳的咯吱声。声音从不间断。一直响到黎明。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有十分钟。我父亲坐在写字柜边，眼前放着那个绿色的小钱匣。他买了一个带有黑色封皮的正字本。他打开本子，取来直尺，把尺子放在页码中间，拧开自来水笔，用尺子比着画了一条垂直的直线，将页码分成相等的两栏。他在第一行里写下了当天的日期：1969年6月19日。再有两天就开始夏季了。左栏里登记的是我练习大提琴的时

间。右栏里是我看电视所用的时间。福瑞，蕾西，蒂尔，隔壁的男孩，艾凡赫和阿明·达尔。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索要赎金

尽管明爱会那位女士在这期间正在东德坐牢，但是麻烦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在晚上道晚安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他们在老酿酒厂旁边找到了那辆欧宝舰长汽车。人们知道，那辆汽车属于明爱会那位女士，而她却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在沙地上人们发现了无法解释的大尺寸雪橇滑雪板的印痕。在欧宝舰长汽车的杂物箱里有一张地图，上面奥登瓦尔德周边的不同地方都用叉号被标识了出来，一小包已抽了几根的“里诺”牌薄荷烟，除此之外杂物箱里还有一把塑料三刃尖刀、两安瓿瓶冰水和一包魔术肥皂。我大吃一惊。这根本就不可能，我们专门又检查了一遍汽车杂物箱。但是那块魔术肥皂，我惦念它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如果人们用魔术肥皂洗手，手不会变得干净，而是完全变黑了。

我冲下楼梯跑进厨房，在那里我父亲的第二位女秘书正在撤去晚饭用的餐具。我问她是否有人去过我的房间，动了我的宝藏箱。这个我说不准，她说道，我是今天晚上才来这里的，晚上这段时间没有人来过。她才二十出头，不大懂怎样料理家务。一切事情都必须要我母亲来吩咐她，此外我母亲也不希望这么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我们家到处转悠。这只是暂时的安排，我父亲说道，直到明爱会那位女士重又回来为止。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母亲问道。你干嘛问我？我父亲说，她可没有通知我不来了。但是这件事太奇怪了，就发生在老酿酒厂旁边。或许她被人劫持了，我说道。不要这么信口雌黄，我父亲说。不，我母亲反驳说，也许他说得对。也许那帮人想向你敲诈赎金。要是这样这件事就更离奇了。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我父亲走进门厅拿起听筒。是的，是的，我听见他说道，然后他又说：稍等。找你的，一个叫克劳迪娅的。请告诉你的朋友们，让他们别再这么晚往家里打电话。好的，我说道。克劳迪娅显得非常激动。你听到那个消息了吗？她问道。听到了，我说，他们在汽车杂物箱里找到了魔术肥皂、两安瓿瓶冰水和我的塑料三刃尖刀。我指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呢？我说的是那个流浪汉。哪个流浪汉？就是我们卖给他那瓶伏特加的那个流

浪汉。他怎么了？他死了。被毒死了。毒死了？是的，是中毒而死的。但是这不可能呀，为什么会这样呢？天哪，你难道不明白，他们是想要毒死我们。他们是谁？看你说的，还能是谁？是人民军那帮家伙呗。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喝了那瓶伏特加，我们现在就已经死了。他们还把魔术肥皂、冰水和我的塑料三刃尖刀放到汽车的杂物箱里？是的，很清楚，这样做是为了把怀疑引到我们身上。

电视里正在播报，有寄宿学校的地方都在汽车杂物箱里的那张地图上用叉号做了标识。但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目前人们尚无法断言。我问道，我能否很快把明天的数学作业给克劳迪娅送去。什么？现在？现在都已经8点半了。破一次例吧，我马上就回来。我跑进自己的房间，往小背包里装了几样东西。然后我拿起粉红色的猪形塑料储蓄罐，里面装的是我为买电唱机省下的钱，转动了几下猪头，用随身带的小折刀的刀刃把储蓄罐的缝隙向里压进去一块，就这样一枚一枚地把积攒的全部硬币都取了出来。总共有17.65马克。我把这些钱塞进我的胸口钱袋里。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已经坐在洛赫碾磨厂门口的长椅上。碾磨厂今天休息。我们必须逃走，克劳迪娅说道。但是往哪儿逃呢？贝尔恩德问道。肯定不去东区，我说。真滑稽，克劳迪娅说道。但是说正经的，他们会把那名流浪汉的死推卸到我们身上，说是我们毒害了他。但要是那样我们就必须索性把一切都讲述出来。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就是简单地和明爱会那位女士开车出去兜风，突然来了一架直升机，几名士兵下来把她劫持走了。那名流浪汉呢？他们确实给了我们一瓶伏特加，我们把它送给了那名流浪汉。可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此外人们绝对不会相信我们的。如果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他们就会从东区那边派人过来干掉我们。那我们就把这件事再推到福德贝格人身上，说这些都是他们干的。福德贝格人驾驶着一架直升机？瞎说，当然不是开直升机了，就跟平时一样，随便开了一辆锈迹斑斑的破车。那么雪橇滑板的印痕呢？它们之前就已经有了。但是这样我们就与福德贝格人为敌了，这样做也不行。那么我们就说是来自高年级的几个人干的，是来自佐尔坦班上的学生。但是你想怎样证明这一点呢？我在我

们的“红军派”记事本里收集了一些关于他们的情况。但是那些都是胡诌的。我有个主意。我母亲认为，他们劫持了明爱会那位女士，目的是为了勒索我父亲的钱财。喔，那又怎样呢？你看，我们还是能够把这件事情搞定的。我们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明爱会那位女士还在我们手里，然后我们就索要赎金。这太好了。事成之后我们就有足够的钱可以逃走了。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逃走。这不行，如果明爱会那位女士不见了，而我们也失踪了，这就太显眼了。我们必须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回到家里，明天上午在学校的时候，克劳迪娅谎称自己不舒服，然后她就去消费合作社门市部附近的电话亭，往我家里打电话，索要一万马克赎金。一万马克？

当我第二天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我们家里是一片混乱不堪的场面。客厅里坐着一些我不认识的男子，走廊里站着我父亲的司机，还有两名来自工厂的男子。我走进厨房。你听说了吗？那位年轻的女秘书问道，她一直还待着没走。什么？他们绑架了明爱会那位女士，现在想要十万马克赎金。十万马克？是的。或许她只是听错了。然后呢？你父亲愿意支付赎金。客厅里的那些男人是谁？他们是警察。我父亲报警了？劫匪专门叮嘱说……我的意思是，劫匪们难道没说他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报警？这个我不知道。我来到母亲身边。你听说过过了吗？她问道。我点了点头。一万马克，父亲有这么多钱吗？一万，你真会开玩笑，他们想要十万。真的吗？是的，千真万确。接下来呢？你父亲愿意支付赎金。我想去电话机旁边给克劳迪娅打电话，但是其中一名男子从客厅里出来，他来到门厅对我说：你现在不能打电话。于是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宫殿公园，走进售货亭旁边的那个电话亭。我呼叫克劳迪娅。我们说好的是一万马克，我说道。是的，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说，你索要了十万马克的赎金。胡说，我说的是一万马克，让他们把钱放在穆斯城堡后面的垃圾桶里。另外警察也来了，这件事我们不可能做成功了。警察，我可是……是啊，但尽管如此我父亲还是报警了。

我们坐在“歌手之家”饭馆靠后的角落了，因为这是唯一有电视机的地方，电视在晚上播放，只不过没有声音。我们给了一个十岁的男孩两马克，为了让他去穆斯城堡后面的那个垃圾桶里查看一下，是否里面

有一万马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先是给了一个小女孩五十芬尼，让她去对游乐场上的那个男孩说，他应该到宫殿公园围墙边的灌木丛来一趟。我藏在灌木丛里，这样谁也看不到我，当男孩站在灌木丛前面时，我模仿美国人用非常高的声音说，他应当去穆斯城堡后面的那个垃圾桶里查看一下，是否里面有一个信封，如果有的话，他应当取出信封送到这里，把它放在灌木丛前面，就放在那块松动的石板上。然后我又说道：你看到那块石板了吗，因为它让我回忆起圣徒赫尔曼·约瑟夫，在他说“看到了”之后我又说道，那你就看一下石板上放的是什么。那是给你的。然后男孩拿起那枚两马克的硬币，朝穆斯城堡方向跑去了，我从灌木丛里钻出来，去和另一侧的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会合，从那个地方人们能够很好地监视灌木丛，因为我们想谨慎行事，一旦那个男孩报警的话。

即便慢腾腾地走，去穆斯城堡最多也只需五分钟时间。半个小时之后男孩依旧没有返回，这时我们知道，他不会再来这里了。当然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很多种可能性：他可能是拿着那两个马克逃走了，或者连带赎金一道，或者当他想从垃圾桶里取出信封时警方截获了他。我对男孩说过了，我们会监视他并把他揍得青一块紫一块，如果他要带着信封逃走的话。就算是垃圾桶里没有信封他也应该折返回来，作为信号把那块松动的石板重新挪正。为安全起见我们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首先沿着马路向下去了比伯里希，在埃内瑟尔音像店听了单曲唱片。这家音像店还播放简单节拍乐队的一张老迷你专辑，这张专辑已经很令人反感了，因为我们听到的总是这个，但是尽管如此音像店工作人员也没有把它从电唱机上换下来。此外我现在也无法再花钱买单曲唱片了，因为我已经为那两个孩子支付了2.50马克，手头只剩下15马克，不，只剩13.50马克了，因为我们还吃了油炸薯条。

我们坐在“歌手之家”饭馆里，每人眼前摆着一瓶布鲁纳汽水。在新闻节目里他们又跟昨天一样播放了类似的画面。又是那辆欧宝舰长汽车，又是那两安瓿瓶冰水和那块魔术肥皂，但是紧接着画面上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即明爱会那位女士。人们在电视里看到的不是照片，而是一部真正的影片。但是明爱会那位女士看上去跟以前完全不一

样，因为她的头发不是散落的，而是向后扎成了一个发髻，此外她还穿着一件制服。那是一件国家人民军的制服。她挨着其他穿制服的人和着西装的男人站着，在对着一个麦克风讲话，画面下方是插入的字幕：“东德”电视的贡献。真讨厌我们听不到明爱会那位女士在说些什么，因为她好像在为某些事情而感到愤怒，说话时嘴巴张得很大，边说边挥动双臂。然后影片演完了，荧光屏上淡入了三张照片。在第一张照片上人们看到的是克劳迪娅，第二张照片上是贝尔恩德，第三张照片上是我。恰恰是那张令人讨厌的照片，照片上我必须穿那件总是刺的人发痒的黄色的套头毛衫和白衬衣，因为当时是复活节，明爱会那位女士还用一把湿的梳子把我的头发向后梳理。

患者在自己身上诊断出一种联想夸大狂情结

我把自己的问题描述为神经错乱，说得简洁一些是发疯，说得客气一些是精神失常，这一问题主要在于，正如我在询问之下已经口头解释过的那样，我的行为举止很正常，因此我会阻止人们对我做出从外观看神经错乱的诊断。虽然从外观看不出来，但是这种错乱还是在我心里存在，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被迫凭自己去获取以下领域的必要知识，包括心理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神经疾病及其治疗史、监狱的诞生、锁具的诞生、红军派的诞生、集中营的诞生、生食和熟食的诞生、我自己的诞生、对这种诞生的描述、对在出生时被使用的产钳的描述、对未被使用的吸钟的描述、一般工具的历史、对于恐吓出生的工具的展示史以及最终应用这些工具的历史。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我才能成功地对自己的神经疾病做出诊断并进行相应的治疗。

我在紧急收容所、后来在门诊住院部逗留期间人们向我提了一些相应的治疗建议，但是它们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益处，相反却加重了我的神经错乱，因为我不得不又一次认识到，我真正的错乱是无法从外观被觉察到的。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感觉只能依赖自己，我决定采取上面提到的疗法，现在这一疗法又带来了这种麻烦，即一种神经错乱从外观好像能够看出，也就是说滥用职权的错乱，精神亢奋的错乱，亵渎神灵的错乱，庄重优美风度的错乱，这种麻烦是一种表面上的精神失常，我想把它归纳为“宏伟联想情结”这一概念，即一种联想夸大狂情结。为了再准确地总结一下：我真正的神经错乱从外观上是无法被他人所觉察的，而同时我所采取的行为举止从外观上又被解读为神经错乱，如早已承认的那样，这样的行为举止我是强制采取的，目的是为了治愈我真正的神经错乱。

当然这种联想夸大狂情结也确实具有精神失常的特征，但是这种精神失常是服务于治愈之目的的，或许它可以跟萨满教宗教仪式进行比

较，或者为了局限于医学语言，它可以和一种药物做对比，这种药物呈现出相当大的副作用，但是人们还得忍受这样的副作用，因为换作其他药物治疗疾病看来是不可能的。

性行为：我的性生活仅仅发生在思想层面，仅仅发生在过去。就跟纳粹们的性生活一样，红军派的性生活也同样潜伏于暗处，不为人所觉察，因此红军派因缺乏对性行为的改变而失败了，这一点人们必须要加以说明。正因为人们认为，作为革命组织必须改变世界，那么以同样的方式掩饰自己的性生活并使之对所有周边的人而言神秘化，就像人们在市民世界已经做的那样，这就意味着继续顺从这样的市民世界。反之对性生活进行描述（红军派从未这样做过），但在描述时却剥夺了性生活的私密性，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使性生活色情化，这样做也不会有任何成效，而是相反帮了反动势力的忙。很遗憾当涉及性欲这一话题时，我只能以这种可疑的革命公告似的语言来加以言说，但是我个人的性欲过于强烈地被打上了因革命而耽搁和社会约定的烙印，以至于我无法用其他方式来加以表达。公告式风格也总是一种寂寞、孤独和由孤独产生的自我毁灭愿望的风格。鉴于我的性欲无法把自己从既掩饰又炫耀同时还缺失了私密性的极点中解放出来，故而我只能强烈地在孤独中体验自己的性欲，并因此不断遭到自我毁灭愿望的威胁。

五种机器和三种饮料包装长时间地直接影响了我的思想。

作为机器我可以把它们命名为：

1. 康西达洗衣机
2. 阿尔派妮人工太阳灯
3. 配有玻璃套口的KM31型布朗搅拌器
4. 带有压感按键和电眼的TK25型根德录音机
5. SK4型布朗电唱机

作为饮料包装我想指定的是：

1. 深色的调味汁瓶
2. 新奇士包装
3. 儿童复合维生素瓶

重新对性欲做一番说明：归纳起来人们可以这么说，有两种力量在患者体内肆虐并控制着他，其一是恐慌和瓦解的感觉，其二是情欲和性冲动，情欲仅仅是为了不至于使患者完全受沮丧的摆布，从而使得这种沮丧感还能尽可能长时间地在他体内起作用，因为如果患者完全受沮丧控制，并很快因其而死亡，那么这种沮丧感就不会再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了。这样患者肯定会发觉，他在过去几年里唯一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安宁、镇静、几乎是由心满意足而生发的幸福感，当他在一次梦境里和父母驱车去往一个偏僻的乡村，为了让他的父母留在那里的一家宾馆或者医院里，然后和格尔妮卡乘坐由她驾驶的汽车去一个射击场。他的父母非常担忧，他们去了一座装有彩色富铅玻璃窗的小教堂，而他则坐在自己女友的汽车后座上，多年之后第一次小心翼翼地提起结婚这个话题，对此她没有马上做出拒绝的回应，这足以让一股少有的幸福感流经他全身，于是他躬身向前，连带提及了要孩子的想法，这种可能性她同样没有排除。但是真正的幸福感却在于，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既不受恐惧或者沮丧，也不受惶恐和性欲所决定，而是更多的是他能够接受提供给他情况，能够充当自己年迈父母的角色，坐在一辆由格尔妮卡驾驶的汽车的后座上，驶往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直到他们在射击场停了下来，在那儿他从很远的地方用多发子弹把一个微小的靶子打得布满窟窿，其中好几次甚至命中靶心，而此前他生平从未摸过枪，从未仔细地从远处识别过靶子。但是幸福却是，为了最后一次对之加以描述，对他所遭遇到的和围绕他而发生的事情他自己并未参与过。这是他与其他人达成的默许。这是对他者的容纳和接受，无论这个他者是谁，这同时也是一种摒弃渴望、伤感、绝望、乡愁、悔恨、罪责、恐慌、疑惑或者无谓的情欲，生活在他者中的意愿。即便是患者梦醒时的勃起也是令人愉快的，而不是像

平时那样经常会令人感到疼痛，因为他能够让勃起消逝，而不是使之转向一种惯常的骚动。

仿佛有必要克服一道新的进化障碍

舌头在感触隐隐作痛的牙齿。宇宙在按摩地球。风吹在树上一个尚未长成的苹果上，使它绕着自己的叶柄直转，最终把它抛在石子路上。雨已经持续下了多久？巴士颠簸地行驶在乡村道路上。我把裸露的双腿伸展开来，脱下被雨浇湿的凉鞋。世界是由各种药片、药丸和一处裂开的伤口的微笑构成的马赛克拼图，它用夹子把它们区分开来，再把它们推到显微镜底下。有人在抚摩我的头发。另一个人在把盛满雨水的碗倒空。密封大口瓶里的黄瓜布满了一层发霉的绿绒。一处为蛆的繁殖而生成的荒凉的凹陷地形。巴士司机尚未打开车灯。在一片小树林我们差点儿蹭到一辆停靠的轿车。巴士一个急转弯，把我横向甩过通道，甩到对面的座位上。

我把脸埋在风雪大衣的风帽下面，清点过道里的挂钩。蒸煮蔬菜和土豆的味道涌过地下室里的粗管。我父亲嘴里衔着手电筒，在草坪上朝狐穴方向爬行。我被从窗边拽了回来，被拖至房间中央。黑板上写着一个公式。在窗帘之间的背景处，夜色里的钢板在反射灯光的搜索下一动不动。大熊扑向小熊。一架飞机掉入一个金罐，在阳光的炙烤下受热沸腾。牺牲的英雄青年时的照片配着黑色的条带，横向挂在墙壁右下角上面。一阵黄色的沙云从公园上空吹过。它驱动着积水呈盘旋的波纹从水洼里涌出。树枝锤打着工具棚，长长的管道把小水塘和河流连接了起来，从管道里冒出一股焦油和融雪的味道。

我沿着经过雕凿的通向城里的主干道行走。在药店的玻璃橱窗里一个体态臃肿、面带微笑的塑料人在闪闪发光，他张开右手抚摸自己健康的胃部。在黄色和红色的小灯下人们可以密切注视他的肠翼。我停留了片刻。橱窗后面的药品出售区一片黑暗。通向邻室的门只是虚掩着。女药剂师躺在一张罩着绿色橡皮垫的治疗卧榻上。她穿着白大褂，没有脱鞋。闪烁的灯光发射在陈列柜的玻璃上。被捕捉的蛇。下意识地紧紧咬住受伤的外皮不放并渐渐死去的蠕虫。一个充当痰盂的

狗的下颚。一只用作眼罩的猫耳。被拔掉的天鹅羽毛作为绷带。我又开手指模仿一头雄鹿，它正呈螺旋状绕着供暖管道向上奔跑。

环绕河流的街道被封锁了。卡车停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之间。巴士到达终点，人们很快消失在狭窄的小巷里。为了这个特别的日子，咖啡店制作了狭长的、带有牛轧糖馅的小轮子形状的蛋糕和点心。巧克力融化了，糖馅开始流出。一个不祥之兆。临近中午的时候价格就下调了，后来人们把剩余的食品放进冰箱的冷冻柜里稍微冰冻一下，再把它们分发给今天因学校放假而闲逛路过的孩子们。封锁线被剪断了。旅行前来的人们肃穆地排起队伍，依次进入巨大的管道。行车道有两辆坦克那么宽。太阳照过水面，就像是一个小型磁球一样追逐着一道信号光线。游客靠在游轮的船舷上鼓掌。孩子们在比赛把印有河流流向图的扑克牌投向一栋房屋的墙面。如果人们小心翼翼地走上摇晃不稳的登岸栈桥，把耳朵贴在其中一块厚木板上，就能听到水下游来的人群的低沉的嗡嗡声。女士们戴着滑稽的帽子，男士扎着印有日期的彩色围巾。在反压力的作用下水从居民区的污水沟里冒出。幼儿园的桌子上摆放着未被触碰的蓝色和红色的橡皮泥。午睡结束之后孩子们坐在桌前，用他们柔软的向内弯曲的手心把橡皮泥擀得越来越长。他们必须当心使橡皮泥不至于过细而断裂。

3点半的时候那个老男人又出现在大门口，此时孩子们正在用皮球掷击大门，通过栅栏他把奶糖糖块递给孩子们。下班之后女幼师们为她们的未婚夫拍摄护照照片。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挤进火车站的自动摄影装置。最后她们做出一副鬼脸，以暗示的方式把上衣向上撩起一块。如果一切正常，男人们现在肯定已经在家了，在给自己擦去干活时落在背上的污物。所有的人都把过去几天的加班费凑在一起，为共同的花园购买了一副好莱坞秋千。过去几天里他们有时在夜里醒来，觉得自己一直还被关在管道里，感觉河流在自己头顶流淌。在登上楼梯往出口方向走的时候，据说每登上三个台阶就要咽一次唾沫。

德高望重者在食用递给他们的蛋糕和稍微附上些水汽的夹心巧克力糖，这些东西摆放在小餐饮车上，停在今天禁止车辆通行的马路边。产房的护士们提着新生儿的脚后跟把他们高高拎起，同时她们透过清

新的空气朝隧道方向望去，在苍白的屋脊后面隧道当然是看不到的。象征性的横越和下移行为赋予城市居民一道奇妙的光环。老师们站在黑板前面，手上沾满了粉笔末，在这种情况下使他们的公式显出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优雅。课程结束时人们彼此握了握手，一言不发地向外走去。苹果被削了皮。果心被捅破了。孩子们把掏空的水果像望远镜一样举在眼前。

在库房里电话铃响个不停。通风出了问题。房屋地下室里的水已经没过脚踝，现在管道里的煤气也要被抽走。隧道侧旁挂着鸟笼，里面的金丝雀扑打着翅膀向上挣扎了一会儿，然后便昏死了过去。两名工程师被叫了过来，之前他们正带着小女儿在影院看下午场电影。人们示意他们通过边门进入一条支路。他们站在玻璃陈列柜旁边接受指示。零星的孩童手里摇着小旗飞奔而过。从毡幕之间青灰色的光隙里透出演员的声音。音乐声渐渐增强，接着又逐渐减弱。接下来响起的是电影新闻周报的播放声。

公共汽车短暂地停了一下，没有开启车门，紧接着又继续行驶。在一处建筑工地出现了交通拥堵。四周到处停着闪着蓝灯的警车。不断有个别司机被挥手示意通行。当轮到我们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正用吊车从挖开的坑里向上拖拽裹在麻袋里的尸体。我感觉到腹部的伤疤。我把手伸进兜里取出打火机，把它塞到套头毛衫下面，以使它稍微冷却一下疼痛的部位。

潜水员们准备就绪。他们光着身子站在刮着穿堂风的游轮上，在往自己身上涂油。游客被用救生艇送上了岸。他们站在岸上，把游轮餐厅里最后剩下的咸味长条糕点吃光。咸味长条糕点和苹果汁：对孩子们来说这些足以使他们的世界陶醉。在游客们朝市中心走去的时候，他们想好了在工作场合给别人讲述时的语言表达。“我大为吃惊”比如说就是其中一种表达。

鱼儿在临死之前被钻机向下作业时产生的压力波冲到岸上，在那儿它们觉得必须要克服一道新的进化障碍。但是进化过程停滞了。生物的运动可能性屈服于自然的限制。它们只能彼此交换那些少量的存在形式并使之完善。之后出现的便是单调和乏味。人们无趣地相互争斗，

为筑巢、孵卵和放牧的地方而争吵不休。生命几乎不会再提供更多的东西。然后思想就被发明了，似乎是作为最后缤纷的花朵，连带产生的还有那些应当使思想忙碌的重大话题。晚上放置在酒吧间楼上房间角落的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德里克”系列节目。这里所说的不是生命的进化，而仅仅是熟悉的事物。只有朝着熟悉的事物发展，运动才是有意义的。所有其他的都是无稽之谈。

管道里的人们听到了约定的信号声。身上涂油的潜水员在指定地点贴着老虎窗游动。当钻机开动的时候，城里的灯火都熄灭了。医院接通了备用发电机。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护士第一次把出生过程感受为是无法描述和奇特的。她把这种情况归之于漫射闪烁的灯光和出生时间的提前。她不像通常那样把孩子腹部朝下放在堆放测量仪的桌子上，而是把他举到窗户跟前，为了把城市指给他看。然后她合上了百叶窗。水像融化的牛轧糖一样流进隧道。

对一些所选动物的形态学和行为生物学所作的评论

但是人们不允许吞咽血液，因为胃承受不了血液，而是必须把它吐出来，但是吐的时候也不能让它沾染嘴唇。

在傍晚的山丘上从铺砌的石块上爬过的蜗牛也不是白色的，而是灰色的。我把其中一只蜗牛塞进小果酱瓶里，第二天早上它死了。尽管我给它往瓶里放入了一块石头，但不是山丘上的那种石头。

往一块山毛榉树皮上涂抹一层薄薄的黄油，注意不是人造黄油，这样能够不让蜘蛛靠近。蜘蛛就像是迷迷糊糊的，想立即朝其他方向跑去。即使这块树皮装在钩织的小包里，放在蜘蛛根本无法看到的围裙兜里。

夜里号哭和呻吟的不是风，而是一个男孩，他长得太快了，床不再能够装得下他。

叔叔的牙齿不多，尽管他比父亲年轻。长款红色皮革钱包藏在制作糕饼的模具和发酵粉小袋之间，母亲从钱包里取出钱给他，钱是用来买一副假牙的。

叔叔的女友躺在教堂前面。唇膏从她的手提包里滚了出来，落在展示牌下面两块随槭树树根连同挖出的石板之间，唇膏的盖子滑落了，口红鲜艳的红色横向涂抹在她的面颊上。

如果人们往死兔子的一只耳朵里塞上一根鞋带，它就会从另一只耳朵里钻出来。

溺亡者的嘴唇看上去就像是我洗过澡后的脚趾。他闻起来像是运输公司让人堆放在卸货台前面的送错了货的那些大纸壳箱。

只有在基督降临节期间那个带有黑色手柄的电钻才被从箱子里取出，人们用它为小动物的火柴腿在栗子上钻孔，这些小动物两个夜晚独自站在桌子边缘，对着下面的深渊沉思。然后它们被赠送给了养老院。

医生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耳虫从里面用唾液糊住了鼓膜的缝隙。然后他们会把一盏小灯塞到你的耳朵里。往鼻子里也是这样。你必须屏住呼吸，紧闭双唇。然后一根软管会通进左鼻孔，另一根通进右鼻孔。你必须非常安静地坐在那里。有时要坐一个小时，有时更长。一台类似于鼓风机的机器通过软管向上往脑子里吹气。然后耳虫就开始飘荡。它一直在飞来飞去，从里面撞击你的脑袋。这会令你感到非常疼痛。但是如果你走运的话，耳虫会最终炸裂。然后你的鼻子里会流出一种液体。这种液体叫蠕虫汁。对耳虫来说这不是糟糕的死亡，因为它先前已经变得发疯了。因为通过软管被吹进你脑子里的空气能够让它漂浮起来，所以它认为自己是一只鸟。还在它为此感到高兴的时候，它就会炸裂或者心脏病突发。

当你躺在草地上或者树林里时，它就会爬进你的裤腿或袖子。起初你什么也意识不到。但是当它突然出现在你肚子上的时候，你就会因恐惧而死亡。你必须立即脱光衣服。然后它会从你身上掉落。但是你不能重新穿上衣服或者把衣服随身带走，因为它会在衣服里暗中埋伏。你必须赤裸着身子跑回家，而且要跑得非常快，否则它就会超过你。然后你会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你从树林里跑到马路上，被过往的车辆轧死。其中一个男人硬生生地被汽车撕开。他的头留在原处，身子却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接着警察来了。但是其中一名警察是那个被撕裂的男人的儿子。当他看到父亲的脑袋时，他也当场死亡了。他是被吓死的。来自平行班级的一名学生成功地跑回了家。浑身一丝不挂。但是之后他不再被允许去上学。也不再被允许出去玩。电视他也不能看了。因为他太紧张了。整个夏天他都必须躺在床上。然后他死了。他的父亲去到那片林子里，因为他想取回儿子的裤子。他只看到一条裤腿的一小片裤脚从一个树洞里探出头来。他发疯似的拽裤脚，但怎么也无法把裤子拽出来。

它有七根刺。在被三根刺扎过之后你就已经死了。一个年龄稍大的男孩曾经跟它搏斗过。他经受住了所有七根刺。然后它死了。但是他必须进医院，因为他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在冒血。血液的颜色非常黑，因为那些刺都有毒，这样血液就会发霉。它坐到草莓蛋糕上，等着你去咬蛋糕。然后它会扎你的腮部和舌头。舌头肿胀并向后脱落。然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医生用刀在你的脖子上挖一个洞。然后它会重新飞了出来。

它的咬伤是有毒的，因为它生活在排水沟里。它有两颗还在不断生长的大门牙。幼虫住在母虫的皮毛里，如果没有过往的孩子能让母虫紧紧咬住不放，幼虫们就开始吃掉母虫。它从后面咬穿衣柜，然后又咬穿鞋盒。在人们打开鞋盒盖子的时候，它就会跳到你的脸中央，紧紧固着在你的脸上。它也能使自己变得非常扁平，从你左脚胶鞋的鞋尖前面挤进去。只有在被碾压的情况下它才会死掉。在车轮下它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这时人们会看到它没有骨头。有时马路中央会有一些黑色的小弹子。那是老鼠的嘴巴，它们不会腐烂。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人们不能跑过去捡起它们。否则人们也会被车碾压，而这正是它们所希望的。

在我房间的窗台上一直还放着医生从我胳膊里拽出的丝线，它们在慢慢地皱缩。

叔叔讲述说，他的女友在事故之后无法再动弹了。她躺在医院里看着天花板。有时候会有一只死苍蝇掉下来。然后他把死苍蝇放入瓷碗，瓷碗放在床头柜上，原本是供人们吐血用的。

星期天提供杂烩会使神经病患者平静下来

调查表明，与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同，神经疾病患者会对纳粹所涵盖的词汇做出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和解读。通过特异反应性和不符合历史的分析，神经病患者会释放在这些词汇里已有的操纵力量。从诸多词汇中举一个例子：比如“杂烩”这个词。神经病患者会对分成好几样端上桌的菜感到不知所措。区分主菜、前餐和后食，这一要求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导致患者忙于这些概念本身及其分类，从而无助于增进食欲。分成好几样分别端上桌的菜经常又会被划分成肉类和配菜，以杂烩对抗之会使神经病患者平静下来。使这样的菜与某一工作日挂钩，同时专门在一个星期天提供杂烩，因为恰恰是在星期天菜往往会被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并且通常是在做完礼拜仪式之后被食用，而圣餐仪式的礼拜式自身又再一次说明了进餐的复杂性和象征力，上述做法会额外给神经病患者一种方向感，这种方向感又会通过这样的规定得到加强，即把10月至来年3月期间每月的第二个周日定为杂烩星期天。通过允许三样杂烩菜（1. 带有配料的调羹豌豆；2. 牛肉面条汤；3. 配有肉丁的炖菜），人们好像又搅乱了患者的方向感，这种可能性再次通过对杂烩菜的精确规定（作为调羹豌豆的配料或者是香肠、猪耳，或者是腌肉等等）得到了排除。海报上《食用杂烩使八千万人联合起来》的标题相反却显得模棱两可，因此根据神经病患者不同的精神状态，它或者增强其信念，或者使之迷惘，因为一方面把八千万人统一起来绝对能够让人感到抚慰，但是另一方面也同样会令人们不安，如果人们把这一数字同相应的盘子和摆放盘子的桌子等等一并想象的话。因此神经病患者将会选择这样的海报：《星期天与元首共进杂烩》，因为元首会给他明确的导向，也因为这样的海报会令他回想起“星期天我的甜心想和我去驾驶帆船”那首流行歌曲。

埃纳·霍恩：烹调书女作家，从1933年至1982年从事食谱创作，另外她推出了杂烩方面的经典作品（《杂烩——德国经济菜》，1933年），靠这部作品的帮助寒冬赈济组织实行了星期天提供杂烩的做

法。如果说杂烩，特别是前文已经说明的杂烩理念能够对神经病患者产生镇静作用的话，那么对埃纳·霍恩出版的烹调书书名的阅读却会致使患者总体状况的恶化。举例如下：

1. 《近代家务：一位高贵的元首视察布赫瑙实验用厨房的整个厨房和家务情况》，慕尼黑，1941年。在此同时有多个概念会令人思想混乱。首先是“近代”，其次是“高贵的元首”，特别是“布赫瑙实验用厨房”，因为布赫瑙很容易让人想起布痕瓦尔德，实验用厨房则令人回忆起那些纳粹也在神经病患者身上做过的实验。

2. 《真让人高兴，新美极食谱》，位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52年。神经病患者会错误地以为这是一本巫术书，就像他童年时所看的那些巫术书一样，与此相适应他会回到从前，让自己进入妄想世界。相反立在餐桌中央的深色调味汁瓶通过它特殊的外形、棕色的所含之物和黄色的标签，会令患者镇静下来。

3. 《医生述说，母亲烹饪：医生指导下的创新及病人食谱》，肯普滕，1955年。灾难性的书名，因为它会诱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即医生和母亲狼狈为奸，针对神经病患者缔结联盟。在此神经病患者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对他来说当然情况正好相反，也就是说母亲在述说，而且据说是为他作为神经病患者着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是在为他指定和安排事项，而医生则在精神病院的实验用厨房里调制各种有毒的鸡尾酒。

4. 《万能食谱，使用万能厨房助手，通过近四百种烹调法做出简单精美的菜肴》，斯图加特，1955年。这样的书名能够引发患者对机器，以及对由机器所接收的命令的想象。

5. 《鲍克内希特食谱，使用鲍克内希特厨房多用机，通过近四百种烹调法做出简单精美的菜肴》，斯图加特，1957年：同上。

6. 《冷食、花哨和美味，一部反映时代的现代烹饪教科书》，肯普滕，1966年。书名体现了神经病患者的社会环境，他把自己所处的社

会环境感受为是拒绝的和冷漠的，感受为是吵闹的、花里胡哨的和过饱的，而他自己却饱受食欲不振之苦。同样的情况还有：

7. 《家庭聚会冷盘，适合各种节假日》，汉堡，1963年；居特斯洛，1968年。在此神经病患者将会把冷盘和精神病院里相应的活动和设施联系起来，例如冷水浇注、冷水浴、冷水冲洗、直流电疗法用的铁板以及夜里出于固定之目的而扣在他身上的金属板，他将会感受到，他的痛苦不仅没有被关注，而且除此之外他的家人也会被误导，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庆祝节日。

掺入鸦片的印度大麻和嘴里插着一把匕首的米克·贾格尔

可以设想，是一种“幻象”导致这名青少年在疗养院居留的。这名青少年在6月份的一个星期一于晚上7点出现在“歌手之家”饭馆，在那里他在桌子之间、在卫生间、后室和吧台区之间漫无目标地转悠了一刻钟。起初人们认为他喝了酒，并且开他的玩笑。但是当他开始战栗、继而开始哭泣、最后说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句子、并最终蜷缩在饭馆的一个角落里时，在场的人这才彼此打听，看是否有人认识这个男孩，然后他被裹在一条被子里，由饭馆老板的一名伙计送回了家，因为几名在场的人辨认出他是工厂主的儿子。到家之后人们即刻给儿科女医生科瑞尔博士打了电话，她马上就指定他入院治疗。奇怪的是在疗养院居留期间，他在“歌手之家”饭馆所经历的幻象从未被谈论过。第一次记录是后来才有的，就在他被送入天主教寄宿学校前不久，在那里这名青少年继续致力于对所发生事件的详细分析，同时也就这一事件制作相应的、可惜已经下落不明的素描画。这次重要经历涉及的好像是第一次精神病冲动，从这次经历中找到一条出路，以使自己摆脱在学校、牧区和家庭遭遇的颇为棘手的孤立处境，在这种希望的驱使下，这名青少年以极大的热情前往他当时遇到的图画世界，为了依照自己的能力对之加以描述和分析。尽管他长期专注于这一事件，但是在任何场合他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无论在与迈尔克林医生或者弗莱施曼教士的交谈中，还是在天主教寄宿学校的记录或者聊天里。六年之后，在即将步入成年期的时候，他才对这件事又写下了几句话。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记录中尝试使整个事件大事化小。他决定从自己的生命里排除这一精神病经历，因为他旨在使这一事件一体化的尝试失败了，会是这种可能吗？

来自1975年的记载：因熬夜而疲惫，在铁路路堤吸了掺入鸦片的印度大麻，在头一天周日没有去参加恒久祷告，可能有一大堆理由最终导

致了将近晚上7点钟时在“歌手之家”饭馆发生在我眼前的那种幻象。在这之前我还短暂地拜访了阿希姆，在他的房间我们一块儿看了一集《宾尼兔》动画系列节目。当时我就已经感觉不舒服，但是我不想承认这种情况，尝试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让自己强颜欢笑，但是整个事情都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大麻里所含的鸦片成分简直太多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又途经那栋房子，当年七岁或者八岁时我透过窗户看到过那个穿着汗衫的男人站在桌边的电视机前，电视里正在播放《菲特·阿佩尔施努特》，至少在那一刻我又想起了这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要从这栋房子旁边走过，我尝试再透过窗户往里看，但是这一次房间里一片黑暗，就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注射毒品后的瞬间快感，因为我在想，黑暗的房间里的一个消瘦的男人非常安静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正是他杀害了当年给穿汗衫的男人把晚饭送到房间里的那个女人。我感到惊恐万分，如同患了吸食大麻者的妄想狂，因此我又一次返回，来到“歌手之家”饭馆，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到家之后的那些烦人提问，以及明爱会姑姑的废话，人们总是问母亲怎么样了，尽管她的身体状况一直都还是老样子，然后我收拾书包，在屋里转悠了一会儿，坐在床上一直等到我弟弟睡觉，然后我自己也尝试睡觉，尽管我那个时候肯定还不感到困倦。因此我又去了一趟“歌手之家”饭馆，想看看杰拉尔德和戈特弗里德是否在那儿，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们俩，因为他们年龄稍大，总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把你当小孩一样对待，但是为了分散注意力此刻对我来说什么都行。还没有到饭馆，我就突然感到极度不舒服。接下来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在那儿待了多久，这些我都不知道了。我唯一能回忆起来的，就是那幅死神和淡紫色圣带的画面，它首先在我的脑际里闪现，因此我也倾倒了，也就是说我躺在地上，情况也的确如此，一名穿着军人制服的男子递给我一杯汽水，同时通向后室的门开启，一名醉汉冲了出来倒在地上，而我则透过成团的烟雾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可能是克劳迪娅，正半裸躺在怪声大叫的男人们之间的桌子上。桌子前面就是那幅瞬间出现的死神画像，他就跟法衣室里的教士一样正在披上一条淡紫色的圣带，这一幕我是碰巧看到的，但其实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人们不允许看到死神，更不允许在他正准备把某人接走的时候，因此我在想，自己现在肯定也要死亡，在想他也是黑暗的房间里被挤进门后角落里的那个人，人们或许有一次会让死神感

到意外，但肯定不会有第二次，因此我于惊恐中跑下楼梯，为了寻找一个出口，最好是从后面出去到院子里，然后从那里开始越过铁路路堤，穿过溪流大街，沿白坪大街继续向上，去往高速公路下跨道和凯尔伯草坪，到那之后才在白杨树林处停住脚步，但是我找不到门，连一扇门也没有，只在墙上有一道窄缝，透过缝隙我可以看到院子，但是缝隙对我来说太过狭窄了，以至于我连手都插不进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试了一下，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在尝试过程中我的胳膊卡住了，我就像钓钩上的鱼儿一样扑腾个不停，但是我不敢向后转身，因为我害怕那个瘦长干瘪的身形会突然站在我身后，不管有没有披着圣带。确切地说楼梯和墙上的缝隙我都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可能整个这段时间我都躺在饭馆的地面上。那个瘦长干瘪的形象或许源自我和阿希姆在他房间里一块儿看的那一集《宾尼兔》动画片。无论怎样，后来我不知怎的又回到我们家院子里。我记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家的。但我不认为是有人把我送回了家。然后我经过厨房、蹑手蹑脚地溜进自己的房间，因为我一直还没有真正下楼，进房间之后我和衣躺在床上，因为我一直还感到头晕目眩。每当我看到那张滚石乐队成员的招贴画时，它就挂在我床对面的衣柜上面，画上的人物就会动起来，准备走下画面朝柜子和走来。我有一种内疚感，我之所以挂起那张招贴画，是因为一旦克里斯蒂安妮到我这儿来时能看到它，而其实我是不愿在屋里挂滚石乐队的招贴画的，因此就算是挂也把它挂到后面的衣柜上面，因为靠前挂在我写字桌上面的是披头士乐队、奇想乐队和小脸乐队的招贴画。那是一张非常流行的照片，它也贴在歌曲《跳动的闪电杰克》（Jumpin' Jack Flash）宣传画的正面上，即便是没有吸食掺入鸦片的印度大麻，照片本身也已经够令人毛骨悚然了，因为米克·贾格尔的嘴里插着一把匕首，布莱恩·琼斯手里握着一把三齿叉，比尔·怀曼左手拿着一副脸前挂着髭须、抽着一根大麻烟卷的粉红色面具，尽管他是惯用右手的人，可能他这样做是为了影射保尔，因为滚石乐队成员当中没有人是左撇子，而披头士乐队中却有两名左撇子，林戈也算是左撇子，尽管他是在专为惯用右手的人设计的打击乐器上演奏，或许是因为他必须要学会这么做，就跟我在公立学校也必须用右手写字一样，虽然我更愿意用左手书写。查理·瓦茨脸前裹着一条围巾，嘴里含着一只灯泡，凯斯·理查德兹穿着摩托服，涂着红色的指甲油，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戴着一副我也在找寻但却未能

找到的墨镜，因为在百货商场或者西雅衣家总归什么正经东西都没有，在威斯巴登总是所有的东西马上就卖完了。第二天我不必去上学。我也确实无法去上学，尽管我没有真正得病。我只是不断地觉得听到火车的声音，这种声音人们原本只有在“歌手之家”饭馆里才能听到，因为饭馆后面就紧临着铁路路堤。但那也可能是工厂院内卡车的声音。人们给我端来切成片的苹果和烤面包片，但是就连这些我也吃不下去，我感到不舒服极了。

庆祝活动结束后在加贝斯波尔纳/沃尔克大街的拐角处 发生了什么

克劳迪娅不再站在桥上，让自己动手裁剪的木偶小衣裳穿过冬季灰色的空气飘落到车行小吃道上。她不再整天听着莫扎特整理厨房里的餐具：茶匙、餐后小吃用勺、食匙、汤匙，它们一动不动地慢慢从灶台朝水槽方向排起了长队，起初纵向延伸，然后像棺架一样并行排列，惨淡的灵魂之光如同冷却的蒸汽一般从这些状如棺架的餐具中逸出。她不再和陌生人的狗交谈，根本不再碰它们一下，不再拥抱它们，不再扯拽狗的颈圈，不再高声怒骂狗的主人，不再宣称比饲养者能更好地理解动物，当她和加比、玛里昂以及克里斯蒂安妮沿着老路线首先去大桥、继而朝水塔方向转悠的时候，她几乎什么话也不说了。她站住不动，数货车车厢，猜出里面装的是什么货物（母牛）。

她不再和我们一道坐在化学课堂上，因为她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她冲着我微笑，因为她知道我爱上了克里斯蒂安妮。当阳光洒在亭子上，当我推着自行车走出地下室时，她不再跟我攀谈。她不再说：我看到你们了，在沃尔克马尔附近的庆祝活动结束之后，就在加贝斯波尔纳高处的拐角处，克里斯蒂安妮在那儿等她的男朋友，你站在她身旁，在寒冷中耐心等待，尽管时间已过十点，而你十点左右必须到家，你总是把她所说的一切都信以为真，不知道马上来接她的是否真的是她男朋友，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是高年级学生，因为在我们学校你从未见过他，但是随后你认为他还是来到了古腾堡，同时希望那或许只是她的一个堂兄，或者是她父母的一位熟人，她只是想简单地以此来吹牛罢了，因为另一方面当轮到她在生物课上回答问题时，她竟然不知道男人的睾丸是长在外面的，而是回答说“里面”，对此全班哄堂大笑，所有的男孩都在笑，因为他们终于能够报复那些总把他们当小孩对待的女孩了，只有你没有笑，只是看着她有多难为情，事后她跟加比和玛里昂站在外面，非常大声地说道：“下一次我必须把这个再仔细查看一

下。”当你们从她们旁边走过时，情况并没有好转，相反却变得更为糟糕，因为其他男孩现在总在说：“然后我必须把这个再仔细查看一下。”只有你除外，你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为否则的话你会不遗余力，就像在加贝斯波尔纳高处的拐角处那样，你最喜欢永远跟她站在那里，她在吸烟的时候你就朝下看着你的牛仔裤，明爱会那位女士把你的旧吉他的带有黄色图案的背带作为镶边缝到了牛仔裤上，其实在这种场合你根本就不该穿牛仔裤，反正那是一次例外，或许是作为安慰，因为你母亲又住进了医院，明爱会那位女士理解这一点，因为她以前也总要把她的衬裙存放在一位女友家里，也正因为你母亲又住进了医院，你才可以站在加贝斯波尔纳高处的拐角处，尽管时间已过10点，因为你太紧张了，因为你把她所说的一切都信以为真，所以你想不起任何可以跟她交谈的事情，无论如何你都不想和她谈论学校，也不想谈论音乐，因为在这方面她没有把握，只是一味地模仿玛里昂，玛里昂跟你匹配要好得多，虽然她对滚石乐队成员评价很好，因为她非常了解他们，她甚至还熟悉齐柏林飞艇乐队，但是你爱上的不是玛里昂，不是加比或者我，而是克里斯蒂安妮，在聚会开瓶时你一次也不接近她，因为她也不擅长搭讪，但她还是坐在那里，这对她来说是典型的，非常典型，而我只是坐在后面的长沙发上，看着你怎样和阿尼塔、继而又和玛吉特出去，阿尼塔认真地吻了你，用张开的嘴巴和舌头，而玛吉特在吻你时连嘴里的口香糖都没有取出来，但是你并不介意这一点，因为如果不是克里斯蒂安妮反正一切对你来说都无所谓，尽管当时搭讪比后来真的站在那里要更好，有所企盼要更好，因为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对愿望加以想象，虽说愿望与现实总是有出入的，然后你和她站在加贝斯波尔纳高处的拐角处，你只是希望那一刻终将过去，希望你又是一个人，这样你就又能希望再一次和她单独在一起，再次绽放你的想象力，而不必像现在这样考虑再三，甚至连点燃一根香烟的胆量都没有，因为你愿意做好一切准备，在那里一直坚持待到她被接走为止，当然你不是真的希望那一刻过去，但是如果事情结束了也没有关系，那样你就可以一个人从加贝斯波尔纳往下走，终于可以感受你现在无法感受的一切，然后你也能抽一支烟，再次渴望见到克里斯蒂安妮，这是一种就像你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奇想乐队的歌曲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在听奇想乐队演唱时才会出现，特别是听《见我的朋友》（See My Friends）和《我与众不同》

(I'm Not Like Every body Else) 这两首歌时，你于寒冷中在那个地方站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渴望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到播放的磁带前面，即使你在房间里不能吸烟，不知什么时候克里斯蒂安妮真的说道：他来了，边说边指向一辆浅蓝色的大众甲壳虫，它从森林大街拐过来，穿过桥洞朝我们驶来，现在你在越发紧张的同时也如释重负，你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在从加贝斯波尔纳往下走，看到自己点燃一支香烟，但就在这时克里斯蒂安妮转过身来，当那辆浅蓝色的甲壳虫正在掉头准备停在你们这一侧时，她转过身来吻你，她吻了你的嘴唇，然后她又转回到甲壳虫方向，车里的灯光亮起，因为司机打开了朝你们一侧的副驾驶座车门，但是她没有马上上车，而是再一次朝你转过身来，再一次吻了你的嘴唇，之后她才上车拉上车门，甲壳虫朝它来时的方向驶去，而你（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则尝试回忆是否见过司机的脸，而不是回忆那两次你刻意淡化的亲吻，因为你无法正确理解两次亲吻，仿佛司机的面孔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接下来你尝试对它进行建构，他可能是随便某一个人，但恰恰不是来自学校的学生，不是高年级学生中的一名，而可能是亨克尔公园里网球场上的某人，你有时候会路过那个网球场，紧接着你意识到这样的想法有多无聊，因为你又想起了那两次亲吻，然后你思考克里斯蒂安妮为什么吻了你，恰恰是当那个家伙已经在场的情况下，你思考她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是否她想向你表明她多么不在乎你，因为你还是个孩子，人们可以随便亲吻小孩，坐在浅蓝色甲壳虫里的那个家伙是绝对不会嫉妒小孩的，因为你的确还是个孩子，你就一直这么继续思考下去，然后你往相反的方向去想，即她想向坐在浅蓝色甲壳虫里的那个家伙证明些什么，但却想不通在那一刻发生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只能在那一刻吻你，因为在吻你的同时那一刻就结束了，因为你不会在那一刻之后做出任何举动，当然你绝对不会让自己做出任何举动，而只是在那儿站着，即使她提前五分钟吻了你，当那辆浅蓝色的甲壳虫还没有闯入你的视线时，但是你不会想到这些，与此同时你没有从加贝斯波尔纳往下走，而是穿过下面市郊的小菜园，看到在溪边的草地上几片雾气是怎样升腾在凹陷的大黄叶片上的，你在想发生在女孩身上的一切总是多么的有戏剧性，她们一块儿上厕所，经常感到眩晕或者恶心，这一切你都无法理解，你现在点燃了最后一支“塔林”牌香烟，心想你必须挺过夏季到来之前的这几个星期，在这之后反正你要摆脱所有这一切，然后

你降了一级，低年级的女孩都还是些孩子，如果你在校园里看到克里斯蒂安妮，你会干脆把目光移走，尽管如此真到了那个时候，施密特-埃瑞也会狠狠地扇你五记耳光，这样你也就不被允许参加补考了，最后几天和其他同学一道坐在班级里已经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了，早晨走进教室，中午走出教室，总是带有这种感觉，即这一切很快就将永远结束。在暑假前透过窗玻璃照进来的光线里，白天变得异常不真实，授课时数已没有多大意义，站在讲桌和黑板之间的老师们轮流授课，他们站在那里讲一些你不再能听进去的东西，因为你只是在看那些光线，还有闪烁发光的洋槐树枝，当你下午回到家里，一个人坐在厨房里的時候，因为你母亲又去了医院，你父亲在办公室或者办事处，你弟弟由明爱会那位女士领着去了一个儿童游乐场，这正是你求之不得的，因为否则的话只会因成绩单、留级和无休止的听音乐而引发争吵，在闪烁的光线下你打开那两张纸条，它们是早上第一节课前放在你座位上的两张折叠起来的小纸条，纸条里面分别用不同的笔迹写着“你很惹人喜爱”和“可惜你留级了”，而你不知道它们是谁写的，只知道不是克里斯蒂安妮写的，这一点你很肯定，也不是我写的，这么说不仅因为我和你根本不在一个班级，也因为我正好面临其他问题，而你是不知道这些的，因为你对我的了解仅限于，我跟古多一样在同一个基层工作小组，我和克里斯蒂安妮是好朋友，但我不会像古多那样谈论铅笔的事儿，也不会谈论有关克里斯蒂安妮的任何事情，当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碰巧凑在一起、一块儿谈论奶油或者施莱默儿·舍沃的时候，你已经有两次借给我一马克用来买一小包“塔林”牌香烟，这也是你喜欢抽的牌子，我知道有一次，你自己的烟抽完了，而我的也只剩下一支，你问我是否我可以让你吸一口，因为你当时正好挨着我坐，于是我就干脆把嘴唇压到你的嘴唇上，把烟吹进你的嘴里，但是我这样做并非是要挑逗你，而是因为整个那几天我都特别紧张，因为劳动节文艺汇演，但是对此我当然无法和你交谈，因为，我怎样向你讲述呢，因为他们想让我在演出时脱去衣服，这事我连加比、玛里昂或者克里斯蒂安妮都没有告诉过，因为导演简直就是一个傻瓜，但尽管如此我还不得不那么做，否则我就会被踢出去，我知道，尽管如此你还是为我感到遗憾，因为我看上去那么悲伤，虽然我一直在龇牙咧嘴地傻笑，一直在抬眼望天，在我向外吐烟的时候，你甚至思考了一会儿，为什么你竟然没有爱上我，因为这对你来说显得更加容易和合乎

逻辑，因为你还是不了解我，但是幸亏不是这种情况，不然的话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即使我不知道我们在一起会怎样的情形，因为我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总体说来不仅是在剧团，不仅是在基层工作小组，不仅是在家里，因为我在哪儿都不想被踢出去，特别不想作为傻气的跑龙套角色被踢出去，如果你要摆脱充当小人物的想法，那么你就可以忘掉这件事了，我边想这些问题边坐在你身旁吸烟，知道你在想克里斯蒂安妮，或者在想你留级的事以及谁给你写了那两张纸条，我知道你并不在意我的胸，因为你的注意力不在这方面，因为对坠入爱河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其他方面，但是那个导演、那个傻瓜当然注意到了我的胸，现在他想看它，仿佛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在剧中让其中一名演员扯下我的上衣，这样我就必须到处乱跑，直到这一场景结

束，我勉强能够阻止在排练时也这么做，也就是说上衣里面什么也不穿，但是在预演时我就必须真的要赤裸上身了，而这样的预演又恰恰属于你们学生的预订专场，虽然你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可你偏偏去看了这出戏，因为你已经放弃了去看《天鹅湖》，你父亲生气地问道，他花钱给你预订学生专场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母亲在医院里说，要是她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她是多想再去剧院看戏啊，于是你就进了剧场，我一眼就看到了你，而且还在二楼楼厅，幸亏是在另一侧，我不知道情况会更糟还是更好，无论如何不会更好，但是我又转念一想，这样我至少能够让你看到我的胸，虽说你平时不注意它，这比克里斯蒂安妮的两次亲吻价值要大得多，尽管你对此当然一无所知，但是然后我感到更加没有自信，几乎想要逃走，就在演出即将开始之前，随后导演看到了他所策划的剧情，尽管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其他女人也这么说道，她们挡在我身前，其中一人还干脆把撕碎下垂的上衣又往我的胸上搭了一下，我自己可不敢这么做，我只有一次，也就是在我刚刚下定决心时，非常自信地朝你转过身来，但是紧接着我就羞愧得面红耳赤，以至于我差一点儿栽倒在地，因为紧张我感到如此眩晕，这种令人讨厌的紧张，那个该死的导演，演出结束后我只想离开，只想跑出去，我没有卸妆，什么也没有做，只披了件大衣就跑到外面的夜色中，你站在那里，可能仅仅是巧合，我们去到那边的喷泉柱廊，坐在那里的台阶上吸了支烟，过了一会儿我问你感觉如

何，你只是耸了耸肩，因为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是戏剧还是我的胸，因此我只是说道：导演是一个傻瓜，然后我们看着那边开来了好多辆出租车，人们上车之后接着驶离，又过了一会儿我们起身前往公共汽车站，我又想起自己还没有卸妆，我指着自己的眼睛做了个鬼脸，你微笑起来，然后我干脆说道：现在你看到了我的胸，你声音非常大、语速非常快地否定了这一点，你说你当时坐在最后面，尽管你是坐在最前面，你说可惜你根本就没有看到我，我觉得你这样说挺可爱的，虽然“可爱”这个词我觉得很傻，而且我绝对不会给你写纸条，上面写着“我觉得你挺惹人喜爱的”，这一次我尝试不做鬼脸，而只是索性看着你，与此同时你登上公共汽车，我还站在原处等8路车，你转过身来对我说“周一见”，我也回了一句“周一见”，尽管我知道周一我将不会出现在学校，你将会在课间找我，将会只看到加比、玛里昂和克里斯蒂安妮是怎样站在一起激动地交谈，但是你不es敢问出什么事了，相反放学之后你骑着自行车向下去了古腾堡，在那儿等古多，问他是否知道我出什么事了，只得知我早在数周前就被赶出了基层工作小组，对此古多的用词是“开除”，当你问他是何原因时，他只是单调机械地说“对暴力问题不明确表态”，仿佛你能够对此做点儿什么，古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又补充说：她没有拥护基层工作小组的观点，你对他说：天哪，古多，我可知道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古多又摆出他惯常的派头开始空话连篇：我们把革命过程理解为是持久的，革命不是到处噼噼啪啪地乱放几枪就能成功的，这是一项要求很多理论渗透的长期事务，因此我们也定期碰面，就连这一点他也抑制不住，也包括那种习以为常的要求：你就到我们这儿来一趟吧，对你来说很多问题都会澄清的。因为他不明白，恰恰是所有这些你都不感兴趣，你的问题在他们那儿是不会得到澄清的，因为他们不会告诉你该做些什么，如果你留级的话，或者如果某一该死的导演要求你脱去衣服的话，但是你不依不饶，继续问古多是否在那之后他又见过我，不，当然没有，这个马屁精可能甚至会朝另一个方向望去，如果他碰巧在毛里求斯广场遇见我的话。我们彼此也不是很熟，他又补充说，但是你想知道的是其他一些事情，你接着问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和我商量此事，为什么他们干脆把我排除在外，随便把某人排除在外，这就好比是，你在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可你只想到了“留级”这个词，这明显是不合适的，但是古多又开始胡说八道，

他声称他们已经就所有的事情跟我讨论过，但是一旦违背了某些原则是不行的，于是你问他那是些什么样的原则，这样他就又把旧账翻了出来：在其他组织取得成员资格，我们是不能容忍这样做的，这是当然了，你点头称是，因为你和你的童子军成员们对基层工作小组的设想是一样的，因为你想起了天主教或者新教、迈尔克林或者弗莱施曼、披头士乐队或者滚石乐队、哥哈钢笔或者百利金钢笔，它（他）们也是相互排斥，人们也不能同时觉得它（他）们都好，然后你又骑着自行车上山，暂时分散了一下注意力而不再想我，因为你对基层工作小组的想象跟你的童子军成员们是一样的，这样的组织都有集会和宿营地，都配有一个写满任务的考核本，人们必须完成那些任务，为了能够晋级并在上衣胸前的左兜上缝上相应的纽扣，然后你想到了你特地修建的鸟舍，想到你必须了解你的命名日和德国圣格奥尔格童子军的四个部族，然后你思考在基层工作小组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任务，但是你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你忘掉基层工作小组和我，又在想克里斯蒂安妮，在想明爱会那位女士做的什么午饭，你不必再做家庭作业，只要闲坐着就行，晚上用磁带从收音机里录一些音乐，改天再仔细聆听一遍，这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鸟儿在木桥下面浑浊的小河里不为所动地啄食。克劳迪娅向前依靠在桥上，自认为辨认出一条鱼，她说道：下面那是一条什么样的鱼呢？你看，就在那儿，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团被卷起来的报纸，从报纸里不是还伸出一块牛舌吗？一个装有淡红色沙子的沙钟立在餐桌上。时间刚过六点。最后一块蓝色的天也变成了灰色。烤箱的灯光照进半明半暗、堆放着许多小碟的厨房。窗前那段被侵蚀的围墙在黯淡的黄昏里变得模糊起来。克劳迪娅回忆起那件米色的连衣裙，她母亲当初在北海度假时就穿过它，当时她妹妹得了病毒感染，她父亲把她拖到那个可怕的医生那儿，然后画面暂时消失，她闻到的只有诊所的味道，直到从这股气味中浮现出一个椭圆形的玻璃杯，里面装有未包装的棒棒糖，所有的棒棒糖都彼此粘在一起，尽管她对此感到恶心，她也不得不取了一支并且说“谢谢”。然后她感觉手指上有一些潮湿的东西。可能是她不小心用手触到了嘴唇上一处开裂的地方。然后她产生了想用胳膊去拥抱一头母牛的感觉。她想拥抱的不是母牛的脖子或者头部，而是母牛的身体。她想让自己头朝下悬挂在母牛身上，在教堂塔楼的钟

声中，与母牛一道穿过夜幕被赶进牛棚。只有这样才会使她平静下来，行进中母牛呈波纹状来回晃荡的肚子撞击着她的脸部，肚子里孕育了许多胃，它们受持续的咀嚼节奏所操纵。鸟儿飞去，只剩下轻微的波浪声能够被听到，波浪围着那节沉重的树桩泛起涟漪，树桩肯定是有人扔进溪流的。

当然纳粹对一切都负有责任

当然纳粹对一切都负有责任。他们把我母亲关进了劳改所，在我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判处他死刑，派我们做校长韦普勒和数学老师荣格的上司。他们把德国划分成区镇边界和河谷低地，给每一个小村庄都套上了一个直角形的街道网，引入了溪流大街、菲尔德大街、行政区大街、白坪大街、火车站大街、加尔根雷德尔大街以及其他128个“只在设立路牌时才被使用的”街名，这些街名我们在任何中等大小的地方一直还能碰到，因为战后有比任命一个委员会令其想出新的街名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尽管处在废墟中的城市现在面临一次难得的时机，以修建新的街道并相应对街道重新命名。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的开始永远也谈不上，这是纳粹留下的真实遗产，也就是说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简直无法停止超越他们自身的消亡而继续产生影响。

人们在历史上寻找一种真正的重新开始总归是徒劳的。在生活中这种找寻也是徒劳的。即使有时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会侵袭人们，比如说在鼻梁骨断裂之后，或者对于每一个新买的写字本而言，当自来水笔在第一页上流畅地滑动，而有很多错误、墨渍、划掉的句子和撕去的页码的旧本子则永远消失在书包里。但是一旦第一页被翻过去，新的开始也就随即结束。书写垫片已经磨损了，笔尖吃力地蹭过彩带，彩带左右颠倒地从第一页微微透了过来。对于纳粹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十字钩能够穿透一切，透过每一栋砖砌建筑、每一座高速公路桥、每一片杉树林、每一个目光、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生活在匮乏和混乱之中。闲荡，逃脱，5点半时路过照得通亮的操场，当升起的晚霞布满了石油色的天空时。

长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对激进共和主义者的蔑称。

长裤汉^①们实施了新的月份，每月三周，每周十天，每天以两个十小时计算，同时他们还重新命名了月份和路牌，给教堂钟楼扣上了便帽

式顶罩，以使基督教象征物不再继续高傲地突出于公民的简陋住房之上。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致使其失败的原因用专业概念来说叫“预辩法”（预先提可能有的反对意见而加以辩驳）。虽然人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借助历法原点重新开始一段历史，但在迫不得已时人们也须注明在这一原点之前事件发生的日期。如果不用预辩法注明日期，人们就必须说：1945年5月7日纳粹尚未投降，但是在0年1月1日他们已经投降。这样说会令人感到困惑，因为人们不清楚，是否0年1月1日这一日期直接跟在1945年5月7日之后。但是如果人们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用预辩法注明日期，那么人们就会按照错误的年代排列顺序谈及一段先于重新开始的时期。通过按历法排列日期，人们使起点不再具有“新”的特征，因为现在看上去似乎是起点之前的时间在为重新开始做准备，仿佛是历史的重新开始要归功于纳粹，最后甚至合乎纳粹的心意，正如从基督教的目的论视角来看所有的宗教都仅仅是基督教的预备阶段，在基督教中实现自我。如此看来重新开始成为一种可怕的精神负担，它从两侧按时间顺序被用水泥粘固起来，永远也不再允许真正的重新开始。

但是事实上1945年5月8日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没有重新确定日期，没有零点，什么也没有。当罗马人于公元708年从罗马建城开始把他们的日历系统调整为儒略历时，这种情况导致了所谓的混乱年，因为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一种日历系统被另一种日历系统所取代。在引入格里高利历时人们想避免这种混乱，于是就干脆确定了一个日期，从这一天开始儒略历不再生效，即从1582年10月4日开始。十天之后，也就是在1582年10月15日，格里高利历正式生效。虽然人们以此避免了混乱年的出现，但是却有十天对于历史学而言完全没有记载日期。而我们竟然什么也没有：没有零点，没有混乱年，甚至连未记载日期的几天都没有。至少人们明晰了这一点，即在纳粹和其后的时期之间存在一道沟渠，人们不能就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人们必须总要想着这道沟渠，不能简单地从1945年5月7日继续数到5月8日。这样人们至少可以把纳粹当作借口加以利用，就跟采取短于正常历年度的学年一样，然后人们说正是因为纳粹以及在纳粹统治和新的历史起点之间缺少的天数，才使得人们无法做家庭作业，或者老师们必须中断教学，包括后来夜校的停课。相

反在班级郊游时人们必须假装去埃塞克斯郡，并做出从荷兰来的样子，因为否则的话英国人只会高喊“希特勒万岁”，这样理性的会话就不再是可能的了。

荷兰精神分析学家凯斯·范·东克在一篇论文中把五十年代末德国这一典型的初始状况描述为“跳马情结”。东克在文中写道：“因为担心自己被剥夺权力，神话里的父亲一般都会杀死他们的孩子。乌拉诺斯一再把他的后代推回到母亲腹中，直到他在这一过程中最终被克洛诺斯阉割。克洛诺斯重又吞吃自己的孩子，直到他被宙斯制服，宙斯的母亲用一块石头替换了他，以此免于他遭到父亲的迫害。但是在德国父亲们允许他们的儿子繁衍后代，在他们割去儿子的睾丸并重新获取统治权之前。儿子们的过错被用作剥夺其权力的借口。然而事实上无生育能力的父亲们从未真正把权力要求交给过儿子们。因此发生的并不是显性，而是一种隐性的遗传，也就是说祖父们的基因遗传特征在孙子们身上得到了再现，而以显性的方式遗传给儿子们的基因份额表面上看是跟儿子们一道被清除和消亡了，但实际上仅仅是被排挤掉了。”——本章以下注释，都是作者原注。

纳粹们倾向于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学校和公共设施。为了至少与此划清界限，联邦共和国颁布了一部法律，据此只有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才被允许用来进行官方命名。只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在邮票和钱币上描绘政治家们。特奥多尔·豪斯就一再出现在所有面值及明暗色调的钱币和邮票上。总是相同的侧面像，总是相同的大小，无论是在克里斯蒂安妮·韦根从诺德尼岛寄来的明信片上，还是在我叔叔从曼海姆寄来的包裹上。相反来自蒙古的邮票是三角形的、菱形的或者竖起的，它们用刺眼的颜色展示了禽类和具有异国色彩的动物，而蒙古只是苏联的一个仆从国，在经济上肯定比年轻的联邦共和国更加拮据。德国的邮票如此缺乏创见，其原因或许根本不在于资金匮乏，而在于对新榜样人物的渴念。这种新榜样人物就是豪斯和阿登纳。因为他们俩都比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年长，所以人们感觉能够把纳粹作为一个偏离正道的时期加以克服，与上述两位刚正不阿的代表性人物一道，使自己与之前联邦总理和联邦总统所来自的那个时代联系起来。同时人们能够通过阿登纳驳倒唯一不是从司法角度、因此

也是更为频繁地为希特勒独裁做出的辩护，即所谓的“速度辩护”（“希特勒至少修建了高速公路”），因为作为他那个年代德国最年轻的市长，阿登纳早在1932年8月6日就为德国第一条高速公路（555号高速公路）举行了开通仪式。阿登纳和豪斯的祖父们以此又接续了基督教民主传统，其起源可以确定为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的某个时候，也就是说“一战”前的帝国时期，当时的帝国正开始通过实施给男人的普遍选举权使自己民主化。人们想在新的共和国延续那时的民主化努力，因为相比一种新的独裁，人们更害怕魏玛共和国“过度的民主理解”，父辈们的暴政政权正是源于这种理解。通过消除纳粹统治产生的历史原因，废除被纳粹描述为“凡尔赛耻辱和约”的和平条约，人们同时也象征性地与一种可能的权利转让保持了距离，因此能够在战后不久就提出必须与上代人遗留下的债务做一了断，能够把自己理解为战争受害者和普遍受害者。毕竟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幸存下来的祖父们不得不照顾他们未成年的孙子，还有哪种命运比他们的命运更悲惨的呢？

这些孙子在新的共和国里作为孤儿站在教堂和学校门口，为母亲康复组织出售纸花。母亲康复组织取代了纳粹时期的冬季赈济组织，但却保留了母亲十字勋章上那幅象征性的母亲图片。如果在纳粹统治时期一名母亲生了四个、六个、八个或者更多德国血统、遗传健康和品行端正的孩子，她就能够获得三级、二级或者一级母亲十字勋章。勋章上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反正他的名字无处不在）旁边写着：孩子使母亲显得高贵。现在在生完孩子和清理完废墟之后，母亲们被卸下套具，必须被遣送到博尔库姆岛或者施皮克罗格。孩子们也要被遣送，特别是如果他们来自柏林的话。为此人们废除了母亲十字勋章，就连原先颁发的母亲十字勋章也不再被允许在公共场合佩戴。在所有的纳粹勋章中人们现在只允许披挂铁十字勋章。不过装饰有金橡叶、利剑和宝石的骑士十字勋章除外，但是这也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这种勋章只颁发过唯一的一次，并且是授予了战机飞行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战后鲁德尔住在那些《禁止佩戴纳粹勋章法案》不生效的国家，即首先在独裁者庇隆治下的阿根廷，在其倒台后又去了独裁者斯特罗斯纳统治的巴拉圭，最后在阿连德遇害之后生活在尊严殖民地，从那里开始他头戴非常合适的巴拿马草帽，作为西门子和其他德国公

司的贸易代表旅行考察南美。比上面提到的骑士十字勋章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大十字勋章。这种大十字勋章也只授予过一次，即颁发给了赫尔曼·戈林，但是就在他自杀前不久，希特勒又剥夺了他的大十字勋章。

尽管纳粹党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宣布为是一个犯罪组织，这样一来佩戴和展示十字钩就被纳入禁止使用违宪组织标志的范畴，但是人们不是十分肯定，应当怎样在公共区域对这种纳粹标志进行更为细腻的描述。1938年在乌克兰西北部策尔尼科夫附近的一片松树林里，人们按照十字钩的形状种植了一些落叶松，它们属于所谓的“听命于时令交替”的象征，因为落叶松虽然属于松科植物，但是与松树不同的是，它们在秋季变成淡黄色，松针脱落，以至于只有在这个时候和冬季人们才能从空中分辨出十字钩造型。因为东德严厉禁止飞机飞越其领空，故而这一标志为人们所遗忘，在两德重新统一十年之后才又被发现，最终人们砍伐了二十五棵树木才使得纳粹标志变得无法识别。

在某些城市除了方位编号（街道右侧用偶数，左侧用奇数）和马掌形编号（编号从街道右侧的第一栋房子开始，不间断地一直持续到街道末尾，从那里再沿街道左侧返回）之外，由纳粹实施的街道的十字钩编号也即刻被常用的锯齿形编号所取代。即使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十字钩编号也未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因为这种编号太不精确和太混乱了。德国公路总监弗里茨·托特乘坐的飞机于1942年2月8日就在狼穴附近莫名其妙地坠毁，托特在这起事故中遇难，之前他曾与希特勒发生过争执，争执的焦点也是围绕十字钩编号的，直到最后一刻托特还在明确反对这种做法，托特死后帝国邮政部临时接管了他的任务。一段时间以来帝国邮政部下属的科研机构已经不再致力于其原本的任务，相反却在一名班内茨博士的推动下，研究从核物理方面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为了转移公众和对口部门对这种泛滥的研究活动的注意力，人们于1942年4月20日颁布了一项试用规定，规定力求在德意志帝国全境“全面推行十字钩编号”，但是首先必须在被保护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及被占的波兰领土上加以实施。跟马掌形编号相类似，十字钩编号也是从街道的右侧开始的，然后正好在右侧街道的中间位置又调换到街道左侧，从那里继续沿原先的方向往下编号。在街道末

尾编号又换回到街道右侧，从那里继续沿反方向朝街头延伸，到了中间位置编号再次调换到街道左侧，从那里同样继续沿反方向朝街头延伸。根据1944年5月22日颁布的信件分送修订细则，邮递员必须严格遵守上面提到的编号顺序，否则将会面临拘留处罚的威胁，这种情况导致了他们的工作时间翻番。

在帝国土地规划局把康拉德·阿登纳1932年为之举行过落成典礼的第555号高速公路从形式上降格为乡间公路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得以在1933年9月23日通过挖第一锹土，宣告帝国高速公路第一分段建设的开始。在听取了不同意见之后人们在当年夏天就一项计划达成了一致，根据此项计划德意志帝国应该被覆盖一张呈十字钩形状的高速公路网。这样一条轴线将会从吕贝克通向不来梅，从那里继续通向莱比锡，再从莱比锡向下通向纽伦堡，与此同时第二条轴线从杜伊斯堡通向法兰克福，从那里通往诺伊施特累利茨，最后再通向兰茨贝格。纳粹的宣传机器把高速公路的修建描述为“我们时代的大教堂建筑”，这一新时代的十字架也应当相应地把自己铭刻在这片土地上。

理查德·瓦格纳1869年就对这个话题如是写道：“如果犹太人提升了他的言语方式，用这样的方式他只能让我们觉察到那种显得可笑的热情，但却从不会令我们体会到因同情而感动的激情，更不用说对歌唱艺术的激情了，那么他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堪忍受的。”

总而言之纳粹污染了我们全部的语言，因此我们不再可能表达矛盾的心理或者进行抽象思维。鲜血、土地、睾丸、奥登瓦尔德，这些仅仅是几个例子而已，但是归根结底就连“归根结底”这一表达和“例子”这个词也渗透了纳粹意识形态（同样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纳粹用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制了一种刻度盘，用来计算纳粹用语在词汇、惯用语和概念中的剩余比例，它用十二个刻度来表明德语语言中所有那些不是特意在帝国人民启蒙和宣传部产生的词汇。属于在可评价范围之外的概念比如说是像“最后解决”和“最终胜利”这样的词汇以及带有目的论导向的概念，此外还有技术类造词如“合并”“短路”“一体化”“高速公路”“大众汽车”“用毒气杀死”“备用发电机”或者用仪器来描述某一组织机构，另外还有描写偏执狂式抵抗的概念如“人民力量和武装力量的

瓦解“种族耻辱”或者“敌对宣传”，以及特殊的词语连接如“源自喜悦的力量”“人力资源”或者“酸白菜排骨”。例如“阿尔卑斯山夕照”这个词的纳粹用语因子为10.3，它在划分成12个分度的刻度盘上位于高位区域。作为在1945年以后产生的概念，“阿尔卑斯山旅游业”以7.3的因子达到了最高值，但还是被“高山牧场风笛吹奏者”以10.7的因子超越，尽管这一造词同样源于战后旅游业，后来它被扣去1.3分的事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否则“高山牧场风笛吹奏者”将会占据刻度盘的最高位，因为在上奥地利“风笛吹奏者”从1941年春季开始就是意指犹太人的暗语，因为“咿咿呀呀地吹奏风笛”被用作“反复用常声和假声的调子歌唱”的同义词，在反犹太主义的煽动中它被用来影射据称无法理解的犹太人的言语方式。

整个固定词组构成了一大特点。例如“这真蹩脚”或者“将某人狠狠揍一顿”。如果无法通过每一个音节对纳粹的意识形态做出牺牲的话，那么人们（纳粹用语因子8.7）归根结底（纳粹用语因子6.3）什么也不能（纳粹用语因子8.7）能（纳粹用语因子4.1）说（作为不带介词的基本形式，其纳粹用语因子为3.0，带相应的介词定位也相应会更高一些，如“陈述”的纳粹用语因子为10.1，“断念”的纳粹用语因子为10.3，“耳语”的纳粹用语因子为9.3）。

不同于在其他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羞愧文化或者罪责文化，德国是一种典型的忌妒文化，这一点我们当然也要归功于纳粹。谁要是比如浏览一下《南德意志报》专栏，或者翻看一下以前的《时代周刊》或者《法兰克福汇报》专栏，或者阅读任意一种专栏，他会在每一页上和每一段中发现，由纳粹首次采用的“妒忌”一词（纳粹用语因子3.2）占有多么重要的主导地位。（“妒忌”一词较低的纳粹用语因子产生于这一事实，即这一概念与一种始终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情感关联在一起。）当然仅仅是“专栏”（纳粹用语因子9.8）这一名称就预示着不祥之兆，但是在这里不便对此详述。《南德意志报》专栏里会定期刊登名为《您现在什么也不说》的述评，文中人们首先被剥夺了使用语言的权利，紧接着被迫做各种鬼脸和扭曲肢体，为了以此回答采访者盘根究底的问题，这是一种来自纳粹刑讯室的实践做法，在那里其他一些折磨人的方式写在每天的议事日程（纳粹用语因子11.7）上，比如

撕扯舌头或者打碎喉头。仿佛是出于讥讽之目的，这些刑讯场面每周都会按照里芬斯塔尔风格被拍摄成黑白照片并被公开展览。我们继续来思考《南德意志报》专栏吧：那里有一篇名为《良心问题》（纳粹用语因子10.4）的述评，文中一名获得双学位的记者（“博士”一词的缩写形式Dr. 的纳粹用语因子为8.3，相反全称形式Doktor的纳粹用语因子只有7.2）回答了有关伦理（纳粹用语因子7.0）方面的问题。接着还有一篇名为《尊敬》（纳粹用语因子8.8）的述评，总之不同专栏探讨的都是不同的话题，在此以下情况丝毫不令人吃惊，即在随机抽取的2010年3月5日（纳粹数据因子8.8）的《南德意志报》专栏里，竟然同时有两篇文章对鲜血—土地—忌妒意识形态表达了赞意，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在自称摆脱了纳粹65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尽管专栏都是由年轻（纳粹用语因子10.8）记者撰稿编辑的，他们自己在1968年尚未出生。这一特殊情况涉及的是“最大的伤害”（形容词最高级是纳粹语言的八大主要特征之一），是一个男人（纳粹用语因子11.3）或者一个女人（纳粹用语因子11.3）所能遭受的最大伤害。仅仅是“最大的”（纳粹用语因子11.8）这一夸张手法，再与“伤害”（纳粹用语因子7.7）这一词汇结合在一起，当然首先就是对大屠杀的一种阴险和下意识的否定，以及对所有其他人们每天对自己和彼此造成的事实伤害的否定。仅用颓废和心满意足对此做出道歉，这对于一家报社的专栏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该报高擎捍卫严肃新闻业的最后一面旗帜（纳粹用语因子11.8），但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它没有注意到，所有那些已经被鄙弃和排斥的成分在经过高亮度抛光处理之后又在自家报纸的专栏里得到了重现。在此被称为“最大伤害”的伤害无异于是对自己虚荣心的伤害，它仅仅是取代了事实上的伤害而已，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情况，这种“所有时代里最大的伤害”涉及的是一种种族遗传伤害，因为这种伤害的实质只在于，一个男人获悉他的孩子事实上并不是他自己的，而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则得知，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有了一个孩子，也就是说在婚姻关系（纳粹用语因子10.6）、安全所（纳粹用语因子11.6）和家庭（纳粹用语因子11.5）之外。这一期专栏采纳了一篇冠以纳粹帝国主义标题《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的述评（又是纳粹语言的最高级形式，与其后的词组“世界各地”一道，达到了10.6的纳粹用语因子，主要是因为引自环球电影股份公司的《电影周刊》或者福克斯《电影新闻周报》而闻名）。这一专栏的记者们预

料到他们会继续传承纳粹遗产吗？可能是吧，因为即使是看似无害的纵横填字字谜（纳粹用语因子10.3）也被加上了《带有话语的十字架》这一辩护士标题。在1999年6月25日（纳粹数据因子10.8，千禧年恐惧因子10.3）这一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一天被终止的《法兰克福汇报》专栏，以调查问卷（纳粹用语因子11.0）的形式继续延伸一种先前的纳粹传统，即使人们认为这是盟军的去纳粹化调查问卷。此外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辈子都在填写纳粹的调查问卷或者盟军的去纳粹化调查问卷，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对于纳粹影响的坦白，因为这两种做法指向的都是继续存在的纳粹主义。

恰恰是在那些自认为摆脱了纳粹的地方^②，德国人又再一次炫耀这些丧心病狂者的文化遗产。比如说关键词“意大利旅行”。这个据说是由歌德创造的词汇吸引着仿佛着了魔似的德国人去往其他法西斯国家，因为他们相信纳粹们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自我编造的谣传，即德国特殊之路的错误仅仅在于过分强调了反犹太主义，因此德国法西斯难逃失败的命运，正如一份1945年4月29日从元首地下掩体开始迅速扩散的文件里所说的那样，失败的原因是人们在德国低估了“犹太世界统治的影响”。墨索里尼之所以下台（就在前一天即4月28日）并在梅泽格拉镇朱利诺村庄附近的一堵矮墙后面被枪杀，是因为他与德国结盟，而伪装成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则是在德国纳粹的帮助下用炸弹轰出了胜利，它肯定还将迎来数十年的丰硕期。

无独有偶，外交部在五十年代初新成立时，聘用的主要都是些长期服役的纳粹们，对每一个在威廉大街审判中针对恩斯特·封·魏茨泽克和其他纳粹外交部成员做证的人都统统加以拒绝，就连这些证人如弗里德里希·高斯或者保罗·卡尔·施密特，他们本身都曾是在里宾特洛甫周围的高级纳粹，在《时代周刊》和《明镜周刊》上即刻用假名淡化了纳粹的罪行，原封不动地阐明了他们的世界观：《法兰克福汇报》是由那些记者参与创办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历届政府的良知，因此之前他们在《民族观察家》（保罗·泽特）或者《帝国》（卡尔·科恩）上写道，为什么5月8日，正如另一位编写者埃里希·道姆布罗夫斯基1955年在“二战”结束十周年纪念日所写的那样，永远是“最深重耻辱”的一天，战胜国仅仅是从“精神的迷惘、仇恨和风头主义”中找到了它

们的推动力。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在其传记中揭示了被盖世太保拘捕和审讯的情景，当初纳粹之所以抓捕他，是因为他跟恩斯特·荣格尔或者保罗·安东·韦贝尔一样属于恩斯特·尼基施的圈子，这样一来他比纳粹还要更加右倾，坚定的反民主人士尼基施指责纳粹自由散漫，特别是指责他们不像日耳曼人、过于循规蹈矩和过于信仰天主教。尼基施也想毁灭犹太人，但这只应是毁灭的开始，紧随犹太人之后的应当是基督徒们。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一种“德国血统祛除罗马式遗传特征的自我净化”，他梦想圣巴托罗缪之夜和西西里岛的晚祷。由此他延续了阿图·莫勒·范登布鲁克的思想，后者创造了“第三帝国”这一概念，但却认为希特勒过于没有教养。早在1925年他就在一次神经崩溃之后自杀身亡，而到了1939年纳粹才废除“第三帝国”这一概念。因为恩斯特·尼基施主张的法西斯主义是亲苏维埃的，并且他作为民族布尔什维克被纳粹关进了勃兰登堡监狱，因此在被苏联红军解放之后他能够加入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得以成为东柏林洪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6月17日之后他放弃了所有的职务，去往西德并提起赔偿损失的诉讼，在打了八年的官司之后法院判给他1500马克的赔偿。直到去世前他都在关心新右翼党，它同时也曾经并一直是旧右翼党。所有这些人当然都被授予大量的勋章，成为荣誉公民和名誉教授等等。如果随便某一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不受纳粹的欢迎，他马上就会登上各种读本，跟那些并未使自己变得不受欢迎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一道。就连在联邦德国把自己标榜为自由主义的出版物也是以纳粹为基础的，例如《明星画刊》，它使库尔特·埃格儿领导下的党卫军分队南部之星连队的标志以接力赛跑的形式继续延伸到了战后德国，该画刊的发行人亨利·南恩就曾经在这个连队效力过。

即使下着鹅毛大雪，人们对此的喜悦也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像“乘雪橇滑雪”（纳粹用语因子8.8）这样的词语，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同义词“乘雪橇行驶”（纳粹用语因子8.7）及其具有威胁性的惯用语“对某人毫不留情”（纳粹用语因子11.1），它们都让纯洁的白色蜕变为苍白的、罩在德国土地上的皮肤。诸如“宇宙飞行器”（纳粹用语因子11.3）、“防滑物料”（纳粹用语因子11.2）、“雪崩危险”（纳粹用语因子7.7）、“雪地防滑链”（纳粹用语因子8.3）或者“被风吹成的雪堆”（纳粹用语因子7.9），这些词语至今仍余威未尽。下雪时在德国的高

速公路（没有纳粹用语因子，因为本身就是真正的纳粹词汇）上直接出现的混乱，只有通过面对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季节时的自我惩罚倾向才能被理解，这种自我惩罚倾向在千年帝国浇灌了混凝土的地面上留下了多车道水沟。总体说来好像有两种态度占主导地位：一种是肯定的态度，另一种不断地给自己开列贝西尔洗衣粉券，此外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年轻的共和国和新的民主制度有多么幼稚，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就能看出，即恰恰是《基本法》第131条做出了对罪行较轻者、随大流者和无罪者重新录任公职（纳粹用语因子11.7）的规定，而盟军旨在去纳粹化的调查问卷正好包含了131个问题^②。（关于数值131的象征意义也可参见：赫伯特·施彭德曼的论文《131名小黑人在体操协会抓住横梯双手交替向前移动。论100以上的质数的法西斯主义象征意义》，收录在《马克西拉尔科学研究参考资料》第7期，不来梅，1998年。）施彭德曼在一处脚注里指出，意大利黑手党继承光大了法西斯主义的、最初甚至源于意大利的质数象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从行驶的汽车里开枪射杀某人时只驾驶菲亚特131型汽车（后来也使用菲亚特127型和149型），这款车的名字“米拉费欧丽”在民间习语里被弄巧成拙地说成了“玛菲亚多丽”（Mafiadori）。

跟当时一样，今天一直还在用同样的天真来审视世界，这一点人们是怎样做到的呢？原因仅仅在于我们一直还在使用的纳粹化语言吗？为什么人们不能至少摆脱那些纳粹用语因子在8以上或者至少10的词语？更不用提像“叛国”（纳粹用语因子12）这样真正的纳粹概念了，法庭今天仍在用这些概念轻松地对人们做出判决，仅仅是因为格奥尔格·达姆和他的基尔学派始终是用以培养年轻法学家的权威著作的编写者，这样一来他们始终决定着我国国家的法制观念，即使从2006年8月开始实行了新的正字法？对达姆而言归根结底每一种犯罪都是叛国，因为偷窃和谋杀首先是对服从元首这一纳粹理想的背叛，相比这一点它们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要更小。相比法学权威著作，有多少危害真正来自那些往往把头发剃光、自诩为纳粹的人呢？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容低估的方面在于将娱乐和知识割裂开来，这种做法曾经被实施过，并且一直被保留下来，它导致了（人们从《南德意志报》专栏的例子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其他新闻媒介也把其无意识作为娱乐栏目分离出去，让它（无意识）在那里不受控制地滋生蔓延，因为娱乐不

无缘由地也被描述为“切断电流”，为了同时给其他人接通电流，也就是说支配和处理，也就是说能够强行使思想一体化。

在基尔学派的实验室里人们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发了“叛国”（纳粹用语因子12.0）这一概念，以此为纳粹的外交和对内政策搭建了法律框架^②。谈及与纳粹有关的偶然事件（纳粹用语因子10.8）、特殊情况（纳粹用语因子7.2）或者例外情况（纳粹用语因子7.5），这在战后德国的学校历史课本里经常发生，这些历史教材都带有脱离现实生活的书名如《生效和停留》《看与说》或者《洋流中的人群》，因此我十四岁时还在崇拜海因茨·吕曼，当一名与基层工作小组的成员们有来往的同学（纳粹用语因子11.6）向我指出，海因茨·吕曼曾经是一名纳粹，1941年在电影《煤气抄表员》里担任过主演，这会令我感到非常意外，影片讲述的当然是用毒气杀人的情节，只不过是以喜剧的形式，这让一切都变得更加糟糕。我吓得如五雷轰顶（纳粹用语因子10.8），连续两天吃不下任何东西，一个月之后才想到去核实同学说过的话。事实证明，《煤气抄表员》是一部电影喜剧，海因茨·吕曼在剧中扮演的是一名煤气公司的职员。整个影片与用毒气谋杀犹太人的史实毫无关系，尽管在开始部分里瓦尔特·施泰因贝克（据说一年后他在选帝侯大街剧场的一次舞台演出期间死于心脏病突发）穿着睡衣出现，想用自己贵达一万马克的睡衣换取煤气抄表员吕曼的西服，最终吕曼同意了这笔交易。剧情的象征意义当然是不容忽视的，施泰因贝克是犹太人，他把自己的全部财富装入囚衣，为了再一次逃脱煤气抄表员。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从这一刻开始感到困惑了，简而言之，我对自己的欣赏品位产生了怀疑。比方说在《火钳酒》这部影片中有一位年轻的教师，他的口腔左上端的牙齿都已经脱落了，我不由自主地把他看作是纳粹的代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吹过教室的新风尚的代表。然后我又获悉，这部影片的拍摄工作被人为推迟了，这样做是为了让演员和工作人员不再被征召入伍。于是情况又完全不一样了，我自认为从演员和导演身上觉察到一种抵抗运动，它当然也使煤气抄表员的象征意义变得更有说服力，因为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恰恰在战争年月里尝试，避免娱乐制作中的任何政治社会关联。

还有几个人的名字必须要提一下：比如伯恩哈德·鲁斯特。戈培尔把他描述为“绝对没有头脑的人”（纳粹用语因子11.1），此外这也在影射鲁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头部重伤，这次受伤据说使他变得神志不正常。鲁斯特是帝国科学、教育和民众教育部部长，他尝试在最后一分钟阻止电影《火钳酒》的上映，因为这部影片损害了学校这一教育机构的声望。于是海因茨·吕曼1944年1月带着电影胶片驱车前往元首总部狼穴，为了亲自请求戈林和希特勒给这部影片解禁。他获准进入临时商议中心，也就是半年后刺杀希特勒未遂的地方，商议中心里设有两家赌场，他在其中一家赌场和舒适惬意的茶馆里度过了等候时间，最后得以在那里的一家设施齐全的影院里放映该片，并最终使影片获得解禁。

说到底纳粹对一切都无所谓，恰恰是在涉及语言的时候。因此脱离纳粹意识形态来理解我们的（纳粹用语因子11.4）语言（纳粹用语因子10.0）是不可能的。我所说的“无所谓”是指，纳粹自己也没有遵守他们迂腐的规定，就连神志不正常，但同时又热衷于工作的教育部长鲁斯特也没有什么其他打算，而是只想着组建一个新的雅利安种族，并且借助于旨在恢复职业公务员的法案首先辞退了近千名高校教师，鲁斯特致力于使整个组织方面的混乱多少恢复些秩序，改变机构设置过于臃肿的现状。1944年帝国人民启蒙和宣传部公布了一份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名单，名单上的人虽然跟所有其他同行一样形式上也须履行服兵役义务，但是仅是出于文化宣传之目的才能被投入使用，也就是说人们免除了他们的前线勤务，就像之前所说的“因有其他重要任务而免服兵役”（纳粹用语因子12.0）。尽管无神论在纳粹阵营中占主导地位，上述开列的名单还是被描述为上帝恩赐的名单（没有纳粹用语因子，因为它是真正的纳粹概念），这就跟让元首稍晚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死亡的天意（同样没有纳粹用语因子，原因同上）相类似。海因茨·吕曼的名字出现在这份上帝恩赐的名单里，同样在列的还有以鲜血和土地为创作素材的女诗人阿格娜丝·米格尔或者元首的女崇拜者伊娜·赛德尔，她的诗行登在我们的学校教材里，1966年她还被授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劳十字勋章。1933年10月26日她们俩都在最忠诚地追随阿道夫·希特勒的发誓书上签过字。

纳粹的外交政策在缺乏创见方面是无与伦比的。首先他们想偷走意大利人的都灵裹尸布，为了能够从中看出元首的面部，然后他们想把可可·香奈儿拉到自己一边，为了让女人们不必总穿着双面针织内衣或者民族服装跑来跑去，当这一切都无法获得真正成功时（可可·香奈儿的情况除外，她因为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喜爱纳粹，只可惜在她投奔纳粹时已经度过了自己的最佳创作期），他们想杀戮和毁灭所有其他的东西，为了给自己的缺乏创见赢得足够的空间，这种缺乏创见应当在全世界得到推广，它归根结底只依循一种思想，即为一个唯一的民族赢得更多的空间。遗憾的是人们没能使纳粹就像在一个他们自己的实验室里那样经受一种长期研究，因为很快人们就得出结论，纳粹唯一的思想就在于想要毁灭他者。如果目标是毁灭他者，那么按照逻辑人们最终也必须毁灭自己，因为着眼于他者的目光如此犀利，以至于人们最终在自己身上辨认出他者，最晚当所有其他东西不复存在时。结局也的确是这种情况。希特勒让人很快处决了爱娃·布劳恩的连襟，剥夺了希姆莱和戈林的继承权，与爱娃·布劳恩结婚，紧接着又自杀身亡。

这一邮政编码的变更却无法阻止来自埃尔富特邻近地区的一群新纳粹，他们于2011年9月1日，也就是在阿尔伯特·斯佩尔三十周年忌日在索内贝格列队举行集会。虽然斯佩尔（Speer）这个名字的拼写方式没有被禁止，但是这群人数在三十人左右，主要以男性居多的示威者仍身穿黑色的T恤衫，上面印有索内贝格的邮政编码96501，数字上是拼写错误的斯佩尔的名字（Speja），他们打算以此把Speja这个名字确立为自己的口号。这场新纳粹游行属于个别情况，尽管在第二年的9月1日一小群反示威者在被称作“熨斗”的建筑物前面列队，一年前新纳粹游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这幢按照纽约熨斗大厦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设计的建筑是由阿尔伯特·斯佩尔负责建成的。迄今人们不是很清楚，为何那些反示威者全都裹着由宜家公司设计的游戏帐篷，帐篷上仅仅为眼睛预留了窟窿。但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既想通过这种游戏帐篷的名字斯佩亚（Speja）嘲讽纳粹示威者，又想以此影射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的法西斯主义历史，因为坎普拉德在四十年代是新瑞典运动的成员，这是一个极右翼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帮派，它赞同的主要是墨索里尼的思

想。鉴于斯佩亚（Speja）在瑞典语里意为“从事间谍活动”或者“窃听”，因此在对“索内贝格的天线宝宝们”（媒体对那些反示威者们的蔑称）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人们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即在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听起来具有异国风情的宜家产品名称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公司总裁和创始人非常有针对性的口号，因为如果不是通过压制性和权威制儿童教育的共性，人们为何要把一种为儿童设计的游戏帐篷和窃听联系到一起呢？在此类教育模式下孩子们只是臆想可以不受监视地沉醉于自己的游戏之中，而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在受游戏帐篷外面成年人的监控。哥本哈根大学政治交流与丹麦语教授克劳斯·克约勒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宜家通常用丹麦地名如克厄、辛达尔、罗斯基勒、贝林格、斯特里布、赫尔辛格或者尼瓦来命名脚垫和便宜的地毯，而价值更高的优质产品则是用瑞典名称来命名的。克约勒不相信这种偶然会发生在像宜家这样在专业模式下运营的企业身上，他更相信这是瑞典帝国主义在作祟，并令人回忆起三百五十年前丹麦地区如哈兰德、斯科讷和布莱金厄被瑞典吞并的史实。

当然尤其是纳粹的审美在缺乏创见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其唯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这种审美不加选择地利用了所有的文化和世界上所有的思想。如果说最初使基督教融入一种民族主义教派的尝试是为了消除《旧约全书》的话，那么后来纳粹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一种当然是被彻底简化的犹太教神秘教义的数字象征，这种数字象征用数字取代了字母表中的字母。人们用数字1从字母A开始，一直数到I，然后插入数字0以取代字母J，为了用文字和语言来象征犹太人自身的灭亡，接着重新用数字1从字母K开始继续计数，这就导致了一种完全做作的多义解释，例如数字2既可以代表字母B，也可以代表字母L和V。德意志帝国的邮政编码也应当按照上述象征系统被分配，战后这样的计划在人们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沿用，通过1962年，特别是1993年的邮政编码变更甚至得到了推广，因此今天乌尔姆的邮政专用信箱还在用数字序列89021拼写希特勒（Hitla）的名字，以容克大街为中心的新乌尔姆地区用数字序列89321拼写希姆莱（Himla）的名字，尼费尔恩-厄舍尔布龙用数字序列75223拼写戈培尔（Gebic）的名字，而位于图林根州的索内贝格则成功地反对使用邮政编码96558（对应的人名为Speer“斯佩尔”），相反得到的邮政编码是96501（Speja）^②。

当七十七年之后科隆大学的一位不知情的生物学家偶然发现，这一伪造的事实一直蔓延到当代时，据说这种情况涉及的是一种简单的数字颠倒。奇怪的是这样的数字颠倒竟然被所有新版的百科全书所录用，这些百科全书在过去和现在又不断被出版发行。为了把其他针对被纳粹伪造的数据展开的调查扼杀于萌芽状态，以恰恰在这个时候被刑满释放的埃里希·楚德尔和正致力于第三篇报道的弗雷德·A. 洛伊希特（参见：《光线在大屠杀否定者的姓氏里的象征意义》）为核心的团体接受了数字颠倒理论，他们立刻宣称，在奥斯威辛被谋害的犹太人的数量也是一种数字颠倒，这一数字不是900000，而是确切地说是000009，这也解释了为何在集中营周边场地上找不到相应的烟囱，正如英国主教理查德·威廉森所补充说明的那样。

1933年纳粹尚未掌权，就悄悄地改变了所有的数据和度量衡说明，为了给后世留下他们真正的遗产。比如他们重新确定了莱茵河的长度，使之比实际长度延长了90公里。如果说此前所有的百科全书给出的莱茵河的正确长度都是1230公里，那么在党部保护纳粹文献审核委员会设立的前一年，1933年版的布罗克豪斯百科词典第一次给出了1320公里的长度。第15版布罗克豪斯百科词典出版于1928年至1935年间。为庆祝纳粹夺取政权，人们出版了第15版该百科词典的第15分卷，除了新的莱茵河长度，这一分卷还包含了其他重要的纳粹概念如象征皇权的标记、品系繁育或者枉法^②。

无论是来自英国广播公司二台、法国电视二台还是德国电视二台，在此期间人们就一种语言达成了一致，把这种语言理解为是文献纪实型的，并用它来处理纳粹时期的不同主题。经过具有煽动性的剪辑，再配以瓦格纳和李斯特的音乐或者特意相应创作的浮夸的言辞，此前已经确定的情感应当被烘托出来。归根结底一切都已经事先被固定下来了，这样一来这些纪实影片与纳粹的电影新闻周报没有任何区别。在客厅里放映的是完全另一种形式的对纳粹统治的否定，因为这些电视纪实节目甚至都不尝试去理解恐惧的本质。就跟戏剧表演中使用的人造血一样，它们机械地运用恐惧元素，没有考虑到通过播放纳粹拍摄和排演的犹太人居住区场景以及来自精神病院和疗养院的报道，它们会使罪犯的目光双倍出现在电视机荧光屏上，或者通过放映瘦骨嶙峋

的大众和堆积如山的尸体，它们一再拒绝赋予受害者以个性，这是能够传递痛苦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它们反过来又不断迷失在罪犯的个性之中。希特勒周围的女人有温妮弗雷德·瓦格纳、格达·克里斯蒂安、和他年龄相差十七岁的侄女格丽、玛格达·戈培尔等等。爱娃·布劳恩穿着泳衣在贝格霍夫与爱犬们嬉闹玩耍，而同时则有数百万犹太人被谋杀，数百万士兵战死沙场，这样的场面应当会显得非常伤风败俗。爱娃·布劳恩和父母去乘豪华游船旅行，她和父母及两个姐妹在喝烈性酒，她活蹦乱跳地穿过花园，她在栏杆旁边荡秋千，如果她不是自己在蹦蹦跳跳，她就用装有爱克发彩色胶卷的16毫米相机给元首拍照。但是这些画面不会激起人的恐惧心理。它们不会引发恐惧，因为那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而是因为它们仅仅通过道德负担和相应的音乐压力而产生恐惧效应，这与好莱坞电影通过让摄影机在紧张情绪达到顶点时聚焦无关痛痒的东西、以此来增强恐惧感是如出一辙的。上述节目的虚伪之处在于，纪录片的制片人拒绝公开他们自己的矛盾心理，拒绝透露他们晚上在家也会蹦蹦跳跳，当他们在剪辑那些残暴的影片时，而另一方面在各大机场孩子们被打发回来，因为对腕关节的X线检查表明，他们已经超过二十岁了。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纳粹不负担任何罪责。这方面的责任完全由我一人来承担。如果说他们对一些事情负有责任，那么这充其量表现在，我能够把罪责分配给他们。在原先的电影新闻周报上看到那些兴奋的面孔，他们都是些年轻人，向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欢呼，愿意让自己在战场上做无谓牺牲，这一点显得令人无法理解。而我们在十岁时也成立了一家俱乐部，它应当超越我们个人层面的心理状态，虽然我们最后只是在阿希姆祖母家的地下室里聚会，在那里我们从一部手提电唱机上欣赏披头士乐队的单曲唱片。最晚在第一次真正把课堂作业做得一塌糊涂和第一次恋爱失败时，我们也很难再经受住战时动员的诱惑，那是一种能够让自己四处活动的希望，一种被普遍认可而非不断被误解、但是主要是超越个人的使命。我们俱乐部的标志是一只红色的手，这样它就是红军派标志的前身，对此我们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因为我们对任何军国主义以及由武器所产生的男性沙文主义的感官刺激都感到非常陌生，因为我们不仅失去了父母，而且也是没有榜样、性别和导向的一代。

或许纳粹也对此负有责任，即我总是感受到一种强迫击打自己面部的冲动，有时我也无法阻止这种冲动，或者强迫自己用一个尖的东西挖出一只眼睛，这一点迄今为止我能够避免^①。这样的一种遗传特征归根结底无法被准确界定和理解，当然它也可能是一种内生紊乱，或者是由环境条件或者任意一种有害物质引发的，用这种有害物质人们处理过我的睡床的板条格垫。这种发作呈周期性出现，有时会连续好几个月被忘却，然后又突然因为最微不足道的诱因而再次出现，这当然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其原因或许在于与权威的分裂关系，因为权威当然永远剥夺了自己所有的存在基础，并且一直还在朝着无底的深渊继续这种做法。

年表2：一辆高举起重臂的吊车投下的阴影无声地掠过岁月

1968年12月

冰层下面的死鱼和布满深红色脉络的秋叶。在它们上面是冻住的枝丫。天空像土豆地的颜色一样灰蒙蒙的。一缕一缕又长又粗的雪花飘落。橄榄绿颜色的医院巴士载着病人驶往城市的另一端去就医。他们坐在车里独自发呆，而不是透过车窗玻璃看我们。我们跟在车边跑了一会儿。然后巴士转弯开走了。今年第一次没有开列愿望单。

1969年1月

我们用手捂住双眼，眯起眼睛透过指缝偷看抬着盖有蓝布尸架的搬运工。有人手里拿着梯子站在翻倒的大树旁边。一只黄色的手套冻得硬邦邦的，挂在一处开裂的根茎上。

1969年2月

雨就像是浇灌园地的长橡皮管里喷出的浪花一样吹打在走廊的落地窗上。沉重的椴树枝在向外延伸的台阶上投下了一片稀疏钩织的带网眼的阴影。傍晚的暮色一再疲惫地而后院贴有瓷砖的墙壁上滑落。

1969年3月

一辆高举起重臂的吊车投下的阴影，吊车正在城市的一处洼地为建造一栋高楼堆放板材。

1969年4月

一个装有沙丘和一只蜥蜴的小型玻璃箱被放在一辆自行车后座上，从人们眼前摇摇晃晃地驶过。一名妇女在参加完教堂仪式之后拿起我的左手，用她的食指追踪我手心的纹路。闻起来像是医院伙食的味道。土豆泥配煎肉汁和煮得很嫩的绿豆。在这之间还有一股淡淡的麦芽咖啡的味道。

1969年5月

星期天人非常拥挤。在砂石建筑前面圣烛的烛蜡滴到参加圣餐仪式的孩子们穿的漆皮皮鞋上。

1969年6月

太阳变得苍白无色，就像是变戏法一样化为一片雨云。之后没有任何过渡天一下子就黑了下来。两个人在布满灰尘的场地上摔跤翻滚。人们在用手电筒照着他们。如果驶过一辆警察巡逻车，人们就暂时熄掉手电筒，场地上会恢复片刻的宁静。一个女人在扇坐在轮椅上的一名男子的耳光。热蒸汽从下水道的盖子里升起。

1969年7月

有时我的腭部如此干燥，就像是在隆重的庆祝活动结束之后绿色橡胶盆里的橙色小海绵一样。

1969年8月

一块漂木，看上去就像一只女人的手。工具间里的味道。平衡木、蓝色的垫子和透气的马革。

1969年9月

我路过铁路路堤旁那栋孤零零的缸砖建筑物，看到从底层的一扇窗户里透出一束蓝光。我轻轻靠近窗户并向里张望。黑暗的房间里一台电视机正在播放节目。一个我此前从未见过的木偶在荧光屏上漫步穿过一片独特的景观。我听不到声音，只能看到木偶笨拙的脚步和屏幕上滑过的背景。然后房间里的灯被拧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她朝一个男人走过去，那个男人穿着内衣，背朝窗户坐在一张铺着油布的桌边。她取了一个未打开的啤酒瓶，让酒瓶在男人的脊背上滚动。我离开窗户继续向前赶路，在人们发现我之前。

1969年10月

树木在花园里颤抖。草已经枯萎了。两名男子抬着一个灰色的木箱朝医院走去。一个女孩从校园的小水坑上面跳了过去，唯一的一片槭树叶在空中滑翔。

1969年11月

一群孩子排着狭长的队伍从自助居民区里走出来。他们在身后拖着带滚轮的手风琴琴箱。乡公所的窗玻璃上贴着黑色的鸟类剪影和彩色的星星。一种浓重的黑色笼罩在莱茵河河面上。

1969年12月

中断的线锯细工，钩织的端热锅用的厚布，再三用橡皮擦掉的句子。

1970年1月

小街里深色的房屋让紧靠在一起的屋顶相互擦碰。在照片上这些被拍摄下来的人看上去都面无血色。他们紧握双手，仿佛手里藏着什么东西。仔细观察人们会看出，他们都不动声色地指向下面。我对此不感

兴趣。我在短暂的课间休息时偷偷抽了一支“塔林”牌香烟。我厌倦了总要不停地理会这样的事情。

在多场次循环放映电影院里那名少年得知，为何火车机车的名称被数字所取代

一个会施催眠术的医师和魔法师正在毛里求斯广场表演自己的技艺，当我和父母从广场边走过时，他向我这边看了一眼，但是并没有中断他的演讲，也没有分散观众对他举起的右手里那只金质怀表的注意力。我听到了“共和国”这个词，看了一下我鞋底下的路面，又看了一下父母踩在我眼前一个浅水洼里的鞋尖，他们俩穿的都是黑鞋，母亲的鞋是尖头的，父亲的鞋是圆头的，然后我看到飘落的雨点，它只是在一瞬间强调了催眠师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便像挥洒的五彩纸屑一样消失不见了。仿佛我此前从未听到过“共和国”这个词，它好像一下子描述了所有的事物：狭窄的廊道，一直通向多场次循环放映电影院；平行街道，几年前我还在那里看到过一队拉着酒桶的马车；还有弯弯曲曲的小巷，人们在去往城市图书馆的路上可以拐到那里看看，其中一处房屋入口总是敞开着，里面站着许多女人。我父亲在多场次循环放映影院的售票处买了一张票，跟以往一样我独自一人穿过敞开的双道门，从在中间拉开、在两边用皮革镶边固定的毡幕中间走了进去。跟平时一样，我在第七排边上坐下来。正在放映的是给一种消毒漱口水做的广告。有时在早晨我听到父亲漱口，但是我不知道人们为何要漱口。从被雨淋湿的廊道吹来的过堂风不断随新的观众涌入影院。总是有身影从观众席的某个地方站起离开放映厅。雨落在后排某处的一块屋顶上，在电影与电影之间会响起扬声器噼噼啪啪的声音。观众在银幕上能够看到兰德瓦萨动物卫生保健研究所，然后是通往哈格斯泰恩的公路，继而是一幅耶稣受难像，它让人回想起那次铁路事故。用粉笔在一扇门上写下的数字。杂乱堆砌的木板，就跟细木工场旁边工具棚里的情景一样。画面静止。一个年份数字。一个声音。事故现场。音乐。我自认为在画面后方辨认出一具死尸。另一幅画面。一辆侧翻在路边的机车。拿着铁锹的男人们。一截树梢。一座教堂。天又下起雨。一直还在下雨。我穿着短裤。那些拿铁锹的男人在埋葬一些

东西。那是些爆裂的板条箱。灰烬。灰尘。过堂风。一名系着围巾的飞行员。在农田上人们用木板凑合搭建了一个台座。台座后面坐着没有穿圣衣的催眠师，他在听取那些被放至他眼前的垂死者的忏悔。我听到了成年人的各种罪孽。我看到了催眠师的猴子吹到空中的肥皂泡。在破裂之前这些肥皂泡是多么的苍白无色啊。男人们脖子上挂着一个装有常备药品的小瓶。从村子里跑过来一个疯子。没错，水是从岩石里流出来的。十七年里我父亲蹬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每天两次沿一条田间小路骑行。空中还有轰炸机飞过，但是火车机车已经不再有名称了。事故发生之后名称被数字所取代，因为火车司机拒绝驾驶事故车辆。两名来自红十字组织的女士穿过出事地点，向遇难者家属分发黑色的袖章。孩子们必须站成两排。人们告诉他们是去修学旅行，而实际计划的却是一次儿童十字军东征，此次东征应当指引他们昏头昏脑地穿过黑暗，继续远行穿过不同的树林直到深谷，因为孤儿院早已人满为患。他们唱的是一首欢快的歌曲。年龄最小的孩子们一边歌唱一边鼓掌。一名高中生戴着镜片破损的眼镜走在队伍最前面。一架飞机空投了援外救济包，但是这些包裹几乎全都降落在仍在燃烧的火车车厢的残骸中。然而还是有一个包裹落到了旁边的草丛里。没有人注意到它。只有我看到它在右下角边缘处躺着。在跟地面撞击时包裹里肯定有一些东西破损了，因为慢慢地褐色的包装纸开始染成了微红色。那肯定只是一个装有蜜饯或者果酱的玻璃瓶。为了安慰孩子们，人们不可能把活着的动物装在援外救济包里空投。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主意。东征的孩子们几乎还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女人们就开始高声叫喊和抱怨起来。她们只是在孩子们面前保持了克制。直到现在这起事故的整个严重程度才变得清晰明了。现在人们也第一次看到了绽开的脸部和脱臼的胳膊。现在许多重伤员用最后的力气把自己拖向挖好的坟坑。因为神父一直尚未到场，催眠师再次出面顶替，给垂死者送上最后的祝福。他拿着那块金质怀表从一个坟坑走向另一个坟坑，让躺在坑里的伤员忘掉疼痛。活着现在变成了痛苦。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忘却痛苦。人们可以用喊叫声压过痛苦。或者用思想抗击痛苦。那个右下角的援外救济包在此期间已经完全被浸透了。无论里面装着什么，人们都不再能够识别它了。包裹旁边躺着一个皱巴巴的学生练习本。一阵狂风掀开了本子的页码，接着又把它合上。我从本子里辨认出一幅儿童素描画。画上一个男人坐在树上。他面带微笑，就跟儿

童素描画上所有的人一样总在微笑。画上的男人缺了一只胳膊。在笑的时候他面临从树上掉下来的危险。树底下停着一辆坦克。坦克上坐着一名穿制服的男子。他也在微笑。然后画面黯淡了下来。

人们在包里携带了些什么

为参加圣餐仪式而获赠的礼物。本章注释皆为作者原注。

一年前在伦敦伍尔沃斯大楼里买的。

两个题名都来自克里斯蒂安妮·韦根。她把琼斯·布莱恩的名字写入这名青少年的钱包，是带有一种挑衅的意思（就跟一年前玛里昂在他用石膏绷带固定的胳膊上题写了“米克·贾格尔”的字样一样），但这仅仅是轻微的、近乎友好的挑衅，因为“布莱恩”这个名字涉及的是最不典型的滚石乐队成员。同时克里斯蒂安妮也想查明，她事实上到底有多受这名少年的宠爱，作为一种爱的证明他能否允许她这样损毁他的钱包。因为他并没有从她手里夺走钱包，也没有提任何反对意见，所以紧接着她在布莱恩的名字旁边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算是对他的一种报答吧。

虽然这家位于盖斯贝格大街（紧挨着高雅的陶努斯大街）的茶馆被搬迁至更不起眼的克莱斯特大街，确切地说是搬到那里一栋住宅楼的底层住房里，但是毒品侦缉部门的大搜捕却并未停止。因此人们决定成立一家俱乐部，以此给警方突如其来的出现制造困难。

知名艺术家学校是根据美国模式创办的一所函授学校，它在电视杂志的最后一页上给自己刊登招生广告。因为这名少年很喜欢画画，他父母想要提升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他们聘请了一名代理，让他登门为儿子出具书面证明，证明他具备必要的能力以参加正规的绘画课程。两周之后三本厚厚的英文版授课教材以及一小卷相应的翻译文字被邮寄到家里。在每一课结束之后这名少年必须完成布置的作业，例如画一个喝水用的玻璃杯，并把作业寄回学校。作为回复几天之后他会收到一些建议和指点，以改进和提高他的画技。在学完第六课之后学校破产了。之前少年的父母已支付了全部学费，所以他们一分钱也要不回来了。

跟刺青图案相类似都是些遗留下来的东西，它们来自一个更为天真的时期，当时这名少年对寻开心的小玩意儿很感兴趣。这些证件都是模

仿通用的证件和驾驶证制成的，只不过规格要更小一些。它们是少年在刻槽比赛中作为安慰奖得到的，但他的个人信息并没有被登记上去。

这里指的是那张被禁止，但在商业领域却被大量贴盖的《两个处子》唱片的封面照片，照片上人们能够看到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一丝不挂地站在一起。这张照片被一期这名青少年定期购买的《地下》杂志刊登了出来，尽管他必须把这期杂志藏在柜子后面，就跟几年前藏《阿基姆》杂志、《蒂伯》画刊、《福克》杂志和《西格德》杂志一样。在此期间明爱会那位女士至少知道了他藏的这些漫画杂志，但她对《地下》杂志的存在却一无所知，这种杂志以美国嬉皮士运动为导向，展现了该运动的主题和思想。

这里指的是迈克·亚伯拉罕森，一名十五岁的男孩，他和母亲住在皇宫酒店，酒店的房间被改造成给美军家属提供的住房。他有时在“甲酸”乐队和“温柔拯救青少年”乐队演奏。

这名少年写的是拉丁语而非法语，因此“雅克”一词被写错了。一切迹象表明他开始对自杀者产生了兴趣，因为哈利·寇斯比、德里厄·拉罗歇尔和雅克·希戈这三个人都是自杀身亡的。据说《存在与虚无》这部哲学著作或许为自杀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萨特的名字同样被写错这一事实来看，少年好像是从朋友那里口头得到的上述提示。

这里指的可能是为一场聚会准备的演出曲目单。曲目单由这名少年或者由贝尔恩德整理而成，它是为给贝尔恩德举办的告别聚会而筹备的，因为他要去法国生活半年。这次聚会与贝尔恩德两年后借道柏林去法国的事实毫无关系，因为那时候他和这名少年已经不再有任何来往了。

一名护士给那个少年往床头柜上放了一个小盒子，盒子里保存着他的贵重物品。只剩最后几项检查还须进行，然后他就可以被接走了。前面提到的贵重物品指的是一根银项链，项链的垂饰上镌刻着一只蝎子，一只荣汉斯手表^②，配有特别宽的羚羊皮表带^③，以及一个用表面起毛的红色皮革制成的长钱包，钱包上刻铸着印度装饰花纹，边缘处有白色的编结绸带，里面用圆珠笔题有布莱恩和克里斯蒂安妮的名字^④。钱包里除了四马克十二芬尼的零钱之外还装着以下证件：一张州立图书馆借阅卡，一个城市图书馆借阅证，一张位于克莱斯特大街

13号的沙洲茶馆（茶文化保护协会）^⑤的会员证，凭这张会员证人们有资格从11点到23点在俱乐部活动室里逗留，一个国际知名艺术家学校^⑥的学生证，一张三级行人证和一张酒鬼证^⑦，一张被折了好几下并且在折叠处已经有裂缝的50旧德国马克，一张同样被折起来并且在折叠处有裂缝的报刊照片，它展示的是一对夫妇的正面站立裸照^⑧，好几张怪物刺青，一张护照照片，照片上能看到一个十四岁左右、留着齐肩长发的男孩^⑨，两张被折起来并在折叠处有裂缝的胶粘，上面写着以下内容：在第一张胶粘的正面上写着：哈利·寇斯比，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雅克·希戈^⑩，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背面是空白的。在第二张胶粘的正面上写着：M. 贝尔恩德·吕克里希特，新教互助会，F-87 土伦，兵器广场大街11-12号，背面上写着：她像个长胡子的彩虹，山上的傻瓜，娜塔莉，我的爱何去何从，我是海象，接下来还有好几行难以辨认的字迹如抱紧，见到我的朋友们^⑪；以及好几张带有补正的碎页。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在思考假名

当我和贝尔恩德、克劳迪娅从“歌手之家”饭馆里出来的时候，在拐角处的路灯底下站着来自高年级的一名学生。沃勒，克劳迪娅说道。克劳迪娅，沃勒也回道，接着他又问：怎么样，见到自己上了电视，你们是不是很高兴？是的，真倒霉，贝尔恩德说道，但是饭馆里的电视机放不出声音。警方在搜捕你们，因为你们在火车站的下跨道里毒死了一名流浪汉。但这纯属一派胡言，我们说，应当被毒死的其实是我们。或许是吧，但是来自东区的那个女间谍说的跟你们说的正好相反。谁？你们没有看到电视里的那个女人吗？你说的是明爱会那位女士？不知道，不管怎样她在你们家里住过，并尝试暗中侦察你父亲的工厂。可是，我说道，那也没有什么可侦察的，我们生产的只是些镜子、玻璃杯和盛土豆的碗。这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对什么都感兴趣，也可能是她发现的情况真的太少了，所以她现在要靠你们引人注意，声称揭露了一起罪行。但是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们把她……不，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克劳迪娅说道，可能是她自己把装在安瓿瓶里的冰水、魔术肥皂和塑料三刃匕首偷偷放进汽车的杂物箱，她也很容易接近你的宝物盒呀。我就说嘛，沃勒说道，现在她声称，你们是一帮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老纳粹的煽动和操纵下去杀害无辜的流浪汉。什么？那些纳粹是什么样的人呢？公立学校的校长韦普勒，你们的数学老师荣格，你父亲……怎么还有我父亲？是的，作为工厂主。但是他还太年轻了。好吧，那么你的祖父肯定是的，据我所知工厂是他建立的。总之她尝试为自己开脱。在东区的人们总说，我们这里生活的都是纳粹，他们的孩子也都是纳粹，放学后立即穿上棕色的制服，必须去体操馆参加防务能力训练，从十四岁开始人们就能得到一把带血槽的利刃，年满十八岁就能得到一把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人们在供暖地下室里继续搞纳粹的人体实验，学生们把年轻和进步的教师关进高空实验室，通过一扇小窗学生们能够观察到，实验室里教师的头颅是怎样爆炸的。通过这些杜撰他们解释了修

建反法西斯防护墙的理由。但是 we 和东德合作过，我们把明爱会那位女士移交给了他们，因为她在这儿不穿紧身连袜裤到处乱跑，作为奖赏他们给了我们那瓶伏特加，我们又把它送给了那个流浪汉，因为我们不喝这样的东西。可是现在来自东区的那个女间谍宣称，事实和你们说的正好相反，她观察到你们是怎样杀害了那名流浪汉，接着她想就此事质问你们，然后你们就开车把她带到了老酿酒厂，为了在那里也把她干掉。然后国家人民军在最后一刻拯救了她。

我们登上沃勒驾驶的福特金牛座车，他开车送我们进城，来到施瓦泽博克宾馆对面的皇宫酒店，那里是美国佬的住处，他母亲在那儿做清洁工。在最顶层有一个空房间，我们可以待在那里。但是我们不能从酒店的大门出入，不能使用电梯，而是必须通过一道狭窄的侧门，沃勒有侧门的钥匙，然后沿着狭窄的供货楼梯上楼。房间里有两张床和一张行军床，浴室和厕所在外面的走廊里。角落里摆放着一台电视机，贝尔恩德立即打开电视，为了看一下是否他们又在播放关于我们的消息，但是电视里只播送美国海外驻军无线电网的节目。这太好了，贝尔恩德说道，这样我们终于能够看到所有门基乐队的歌曲序列了。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渴求收看电视节目，尽管我也很喜欢看门基乐队的演唱，我经常无法看到他们的演奏，因为他们的节目是在周六四点差十分的时候播出，而那个时候我往往要去教堂忏悔，即使我三点钟就已经出发，在做完忏悔之后我也不准马上看电视，就算我不去教堂忏悔，周六中午我也不应当总在电视机前面转悠，此外我在大提琴练习方面做得不够，原本必须花一整天的时间或者类似的强度来练习，为了把我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通通补回来，明爱会那位女士就总这么说，因此周六是不行的，而最好的节目恰恰是在周六才有。但是现在我父母将会认识到，明爱会那位女士一直以来就很卑鄙，她只想煽动和唆使他人，事实上她一直在暗中侦察工厂，她特地脱掉紧身连袜裤，因为在这之前她亲手剪断了三角皮带，只是我父亲对此浑然不知，只是为了让我觉得她很恶心，想把她移交给东德，反正她正想去往那个地方。

沃勒从楼下给我们取了薯条和新奇士橙，我们躺在床上，边吃边看美国海外驻军无线电网的节目，但是电视里播出的只有美式棒球比赛，

这我和克劳迪娅感到很无聊，只有贝尔恩德感兴趣。沃勒离开房间，想很快再带几个人回来，为了一块儿考虑我们能做些什么。无论如何我们是去不了东区了，贝尔恩德说。你这话太搞笑了，克劳迪娅说道。如果我们干脆自首呢？毕竟那个女人在我们这儿从事过间谍活动，我说道。那个流浪汉呢？克劳迪娅问道。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她说得有道理，如此颠倒事实，明爱会那位女士真的太卑鄙了。然后门开了，沃勒和另外三个人回到房间，他们年龄要大一些，至少是大学生或者年纪再大点儿，但他们三个都留着长发，只不过头发顺滑，不像沃勒的那么鬈曲。这是佩尔龙、德拉龙和奥尔龙，沃勒介绍说。你们不要觉得奇怪，这些当然都是假名了。你们也必须给自己想出假名，这一点很清楚。我们往一块儿靠拢了一下，他们四个在床上和地上坐了下来。佩尔龙掏出身上的“塔林”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们。我接过一支，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拒绝了。你们的处境真的很艰难，他说道。我们点了点头。东部的修正主义者们声称，你们是被纳粹操纵的无政府主义者，专门杀害流浪汉和普通妇女……我们没有杀害流浪汉，更没有杀害明爱会那位女士，她明明还活着。是的，但这都无所谓。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向他们证明，你们不是资本家的某些奴仆，因为这正合东区人们的心意，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也正是求之不得的，这样他们就会说，所有的二流子实际上都是纳粹，只有他们才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好吧，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需要采取几次行动，以此表明你们的立场，这是很明白的。也就是说针对那边的修正主义以及这里的老纳粹和以权谋私的政客们。其他人点了点头。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行动呢？当然是政治行动。但是为此你们得先起一个名字。你们有这样的名字吗？我和贝尔恩德耸了耸肩。你不是想了一个名字吗？克劳迪娅说道，是比伯里希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协会或者类似的叫法。其他人笑了起来。你没有随身带那个本子吗？不，带了，我说道，伸手把我的背包拽了过来，从里面抽出那个标准A4笔记本，翻开本子，把红军派的标志即彼此相连的三个字母RAF以及年份数字1913介绍给大家。但是这还没有设计完，我说道。红军派，这个名字太好了，沃勒说道，佩尔龙、德拉龙和奥尔龙纷纷点头，也说这个名字起得非常棒，说我们现在只需考虑采取几次成功的行动即可。

索恩莱因 (Söhnlein) 的字面直译是“小儿子”。

在沃勒、佩尔龙、德拉龙和奥尔龙走了之后，我们躺在床上，考虑也给自己起一些假名。我不愿再叫“格奥尔格”这个名字，因为它也是我的教名，因此不适合用作假名。你们觉得“斯芜拉布勒”

(Swlabr, she walks like a bearded rainbow“她像一道长胡子的彩虹”这句英文的各单词首字母合成) 这个名字怎么样？斯芜拉布勒？贝尔恩德问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是奶油乐队《爱的阳光》

(Sunshine of Your Love) 歌曲唱片的封底，我说道。无所谓，克劳迪娅说道，反正这个词的正确发音人们无法做到。你有更好的主意吗？我问道。我想到的是“卢森堡广播电台”。卢森堡广播电台？是的，因为罗莎·卢森堡的缘故。不，这个名字太长了。而且我们也必须起三个类似的名字，就像沃勒、佩尔龙和德拉龙的名字那样。对，是应该那样。我们可以把自己称作阿塔、维姆等类似的名字。是的，阿塔、维姆和伊米。或者阿塔、维姆和希尔。这听起来总觉得傻里傻气的。没错，此外这些都是大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的名字，克劳迪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我说道，你说得有道理。我们又考虑了一会儿，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房间，想起了我的那些单曲唱片和我的宝物盒，但是盒子里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了，我生气自己对明爱会那位女士总是那么迁就，生气自己没有早点儿想出针对她采取的行动。为什么我们不索性用那些点燃法兰克福商场的纵火犯们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呢？克劳迪娅说道。巴德尔、恩斯林、普罗尔。或者巴德尔、恩斯林、索恩莱因。是的，索恩莱因·塞克特。天哪，就这么定了，我们把自己称作索恩莱因、亨克尔和穆姆。穆姆应该就是我吧？克劳迪娅说，那么你就是工厂主的小儿子^⑧了。你真让人讨厌，我说道。

递菜窗和成年礼

我赶在下雨前躲到履带旁边避雨。幸亏这次没有穿短裤，不像去年在野营结束后那么狼狈。烟卷受潮变软了。头发贴在前额上。在广播员身后的墙上是用图钉固定的单曲唱片的封套。那是谁人乐队的单曲唱片“莉莉的照片”。现在跑步回家。到家后坐在厨房里。事先把身上的香烟扔掉。明爱会那位女士给我揉搓了头部。新衬衣被挂了出来。或者马上换上睡衣。更愿意站住不动。即使胳膊感到冰冷。因为风直吹到屋后面。

一块光斑落在我弟弟一直还未成形的后脑勺上。他年纪太小，还不适合玩我的“骑士”和“印第安人”玩具。他将必然取代我的位置，但会继续玩他的玩具娃娃。如果他聪明的话，他会继续这样下去。成长就意味着死亡。而在死亡之前需要体验的是：惩罚性作业和放学后留下。

他转过头，朝厨房和餐厅之间的递菜窗方向看去。在我被送入教养院两周前，当时我母亲外出购物，我父亲在工厂里，我把他举到摆放在递菜窗上的旧电视报和我母亲挑选的《女性》杂志中间。仅仅是出于好玩，我说道，但是他没有笑，尽管他已经会笑了。他也没有把那些报刊的页码撕坏，虽然他很喜欢把东西撕碎。他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我不想惊吓他，但是不能对他说任何话，因为这是一次他应当经受住的考验。闭上双眼，一直数到十，在外面走来走去，从厨房穿过门厅进入客厅。在快到递菜窗时才又睁开双眼。戴着红色毡帽的冷杉球果小人一动不动地挂在黑色的门把手上。我叔叔在我弟弟出生后不久的一次拜访中把它挂到了那里。我母亲很讨厌那个小人。我父亲则觉得无所谓。一次我梦见那个小人劫走了我弟弟，把他关在一间茅舍里。不久之后我母亲的双腿就不能动弹了。仿佛在我参加圣餐仪式的星期天里地球仪没有从柜子上掉下来，仿佛我母亲身体还一直健康，仿佛明爱会那位女士从未来过这里，仿佛我父亲又坐在沙发椅上看报纸，仿佛被洋槐树枝筛滤过的傍晚的阳光只是为了落在厨房用桌面上面

的咖啡和蛋糕顶上，我独自一人在紧闭的递菜窗前面的客厅里站了一小会儿。我弟弟没有从报刊堆里掉出来。相反他难道是窒息而死了？他不可能这么快就闷死。递菜窗的门关得肯定没那么严实。厨房蒸汽一直还能渗透到客厅里。反之来自客厅的议论声也会隐隐约约地传回到厨房，当我周日晚上坐在摆放着面包餐盘和雀巢牛奶巧克力冲剂的厨房餐桌边、我父亲正在客厅会见几位先生的时候。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不需要太多的空气。他在狭窄的板条箱里会感觉很舒服，在玩捉迷藏游戏时会自行寻找狭窄的地方。我怎么会知道这些。我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所有这些我们在生物课上都没有学过，用阿希姆的秒表我们测算了二十八秒的时间，那是一块又大又沉的真正的秒表，不像我从刻槽比赛中赢得的那种中间带转子的小型秒表。如果我们能够将近半分钟屏住呼吸，那么我弟弟将会很容易做到在十五秒内不呼吸。尽管如此他们会把我关进教养院。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那个狭长的浅褐色的箱子被从仓库里取了出来，为了往里面塞入内衣、衬衫、套头毛衫和一条裤子，我祖父从上西里西亚逃难时就带着这个箱子，后来我父母在骑黄蜂摩托车去威尼斯订婚旅行时，往同一个箱子上贴了许多彩色的纪念章。箱子里没有装橙色的毛巾袜，没有装配有带条纹的松紧腰带、下面宽大的裤腿处有裂缝的摇摆舞裤，也没有装我那三件卷筒式领套头毛衫，这三件毛衫我是配着格子衬衣轮流换穿的，那样的格子衬衣就是明爱会那位女士所说的林业工人衬衣，按照她的话讲那件衬衣我将一直穿到被用毒气杀死为止。相反箱子里只装了星期天用品。带有深开领的黄色羊毛套头毛衫。领子已经洗得发灰的白衬衣。褐色的面料裤，但不是明爱会那位女士所说的灯芯绒裤。手里提着箱子，没有背我的背包，我站在花园门口，身上穿着那件蓝色的风雨夹克，按照明爱会那位女士的话说就是紧身短上衣。一辆福利局的公车开到门前。它不是绿色的米娜车，而是一辆褐色的欧宝上将汽车，为了在工厂职员和工人们面前不引起太大轰动。我又一次转过身去。我父亲站在房门的门框里。明爱会那位女士胳膊上抱着我弟弟站在他身边。我弟弟在微笑。我父亲一动不动。他看上去很严肃。还有什么比不得已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更糟糕的事情吗？来自青年福利局的那名男子用力从我手中取过箱子，把它放进汽车后备厢里。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推到汽车的后座上。透过蒙了一层雾气的窗玻璃，我向外面浓雾弥漫的运动场上望去，场地上铺有碎石路面和铺有炉渣的红色

跑道。我不敢在蒙有雾气的车窗玻璃上画画。耶稣的心。一块没有实质性内容的面包。我没有被戴上手铐。我还没有达到判刑年龄。我还未滿十四岁。但是很快就十四岁了。法官会认为我的年纪已经足够大了，我能够明白我的行为造成的影响。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客厅里递菜窗的双扇门。跟平时一样我闻到了埃克斯深红樱桃酒的味道，它就摆在递菜窗旁边的家用玻璃酒橱里，也闻到了法国白兰地的味道，明爱会那位女士会把白兰地从酒瓶里直接倒入多棱的有玻璃塞的大腹车料玻璃瓶。玻璃瓶旁边是腹大口小的烧酒杯。我弟弟在看着我。一声也不吭。

这名少年1969年5月9号的历史作业

(对于成绩单上的分数来说至关重要)

这项历史作业极有可能是虚构的，因为随着五十年代复辟时期的开始，纳粹这一主题在经由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时间跨度内（在战后在盟军的影响下它被直接定为教学计划的一部分之后）在历史这一科目里不再被探讨。历史课讲授素材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魏玛共和国。但尽管如此也可能会有些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纳粹素材，其目的比如说是为了强调德国人作为受害者的角色，或者他们本人作为昔日德国国防军的成员，想要以此烘托军队的纯洁和盟军的管束。从八十年代开始纳粹题材才又属于联邦德国学校教学大纲的讲授范畴。

关于第三帝国的主题汇总

在此这名少年就已经流露出从内心抵触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这不是因为他听出了这些问题里所隐含的操纵性语气，而仅仅是因为在他真正的幻象形成之前一种发病的先兆包围了他，偏头痛患者也熟悉这种先兆，并阻止他把他觉得重要和珍贵的事物（例如神秘主义者，这一点在此必须被提及）通过课堂作业的形式世俗化和平庸化。“第三帝国”和“千年帝国”这两个概念皆源于基督教词汇，特别是由约阿希姆·菲奥里得到了继续发展，他把千年论和对第三帝国的信仰统一在一起，这种信仰先于基督之敌的出现而发生。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空想共产主义者托马索·康帕内拉也继承了他的思想，康帕内拉主要以犹太教神秘教义为导向，因此被判处为异教徒。

1. “第三帝国”这一名称源于何处？这一名称指的是什么？请把它与“千年帝国”这一概念做一比较。

这里指的当然不是一种真正的反抗形式，而是民众的一些英勇事迹，例如在家庭内部拒绝行纳粹礼，不加入纳粹党，或者作为女人拒绝党卫军军官的求婚。无论有多晚和多么的不完美，反抗都仅仅是由军队来完成的，并由此满足了这一目的，即确立了德国国防军的地位，德国国防军虽被希特勒滥用，但却是内部运转正常和无罪的集体。

2. 描述几个例子，说明民众是怎样反抗阿道夫·希特勒的诱骗的 。

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封·里宾特洛甫的前新闻发言人保罗·卡尔·施密特战后只是把姓改成了卡雷尔，但却并未改变他的纳粹信念，并成为了一名很受《明镜周刊》《时代周刊》，当然也包括施普林格出版机构如《世界报》和《图片报》欢迎的撰稿人。作为作家他出版了描写希特勒远征苏联的拙劣作品《巴巴罗萨行动》。作品并未美化，而是根本就未提及德国国防军的罪行。他的出版物获得了德国媒体的普遍赞誉，或许是因为他成功地撰写了关于远征苏联的两卷本巨著，但却一次也没有使用“犹太人”这个词，正如乔纳森·利特尔所断定的那样。他的图书《巴巴罗萨行动》《烧焦的土地》和《西方的没落》以及另外五六本图书俱乐部版本和《读者文摘选集》一样，在许多德国人的客厅里都能被找到。当然这些书都原封未读，但不管怎样是被买下了。反向取证责任不应该适用于私人，但却应当适用于公司、企业、机构、报社、广播电台或者电视台，因为人们很容易把本就有限的宝贵生命浪费在这一方面，即证明昔日纳粹的共事者今天都身居要职，或者公司及机构的创建成员都是昔日的纳粹，这样他们就能够继续贯彻或者推广纳粹意识形态。因为并不是在每个地方人们都能够像在《明镜周刊》《时代周刊》或者施普林格出版界那样，很容易地为大批老纳粹的任命提出论据，这些老纳粹于五六十年在上述机构任职，在那里比如说（仅举施密特-卡雷尔一例加以说明）散布马里乌斯·范德尔·鲁伯是国会纵火案中单独作案者的论调，并让这一论调升格为历史事实。另一个很容易被证明的案例就是瑙曼集团，施密特-卡雷尔同样属于这个圈子的成员。这是一个由二十六名纳粹高层人物成立的协会，它以维尔讷·瑙曼的名字被命名，瑙曼是戈培尔的最后一任国务秘书，党卫军统领及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朋友圈的成员。该协会所追求的目标是，瓦解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自由民主党并把它转变

成一个新的纳粹党。“是否人们最终能够使一个自由党转变为纳粹战斗队 [.....]，对此我表示怀疑，但是我们必须敢于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 如果不存在自由民主党，那么它今天就必须被成立。”这只是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监听记录中的一段表述。鉴于德国当局对此装作不知，英国人不得不于1953年1月15日自行干预，逮捕了该协会的几名领导成员，尽管当然只是暂时的，因为德国联邦法院假期刑事审判团在几个月之后，也就是说在暑假期间，终止了针对上述被告的诉讼程序。

3. 《巴巴罗萨行动》^①是什么？

正如米夏埃尔·雷泽所写的那样，他也是我们班级唯一读《士兵》连载小说的人，“高速公路”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被认可的，因为对于几乎不拥有私家车辆的德国民众而言，高速公路并不构成诱惑民众的论据。属于正确答案的应该是：给所有的人创造就业，保障街道上的安全。

4. 通过哪些承诺和实际兑现的措施，阿道夫·希特勒最终赢得了民众的支持^②？

按照普遍的观点，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共和国内部众多四分五裂的小派别在国民议会“表演民主”，但实际上却对民主一窍不通。其次当然还有道德上的颓废，它与背离上帝同步发生，以及通过起义甚至革命所表现出的共产主义的威胁。

5. 请列举其他为第三帝国提供温床的社会原因^③。

唯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某人是怎样死亡的

伤口蔓延覆盖了半只胳膊。我坐在通向牧区图书馆的台阶上。那是夏天周六的一个下午。在忏悔结束之后。我抓着受伤的胳膊伸向旁侧，为了不让淌下的血滴到我的裤子上。一名修女正好路过，但她并没有注意到我。

每咽一口薄荷茶都会感到疼痛。它与患咽峡炎时的感觉不一样。我也不感到饿。虽然克雷尔女医生已经五天没来了，但我舌头上一直还有木片压舌板的味道。就跟我偶尔还能闻到石膏的味道一样，一年前我的右胳膊就套在石膏绷带里。此外在我的阴囊处有一种奇怪的隆起。然后在我阴茎的底面还有那道结疤的接缝。

战争在一处前线打响了。这里说的前线是一道围墙，就像阿希姆家院子里的围墙一样，就像把厂区圈起来的长长的围墙以及围绕宫殿花园的更高的围墙那样。围墙后面是特殊植物蔓生的平原和藏在树上的黑人，黑人们从树上纵身跃下，为了用一把大砍刀砍掉士兵们的头颅，那些士兵清晨六点钟（还在吃早餐之前）越过围墙进入后面的平原地带，他们举着步枪作瞄准姿势，背后背着背包，脸上戴着防毒面具。人们把砍掉的脑袋装入一口铁锅，再把它们熬煮成一种神奇的饮料。这是古巴爆发的黑人起义，刺耳的枪声划破夜空，白人在哈瓦那大街上被杀害。树上坐着黑人酋长，他正在啃咬一个婴儿，他让人用啃剩的骨头给他炖了一锅肉汤。大街上流着脓液，交通已陷入瘫痪，男孩子站在马路拐角处，他们在津津有味地品尝脓液。黑人们拿着手枪坐在地下室的煤堆上，他们瞄准所有角落里的白人……胡巴胡巴哈萨，胡巴胡巴哈萨，胡巴嘿 啾嘿 啾嘿。

在吃完第一顿早餐之后，我们离开膳宿公寓来到城里。城市不是特别大。城里的邮政大街通向带有一道拱廊的疗养公园。我父亲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我母亲，怀里抱着我弟弟。拱廊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

旅游纪念品和玩具。昨天我已经买到了《费克斯和福克西夏季特刊》。在一家卖假发的商店门口我们停了下来。商店的入口太窄而台阶又太陡了，因此女售货员朝我们迎了出来。她弯下身子看了看我母亲，点了点头，回到店里，过了一会儿拿着不同样式的假发又折返回来，把它们举到我母亲的头后部。我母亲用一面带手柄的镜子照了照自己。最终她决定要一副八十九马克的假发。我父亲跟女售货员进店结账。晚上在膳宿公寓用餐的时候我母亲就戴着那副假发，并称它为“阿策尔”。它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显眼，我父亲说道。我母亲吃的是给病人规定的特种饮食。我和我父亲要的是夏威夷烤面包片。我也会做这个，如果你们这么喜欢吃的话，我母亲说道。我弟弟吃的是奶油饼干。

我多想现在把这些故事再听一遍，多想就母亲艰难的命运、父亲的外出和假发的意义了解更多的情况啊。我想把一切都再听一遍。或者再看一遍。甚至包括和埃里卡姑姑一起度过的手工制作时间。或者《电动梅克尔和电动敏辛》节目，尽管这是给婴儿看的。无所谓。只要能拖延点儿时间就行。只要不必吞咽东西就行。

人们在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可能还会有什么出息，这的确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当然每个人在死的时候都不清楚这一点，因为即使在生命垂危时他也会想象，明天或者后天可能是什么样子，他一直在希望自己的人生会发生一些彻底的改变。但是是否人们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死亡，或者年纪还不到十四岁就死亡，这到底还是一种差别。当然死亡也会给人们带来好处。比如人们不必看着其他人死亡。例如不必看着我父母或者我弟弟死亡。或者总而言之不必看着动物死亡，就连鲜花或者火柴盒汽车也属于此列，后者（火柴盒汽车）当然不会死亡或者枯萎，但是却会坏掉。一只动物倒毙，一朵鲜花枯萎，一个人死亡。有时我在想，上述这些名称还不够。每一个物种、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有自己用以描述自身死亡的表达。但这当然是在胡说八道了。这些仅仅是我产生的想法，因为我必须总要躺在床上。白天总觉得过得很奇怪，只有晚上才会格外引起我的注意，当天已经变黑、其他人还在外面的走廊上和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晚上他们从任何其他地方回来，而我一整天都待在屋里。因此我用上述这些思想来分散自己

的注意力。我也用这些思想来多少安慰一下自己，因为以前我经常思考，如果父母死亡我该如何表现。我想为那一刻想出点什么，一种特定的行为举止方式，几句我能对自己、但主要也是对其他人说的话，但我就是想不出合适的。幸运的是我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因此也就不必为此而绞尽脑汁。那是一种高昂的代价，但是我很肯定，抛弃别人要比自己被别人抛弃更令人愉快。真奇怪，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不出什么特别的，现在到了最后时刻，就像我一直想象的那样。相反，在我脑海里闪过的都是些完全不重要的事情。根本没什么重要的。我把舌头伸向右边还是左边？在咽下一口之前我能再等一会儿吗？其实这挺可惜的，因为现在我原本是有思考的时间的。而且也有必要的安静环境。生病的好处是我可以看《米老鼠》或者《费克斯和福克西》画刊，吃削过皮、切成片或者磨碎的苹果（如果我感到胃部不舒服的话），躺在床上听广播。但是我能够理解，我父母偏偏现在要放弃这些好处。情况的严重好像对他们来说显得不合时宜。或者他们不想让我有生病的希望。

然后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新高速公路路段上被轧死的那只猫，想起了养老院旁边工具棚里的那名死者，当我们在暑假里的一个上午在那附近玩捉迷藏时，他正在被一名修女清洗身子，接着想起了从我膝盖的伤口里流出的脓液，当然还想起了（但是我只是听说过此事），一名来自平行班的学生把一支铅笔捅进了另一名学生的眼睛里，眼睛开裂，和晶体以及里面明胶状的液体一道滴到本子上和书上。那种情形特别可怕，因为人们无法给一只眼睛进行简单的包扎，更不用说把它替换掉了。从根本上来讲我的处境只与一种情况有可比性，即老沙特汉德舌头上的刺伤，当时他在帐篷里躺了好几个星期，伤口不停地流血，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如果活下来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再开口说话。相反我只是被绊了一下，摔倒时膝盖碰到了我祖父母房门前木条垫上伸出的尖头上。另一个男孩，年龄不比我大多少，在上厕所的时候昏倒死掉了。我在《体操运动员报》上看到了他的讣告。讣告里没有写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我是在更衣室里从其他男孩那儿得知他的死因的。可是唯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某人是怎么死的。人们想知道这一点，因为或许以后这会对他有用。这样人们就可以对自己说，现在眼前一片黑暗，但之后又会再一次亮起来，然后人们才会真正死亡，

正如人们也知道，一名溺水者会三次下沉，只有当他在第三次下沉之后又浮到水面上，他才真正是死掉了。或许那些死者之所以叫人觉得可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或许更清楚地了解死亡过程会极大地减轻我们的恐惧感，这样的恐惧伴随我们一生，我们却无法摆脱它的纠缠。恰恰是真到了那一步，当人们跟我目前的感觉一样时，人们又不必总去观察每一件细微的事情，认为现在生命已经在走向终点，而是很容易能够回想起许多其他死者和他们的经验，并至少能够让自己对此有些许的信赖。当然每个人的死亡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我的讣告里可以这样写道：情况根本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他已经很虚弱，经常无法再分辨梦境与现实，无法再区分回忆和当前。更令人不快的是等待关键时刻的到来，因为人们总在想，我应该怎样挺过这一刻，在这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总在留意：现在，现在，是现在吗？在那一刻我该很快想到什么？或者说些什么？或者感觉到什么？因此在发生特别可怕的事故时人们所使用的那句表述“他当场死了”也显得如此重要，因为生者不应当相信会有一种可怕的终结，尽管如此这种终结会永远延续下去。当然这种情况谁也说不清楚。在我读到来自体操协会的那个男孩的讣告并得知他的死因之后，好几周里我都害怕去上厕所，如果去上厕所，我不再敢把门锁上，而是用左手顶着门，为了不让别人进来。或许在这一刻更加紧凑的日程安排能够给予我帮助，尽管我已经上学，是演奏者小组中的一员，履行辅弥撒者义务并参加集体活动。但是其间我一直还是一个人，并未在疗养院接受治疗。当我夏天终于住进疗养院时，这对我来说已无济于事。即使是接下来的天主教祈祷练习也无法再给我提供任何帮助，在祈祷练习期间我曾再次获得对于新生的希望。因此我现在也明白了，我父亲不无道理地认为，总有一天延续生命的努力会来得太晚，人们自己能做的已经不多，或者根本无法再做任何事情。人们只是在简单地度完余生，就像一颗从沙丘上快速滚落的玻璃弹子，缓缓滑行直到停止。还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大多数事情反正我也只是听来的。例如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我没有被安排任务，当天沙普尔无法再发表言论了，因为在头一天夜里他父亲用刀追着他撵过大街。再比如亚历克斯的同班同学死了，因为突然之间他全身的毛孔都在出血，这一点我是很晚之后才得知的。

我站在仓库前面的走廊上，仓库是在楼上，明爱会那位女士从狭窄的楼梯上下来。她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不知道她在仓库里做了些什么。或许她只是把我的旧东西搬了上去。她的嘴唇涂过口红。时间已是晚上，我马上还要很快去给克劳迪娅送数学作业，或许我们将马上第一次接吻，尽管我其实爱上的不是克劳迪娅，而是克里斯蒂安妮·韦根。明爱会那位女士在含笑注视着我。那是一种异样的微笑。她朝我走来拥抱了我。这令我很难堪。此外我不喜欢明爱会那位女士。我不喜欢她奇怪的装束，不喜欢她的发型和她装有宗教诗歌集的手提包。此外我不再是孩子了。当然你不再是小孩了，明爱会那位女士边说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这让我感觉很恶心。她不是阿希姆的母亲或者贝尔林格夫人，换作她们或许我也会感到恶心。我只是想看一下阿希姆的母亲或者贝尔林格夫人裸体的样子，我希望她们赤身裸体地把我叫过去，这样我能够非常近距离地看到她们裸体的样子，但也仅此而已。不会再有更多的举动。不会有身体的接触。或者可能会触摸她们的乳房。尽管触摸我的乳房吧，如果阿希姆的母亲这么说，我当然也会这么做的，或许我在做的时候甚至会感到眩晕。但是不会再有更多的举动了。无论如何不会接吻的。此外所有这些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在我弟弟的房间里。在他的写字桌上放着一本素描簿，翻开的页码上是他的儿童画作之一，画的尽是一些头足纲动物和胡乱涂画的蓝天。其中一只头足纲动物看起来有点儿像克劳迪娅，旁边的另一只像我。一阵穿堂风从下翻窗方向吹来，闻起来有股秋天的味道。我错过了整个夏天，而且不仅仅是夏天，所有发生在将来的事情都不会再来了。我将不会成为高年级学生。我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将不会戴上宽边礼帽。不会手持公文包。所有这些我都不会有。永远不会知晓某事。永远不会去行政署。我父亲总是去某一行政部门。什么是行政部门？它是一个政府机关。一个高级政府机关。那肯定与别处不一样的地方。在下面的大堂里是支撑整个行政大楼的大理石柱。大堂里有一面天花板，人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群人，他们站在一位国王面前，把一份卷轴递给他。民主制度就是这么开始的。好吧，国王说道，接过卷轴并宣布退位。他是一位好国王，因为他退位了。因此我们要把许多事情归功于他。我们必须把民主制归功于他。现在我们必须向

民主表达敬意。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正在为自己的自由做些什么，就像我必须为自己的自由做些什么一样，因为否则的话我的零用钱就会被扣除，我就必须回自己的房间，不允许听磁带，也不允许外出。因为到行政部门办事是必要的，这样人们的回忆能够被激活，人们能够回忆最初，回忆现在高年级学生也面临以及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事情，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错过一切，错过夏天和所有剩余的年月。我们会错过一切，如果我们不定期去行政部门的话。去的时候穿一身好看的西服。就跟我们去看病时的情形一样，一大早就把热水器打开，在浴缸里彻底洗浴一番。然后沿楼梯上楼，总是转着圈上，直到天花板上画有国王、民众和卷轴的那幅画在眼前旋转。上到顶层之后再穿过玻璃门，只是人们不清楚到底是哪道玻璃门，因为楼下的门卫只说上楼之后左拐，然后您就看到了，但是到底是哪个左边呢？因为楼上有好多入口，门上有好多编码，它们都是一个模样，总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门上的姓名牌也都是一样的。在政府部门人们只能迷失方向，只能把一切搞砸，只能失望地返回，因为人们忘记携带了某份文件。我父亲头戴礼帽、手持公文包去政府部门办事时，我们就在家坐着等他回来，而每次总说少某份文件。我母亲在轮椅上睡着了。我弟弟在他的玩具堆里睡着了。明爱会那位女士趴在账簿上睡着了。只有我睡不着。我坐在厨房的凳子上望着中午的太阳，阳光只在这里照耀，而不是在政府机关前面，那里总是在下雨。我可以祈祷。祈祷一切都会变好。就是这样。祈祷一切都会变好。这是我唯一的祈祷。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可以期盼什么，不知道我可以祈祷什么。我只希望一切都会变好。这就是我全部的希望。不仅是我自己。因为这不会对我有任何益处，因为如果只是对我来说一切都会变好而不是对其他人来说也是这样，那么并非一切都是好的。那样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好的。但是对所有人来说一切都应当变好，这一点我无法想象。在这方面仅有信仰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如果我必须做出选择的话，那么情况更应该是为了别人变好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反正对我来说情况也会变好的。因为如果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好的，我就不必再费心关照他们了。

询问红十字信件

红十字信件有什么重要意义？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但是您知道，红十字信件是什么吗？

是由红十字会寄送的信件？

流亡者，也就是说主要是被迫流亡国外的犹太公民，他们从1936年开始可以跟留在家乡的亲属取得联系。为此专门有一种可供填写的表格纸，人们最多允许在上面写二十四个字，内容要尽量笼统，因为所有的信件都要通过审查。

有意思。

可不是嘛。这些信件经常在路上要持续数月时间，越来越频繁地被退回给寄信人，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此期间已经被流放或者被谋害了。但是我的提问指的不是历史上的红十字信件，而是由您撰写的二十四字囚犯秘密通信。

您能把那些信给我看一下吗？

您很清楚，所有的红十字信件都被销毁了。

被谁销毁的呢？

或许是被您自己。不过我们各地的实验室能够找到一些残存的碎片，并从中还原出个别词组。我甚至都不认识那个概念。您自己知道，六十年代的课堂教学或者历史意识看起来是怎样的，如此专业的一个概念.....

我们肯定这些信件存在过。

您还想从我这儿知道些什么？

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些信件背后隐藏着何种意图。

那些信不存在，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意图。

如果您想听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这个写红十字信件的主意对于您的整个行为举止而言是典型的。一方面总是以相同的字数表达思想的确是一种美学挑战，就好比一位诗人总是服从一种格律或者一种商籁体形式。但同时信件的名称也表明，其实您才是受害者，是被逐出家园者，是被开除的人。囚犯秘密通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信件。人们出于密谋之原因撰写一封囚犯秘密通信，人们是积极主动的，但是您一再想要掩饰这一积极主动的角色，为了把自己描述成情况、时代、历史、纳粹、教会、家庭等诸多因素的牺牲品。不容忘却的是，信的名字也反映出红军派的成立日期，在那一天您与阿希姆一道被一家德国联邦法院判处向红十字会支付五马克罚金，这一判决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效力。

一种美妙的理论。

不讨您喜欢的理论。为什么您不公开表明主动参与了恐怖活动呢？

很简单，因为我没有那样做过。

那些红十字信件或者就我来说那些囚犯秘密通信里经常谈到一个女人，针对她极有可能应当执行一次暗杀行动。这个女人是谁呢？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她是明爱会那位女士吗？

我为何要杀害明爱会那位女士呢？

这我要问您才是。

我跟明爱会那位女士没有任何过节儿。

在这方面我们掌握的信息完全不一样。信中也提到了那个宝物盒或者宝物箱，那是一颗自制的炸弹吗？

不，那是一个带有双层底面的宝物箱，它是我祖父亲手制作的，在我十二岁生日的时候祖父把它送给了我，我把自己的贵重物品都保存在箱子里。

什么样的贵重物品？

透镜光栅图片、寻开心的小玩意儿、塑料人物形象、照片之类的。

没有炸弹？

没有炸弹。

但是有一个蜂鸣器、一把水枪和橡皮泥彩蛋？

是的，是有这些东西。

还有那个米勒同志，他不是也把一个类似的箱子交给了一名连学龄都未达到的男孩吗？

对此我一无所知。

这件事涉及的也是一起暗杀行动。

刚才已经说了，对此我一无所知。

疯子笑话和掩护性回忆

当我很快从床上起来的时候，我口腔左上方的一颗臼齿在隐隐作痛。走廊里凉爽宜人。我应当写一篇作文，为了证明我已具备出院的条件。弗莱施曼教士和迈尔克林医生两个人都赞成我这么做。我没有必要为他们每个人都写一篇作文，而是只需为他们俩共同写一篇就够了。这就跟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的情形一样：所有的人都在我背后达成了和解。雷纳·施米特和他的老朋友克劳斯·维尔贝克，尽管他再也不想看他一眼，当他和我们结交的时候，因此我也自动成了克劳斯的敌人。可我根本就不愿与他为敌。我也想去他父亲开在行政区大街上的工场。现在我在去勒伯尔食品店或者在去霍夫曼理发店（他每次都给我把后颈剃得干干净净）的路上甚至得走在马路的另一侧，如果工场的门敞开着，里面飞溅着焊接时的火花。我为克劳斯·维尔贝克感动遗憾，因为他长着红头发，有时说话也结巴。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他更应该和雷纳保持友谊。但是这样的话我永远也不会这么早就认识披头士乐队。不会在八岁时。不会在1963年。因为当时只有雷纳的大哥洛塔尔了解该乐队成员。

这位演员指的是卡尔-海因茨·施罗特，他的名字（Schroth）里也有Sch字母组合，他在发Sch音时舌头特别靠近口腔前部，因此他印象深刻地留在了这名青少年的记忆里。

我禁不住想起我们的音乐教师伯恩哈德讲述的笑话。一位瘦长而笨拙的老人在给我们示范怎样正确书写乐谱，也就是写成核桃壳的形状，在讲解时他把“核桃壳”（Nusschale）里的Sch音发得就跟一位演员的发音一样，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位演员的发音的^①。因为我们不想照他的话做，他就在一旁看报纸和放音乐。但是有时候他也讲一些疯子笑话。一名疯子把自己当作一只老鼠。他来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最后他被当作正常人出院了。他走上街头，这时一只猫朝他迎面走来。他马上转身跑回精神病院。但是您知道您不是老鼠，他的医生说

道。是的，这我知道，这名男子说，但是猫是否知道这一点呢？其他笑话也都是类似的构思。一次一名男子给疯人院打电话，说他妻子把自己看作是一盏床头灯。当工作人员对他说，他应当把他妻子顺便带来检查一下时，这名男子回答道：我明天一大早把她带过去，现在我还用得上她，因为我想躺在床上看书。我禁不住想到这些笑话，当我拿着一个新的标准A4笔记本坐在疗养院的小房间里时。迈尔克林医生建议我记述自己的人生，记述迄今为止我的人生是怎样度过的，记述现在我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特别是也要记述我怎样看待自己的未来。弗莱施曼教士则说，信仰将会给予我帮助。只有信仰能够做到这一点。两个人一块儿离开我的房间。反正我不能从任何地方抄袭。如果我从出生写起或者最好从出生前写起，迈尔克林医生肯定会很高兴的。如果我写道，其实我不想来到这个世上。这将是原原本本的大实话。但是据我所知我没有为阻止出生做任何努力。我没有刚蹭子宫壁并在嘴里积攒血液。我被怀孕过期，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接下来就要记述全部的掩护性回忆了。我甚至连自己的洗礼都回忆不起来了。第一次忏悔，第一次圣餐仪式，所有这一切才仅仅过去几年。我必须从这些事件之间的某个时候开始记述。从报名上学开始。从《爱我吧》（Love me do，披头士乐队的第一首单曲）开始可能是在说谎。但是从《她爱着你》（She Loves You，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开始或许是真的。1963年8月23日。

联想涌入虚无

从高高的木板桥上摔到隔开的畦田里，尽管与地面猛烈撞击，这些动物在一个接一个倒毙之前，仍然在半个夜晚的时间里强忍着疼痛的折磨。工厂主的工人们把熟石灰铲到动物的尸体上面，让它们在那儿一直躺着，直到下一趟运送泥浆和黄土的车辆把它们运到城里。为了即使戴上涂抹焦油的工作手套也不必抓握动物的死尸，人们把棱木塞到像是为做帕纳德糊（供油炸或调馅用的用面包粉和鸡蛋等调成的糊）而准备的扑上白粉的尸体下面，再把它们举抬到满是污泥的挂斗车上。因为已经开始腐烂，腹部开始膨胀，因此尸体背朝下漂浮在冒着气泡、在堆积的淤泥中间积成的小水塘上，在车辆转弯的时候它们脱臼和折断的肢体就会撞击侧壁和驾驶室。工人们证实，那当然不是桥梁的设计错误，桥是工厂主根据相应的负荷精确设计的，而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为了节省必要的花销和费用，从而不必用吊车和支架再把那些动物卸载到地面上，总归它们只是在一道栅栏后面的牧场上远远地站着度过了最后几年的光景。

委员会成员跟在两名女秘书身后，心情大好地上楼去来宾餐厅。工厂主肯定会随时到来，他在城郊的一处工地上还有些事情要处理。那是一个地下水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每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来宾餐厅是在那个年代建成的，当时人们要定期接待其他企业的手球队来访，因此餐厅能够容纳将近一百五十人用餐。在临时镶嵌了木板的墙壁上，壁灯放射出一种柔和惬意的光线。窗边的一张桌子已经被摆好了。委员会成员几乎还未就座，摆放着各式前餐的手推车就被推了过来。一名侍者往杯子里倒了利口酒。其中一名女秘书清了清嗓子说道，工厂主让她代为转达，人们不用等他回来用餐了。透过窗户人们可以看到在工厂车队和私家车库之间修建的花园。一处旧的大理石基座立在载有花坛的山丘上。

在上床睡觉时这个孩子想起了明信片上的主题，用这些明信片他在下午还搭建了一座塔楼。人们几乎有这样的感觉，仿佛大脑在使用一种单独给这个孩子设计的象征语言，为了把原本尚无法理解的经验传授给他。在那个地方成年人或许想到的是威尼斯城市图的下方文字，并连带回忆起一幅历史题材版画，相反这个孩子看到的却是树下一只蜷缩的小动物，或者他听到一支曲子，或者感受到胸脯里一股促使人笑出声来的愉快的压力。但尽管如此孩子和成年人想到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在梦里对事物的两种话语方式，即经验的话语方式和理性的话语方式，会重叠在一起。在醒来时我们会问自己，为何在梦里一张城市图会令我们充满忧伤，让我们回想起动物脖颈上的毛发，还在我们回忆期间，那些画面就又分开了，联想也随即走向空洞。后来在注射吗啡后产生的近于蓝色的烟雾中，患者认出了儿时的画面，半麻木的大脑给他把这些画面解释为抚摸动物皮毛和闻嗅油布的味道。然后这些画面从中间分开，仿佛它们像衣服那样有一道线缝。

这个孩子看着云彩在连通主要马路的街道上从一个小水坑跳向另一个小水坑。它们（云彩）作为缝纫线团从天空呈对角线坠落，把小水坑里的积水用力撞开。孩子使水里的云彩与他的滑轮车交叉，让它们钻进他的套头毛衫，掠过他的头发。饭菜的味道像动植物体内分泌出来的芳香物质一样从住家窗户里涌出。在地平线上工厂主作为侧面剪影像在察看来宾餐厅的窗户。从这里看上去那种情形就像是一出皮影戏。幻灯机的灯光在缠绕的手指上亮着。孩提时代所有皮影戏的开场白都是：“不要转身！”在开市议会大会之前工厂主的时间很紧，但他至少想向客人们表示欢迎，想给他们介绍一下那座小型凉亭，客人们可以在亭子里放松休息，消除舟车劳顿之苦。

这个孩子在等新的明信片用以搭建他的塔楼。那些已经寄来的数量不多的明信片会首先在配菜柜的玻璃窗后面存放一阵儿。中午的时光显得没完没了，不可想象的是一天的时长或者还有更多的事情。太阳在低矮的城市上空瓦解成微小的微生物。骑车油腻的身影像灌了铅的灌木丛一样一推一撞地朝马路尽头移动。一只挂钟的嘀嘀嗒嗒走个不停的秒针是由一个孩子臆想出来的，因为对他来说时间就是这样流逝的。因为他不会看表，他就总是听到一二、一二的节奏，就像一个木

偶原地踏步的脚步声一样。与此相应的还有儿童游戏：山上的公牛，一头、两头、三头。当这个孩子转过身来的时候，一切好像都还是原地不动的样子。他不断透过窗户朝外面的公共汽车站望去，等车的人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然后他们一下子又都不见了。

山上的公牛是人体内部的动物象征，将来人会把这种动物浇铸成青铜像，雕刻成大理石像，为了把驱除的安宁重新归还给它。突然面对一种人们不认识的生物，而且它与其他生物又没有相似性，以至于人们可能会给它起一个名字。在这一刻人通过动物的眼睛看到了自己，他知道动物不会这样看他，不会按照概念和名字对他进行分类，而是仅仅按照体形，动物会考虑是否躲避这种体形还是应当战胜它。

在持续的逃亡过程中动物会丈量土地，从陆、海、空三个维度。通过长毛被固定在地面上，对于人来说各种神就产生了，他们是为了向人类揭露，冰冻的土壤里蕴藏着什么，无边无际的大海里隐藏着什么，弥漫着大雾的天空拐走了什么。在环绕地球运行一圈并征服了世界之后，神灵们应当宣布，在他们自己的颅骨里能够找到些什么，在肌腱之间以及在脸部的孔洞里能够找到些什么。为什么我们认为，把东西推来推去会决定其意义和我们的意义？为什么一条曲线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道依循它的命令、一座山就像是登上它的要求？为什么神灵出现的目的是为了紧接着又消失不见？为什么他们能够抛弃我们而不是我们抛弃他们？为什么我们总是向越来越远的高处望去，尽管我们相信每次原因都不一样，而其实我们只是想知道明天下不下雨？我们甚至连东西都无法抛弃。可能这就是东西身上的神性和我们身上的人性吧。还有其他非物质生物，我们不无道理地把它们看作神灵，为了像对待所有神灵一样首先崇拜继而杀死它们，为什么它们（也就是动物）什么也不需要，能够征服世界，即使是死也拒绝向我们妥协，因此我们盛怒之下把它们切碎劈碎，不让它们安宁，直到它们从我们的肠胃里穿过？或许我们会强使它们在痛苦中看我们一眼，但是只有当它令我们回忆起自己、而非一只动物的时候，这道目光才会触及我们。如果我们回想不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尽管如此也无法逃脱惩罚的话，那么我们至少不应当有判决权、有宣告判决的权利吗？

一旦这个孩子会数数了，他就开始清点数量。他不是随便清点数量，而是像那名患者一样数数，他（患者）在痛苦中只是简单地把数字彼此串起来。这个孩子尝试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但是自己也不知道他能够数到多少，因此他尝试把数字范围设定到中断为止。中断就是他预先确定的目标。他希望下一次能够冲破中断的阻碍，以此使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但是他想不起去清点池塘里的鸭子。它们反正一直在那儿，不需要具体的数量。东西需要计数，这是学年讲授中令人感到吃力的课程内容之一，它堪比同样费了很大力气讲授的被动态和主动态的区别。

摘自对高年级学生的观察记录

在这些高年级学生十四天没来上课之后，一天早上他们突然站在学校公共休息室门口，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他们在谈论转学事宜。他们自称搭便车游历了英国，遭遇了爱情的挫折，在树林里瞎跑了好几天。他们的确看上去眼窝深陷、面颊凹陷。在大休息期间人们看到他们站在学校礼堂的平屋顶上。他们跳进运动场的红沙里，扭伤了一只脚的踝骨。

这些高年级学生在抽小雪茄，而不是在教室里做课堂作业。在下最后一堂课之后他们在教师停车场碰面，脚下胡乱踢着碰得坑坑洼洼的易拉罐。其中一只易拉罐飞起撞向副校长的欧宝车，在右挡泥板上留下了一处凹陷。穿着蓝大褂的房管员出现了，他揪出其中一名高年级学生，把他的鬓角捻搓在一起。然后房管员用勾曲的手指敲他的头顶，并给他灌了一杯白兰地。在灌白兰地时他的鼻尖一直被用力挤压，直到眼睛里流出泪水。其他人无动于衷地看着。这就是殉难思想的诞生时刻。

这些高年级学生用滚烫的烛蜡来锻炼自己的胳膊。他们穿着新的镶钉牛仔裤进入注有冷水的浴缸，为了让裤子变成他们的第二层皮肤。从十二岁开始他们在头痛时就拒绝服用父母提供的去痛片，因为他们想弄清楚自己能够忍受多大的疼痛。他们吸食被刨成薄片的注射了滴滴涕的香蕉皮，不是把圣饼而是把小片的吸墨水纸放到自己舌头上。他们在旅行时照镜子，看到自己的终点是在两条铁轨之间。如果在一次庆祝活动期间的几乎没有灯光照明的角落里双腿好像开始肿胀，他们就互相夺走对方身上的刀具。然后他们又会跳进暖坝景观公园旁边的池塘里，因为他们认为，一块从他们眼前漂过的木头是他们的食指。

这些高年级学生去上资本教育课程和黑格尔专题讨论课。他们封锁比尔和韦贝尔舞蹈学校，尽管这些学校跟随时代精神，顺应新一代人的

需求。每周二和周五八点半这些高年级学生都站在楼下的学校门口，挨着穿卷筒领套头毛衫和运动衫裤的人骑的轻型摩托车，对女孩们大声说些什么。女孩们的脸变得通红，因为她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人的叫喊，她们站在那儿窃窃私语。

这些高年级学生让人找不到班级记录簿。他们用肥皂擦黑板，把一大瓶所谓的冰水倒在教师座椅上。当他们一个月之后在火车站大街打算向魔术王购买补给时，对方告诉他们说，冰水现在被从市场上收回并禁止出售了。因此他们把手头最后一大瓶冰水供奉起来，小心翼翼地加以保存。当数月之后他们又想起那瓶冰水并去装贵重物品的小箱子里查看时，发现瓶里的水已经变干了。可能去往非法性的通道仅仅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这些高年级学生像湿麻袋一样挂在单杠上。他们没有穿体操裤，而是穿着剪短的牛仔裤。他们就像风景画上立着的问号。如果他们在宗教课上打哈欠，教士就会说道：“哈巴谷书1.13：在不信神的人吞食比他更有正义感的那个人时，为什么你在一旁观望呢？”虽然记号笔和活页本都被禁用，但是这两样东西这些高年级学生都在使用。他们背着懒汉书包，因为在变换颜色之间他们不是首先把画笔蘸到水里清洗一下，因此他们的百利金文具盒看上去也是相应的乱七八糟。人们究竟还应该告诉他们多少遍呢？首先人们画的是背景，只有在背景画完全晾干之后，人们才能画前景。他们把绘画本放在暖气上烘干，并利用去往司炉间的通道搞一次短暂的会晤。不过事后绘画本的纸张都被烤成了波浪形。

这些高年级学生散布谣言，说他们患了肺结核，他们把它缩写为TB，有时还给它附加了“开放性”这一定语。他们戴着长围巾，把从魔术王那儿弄来的德古拉（吸血鬼）血咳到手绢里，那些手绢是缺乏创见的姑娘们每年圣诞节都以十二条一套的包装送给他们的。有时手绢上还被绣上交织字母。

这些高年级学生沿莱茵大街往下走，在一家卖卫生用品的商店旁边拐进一个后院。在后排房屋的地下室里他们试穿几条黑色的裤子。他们

站在一面镜子前面，检查这些瘦裤腿裤子的宽窄。从一个扬声器里播放着《让我更强，金凤花》这首歌。

在市政厅大街布勒宁克迈尔商场的入口处，这些高年级学生看到一个由玩具猴组成的管弦乐队站在一个玻璃箱里，在投入十芬尼硬币之后那些玩具猴就开始击铙钹、打鼓和吹号。这些都是为了取乐孩子们而设计的，这些高年级学生从中识别出一种被异化的人的象征。尽管如此他们也投入格罗申（十芬尼）硬币，就像他们用硬币尝试从自动售口香糖机器里拽出透镜光栅图片或者小折刀那样。在这方面他们研发出不同的关于硬币的旋转运动和降落速度的理论。同样投入十芬尼人们可以在安格勒海姆酒店的前厅里让4711型香水喷洒在自己的胸口。即使香水的气味令这些高年级学生回忆起他们的祖母，他们也无法抗拒自动售货机的诱惑。

这些高年级学生收到了城市图书馆的提醒还书通知。他们乘巴士去谢尔施泰因，在港口租了一艘能划半小时的划艇。橡树叶落在撑在摩托车顶上的橡胶护罩上。一个冰激凌球卖十芬尼。一块汽水味糖果卖一芬尼。一袋汽水粉卖二芬尼。一小袋水果棒棒糖卖五芬尼。一方盒水果棒棒糖卖五芬尼。这些高年级学生不喜欢香车叶草口味的。周二提供面条，配有番茄汁和一个煮老的鸡蛋。那件连帽上衣今年还能穿吗？雪花的白色边棱能否从其乐公司生产的皮鞋里渗出？房间里一片黑暗，而窗外第一场雪在飘飘飞舞。披头士乐队的拼图在写字桌的玻璃板下面闪烁发光。装有用来买电唱机的马克硬币的粉红色猪形塑料储蓄罐在面无表情地冷笑着。

这些高年级学生认识古多同志，他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他把一支铅笔从中间掰断，然后把一捆绑在一起的十支铅笔递给他们并说道：“现在你们试着掰断这些铅笔。”周三他们跟古多一道去参加一个聚会。这些高年级学生得知，人们错误地嘲笑扎伊尔的那些黑人同志们，因为他们缺乏像“自由”这样的抽象概念。“当人们往他们手里塞一块石头时，他们立即就明白了那是什么意思。”工作部负责人如是说道。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高年级学生）定期参加这样的聚会，然后他们就因为过高估计自己和逃避现实被排除在外了。

今年夏天这些高年级学生在想什么呢？在想他们要逃脱命运的摆布？在想他们能免除苦难？在想生活会像恩典他们的同龄人那样赐予他们无忧无虑，再后来会赐予他们一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人们值得去努力工作？他们抽了两天时间坐车去斯特拉斯堡，在那里品尝了法式热三明治和牛排薯条。太阳就像是一个咧嘴狞笑的荷包蛋一样照在小公园上空，他们正在公园里打羽毛球。他们的语言知识还不足以令他们看懂房屋墙面上的那些标语口号。在某些下午滴进伊尔河的雨水不再令他们感到悲伤。他们用旅行社的折叠广告单做成各种小船，把它们从桥上扔进河里。白天也穿体操鞋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这能给人一种轻飘的感觉。他们回想起克里斯蒂安妮·韦根并给她写了一张卡片，卡片带来的结果比他们原本打算的还要更加严重。他们带了两条高卢金丝烟回家。他们的母亲们原来预计他们要晚一天到家。现在这些高年级学生也知道了这种情况。离婚早已被公开谈论。温暖的夏雨落在印第安人帐篷上，不知什么原因帐篷被从地下室清理到外面的花园里。可能是为了把它送给别人。这些高年级学生已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不再需要这样的东西了。画架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这也不过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而已。这些高年级学生还知道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紧急吗？然后呢？他们究竟在画架上画过几次？但是这些高年级学生不是一直以来就没有父亲吗？他（父亲）现在把米色的皮箱放入浅蓝色福特全顺的后备厢里，然后开车扬长而去，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高年级学生在去上学的路上吸烟，他们在笔记本里写下最初的诗歌。带有砸炮板气味的狂欢节期显得很奇特，它馈赠给周边地区的人们一种少见的自由，就连这些高年级学生也觉得它过去得太快。

暑假过后这些高年级学生明白了，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不可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其他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心里在想，但是却没有问任何人。他们沉默寡言，很少启齿说话。在此期间他们的名声早已传了出去。如果他们只是想很快凑到一群人当中，那么这群人就会马上散开，因为人们担心会受到严厉的盘问。他们和女孩子的交往也是困难重重：那些对他们感兴趣的女孩想要寻求禁令的刺激，当这些高年级学生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奇特的感伤表达时，她们会对此表示不解。很晚归来的卡车的灯光在地平线上杂乱交错。老酿酒厂被汽车头

灯很快照了一下。在家里这些高年级学生一直还在就着晚餐喝可可粉，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全家福，照片上他们作为八岁的男童手执弹弓在花园里站在父母中间。

秋天来得很突然。这些高年级学生站在运动场上冻得直哆嗦，而其他人则在围着场地跑圈。今天又是暖和的一天，在临近中午时分天变得阴暗了。就在马上从阴沉沉的云里落下雨点之前，一个女孩站在被风吹弯的花楸树旁边。她的针织羊毛衫仅由最上面的一颗纽扣束紧着。她是克劳迪娅。

这些高年级学生参加了一次由德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有奖征文活动，活动的主题是探讨边缘青少年问题。他们的投寄起初已经入围关键评选阶段，然后却遭到了一群反动势力的阻挠。相反本次活动的胜出者是一名被同化的扎领带的学生，他做牙医的父亲用金钱帮助他在一所私立学校顺利通过了高年级关卡。他父亲也够不容易的，战后的纷乱使得他未能获得博士学衔并进行正规的医学专业学习，因此他现在虽然可以钻牙和拔牙，但却无法获取麻药，这就使注射麻醉剂变得不可能了。在战后的二十四年里这种情况给他制造了很大的困难，毕竟娇生惯养之风开始波及越来越广泛的民众群体。候诊室里空无一人。即使是口头宣传（他自称从盟军以前的战争储备里私藏了一些笑气）也仅仅使几名公职人员光顾了他的诊所，他们跪在地上爬过诊疗室，为了能够找出相应的玻璃瓶或者器皿。不过确有一些弹壳被存放在工具棚里，铁锹和野营用火炉把它们遮挡得严严实实。在这种情况下由德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颁发的奖项对他儿子来说来得正是时候。作文是在支付了五十马克的报酬之后由来自平行班的一名女生代写的，文中涉及的不是边缘青少年，这一概念更多的是被应用在舞会上所谓的墙边之花身上，这些都已显得不重要了。相反，评审委员会在颁奖原因里恰恰突出和赞扬了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非政治的、对于青少年来说完全得当的立场，反之却认为这些高年级学生的作文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就业市场令人信服的法则和养猪国家的再生产方式，把它严厉批评为“向卑劣本能进行呼吁的德摩斯梯尼演说（抨击性演说）”。随后这些高年级学生在公共汽车上把牙医儿子的眼镜从鼻梁上打掉，往他父亲的工具棚里扔了一颗燃烧弹，事先他们不知道笑气弹

壳就存放在那里，以至于工具棚在一场无法形容的爆炸中飞向临近数百米远的莱茵河岸，从空中像雨点一样坠落的碎片伤到了几名在那儿避暑的人。当晚他们在共同的日记里写道：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些高年级学生在快过十八岁生日的时候在位于莱茵高大街的施罗姆普驾校给自己报了名。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好像更对理论课程感兴趣而不是对驾驶课时。许多来自乡村地区的男孩子多年来已经在开拖拉机，在当地范围内也开他们父辈的汽车，他们恰恰相反对理论学习感到很吃力，有一种相应的自卑感，因此在驾校课程结束后他们就会伏击那些狂妄自大的高年级学生，当这些人（高年级学生）在对面的公共汽车站等4路车、为了一直坐到亨克尔公园的时候。那些因为干农活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绕着石砌的、早已关门的售货亭把这些相比之下身体单薄的高年级学生催逼到科隆-杜塞尔多夫码头停泊处，威胁说要把他们扔进冰冷和布满油污的河水里。我们到底怎么惹你们了？这些高年级学生用愤怒的声音喊道，完全没有认清他们处境的严重性。因为那些小伙子想不起该怎样回答，于是他们干脆动起手来。打完之后他们登上一辆白色欧宝创纪录，驶过冰激凌咖啡店开车回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周，然后那辆白色欧宝“创纪录”在来驾校上理论课的路上因为车轴断裂脱离了路面，飞速撞进一家昔日轮胎制造商的办公楼里。因为车辆超载（里面坐了六个人），乘客卡在车里出不来，最后全都烧焦了。理论课时现在完全属于这些高年级学生，他们深挖自己真正的兴趣，能够精确分析汽车后备厢的不同容量。除此之外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也不多。对于教员提出的一个相关问题这些高年级学生回答说，有时不掌握交通规则甚至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的话人们就不被故意颠倒的路标和总是设定为红色的交通灯所迷惑了。

大概在同一时期这些高年级学生被征调参加服兵役前的体格检查。对他们来说穿过乡镇征兵局就像是决定整个未来的一次彩排一样。第一次他们看到自己的敌人确确实实地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面悬挂着德国国旗。这些高年级学生只需穿着内裤在寒冷的走廊里等候。人们否认了他们具有成为山地步兵的能力，除此之外他们的体格是完全达标的。起初他们打算不拒绝服兵役。不这样做的话人们什么时候还能这么容易地接触到武器呢？但是紧接着上下铺和兵营里摆放《士

兵》连载小说和豌豆汤的窄柜令他们感到恶心，豌豆汤里还连带煮有治阳痿的药剂，于是他们把第一个住处迁到了柏林。

这些高年级学生查明，人们在一个协会里是不能毫无顾忌地进行大搜捕的，因此他们在位于克莱斯特大街的聚集地也安装了一块相应的牌子。所有一直以来就光顾这里的人，无论是为了抽点儿烟、喝点儿茶，还是为了点一份水果拼盘，如果他们带够钱的话，都会得到相应的俱乐部会员卡。如果人们在游荡时突然咳嗽发作，这可能会预示着大咯血的危险。

这些高年级学生在用酿酒厂的宣传画裱糊他们的房间，这些宣传画是他们从一名贴海报的工人那儿用一小包HB香烟游说来的。中午放学之后，当他们的父母还在上班的时候，他们给自己加热一罐亨氏茄汁焗豆，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不停地把糖倒进罐里。他们从烟盒里敲出高卢金丝烟，先用舌头沿纵向把烟身舔一遍，然后才把烟点着。

为何这些高年级学生还要和父母去度假呢？反正在度假期间他们只是住在一家小型膳宿公寓里，坐在一个疗养浴场里，那儿真的没什么好玩的。第一次单独待在家里，这些高年级学生每天都吃夏威夷烤面包片。上午他们沿比伯里希林荫道向下去埃内瑟尔音像品店，在那里取了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新专辑，接着他们在客厅的电唱机上聆听这张专辑。第一面上的第一首歌非常好听，其余的不如说是令人失望了。窗外洋槐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这十天里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他们也不用去想任何特别的事情，恰恰是这一事实事后构成了这段时间的无与伦比之处。到了第二年夏天他们就在想一个女孩，那个时候她正和她的姑姑在赖特伊姆温克尔度假。之后总归一切至多都是与结构和纲领的抗争。

借助相应的侦查器具人们能够从一架直升机上辨认出那些高年级学生，他们正身处奥登瓦尔德山区的一个训练营里。他们在那里学习生火、煮豌豆汤和辨认踪迹。一枝折弯的树枝可能会使整个计划失败。用蘸湿的食指人们可以检测风向。把耳朵贴在铁轨上人们可以听到正在驶近火车，这样就能够及时把自己撤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在沙漠里找不到水，人们就用大砍刀劈开仙人掌，在不得已时也可以切开骆驼

驼的驼峰，尽管还有储备的水源，尽管动物的眼睛看上去无比悲伤，当它斜躺在地上死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地用原始工具掏空一头骆驼的内脏并让自己躲进去，为了让侦察机看不到自己而从头顶呼啸而过。十四天之后这些高年级学生的父母来探视他们。他们（父母们）向帐篷里张望，看到睡袋整齐地摆放在气垫上。中午这些高年级学生用他们的固定刀玩投掷比赛。谁要是有一把三刃匕首，他就不把它拿出来展示。就连三刃匕首的梳齿也能意想不到地帮人们大忙。这些高年级学生的母亲暗中塞给他们一块圆台形中空蛋糕，他们马上把蛋糕藏进自己的背包。晚饭提供的是切得太厚的面包片，在肝肠下面还抹着黄油。星星从无与伦比的景观上空飞驰而过。脚下的沙砾在沙沙作响。父母最后一次从林边向他们挥手，然后就登上他们的轿车离去了。这些高年级学生把烟吸进肺里，给其他青少年讲述他们班一个被称作豪斯的家伙，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想象一下，那个家伙有一个多么宽的腰骶骨。

这些高年学生能够在黑暗中拆卸一支冲锋枪，然后再把它重新组装好。他们用一根金属线和两个土豆装配了一台发报机。他们猜一张任意抽取并插回牌堆里的扑克牌。

多愁善感的感觉让这些高年级学生感到很难堪，这种感觉在他们聆听奇想乐队《我与众不同》这首歌时侵袭了他们。可是当这首歌碰巧从收音机里传来时，他们还是站在窗边，朝楼下的街道望去，街上人们从停靠的车辆和雪堆旁边走过，边走边把大衣领子竖起。空气驱赶着灰蒙蒙的雾气从张开的车库出口飘过冻硬的门前花圃。一个女孩把她的自行车推进一个低矮的车棚。在她把锁套在后轮上的时候，她柔顺的长发向前滑落遮挡在她的脸前。带有流苏的挎包搭在她的后背上。她的山羊皮大衣有擦蹭的痕迹。牛仔裤上的镶边是从一条旧的吉他背带剪裁的，那是她父亲当年行游吉他上的背带。现在这把乐器立在仓库里，它的边板上有一道裂缝。这个女孩的头发闻起来有刺蕊草的味道，她的呼吸带有口香糖和拉贝罗唇膏的味道。但是这些高年级学生不会靠她这么近。他们去找那些已经上大学的女性。她们坐在大学公寓的床垫上，呷着一杯红葡萄酒。女大学生们的舌头宽得令人吃惊，她们用舌头在这些高年级学生的嘴里来回搅拌。有时候集体公寓里有

人不敲门就走了进来，从写字桌上拿了几张用胶版誊写版印刷的纸张。这些高年级学生闭上双眼，尝试去感受女大学生的身体。但是在他们脑海里浮现的只有那个女孩的画面，她伴着“我与众不同”的歌声消失在楼宇之间。路灯灯光照在刷有绿漆的拍毯杆上。一辆有轨电车驶过。这些高年级学生点燃了一支“吉卜赛女郎”牌香烟。

对于这些高年级学生来说，他们个人的不幸是一种由社会促成的不幸。渴望就意味着缺乏理论渗透。特别是在晚上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命于变化无常的情绪。然后生活就会以某种精确绽放自我，用错误的发展模式欺骗人们。周游世界。表演一次“魔法智利”这首歌的独唱。缔结和平。但是跟谁呢？还没有人向他们宣战。

那些静止不动的夏季午后再也没有来过，当初在那些下午里课堂授课都是在拉下的百叶窗后面进行的。紧接着又背着书包去逛娱乐场和玩碰碰车。夜幕在摩天轮身后开始降临。桦树树叶在闪闪发光。从高速公路桥下面回家。房门敞开着。走廊里还挺暖和。就着晚餐母亲把满满一勺雀巢巧克力粉倒进一杯牛奶里。她自己只吃了一块番茄酱面包。

这些高年级学生乘坐夜班火车去曼海姆。他们站在火车站旁边一家餐馆里的弹球游戏机旁边。坐在吧台的一个人想知道，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

十四岁生日刚过这些高年级学生的扁桃体在没有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被切除了。他们看到那两团沾满血的东西放在自己身边的一个碗里。人们向他们承诺的大份冰激凌只在美国电影里才有。一位朋友给他们捎来了《切·格瓦拉日记》。他们在一本黑白艺术画册里欣赏阿列克谢·雅弗伦斯基（Alexej Jawlensky）笔下风格化的面孔。如果天下雨，他们有时就去博物馆旁那家美国租书铺。然后他们就犹豫不定地面对各种杂志闲站着，希望不要有人跟他们打招呼。手术过后最糟糕的就是口渴。

这些高年级学生一再打算中断他们的生命，无论这具体来说可能会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日记，很快再把页码撕掉，因

为他们认为上周才刚刚写过的东西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他们几乎无法想象还能挺过下一年。尽管如此夏天还是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不久他们就不得不考虑怎样开始度过假期。在某一年里这些高年级学生确实能够给自己示范些什么。他们和其他人一道再次乘车去阿尔萨斯地区，用一架柯达傻瓜相机互相照相。或许我们明年甚至去罗马，坐在纳沃纳广场上，他们在参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时这么想道。他们从克勒贝尔广场上的非洲人手里买下一条腰带，就像在柏林诺伦多尔夫广场边上的比萨饼店里那样喝着加汽水的啤酒，只是这种混合饮料在这里（斯特拉斯堡）有着不同的名称而已。

这些高年级学生住在一个建于三十年代的住宅区，它位于瓦尔德大街附近，在这条街道的拐角有家面包店。火车站在隔两条街远的地方，但是几乎已经不再被使用了。晾衣竿立在院子里未动过的沙箱之间。往下走是去田野方向，往上走则是去美国佬方向，他们过圣诞节时会在营房房顶安装一个巨大的圣诞老人造型。

这些高年级学生给来自低年级的学生辅导功课。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这太棒了，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些高年级学生的房间里吸烟，能够把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第五张专辑《原子心之母》

（Atom Heart Mother）借回家录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高年级学生的拉丁语很好。辅导一小时收费五马克。这些低年级学生在家对她们的父母说是六马克，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多出来的一马克在去参加辅导课的路上给自己买一小包十一支装的“塔林”牌香烟了。如果这些高年级学生休息期间在校园里凑在一起，那些参加辅导课的学生就不打招呼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这样最好。

还没有脱离学校，尖锐刺耳和支离破碎的城市嘈杂声就在这些高年级学生的耳际响个不停。他们以前不也沿着这些街道走过、抄近道穿过家具店的院落、从叉车旁边经过去往公共汽车站吗？但当时他们的思想还在其他方面。他们把书包夹在胳膊下面，从后门上车，站到公共汽车中间稍微摇晃的平台上。坐车回家的仅仅是他们，而不是所有从位于火车站大街的埃克保险公司大楼里蜂拥而出的成年人，因为家必须由另一个人创立，而不是被自己。感到幸福的是那些人，他们因为

有工资收入得以搬入城郊的一处新建住宅区，在搬迁过程中他们有着与当时在园子里支帐篷时同样的感受。人们拒绝让这些高年级学生拥有类似的幻想。在过节放假的周六下午他们穿过空荡荡的大街，感觉自己年纪轻轻就已经很孤独，在这样的年纪其他人还在倔强地摔打自己玩具汽车不起作用的遥控装置。但是心怀这种绝对必要的感受离家出走？然后人们就能马上背离整个城市，而且也能背弃欺骗虚假的制度。尽管如此这一切都还没有定论。这就好比是那场现代音乐会，人们曾经在学校为这场音乐会发放过免费门票，在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他们也去听了这场音乐会。总体来说音乐会挺有意思，乐音跟城市的嘈杂声挺相似的，小提琴高亢并一再被中断的尖细音，不想融入旋律的笛音，突然被猛力乱奏的打击乐声，然后又是出其不意的寂静，寂静中只有笛键的咻嗒声和刚一弹拨马上又被抑制的大提琴琴弦的震颤声能够被听到。当这些高年级学生从音乐会演出大厅里出来的时候，外面又冷又黑。他们把长围巾在脖子前面打成结，在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吸一支烟。那些人们听第一遍就能马上跟着哼唱的知名音乐显得无聊和单调，甚至无法在他们内心唤起某种忧伤的感觉。但是新的和不习惯的事物对这些高年级学生来说又显得冷漠和缺乏结构。即便是当 they 从音乐图书馆借出了两张唱片，一张是泽纳基斯（Xenakis）的，另一张无论如何只是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的，并给自己布置了这样的任务，即每张唱片的每一面都要连续听五遍，那种重新认出的感觉也不想在他们身上产生。他们把每一面又听了五遍，可还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新事物的本质就在于它总是让人感到不习惯并保持陌生吗？音乐成功地创造了新事物本身吗？这些高年级学生也会取得类似的成功吗？没有结构和重新识别能行吗？还是相反只能通过不断地变化？人们为此不得不忍受一种陌生感，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吗？

幸运的是，人们无法从空中看到这些高年级学生成长的那些住宅区，也无法看清它们的全貌。这样他们就能至少偶尔想象一下，路在下一个拐角处后面会笔直地通向一片未被开发的风景区，从那里又会越来越远地向远处延伸，在晚风的吹拂下途经剥蚀的栅栏和瘦骨嶙峋的苹果树枝直到那片土豆田，它闻起来总是有雾气、灰烬和污浊的烟雾的味道。事实上人们从一架运输直升机上看到的是毫无希望的彼此重叠

的破旧房子，它们从左右两边与工厂厂房和仓库接邻。如果定睛细瞧，人们还能辨认出在被破坏的游乐场旁边有几个扔掉的床垫。

当这些高年级学生开始深入探讨时代问题时，这从根本上来说已经太晚了。有时他们认为，凭借一种合适的理论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但是一台弹球游戏机有什么可理解的？它立在诺伦多尔夫广场边上的一个游戏厅里，在那儿独自闪烁发光，同时从吧台后面的两部扬声器里播放着苏西·奎特罗（Suzi Quatro）和克里斯·诺曼（Chris Norman）的二重唱《坠入情网》（Stumblin' In）。人们投入一马克硬币，得到五个弹球，然后就可以玩耍了。这是游戏机的基本原理。这些都是工业界想出的无用的小玩意儿，它们有两个游戏层面，顶部还额外有一对弹球游戏机，人们总是忘记使用这样的额外设备，“转换成数字”，这只是些随机特征，仅仅是为了迷惑游戏者。这些高年级学生难道只想在内心阻止这个句子即：我不再理解这个时代了？仿佛人们曾经理解过它，身处过这个时代，顺应过时代的潮流，就像在第一个春日里呼吸后院的空气那样呼吸过时代的气息？灰色的烟雾悄悄散去，光秃秃的树枝在寒冷中颤抖，几乎带有几分羞怯。

在一次打架中红色的女士假发滑落了下来，让人看到下面稀疏和鼠灰色的头发。被从手里打掉之后，带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斜向滑过铺有亚麻油地毡的地面，在护壁镶板处停了下来。戴在橡胶手套里的双手开始轻微出汗，此外人们对细微的动作技能没有感受力，比如固定一个小齿轮或者捻搓两根不同颜色的金属线。

就连离这些高年级学生最远的相识也曾经在夜里被按铃唤了出去，对方说了一句“我们在危难中需要你帮忙”之后，便把一个浑身湿透、有时甚至受了伤的人推进了门厅。谁要是运气好的话，第二天早晨就会在厨房桌上发现几张钞票，它们被压在盛果酱的玻璃瓶下面。但是经常会少一些衣物，没过多久会有几名官员站在房间里，因为疏忽而开枪打掉了天花板上的灰泥。

后来人们个别指责这些高年级学生，说他们在过去两年的恐怖活动中，也就是从他们的第一次作案（炸毁了牙医花园里的工具棚）直到他们在古斯塔夫斯堡的旧铁路桥边被捕，做过秘密警察的不情愿的傀

儡。否则的话怎么能够解释这一事实，即保存在金斯海姆城外一个谷仓里的全部武器弹药库都是用完全没有危险的材料换来的？此外这些高年级学生每天在博纳梅斯城区的不伦瑞克打保龄球时向人们展示的那些高清照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磨洋工，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时代内在性的唯一标志。长长的房屋墙面彼此邻接。折断的树枝在墙面上留下一道白线，这些高年级学生正低着头在缸砖上擦蹭树枝。夹在胳膊底下的书包很沉，因为这些高年级学生早已不按每天的课程表整理书包，总是把所有的书本都背来背去，就连《迪尔克世界地图册》也在其中。这纯属单方面的负担。仿佛生活本来并未构建在这样的负担之上。八岁的孩子背着他们的书包会远离死亡。他们脚下的每一片树叶都是不朽的。

人们观察这些高年级学生，看他们是怎样把两打装有剩余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蓝色垃圾袋扔进一个高层住宅区的大垃圾箱里的。因为他们在改装一辆逃跑用车时在车库门紧闭的情况下让发动机运转，因此他们不得不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自己拖到外面的院子里，他们躺在那里不省人事，邻居们通知了一名急救医师，后来他在警方的通缉照片上认出了这些漫无目标、四处游荡的高年级学生，尽管其他同志还很快在他们的鼻子下面夹上了斯大林夹鼻器。

对这些高年级学生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名市议会议员认为警方的通缉方法过于松懈，于是他假造自己被人绑架，在多次为男士固定客菜慷慨解囊并暗中两次塞了五十马克之后，让两个在布鲁姆咖啡店偶然结识的人把自己绑在城市公园的一棵橡树上。这场闹剧持续了整整两天，然后当局在伪造的供认书上发现了这名议员的指纹，查明这些指纹与他的打字机上的指纹完全一致。反正鉴定专家立即就注意到了供认信上非同寻常的表达“母猪制度”，而非一般性措辞“猪制度”。另一方面那些无目的的极端化组织也会给这些高年级学生制造事端，这些组织不加选择地冲击大使馆，枪杀经济参赞，在安装梯恩梯炸药时因操作不当也把自己炸上了天。因为在公众面前所有的事件都被归咎于这些高年级学生，他们很快就被迫面临这样的处境，即更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显然令他们很不高兴。这样他们就会损失宝贵的时

间，而同时下水道的盖子又会被特种部队焊死，直升机通过从空中对由四辆闪着蓝灯的警察巡逻车从两侧包围的住宅区进行拍照，把城市切分成地图上的方格网。

确切地说这些高年级学生都是具有活跃困难症的面色苍白的人，他们倾向于采取暴力策略。他们很早就被鼓励做出攻击性行为，同时他们又不允许发展一种潜意识中的父亲偶像。超我的空缺能够使他们更容易忽视内化的标准和价值观。但是他们的行为主要是由一种所谓的痛苦嫉妒心理所决定，这种心理满足了由延期教育引发的自我辩解需求。此外这些高年级学生的个性发展呈现出单元化特征，这与无论怎样而形成的社会现实之间无任何真正的关联。

为了尽管无法阻止人质对他所处的环境进行描述，但至少相应增加他这么做的难度，这些高年级学生在一间普通的堆放煤炭的地下室墙壁上铺了石膏板。他们在隔墙上挖了假想的窗洞，给它们遮上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窗帘。类似于在埃及的墓室里他们还设计了假门，他们在参加完一次训练的归途中曾参观过这样的墓室。在最初心血来潮的驱使下安上的装饰物又被用其他颜色涂盖，并被一张质朴无华的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宣传画所取代。

如果不使他完全丧失食欲，那么这样的一名人质能吃些什么呢？为了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应对准备，这些高年级学生在一家药房谎称想为一次旅行收集必备药品，在那里买了活性炭药片和退烧药。“千万别忘了：水一定要烧开！”女药剂师还在他们身后喊道，但是他们已经拐过街角不见了，登上被一名未公开的女友借来的福特全顺车扬长而去了。

当这些高年级学生往地下室里搬运一箱苹果汁和几袋咸味长条饼干时，他们在一刹那间觉得想要回忆起什么，但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如果还有彩色纸带挂在墙上的话，他们或许就会想起些什么。但是过去孩提时代的玩乐已经永远逝去了。

这些高年级学生感觉自己被困在虚度光阴的贫瘠当中，除了把时间的流逝重新解释为一种潜伏着危机的运动之外，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

解脱途径。为了利用下午间隙规划一天余下的作息安排，这些高年级学生连续几年几乎每天都要观看在影院上映的影片，他们从影片中所了解到的那种结局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去克服的。

在波鸿大学附属医院的胸外科、心脏外科和血管外科室里，这些高年级学生向一名女助理医师提出一些看似不使人为难的问题，为了以后能够（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有针对性的刺入胸腔左侧下四分之一处对心包进行穿孔，而且这样做还是用一把普通的手术刀。

这些高年级学生穿越威廉大街朝疗养公园方向走去，他们在路边发现了一名男子，他扛着一部电影摄影机，蹲在一辆欧宝士官生汽车后面。他们循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一对夫妇正在往马路对面搬东西。这些高年级学生闲荡了这么久，直到那名摄影师在一次拍摄间隙里跟他们打招呼，并请求他们帮个忙。这些高年级学生应当在威廉大街17号的那栋房子前面模拟一次非法集会。当摄影师不仅看到这些高年级学生愿意充当群众演员，而且还看出他们身上蕴含的革命潜能时，他自我介绍说是东德公民。人们要在这里为著名的电视连续剧《史无前例的刑事案件》补拍一起劫持事件，但是拍摄工作必须偷偷进行，而且不能让西德当局或者民众知道，因为否则的话人们可能要面临麻烦。这些高年级学生最熟悉劫持事件了。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市政厅一楼去往城市图书馆的路上看到了许多通缉令，其悬赏金额从两千马克、一万两千马克最后到五万马克不等。除此之外还有捉拿于尔根·巴尔奇的通缉令。他们在哪儿也没看过张贴着印有他们自己头像的通缉令。人们用黑色记号笔在那些被抓获或已死亡的通缉犯照片上打上叉，这一点他们也没亲眼见过，仅仅听别人讲过。

在这些高年级学生的孩提时代，皮克勒侯爵冰激凌的家用包装盒上有褐色、白色、红色这样的颜色排列，这些高年级学生从道姆面包店买来这些冰激凌，把它们包在报纸里带回家，到家后把它们放进没有冷冻柜的冰箱，直到午饭过后它们变得松软爽口为止。这些高年级学生用勺子舀着所有三种颜色的冰激凌吃，因为这么掺着吃对他们来说正合适。后来道姆夫人离开了她丈夫。再后来她又回来了，重新站在店面的柜台后面。

星河夹心牛奶巧克力如此轻质，以至于它甚至能够在牛奶里漂浮。归根结底对于这些高年级学生而言，这是一幅令人无法理解、近于荒谬，但正因如此却让人更容易记住的画面。能在饭前吃甜食，这一革新也受到这些高年级学生的欢迎，但他们并不理解这样做所带来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深远含义。将来他们在读到这个句子：“先吃饭，然后再讲道德”的时候会回忆起星河夹心牛奶巧克力的。并且他们还将回忆起，士力架最初是裹在深红色的包装纸里出售的，一段时间里还有一种名叫“凯迪”的巧克力条和爆米花一道出售，就连“黄油指”这种巧克力条也在德国市场上短暂出现过，但是即刻又消失不见了，仅仅是为了数十年后再次现身，只不过这一次人们听到的消息是，现在在生产这种巧克力条时使用了转基因配料。

这些高年级学生还没有死，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就已经开始流传了。据说他们把小口径步枪藏在排水管道里，用一台电唱机制作了无线电收发机，尽管有最严厉的隔离囚禁和监视，他们不仅能够彼此收到对方的秘密通信，还能继续定期与外界联络。此外就在他们临死前的头一天夜里，这些高年级学生甚至从上了双层锁、用横木板堵挡的牢房里逃脱了几个小时，为了再次返回他们的故乡，在那儿穿过宫殿花园下到莱茵河河岸，为了站在那个以前曾是一个售货亭的地方（花五芬尼人们就可以从那里买到两种颜色的橡皮精灵），然后向莱茵河对岸望去，他们惦念着对岸一家工厂的塔状建筑。在他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家先前非常现代化的餐馆已经消失了，那是一座建在木桩上的平房，它半伸在河面上，那家餐馆他们只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去过一次，当时人们刚开始和朋友们下馆子吃饭。同样消失的还有驾校和电影院，电影院有一个通向狭窄岔路的后门，岔路上只能看到没有窗户的房屋背面。街道变窄了，在通往市郊途中交通线路也发生了变化，班里的两名女同学以前就住在市郊。她们的生活轨迹与他们的平行运行，她们或许还远未到达生命的终点，现在正和她们的丈夫躺在自家小楼的床上，这些楼房建在城市另一侧一个更好的居住区里。她们的孩子慢慢成长起来，现在同样正在安睡。一切都在沉睡。只有这些高年级学生在他们短暂而又朴素的生命的最最后一夜里，再一次站在回忆抛弃他们的那个地方，在那儿他们开始更多地关心未来而不是当前。现在在几小时之内一切都赶上了他们，并且就跟

怎样来的完全一样，又将再次和他们一起消失。仅仅是鞋底凹槽里的一些沙子就会令细心的观察者起疑心，但他很快又会把这个当作不重要的事情搁置一旁。甚至莱茵河里的一颗小石子也会在规定的尸体剖验过程中从这些高年级学生的鞋里掉出来。但是病理学家们可能会对这种石子的特殊气味感到一筹莫展。他们无法用舌头感觉那种带粉色硬馅的狭长的华夫饼干的味，这种饼干只有在圣灵降临节体育运动和游戏比赛期间花二十芬尼从胸前挂着托盘的小贩那儿才能买到。在漫长的暑假里的一天上午，他们没有看到光线在威廉-卡勒大街上的房屋背后突然变向，一瞬间几乎一切都变得黑暗了。那里的房子太雄伟气派了，以至于普通人简直无法在那儿出生在那儿生活。人们拜访会修理录音机的朋友们，他们跟这些高年级学生完全不一样，后者好像总忙于一件事，也就是总是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忘记存在是一种慈悲，这些高年级学生在这最后一夜里才明白这一点，当他们从未发生变化的冰激凌咖啡店旁边走过，尝试透过黑暗的窗玻璃辨认出里面罩有蓝色人造革坐垫的座位时。但是如果人们恰好在生命的终点想再次返回，为了找到一些类似家乡的元素，结果只在少量未发生变化的东西里发现了它，那么这些高年级学生的开端或许基本上是错误的？他们能够看到各种变化在不停地发生，当然这也取决于一切在朝什么方向变化。那两家邮局都关门了。就连取代了电影院的那个饮料市场在此期间也不见了。改衣裁缝铺搬进了烟草制品店的店面。后者也出售车票和小本子，后来这家裁缝铺也必须收拾东西撤离。仔细看去，人们在某些房屋身上还能看出商店入口大门和橱窗的痕迹，现在它们都被用砖砌住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已经在这些痕迹上抹了灰泥。这些高年级学生可以一直这么走下去，但是时间快到了，清晨越来越近，他们必须返回牢房，在那里迎接死亡。如果就连那些还得吃力地找寻过去的足迹，并对每一样剩余的东西都会感到高兴的人也不再有所发现的话，那么在他们也离去之后还会剩下什么呢？这些高年级学生可以免除年岁的磨难，但却无法避免残酷的认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他们会回忆起莱茵河河岸，回忆起他们甚至都没有爱上过的文具店老板的女儿，回忆起那些他们只是路过的其他学校的校园，回忆起他们童年时代那些不知名的食品店和面包店，它们只隔了几条街远，但还是显得无法企及，因为出于某种说不出口的原因人们从未踏进过这些店铺。但这不是在做梦。生活曾经以简单的方式开始了自己

的历程，不是没有负担，但就是没有疑问，因为人们没有问过，这些高年级学生想很快（还没有过去几年）改变和摆脱这种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总是不断出现这样的画面：道路、人、公共汽车站、天上的云、云前的树木剪影、一座桥、一个公园和名字，这种生活现在必须被终结，或者它使自己走向终点。这些画面久久不肯消散。在生命慢慢结束的同时，他们应当干脆一直注视着这些画面？还是应当最后一次亲自动手？

为了让人们知道哪儿是前面哪儿是后面

病房护士一再告诉我，说我什么准备也不用做。但是你是知道的，我总是事先未做任何准备就去了某个地方，而且你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即经常一切只会变得更加糟糕。因此我现在需要那个小箱子，你务必并且必须尽快把它带给我，因为我必须把全部材料再浏览和审阅一遍，并且是在我第一次被检查之前，在第一次检查时不出任何差错，也就是说预先进行充分的准备，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事后我还可以让自己过度劳累，但这都将不算什么了。所以我请求你，接到这封信之后马上把那个小箱子带给我。在这之前我不清楚将要做些什么。因为我不想通过拒绝医生会诊而给人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因此我在自己的腘窝处割了一个小口子，往伤口上涂了一些从公共活动室的烟灰缸里取来的烟灰，为了让伤口感染化脓。这样我就有借口不去参加第一次医生会诊了。我赢得了时间。这是我迫切需要的时间。我生气自己没有从一开始就想到这么做。没有想到再多等一两天，为了在家里不被打扰地浏览、筛选和审阅小箱子里的东西。因为我担心，他们会检查箱子里的东西，担心他们可能根本不允许让我得到箱子里的东西，就跟现在一样，虽然我在这里可以穿着自己的衣物到处乱跑，但却是在不扎腰带和不穿便鞋的情况下，而且我也接触不到剪子或者刀具，与此相应的是我在自己的腘窝处割一道口子也很费劲儿。因此你必须尝试亲手把那个小箱子交给我。你必须尝试向他们阐明，因为小箱子他们没什么可担心的，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箱子里装的东西。或许最好你把所有的东西转装到塑料袋里，因为他们一般只留意箱子上的扣环，最后对这样的小玩意儿会置之不理。或者更好的做法是，你带着小箱子来，但是随身携带一个正好能容纳箱子里东西的塑料袋。因为这样既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小箱子上来，同时又能转移他们对箱子里所装东西的注意力。如果他们说，这样不行，因为箱子上有扣环，那你就取出随身携带的塑料袋，当然塑料袋必须要有相应的大小并足够结实，当着他们的面把箱子里的东西塞到塑料袋

里。万不得已时你也可以让他们自己这么做。但一定注意不能有纸张散落或者掉到地上或者折叠。你也可以带两个塑料袋，如果一个不够装的话。但那样的话你就必须看仔细了，你是在什么地方拆分页码的，页码经常是双面书写的，往往还没有编号，因此人们很快就会失去概览，如果把一堆纸张随意从某个地方分开、再把它们分装进两个不同的塑料袋里的话。一旦你要使用两个塑料袋，那么还是在塑料袋上做上记号吧，这样人们就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了。你干脆用记号笔在前一个、也就是第一个塑料袋上画一个叉号，在第二个塑料袋上画两个叉号。然后你从箱子里取出前一半纸张，也按最上面的一页在上的顺序把它们塞进第一个塑料袋，人们看见这个塑料袋时就会看到上面画的叉号。箱子里的后一半纸张你也完全按照这一程序转移。然后我就能把这两个塑料袋并排放到桌子上，让画有叉号的一面朝上，首先我从画有两个叉号的塑料袋里取出纸张放到床上，然后再从画有一个叉号的塑料袋里取出纸张，把它们直接摞在第一堆纸张上。这样做就恢复了原先页码的正确顺序。我把这件事托付给你。你知道我信任你，我也知道你将会做成此事，将会成功地把小箱子，也就是把箱子里装的东西（我主要在意的就是这个）送到这里来，这样我就能进行准备工作了。如果腠窝里的切口还不够严重，我会再想出其他办法的。但是再久的话或许我就无法拖住他们了。万不得已时，一旦第一次医生会诊已经发生，你必须尝试在我拿到那些材料之后，马上把我转到另一名医生那儿去。现在我想不出充分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何要采取这一步骤，但是我将会继续思考，然后告诉你想出的原因。昨天夜里我几乎没睡，因为尽管吃了药，一想到必须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去接受第一次医生会诊，我就特别紧张不安。这种可能性使我安静了下来，那就是一旦小箱子未能及时到达，我还是有机会进行拖延的，当然我也不能太过夸张，也就是不能切太大的口子，否则我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然后他们就会认为我受到了危害，因为我在伤害自己，这当然是不对的，我只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才这么做的，除此之外我永远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为何要有这样的思想呢？我觉得换医生的事肯定是能够做到的。当然你必须注意语言表述，别让人觉得受到了侮辱或者冷落，也就是说不要唤起这种感觉，好像人们不信任他的主治医师或者怀疑他的能力。在塑料袋这件事上我刚刚想起来，人们可能会错误解读不同袋子上的叉号，会认

为它们涉及的是你想让我收到的某一秘密消息。或许这样做更好，也就是你不在塑料袋上画叉号，而是用一个打孔器在第一个袋子的正面左上角打一个孔，在第二个袋子的正面左上角打两个孔。这些孔洞不大，肯定会被忽略的。但是你不能把孔打在太靠近袋子边缘的地方，因为否则的话袋子可能会扯破，这样我就无法再区分哪个是第一个哪个是第二个袋子了。

不一样的青春期1：小马克斯·雷格

我母亲生下我之后就去世了，我父亲对天主教非常虔信，仅仅是因为他不断复发的神经崩溃这一点，他就不再有能力继续抚养我了，此外作为管风琴师和教堂乐师，他几乎不可能把一个孩子拉扯大，因此我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成人的。我被取了跟父亲同样的名字，这种关系从表面上看总是引发恼怒的一个起因，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把它称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我很早就知道去否认这种秘密，我向其他儿童，也包括向那些就一种亲属关系询问我的成年人指出，即使在教会圣徒当中也会碰巧出现名字相同的情况，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位圣徒名叫托马斯、弗朗茨或者约翰内斯，虽然我的解释只能令极个别人感到信服，但却至少能够使他们不再提那些令人不快的问题，因为我用深度信仰的假象出其不意地难倒了他们，令他们不敢再继续逼迫我了。

我父亲每月来看我一次。我父亲胖得令人难以置信，仅仅是因为他庞大的身躯我就觉得他很陌生，尽管在他身旁我感觉还是非常舒适的。他总是星期天来看我，之前他还要在教堂演奏弥撒曲，他先是开车带我去设在市政厅地下室的餐馆，在那儿他习惯于对服务员说：“请您半小时后把肉排送来。”这是他点菜的方式。事实上他至少要吃八块肉排，有时甚至更多，而我只能勉强吃掉一块。就着肉排他喝汽水。每次只喝汽水。汽水都是装在大腹车料玻璃瓶里，每次他都整瓶整瓶地喝。接着我们去疗养公园散会儿步，然后去布鲁姆咖啡店，在那儿他点了两整块蛋糕，其中一块据说是给我点的，就着蛋糕喝的又是汽水。其间他给我讲述他的半音阶复调音乐。当然我从五岁开始上钢琴课，从八岁开始上管风琴课，开始的时候我也非常勤奋，每天坚持练习，从未缺过一次课，或许是因为我想象有一天作为势均力敌的钢琴师和管风琴师，能够和我父亲共同弹奏，甚至和他一道出场表演，但是因为我父亲在相聚时从不打听我在音乐方面的进步，好像完全不在乎我在整个一周里都做了些什么，相反他总是向我阐明他当时令我

无法理解的作曲理论，用这些理论他打算逐渐颠覆音乐的调性，因此我的音乐抱负开始减弱，不久便彻底熄灭了我的希望，即通过在音乐领域的成就能赢得他对我的好感并获取他的认可。

当我进入青春期时，我尝试（可能跟大多数孩子一样）让自己有意识地与父亲划清界限。首先在我们星期天郊游时我拒绝用餐。因为这么做好像并未对我父亲造成太大妨碍，甚至他可能不再感受到这一点，因此令我祖父母感到震惊的是，我在平时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拒绝吃饭。同时我在自己动手搞一项发明。它应当涉及一件全新的乐器，其音色人的耳朵此前从未听过，只有我才能用这种乐器达到一种高超的演奏技巧。一开始我用不同的木料和金属废料来做试验，它们都是我在城里闲逛时收集到的。后来在我祖父母用上电灯之后，我尝试用电磁线圈和电阻制造出最初的音色。

我十六岁生日刚过去两天，那是在一个星期天，我父亲死了。当他中午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来接我时，我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了圣博义教堂。或许是一次合唱排练或者其他一种典礼妨碍了他，我这么想道。但是在我临近十二点半到达的时候，教堂大门已经关闭了。从里面还能听到管风琴轻微的嗡嗡声，因此我向通往廊台（教堂中唱诗班的席位）的门走去。在我沿铁质的盘旋梯上楼期间，管风琴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了。那声音听起来就仿佛是管风琴的一个或者多个音栓被同时钩住一样。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然后被吓了一跳，因为我看到父亲的脑袋耷拉在管风琴椅上，面部表情扭曲，双眼毫无生气。我跑到他身边发现，他可能是在起身时不幸跌倒，在倒地过程中双脚一定是卡在管风琴的踏键里了。我把所有的音栓拨回原位。教堂里寂静得叫人害怕，虽然那种沉闷的和弦好像一直还在回荡。然后我尝试搬动父亲庞大的身躯，让它换作一种不太抽搐的姿势。但是我的尝试是徒劳的。我跑下楼梯，跑向那边的教士住宅。但是我父亲救不活了。一切迹象表明他在弹奏的尾声心脏病突发。几年之后我在战壕里再次听到了类似沉闷的一连串音响以及随后突然出现的寂静，当低空飞机贴着我们从上空呼啸而过的时候。父亲死后我个人的音乐事业也戛然而止。虽然我又能正常吃饭，而且饭量也比以前大了，但是我的听觉对所有C小调以上的音级都变得非常敏感。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把兴趣更多地转移到电学上，开始用烤蛙腿模仿著名的伽伐尼实验。战争期间我在营房的漫漫长夜里应用了这种能力，为了使战友们被截去或者撕裂的肢体短暂地重获新生。当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性刺激，因此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也无法摆脱对于电学的激情。几乎每个夜晚我都在火车站周围游荡，和年轻小伙子打招呼，尝试说服他们跟我回家，为了在家给他们接通电源。为了与人相识，我购买了一个寻开心的小玩意儿，它是一个带电池的烟盒，能够使触碰它的人遭受轻微的电击脉冲。我首先把烟盒递给那些我打了招呼的男孩子们，观察他们是怎样对电击做出反应的。尽管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但有些人脸上也同时掠过一丝短暂的微笑，其他人会愉快地颤抖，也有些人不由自主地去抓自己的阴茎，仿佛他们感受到一种从那里涌上来的刺激。我给这些人钱，把他们带回到离市区稍远的祖父母的房子里，这栋房子安然无恙地挺过了战争的洗礼。我的祖父母在此期间已经去世了，因此我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自己的爱好。

我的实验指的是一种刚开始还比较模糊，但在随后几个月里越来越严格规定的仪式，仪式中男孩子们必须脱掉衣服，腹部朝下趴在厨房用桌上。臀部肌肉对所施加电流的反应是最有效的。至少人们注意到它们的抽搐是最明显的。以臀大肌为例，所谓的后续抽搐最长可持续十五秒，频率为每秒抽搐四下。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它使我产生这种感觉，即就像演奏一件乐器一样去操作我这些被保护者的臀部。当然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我弄明白那种完美的技术，也就是说怎样正确分配电流的剂量。我也必须查明，身体里好像存在一种电压的累积形式，尽管我在相关文献里找不到关于这一主题的任何说明。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我的几名男孩在仪式过程中死去了，尽管我不像在最早的实验中那样使用了过多电流，而是因为我好像使他们连续遭受了过多轻微的电击脉冲。后来人们自称在我祖父母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些尸体，但是报纸上关于这些尸体数量的说明却是过分的夸大其词。同样错误的还有那种宣称，据此我的祖父母不是自然死亡的，而是极有可能被我杀害的，为了在他们尸体上实施最早的电流及电子实验。此外我也没有试图逃脱逮捕。在我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程度和残暴之后，我更希望的是能够探访东德区域，因为在那里人们还没有废除死刑。

对于东德处决罪犯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认为再通过一两次暴行，最终能够实现在电椅上被处以死刑的愿望。一方面我想以相同的方式死亡，就跟那些确切地说是因为无意间出错而使其丧命的男孩子一样，另一方面我希望通过一种从未了解过的形式、最后以最终通牒的方式在自己身上感受那种肌肉和肢体抽搐的快感，因为那样的快感不会再有止境、克制和限制了。我终于可以感受一次那种性欲高潮的颤抖，因为生殖器官的另类畸形，这样的感觉我一辈子也不曾有过。

在东德人们通过所谓出其不意的近距离射击处决犯罪者，在处决之前人们通知一名被判刑者，对他的行刑马上就要执行，为了在同一刻用一把瓦尔特P38手枪朝他的后脑勺开一枪而直接处决他，这种情况我是在1957年9月27日才得知的，当人们在莱比锡监狱以这种方式对我执行死刑判决时。但是之前在我的协助下，人们拍摄了一部旨在还原所谓作案现场的教学影片，影片中我可以把在东德犯下的五起罪行以及几起来自西德的案例再复制一遍。一方面这部影片应当被用作针对西德的宣传材料，另一方面它也应向人们展示，暴力犯罪和性犯罪早已在东德消亡，仅仅是那些从西德旅行前来的不法之徒在做这样的坏事，并把这些罪行拖拽至这里。不过通过国家安全力量警惕的眼睛和果断的干预，这些受天性折磨的家伙们的卑劣行径很快就得到了制止。在这部教学影片中我扮演我本人的角色。几名非常帅气的国家人民军士兵扮演我的受害者。只是在拍摄进程中流经人体的不是真正的电流，尽管人们一开始考虑过要使用电流，当然是在采取一切得当的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最终放弃使用电流不是出于针对当事群众演员的人性考虑，也不是为了拒绝再让我经历一次实验的快感，而仅仅是因为充当拍摄地的临时木板房里的电线无法再为实验提供合适的电容，这间木板房位于靠近法兰克福（奥德河畔）的一片树林里，它已经为聚光灯和摄影机提供电源了。

询问自杀这个话题

为什么您不能简单地澄清事实，交代过去是什么情况，尤其现在又是怎样一回事，并为您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呢。还是您想效仿您的伟大榜样海德格尔，他在记录本里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声明拥护元首，在自己死后几十年才让人出版他那些混乱无绪的记录本，也就是当蛆已经把腐蚀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当不再有残存的节骨可供人们问责的时候，因为人们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所有的独裁者、教皇和恐怖分子都再次被从坟墓里挖出，以半腐烂的状态被拽上法庭。但是我离题了。

海德格尔是我的榜样？如果您说的是马尔库塞.....

啊，您认识他？

什么叫我认识他？

那好吧，我本来以为您只看关于解构主义的瞎胡闹的作品，为了从中拼凑出适合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没有一天晚上我不至少浏览一下他的《论据和药方》。或者《幸福哲学》，这本书您应当看一下。

我指的是赫伯特·马尔库塞。

啊，原来是这样，那当然。不过他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

在我看来应该是阿多诺。

当时女大学生们用撩起的上衣冲他.....他是一个相当拘束的人，尽管这种类型当然也与您相匹配。

拘束？这我不知道。可能是吧。尽管他有过一位情人。

就跟您一样。

您不觉得您的审讯方法对我有些要求过低吗？总是不假思索地用会话中刚刚出现的某些片段来反驳我，无论这些片段正确与否。

难道不对吗？

是的，当然不对的。

那克劳迪娅呢？

克劳迪娅怎么了？

作为您的格尔妮卡我将会感到非常嫉妒的。

这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您怎么也忘不掉这个女人。

当年她还是个女孩，什么叫“忘掉”？我能回忆起许多当年的事情。

可就是回忆不起我们所谈的这件事。

我不明白您说的。

您非常明白我的意思。您不断变换方向，总是偏离话题，但是对关键的事情总是闭口不谈。

在这方面我破例地赞同您的说法：关键的事情总是没有被谈及。

但是情况大可不必如此。

我也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认为：情况必须如此。情况必须如此。

为什么您如此充满激情地重复这句话？

贝多芬的第16号弦乐四重奏，这是贝多芬在他侄子做出自杀尝试之后创作的。这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

是的，自杀，本来我也想再次谈起这个话题。它好像也是这么一种自青春期阶段开始您就不曾摆脱过的诱惑力，这些都表明了您的某种不成熟。但是我的用意根本不在于此。恐怖和自杀，两者属于同一个整体，这种情况不是近来才有，而是当时在红军派时期就已有之，当年红军派的所有成员都自杀身亡.....

.....

您压根什么也不说。

我该说些什么呢？

那好吧，我刚刚谈起红军派，说该组织的所有成员都自杀身亡了。

.....

还有什么？

什么还有什么？我听到了您刚才说的。

也就是说您也认为当年在施塔姆海姆发生的是自杀事件？

对此我不发表任何意见。

啊，有意思，那么请允许我引用一下您在1978年秋天对此.....

您不要费力气了。或许我最好应该这么说：对此我不再有任何意见。

但是“自杀”这个字眼还是不断地在您的所言和所写中出现。例如那个小马克斯·格雷格，人们在专业文献中把他的情况称作“强行自杀”。

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论点。当然他去了东德，因为在那里死刑还没有被废除，但是.....

这是他自愿的决定。

也谈不上是特别自愿。他被警方通缉。他不想进监狱。他的生命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对您来说原来这就是问题的所指。

所指什么？

那些无法挽回的生命，它们应当让人注意到您自己无法挽回的生命。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您发送的紧急呼救信号。是您发出的呼救声。

您能如此看问题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对这件事、对所有这一切的感受不太一样。

最终人们也能理解这一点。您把自己孤立起来。非自愿地孤立起来，不得不承认这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就是在您这个年纪再次从这种生活结构中退出，从这种质薄轻柔的织物中（如果我能这样表述的话）退出。但是我们给您提供的正好就是这个。

我们？您这么说话仿佛是想招募我，要我接受您的计划而退出自己的行当。但这些都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

恰恰是您说这样的话？如您所言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那为何您要坐在这里呢？

不一样的青春期2：克里斯托夫·冈斯塔勒

1972年9月11日奥运会的闭幕式在慕尼黑举行。我父亲当时是体育场播音员，我可以跟他坐在看台高处的贵宾室里，所有的社会名流都在那里进进出出，也包括主办者和教练员。体育场里挤满了人，当时是晚上7点钟左右，突然广播里通知，说一架芬兰客机、一架私人飞机正向体育场飞来。六天前所有的以色列人质和劫持他们的匪徒刚刚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被击毙，因此人们现在当然变得特别小心。尽管如此他们让我父亲来决定，体育场是否应当被清空。我父亲反对这样做，因为他认为，清空体育场将会在下面引发一场大规模恐慌，因为所有的人都被9月5号的悲惨事件和一天之后的悼念活动搞得精疲力竭。但是父亲把我打发到贵宾看台下面。他说我应该离开体育场，到后面停车场上的房车里去，我们的东西都在那里放着，然后我在车里等他。起初我不愿意走，但接着我意识到，他简直有太多的事物要去料理，现在还必须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人们把决定权干脆推到他身上，这本来就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做法。或许他们认为：他在那么多影片里演过警官的角色，对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他应该也能胜任。然后我摆出一副好像要走出体育场的样子，但在外面的通道上藏在了一只巨大的瓦尔迪猎犬后面。短腿长身的猎犬瓦尔迪是当时奥运会的吉祥物。如此带有彩色条纹的猎犬在四周随处可见。从瓦尔迪身后我观察和看到了体育场内的一切，就像我父亲从贵宾看台上所做的那样。我非常钦佩父亲，同时也相当嫉恨他，因为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清楚地意识到，我这辈子几乎不可能达到像他那样的成就了。然后人们就可以马上饮弹自尽了。但是当时我当然还不像现在这样感受得这么真切。当时就是一种简单的由钦佩和憎恶构成的混合心理。也就是对钦佩对象的憎恶。我更愿意在那一刻让自己感到疼痛。把手指夹伤或者把一只叉子刺进腿里等等。相反我只是打开我的照相机，把曝光的胶卷从卷轴里抽了出来，胶卷上都是我在中午精心拍摄的社会名流、政

治家、运动员和演员的照片。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根本算不上是令人不快，尽管在那一刻我也夺走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后来我一再找寻这种感觉，但是只是在多年以后才再次感受到了它，那个时候我正和妻子在缅甸，我们陷入了一个封锁区，突然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所包围。他们没有打搅我妻子，这可能是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但我却受到了他们的折磨，被他们推来推去。恰恰是因为情况真的很危险，我又感受到那种憎恶和钦佩的复杂情感，在彻底绝望的同时我又想设法解救自己，虽然我也对这样做感到害怕。但尽管如此在那一刻人们也能产生一种愉快的感觉，这一点无论如何让我有所思考。

2003年年初我患了肠脱垂，医生先是对我进行了错误的治疗，然后我必须经历二十一次手术的磨难，但我并未因此而丧命。事后我才意识到，我在缅甸的那次遭遇也是发生在9月11号。2001年之后9月11号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期，但是对我来说它从1972年开始、当那架飞机朝慕尼黑体育场方向飞去的时候，就已经具有特殊意义了。一年之后的1973年，同样是在9月11号这一天在智利爆发了政变，当时所有的军用飞机也都朝首都圣地亚哥飞去。1974年9月11日14名英国士兵在一次北约军事演习中因为疏忽而跳进了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在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飞机坠毁事件之一，事件致使七十人丧生。或者在以前的历史上也是如此，例如1926年9月11日无政府主义者对墨索里尼发动的炸弹袭击事件。但是半数以上在9月11号这一天发生的灾难都有飞机的参与。例如1982年也不例外，当时一架军用直升机坠落在海德堡和曼海姆之间的第656号高速公路上，机上所有人员（超过四十人）都在这起事故中遇难。

在缅甸的那次突发事件之后我对被动性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作为异性恋男人们只能对被动性有很糟糕的感受，特别是当你一直就以某种方式在搪塞这种缺陷，因为你在这方面无法达到像样的标准。因此，这是我个人的理论，这种被动性也一直是外界被强加给我的，比如通过疾病，因为我不能有意地也就是说主动地去感受疾病。无论怎样这么说也是有逻辑性的，因为如果我能够主动地接受惰性，那

么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得到了解决。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只是它没有起到任何帮助。相反我患了抑郁症，这也是被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人们也说，抑郁症原本是一种妇科病。但是人们应当调查分析，看抑郁症的表现形式在男人和女人身上是否没有差别。人们应当搞清楚，男人变得抑郁是因为他们无法消极，而女人变得抑郁则是因为她们必须消极。

1978年在一次马戏团盛装表演期间，我父亲被一只黑猩猩咬伤，染上了严重的肝炎。他在隔离病房里躺了将近半年。当然各大报纸上报道的净是这样的消息。记者们包围了我们家的房子，给我和我母亲拍照，当我们离开家乘车去医院的时候，在那儿我们反正也只允许通过窗玻璃探视父亲。我们给他寄到医院里的信件事先必须被消毒，他从医院里给我们寄出来的信也是如此。换作其他人会在这一刻抓住机会的。我的意思是我当时已经成年了。本来我是在那一年成年的，但是联邦政府早在三年前就使我达到了法定成人年龄。准确地说我是在1975年成年的，把法定成人年龄下调到十八岁使这一年成年的人获益最多，如果人们可以这么说的话。当然我现在是在事后说获益，当时我觉得这样太早，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我那个时候确切地说是缺乏自信、绝望、消极等等。我也无法看到我父亲同样感到绝望和抑郁。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1971年他拍摄了自己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否电视台会不断聘请他拍片，这一点还很值得怀疑，他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影片，因此他们才聘请他加入电视摄制组，但是一旦有什么意外，或者就跟现在一样他长时间不参加摄制工作，他就很快又会脱离这个行业。十年之后重返电影业或者类似行业，这也不是没有困难的。

当时我也同时被确诊为糖尿病。这也堪称一次打击，不仅对我来说，对我父母也是如此。我父亲说，这给了他坚持到底的力量。为了照顾我，他现在务必要恢复健康。这种情况也跟以前类似。我生病了，因为他患了病，他恢复了健康，因为我得病了。我最愿意又躲到一只巨大的瓦尔迪猎犬后面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开始演奏一些音乐。但我不是那种真正乐意站在舞台上的人。同时你又成长在一个就看重这一点的家庭里。在那儿你根本没有自己的观念，你只是在想：这个我也想做。一直以来我也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有一点很清楚，在

音乐方面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我清楚这一点。我父亲也清楚这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我，让我上他的节目。但这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我总是作为他的儿子登场。到了某个时候，大概是三十出头吧，我对过往的人生做了一番总结，问自己我究竟拥有什么，我是由什么构成的，而我唯一想起的就是我患有糖尿病。这种病只属于我一个人，我没有和任何人分享过它。我指的是没有和家里的任何人。然后我便贪婪地扑到这个主题上，开始著书（烹调书之类的）和做报告。

十一年前我认识了我妻子。她是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表演，或者在照相机前为《花花公子》杂志脱衣，或者让《图片中的女人》以及所有叫不上名字的报刊记者记录我们不同的旅行，尽管你每时每刻都不是一个人在旅行。所有这些我父亲也会，虽然这在当时的五六十年代、即使到了七十年代都远不像现在这么疯狂。因此她填补了我不会的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原本可以认为现在一切都回归正常了，我指的是我的性欲，和她在一起我应该能够找回性欲才对，她主动、外向、好自我表现，而我则消极、内向、拘谨。但是然后就出现了我患肠脱垂这件事，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人们当然也无法做到真正理解，此外如果人们得了这样的病，其原因往往不止一种。再加上错误治疗（它让整个事情无限期拖延下去）和众多后续手术，对此我真的无能为力。

我父亲当时情况很糟糕。我父母移居到了新西兰，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他们一直还保留着位于布兰克内泽城区的这栋房子，这也是他单方面针对不懂得赏识自己真正明星的德国低能文化的一种抗议形式。那些人也理解不了，某人是会改变自己的，不想为4711香水做一辈子广告。接着我和父亲一道为德国电视二台拍摄了关于新西兰的影片。我们俩都学过驾驶飞机，我禁不住想到了格日梅克的儿子米夏埃尔，他也跟他的父亲共事合作了一辈子，和他拍摄了关于塞伦盖蒂的影片，为此也学过驾驶飞机，然后年仅二十五岁他就在坦桑尼亚失事坠毁了。飞机的机翼擦碰到一只秃鹫，因而飞机坠落了。这确实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他和父亲为致力于动物保护做了那么多努力。他的死让他出了名，人们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德国的一些学校。作为一

位著名父亲的儿子，你很快死去或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这样你还能获得自己的荣誉，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我已经五十三岁了，这个年龄虽说不是特别大，但无论如何对于一名年轻的悲情英雄来说是太大了，我其实就曾是这样的悲情英雄。因为所有的人都具有一些悲情色彩，只要他们无法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

在死亡当晚我还参加了一个专家论坛，地点是在库姆巴赫，论坛的内容涉及传媒和我父亲，也涉及我和我的糖尿病。就在我死前几个小时，我还说了这些话语：如果我开始毫无意义地信口乱说、面色苍白或者突然发汗，这时人们问我，你需要糖吗？而我则说：不，不，我不要紧，那么这就已经是神经阻滞的先兆了，那样的话你就不再有能力说“救命”了。这其实是对我人生的一个美好总结，因为尽管受尽了磨难我或许也无法说出“救命”的话。然后我还和众人一道去了一家餐馆，之后乘出租车朝宾馆驶去，那个时候已经是夜里1点了。出于某种原因我总是专注于9月11日这个日期，因为我觉得将来在这一天我会出事，但是幸运的是今年的9月11号我已经挺过来了。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变得有点儿漫不经心了。专注于这样一个日期，然后臆想在这一天可能会发生些什么，这当然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是我父亲的确是在某年的9月11号死亡的，这一点我是经历不到了。否则我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日期涉及的根本不是我，而是他。其实我也应该自己想到这一点，因为这对我的生命来说如此典型。不管怎样我在十月份的这天夜里，在库姆巴赫参加完专家论坛之后，不知怎的突然失去了导向。下了出租车我没有走几米进入宾馆，而是从宾馆旁边经过步入夜色。当我掏出手机想给我妻子打电话时，手机从我手里掉落，在黑暗中我无法再找到它。然后我就干脆一直往前走。流经库姆巴赫的是米尔溪流，不知怎的我在河岸加固不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滑倒了，紧接着掉入河中。河水在这个季节已经相当凉了。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冷。因为它的质地也很柔软，我指的是河水。我当然想再回到岸边。但我肯定是在黑暗中走错了方向。然后我又被绊了一下，然后我就在河水中溺亡了。

询问空位这个话题

我觉得您不仅是对我，而且对所有其他人，但是首先是对您自己在恣意说谎。所有这些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您指的是什么？

嗨，就是所有关于青春期和被扰乱的性欲的那些感人故事。其中一则故事里的主人公发现他的父亲被卡在管风琴上，由此他患了一种耳鸣，必须用电击的方式来杀害别人。另一则故事里的主人公必须躲在一只用厚纸板制成的瓦尔迪猎犬后面，紧接着患了肠脱垂和糖尿病，让几名阿拉伯人对自己施暴，因为他的人生过得并不如意。

缅甸。

什么？

因为您刚才说到了阿拉伯人，在此期间您可能是联想起了“9·11”事件。缅甸不是阿拉伯国家。

是的，归根结底就是9月11号这个日期，它在这里也被纠缠不休地滥用了。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抹去痕迹，转移人们对自己的注意力。

这些事情不早都已经过了法定时效期吗？

谋杀没有时效期。

谋杀？您能不能说得具体点儿。

到底是谁投掷了燃烧瓶并对警官造成了致命伤害呢？

反正不是我，如果您这么认为的话。

是的，您总这么说。当然您无法颠倒是非，自己也只是个可怜虫而已，在谈恋爱方面处处碰壁，因此去埃布拉进了监狱，为了在那里能够真正发作。但是这可能也没有奏效，毕竟人们不会这么快就卸掉拘谨的枷锁。

我没有去埃布拉，而是在疗养院里。或者也可能是在天主教寄宿学校里，这些情况我脑子已经记不清楚了。

没错，您的记忆力总是很差。当时您应该也不会在赫尔普。那个阿希姆·希尔施贝格尔肯定把8点之后在电视里播出的所有影片都讲给你听了。难怪你有那么多荒诞不经的想象。

我觉得我总在围绕同一个问题思考吧？

是的，总是只围绕自己。就是变换着花样而已。我表现出如此极度的忍耐，您应该对此感到幸运才是。在这里我也可以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是吗？隔离囚禁？禁止外出？

这会正合您意，这样您能更容易把自己刻画成殉难者。不，我不会帮您这个忙的。

那要怎么做？

我只需在这里让您的女士们列队而来就行了。

我的女士们？

嗯，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对双方来说都将是很不愉快的。

可我不明白？

好吧，您听好了，我相信您非常清楚我是什么意思。像您这样非常拘谨的类型，总归就像左翼人士以及所有标榜伟大解放的人那样，他们

都是非常拘谨的人。如果我们大家都简单了解一下您的性生活，这肯定将是极其有趣的事情。

您这么认为？

我是这么认为的。那样您很快就会供认，比您想象的要更快。

随便您怎么认为吧。

当然我就这么认为。我现在就能生动地想象这一切：一方面是幻想被强暴和捆绑，紧接着又会感到悲痛绝望和无力勃起。这一切那些可怜的女人们一定也参与做过。

您在说谁呢？是格尔妮卡？

也包括她。

我不知道您还想把谁牵扯进来.....

不牵扯任何人，如果您不希望的话。这完全取决于您。

我不知道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重要启示。

为了不至于使您理解错误。例如当时在阿尔斯特之家百货公司里的情形，当您的女朋友想给您买一件套头毛衫的时候？天哪，这是多么富有戏剧性啊。没有任何原因。

是的，这让我也很难堪，但是我当时如此.....

是的，您总是这样.....这也使得这种事情不可能在您身上发生，因为这种情况，据说您不是这种类型，只发生在您的想象当中。您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

这难道不是叫平行社会吗？

您在此最想建立的就是这样的平行社会，而不是把您的精力投入到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中去。那样也就很容易找到解决您其他问题的答案。

一个解决方案？为我的私人问题？

当然了。毕竟人们不能把社会问题和私人问题彼此割裂开来，如果我可以引用您的话来说。

您怎样想象这种情况呢？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她给我买衬衣以及所有的一切，回家后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放在新铺好的夫妇用双人床上？就像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习惯做的那样。我不清楚自己所穿衣物的大小尺码，因为所有这些很久以来都是她来解决的。但是幸亏今天这种情况不再有了。我们不再希望再有的恰恰也正是这个。

是不再有了还是我们不想再有了？

两者都是。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整个恐怖活动？

那可不是因为这个。

那其实也是一场相当无用的行动，因为这样的事情今天很有可能还继续存在。您只需审视正确的方向，不要总是给自己选择不合适的女人。克劳迪娅也已经断定了这一点，您自己肯定也是。

克劳迪娅？

我相信，她对您的了解比我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还要更多。

了解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知道有人给我买衬衣？既然已经谈到了精神错乱，那么这是我多年来所听到的最不合情理的事情。

您一向也生活得很好。您瞧，您索性匆忙否定掉数百年来久经考验的事情。人们在此期间又重新意识到这一点。问题很简单就在于，您无

法用一种可信的替代方案来占据由您创造的空位。拒绝，这谁都会。

您能用一种可信的替代方案来填补这一空位？

当然了。就像也能填补您人生中众多的其他空位一样。

不一样的青春期3：埃坦·龙德科恩

伊利沙害了三种疾病：害第一种病是因为他唆使熊去攻击小孩，害第二种病是因为他用双手推开了基哈西，最后害了第三种病并要了他的命，因为有记载说：伊利沙患了那种疾病，最终也死于那种疾病。本章注释皆为作者原注。

世界就像一座倒塌中的桥梁。

“看呀，天主将会带着火种前来，他的车就像是一场暴风雨。”《以赛亚书》66：15。

阿巴胡拉比说：“比死者的复活更了不起的是下雨天；因为复活仅仅为义人，而雨水则一视同仁地落到义人和罪人身上。”

阿基巴拉比说：“如果你来到纯粹的大理石板这个地方，请不要说：水，水！因为大理石板上写着：说谎的人不应在我眼皮底下停留。”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但是大海永远也不会满盈。

在为耶路撒冷城制定的十条“特殊规章”里，就包括不允许设立垃圾场的禁令。

亚伯拉罕在宁录国王面前提供了在修辞方面无法超越的“销售会谈”的典范。当国王说：“因为你们不崇拜偶像，所以你们应该朝拜火。”亚伯拉罕回答道：“我们更应该朝拜水，因为它熄灭了火。”当宁录同意（因为亚伯拉罕好像也赞同他的观点）给予犹太人崇拜水的特权时，亚伯拉罕说道，朝拜云更有意义，因为是它们带来了水。在他的这一观点得到认可之后，他又指向了风，是风把云驱散开来，等等等等，直到他触及原本的目的即造物主本人，而他的解释总是得到宁录的赞同。

伊利沙^①大街离曼哈顿下城的布鲁克林大桥^②不远，我叔叔就在那里的一块闲置的地皮上经营他的二手车交易^③，过去几天的降雨^④给伊利沙大街上的房屋挂上了深褐色的斑点。虽然在此期间天空^⑤又被漆成了蓝色，木片瓦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但有时从他

销售用临时木板房上凑合着涂了沥青的接缝处和雨水槽的生锈处，还会有一股细细的水流^⑧淌下，溅到停靠车辆的车顶上。有时在我玩完回家的路上，我特意借道穿过他的销售场地和后面的垃圾场^⑨，那是一片像丘陵一样起伏的场地，每个人都把他的垃圾扔在这里，尽管这样做是被禁止的。如果我来得早并且恰好他不是很忙，我叔叔有时就把我牵扯进一种虚构的销售会谈^⑩中去，当我表现得完全不感兴趣并且听不进任何论据时，这样的会谈就会最令他感到开心。如果我来晚了，挂有小旗的那根红色的绳索已经在门柱之间被撑开，门旁窗前带有窄条纹的“侯爵夫人”窗帘在写字台灯的黄色灯影下闪着微光，这时他就会从他正在算账的铁皮屋里向我喊一个口信，让我在回家的时候把它捎给他的姐姐。经常这样的消息不外乎是“告诉她我马上就来”或者“给我留一些牛腿肉”。

三种东西能够使人重新恢复知觉，它们是：声音（呼唤）、目光和气味。

在十一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却透过窗户看不到他。我敲了敲门，但是他没有回应。在我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之后，我看到他从椅子上半滑到写字桌下面，衣领撕裂，满脸通红，拼命喘气。我开始害怕起来。他的右手使劲抓着一个空的管状小药盒。我把空药盒从他的手指里拧出来，立即向洗衣店旁边的那家药店跑去，去年夏天我的另一位姨姨就在洗衣店里做过临时工。药剂师认识我们，在人们喊他之后他立即就从后屋里跑了出来，为了陪我前去查看叔叔的情况。幸运的是我们到得还挺及时。药剂师抬起我叔叔的头部，在他的鼻子底下搓碎一些嗅盐，然后呼唤他的名字^⑪。在我叔叔逐渐恢复知觉并睁开眼睛的时候，药剂师给了他一些喝的，接着让他服下两片药。慢慢地扎伊迪赫又能正常呼吸了。药剂师把窗户打开。

法师说：“我愿意忍受任何疾病，只有肠病除外；愿意忍受各种绞痛，只有心绞痛除外；愿意忍受任何疼痛，只有头痛除外；愿意忍受各种邪恶，只有恶毒的女人除外。”

“我对你也包括你姐姐已经说了多少遍了：这些药品的药力简直太强了，不能像你这样不规律地服用它们。为了能够有规律地跳动，心脏^⑩也需要定期定量服药，”他对我叔叔说道，“为什么你就不能养成早晨在吃早饭、在晚上用晚餐时服药的习惯呢？莎拉可以给你把药溶解在茶里，这一点儿也不碍事。”我叔叔打手势表示拒绝。

神医，魔法师。

“啊，拜赛姆^⑪，难道你认为我在这儿是为了开玩笑才这么做的吗？”然后他看了看我，笑着说道，“但是从现在开始伯伊特西克尔将会总让我回想起这件事，不是吗？”他用滚烫和虚弱的手拂过我的脸面。

数字“4”代表着完美。例如四字神名就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四根手指是人的象征，它们面对的是类似于天主的大拇指，只有与大拇指一道它们才能从事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的大师这样教导：“世上有四个极其漂亮的女人，她们是莎拉、喇合、亚比该和以斯帖。但是谁要是说：以斯帖是稍带绿色的，他实际上是忽略了以斯帖，相反让法施提取而代之。”

我们的大师这样教导：喇合用她的名字诱惑别人。

我们四个人^⑫住在隔几条街远的一处面积不大的住房里；我，我叔叔赛特，我姨姨莎拉^⑬和另一位姨姨喇合^⑭。其实我叔叔赛特和我姨姨莎拉是我祖母的兄弟姊妹，也就是说是我的姨婆和叔祖，而姨姨喇合是年龄比他们小得多的我母亲的表妹，也就是说是我真正的姨姨，因此我也管莎拉姨姨叫布贝赫，管赛特叔叔叫扎伊迪赫，因为他们对我就像是祖父母一样。相反，穆里赫·喇合是完全不一样的。

“普里门尼克，小家伙，你能给我送一杯茶来吗？”她习惯于下午对我这么喊，当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虽然我有很多姨姨、姨婆和表姐妹，但对我来说她还是来自另一奇特的世界。我非常惊奇地注视着她高挑而又妩媚的身姿，看她总是抬起头直视前方，从她的房间里沿着狭长的过道走来，为了坐到厨房里和我们共同用餐。有时候我在想，她不可能属于我们的家庭成员，而是或许作为外人被接纳，只是我不知道这件事而已。

这是上帝创造万物的第四天，在这一天天体被创造，白昼与黑夜得到了区分。

《犹太圣经注释》里提到六处服务于人的身体部位。其中三处即眼睛、耳朵和鼻子不受人的意识所控制，但是另外三处即嘴巴、手和腿却可能受意识的操控。因此埃坦的行为还算不上是犯法，他用眼睛感知他姨姨的乳房，但却必须控制住自己的双手。在这种情况下手增强了他用眼睛感受到的刺激。

每周一次，是在星期三^①，当她只上半天班时，她要专门抽出时间洗衣服，这样她就会定期把一个晾衣架放在她房间门口的过道上，因为她的房间太小没有地方。然后在我放学后悄悄地从晾衣架旁边溜过时，我就能够感觉一下她那些白色上衣的面料，感受略微潮湿的面料是怎样从我手上滑过的。每次她挂在那里的都仅仅是那些白色的上衣，有时或许会晾几双长筒袜或者一件裙子。但我从未在那儿见到过胸罩。当她晚上拥抱我并道“晚安”时，我尝试感觉扎入我上臂的是否是用鲸须制成的弹性条状物，并用搭在她肩上的手^②在她的后背小心翼翼地摸索背带必定相交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我的双手在颤抖。我嘴唇干涩，看着她沿过道走回到自己的房间。毫无疑问，喇合姨姨在我们悠久和分支众多的家族史上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我们宗族再无其他女性成员拥有类似丰满浑圆的乳房；即便有也是被按压在紧身胸衣后面，藏在围裙下面，而不是在几乎透明的上衣面料里绽放。

“我是墙，我的双乳像其上的楼。”《雅歌》8, 10。

“普里门尼克，普里门尼克！”单单是这种呼喊就足以使我心醉神迷。我跑进厨房，倒了一杯茶，把茶杯放到一个托碟上，小心翼翼地从来没有门的厨房上三个台阶进入过道，然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朝她的房间走去。我看到了那个晾衣架，上面挂着她那些白色的上衣。她房间的门只是虚掩着。背对着我，胸脯上^③松散地围着一条毛巾，她将坐在那里给自己梳理长发。她会朝我转过身来，在稍不留神的那一刻让毛巾滑落下来。她会一边微笑着一边弯下身子去捡毛巾，她丰满的乳房将会屈服于重力，在她弯腰时也会跟着下垂，从而变得更加丰满和

柔软：轻柔的波涛，由又白又嫩的皮肤构成的涌流。我颤抖起来，不慎把茶泼了出来。

“普里门尼克，普里门尼克！”我很快跑回厨房，用洗碗布把托碟拭干。那样的一条毛巾有多小啊，我心里在想。即便她把毛巾夹在胳膊底下，它也不可能遮住她的胸部，它不可能足以覆盖她的全部胸围。恰恰相反：就像正常毛巾该有的尺寸那样，那条狭窄的毛巾将会把她浑圆的双峰向上挤压，让一道山谷出现在两座丘陵之间，那是一道裂缝、一条沟槽、一处深渊。喇合姨姨丝毫没有理由在我、一个小男孩面前掩饰自己。她将坐在那儿抿她的茶喝，在她浓重的气息中，有时我会恍惚觉得看出她那白色底面上褐色的乳头，当然是模模糊糊的，只是隐约看见，只看到那么一丁点儿。一道华美的影子映在白色的雪地上。雪是那样的白，在纽约人们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白雪，白色松软的雪花，贯穿我一生的白雪，因为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那一天我在十一岁时第一次过主显节。

预言家，和罗伊赫一样都是《塔纳赫》里对一位先知的常用名称。只不过扎伊迪赫向他的侄子隐瞒了，患有特定眼疾的男人是不允许在犹太教会堂里供职的，就跟具有相同缺陷的动物也不适合用作牲畜献祭品一样。人们列举了三种疾病，即吉本症：缺少双眉或者一道眼眉，或者眉毛盖住了眼睛。达丘症：角膜浑浊。泰巴鲁症：白色跨越了深色边缘，最终过渡为黑色。

证明在犹太教法典里出现过眼镜或者类似眼镜的器具，所有这方面的尝试都被认为是失败的。Ispaqarja是用一只碗做成的，因此它可能只是一个凹面镜。借助Schephapheret加姆利法师能够看两千码远，但它是一个望远镜。Okselith也是一个无法被精确辨认的外来词，虽然它曾被翻译为“眼镜”，但之后也被翻译成“眼罩”甚至“畜栏”。

当时在我面前显现的不是上帝，因为我不相信上帝会在同一个人极其短暂的人生中两次出现在他面前。但尽管如此那还是一次真正的主显节，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那个时候我配了一副眼镜，每天早晨都要把摇晃不稳的镜架戴在鼻梁上，很快它就成了考验我温厚和耐心的试金石。每天上午在去上学的路上以及每天下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我都被别人嘲笑、辱骂和踢打。扎伊迪赫·赛特尝试安慰我。他把我称作霍扎赫^②，说拥有四只眼睛^③是一些非常奇特的现象。我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见的东西。先知们也曾经都是预见者，一开始人们也经常讥讽和愚弄他们。但最终有道理的还是他们，而那些无信仰者则因为他们的愚蠢坠入永恒的堕落。扎伊迪赫给我讲述传奇和故事，向我报道耶利米和丹尼尔的情况，但是当我独自一人翻开带插图的《塔纳赫》历史读本时，我从未见到过戴眼镜的先知，而只看到留着长发和飘垂胡须的老男人，他们把目光投向远方。我问我叔叔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认为这些图片并不一定与事实相符。他对我解释说，先知的图片都产生于一种感觉，因为当时还没有真正的图片。每一幅图都是正确的，如果它是由一名信徒所画的话。“这样看来以赛亚也可能是戴着一副眼镜？”我问道。“当然了。”^④他微笑着说，跟以往一样抚摸了一下我的头。

《哈格篇》16a按相同比例把人比作天使和动物。在人的六种能力当中，有三种（理解、直立行走、操用神圣的语言）是人与天使共享的，另外三种能力（饮食、繁衍、排粪）是人与动物共享的。在《创世记·拉巴》8:11里又补充了两种能力，即人与动物分享的死亡能力以及人与天使分享的预见能力。

人们普遍宣称这一点，这一说法也由《圣经》中的不同地方得到了印证，在那些章节里上帝自己也指出，任何生者都不允许看到他的脸面（《出埃及记》33:20）。但是在《出埃及记》33:11里是这么说的：“耶和華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24:9里也记载说，摩西和亚伦率以色列七十长老登上西奈山，见到了上帝并且未受到惩罚（“他没有朝着以色列的贵人伸出手去。”）。只不过他们好像只感知到了上帝双脚周边的区域，因为只有这一区域得到了描述：“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人们一方面可以把这种情况解读为，上帝站在天上，他们从下面只能看到他的双脚，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转移话题的描述，为了不谈及上帝的面孔，但同时他们也确实看到了他的脸。

犹太人不允许人们给上帝画像，这不是因为上帝的光辉形象无法以艺术的形式加以描述，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雕塑限制对上帝的信仰，一种并非无关紧要的解释尝试是，这一禁令仅仅是为了隐瞒上帝

的一个缺陷。如果人们回忆一下在先前的注释里所提到的那些矛盾之处，那么这种对隐瞒缺陷的怀疑是不能完全被否定的。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不停地重新审视我读本里的插图。最后我从书包里取出彩笔，给第一名先知戴上了一副眼镜。我恐怕自己亵渎神灵，因为我担心，我的信仰不足以让自己画出真实的先知图片。因此在我用一支土黄色的彩笔在先知以西结的眼睛上画了第一副眼镜之后，我很快把目光移向旁侧，害怕读本会因为我不可饶恕的行为而化为尘土。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相反一种嗡嗡声在房间里萦回。那是一种只有我姨姨塞满白色上衣的电动双把洗衣木桶才会发出的嗡嗡声，但是强度要大得多。我把这种声响解读为是一种赞同，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忙于给一位接一位先知画上眼镜。据说上帝是根据与他相似者的模样创造了我^②，但是他自己从不露面，也不允许被展示给众人。在摩西看来上帝是以燃烧的荆棘丛形式出现，先知以利亚把他看作是轻拂的微风，对我来说上帝就是独一无二的嗡嗡声。看到他的人必须死亡，还没有人真正面对面地看见过上帝^③。但是或许这一切根本就不对，人们之所以不许描绘上帝，可能是因为他的长相根本就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美好，因为就连他自己可能也有一些人们能够视为缺陷的东西，因为可能他自己甚至也戴着一副眼镜^④。不，这不可能，上帝没有缺陷，此外他无所不知，能够看到和听到一切。可是在我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当晚又把所有的插图慢慢翻阅了几遍之后，过去几天赋予我的那种慰藉效果却很快消散了。我让我的榜样们向我看齐，光这样做是不够的，我自己必须向他们看齐。于是我决定自己也做出一些预言。

“希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以赛亚书》38:2。

“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出埃及记》4:1。

“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出埃及记》4:6。

“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诗篇》56:8。

“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利未记》24:14。

透过蒸气埃坦第一次把他的姨姨感受为是女人，这就跟摩西经历到神是在一片云里出现的一样。

在我做出上述重大决定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比平时早起了半个小时。我穿好衣服，把自己编辑的先知故事本塞进书包，没有吃一点儿东西也没喝一口水，就朝学校方向走去。我肯定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幅哭墙的画面，因为在到达学校教学楼之后，我把脸贴在入口大门旁边的墙上^②。我摘掉眼镜。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不知道应该预言些什么，但是决定一经做出，我就不再有退路了。那天早晨天气很冷，我的手冻得直疼，因为我一时紧张把手套忘在了家里。我用伸出的手臂把眼镜举到高处，仿佛它应当替我预见什么。冻得非常结实的墙面石块凉爽宜人地顶在我滚烫的前额上。我在等着话语自己从嘴里说出来，但是我的嘴巴就像干涸了一样。上下嘴唇紧紧地粘在一起。我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在更小的时候和一个朋友在玩耍时想出的语言小声嘟囔了些什么。或许从这种喃喃自语中会产生出有意义的话语，如若不行，那么我理解不了的东西或许对其他人来说是能够被理解的。我听到身后有校车停车的声音。其他学生越走越近，他们一边大声交谈一边哈哈大笑。我的呼吸停滞了^③。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的声音开始嘶哑、变尖，最后汇成一种哭诉的腔调。我的几名同班同学停下来故意做作地模仿我。我几乎要流出眼泪了。第一个雪球击中了我的后脑勺。然后帽子被从头上打掉了。我一直还伸展的手臂被弯了下来，眼镜也被从手里夺走了。人们把雪涂擦在我身上。因为我不想停止哼唱，他们就剪断我的鞋带，把我的衬衣从裤子里拽了出来。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的眼镜找不到了，我的眼睛被雪^④晃得直流眼泪^⑤。我尝试站起身来，但是越来越多的雪球砸中了我。最后我就像是被用石块砸死^⑥一样栽倒在地。鲜血从我的鼻子里流了出来，淌在冻得硬邦邦的地面上。当我低着头跪在那里浑身发抖时，我明白了不是因为我是先知才被嘲笑的，而是因为我尝试成为先知，因为人们在嘲讽我。我明白了是自己亵渎了神灵，我正想伸展四肢躺在雪地上，为了让自己冻死而殉难，这时一缕阳光冲破了上午的炭黑和烟雾，反射在我被打碎的眼镜上。于是我拾起眼镜，捡起被撕坏的

围巾和被踩得脏兮兮的书包，就这样回家了。那天上午只有喇合姨姨在家，她把我拥在怀里，脱去我的衣服给我洗澡。在浓密的水蒸气^②和甘菊气味之间，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的乳房。

从这一天开始我的生活被改变了。我不再感知别人的嘲讽。我轻松地漫步穿过我们学校的过道，因为我听到喇合姨姨在召唤我，几乎等不及临近傍晚再给她送一杯茶去。在我们之间很快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惯例，也就是说在我给她把茶送到房间之后，我可以坐在她身旁多待一会儿，看她是怎样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喝完茶的。这些特殊的日子也包括那样的时光，在那些下午里她的上衣就像升起的旗帜在门口过道的晾衣架上随风飘扬。今天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撒母耳记下》14:14。

“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记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诗篇》31:12。

起初我生气自己不慎把茶泼了出来^③，这样我不得不跑回厨房，用壶里的茶水把茶杯重新加满，但接着我意识到，这种拖延是怎样使我的内心变得更加激动的。我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气。我必须集中心思。当我想用手绢把镜片擦干净时，茶杯从我手里滑落，掉在地上摔碎了^④。我很快把碎片扫进簸箕，很高兴还能在矮长的餐具柜上发现第二个杯子，因为我很难够着吊橱，然后我往这个杯子里注满茶水，再一次离开厨房，这一次步伐缓慢、小心翼翼。

在此人们回想起关于所罗门王为约柜修建圣殿的描述。“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列王纪上》6:18。同时对挂有上衣的晾衣架的不断强调，又能被解读为是列维纳斯哲学意义上讲的迹象。为了规避绘画禁令，人们用带翅膀的宝座来描绘上帝，同样挂在晾衣架上的上衣也象征着喇合姨姨。埃坦对他的姨姨并没有概念，他没有凭空想象她的形象，而是依循没有画面的迹象，希望以此到达神圣的境地，最终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和预期的可能不大一样。宝座指向的正是上帝在创世时不在场的

情况下所留下的空位，这就跟埃坦姨姨的上衣指向的是她的身体所留下的空位一样。埃坦在这种迹象里游移，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动机是未加伪装和“纯粹”的，只是随着一种图像的不断确定和形成才被腐蚀的。鉴于这种意图按照犹太人的法律理解来看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他就能被看作是清白无辜的，因为他作为不成熟的少年又额外缺乏这种经验，即出于最美好的愿望而选择的道路有可能会成为歧途。

“普里门尼克，普里门尼克！”我姨姨的声音朝我迎面而来。过道在半明半暗中显得有些庄严，白色的上衣像彩带一样装饰着她的屋门。这一次一点儿茶都没有泼出来。我打开房门进到屋里。喇合姨姨站在镜子前面。她的上衣一直敞开到快要看到乳房的地方。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知道那一刻终于在今天来到了：她将让我参与分享她整个外形的华美。我把茶杯放到桌子上。现在还什么也看不到，上衣的绷紧程度被控制得恰到好处，以至于半敞开的纽扣边框就像是自行把自己束紧一样。但是一旦她开始走动，那么至少这道缝隙也会开裂，上衣纽扣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她朝我转过身来。

“喂，你今天让我久等了。”她微笑着说。我也吃力地朝她微笑。“我真是渴得要命。”她端起茶杯，不像平时那样小口地抿着喝，而是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茶水。“真解渴。”她用手背擦了下嘴唇。然后她坐到镜子前面，为了梳头或者也可能是为了再解开一个上衣扣子。因为紧张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屏住呼吸，当她的双手真的慢慢向纽扣边框移动、当她用隆起的双手抚摸自己胸脯的时候。但是在她的面容扭曲地朝我转过身来时，我才从自己的梦境里清醒过来，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她想说什么，但却发不出声音。一种战栗流遍她的全身。她的眼睛瞪得溜圆。她的头部通红。她的前额渗出了汗水。她从凳子上滑落，当着我的面瘫软在地上。我下意识地退了一步。然后我朝她弯下身子，摇动她的肩膀和脑袋。

“穆米赫，穆米赫！”我大声喊道，但是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她断气了。她的死是为了使我免于犯罪，是为了拯救我的清白。我不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最后我跑出房间，跑出住房，冲下楼梯，奔到临街房屋里去找布比赫·莎拉的一位熟人。

晚上在邻居们和医生走了之后，一种可怕的寂静在房子里蔓延开来。晾衣架被从过道里清走了，喇合姨姨的房门也被锁上了。我坐在通往过道的台阶上，听布比赫·莎拉和扎伊迪赫·赛特两个人在小声交谈。

我应该遭到诅咒。

“A broch tsu mir, ”^②赛特叔叔说道，“所有这些……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愿她在和平中安息。

“Oleho hasholem^③。谁把你装有药品的杯子放到那里的？”莎拉姨姨问道。

我真伤心啊！

“履行这些戒律会创造生命，忽视这些戒律则会招致死亡。”于是年迈的拉比阿基巴拒绝在狱中进食，因为他无法在饭前清洗双手。

《塔纳赫》里提到了两类伪先知，一类是那些呼吁人们进行偶像崇拜的先知，另一类是那些先知，他们声称以以色列神的名义来行事，但却提出错误的命题，宣扬异教邪说。埃坦属于后者（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因为他自认为是被上帝选中的，可他并不遵守戒律。

“因为我平时总忘记那个杯子。”赛特叔叔摇着头说，“A klog iz mir!”^④为了我自己的侄女我必须吟诵珈底什（犹太教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因为温良他们丝毫没有预料到我们的罪孽，丝毫没有想到喇合姨姨是为我而牺牲的。一种极度的悲伤侵袭了我。我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普里门尼克，普里门尼克！”的呼唤声了，再也看不到她的晾衣架了。我的脖子抽搐了起来。为什么我让事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必须有另一个人为我牺牲^⑤？我难道一直还是那人们出于正当理由要把他打倒在地、用乱石砸死的伪先知^⑥吗？慢慢地我站起身来走进厨房。莎拉姨姨的眼睛都哭肿了。

以下场景按照犹太人的礼俗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进入死亡状态直到安葬，逝者就不再被单独放置。尸体也不是衣物完好地被放在床

上，而是裹在一块亚麻布里被安放在地上。对于文中错误的描述归根结底只有两种可能性解释：或者埃坦想再次、这一次好像是间接把自己揭露为谎言家和伪先知；或者这一段叙述是由一名非犹太人撰写的，他不熟悉犹太人的惯例，根据自己基督教的经验财富设计了这一情节。

“布比赫。”我轻声说。莎拉姨姨用失神的目光看着我。“布比赫，”我清了清嗓子，“我能最后一次，我能跟穆米赫·喇合道个别吗？”莎拉姨姨点了点头，把脸又埋进手里。赛特叔叔用沉重的手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去吧，伽迪谢尔，去吧。”他说道。我慢慢地转过身去，登上那三个台阶^②。我拖着更加缓慢的脚步吧嗒吧嗒地向过道后面喇合姨姨的房间走去，我在心里发誓这是我最后一次踏进她的房间。

“恶”是人做坏事的倾向，“善”是他做好事的能力。然而米德拉什很清楚，人的性冲动不仅是值得诅咒的，而且也是生活必需的。经书上就能读到这样的话：“如果不存在恶，没有男人会娶妻、盖房子和养育孩子。”

有记载说：“如果恶人想要说服你：犯罪吧，上帝将会宽恕你的，那你不要相信他。”（《哈格篇》16a）但是埃坦在这里运用的是另一种辩解逻辑：因为他反正已经犯了罪，反正已经遭到了诅咒，因此他也可以继续造孽。这是一种合理化形式，它经常出现在惯犯身上，他们使已犯下的罪行成为继续犯法的基础。

亚伯拉罕在十三岁那年反对偶像崇拜，雅各布在十三岁那年决定毕生研究《妥拉》。只有从十三岁开始人的“善”才能够完全显露出来，因此犹太人的成人礼是在男孩过十三岁生日时庆祝的。因为埃坦还未满十三岁，而是只有十二岁，根据犹太法律他还没有能力遵守所有的戒律。他臆想的对自己犯罪的认识产生于对自己性欲的觉醒和认识。两者彼此相连，因为它们只能由人们在成长过程中隐约意识到。恰恰是出于这一原因，埃坦绝不可能依据他的年龄对自己的行为道歉。如果他以年龄为依据，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就会因此而有罪了。但正因为他感觉自己有罪，人们必须把他看作是清白无辜的。

可惜太晚了。大声喊叫或者发出警报在旨在反抗罪孽的犹太教宗法传统里意义重大。有很多这方面的讲述，在这些叙述里比如一位拉比被

独立安置在一个房间里用餐，突然他大声喊道：“一个贼，一个贼！”只是为了告知那些急匆匆赶来的人，他感到有这样的需求，即想要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例如人们报道了暗兰拉比的情况，他在夜里起床，在没有人帮忙的情况下独自把一根梯子（“十个男人也无法举起它”）靠在房屋最顶层，妇女们就是作为客人被安顿在那里的，然后他顺着梯子往上爬，爬到一半时大声喊道：“暗兰拉比的房子着火了！”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犯罪意图，我使善良战胜了邪恶。为了避免犯罪，我必须把自己视为另一个人，像对待他人一样对待自己。为了能够再度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放下所有的虚荣，放弃任何双重道德。我公开自己的犯罪意图是为了不犯下罪行，但同时我也会有意识地忍受别人现在把我看成是罪人，尽管我恰恰没有犯罪。

如果人们从上帝的格言出发，即“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出埃及记》33:20），那么看到上帝和自身的死亡同时发生只能是合乎逻辑的结论了，甚至死亡必须先于看到上帝而发生。鉴于这种“看到上帝”主要是指看到上帝的面容，所以这种启示还是能够发生的，如果有一些可以使观察者把注意力从上帝的面面上移走的东西存在，文中这种情况是通过解开上衣纽扣而发生的。是上帝解开了上衣（总归美语原文在使用“恤衫”这个概念时会产生更大的矛盾心理），为了让垂死之人看到他的胸脯，以此转移他对招致死亡的面容的注意力，这种假设会显得有些凡俗。更可信的假设是，对于埃坦来说解开上衣的动作就昭示着他被上帝所接受，他徒劳地尝试从受自己性欲决定的行为中获得，甚至迫使自己得到这种感觉。绘画禁令针对的也是上帝片面和僵硬的规定，这种规定与人的施为活动相对立。

就跟在阅读《妥拉》时四字神名不允许被说出来一样，独一神也不能直接被赋予属性或者被描述。相反人们使用一种表达方式，它应该通过隐喻和类比，向人们介绍上帝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上帝不是什么。如果说在父权结构社会（《塔纳赫》经卷就产生于这样的社会）毫无疑问占主导地位的是男性隐喻，如父亲隐喻、武士隐喻或者雄狮隐喻，那么同期归属女性的特征描述也出现了，如正在生育、正给孩子哺乳或者正在抱怨的女性形象。类似于独一神的住处，锡安的女儿也时而被看作是寡妇、母亲、新娘或者女王，时而被视为是妓女、女通奸者或者女叛徒。尤其是先知以赛亚交替使用涉及造物主的男性和女性隐喻，并在文中辟出一处把它们汇聚在一起，在这里上帝对他创

造的万物言说，他时而把自己描述成生身父亲，紧接着又把自己描述为分娩者（45:10）。这样看来把上帝想象成女人的思想绝对不能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与经卷相悖的，埃坦的这种想象并非源于他对《妥拉》的研究或者对《塔纳赫》的阅读，而是他真正感受到并将之作为上帝的启示经历到了这一点。

我的心又怦怦直跳，当我打开门走进屋里^②的时候。我知道，喇合姨把房间钥匙挂在镜子后面的一个钩子上。我在黑暗中摸索到钥匙，从里面把门锁上。窗帘被拉上了。喇合姨姨面容安详地躺在新铺的床上，胳膊并排放放在身体旁边。我从镜子前面取来她一直坐的那个小凳，把它放在床边，接着打开床头灯。她看上去很漂亮。她的头发刚被梳过。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不得不把头转过去一会儿。然后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她上衣的原貌没有任何改变。最上面的几个纽扣一直还是解开的，但是纽扣边框已经合上了。那种永远失去了她的感觉再次卡住了我的喉咙。我再也不能看到她、听到她或者拥抱她了。我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我的罪孽^③，从现在开始我要独自和无助地遭受世人的残暴了。不会再有人安慰我了。我所面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必死的和痛苦的。然后我看到，那颗关键性的纽扣在她跌倒时肯定是半穿过了扣眼，现在它被绊在扣眼上。我稍微闭了下眼睛，以至于一切都只能隐隐约约地被觉察出。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我只想看看到底能否用手够到那颗纽扣。结果我真的能够用指尖触到那颗纽扣。我把手抽了回来，闭上双眼，再次伸出手去，这一次没有用眼睛去看。我食指的指尖又一次触摸到那颗横斜的纽扣。我轻轻按压了一下它。纽扣在我的手指下面向上竖起。我加大按压的力量，纽扣继续沿垂直方向竖起，然后穿过扣眼滑进衣内。上衣裂开了几厘米。我的眼睛一直还半闭着。我的心跳得厉害。我又向前弯了弯身子。现在我又眯起眼睛，手沿着纽扣边框向下移动，很快但又像是顺便解开最后两颗纽扣，用仿佛是偶然做出的一个猛然使劲的动作，我把她的上衣向两边拽开，与此同时又把手抽了回来。我把双手平放在腿上，又吸了口气。然后我睁开眼睛。灯的微光照在喇合姨姨白皙的皮肤上。它们（乳房）裸露着躺在那儿，浑圆柔软，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要柔软得多，还要大得多。它们丰满浑圆，彼此紧挨着，我不仅看见了乳头的影子，而且还看到了整个乳头和褐色的乳晕。我看到了一切，让自

已淹没在那些波涛当中，那些巨大、柔软、白色和浑圆的波涛源源不断地向我袭来。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就算是用双手我也无法握住她的一只乳房。无论用什么人们也无法握住这样的乳房，不管用什么都不行。我的呼吸变得不均匀。我感觉越来越头晕目眩。我感觉到最终的、一次性的、诀别的和不可撤销的时刻的来临。喇合姨姨的乳房像汹涌的波涛在我眼前翻滚，漩涡、水流的吸力、裂缝、丘陵和拍岸的浪花。一股战栗不停地流经我全身，就跟喇合姨姨临死前的战栗相类似。但是我不再害怕死亡了。现在不再害怕了。我向门口跑去，用钥匙打开门，穿过通道从厨房旁边跑过，跑出住房，冲下楼梯跑到房子外面。我朝黑夜里跑去，边跑边大声喊叫，就跟当时在墙边一样含混不清地大声喊叫，只是这一次叫喊的一切都有意义。我就是那个伪先知，是天主的替罪羊，在其短暂的人生当中，天主赐予他的唯一恩典就是让他走上罪恶之路^①。另一个人替我死去了，为我奉献了生命。我绕着自己旋转起来。我把衬衣撕破。我不停地大声喊叫^②。然后情况就发生了。那是在雅各布大街，离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布鲁克林大桥不远的地方。我没有看到梯子和天使，也没有看到那辆白色的福特跑车，它撞了我并把我横着甩过马路。但是我看到了上帝^③。上帝出现在一个用灯火编织的花环里，他自己解开上衣说道：“来吧，普里门尼克，到我这儿来吧！”^④

询问交错配列这一概念及其应用

不得不承认，关于伪先知的介绍我挺喜欢的。这是您用来自我描述的一种新的变化形式。描述中也不无自我批评的成分。向您表示敬意。不过您偏偏要把这一切纳入犹太人环境，嗯，这当然就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了。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作为具有纯正日耳曼血统、对天主教极度虔信的辅弥撒者，您的这种与受害者的共鸣会让其他人感觉有些奇怪。

共鸣？

好了，您对犹太教的吸收程度如此之深，并且自上而下呈现出这么一种殖民主义视野……

顺便说一下，这是您的第二个花招，您极力使自己吸收一种隐语，就像您先前所说的，然后把它认定为是我的，为了以此故意激怒我。

但是您必须承认，那是一种具有异国情调的视野。对于具有犹太风情的纽约人们就是这么想象的，如果他是在比伯里希长大的话。一切都像是在木刻版画里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它们最终指向的都是一回事：青春期阶段不正常的性欲。对您来说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这应当能够对您的处境起到缓和作用。我把迄今我们所了解到的归纳一下：首先是一名变态的同性恋强奸犯，其次是一名身心性同性或者至少异性恋者，他已不可救药，就像人们在东区所说的那样，您对东区也有某种亲合性，无论它是最后的还是在此期间仅是幻想的退路，现在还要再算上一名乱伦的恋尸癖者。您有什么打算？用自己的话把克拉夫特·埃宾（德国精神病学家，二十世纪性学运动之前的早期性研究者之一）的思想再复述一遍？

您总是让人感觉到，仿佛是我凭空捏造了这些人物传记，撇开这个不谈，这些人物的图片可都是您自己拿给我看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人的经历与我的生平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是不在您说的那种平庸的层面上。

最显著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是这样的生活经历，其目的在于分散我们对于真正感兴趣的那些生活经历的注意力，即克劳迪娅、贝尔恩德、沃勒以及所有其他人的生活经历。当然我能够理解，您不愿意谈论这些事情，因为您非常残酷地背弃了您的两名最亲密的伙伴。在贝尔恩德那家伙临时夺走了您的女朋友之后，他索性溜到了法国，在那里假装自己是伟大的心理学家，而克劳迪娅则认为自己可以安然逃脱，如果她只是背离文明世界的话。但是这就是全球化的好处，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它与外界的联系仅仅是每周一次的邮船，即使这样的小岛上人们也能被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发现踪迹。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您没有必要记住这些机构的名称，它就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总而言之，您可谓是你们当中唯一一事无成的人，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前后一致的结果，因为还在当时您就是被人同情的对象，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一个可怜虫，为了其他人的目的……

您还是别说了。我曾经是整个组织的创建人，然后又仅是一个随大流者而已。您必须要选择一种策略了。

策略？这您完全理解错了。对您我没有采取任何策略。我只是想简单地跟您聊天。就像一名治疗医师所做的那样。您应该对此很熟悉。您总认为我对您不感兴趣，但是您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我听。您就放心地向我倾诉吧。

好吧，是这样的，我禁不住要经常想起格尔妮卡，尽管我好几个月没有和她说过话。

精确地说是一个半月。

没错。有时这会对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效果。

然后您遁入了幻想世界，但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是的，然后，然后不知怎的整个过去都在跟着一起浮现，就仿佛它与格尔妮卡也有所联系，这当然都是胡说八道了，但我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然后我最喜欢.....根据您的经验，您觉得真有这种情况吗？也就是说某人想承认他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情？

不像相反的情况那样频繁发生，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相反的情况？

也就是说某人不想承认他做过的事情，一种简单的交错配列，从您崇拜的马克思那儿您肯定知道这一点，这可是他最受欢迎的修辞形式：决定人的存在的不是人的意识，而是相反，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或者：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等等等等。

如果听您这么引用，我真的会变得易动感情的。我也不知道这种思想从何而来，但那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我只有在听歌曲时才会有的感觉。您知道吗，在我很久以后比如说又听到蒂姆·摩尔（Tim Moore）演唱的《第二大道》（Second Avenue）时，很明显歌词大意是指不幸的爱情，人们会变得情绪忧伤，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听到马克思时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触.....这难道意味着，社会变革也在离我远去，就跟我曾经想象的爱情一样？

可能是您这两次坠入的都是一种幻觉。

一种幻觉？好吧，或许是吧。但尽管如此还是有这回事和另一回事之分。有爱情，但同时也有革命。

有些人这么说，其他人又那么.....

不，但是不开玩笑了。除此之外它指的又是什么呢？

是啊，除此之外它指的又是什么呢？

不一样的青春期4：米盖尔·加西亚·巴尔德斯又称费利普

一块被擀过的透明渗油的香肠皮，它是很久以前一位闲散的土著神在告别时越过肩膀扔到自己身后的，这就是伊玛纳丘的天空。几百年来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僵硬和呆板了，在它后面人们能够认出一道苍白的天际，天际处有一条在寻找银矿的过程中被挖空的山脉，仙人掌长在部分光秃的草地上，在大片休耕地之间遍布着人工培育的长势不佳的变种植物，妇女们步行用枝条把身形消瘦的黄牛赶往那些休耕地。伊玛纳丘这个地方没有马，因为它们忍受不了这里的气候，耳朵后面会生出肿块，这些肿块使它们丧失了平衡感，变得脾气暴躁。它们会转着圈跑好几个小时，瞳孔向内翻转，露出淡青色的布满细微裂缝的牙齿，直到人们开一枪了结它们的性命，用车把它们的尸体运到屠宰工人那里，让人把尸体肢解掉。因此骑马牧人们不得不将就着开吉普车，如果是短途的话他们就都到处骑着骡子，骡子们心里清楚，它们在自己的同类中总是能够挺到最后。

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没有划分割线。女秘书们在短暂的咖啡休息时间里到外面抽两三支烟，她们用前一支烟的烟蒂再把下一支烟点着。炽热的太阳投在没有树的街巷上。如果有人从门拱里或者庭院入口处出来，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缩紧脑袋。在交谈时人们很少把话题引到这个国家的工程师大学上来。倘若有其他人谈起这个话题，那么在一名行人几乎还未进入他们视野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默不作声了。就连出租车人们也会避开，并训练自己对于发动机声响的辨音能力，为了即使隔得很远也能够把它和其他发动机的声响区分开来。

载有水箱的卡车被临时改装成洒水车，在运动场和足球场上绕圈作业。男孩们溜向边缘城区，他们在被停用的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会面，为了把他们缝补过的皮球踢向上插销的铁门。国家的行政机构受到削减，对小型事务的调控被交由地方登记处处理。因为没有把

握、要求过分、主要是缺乏必需的权限，地方登记处对于材料本来就不短的处理时间又比平时多出了两倍。一大早过道里就挤满了人，他们闷闷不乐地靠在没有座椅的走廊墙面上，手里捏着需要盖章或者公证的材料。于是人们缩短了对外办公时间，但尽管如此即便到了晚上，当各办公部门都已关门的时候，一直还有人在过道里滞留。他们吸烟、玩掷色子或者打扑克牌，当清洁女工们前来打扫卫生时，他们就和她们开起玩笑，或者出于寻开心帮她们把垃圾桶搬到下一个楼层。香烟烟雾、熏鱼和橄榄酱的味道穿过各个办公室，有时就连公职人员们也经不住诱惑，他们走到办公室外面，以想要浏览一下材料为借口，加入那些吃客当中，后者也热情地向这些先生们提供他们随身携带的伙食。这些经办人员急匆匆地站着吃完，然后又消失在他们的办公室房门后面，并诅咒让他们面临没有公章和规章目录这一处境的那些人。人们责令护照局普遍停止签发护照和证件，但并不正式宣布这一规定，而是仅仅通过把制证费提高到一名小职员의月平均工资水平，让上述规定听命于一种自然的自我调节机制。

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结束。为了多多少少控制通胀，人们在“七点钟新闻播报”节目里通知了应当在钞票上添加的零的数量。因为只有极少数居民拥有收音机，所以出现了仓促售卖的现象，它们在场面上往往堪比对财产的没收。在人们从官方方面想到这个主意之前，也就是把原先印在钞票上的面值保留为基础价值，仅仅让它每天早晨与国有超市里商品的价格相适应，大城市里的资产分配状况虽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但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那些小商店的所有人不再开车去大型批发市场，而是一大早就把国有超市的停车场塞得严严实实。最初为了让自己以官方价格为导向，零售商们很快养成了自己去超市采购商品、通过相应的附加费再把这些商品在自己商店里继续出售的习惯。这样一来超市就变成了一种批发贸易场所，尽管官方从未做出过这样的规定，孩子们和家庭主妇被身穿制服的安全警卫人员逐出超市，而那些大型批发市场则通过被政府描述为自我调节和自我净化的结构调整，使自己转变成配备了保护关税和进口关税的新出现的保护主义堡垒。后来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错误决定像伪造的无光泽的珍珠一样把自己穿在项链上，使得项链越来越紧地套在国家干枯的脖子上，但是在我所谈到的那些年月里，经济问题对于民众来说却是最轻微的不幸，

无论这一点在普遍蔓延的贫困状态下听起来是多么的令人无法置信。人们几乎可以认为，政府的专断仅仅是一种手段，为了把民众的注意力从不断折磨他们的痛苦身上移走，这就好比是人们向一个哭闹的孩子展示或者给他一些好玩的东西，只不过这里涉及的是一些令人不快和不大美观的事情，它只是应当转移民众的视线和分散民众的思维。当几乎没有或者只有少许抗议活动出现时，政府意识到最初出于政治原因而采取的压制措施，同时也减轻了贯彻经济荒谬的难度。独裁制度似乎以此给自己创造了经济基础。

在周边邻国（我自己就来自西边的某个国家），人们带着或多或少的紧张心情在等待即将到来的国家结构的瓦解。首先人们关闭了边境，继而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最后又环绕国家建起了所谓的半透膜，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半透明的围篱，它们（当然只在交纳高昂费用的前提下）允许自由入境，但却禁止任何形式的出境。最晚在这个时候政府应当寻求与邻国进行谈判才是，但是因为人们不无道理地担心，其他国家将会提出某些令人厌烦的要求，所以人们为了对内镇压干脆放弃对外寻求保护。尽管边境壁垒好像和其他地方操用的语言不一样，这个国家还是从边缘处就遭到啮咬，大片区域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也从语言和文化上被强占，因此首都虽坐拥港口与海洋连接，但却很快就像是一座越来越与广阔的后方相分离的岛屿了。虽然在此期间谁都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国家和哪段时期，但我还是想放弃给我的故事（它描写的不外乎是我后来的不成熟）配上具体的人名和年月顺序，因为这些只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故事所散发的朦胧气息上引开，而我最注重的就是这种气息，一种在磷光中闪烁的消极的气息，朽木在夜里就会发出这样的磷光。此外我也想保护一些人，因为历史进程不是在真正封闭的意义上发生的。虽然多年来我自己生活在一座很小的城市里，它与很多年前我的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国家相隔甚远，但还是有足够多的人留了下来，快速变化的政治氛围的漩涡很容易侵袭并将他们卷走。

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许多人从跟他们面对面的人身上看不出无知和缺乏经验的程度，如果人们通过巧妙的评论使他们相信，人们早已经历和克服了自己事实上一窍不通的事情。专家们的行话也是服

务于类似目的的，也就是既使我们惊愕又使我们胆怯，因为我们认为，一位研究手套在一个特定国家的法制当中以及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意义的历史学家，能够一个人找到想要的答案，在他把所有国家和之前所有时期的普遍法制都做了深入研究之后。在此过程中没有什么比获取专业知识更为容易，也没有什么比认识普遍知识更为困难的了。

如果说我在青春期阶段因为患形成中的哮喘而得以掩饰这一情况，即无法按照真实年龄继续发育，那么周围的人糟糕的记忆力又帮助我能够一下子作为年轻男子立足于社会。不必深入分析青春期阶段令人难以领会的现象，这或许正合我家人的心意，因为我通过患病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这就跟一名魔术师相像，他用右手完成了一个特别的动作，只是为了隐藏关键性的左手动作，或者类似于一名戴假发的男子，他在第一次戴着假发走到人们当中之前，会让自己长出大髭须以迷惑人们的视线，所以他们（家人）甚至都不会想到，我的生长发育可能缺少关键性要素。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至少没有刻意想过，假如我没有选择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甚至去国外留学（这样做或许正是为了弥补我成长中错过的东西），我可能会直到生命的终点一直保持纯洁和清白之身，对外则一直给人一种淡泊和博学的印象，甚至可能会通过出版几本著述或者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出名，因为另一方面人们不允许低估不受拘束的能量，没有深入研究过性欲、爱情和死亡问题的人懂得去运用这样的能量。不是我放弃了对自己出书的希望，也不是我对一种不管以什么方式而形成的制度不抱希望，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只有当我创造了一种基础，把所有我欠缺的经验都弥补回来，我才会取得成功。

事实上我对留学地点的选择绝对是巧妙的。通常情况下富有家庭的孩子会去欧洲留学。巴黎、伦敦、马德里或者慕尼黑，根据不同的个人喜好。而我却留在了我们大陆，虽然跨越了边境，但既没有变换语言也没有改变习俗，而是能够在不引发太大恼怒的情况下继续走自己的路。至少我在过十八岁生日的时候就是这么想和这么计划的，因为尽管做任何事情非常拖沓，我好像天生就具有某种实践才能。但是夏天过后我几乎还未离开父母家并把自己安顿在塞罗那萨吉达附近的伊玛纳丘，我就禁不住又发觉，那些在我青少年时代被忽略的主题是怎样

以缓慢和小心翼翼的步伐再次向我靠近的。起初我认为，在我自行选择的流亡地的女人和在我家乡的女人是不同的，而事实上我看她们的目光也跟以前不一样。从社会环境和父母家规定的社交礼仪中解脱出来，在专题讨论课和讲座课上和那些家庭出身及知识程度完全不同的大学生聚集在一起，不得不承认也是第一次开始了强度更大，尤其是更为规律的酒精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是忽然之间就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要求，即让自己有不知道某事的权利。如果说一开始它还只是一种适应形式，因为我不想和同学面前显得无所不知，因为我足够了解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我行我素者角色，那么很快我就对装傻感起了兴趣，最终不得不意识到，这种装傻不仅仅是表演出来的，而且还指向一系列我的确一无所知的领域。于是正好在喝醉酒的状态下，当交谈的话题总是围绕女性的时候，我再一次注意到了那个这么多年我一直深藏不露的秘密。我好像清醒了过来，自打九岁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用一种毫无成见的眼光来观察女人。

如果说起初我看到的都是女人的胸脯及其各式各样的形状，那么很快我就注意到着装女人身体上的其他部位了。胸罩在后背上的搭扣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看得都更加清楚，迄今为止我从未过多留意过它，甚至可能把它当作突出的腰椎骨刺而未予理睬。我在接近裙腰顶端的地方看到了某些凹痕，然后看到在大腿上也有一些。但是这些还不够。我在这方面的目光还没有变得敏锐，越来越多隐蔽的线条和素描画就开始朝我迎面而来，直到女人的身体，就跟我在城里大街上、在去听讲座的路上上百次看到的穿着衣服的那种一样，好像和那些不清晰的、轮廓不分明的裸体女人的图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我把那些裸体图片装在一个狭窄的烟盒里，保存在床后面一块松动的地板底下。

我是在一本探讨儿童语言习得的社会语言学著述的最后几页里偶然发现的这些图片，在教堂前的集市上我以微不足道的价格买下了这本书，该书主要涉及的是儿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对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售书者是一名长着大髭须的年轻男子，他坐在售书台后面两个摞在一起的啤酒箱上，幸运的是他自己都不想再翻一下这本书，而是从他坐的高处随便给我喊了个价。我多少可以肯定，这本书一定不是他

自己的。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七张图片也不是私人照片，而是大量生产的蹩脚的洗印照片而已。我可能是中了一名专业销售员的圈套，他懂得以这种方式把即使是最严重的滞销商品推销给顾客？我摒弃了这种想法，虽然我又有几次在类似的情况下遇到了那名长着大髭须的男子。但是那几次他卖的不再是图书了，而是电池和镀铬的水龙头。

那些图片上的女人涉及的是三个不同女人，她们两次摆出两种、一次摆出三种不同的姿势，她们把双腿紧紧夹在一起，胳膊紧贴着身体，肩膀高高耸起。她们就这样坐在一张床的边缘上，床上罩着褪色的格子呢床单，或者她们伸展四肢躺在床上。这种被公开展示的裸露通过相应的整饬又额外增强了裸体效果，它让我觉得女性的身体都具有相当统一的形态，没有太大的奥妙和秘密可言。但是这一点丝毫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仅仅是进一步拉大了赤裸身体和着装身体之间的距离，因为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哪怕是近似的一致现在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穿了衣服的女性身体被各种不同的线条和束紧切割得面目全非，而且衣服本身看来也被划定了不同层次。有时我在一块裸露的肩膀上看到三根甚至四根背带。这些背带固定的都是什么呢？是一个胸罩、一条衬裙，或许又一个胸罩，又一条衬裙、一件小衬衫、一件紧身胸衣？人们在皮肤上穿一件，再在上面套一件，为了掩盖吊袜围腰留下的凹痕？先是腰带，然后是吊袜带，最后是长筒袜自身。我简直理解不了这种加固的意义，只能隐约感到控制一个女人的身体好像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好几层内衣和衬裙、固件和背带，这样一个女人一旦穿好了衣服就不会再被拆散。但是男人怎样以及什么时候学着去阐释女人身体的装束呢？还是其他男人也跟我一样不清楚，真正隐藏在那些套头毛衫、短裙和连衣裙后面的都是些什么呢？但是当男人们看到这样的装束时，是什么牢牢地吸引住了他们？难道真的是摆脱了现象学分析、通过束紧、描画和切割抵制所有的推断，以此驱使男人似乎不可避免地进行形而上空想的那种浑然不知？

在我端详这七张图片、尝试找到针对我内心那些迫切问题的答案时，我眼前不由得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教堂集市上那名大髭须男子的画面，直到我认为从他身上识别出那个懂得破解这一秘密的人，他就类似于斩断戈尔迪之结的亚历山大，不是借助于敏锐深刻的反省，这种

做法面对上述对象肯定会落得悲惨的下场，而是通过纯粹的行动。他不会根据衣着的各组成部分来分析女人，而是凭借他粗壮双手的力量让她们回归裸露的纯洁本源。无论人们用多少背带，用多少扣环、纽带和搭扣来阻碍他——因为这种人为和奇特的复杂化把身体密封了起来，为了让我对缠裹在诸多层次里的本性心生更多的揣测——大髭须男子都将使用他粗大的双手，只猛地用一下力，便将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除去。他不会像我一样在探究衣物的歧途上迷失方向，而是穿过装点着缎带和镶边的层次开辟自己的独特路径。绦带将会挣脱，搭扣被弄弯，松紧固件失去了弹性，缎带被扯坏，一小堆无用的解不开的材质被丢在后屋冰冷的地面上，大髭须男子把他的牺牲品都会驱赶到那里。难怪图片上的那些裸体女人会胆怯地夹紧双腿，胳膊紧贴着身体，肩膀高高耸起，当大髭须男子拿起相机，把揭开的秘密定格下来，紧接着使它（揭开的秘密）丰富多姿，再把它打发到世上，为了完成一项类似启蒙的使命，就像当初狄德罗《百科全书》里的铜版雕刻家那样。因为这些照片的目的不可能在于刺激男性，我对它们粗浅的第一印象迷惑了我。只需仔细看一遍人们就会立即察觉，它们不是色情图片，而是类似于警方拍摄的通缉照片。它们涉及的是对证据的记录，是对证明材料的解释。男人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女人的赤裸就是这么质朴。

但是从教堂集市上买来的这本便宜书被证明为又隐含了一处麻烦，因为我必须承认自己再一次暴露出性格上一种奇特的软弱形式，它使我不可能不去读一段文字，无论我对这样的文字多么不感兴趣。于是我只好埋头于这篇陈旧的、关于对人称代词的语言习得过程的研究性文章，了解到儿童在说“我”时绝非指的并描述的是他自己的身体，而更多的是一种直觉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在使用“我”这一人称代词时，儿童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愿望、希望和担忧，虽然一开始这一断言使我感到惊愕，但在短暂的思考之后它对我来说就显得完全可信了。当然“我”只能是那种受意愿所决定的“我”，即仅仅被想象为一种潜能，但却并不真实存在。相反对于自己身体的名称，儿童采用了其他人对于身体的描述，因此他用昵称或者自己的名来谈及自己身体上的“我”。我刚想认为甚至能够从这种自己强加给自己的阅读中获得益处时，作者，一位名叫杰姆斯·卡拉威·罗莱的北美儿童心理学家，却举了一个

让我觉得奇特的例子。他发现自我被划分成一个精神上的意愿者（就连小孩也知道用“我”来描述它）和一个身体上的存在者（小孩用分配给他的名字来命名它），为了更为详尽地调查研究他的这一发现，他让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照镜子，接着小女孩指着镜中的自我，说了“宝宝”一词。在另一起实验中，罗莱在书中简短地写道，小女孩化妆之后再次照镜子，她又指向镜中的自我，但是这一次说的却是“我”。我非常惊讶，不是对实验结果感到吃惊，而更多的是对人们给孩子化妆这一事实。在被戴上了一种面具之后，孩子突然用一般对意愿的精神领域负责的人称代词来描述自己。罗莱在一处脚注里阐明，人称代词的主格“我”、人称代词的宾格“我”或者物主代词“我的”之间的区别在这个年龄显得并不重要，它们被这个年龄的孩子交替使用。因为才疏学浅，我在这里只好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我却有这样的想法，即那个孩子是否真的不想命名一种占有物，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也就是如果小女孩从镜子里看到的面孔应当属于她所有的，那么先前已经在精神意愿层面上的“我”和事实存在的“我”之间做出的区分也能够保留各自的语言名称。

我几乎觉得提到这一点是多余的，即很快这两个错综复杂的主题（衣物对女人身体的扭曲以及使用人称代词）就混杂在我的思想当中，我在考虑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在治疗措施范围内甚至可能是得当的，也就是对我们一般描述为“我”的那个概念进行更为精确的区分，或许用更多数量的人称代词来细化它，为了不仅对我们自己，而且也对我们与其他人的交往做出不同的评价。另一个我这学期特别要下大力气研究的主题在这里也掺和了进来，即马塞尔和布伯的哲学思想。因为如果人们对“我”进行了相应的区分，而仅让一个唯一的“你”就能够应对这些多重的“我”，那么这对我来说几乎显得是不可能的。在我这天晚上为“我”和“你”之间的多价关系设计出了第一幅草图之后，我想再次出门到外面去，但在楼梯上摔了一跤，左脚脚踝伤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它必须要静养才行，所以我几乎三个星期都不能离开房间了。

我前面提起在三月份发生了两件不寻常的事情，它们虽然没有为我揭开女人的秘密，也没有让我为此厘出头绪，但却给予我初步的指导，让我明白了另一个性别世界是怎么回事。对于这两件事中的第一件我

已经报道完毕，也就是我在从教堂集市上买来的书里发现了那七张裸体图片。第二个经历涉及我的女房东伊利斯·萨奇达夫人。但是在我开始讲述之前，我想插入一小段评论，它能够阐明我在1956年夏季学期开学时的精神状态。一位名叫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的近代哲学家（他的著作可惜还没有被翻译过来）据说找到一个新的途径，以探究在当时围绕我多时的“他者”问题，我是在大学听到并在一个大学生哲学社团用胶版誊写版印刷的刊物上读到这一点的。从对马塞尔、罗森茨威格和布伯（我正准备使自己熟悉他们的哲学思想）的批判出发，据说他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对“他者”概念进行了革新。只是我无法获悉更多这方面的情况。南美哲学月刊和季刊三年来一直深陷一场大规模的语言哲学争论，北美唯一的哲学杂志（我们几乎要晚三个月才能收到）也把存在主义形而上学这一主题束之高阁，相反却在探讨与托克维尔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新民主和法治理论。

可能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有一次带着一种近乎确信的可靠性觉察到，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一种原理，它不仅会促进我们的思维，还能够把思维提升至一个全新的维度。人们骑马巡视土地，在关键时刻人们只需要一个名字、一个概念、围绕一种理论的尚显混乱的知识，为了能够插下一棵秧苗，让它开始萌芽。对我来说这棵秧苗就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每个人都是他者，没有人是他自己。”海德格尔在《存在和时间》里如是写道，1927年版，第128页。在此我想起了没人、无人和傻瓜的玩笑，所有三人都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一天他们向窗外张望。没人向住在底层的傻瓜头上吐唾沫。于是傻瓜报警并对警官说：“没人向我头上吐唾沫，无人看到这一幕。”听完后警官问他：“您是傻瓜？”“是的，是我本人。”维特根斯坦认为，撰写一部仅仅由玩笑组成的哲学作品，但是让它显得非常严肃而绝非荒谬，这一点是可能的。从这个方面来看或许人们可以重新阅读或者改写海德格尔的思想？——作者原注

我一再阅读那几行被我收集在一个本子里的内容贫乏的陈述，但是它们更像是阻断了而不是开启了我的认知之路。我干脆无法想象，列维纳斯在他者身上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越努力基于类似情况的哲学构想让自己有所领悟，我就越发变得不自信了，即使在面对不久前还自认为非常肯定的东西时也是如此。我花了将近三周的时间，完全埋头于探究重新定义“他者”的可能性，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作为对策让自己再一次深入研究谢林的启示哲学论，在这之后的一天夜里我突然产生了那个十分重要的想法，那天我正好喝了不少酒，和几名同学坐在其中一个当时还存在的非正式酒吧间里，那些酒吧间都位于城北的房屋废墟里，房屋的入口都被用木板钉死了。大学内严格的性别划分使得人们在教室和阅览室里很少能够遇见女性同学，这让我首先是在自己真真切切的生活当中，毫不犹豫地把女人视为他者本身。但是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如此普通、如此正常，以至于如果我想要信赖这一客观事实，即列维纳斯在面对他者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那么只可能存在一种真正激进的新理念：他者必须被设想为是男性。当我因为酒精而显得沉甸甸的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个念头时，我正在去上厕所的路上，厕所只不过是一个天棚塌陷、地板被抽掉或者可能被烧掉的房间，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随处大小便。这个阴沟臭气熏天，让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很高兴终于闻到了自己小便的味道。我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社会里，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远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姐妹、自己的姑姑姨姨。在这一刻我肯定无法再清醒地思维，但是我确信地知道，这个他者，也就是女性，被列维纳斯用男性取代了。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我扣好裤子走到外面，回到乌烟瘴气的酒吧间里。酒馆在当时是非法的，所以柜台后面甚至连一名女服务员都没有。我看到的都是些红通通的、大汗淋漓的男人的脑袋，他们情绪激动、口齿不清地说个不停，一边说一边相互敬酒。我尝试让自己把思想集中起来。如果列维纳斯用男性取代了天然他者即女性的位置，那么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给我一面镜子，不是为了让我看到对面的兄弟、父亲和酒友，因为这些人几乎不适合充当他者，而是为了使我自己变成女人。列维纳斯哲学思想的极端性就在于此。这件事涉及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因为他者与我相似，它就把我自己改变成了那个极端的他者^⑤。因为他者都是相同的，我就成了它的他者。我自己变成了女人。

这种想法以一种无法拒绝的力量向我袭来，以至于我没有告辞就从废墟酒吧间里冲到室外，一刻不停地一直往前跑，直到来到那栋房子前面，我的房间就在这栋楼的三层。我用手往裤兜里掏，但却找不到房门钥匙。房间的窗户里都没有点灯。入口处也没有门铃。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呼喊萨奇达夫人的名字。我张开嘴，原本以为从沙哑的喉咙里只能喊出嘶哑的声音，但是令我自己吃惊的是，我听到自己是怎样用清澈的嗓音清晰地喊出她的名字的。走廊里那盏忽明忽暗的灯被打开了，我听见她穿着带镶珠饰物的拖鞋从台阶上往外走的脚步声。钥匙被插进锁里，门打开了，萨奇达夫人穿着长睡衣站在我面前。我不是第一次这样看到她，但是作为男人，即使是作为没有经验的年轻男子（我也的确如此），迄今为止我一直都拒绝了她的示好，但是现在通过与他者的形而上相遇我自己也变成了女人，因此我从她在夜风里轻微飘动的、在走廊微弱灯光的照射下显得透明的衣衫里只看到了我自己。当我从她身边走过时，我感觉到了她的呼吸。我伸手去抓楼梯扶手，没有抓到并摔倒在地。我上身半直起趴在最下面几节台阶上，下身蹲坐在走廊冰冷的地砖上。萨奇达夫人把门锁上，向我转过身来，这时我感到一波刺激涌了上来。同时我醉得又太厉害了，以至于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阴茎，更不用说让它勃起了。但是在这关键时刻恰恰是这种情况向我迎面而来。萨奇达夫人朝我弯下身子，我配合地接受了她的示好，就在这儿的台阶上，我吸收了她的身体，她的乳房挤进我的嘴里，她的阴部以一种抑制不住的节奏撞击我的生殖器。随着每一次撞击，她在我头脑里体现的不仅仅是形而上的他者，而且还在我身上实现了《旧约》的信仰，这种信仰表现为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句话，在萨奇达夫人脉冲式的身体抽动下，我一边呻吟一边向夜间的走廊里说出了那句话：我可能是沉默了许久，一直在安静中克制自己。但现在我想像分娩中的女人一样喊叫，我想大声呼唤和喊叫。

询问被白白浪费的存在主义的可能性

您流鼻血了。给，您用我的手绢吧。您没意识到吗？血都已经滴到您的衬衣上了。

喔，谢谢。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在我身上。

要不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我以为我们很快就会结束的。

这完全取决于您。您尝试在这里虚构一个动听的恐怖冒险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来自各宗主国的处于青春期阶段的精神紊乱者，现在只缺一名爱斯基摩人了，但是他肯定也会出现的，如果我对您劝说得当的话，事实上您简直无法承认，那些主人公都完全与外界隔绝，是孤独和无足轻重的。啊不，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让您失望了，有很多人，我甚至想说是绝大多数人，他们都是非常正常和特别能干的年轻人，他们也能很好地应对这一不大容易（这一点人们必须承认）的人生阶段，让自己成长为能被派上用场的社会成员。您收集的那些深陷青春期的失败者也跟您一样，为了紧接着用可疑的向往和对宏伟壮丽的不完美的自恋想象来折磨自己的人生，这也没能使您避免，必须为您作为自己的经历而加以虚构的故事承担责任。您对存在主义哲学家也赞赏有加，例如加缪和萨特，尽管您不懂法文，您的专注度也不足以应对那些长篇大论，因此您总是只在加缪的日记里翻来翻去，但在那里也写着足够多的存在主义学说的精髓，主要涉及的是有意识地接受自己的存在，对存在承担责任，而非总是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过着这种生活的人根本不是他自己。

阿拉巴尔（Fernando Arrabal, 1932—），西裔法国荒诞派戏剧家。

是的，那些红色的罗沃尔特版本，《反抗者》《西西弗斯神话》，虽然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百科全书》是黑色的，它是当时我和德国袖珍图书出版社出版的《荒诞派戏剧》一起买的，尤内斯库，阿拉巴尔^②，您根本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希望把我和这些书籍联系在了一起。萨特，这是后来才有的，他与先前的截然不同，目标更为坚定，但是《荒诞派戏剧》，也许人们过快地抛弃了这些，在当时，因为原本……

好了，请您不要再一次陷入这种回忆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了，我们正处在正确的道路上，刚刚想要重新确定当前的位置，采取的办法是虽然我们认可和接受过去，但仅仅是作为过去，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过去的事情重新泛起。这是今天的一种记忆文化，我觉得这样的文化极其可疑。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人们看待新事物的视线被所有可能性的旧有的钙片药瓶和轻松愉快的袖珍图书所遮蔽……

《哥伦布蝴蝶》。

您说什么？

那是第一本轻松愉快的袖珍图书，它在两年前让人心生类似的希望。其实这是很奇特的现象。还是所有这些我只是现在、在事后才这么认为的？

回忆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分歧很大。

但您不是希望我回忆过去吗？

是的，是希望，但不是这么回忆的。我觉得您过于纠结于过去，总是追逐一些幻象，但是在此期间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了。而且在感情上您也一直停留在过去，这些我已经说过好多遍了。您一直还在希望得到挚爱，因此您在现实的夫妻关系中大发脾气，总是对女人们牢骚抱怨。是的，您用不满、紧张和歇斯底里把她们折磨得筋疲力尽，如果我可以说得这么性别中立的话，同时您梦想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对这样的社会您自己也不知道它应当是什么模样，所以您漫

无目标的反叛就总是游移在听天由命、宗教神秘主义的逃避现实和幼稚愚蠢的抗议之间。尽管晚了几十年，但您终于还是证明一下您在一定程度上的成熟吧。

通过我与您合作的方式？

这将是一个开端。我不能剥夺您个人的身心发展，也无法满足您追随某人的渴望，所有的左翼人士都怀有这样的渴望，但除此之外.....有一个办法也能使您从完全陷入困境的生活当中解脱出来，使您从回忆中解脱出来，为此您根本不必再去要求人们把您宣布为是对自己行为不能负责的。

终于能够过上正常有序的生活，有妻子、房子、孩子和狗，还能肩负一项被相应给付酬金的社会责任，这听起来是挺诱人的。

这样您的身体状况也将逐渐好转。您无须再服用药片，不必再去急救室，您也能和其他人一样每天吃三顿饭，并在用餐时就着喝一杯啤酒。

我好像能变得长生不死了。

嗯，至少在社会福利方面有了保障。

我原本以为今天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

您也曾经想过，不会再有女人给您买衬衣了。您只需向正确的方向展望。有足够多的领域还保留了所有这些现状，作为男人人们一直还能开始新的生活，组建新的家庭，使一切从头再来，在您这个年纪也是可能的。您看看我，我也是这么做的。

也就是说，您以前也是.....

以前我们都是跟现在不一样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不认识您，是不是？

对此我无法给出详细说明。

您长得和我认识的人都不像，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谁又知道呢。曾经有人对我说过，人们能够从说话的方式认出某人。

这些也都能相应地被改变。人们只需察觉原因，那好吧，这在您身上是显而易见的……

什么？

对所有这一切的原因。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那种共性，您讲述的所有那些关于离奇青少年的故事都有的共性。

这种共性是？

在这些故事里都没有出现母亲。

没有出现母亲？

是的。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故事里有父亲和祖父母，有叔叔、姨姨，甚至有姨婆和叔祖，所有可能性的人物都有，就是没有母亲。

您在影射血亲相奸。《哥伦布蝴蝶》。

不，我影射的是空位，那里通常情况下是母亲的位置。

但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空位，不是据说被从我们身上强行除去的那种。

是的，不太一样，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欠缺，您描述了一个没有母亲的社会。

反正我从未觉得关于没有父亲的社会描述有什么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此外对我来说听起来太像是没有祖国的小伙子们。

格尔妮卡当着您的面也这么评论过.....

什么？

说您不放过任何说母亲们坏话的机会。

说母亲们的坏话，亏您说得出口。

我引用她的原话：你总在背后说母亲们的坏话，这真的令人无法忍受。

但这和我们谈话的主题毫不相干呀。

人们总喜欢这么说。其实两者还是有关联的.....

空位。您刚刚谈到过一种空位。或许这是对的。

这将会解释很多问题。

至少解释几个问题。

是的，几个吧。然后这一切都只是填补这一空位的尝试，用想象和哲学，或者出于彻底幻灭之后的孤独，甚至用自己的生命。

这将是令人伤心的事情。

这的确是可悲的，我亲爱的。而且不只是可悲。这是唯一的不幸。

坐在攀缘架上抽烟

这个人就是位于下面和上面之间的衔接环节，下面是《忏悔镜》描述的地方，而圣饼则从上面掉入张开的嘴里。但是地平线会从中间穿过他的身体，成为他肉体里的硬刺，在陌生人面前他的身体就是狭窄的小巷、通道和迷宫一样的试验。他不断地被叫到黑板前面，又一次把手插在裤兜里，默不出声、没有才华地站在那里，直视同样没有才华的老师们，希望能够从他们的眼睛里觉察出什么。他混淆了圣水盆和玛利亚的圣盆，把她纯净的贞洁和他自己编造的独特的幸福的罪恶混为一谈，并尝试用费尽气力从古埃及搜集到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惨死在魏玛共和国，当时一切都变得失去了数据，孩子们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被以教学诗谣的形式灌输了历史的遗忘，在这些诗里是这样说的：这是拇指，它把李子从树上摇落下来，因为这种拇指相对显得是被附加上的，所以它事实上已经在描述食指了，这样一来孩子们大脑里所有有意义的东西都永远变得含混不清了，因为在每一次造物之初都会预设没有性格的假定，就像拇指只是被肯定而已，而所有紧随其后的手指则通过不同的行为活动被区分开来。虽然应该是拇指对人和动物进行了区分，可上帝却是用食指根据与自己相似者的模样造出了人并赋予他生命，因此人们也禁止儿童用食指去指别人，因为这样做他们在嘲笑上帝创世的同时，也是在讥讽他的造物，并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刻画成造物主，尽管夜里因为害怕，他们（儿童）总是尝试绝望地吮掉没有性格的拇指，为了永远成为动物，不负担任何责任，这样他们就不再被叫到黑板前，不必再在墙边罚站，当时机来临时只要被拉去屠宰就行了。因此这名少年也在观察那些高年级学生，因为他无法想象，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在课间休息时站在那儿吸烟，出于同一理由少年也在观察克里斯蒂安妮和她的小集团，也正因如此当其他孩子早已跑到校园里休息时，他总是一个人站在新打过蜡的走廊里，清点衣帽钩的数量并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挂在那里的总是一顶帽子或者一件带风帽的厚夹克，为什么人们总

是用连接衣服的风帽把厚夹克挂在那里，而从不用母亲们额外缝在领子上的搭环把它们挂在衣钩上。当上课铃响起时，少年才发觉自己忘记吃间食了，没办法只好饿着肚子继续上课了。还在上下一堂课的时候他就禁不住问自己，为什么他的回答总是错误的，而其他人的回答却总是正确的，尽管他们经常只是重复了他刚刚说过的话。少年预感到，所提问题涉及的可能不是规则本里的公式，不是单词本里的词汇，也不是历史书里的数据，而是一种除他之外其他人都知道的背后隐藏的信息。因此补习功课和严词威胁对这名少年都不起作用，宗教信仰方面的指导也帮不上忙，因为他反正也只是依次浏览忏悔镜上的罪过录，就像人们教给他的那些儿童短诗，在此期间当他再一次肚子痛的时候，那些短诗能够帮助他很快入睡。但是不仅是因为他在宗教仪式的鹦鹉学舌过程中会迷失自我，少年还欠缺一些更为基本的知识，比如为什么人们在红灯时停下来、在绿灯时继续前行，为什么人们要坐在宫殿花园里的长椅上观赏池塘，为什么人们要回忆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而做的事情，并尝试找到所有这些背后的原因。因此少年独自一人穿行在这个世界。这就是原因。唯一的原因。找到一个原因来解释所有这一切，让事先规定的事情得以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是他唯一的知识和他唯一的确信。正因为如此他才变得疲倦。然后红军派也就产生了。这名少年是想不出这样的组织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臆造了红军派。人们通缉红军派成员，在海报上公示他们的图片，少年把这种情况阐释为共性的标志。跟他们一样他们也在黑板前站过，一句话说不出来。他们准备使用击发的武器，也就是说他们同样坐在餐桌上摆放的面包前面，但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切面包，在逃亡途中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进入教堂，怎样着装，怎样照镜子，在学校里应该怎样就座，怎样穿过小巷，怎样和其他人坐在攀缘架上吸烟。针对他们的说法没有别的。针对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些。少年清楚地意识到，人们必须为这种无知付出代价，就像他一样每天都在为此付出代价。在这一刻少年明白了，终于有人向世界宣告自己的无知，简单地表达出自己的无知，但对此并不感到羞愧。不求更多。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让少年感到满足了。他一直还对此感到满足，即便是当他意识到他估计错了，当他意识到他将带着跟儿时一样的无知看着他们死去，但却没有对自己或者对世界有不一样的理解。

但是因为在片刻之间一切都好像得到了解释，少年还会长时间并且一直继续抱定这一点。

虚构的友好1：摘自形而上学小词典

心病得用心药医：用思想治疗思想，以此驱除思想。

夜里一辆调车机车拖得长长的鸣笛声使我陷入一种多愁善感的心境。它像是人们越过走廊听到的煮水壶发出的声音，像是在一个雨下个不停的周六下午从足球场另一端传来的发出颤音的哨声，但是这种鸣笛声主要还是——这样思想的圆周就闭合了，仿佛所有的思维都总是在寻找最初感知的起点——和我在少年时代对天体发出的声音的想象相像，我把天体想象为是宇宙中的圆盘，它们在旋转时相互摩擦，由此制造出一种类似于白浪轰鸣声的均匀的频谱，或者这种声音也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当一根打氧用的胶皮软管从固定它的夹具里弹出，或者当主动脉从左心室滑落时：一种令人感伤的啾啾声，紧接着是暖热宜人的大量出血而死。

也不能从体内清除掉，身体仅有10%由真正的人体细胞组成，其余90%都是由细菌（大约 90×10^{18} 个）组成的。

我观察在我体内展开的不同的炎症疫源地，带着一种由猜疑、活跃的兴趣和惊慌失措的恐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理，尽管这些疫源地也没什么特别的：链球菌、衣原体属、支原体属、立克次氏体属和其他微生物，我就是它们的宿主，它们中没有谁不能用一种广谱抗生素从这个世界上，或许不是直接从这个世界上，但至少是能够从我的身体里被清除掉^⑤。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疑虑。难道就没有其他手段和途径了吗？或许通过对它们的名字进行可视化处理的方法，也就是说我把它们的名字划分成音节和切分成最小的意义单位，为了以此杀死它们。但是我究竟怎样才能变得这么自私——把善良人的思想演绎到一个新的极致——消除微生物或者服用一些杀死我体内其他物质的东西呢？

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文化加以审视，在审视过程中就像开明的人种学家那样再度观察自我，运用所有的作用与反作用，这一点由作为客体和主体的双方交替完成。

我在走廊里早就需要被修理的衣帽架前面独自说着这句空洞的言辞“我有所付出因此……”。在说了大约二十五遍之后我又换到“您或许会感到惊讶……”上来，这一句我重复了将近十二遍。然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我上一次真正感到惊讶是在什么时候。

神的特征：上帝是唯一不把自己和我进行比较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创世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衬衣袖口来说我只是手、对于衣领来说我只是脖子、对于衬衫来说我只是胸脯吗？衣服在早晨把我穿好，在白天悄悄地向我发号施令？

如果人们多少还算诚实的话，他们就必须把被碾平的动物尸体拴在一根绳上在自己身后拖拽。他们必须给一块石头套上一个颈圈或者把一台电视机拖过马路。但是动物？我们对动物又知道些什么呢？如果把词源学尽可能往回追溯，人们就能想到我们对于动物概念的真正含义了：动物就是人们必须要拴紧的有生命之物。

活活地掏出某人的心脏，这种风俗今天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有时唯一——一个单词就足够了：电台儿童节目。

我用手洗了自己蓝色的套头毛衫，把它挂到浴缸的边缘上晾干。当我晚上查看时，发现在浴缸底部有一片干燥后形成的水痕，它的形状就像是一条伸出手张开手指的胳膊。此时我的脑子里不由得闪过“那只手在向你示意”那句话。自己连最荒唐的思想都不能不予理睬，这就是真正的可怕之处。比如还有在那一刻紧随那句话而出现的吞食一切的邪恶阴沟人的形象。父母逃脱了所有的精神病，因为他们有机会在孩子们身上以及与孩子们一道尽情享受那些精神疾病，和他们一样我也需

要身边有一个人，这样我就能用玩具熊和自己童年时代的鬼怪来诓骗他，为了不让自己因为这些东西而走向毁灭。

精神错乱就意味着身边没有人能够听到自己讲述。夸大狂则是：所有的人都在听自己讲述。

原子论者认为，原子结构不间断地从物体上脱落，然后以画面的形式侵入人的灵魂。虽然他们说的完全正确，而且我们的全部思维都由物体的原子化所决定，但是原子理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越多的原子从物体上脱落，物体本身也就愈加无法辨认。最后那些脱落的画面以空前的程度从因为脱落而发生变化的物体身上分离出来，以至于它们最终失去了与生产它们的物体的联系，并变得失去控制。通过不断与物体剥离的画面，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很快人们就不无道理地认为，物体就其本身而言根本无法再被辨认了，很快人们就开始尝试，以实证主义方法修复幸存的画面，或者用语言的映像理论超量运载这样的画面，最后人们认为，人们处在模拟物当中，它们无法再指向原型。这样看来哲学的历史就是一段原子论的历史。只有不幸的恋人才会知道，他周围的一切都在消解，散化成无法再被捕捉的点。这种情况涉及的不是心灵的幻象，而是因为爱情的痛苦而变得自由和敏锐的看待现实的目光。用不了多久，我将穿墙而过。

我们的进化史分四个步骤：

1. 浅表烧焦在各浅表烧焦之间。
2. 表征在各浅表烧焦之间。
3. 浅表烧焦在各表征之间。
4. 表征在各表征之间。

绝对是彻底与物体剥离的画面，它于自由游动和偏离圆心中飘荡而去。物体因为从它身上脱落的画面而遭到破坏。因此围绕我们的那些绝对画面都是无条件的。人要是追求绝对，他就必须脱离他的物质存

在，必须完全成为画面。为此我引入“形成”这一概念。“形成”就意味着从各种存在关系中分裂出去。哲学不可能达到绝对，因为它一直在忙于解决（solvere）问题，而不是脱离（ab-solvere）它们。其原因在于哲学上代遗下的债务，也就是害怕返回到它最初产生的那种状态，也就是害怕回归虚无。习惯了用二元对立概念思考问题，人们认为联想只可能与一种分裂相对立。人们继续认为，一旦人们不再解决任何问题，人们就将消解死亡。我们知道哲学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我知道我成长到了何种阶段，我被“构成了”，也就是说被分离了，因此我变得绝对了。以下就是检验：

1. 我没有被关联吗？

没有，因为格尔妮卡离开了我，这只是作为我无关联性的最显著的征兆。

2. 我是无条件的吗？

是的，因为我离开了作为物体的自我，对于其他人以及对于我自己来说作为画面继续存在。

3. 我不是被造成的吧？

不是，因为我自己决定了我的状态。我独自一人承担责任。

4. 我是不受限制的吗？

是的，是的，再说一遍是的。作为分离出来的画面我在飞翔。我在飘荡。我是不受时代限制的。这就像是一场梦。现在我终于知道一切了。

小时候我发明了哥特式油画板绘画。小块的向内卷曲的景观，持续中断的远景，因为组成生活的各个部分还没有合理地嵌套在一起。画上总是有围墙，墙后面一条路通向远方，窗拱从里面划分出外界，让两者都显出一种不完整的效果。画上出现的动物和人都非常独特，无法被归入任何物种或者人种。每个人或者是圣人或者是罪人。一切都跟

一切联系在一起。有时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被看到。人物确定地点，上帝对他们而言无处不在，甚至会出现鹿角里。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没有面目的东西显得更加可怜、能够在我们内心唤起更大同情的了。心理学家们自称发现了，我们会带着好感对小鼻子和大眼睛做出反应，因为这唤醒了我们的保护本能，但是他们只是对不同的面孔做了比较。可是没有面目的东西却能唤起我们更为强烈的怜悯之心，这种感觉几乎深入到灵魂未被区分的领域。当我比如说观察我烟灰缸里吸剩的烟蒂时，它们裹在几乎无法被看见的带有细条纹的白色薄皮里，作为面目全非的小生命蜷缩在这种旧式托盘中的大摊灰烬里，这时一股强烈的同情心侵袭了我，它比我向一个无助地盯着我看的人所能够给予的还要更甚。

正因为我们忍受不了这种同情感，我们必须立即并随处又重新识出面孔：那两个吸剩的烟蒂在圆形烟灰缸里弯曲成两道眼眉，楼房的凸出部位变成了房子的鼻子，屋顶成了房子的皮肤，上面一轮圆月露出了笑脸。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成了面孔，以至于我们能够随时在任何无定形的形体上毫厘不差地指出缺少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所在的位置。

一张面孔向我们展示的难道不只是它的承载者认为向前的方向？

包装箭牌口香糖的锯齿形锡纸：就连这个也要被设计出来并不断改进。

相比我在清醒状态下的思维，那种看似混乱、无意识和充满了各种象征的对于梦境的臆测是一种不自然和相当勉强的模仿，确切地说它与一种不是特别富于想象力的讽刺性模仿可以相比较，总之它是一种陈词滥调，总是用相同、极易被识破的花招尝试制造困惑和不安，为了把它极其乏味的口信通知给那个男人，也就是通知给我。这条口信的内容是：使自己适应！为梦境的丰富多彩和欢快的荒谬，也包括其令人惊恐的精确而着迷和失去理智吧，这样的梦境会召唤你使自己适应。

他们尽管去膜拜和记录他们的梦境、把它们评价为一条扎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创造性之河吧。真正的创造性仅仅产生于把梦揭露为社会制度，唯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才会记录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梦境，为了根据记录揭示那些被称为是远古力量的倒行逆施，那些力量推行的无异于通过创立一种二价圣像学来磨灭个体性，因为每一幅画面都能够溶解在一种被指派给它的阐释之中，并由此而显得是可逆的。（牙脱落：某人死了。某人死了：牙齿脱落了。）

我们作为白发老人来到世上，从此便久病不起。

在我们体内的这位白发老人对所有的事情都了解得更加透彻，可他还是什么也做不了，每过一小时他的体力就会丧失一点儿，但同时又让他警告的声音洪亮地响起，令我陷入恐慌、惊惧和瘫痪。应该把他放逐到哪一座山上、推进哪一条深谷呢？

我们对固有、孤独的生活感到绝望，因此我们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坐标网，它的连接点把我们与时间、空间和其他围绕我们的人联系起来。为了把自己固定住，心脏投下了伪装的圈套和黏糊糊的绳索，这样它就可以以为自己是长生不死的了，因为它现在感觉到，其他人的血液怎样吃力地拖着自己流过他们的血管，感觉到生命怎样以无限和善良的公正来平均分配它的残酷，尽管从表面上看对我们来说总会显出这样的情形，即我们要遭受更多的苦难，因为我们在内心承载了生活必需的希望，那就是少吃苦甚至可能完全避免吃苦，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方法是，我们更加关心其他人的疾苦，使自己转向他们的苦难，就像吃得过饱的蜘蛛使自己转向被织网缠住的储备那样。

“对我来说这是纯粹的裁决，即谁要是只会表演自己，那他还算不上是演员。谁要是不能向意义和形象倾诉衷肠，那他就配不上这样的称号。”这句话是无可争辩和不引发歧义的，正因为如此它出自我们最伟大的德国文豪之口。当然人们用这句引言可以把整个电视行业清扫得干干净净，但是表演自己并真正表达自己所有的方面，而又不沦为那种诱惑，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那种强迫的牺牲品，即强加给自我一种形式，让他者有机会看出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表现，这难道不是最难的事情吗？

有那么一些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对他者的思考又会变得烦冗、费时和迷惘，但我又说不出为什么会是这样。经常在说完第一个句子之后我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方面我想停止思考，当我感受到我的思想变得混浊不清时，另一方面这恰恰又刺激我从中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混浊是思想独具的特性。

尝试让自己再三考虑，就是跨越自己思想的疆界去思考。

一方面是这种暂时性的感觉，另一方面出于某种原因，我又坚持在自己有能力做成一些事情之前，必须首先找回我的笔记。或许这就是人们对“上代遗下的债务”的理解吧。最残酷的遗产总是人们强加给自己的遗产。

我给回忆录所下的定义是：琐碎的、自我封闭和不能再被划分的回忆单位，它们沉积在每一个身体里，最终在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开始导致身体的辞世。在身体腐烂过程中那些被积累起来的回忆录得到释放，为后世构成了世界和事件，后人重新吸收了它们，为了让自己再度因为这些回忆录而走向灭亡。

相似性只不过是一些片断而已。谁要是认为看出了相似性，例如从面孔上，那他仅仅是选取了某一个片断罢了。这一片断被随意移动，直到它被挪到据说与它相似的位置上。这样一来一个肘窝就变成了一块香蕉皮，然后又变成一个女人闭拢的嘴巴或者甚至是阴部褶皱（真的存在这个单词吗？）。但是促使我们去寻求这些相似性的是回忆录（见上文），当然还有我们的孤独和持久的渴望，是它们吸引我们在有必要认为所追求之人是无与伦比的，并希望能够任意复制或者重新找回这种无与伦比之间来回奔波。

必要性：在困境中能够很快转向其他事情的能力。当然这样做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因此任何必要性都总是一种注意力的转移。但是怎样才能看出真正必要的是什么呢？

过去几天里我在大街上从看上去往往是完全不一样的、往往让人感觉无关紧要得可怕的陌生女人的脸上，越来越频繁地遇见了格尔妮卡的

面孔。给我的感觉几乎是，仿佛在我孤寂的时日里，我体内那些几乎完全摆脱了现实调整的回忆录从陌生女人的脸上选取了一个细微的片断，它们把这一片断作为共性提出，为了让我想起我惦念的那种共性。（精神错乱总是与一种调整措施的缺失有关。天才也是如此。当然也包括爱情，它在这方面做得更加巧妙，假托拥有调整措施，然后让自己选择的对象不受限制地击败这些措施。）

我也想煞有介事地大声在大街上乱嚷些什么，尤其是想嚷多久就嚷多久，并且一再这么去做。可能在某些人看来说话（最好是大声喊叫）就是目的本身，因为说话只有通过自身才显得重要，才不具任何交际意义，因此说话也就不会在“被听”中实现自我，或者在一种回答中成为多余。

地点比人物存在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回忆起的却全都是人物，仿佛我们只能够以不同变种的形式感知我们自己。人在感知方面比任何动物和植物都要显得更加头脑狭隘，它们（动植物）把我们缩小成素描画，八倍成蜂房里的蜜蜂，或者把我们感受为热场。对于动物或者植物而言，我们至少是另一种它们逃离或者接近的动植物，而我们却只回忆起相同的对象，也就是我们自己。马脖子谦恭的弯曲让我回想起字母B，同时长长的睫毛和看似无动于衷的眼神以及母牛也有的同样的眼睛又更倾向于是字母A。垂死挣扎的蛾子在厨房地面上旋转，这种运动我是从字母C了解到的。乌鸦在鸣唱时昂起的头像是字母E。孤零零生长但又骄傲地立在那里的山楂树像是字母D，等等。在一切当中我们都会发现一种运动、一个姿态、一次脸部的表情变化，因此我们会立即喜欢上整个一种物种或者人种。

宁肯用隐喻和象征使整个世界超载——并以此保持世界之于我们的可支配性（因为可解释性）——，也不愿把他者真正察觉为是不一样的。

这条街道，这种味道，太阳，风，黎明或者黄昏，一个女人飞奔而过的身形：这种令我们忧伤的场景是对我们行为的报应，因为我们在一种平均化过程中使泥土听命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不断重新把我们自己排除在外。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相同的，最终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说

也变得相同了。（这就跟解释上代遗下的债务一样，通过随后对之不予评价，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变得同样有效，直到我们自己对自己都无所谓了。）在一切当中我们只看到一个面孔，直到云层像是一层变成黑色泥煤的泥土一样非常近地从我们头顶飘过，现在我们在这层泥土下面长眠，变成跟泥土一样的东西，而此前我们曾尝试使泥土化为我们。

每次当我外出的时候，我都会经过一家在此期间已经关门一个多月的空荡荡的立饮咖啡店，从橱窗里仓促之间被丢下的面包筐身上，人们能够观察到造型和配色方面最细微的变化情况。灰尘慢慢渗漏到柜台上，也渗漏到那个印有令人无法理解、难以辨认的数据及工作日代码的灰色纸板箱上，它否认了自己最初作为盛装聚酯纤维衬衫衬布的功能，上端的棱角被磨成了圆形，开口朝下被挂了起来。因为春天的阳光松开了窗户上四根霉绿色绝缘带条中的两根，所以外面的路牌以同驶过的多轴车相同的步调在屋里发黄的那堆日报上晃动，一位可惜已经死去的艺术家只要在捆报纸的绳结上固定一个用红色封蜡制成的十字架就行了。

尝试使自己熟悉作为我绝对反面的英雄形象。英雄正在朝一些东西移动；悲情英雄比如说正向他失去的东西移动。他是一种更加深刻的思想、原型、神话形象等的代表，但我自己却不允许知道，为何他表现得这么无望和笨拙。相反，英雄姿态刻画的却是非英雄特征。归根结底英雄别无选择。他的英雄气概是添加上的，因为我们把一种选择强加于他。或许英雄气概不是别的，而仅仅是对自己欲望的错误动机的信奉。英雄声明，为他人表现出和为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正如我从自己身上所能看到的，不采取英雄姿态，表现得无助和笨拙，这样做还显得不够，因为我了解英雄本来的情况，所以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英雄。英雄的历史不是被书写出来的，而仅仅是被记下来的，它的强度和明确性体现在事件的发生过程中。英雄史诗与恐慌性黏液可以相互比较，被一只乌鸦从浸软的耕地里拖拽出来的蚯蚓通过分泌这种黏液，警告所有在它身后跟过来的蚯蚓勿要重蹈它的覆辙。

引人注目的是，一旦人们在哲学领域要谈及一样物体，被援引的例子大多都是桌子或者椅子。难道没有桌子和椅子这两样东西，哲学根本就不再是可能的了？

从这种意义上讲“首先”这种套话又意味着什么呢？究竟有没有在所有事物之前就已存在或者在这之前就能被想到的东西呢？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创立了以下“使对立具体化的十八条定理”：

0. 跟我们相反，或许物体承认它们是有边界的，并默默地坚持这一看法。虽然它们能够讲话或者飞行，但它们却刻意不这么做。有时物体会同情我们，暂时对我们优于它们的愿望做出让步。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念力或者普遍称之为奇迹，把物体对我们狭隘性的让步归功于我们的能力，我们把这些能力描述为“超人的”，对此“物的”或许是一个更为贴切的表达，因为超人的就是物的。

1. 对我们来说物体经常显得粗糙和静止，但是不恰恰是它们比我们更拥有变革的能力吗？而我们甚至连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无法修正。此外物体的变革能力不恰恰在于它们能够随时被改变吗？而我们却往往拒绝被改变，甚至把被改变解释成一种软弱的标志。我们认为，改变必须是内生的，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改变才是自我反省和意志力的表现。但是我们认为的内部变化或许只不过是同一个东西在时间交替中的稳定？我们不应该像物体那样过渡到更多的让自己从外部发生变化、把注意力转向外部、就像我们一生中可能只有唯一一次在爱情里所发生的那样吗？简言之：物体不发生变化，是因为它们没有看到变化的必要性，但它们随时能够被改变，随时愿意奉献自己。（谁能付出更多的爱，是改变别人的那个人，还是让别人改变自己的那个人？）

2. 物体的思想就是它们在空间里的形态。

3. 物体的爱就是它们能够被改变的能力。

4. 我们一直想知道一个物体里面有些什么，我们检验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是封闭的还是敞开的。我们从来不看在物体形态以外的是些什么，尽管我们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在那里。（正如答案可能总是处在待解决之物以外的地方，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来对付我们自己，同样也不能用仇恨制服仇恨，或者干脆一吐为快，用爱情解决爱情。）

5. 对女性具体化的批判难道不是在对物体女性化的过程中达到了出人意料的高潮吗？一种生物具体化的可能性不恰恰证明了它有能力去爱、去奉献，更有甚者，有能力去存在、去在自我中存在作为现世存在吗？

6. 人在寻找物体。衡量一个物体价值的标准是，人们须以何种迫切的程度寻找它。人们不必寻找的东西，也就没有任何价值。

7. 物体什么也不寻找。衡量一个物体内在价值的标准是，它寻找人的必要性有多小。如果一个物体大量存在，它就好像是在找人，这样它就不具任何价值了。

8. 虽然是人自己赋予了物体一种价值，即通过他寻找这种物体的劳动，但他好像恰恰是通过寻找受到该物体的制约。人与物体关系的矛盾性在于，尽管他首先通过寻找创造了物体的价值，但他无法再摆脱寻找过程、由此也就无法再摆脱物体对他的价值性，因为他对物体的感知不是通过观察、触摸、使用等，而是仅仅通过他的寻找进行的。一旦他占有了物体，他就不再把它感知为物体了，而是把它感知为自我的延展，感知为是有用的，很快又会感知为是无用的。

9. 此外就连人的思想和言语好像也与物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能够非常形象地通过以下情形得到证明：在德语中我们怎么也想不起一个人的名字，还在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突然不由自主地把他描述为是物体的，在此需要强调不是描述为物体，而是用第二格（相当于汉语“……的”）描述为物体的某人，仿佛我们与之相连或者等同的物体还在它自己的属性和特征形成之前，就已经在我们头脑里出现了。如果人以一种这样的力量和欲望到处寻找物体，以至于他找到的是物体自

身而不是被寻找的人，那么这无异于就意味着，人总而言之通过他的寻找才创造了物体。

10. 人对物体的创造也是一种对它的清除，因为人通过寻找过程创造了物体，但这种寻找过程是以被寻找对象的不存在为前提的。

11. 但是赋予物体价值和通过寻找清除物体不会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最终归结于找到了物体，而是更确切地说归结于对物体的废除。对物体真正价值的失望就在于找到了物体，价值仅仅通过寻找过程被创造出来，因而也只在寻找期间才得以持续，在物体被找到时价值就消失了。对在寻找过程中被清除的物体真正价值的失望在物体被找到的瞬间得到了体现。找到是寻找的目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有用的虚构，也就是说是一种不真实的假设，它通过佯称一个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目的，启动了人在与物体的关系中所固有的一种无意识过程，如果不佯称一个虚构的目的，这种过程是不可能发生的。

12. 如果寻找者的假定在找到时与现实不相符合，寻找者就会断定，他的假定涉及的不是被找到的物体，而仅仅是被寻找的物体，这样就产生了使对物体的清除超越为对物体的废除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人在寻找物体，但却不想找到它们。谁要是在汇聚成对想要找到物体的幻想感到失望的过程中创造了物体，那他实际上就是清除了物体；谁要是在寻找物体，但却不想找到它们，他就废除了物体。

13. 想要废除物体就意味着，把自己排除在所有社会及语言约定过程之外，因为好像离开了找到的意愿就不存在寻找过程，尽管那个在寻找而又不想找到的人考虑到了人与物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却没有假借一种只是看似逻辑的构想来掩饰自己的行为。人与物体的关系看上去几乎是更为原始和更具决定性的关系，而人与其他人的关系都是在模仿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14. 仅仅通过寻找物体而不是通过找到它们来创造物体的价值，因为大多数人都忍受不了对他们这一幻想的失望，所以他们无法成功地使清除物体演变成废除物体。他们更多的是复归到一种移除物体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把其他人找到的物体移除掉，为了把其他人重新开

始的对从物体上被移除的那种东西的寻找侵占为价值。认为寻找的价值就在于找到，因为对这一错误假定的失望，他们失去了先前存在的个人寻找（作为一种清除物体的形式）的价值，用通过他们对物体的移除而引发的他人寻找的价值取代了这种价值。因为是移除者招致了对被移除物体的寻找，所以他不仅能够把这种寻找的价值据为己有，而且也同时能够醉心于这种幻想，即这一价值是直接通过他对物体的移除，而不是间接通过移除物体引发的他人对物体的寻找产生的，这给令他感到失望的幻想（物体的价值在于找到了它）提供了新的养料，因此他现在认为，对于寻找的失望不在于找到了物体，而在于他找不到这个物体，因为另一个人在他之前找到了它。

15. 对物体的移除可以直接通过抢劫或者偷窃，或者隐藏在广告、有奖竞猜和拍卖活动中、最终以不同形式的购买而发生。通过移除物体来创造物体的过程孕育了这样的幻想，即仅仅是人们自己在找到物体方面失败了，而寻找的普遍意义好像仍然存在于那人们估计但却发现不了的地方，即找到物体，因此偷窃和消费、无论以何种形式对他人物体的侵占就成了一种基于速度和进步的社会结构的重要稳定因素。（因为通过一种循环论证，活动和进步就被解释成一种寻找物体过程的结果。）

15a. 最晚从这里开始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与我们对爱情的想象相似的情况，因为我们在此探讨的也跟一种假设的保存形式有关，这种假设的重要性好像是生活必需的，尽管它被体验为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是总在爱情上受挫，如果我们不是尽管如此还认为，现实中肯定有一些与我们对爱情的想象相适应的情况，只是这些情况发生在其他人身，因此我们将来不再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爱情上面，而是专注于其他人的爱情，根据各人不同的天性，我们现在开始尝试去掠夺、收买或者毁灭他们的爱情。

16. 然而那些移除物体的人不仅替换了他们自己失去的寻找意义，而且还助长了另一些人失去的寻找意义，这些人面对的是找到的无意义，在他们的寻找过程到达某一终点之后，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被移除物体的缺失，他们往往陷入重新置办的状态，人们错误地把这种状态

描述为想要重新发现的状态，尽管被剥夺者事实上很高兴，因为他不再对自己发现物的无意义感到失望，能够重新开始寻找过程。

“幻想”（Illusion）这个词的字形难道不是很奇特，以至于人们禁不住要产生怀疑吗？

我想象：我一直活下去，直到有一天我瓦解消散。我的生命是一个不断积累思想、经历、概念、主意、情感、观点等的过程。我什么时候能停下来，这其实是每一位收藏家最高兴的事情，为了从容不迫地欣赏自己收集的东西，除去罩在它们身上的灰尘，对它们进行修复呢？原因难道在于，我不能把自己理解为藏品，我的身份开始动摇，我更愿意总是继续吞咽一切，因为我不允许成为藏品，而是只能作为收藏家，不断处于运动之中，为了在某个时候变得空虚，然后在我的藏品当中垮掉？

就像是默契使然，那个平时很安静的家庭在过去几周期间关门的声音好像比以往更大，在它通知解除寓所的租约之后。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解脱啊，不必再需要某物，因此把它用坏，也就是说能够利用它：一件物品，一段友谊，一次恋爱，一个婚姻。只有人们不需要的东西，人们才能够利用它。

云像脱纱的纤维一样向四处分散，挂在细细的雨线上。我想向云挥手，就像一个孩子站在高速公路桥上向下面的汽车挥手那样。父母需要他们的孩子以使自己变得童真，对于这样的父母我说了些什么呢？他们牵引着孩子的小手说：“看下面的汽车”，等长大以后人们只可能往下面扔石子了。

总要不断地去往某处，这一经验使生活变得如此糟糕。这些单词必须组成一个句子，然后它们的确也不断地组成句子，阴茎在阴道里的抽动应当导致射精，疲倦导致睡眠，饥饿导致饮食，饮食再度导致恶心、把呕吐的东西冲洗干净、把垃圾清理掉，直到我们在这种组合中只能想到死亡，生命正在缓慢地朝着死亡游移：只不过死亡不再会有任何后果了（至少人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或者只会有对其他人

而言的后果，这会让人平静下来。这时候宗教开始施加它的影响，夺走了无后果死亡带给我们的慰藉，宗教假托想要忽略我们行为的后果来安慰我们，总归它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相反，我们一下子要对自己行为的目的性负责，因为据说是我们自己掌控着我们死后的轨迹，可其实我们连现在的人生轨迹都无法决定。

如果我们停止在自己的行为过程中总去偷看后果，那么一切都将像是奇迹一般，我们会像牧场上的奶牛一样驻足，惊叹自己竟然还存在着，在所有其他同类当中。因此语言和人的发展或许只不过是一次牵制行动，从中似乎是作为副产品，形成了那种我们也为之自豪的所谓的对自己必死性的意识。

采购：这是何等的发明！在回家的路上天开始下雨了。起初空中划过一道闪电，然后是透过六月阳光的小口子，就像不留血痕地仅仅割断皮肤表皮的锋利纸张上的切口一样。停下脚步，眯起眼睛抬头望天，看是否至少有几只甲虫或者蝗虫作为某一平行世界残余的祸害正向我们挤压过来。

我找了个地方避雨。雨水落到几只被儿童的跳跃和醉汉的脑袋撞出凹痕的垃圾桶上。在均匀的降落过程中，蒙蒙细雨背景处的远景像是在人的错觉中一样颠倒了过来，在错觉中那些刚才还指向观察者的立方体，现在却变得空洞和虚幻了，楼梯摆脱了半搭在它们上面的脚，古希腊双耳陶瓶把自己转变成两个人的剪影，他们面面相觑地沉默着，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沉默中他们变得彼此更加相像了。他们仅仅是被翻开的罗夏墨迹检测图片中的一页，他们不再关心自己是谁，而仅仅是由分割线所决定。他们的相似程度越高，他们就会越沉陷在背景处，与此同时位于他们之间的作为裂隙的东西却强烈地决定性地向前涌来。这难道不是对爱情的贴切描述吗？通过相互适应，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构造出我们之间那道对称的裂缝，直到那只酒杯出现，从杯里我们喝下苦涩的毒人参酒。爱情也似一杯毒酒：我们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就会窒息而亡。

开始以其他方式来描述过程，为了改变我对这些过程的感觉。不再用由骄傲（认为自己的身体总归有能力描述经验，也就是说并非一切都

是它想象出来的)、讽刺和纯粹的格伦·古尔德式的惊恐交织成的复杂心理来审视我腿上的蓝色斑点，而是直截了当地声称，恰好是血红蛋白经发酵之后把自己转变成青绿色的颜料。

当我在湖边睡着的时候，她拿起铺在我身下的桌布，把我连人带桌布慢慢地拖进水里。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漂浮了起来。我睁开眼睛，搞不清楚自己仍在继续做梦还是已经醒了，醒来的感觉是这般奇特。就连湖水涌进我嘴里时，我也不是特别肯定。当时我正在写一则模仿洞穴比喻的寓言。它讲的是一些鱼儿，它们从水里跳出，但总是因为高度不够而无法看清水面上的东西。如果它们想在空中停留更长时间，为了查明水面上那些模糊的东西，它们就必然会死去。两年后我又一次拜访了她。我们带着她六个月大的女儿驱车去同一个湖边，在那里绕湖转了两圈。在她当时趁我睡觉时把我拖入水里的那个地方，至少我认为又认出了那个地点，她用双臂把孩子高高举起并旋转起来。阳光从她女儿光秃秃的小脑壳上滑落，射入湖水里。我弯下身子捡起一颗橡子，摘去它上面的菌盖，菌盖正好能扣在婴儿的鼻尖上。最先有的是巴门尼德还是上帝呢？最早的哲学是宗教还是总是训斥呢？

一旦被写出来，我就把这些句子看作是内容空洞的。最高程度的抽象就是：变得内容空洞。内容空洞注定要成为永恒。它（内容空洞）比我活得长久。

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偶然来到一栋房子里，房子里有一个地方博物馆。展览室由唯一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组成。展室中央有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满是灰尘的这个村庄的模型。小路和街道。在运动中被冻结的小人造型。回忆看上去跟其他地方的没什么两样。比伯里希和卡斯特尔以及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道路。比绍夫斯海姆，古斯塔夫斯堡，金斯海姆。在朋友家和他们的父母坐在同一张桌边别扭地共进晚餐。坐火车返乡。当我十点半在黑暗的房间打开折叠床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戴夫·派克的专辑。

我穿着补过的袜子、一件旧衬衣和一件有磨损的套头毛衫。在我的柜子里放着新袜子、一件新衬衣和一件新的套头毛衫。我穿旧的东西，

为了不把新的东西穿旧。当我从抽屉里取出旧袜子时我在想，只有在值得的时候我才穿新的。

门开了。女人走到一个行列式住宅小区外面的路面上。就像以往的十一月份那样，天空在七点半就已沉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朝向结冰花园的阳台窗户没有挂窗帘。山谷里数米高的吊车立在未完工的混凝土墩柱旁边。人们在下午喝咖啡和利口酒间隙就会向那里望去，在这一周像是被一小间售票处放下的卷帘隔开之后。过渡仪式。被四面的停车场框住的训练场地。为研究在公共区域吵架夫妇的姿态而搭建的蜂房。被打掉的车辆尾灯。孩子们站在小水塘四周。一块刻有名字的木头从眼前滑过。我不让人们注意到我轻微的窘迫。

在恐慌中那种正常、有序的世界会让我平静下来，也就是说它与那种归根结底引发我恐慌的要素并无二致。

我的精神错乱或许表现在，在其他丧失理智的地方，我却保持得非常正常。这种情况不是游戏性或者试验性的联想活动，而是客观事实，在这样的事实中我能够感受到的不是别的，只有完全的正常性。

我用不同的步态移动着穿过房间。在此过程中我想象不同的动物。一种蹑手蹑脚的行走，盘旋而行，滑行，拖着行走。我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塞满了骨头和内脏的袋子，无论是盛装生物降解垃圾、废纸还是残余垃圾的垃圾桶都不对这样的袋子负责：因此我只得继续前行，直到永远没人理的垃圾场。中世纪的生活感受，生活的不公正以旧约全书式的风格得到了鞭挞和刻画。年仅二十岁就已经在满口无牙地出声地喝着面包汤，得了腺鼠疫和脓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发展出一种思想呢？（或许是唯一的幸福。）一种匍匐而行，爬行，蟹行，佝偻着身子行走。我作为生命在生物进化及隔代遗传性的跳跃式演进过程中的创造和总和。避开卧室。一直低着头，直到我耳朵里发出像是海浪澎湃的轰鸣声。尝试和波涛一起骑在浪尖的里侧，尝试用比说话更快的速度来进行思维。用城市名和国名来替换句子。委内瑞拉。老施泰滕。我又开始迟疑了。（更深的含义？）让自己转向另一个方向。避开浴室。加拉加斯。世界就是象征。这个世上所有的城市都只说一句话：我爱你。其他人现在可能正从任意某处偷来一首旋律来配这句

话，可能已经创作好了他们的流行歌曲，而我才刚刚开始这方面的努力。

沙丘后面是周围栽有小块菜畦的房屋。还没有进到村里，储蓄所门前就已经有五个男人站成一圈。屋顶窗开着。下面是穿着短裤、撞破了膝盖的八岁孩童。面包店橱窗玻璃后面的一扇遮光帘在咯咯作响。周三下午面包店关门。在空的玻璃柜台上放着一个边缘被折起的纸质尖头面垫。

肯定有治感情冲动的泻药、通便剂和催吐剂。这将会起到真正的净化作用。为什么通常每天夜里心脏会跳得这么快？因为有一些东西想出来但又出不来。与此相反人们又往里面填塞了一些东西。因为医生给我开的安定药都用完了，所以只能服用缬草属（人们在18世纪还把它当作兴奋剂开给病人）。

我向下打量自己的身体。我在盯着身体看而不是在看我。为什么器官没有在皮肤上设置一些检查站，这样每天早晨它们就可以很快巡视一番，为了不至于非得每年一次问心有愧地逃避那种体检恶作剧。为了与汽车工业的发展保持同步，人的健康系统也在不断地膨胀。被全德汽车俱乐部及其修配厂培训过的客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人们对自己的身体也无能为力了。没有相应的工具就更谈不上这一点了。如果说在汽车身上还能体现出物种多样性的话，虽然在外观上这种多样性只能从尾灯边框上看出，那么性别之间的差异则只局限于乳房X线照相术和前列腺医学超声检查了。

这些在六十年代被粗制滥造的四层高的板材建筑，证明了脆弱之物奇妙的坚固性。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人们将会领着旅行团参观我们的街道，然后那些游客将会摇着头断言，人们当时是多么富于冒险精神。当年因为发展水平的地下人们只得铤而走险了。人们不禁会把这种情况与铅质的酒器进行比较，不禁会想起用水银作为治疗梅毒的药物。

在粘有糨糊的油毛毡上进行平衡动作表演，油毛毡下面涌动着混乱不堪的情景，就像我们体内那种不可驯服的呼唤永恒生命的转嫁法。在

修辞学里转嫁法是一种语言形式，它把对于一些事情的责任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在医学里情况也是如此。（“什么也做不了了。一切都充斥着转嫁法。”）不，说得更好一些，至少这一概念也具有了一些后现代气质：人们转嫁责任的形式本身又变成了责任载体。人们用来相互沟通的工具即语言本身又变成了令人无法理解的东西，等等。

空气里有一股味道，仿佛在某个地方正好有一家中型企业被烧毁了。自从消防人员在18世纪初发现可以用水作为灭火工具、这样就不再只是一味地挖坑以阻止火势以来，这种情况的发生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即塑料和合成橡胶一旦被点燃，就不会再受到水这种初始元素的解毒力量的影响，直到它们大摇大摆地让自己完全熔化为止。就跟每一次进步过程一样，未知元素也同时把自己创造了出来。最后一切又回到了发展的起点：火焰接受物体，给它们空间，让它们烧毁，对财产不抱希望，对生命也是如此，与自然暴力协调一致，后者至少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奇妙的终结，当它们把我们刮到空中打旋、跟雪崩一道拖泥带水地把我们卷入山谷的时候。据说上帝是不存在的，因为整个家庭或者村庄一下子就被清除了？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这就是唯一有说服力的证明。

然后是那种信誓旦旦的个性，而我们则蹑手蹑脚地穿过城市，就像穿过一家管理非常完善的康复中心一样。下一次应用个性是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我真的有一次从内心向外看，而不是从外部打量我自己，尽管我的精神很乐意把我想象成是它的傀儡，那么生命这种东西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是那条穿过我体内、让我抓着它双手交替向前移动穿越所有时间和地点的绳索，那么我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呢？或者那种斜穿过我体内的铁棍的形象难道不是更恰当吗？在和其他人玩桌上足球游戏时我总是想着同样的问题：用我的封闭型腿我究竟能不能踢到球？如果人们总是只围着自己转圈，这也能被称之为运动吗？

即使人们尝试从其他人的日记里了解到一些关于自己的信息，人们在那里只会找到一些关于迄今为止人们还不认识的人，也就是所谓第三

者的信息。但是人们自己在那里从来不会被提及。（其实对于自己的日记来说也是这种情况。）

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以赛亚书》44: 9）人们不应当过于表明自己的关切，如果人们不想马上出卖自己的话。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异教徒和他们的神像是多么不幸啊。但是被唾弃的部分又经常会翻转过来。在阅读完《以赛亚书》之后我想成为异教徒。当然不是一名从民族意识出发而到处呻吟的新异教徒，而是一名处于整体和同一性世界中的异教徒，当宗教信仰还不是与异教不一样的信仰时，当整体虽然也是错误的，但却错误得不一样并且不知怎的要更加毫不在意时。因为就连以赛亚也把异教徒描述为是百折不挠的人：他伐木取材，用其中一半木头生火，以便烤面包和炖肉，而用另一半木头雕刻了一具神像。异教徒这么做不仅直接向帮助他获取食物和温暖的那个人供奉了祭品，此外他还通过使保存他生命（即身体）的一部分成为神的映像，保留了它神一样的特征。他没有使身体与精神相分离，没有让祈祷与进食相脱节。对于基督徒来说神就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神是自上而下被赐予他的，神作为吗哪（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落到凡间，对他进行管束。

就连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也能想象，只要我感受不到这一点，它就算不上是高深的艺术。例如我能够想象，我的思想和用于推想的全部力气，其意义仅仅在于安慰我的心灵和转移我的情绪。我完全可以这么认为，只要我也感受不到这一点的话。一旦我感受到这种思想，它就会直接导致身体的虚脱。

心神经机能症是那则古老的疯子笑话在身体上的改写。（医生：但是您知道您不是老鼠。疯子：但是否猫也知道这个呢？）当然我知道，还没有人死于心神经机能症，但是否我的心脏也知道这个呢？（通常情况下这种考虑，或许我得的是其他疾病？会让症状显得合理，这些症状的阴险之处就在于欺骗人们。最终真正阴险的却是：那些因为应发生但未发生而显示出的症状。）

如果心身医学继续取得进步，不久就将发展出另一种器官语言。长着大鼻子或者粗脖子，这对于身体而言很快就将显得过于平庸了。在被分析化验和被人们所意识到之后，疾病将依循另一种系统，重新摆脱人们对其采取的行动。如果无意识真的据说就像一种语言一样被结构化了，那它从来就不是我们所操用的那种语言。它是他者的语言。

（因此也就只能用来描述身体，只要身体是他者的身体。）也就是说更确切地讲：无意识就像一门外语一样被结构化；即就是说我能够接近这门外语，但永远也不会掌握它。它也许是我的母语，我指的是我母亲的语言，我的母亲语。（祝福！祝福！我母亲的语言在我父亲的国度里从我的嘴里喊出。祝福！）

对联想和感受以及对非理性同情的分析，恰恰不是对它预先确定要阐明的对象的分析，而是对精神的安慰，因为精神觉察到自己无法以一种清楚易懂的形式支配思想和情感。它（精神）建立了一种象征语言和联系史以取代它无法支配的那些东西，以此使自己继续远离非理性，它在自己内部持续感觉到非理性的跳动，但却不知这样的非理性指的是什么。

我发现了一条新的通向艺术的通道：我欣赏丢勒的名画《祈祷的手》和《兔子》，我听《小夜曲》，紧接着又听披头士乐队的《顺其自然》（Let It Be），然后我阅读《摩西十诫》。做所有人都做的事情，知道每个人都有的东西，从最陈腐的事物中得知我存在的柔弱的灵魂，这是一种多么神化的感觉啊。

我越来越频繁地在装有栅栏的电视商店的橱窗前度过晚上的时光，在那里我盯着不出声的电视机荧光屏，上面以白南淮堆叠式先锋艺术风格播放着丰富的电视节目。站在我旁边的是移民家庭的孩子们，他们是从人员拥挤的收养所和住房里被赶出来的，就跟我是从我空荡荡的家里被赶出来的一样（世上没有平衡）。晚春的风从远处的雷雨那儿吹来一些热气。它闻起来到底还是像我们童年时代那些小村庄的味道，我们所有的人都尝试逃脱那些村庄——无论我们事实上是在哪一栋高楼里长大的。因为无声的电视影片我们好像也同样变聋了，但是我们当中谁也不想逃离这种聋哑状态，回到自己有着固定轮廓的语言

领域，于是我们感到我们之间共性的纽带受到了这种最轻声话语的威胁，以至于当我们中有人离开他的位置时，其他人连目光都不会从闪光的布里洛盒子上移走，作为告别的姿态他们仅仅是把放在两腿之间的塑料袋夹得更紧一些。

一夜一夜地我熄灭灯，沉陷在地下的一個石方里。我四周都是些假门。它们不是为了迷惑盗墓者，而是为我的灵魂设置的。灵魂缓慢地从我的身体里爬出，若有所思地坐在床沿上，向那些门看去，在给自己设想一条逃跑路线，以便向上去往自由和没有世纪约束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枣树和无花果树在蔚蓝的阳光里静默，风轻轻拂过我的女伴们裸露的肩膀。但是灵魂太狡猾了，以至于它不会朝其中一扇门走去。它只是简单地坐在床边，每天夜里都重新开始。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不再这么做了。

屋前花园里发炎的甲床在边缘处流出的脓液滴进黄色的水仙花里。前面是皮屑脱落的皮肤，上面铺有嵌着开裂的焦油气泡的路面。马路后面是带有发红、渗水和结痂损伤的板材建筑，每天晚上天空软骨的复发性炎症都会从这些建筑上空飘过。行列式住宅的窗户带着肿胀的眼睑凝视着夜晚。黄色的厨房灯光作为颗粒状的分泌物从木质十字架和窗帘之间照射到外面。蕨类植物的维管束套圈盖满了后院的茧皮。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路加福音》5: 23）尝试借助话语行为理论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上面两句话涉及的分别是以言行事行为还是以言成事行为呢？此外把这两句话对立起来进行相互比较，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动物种类从树林里消失，饼干品种从货架上消失。这就是市场规律。结实有力的人会要求名望和酒精。他想健康地生活，想由医保公司负担费用让有害的毒素从体内被清洗掉，然后他又想毁灭自己，因为他把自己感受为是一种构造，也就是说没有绝对存在的必要。谁要是达到这种反省程度，抱定一种坚定的信仰，他就会被赐予祝福。

证明上帝的存在被指点参阅上帝的神谕所接替。人们注意到举起的手指，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里大量出现。很快人们混淆了手

指和手指指向的月亮，就像禅宗里所说的那样，于是上帝就消失了。

走到一件事情的背后：有时我甚至连来到一件事情的前面都做不到。

高度赞扬这名法国浪荡子，唯独他从持续稳定的状态中看出一种经久的烫发发型，从看不透（不可渗透）的东西上联想到一件雨衣，对他本人来说天主教的临终涂油礼就是一次临终敷圣油，生命的全部苛求即使在生命逝去时也不会停止，并最后一次在这个单词里得到了显现。

他什么都知道。甚至知道何谓死亡。因为他当时作为便衣警察开过救护车。

相比那种看不见的东西，就像如幽灵般出没在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中那样，他自己的隐身却令人怀疑叫人害怕，因此很快他就要求得到漂白薄纱布，为了用它把自己缠绕起来。因为对我们自己来说看不见的东西必须是可视的，神圣的东西必须是公开的，所以它对我们而言只存在于对其本身的参照之中，也就是以隐身帽、漂白薄纱布和藏匿者的形式。

蠢人们在建造市政厅时忘记了安窗户，相反他们却想到了这个主意，即把光线装在袋子里抬进室内，在墙上打洞作为透气孔，为此人们必须要责怪那些蠢人吗？他们内心难道不渴望一个不被破坏的空间、那种封闭的空间、那种盖在我们世界上面的玻璃罩吗？我们不也总是怀有这样的渴望吗？

总有一天人们将在那些修建隧道和修建桥梁的文化之间进行区分。

帽子使人们能够在相互交往中确证某种恭敬，也就是说通过人们在彼此相遇时脱帽的方式。即使在好朋友当中，短暂地触碰一下帽檐也同时是尊重和亲密的信号。脱帽的不同程度描摹了社会等级，塑造了不同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有那种暗示性的触摸帽檐，它指的是手虽然朝帽子方向移动，但并不真正触碰帽子，然后是真正的触碰帽子，而这又有长短不一的触碰时间。接着还有那种暗示性的稍稍

脱帽，它与长时间碰帽的区别不是通过帽子的运动，而仅仅是通过手势表现出来的（在触碰帽子时是食指冲前、手棱朝帽檐方向移动，而在稍稍脱帽时手以僵硬的抓取动作朝帽顶方向移动）。脱帽的不同程度从触碰帽檐、暗示性的稍稍脱帽、四分之一度、二分之一度、四分之三度稍稍脱帽一直上升到摘下帽子，后者又再度被细分为不同的时段，在这些时段里人们把脱掉的帽子举在头顶，或者把脱掉的帽子伸向前方（不鞠躬和鞠躬），或者把帽子完全摘掉放在胸前或肚子前面，并同时鞠躬。男人和女人对待帽子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因为女人们在问候时不摘掉或者触碰帽子，即便在教堂里她们也是戴着帽子坐在右侧，而男人们则摘下帽子在左侧就座。女人的做法让人觉得仿佛帽子不是变化不定的附属品，因为一旦她们戴上帽子，在公共场合就不再改变它的位置了。相反男人则把帽子用作是保护性头盔，但却愿意在问候时以细微的程度变化放弃这种保护，并在特定社会约定的框架下把自己移交给对方。

比德语中所有其他语言变革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在使用表示“知道”“认为”和“相信”这样的动词时引入一个部分语助词。也就是不说“我认识他”，而说“我知道他的情况”，不说“我知道这是什么”，而说“我知道这种情况从何而来”。

人们怎样才能认真地希望活得“更有意识”？它里面应当包含何种希望呢？生活得更加无意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而简单地活着，这难道不是一种真正的愿望吗？你们看这些百合花，即使在赏花的时候我也禁不住要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偷师鲜花的一些东西。

没有疑虑和异议。一种就像是在民歌里的生活。《那肯定是正派的米勒》或者《上帝想给谁真正的恩惠》，就这样一直唱下去。规定事项非常简单，然后人们就出发去往广阔的世界。奇特的是，我在第一刻想到的竟然是，那首歌的名字叫《谁想给上帝真正的恩惠》。语言不会把自己放错位置，也从不会被迁移，但如果涉及的是这种情况，那么词汇之间会非常相似，只需更换一个字母就能远离一种致命的误解。

吉卜赛人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法里亚法里亚胡。这是民歌的另一种智慧，它通过运用拟声法而对上帝的赞美不加理睬。每一首有内涵的歌曲早晚都会爆发成一种“嘿呦，嘿呦，嘿呦”。人们甚至都不清楚这个词应该怎样拼写，因此它涉及的不可能是上帝的词语。上帝不要求灵魂爆发为这种反复用常声和假声的调子歌唱的形式。西姆萨拉 巴萨拉 杜萨拉 蒂姆。《吹拂的风》的革命元素。

极度幸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下午时光伴随着一轮城市、乡村、河流的世界结构化进程而流逝。但是很快这三种结构元素就显得不再够了：名字、动物、植物、职业和演员必须补充进来。但是这样人们建造不了世界。人们是用城市、乡村、河流来建造一个世界的，并且是按照红、白、蓝，或者是按照黑、红、金的顺序。这就是我认为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三角旗欢快地在其他三角旗上随风飘动。他者在遇到人们后也马上跟着融入一种远离上帝的模糊不清的说话当中：顿雅，顿雅 提萨，巴斯 玛达 瑞姆 特瑞姆 科迪亚尔等等。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流行歌曲爱好者喜欢带外国口音的歌手的原因：歌的内容变得无法辨认，但那还是自己的语言，也就是说他们不必拒绝他者，不必接受自我。（马略卡岛效应。）

既然已经谈到了民歌这个话题：爱情就像熊身上的污垢一样黏糊糊的，人们无法把它从心里清除掉。熊使粪便显得高贵，仿佛人们是在狩猎大型野兽时踩进了粪便。不过现实却要乏味得多：爱情就像鸽子粪一样黏糊糊的，人们无法通晓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想象，人们以前是唱着歌坐在营火旁规划未来的人生，后来就坐在电视机荧光屏前面了（在我已经八岁那年我们家买了第一台电视机）。当时电视里几乎没有广告，看电视的时间反正也被压缩在半小时以内。尽管如此几十年后有时我一直还能想起当年看过的节目：《够了，只可惜这件漂亮的棉衬衣》以及《给一名男子一块柴郡干酪》。

然后人们长途步行，边走边唱得有模有样，并把手伸到一个崭新的烘制华夫饼干的铁模上，让它发出咝咝的声音。另一个人精神恍惚地在

和草地上的一只蝗虫聊天。浪漫派的理想看上去究竟是怎样的呢？它是肺结核、渴望还是躁狂症？浪漫派把古典的东西称作是病态的？还是它根本就不提及后者，以此最终赞同古典派，而把自己视为是精神错乱的？（如果这样那么我就是浪漫主义者了。）

要求归还被他人占据的财物：赐福给那个能够自称出于工作原因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吧，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啊！

死亡状态里蕴含何种解脱性的献身精神？终于不用再节省体力了，而是让自己筋疲力尽地倒下，先是进入坟墓，然后来到熙来攘往的蛆堆里。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美食。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以及来自沙尔阿基先生的问候

我们穿着衣服睡着了，当沃勒和其他人第二天早晨来到房间的时候。他们带来了罂粟长条饼干和撒有盐粒的棒状糕点以及可可饮料。奥尔龙把一台手提收音机放到窗台上，拔出天线并打开收音机。从里面传出从电话机到麦克风的声音。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关掉吧，贝尔恩德说道，但是我禁不住想起，我是怎样总听到这样的节目的，当时我卧病在床，我母亲把收音机放在小餐桌上给我推到床边，收音机里的人们总说：向录音资料保管室致以美好的问候，因为播音员总提到录音资料保管室，人们想听的歌曲就是从那里被找出来的，与此同时他还要与打电话的人交谈。某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播音员总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那么跟着学舌，因为刚好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就像那个里泽也在鹦鹉学舌一样，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正确，不知道那句话指的是什么，于是他们就说成了：向沙尔阿基（录音资料保管室Schallarchiv的错误谐音）先生致以美好的问候。我把这种情况讲给了阿希姆听，然后我们在放学后告别的时候就总说：向沙尔阿基先生致以美好的问候。每当有人问我们，某些事情我们是从哪儿知道的，然后我们就会说：从沙尔阿基先生那儿。这件事我们觉得非常滑稽，但是现在我只觉得它傻里傻气的，生气自己现在甚至想听这种无聊的节目，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我将再次听到这样的节目，因为在寄宿学校或者教养院里是没有收音机的。即便是几名年龄稍大的学长自己动手用土豆和金属线拼凑了一台收音机，就像在给男孩子的手工制作指导教程里所描述的那样，他们肯定也不会让别人跟着一块儿听的。可能会让我听，如果他们得知我作为某一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成员进过教养院。除非他们正因为如此不让我跟其他人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我会施加不利影响，就跟我父母不希望我和戈特弗里德以及格拉尔德来往一样，因为担心他们也会对我产生不利影响。原本他们也不希望我和赖讷碰面，因为他留在了公立学校，明年要开始学徒期。明爱会那位女士说，赖讷得到了自己心爱的教育，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心爱的教

育，也不想向明爱会那位女士打听。现在我知道那样做是对的，因为明爱会那位女士总爱说谎，欺骗了我们所有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索性回家揭露这件事，因为她和来自东区的其他人杀害了那名流浪汉，虽然不是直接故意的，因为他们原本是想杀死我们，但最终这也都无所谓了。在我正想这件事的时候，奥尔龙说道：你们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把收音机音量开大点儿，因为正开始新闻播报。

新闻里首先播报的是那则消息：三名蒙面青少年在大清早抢劫了毛厄夫人的杂志和烟草制品商店。他们三个都戴着佐罗面具和披头士假发，用绿色透明的水枪威胁毛厄夫人。但是毛厄夫人不知道那不是真枪，因此她把两千多马克当面交给了案犯，这笔钱的数额之大非同寻常，因为一般情况下她的钱箱里顶多只有五百马克，但是在事发当天的下午应当有一批雪茄和卷烟到货，因此警方认为，案犯熟知这一情况，并对这家商店踩过点儿。你瞧，这些狭隘的媒体又在胡乱编造些什么，德拉龙说，奥尔龙也说：这些猪猡，因为事实上那些钱正好才四百马克，再加上几张破碎的钞票，而不是他们所报道的两千马克。是的，克劳迪娅说道，我也只索要了一万马克赎金，然后到处都在传是十万马克。这些猪猡，奥尔龙又一次说道，但是所有这些我们都会回敬给他们的。真的是你们干的？贝尔恩德问道。那当然，沃勒说。但是新闻里只报道了三个人。德拉龙在给我们望风。啊，原来是这样的，贝尔恩德说，接着又补充道：太传奇了。是的，沃勒说，必须这样，我们可不能把这种事情栽赃到你们头上。什么？我问道。不就是整个那些谣言嘛，说你们杀害了那名流浪汉，等等。

沃勒从他的挎包里取出一块字模。瞧这个，他说，你现在把你们的标志画到上面，然后我们再考虑给它配一段文字。事后我们把它拿去印刷，再在火车站和毛里求斯广场散发印刷品。但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认出你们，贝尔恩德说道。胡说，当然是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这么做，此外几名同伴也会帮助我们的。好了，赶紧开始吧。我取出那个标准A4笔记本，把带有纵向RAF（红军派）三个字母、顶端是1913这一年份数字的标志画到字模上。这看上去太棒了，沃勒说，现在必须在标志下面再配上文字。一段什么样的文字呢？不如这样写：创立于1913年的红军派对抢劫毛厄杂志和烟草制品商店一事负责。这一抢劫

事件应当暗示西德欺骗性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但是也应当暗示东德同样具有欺骗性的修正主义政策，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在谋害那些拒绝社会成绩压力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措辞。

工厂主的嗜好

没有任何海洋的深度能够没过这名工厂主的膝盖，无论他去过多远的地方，他饱经风霜的皮肤始终没有丧失对他的女秘书们的吸引力，这名工厂主正站在架在黑色页岩之间最高处的摇晃不稳的桥上。一旦他要走下桥，探照灯就应当照射在他身上。几名穿着新西服的工人在到处穿梭，出于检查之目的拍打电缆和变压器。他们戴在头上的黄色安全帽显得很不稳当，因为他们在匆忙之中忘了取出帽子里的泡沫塑料衬里。

这名工厂主踉踉跄跄地从一家小酒馆里出来。他鞭打那些在饮饲槽前面打瞌睡的马儿，直到马屁股上留下一道道堆在一起的白色鞭痕，直到它们的肌肉在不由自主地颤抖。他把擦在一起的酒桶乱丢乱放，用脚踹它们，直到它们全都经过院子的铺石路面朝谷仓方向滚去。他暴怒地跑出大门，右拳里一直还紧握着皮鞭，边走边用鞭子抽去花的脑袋。他一跃从小溪最宽处跳了过去，站在一片飞廉地中间。在继续狂奔中他不断地用左手把几米长的主根从地里拔出。他用力踢树，为了检验它们的结实程度，终于找到了一棵，它最高处树枝的粗壮程度足以经得住他的重量，并在这棵树上上吊自杀。上吊过程中他大声喊叫，吐出胀得发青的舌头。我拿着从我的玩具消防车上扯下的小梯子跑了过去，可是梯子太小了，甚至连树根的第一段末梢都够不着。他的阴茎在血液的最后一次沸腾中冲破了裤子，向着天空裸露在外面。我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这只是场梦，而工厂主则从高处吼道，出于对他以及对他的死亡的敬意，我应当唱那首复活的上吊者之歌。因为我既不知道歌词也不会曲调，我就干脆一个人小声哼唱起来，边哼边从地上捡起被拔掉的飞廉，它们比我还高，根茎散发出的苦涩的气味让我回想起化脓的伤口。

战后这名工厂主凭空变出了自己的工厂，因此他也能随时再把它夷为平地。如果他现在上吊自杀，这种情况就等同于充分就业的终结。它

等同于小家庭的终结，这样一来也就等于终结了我。我既不能待在这片被疾风抽打的飞廉地里，也不能回到布满灰尘的家里，在那里我母亲和明爱会那位女士甚至连我的小小弟弟都养活不了。

工厂主从树上挣脱了下来。他笑着说，我甚至连死亡都不知道是什么。上吊的意义不多不少，仅仅在于提升他的生殖能力。他凭自己的力量上吊，也靠自身的力量解救了自己，他一边不停地使我信服，一边把扯破的绳索像做游戏一样缠在我的脖子上。明天我们给你找一棵树，他说，一棵适合你的小树，因为该是让你成为一名男子汉的时候了，而不是整天没完没了玩你的玩具消防汽车，那些消防车甚至连一根梯子都没有。是啊，是啊，他又说道，它们根本不可能外出执行任务，说完笑了起来。在此过程中他压低了我的头，查看我脖颈上的毛发是否已经长到必须被剃去的程度。那是人类最古老的感觉，它比薄薄的大块浮冰在裸露的胳膊上的摩擦感、植物的刺扎进脚后跟的刺痛感以及手指在结冰的禾秆上的划破感还要古老。它甚至比脚对于地面以及手对于空气的感觉还要古老。我说的是头处在工厂主膝盖之间的那种感觉。由此也会产生出宗教信仰和一种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与荒诞不经发生摩擦，它起源于那种萌芽思想，即必须向下俯身、穿过自己的双腿观察世界。我朝地上吐了些唾沫，它看上去像是在湖中央被冻住的那只幼鸭的不透明的淋巴液，我们在湖上围着它滑冰，直到有一天在谁也没有碰它的情况下，它的脑袋掉了下来，以很快枯竭的小波浪形式滴落到我们脚跟前的不是血液，而是一种被冻成透明果汁冻的液体。

工厂主要看晨报，一名消瘦的男孩给他送去了报纸。接着工厂主带着一种眼神往男孩手里塞了一枚五十芬尼的硬币，他的眼神里透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对我的轻蔑。工厂主蔑视我，是因为给他送报纸的不是我，因为我并不贫穷，不会为了自己负担生活费而在街头卖报，在高速公路桥前面，正好在溪流消失在地下的那个拐角处，在那片飞廉地前面，田地远处种着那棵被折断了树枝的高大橡树，不久前工厂主还在那根树枝上上过吊。假如是我给工厂主送去了晨报，他对我的轻蔑程度肯定不会更大，但也不会更小。

工厂主从报纸的经济版上读到，全世界都在按照他设计的模式仿造高桥，这种桥建在两面黑色的页岩壁之间。他笑着合上报纸。我太了解他了，知道在这一刻他已不再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了。这是给你的投资，他说道，为了日后。

我带着我的颜料盒和彩笔坐在存放东西的顶楼上，在起波纹的活页画图纸上笨拙地画着逃跑设计图。

工厂主只知道一些疾病的名称。一次他在我眼前剪断了自己的舌头，他能够随时把剪掉的舌头再接到舌根上。我把他拔掉的飞廉随手带回了家，这些飞廉对他来说正好合适。他把它们跟他的阴茎进行对比，一边微笑着一边往一个草稿本上记下一些数字。我应该玩耍，他说道，但在玩的时候不能使用双手，也不能用嘴把积木搭建起来。如果有敲窗户的声音，我不能去瞅那里，因为如果看到站在那儿敲窗户的是谁，这对一个孩子来说简直太可怕了。只有工厂主一个人能够经得住这种恐惧。他会抓住那个东西，把它拖到地下室里，在那里肢解它，蒸煮后把它密封罐装，和保存带有鞭痕的马肉的那些罐头盒放在一起，只有他早餐时才会吃这样的东西。因为强制性的一动不动，我的双手感到疼痛。我双膝跪地滑到柜子跟前，用下巴拉出抽屉。抽屉里躺着那两只兔子。我看到它们是怎么变了模样。首先是兔毛脱落，然后下面的皮肤开始腐烂。它们使自己成为树叶和青草的形状。灰色的腱肉成了一根芦苇秆，红眼睛变成了花楸果，牙齿俨然是竖在公路边的里程碑，耳朵就像是要把我拖向湖底的车轮。我让自己向后倒下，仰面躺在地上练习憋气，直到工厂主过来一脚把抽屉关上。

我把兔子的躯干浸在一个盛了水的盆里，为了把它们身上的蛆虫冲洗出来。工厂主推着一辆木制手推车咕隆咕隆地在走廊上转悠。他刚从页岩那儿回来，在那儿不加选择地采集了一些树枝和小动物。当然他不必采集任何东西。正因为如此他才这么做。那是他的癖好。因为这么做是他的癖好，所以这样的事情必须毫无意义。他把采集到的东西倒在我脚前，为了让我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编目。不，不要这么简单地把动物和动物放在一起，把草茎和草茎归成一类，他喊着说。你必须认识到，真正把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他把一个方格本和一

支铅笔扔给我。然后他推着手推车又朝页岩方向飞奔而去。我用美术字在方格本的第一页上写下：人们能够卷在地毯里的东西。在这一行字下面又写道：第一个母亲。

没过多久工厂主又推着手推车来到我的房间。他在头上戴着一顶用兔毛做成的帽子。手推车上放着一块卷起来的地毯。我看了你往本子里乱写了些什么，他吼道，推着手推车围着我转了起来，让那块地毯一直保持冲前的样子，就好像它是他的阴茎一样。我没有必要把某人裹起来，他一边喊一边把真正卷在地毯里的东西抖落在我的脚前面：人们在哪儿都找不到的螺钉、不生锈的钢弹簧、我想要的那么多兔爪、兔耳朵的石膏模型、来自所有宗主国的火柴盒，等等。他把本子摔到我的脚跟前，命令我重新把所有的东西工整地记在本子上。我看到本子缺了第一页，是他笨手笨脚地把那一页撕去了，撕的时候他甚至把后面连在一起的另一半都没有扯去，因此顶端露出了流苏状的磨损边缘。

我作为蛇躺在床上。红色的兔眼睛发着亮光，在我半张开的嘴里来回滚动。我在等工厂主。阅读台灯已经熄灭了。算术练习本躺在地上，上面一个字也没写。虽然我既没有脖子也没有四肢，但我还是能够精确地感受一切。我听见走廊上有一声动静，于是我慢慢地把含有兔眼的嘴巴闭上，这样房间里就一片黑暗了。工厂主冲进房间。他用皮鞭抽向电灯开关。我有些害怕地在羽绒被下面把舌头像蛇那样缩进吐出，工厂主一下子就把被子从我没有防护的身上扯了下去。他哈哈大笑，因为他认为我想通过我的象征形式嘲笑他，或者通过我有两个生殖器官这一事实质疑他的生殖能力。他想马上看一下我的两个阴茎。首先他让我把毒牙磕进一个蒙着亚麻布的密封大口瓶里，然后用瓶子一直使劲顶住我的上颚，直到最后一滴毒液滴落出来。接着他把我仰面翻过身来，这样我就彻底丧失了抵抗力，把细小的皮肤皱纹拨向一边，让我的两个阴茎凸显出来。他又笑了起来，从写字桌上拿来我的测量三角板，量出2.5厘米的长度。好吧，我们就大方点儿，就说是3厘米吧，他对我小声说道，与此同时他从地上拾起那个算术练习本，把这个数字登记在上面。他又接着说道，虽然这样做其实并不十分合理，但是还是总数乘以2，就算是6厘米吧。他在第一个数字下面又写

了一个“3”。然后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捕蛇器，把金属夹张开卡住我身体上他认为是脖子的部位，把金属夹收紧，最后把我举起来顶在墙上。在他就这样用左手固定着我的同时，他用右手解开了他的裤子。从裤子里一下子跳出来三根粗壮的阴茎。测量三角板的长度不够，他大声吼道，然后一把抓过我的直尺。他漫不经心地用直尺比量他的阴茎，后者远远超过了直尺的测量范围。哎呀，我们可不想这样，他笑着说：足足30厘米。他弯下身子，为了把这个数字同样登记到我的本子上。再乘以3就是90厘米。他又系上裤子，松开了捕蛇器的叉子，以至于我头朝下摔到床上，不由自主地让兔眼从我嘴里滚了出来。然后他啪的一声把算术本摔到我眼前。我希望，他大声喊道，你周一把这个给你的女老师看看。他把亚麻布从盛装我毒液的密封大口瓶上扯掉，一口气把瓶子里的东西喝得精光。然后他从房间里冲了出去。

Die Erfindung der Roten Armee Fraktion durch einen
manisch-depressiven Teenager im Sommer 1969

躁郁症少年 一九六九年夏的 梦中江湖

[德] 弗兰克·维策尔 著

付天海 刘颖 译

一封克劳迪娅的来信

我父亲把我的几件衣服扔进棕色的皮箱。内裤、汗衫、卷筒领套头毛衫。原本我是不允许把任何私人物品带进天主教寄宿学校的。约翰和小野的那张照片反正我已夹在我的钱包里。然后我又往皮箱里装了一个新的标准A4笔记本。这些都是披头士乐队的图片。一本超级棒的画册，虽然厚了点儿，但是尺寸要小一些，因此正好能装进那个本子。当时披头士乐队来德国巡演三天，在皇冠马戏团演出过。我父亲已经先往汽车那儿去了，因为他今天自己开车送我。我又一次打开皮箱。箱盖织物套蒙的侧面是松动的。我把笔记本就塞在那里面。我母亲正躺在沙发上睡觉。她脸色苍白。在她旁边的小餐桌上放着药品。我弟弟和明爱会那位女士在游乐场上玩耍。在车里我可以坐在前座上。汽车杂物箱旁边有两块磁铁。圣徒克里斯多夫。人们经常用一个狗头来描述他，他给自己讨来这个狗头，为了对抗所有世俗的攻击。虽然他能够把耶稣圣婴，并且连同他把全世界的苦难都扛过河去，但他自己后来还是被淹死了。人们或者挽救他人，或者拯救自己。两者都做是不可能的。圣徒克里斯多夫手执用来驱散树叶的旅杖，摆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小相框。右边是我和我弟弟的一张照片。左边是我母亲的一张照片。中间是用金色书写体写在蓝底上的一句话：想着我们。小心驾驶。我父亲开动了发动机。母亲身体状况很糟，他说道。你现在很快就要十四岁了。当年在你这个年龄我已经开始学徒了。我们当时恰逢战争。你不能总这么下去。如果你再留级的话，无论如何你就得退学了。你母亲不能再情绪激动了。但是在结束祈祷练习之后或许你会选择上天主教神学院。这会让你母亲很高兴。这样的话我也会少一件烦心事。你想象一下，过几年你弟弟就可以到你那儿参加圣餐仪式了。或者至少在你那儿受坚信礼。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他倒着把车开过工厂院落。我撕开信封。信是克劳迪娅写来的。克劳迪娅在信中写道：“你好，我们彼此再没见过面，这真让人感到不快。但是当我去学

校取我的东西时，你却不在学校。克里斯蒂安妮说你病了。但你不会也跟我一样头脑有点儿不正常吧？是不是？暑假过后我可能要转到另一所学校。也很令人讨厌，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本月15号我去埃布拉参加联谊野营活动。你也来吗？斯宾塞、盖耶和斯托尼也都去。我们早上7点在毛里求斯广场会合。回头见。再见。克劳迪娅”。我把信折叠起来，把它塞进我风衣的里兜。信是谁寄来的？我父亲问道。是赖讷寄来的。暑假过后他也要开始学徒，是吗？是的，在位于美因茨公路上的奔驰汽车公司。这也不是什么美差事。如果赖讷再给我写信……？当然我们会把信保存起来。你们不能把信转寄给我吗？我们沿坦豪依泽大街向上行驶，穿过林荫路，然后沿亨克尔大街向下途经登格斯家的平层别墅，最后驶上高速公路。灰色的天空笼罩在莱茵高地区上空。现在我能够再看一眼工厂和斜后方我们家的房子。右边是格莱泽尔山。封·霍夫曼家多角落的房子。周日下午我们总沿着与高速公路平行的那条小路散步，当时我母亲还能够行走。那件黄色的套头毛衫，即使隔着紧身衬衣它也能刺得人发痒。美国佬的兵营。罗森费尔德。诺贝特·佩尔施一直还拿着我的三本米老鼠收藏纪念册。它们分别是蓝色、红色和绿色的。一根金属平头钉把那些本子从中间固定在一起。与《费克斯和福克西》相配套的“我知道得更多”索引卡片。配有金色封面的《费利克斯》复活节专刊。青年杂志《现代卢波》。《米奇幻想》。流行照片。我祖父家那本为邮政员工发行的杂志。杂志里有专为儿童设计的版面《邮车小号角》。版面右下方有一幅图画。一辆汽车行驶在一条马路上。一个男孩抬着一块圆形大蛋糕。一条狗挣脱了皮带。图画下面写着：接下来怎么办？

志愿者汉斯-君特拓展他的诠注能力

第一周里人们宣布了我们的晨祷义务。我们六点差一刻起床。六点钟我们在小教堂里集合做晨祷。紧接着吃早饭。做家务劳动直到第三时（上午九时举行的第三次每日祈祷）。之后人们向我们传授礼拜仪式直到第六时。吃午饭。再次在室内或者在花园里劳动直到午祷时间（下午三点），这期间我们纪念天主的死亡时刻。在晚祷之前我们还要学其他课程（拉丁文、教父学、修辞学、诠注学）。接着吃完饭。截止到终祷之前是我们原本应该用来自学的自由时间。20点被关进单人小房间。21点熄灯。

在这里药物是不成问题的。安菲他明、兴奋剂、安定药、大麻、麦角酸二乙酰胺。但是仅凭每月二十马克零花钱人们不可能有太多选择。我每周就要花去五马克，这样才不至于使克劳迪娅寄来的信件落入看门人之手，而是让人事先截取信件，替我把它保存在栅栏后面工具棚里的麻袋里。这样算下来就只剩五马克了。一包10片装的安定药卖3.50马克。奥沙西洋稍微便宜点儿，但却使人头痛。抗多动症药对我来说太危险了。抑食欲药的效果过于反复无常。我先买半片安定药。做完终祷之后服用四分之一片。

问题在于：我不能看到血液。在两个小时的血液学课程期间我始终盯着我的作业本，不抬眼去看展示板和幻灯片。血液是一种悬浮物，因为它是由水和纤维素组成的。它是一种非牛顿流体。牛顿是异教徒。不是因为他的学说，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与上帝相似。牛顿是在耶稣圣诞日那一天出生的。从自己名字（艾萨克·牛顿Isaacus Neutonus）的字母中他构造出拉丁文Jeova sanctus unus，意为“被上帝选中的人”。在生命垂危时他拒绝施行临终涂油礼。奥泽比乌斯教士说，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作为非牛顿流体的记号记录下来。虽然严格地讲油不属于非牛顿流体，但是天主为我们抛洒的血液却是。详细情况我们在流变学这门课程里将会学到。

在我们于修道院食堂前面排队等候期间，一名同学小声告诉我，我们在流变学课堂上会被问到，精液是胀流性的还是结构黏性的。我应当小心这样的提问，因为它可能涉及的是一种诱诈性的问题。如果回答正确，也就是回答“结构黏性的”，我就会被追问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知识的。干脆说不知道也不行，因为这会被解读为是一种借口。最好人们从理论层面出发这么回答：为了清楚这一点人们必须核实，在施加了剪力影响之后也就是说在射精之后（但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提到这回事），精液的表现是流凝性的还是触变性的。他向我眨眼示意，并做了一个奇特的手势，他先是握紧拳头，然后以一种流动的运动形式叉开手指。与此同时他发出咝咝的声音说道：触变性的。如果我用一条羊毛毯摩擦阴茎的包皮，那会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会流出精液。如果我把包皮向后拉，我就会有疼痛的感觉。

我尝试尽可能充分利用从被关进房间到熄灯之间的这段时间。首先我阅读克劳迪娅寄来的那两封信。然后我取出那个偷偷带进来的标准A4笔记本，尝试写一些关于克劳迪娅的文字。我想象她现在正和其他人在埃布拉。我把在埃布拉举行的活动想象成类似于去年在克劳森巴赫举办的童子军宿营。只是那一次有乐队表演。阿蒙·杜尔乐队和橘梦乐团。阿蒙·杜尔乐队我不了解。橘梦乐团曾在博物馆里演出过。以“六九俱乐部”作为开场表演。我把脊背靠在门上坐着。尽管我在房门上没有发现小窥视镜，我还是想确保万无一失。和折叠起来的约翰和小野的照片以及那本披头士乐队的画册一样，标准A4笔记本和克劳迪娅的来信是我唯一的占有物。我把所有这些东西卷到一个旧塑料袋里，在我每天早晨离开单人房间之前，把它从下面塞到洗手盆的出水管里。熄灯之后我又坐了一会儿。我尝试把披头士乐队唱片上的歌曲按顺序小声背诵一遍。那些歌曲的名字我都记得。但是按顺序背诵却很困难。在《橡胶灵魂》（Rubber Soul）专辑的B面上，《单字》

（The Word）那首歌是在《等待》（Wait）和《如果我需要某人》

（If I Needed Someone）之间，还是靠前排排在《为自己着想》

（Think For Yourself）之后和《米歇尔》（Michelle）前面？第二张唱片无论如何是以《发生什么了？》（What Goes On）开始的，它背面的第一首歌是《流浪的人》（Nowhere Man）。然后是《女孩》

（Girl），背面第一首是《米歇尔》。我忘记了《为你的生命奔跑》

(Run For Your Life)。这样看来《单字》那首歌还是应该在A面上。我躺到床上，尝试把《我刚刚看到一张脸》(I've Just Seen a Face)那首歌的第一段一口气对着枕头唱完。

周三下午志愿者汉斯-君特监督我们做诠注学家庭作业。我们应当就《马太福音》6: 27中的一句话写出至少一页的注释。“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呢？”对此我什么也想不起来。或许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生是一个时间计量单位，而肘则是一种长度计量单位。一个不准确的长度计量单位，因为正如我们在宗教史课上所学到的，有一系列不同的肘，它们分别对应人不同的身高。但是这句话指的肯定不是这个。志愿者汉斯-君特朝我走来。他站到我身后，越过我的肩膀弯下头来。

“怎么，”他说，“你什么也想不出？”

我耸了耸肩。

“在诠注时人们必须摆脱自己的想法。”

我困惑地看着他。

“你最喜欢的披头士乐队的唱片究竟是什么？”他问道。

这可能是一个诱诈性的提问。或许我应该否认这一点，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披头士乐队。但是那样我就不仅撒了谎，而且还出卖了我喜欢的东西。就像使徒彼得那样。志愿者汉斯-君特的头发一直垂到他的下巴处。他看上去有点儿像戴夫·戴维斯。我喜欢《小丑之死》

(Death of a Clown) 那首歌。还有《苏珊娜还活着》

(Susanne's Still Alive)。在这些单曲发行的时候，我担心奇想乐队会解散。因此我从来做不到完全静下心来听这两首歌。苏珊娜遭到否认并被无辜地起诉。一次她来到花园里。她感到很热。她想游泳。她的女仆们取来游泳用品。她脱掉衣服。这一切被两个男人看到了。就像当初我和赖讷那样，当时我们在赖讷那儿从房子里出来，看见贝尔林格夫人正在系上她比基尼式泳装的上端。赖讷的父母都在干活。贝

尔林格先生也不在家。但是我们只是退回到屋里没敢再出来，尽管室内温度很高。这跟苏珊娜碰到的那两个男人不一样。他们径直走向她说道：“如果你不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就索性声称，你和一名年轻男子干了淫乱的勾当。”但是苏珊娜没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于是她被告上了法庭。那两名男子对她提出起诉，最终她被判处死刑，尽管她竭力申明自己是无罪的。当她被带离法庭的时候，人们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如果她流血牺牲了，我就是清白无辜的。”说这番话的是男孩丹尼尔，他后来成了先知。法官意识到，是上帝在从他嘴里诉说，于是就把案件的审理权移交给他。丹尼尔分别对那两个男人进行了询问，问他们是在哪儿看到苏珊娜和那名男子淫乱的。其中一人说：在一棵雪松下，另一人说：在一棵橡树下。这样他们就被证明是有罪的。苏珊娜获得了自由。那两个男人被用乱石砸死。但是从诤注的逻辑来看这样的判决是很成问题的。他们在事件发生的地点方面撒了谎，这并不自动就证明了他们对事件的过程也说了谎。我尝试回忆《苏珊娜还活着》那首歌的歌词。“威士忌或者杜松子酒，这都没关系。”更多的内容我记不起来了。“葡萄酒是甜的，杜松子酒是苦的，你能喝下所有的酒，但你却忘不了她。”这是现状乐队《爱的代价》

(The Price of Love) 歌曲里的歌词。我最喜欢的是《你是否厌倦了我的爱》(Are You Growing Tired of My Love) 那首歌。不知是什么反正这首歌令我感到很忧伤。尽管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可能正因为如此吧。

“怎么样，”志愿者汉斯-君特问道，“是哪张唱片呢？”

“《橡胶灵魂》。”我说。

“啊哈，橡胶灵魂。”

我根本没往这方面想。否则我肯定不会这么说的。也许这张专辑的名称有诋毁上帝之意。

“你熟悉那些歌曲的歌词吗？”

“差不多吧。”

“那就试着在明天之前对那些歌词做一番诠注吧。不要以为某人在用第一人称‘我’演唱时，他所指的就总是他自己。用第二人称‘你’演唱时情况也是如此。歌里唱的不一定总是女孩。一切也能颠倒过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景。你干脆想象一下另外一个人，不是约翰，也不是保罗在唱，然后问自己为什么他要这么唱这些东西。”

晚上我把《橡胶灵魂》专辑上的歌曲逐个过了一遍。我想到了克劳迪娅。但是她不可能唱这些歌曲。和她一道乘车去埃布拉的斯宾塞、盖耶和斯托尼或许会唱。他们三个人的长发都耷拉到了肩膀上。斯宾塞吉他弹得非常好。是布鲁斯爵士乐。他被古腾堡地区的学校开除，然后来到我们学校上十一年级。在接受校长面试的时候，他把头发扎成了辫子，藏在后面毛衫的卷筒领里。他穿着一件山羊皮大衣。有一天晚上我能够在爵士俱乐部和他们以及克劳迪娅会面。他们打算随便搞一次行动。但是他们不让我走。此外不知怎的我也感到害怕。第二天我对克劳迪娅说，我父母会把我关进屋子不让我出门。但是不知为何她不在场。《开我的车吧》（Drive My Car）很明显符合他们的观点。他们需要某人弄辆逃跑用车。他们自己也没有驾驶证。或者他们中有人已经超过十八岁了？尽管这也无所谓，如果人们打算做一些非法的事情的话。《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也很适合，因为歌曲最后唱的是把房子点着。需要澄清的问题顶多是点燃谁的房子。克劳迪娅想要我的纪念章，上面刻绘的是面向地狱站立的波克尔。纪念章是绿色的，在黑暗中能发出亮光。《你不想见到我》

（You Won't See me）：很难判定。可能他们给某人打电话，但是人们害怕拿起听筒。就跟我当时一样，当时我也应当去爵士俱乐部。

《流浪的人》：非常明确。这是隐匿起来的人，他不在任何地方生活，不再有名字，但却拥有一切。《为自己着想》

（Think for Yourself）：歌曲的名字已经说明一切了。只是我不再能回忆起来，歌词的大意是“为自己着想，因为我将会和你在那儿”还是“我将不会和你在那儿”了。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人们大致可以把它阐释为：如果两个或者三个人以我的名义聚集在一起，那么我也存在于他们当中。第二种情况更像是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队员。人们完全要靠自己了。《单字》是行动的口令。只有口令正确人们才能得到放行。到《米歇尔》这首歌时我累得睡着了。

早餐过后昨天的那个男孩又跟我攀谈起来。他肯定比我大两岁。已经处在身体发育的变声期了。额头上长着丘疹。这一次他没有给我讲任何关于触变性方面的事情，而是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展露”。我没有兴趣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脱光，他说。一个胡思乱想的家伙。十字架展露仪式，这我当然知道了。是在耶稣受难节那一天。当钟声飞向罗马。当铃铛被拨浪鼓所取代。支持祭坛仪式的牧师赤脚朝圣坛走去。众人腹部着地趴在地上。胳膊伸向前方。那个每年都必须读出犹大的人太冷酷无情了。舒尔茨先生。教堂仪式结束后在听到他的声音时我大吃一惊。他身体干瘪、面容消瘦。有时他也在仪式中间穿插读一些经文，但这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主受难而死。

“公元10世纪。情妇当政。”那个触变性男孩说道。

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我有一张玛洛西亚的图片。作为巴比伦淫妇。还有一张女教皇约翰娜的图片。”

我不由得想起了小野。赤裸着身体。尽管如此我不再继续听他胡扯了。

我试图避开志愿者汉斯-君特，但是他在十字形回廊里直接朝我迎面而来。

“我没想起什么特别的东西。”我马上说道。

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走到药草园里。

“我真的试着去做了，”我竭力申明，“但是到《米歇尔》那首歌时……”

“因为是法语？”

“没错。”我撒谎说。

“恰恰是在出现外语时，人们必须探究它的特殊意义。就像耶稣说的最后几句话，它们是以阿拉米语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呢？”

“这我不知道。”

“一种特殊的强调。但是不止这些。误解也被有意识地考虑了进去。一种双重意义。或者干脆显得不可捉摸和神秘莫测。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开我的车吧》，对于这首歌你压根什么也想不出来？”

关于逃跑用车的想法我不可能说出来。因此我摇了摇头。

“我们来想象一下耶稣吧。或许耶稣希望你应当成为他的司机。就像圣徒克里斯多夫把他抬过河那样，你或许也应该开车接送他。”

“但是为什么呢？”我就是无法摆脱逃跑用车的想法。如果那些高年级学生想利用我，这我能够理解。我在银行门口等候。他们跳上车来。我开车离去。他们摘掉面具。我们朝火车站方向驶去。在高速公路桥后面我们拐进一条田间小路。妓女们也站在那个地方。我躲避路面上的坑坑洼洼。途经市郊的小菜园。最后驶向一个简易仓库，在那里我们给车身重新刷漆。

“作为司机你可以帮助耶稣完成他拯救人类的任务。但是当然你最主要的是帮助你自己，因为他选中了你。一旦你理解了这一基本思想，你就能够给它补充越来越多的细节。耶稣对你说：为花生而劳动都是美好的事情，但是我能向你展示一段更美好的时光。谁究竟会为花生而劳动呢？它们是马戏团里的大象和动物园里的猴子。都是些被驯服的动物。被训练过的。但是耶稣能指给你一些更美好的事情。他能解救你。只有当你这么解读，结局才会产生出一种意义，因为事实表明，耶稣根本没有汽车，但是他会说：我找到了一名司机，这是一个开端。他又说：这件事涉及的是你，而不是汽车。汽车都是些附加物，是不重要和外在的东西。因为耶稣当然不需要汽车。耶稣是上帝之子。他无所不能。但是他需要你。他需要你，因为他爱你。你就是开始，是阿尔法（希腊语的第一个字母），这样他就能成为欧米伽（希腊语的最后一个字母），能够实现愿望。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

“继续来看《挪威的森林》这首歌。耶稣登门到你家里。你有一处布置得非常美妙的住房。你说：瞧这儿，耶稣，看我漂亮的家具。为此我攒了很长时间的钱。我为此而自豪。你对他说，他应当坐下来。耶稣在你的房间里环顾四周，但是屋里没有椅子。所有的事情你都想到了，按照最新的时尚给自己布置了房间，但是有一点你忘记了：给耶稣准备一个座位。因此耶稣只得坐到地上。他受到了侮辱。他坐在你的脚跟前。他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就像他给门徒们洗过脚那样。但是还不止这些，他甚至喝你的葡萄酒。尽管能够把水化为葡萄酒的人是他。耶稣朝你走去。他接受了你给他的东西。但是你却说：我得上床睡觉了，因为我必须明天一大早出门。我必须很早出门，因为我还想挣更多的钱，为了能够给自己买更漂亮的家具。你嘲笑他，当他说：我不必明天去工作。当他说：看原野上的百合花……”

“苏珊娜就叫百合。”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

“我不由得想起了另外一处歌词。”当然这与刚才他说的毫无关系。我就是想随便说点什么。游泳中的苏珊娜。圣洁得就像一朵百合。但是没错，我们刚刚在说其他方面。在说家具。

“很好，”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志愿者汉斯-君特这么说道，“苏珊娜，她在《路加福音》中作为女门徒与耶稣同行，捐赠她的财物。我想指的就是这个。如果耶稣到我这儿来，那么我不会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会笑着就那么去上床睡觉。你们就不能抽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我一块儿醒着不睡吗？这是耶稣提给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因为他在我们不宜客居的住房里既没有椅子也没有床。他在浴缸里睡觉。浴缸里又冷又潮。但是他一直忍耐着。他在等着我们。或许我们在早晨会明白过来。但是我们走了。耶稣做了些什么呢？他点燃了家具。就跟他把兑换钱币者和商贩逐出庙宇一样，他抽去了我们眼中的横梁，烧毁了阻碍我们视线、让我们看不到他的那个东西。他给了我们又一次认出他的机会。一次找到他的机会。”

“但是《你不想见到我》，这首歌太难了。”我说道。

“你觉得吗？”志愿者汉斯-君特友好地微笑着，“其实人们可以把它解读成《挪威的森林》的续集。耶稣又一次在关心你。他给你打电话，但是你的电话占线。他说：我感到厌烦了，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成人啊，不，用英语说要更好一些：注意你的年龄，行为举止要符合你的年龄。因为耶稣喜欢孩子们。他知道孩子们经常比成年人明白得更多。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出与他的年龄相一致的行为举止。一旦接受了某些任务，人们就必须完成它们。人们不能装作听不见。把听筒干脆从电话机叉簧上取下藏起来。耶稣在不停地探问，他的宽容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如果你拒绝聆听他的教诲，那他又该做些什么呢？我的手累了，耶稣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帮助你了，而是更多的想要清楚地向你指明，他怎样能够帮你，他怎样已经拯救了你，即通过化为人身以及在十字架上的升华。这是受难之路的开始。人们接住他并给他包扎。这就是耶稣向你表明的。以此他对你说：接受我的建议吧。”

志愿者汉斯-君特停顿了一段时间。我甚至都不敢咽一口唾沫。他的手显出红色的斑点。从侧面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一直低着头，头发向前滑落盖住了他的脸庞。突然他站起身来，“好了，现在你知道该怎么继续了。剩下的你就自己试着去想吧。”

教皇是罗马主教、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首席使徒的后继人、西方教会最高教宗、西方牧首、意大利首席主教、罗马教省枢机主教和都主教、上帝之众仆人之仆人。虽然我只读过《罗德里甘达城堡》和《温尼托3：亡命之徒》，但是哈失·哈勒夫·欧玛·本·哈失·阿布尔·阿巴斯·依本·哈失·达伍德·阿尔·格萨拉这个完整的名字我却记得很熟。在我九岁那年我父亲教会了我这个。卡拉·本·尼姆西总是把他的随从只简单地称作哈勒夫，就像人们通常情况下把教皇称作最高祭司那样。阿希姆在翻阅一期《卡尔·梅》介绍，他只读那些以“突然”打头的段落，因为这些段落让人觉得紧张刺激。只有在麦加朝圣时某人才能把自己称作哈失。哈失·哈勒夫·欧玛却这么称呼自己，尽管他不在麦加。在温尼托临终时他想听万福玛利亚。然后他对老沙特汉德说：“沙里赫，我相信救世主。温尼托是一名基督徒。请多保重吧！”卡尔·梅

在监狱里。他从未去过美国早期的西部地区。他也写了像《圣诞节》或者《我》之类的书籍，它们与美国早期的西部地区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它们看上去和其他图书完全一样，也摆在牧区的小图书馆里。

在法医学课上我们学到，一具尸体不会再流血了。死后六小时血液分解为水和血浆。在耶稣说完最后几句话不久、当罗马军团士兵朗基努斯用长矛挑开耶稣的侧腹时，从里面流出的还是血和水。这跟伤口在坟墓里流血一样也是一个奇迹，它导致了都灵裹尸布上的印痕。因为所戴的荆冠，耶稣前额上有三处伤痕，后脑有九处伤痕。因为钉子他在手和脚上也都有伤口。此外他的左前臂上有六道伤疤，右前臂上有四道伤疤。裹尸布几乎两次被焚毁。每隔三十三年它被展出一次。

童贞玛利亚的第一次痛苦就是，在行割礼时必须极其小心地把基督的包皮收好并保存起来。但是耶稣肯定也要吃苦，因为当我把我的包皮只向后拉一下并小心地触碰龟头时，一股钻心的疼痛就会贯穿我全身。然而基督被神化的身体在天国又会拥有一层包皮，它是用属于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物质仿制而成的。体现在被净化的圣体中的天主的身体有还是没有包皮，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了。当耶稣在主持圣餐仪式时，虽然他被切除过包皮，但在圣体中他体现的却是未行割礼和完美的。割礼是他化为人身的象征，他的完好无损是他神圣的标志。

拉丁文和希腊语多少有些进步。但在希伯来语方面我简直一筹莫展。我甚至连希伯来语的字母表也记不住。贝内迪克特教士以其即兴表演而著称。那个触变性男孩主动提出给我补习功课。

“你不能抽象地学这些东西，”他说，“你必须用画面给自己创造一种联系。我演示给你看。艾礼富（Aleph），数字1，希伯来语字母表里的第一个字母，它代表的是公牛，是牛头。公牛站在最前面，异教徒们崇拜公牛，也就是金犊。祭祀用的动物，就像我们也应牺牲自己一样。最早先知以西结就在一片火云中看到生有四张面孔和四对翅膀的四个生物。从前面看这些面孔像人，从后面看像鹰，从右面看像狮子，从左面看像公牛。约翰内斯在上帝的启示里再次提到这种情况，只是那里记述的是一个人，但却被划分成了四部分。四位福音传教士。路加得到了公牛的象征，因为他的基督福音是以殉道者撒迦利亚

的献祭仪式开始的。但是人们也可以说，耶稣在所有四个生物里都有所体现，因为他在出生时化为人身，在死亡时作为公牛牺牲自己，作为狮子战胜了死神，作为雄鹰升入天堂。但这扯得太远了，因为人首先要定居下来。他们迁入一栋房子。这就是希伯来语字母表里的第二个字母贝特（Beth），数字2。我们现在在房子里。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分割。有了外部和内部。我们和世界。这些都包含在数字2里面。起始字母艾礼富不被人们所质疑，偶像信仰和公牛也是如此，因此字母艾礼富也不发出音来，因为只有当一个非字母A与字母A相对立时，当从1里面变出2时，人们才能开口说话。于是就有了我们避难的房子。有了我们在里面祈祷的庙宇。待在外面的是世界，是其他东西。吉梅尔（Gimel）是希伯来语字母表里的第三个字母，它通过骆驼（Kamel）被象征出来，因为两者的发音听起来很像，特别是当你弱读元音时。现在开始的几个字母都很清楚了。默不出声、对他人情况一无所知的公牛，对房子和世界、农民和游牧民族、该隐和亚伯的划分，因为从2里面总是马上就会产生出3。接下来就是使它们趋于完美了，人们怎样跟世界打交道？人们需要在房子里安一扇门。这就是达里特（Daleth），希伯来语字母表里的第四个字母。门打开又关上。它有两面。它相当于古罗马的两面神雅努斯、不同的党派和战争。在我们穿过的门之后是透过它我们可以向外看的窗户。这就是赫（He），希伯来语的第五个字母。但是在我们因为众多的数字而失去方向感之前，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把一切重新固定在一起的钩子。这就是希伯来语的第六个字母乌阿（Waw）。乌阿的作用就是连接。它的意思是‘和’。杂乱无章。混乱和黑暗，荒凉和空旷，困惑和迷惘，因为在创世之前一切都处于无序状态，没有秩序就不会有思想，不会有发展，一切总是只围着自己转，不能指向一个目标，指向天主。你还能跟上我的思路吗？”

“说真的有点儿跟不上了。”其实一开始说公牛时我的头脑还是非常清楚的，然后是房子、骆驼、门、窗户，但正因为如此我仍不知道那些字母看上去是什么模样。它们都长得那么像。

“我马上也就结束了。但是再说一点，因为第七个字母确实很有意思。查金（Zajin）是希伯来语的第七个字母，它的意思是‘武器’。当然很

清楚，人们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这么多数字打交道。或者人们用乌阿（钩子）把物体连接起来，或者人们用查金（武器）把它们打碎。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你知道的，《马太福音》10: 34：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在犹太教法典里教士也被看作是武器，被视为我们体内不安定因素和制造祸端的象征。然后是希伯来语的第八个字母切特（Chet）。非常有趣。因为它似乎是字母赫的一种鲜明体现。它也寓意着一扇窗，只是窗户前面有一道栅栏。你知道赞美神的欢呼语‘哈利路亚’，可是如果你用字母切特写‘哈利路亚’时，它就会变成‘切利路亚’，也就是‘引起争执’的意思。接下来是字母泰特（Tet），意为‘子宫’……”现在触变性男孩又奇怪地微笑起来。

在上完触变性男孩的补习课之后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什么都没听懂。几乎什么都没懂。希伯来语对我来说变得更模糊了。我可能永远也理解不了这种语言。但是他说话的方式真是不一般。一方面几乎和志愿者汉斯-君特一模一样。但是语句却要更加零碎。仿佛每一个字母都有一种意义。不仅是字词。不光是句子。也包括把不同的数字混杂在一起。特别是《马太福音》里的一处表述我总也忘不了。当然我以前听到过那段话，但我从未清楚地意识到，耶稣说的话跟克劳迪娅或者古多或者切·格瓦拉或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或者那些高年级学生说过的话完全一样。

在我的单人房间里，我又翻开《马太福音》里的那个章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第一次我又想起自己的家庭。想起躺在沙发上的母亲。想起我父亲。想起我弟弟。还有明爱会那位女士。一下子我为他们所有的人感到遗憾。除了明爱会那位女士。但是除此之外所有其他人也令我感到遗憾。我不会因为他们而恼火。无论是谁要求我这么去做。对此我就是太软弱了。就跟我害怕去爵士俱乐部一样。所有这些我都做不了。

我开始继续整理《发生什么事了？》那首歌。这很简单。耶稣问我，在我心里和头脑里正发生着什么。“前几天当我沿着道路行走时我看到

了你”。耶稣遇见他的门徒们，他们正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但是他们的眼睛被蒙上了。他们没有认出他。只是后来当他们分手时，他们才知道那个人是他。但是耶稣和谁看见了我？和魔鬼吗？使他的未来坍塌的就是这种情况吗？事情总让人觉得不太对头。或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难道是我在跟上帝打招呼？是我在问他，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为何他这么不友好地对待我？我难道跟约伯一样好像在怀疑他的神？或者跟被钉上十字架、感觉被遗弃的耶稣一样？触变性男孩说过，“约伯”和“敌人”这两个单词在希伯来语里是用相同的字母拼写的。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因为约伯在跟自己内心的敌人对抗。因为他没有退缩。直到最后一刻。直到他从上帝那儿得到一个回答。因此犹太教大祭司总要读《约伯记》，在他每年一次说出平时不能被说的上帝的名字之前。这种情形就仿佛是我从一门语言里学到一些话语，但我不理解那些句子是怎样关联在一起的，不明白什么是宾语什么是主语。就像我不久前还在认为，植物的枯死（Eingehen）与那句恳求指的是一个意思：主啊，我不值得你来到（eingehen）我的屋檐下。读到“欢呼并带着喜悦歌唱”那句时我在想，某人在对着半升啤酒欢呼酣唱，欢呼的动作就跟一声欢呼声是一样的。如果天主来到我的屋檐下，那他就在哪里为我再度死去。像一朵花一样。女孩子是耶稣吗？我不知道。

我对奇术有不一样的想象。当然不是我们学着去产生奇效。但是现在在第二次两节课连上的大课上我们探讨的仍然是错误的奇术。许多伪先知在论及奇术时也会援引《圣经》。比如《圣经》中的任意诗篇。使徒彼得的对立角色是西门·马吉斯。我想到了家里那些我从火车站大街魔术王那里收集到的东西。一枚可以用来喷水的指环。一架相机和一块巧克力，它们同样具有相应的功能，但是看上去却不那么真实。炭黑肥皂。带有双层侧壁的白兰地酒杯。一块糖，它在溶解时能够让咖啡杯里的一只塑料苍蝇漂浮上来。还有一块糖，它不会溶解，而只在表面漂浮。一把被填充了透明塑料的调羹，因此人们用它什么也舀不起来。魔术墨水。魔术炭黑。但是最好的东西还是冰水。

西门·马吉斯会飞，当时许多人聚集在罗马，为了欣赏他的飞行艺术。他能够把石像逗乐，能够赋予一条金属蛇生命。当他站在尼禄面前

时，他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继而变成一位老者，最后变成一名年轻男子。但是他对此并不满足。他想从使徒彼得那儿获悉那个秘密，即人们怎样通过把手放在病人头上的方式治愈他们。但是彼得没有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他。于是西门公然要求与他进行一场比赛。古罗马行政长官阿格里帕命令西门·马吉斯杀死一名男童。接着彼得必须把死去的男孩重新唤醒。这样一来两人的比分是1：1。西门·马吉斯因感到胜利而得意扬扬，让自己升到空中。这时彼得向天主发出一阵急促的祈祷。虽然他不希望西门·马吉斯死亡，但想让他从空中摔下来，让他的大腿在三处断裂，这样就够了。事实也果真如此。现在马吉斯不能再飞了。他必须想出其他招数。于是他让人们像埋葬耶稣那样把自己掩埋，为了三天之后重新复活。但是他没有从坟墓里出来，而是在里面死了。在彼得让西门坠落的那个位置上，人们后来为耶稣使徒修建了一座教堂。那块彼得跪过并在上面压下凹痕的石头成了圣弗朗西斯卡罗马纳教堂的基石。

另一位伟大的奇术师是来自提亚那的阿波罗尼厄斯。他生活在公元后二世纪。他也由一名童贞女所生。只是当时出现在他母亲面前的不是天使，而是一位埃及神。于是她走出房子，去到一块草地上采花。这时飞来一些天鹅，它们围着她组成一个圆圈并唱起歌来。接着孩子就降临人世了。天鹅原本只在死亡的时候才会唱歌。但或许这些天鹅牺牲了自己，为了这个孩子能够来到人世。阿波罗尼厄斯能够变出面包和葡萄酒，能够让一些东西消失。他能够使雕像活过来，让它们充当仆人给自己干活。在罗马他因为诈骗遭到控告。当人们想宣读起诉书时，却发现纸页上都是空的。人们把他投入监狱，但他非常容易就能把脚从镣铐里拔出。

作为孩子人们原本只在教会里才有机会。不是作为革命者。甚至连一个节拍乐团的成员都不是。“轻松节拍”乐队的成员又被打发回新西兰老家了。乔治·哈里森仅仅是在明星俱乐部非法演出。但是教会听取孩子们的心声。儿童十字军。或者法蒂玛。所有的人都害怕第三个秘密。人们必须找出这个秘密。使之具有一种新的预示未来的幻景。但是我不变得可信。这就跟念咒驱除妖魔的情形一样。情况证据必须确凿。人们必须涉世未深。未受玷污。也许第三个秘密会告诉人们，

将会有新的先知出现。或者是一场革命。并且这场革命是上帝希望看到的。

志愿者汉斯-君特对我感到失望。把女孩阐释为耶稣是颠倒方面一次真正的创举。他让我把歌词大声重复了一遍。然后他问道：“至少现在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犯了关键性错误吗？”我摇了摇头。他沉默不语。

“或许是在第一段里，在那里他如此渴望那个女孩，以至于她让他自己感到遗憾？”我迟疑地说道。

“喜爱上帝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这又有什么错呢？特别是因为他说，他没有一天感到后悔。必须承认的是，在开始部分里一切都还显得非常矛盾。但是在第二段里情况就很清楚了。你瞧，他试图离开她，她哭着向他允诺整个地球，如果他留下来不走的话。你认为耶稣有必要这样做吗？你曾经听说过，耶稣祈求你的爱，他想用金钱换取你的爱吗？不，肯定没有。‘她答应把地球给我’，这是对《马太福音》4: 8中所描述场景的一种等值模仿，场景中魔鬼想诱惑耶稣，从一座高山的山巅处把世上所有的王国指给他看，并保证这些王国都归他所有，只要耶稣一直崇拜他。但是耶稣说：离开我，撒旦！此外这是耶稣第一次这么称呼魔鬼，在这之前他总是被描述为鬼。耶稣认出了魔鬼的本质，以一种颠倒命名的方式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他。之前魔鬼是无害的，他是抛掷东西、指责和诽谤他人的一个人，但是耶稣察觉出他作为永恒敌手的真正含义，而这一含义是不容低估的。他也识破了他的历史，因此用他的希伯来语名字称呼他。这一切他都是通过洗礼了解到的。归根结底魔鬼是在耶稣受完洗礼之后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是洗礼招来了魔鬼？”

“大概可以这么说吧。魔鬼当然特别是对通过洗礼离他远去的那些灵魂感兴趣。现在他试图用眼泪和允诺来吸引他们，就像在女孩那个场景里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一旦你落入撒旦的圈套并崇拜他，那你的情况可就糟了，因为你会在你的朋友们面前出丑，因为你在爱慕一些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会看到魔鬼的庐山真面目，遭遇到一种彻骨的寒冷，就如魔鬼的精液一样也是冰冷的。最后一段的意思非常明朗：

痛苦应当导致喜悦，为了能够休息一天，人们必须拼命干活。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耶稣在哪儿也没说过痛苦导致喜悦这样的话。我们应当证明这一点，殉道者们就是用他们的鲜血这么做的。但是组成我们信仰的就是忍受苦难，尽管一切显得毫无希望，这就是忍耐，是无望地对一种未来幸福的坚持，它的对立面是希望，也就是有理由的期待，它明确指向未来，着眼于改善现状，尽管希望有时会缺失可能性要素，而忍耐则专注于剥夺希望的苦难。我们的信仰由这两种期待类型组成，它导致悔改、转变思想和改过自新，因此我们也用‘悔罪’来翻译‘悔改’这个词，但是所有这些你们还会在课堂上进一步探讨。这些人们也不一定非知道不可，因为《橡胶灵魂》那张专辑本身就给出了足够多的提示。你只要看一下第二面结束的那首歌就行了。《快逃命吧》（Run for Your Life）。因为在那首歌里那个女孩再次被提及，而且这一次非常直接。歌手在追逐化为女孩形象的撒旦。歌手就是耶稣，他作为祛邪师用符咒驱除恶魔，如果他说他宁愿看到她死亡，也不让她和另一名男子私奔，那么这句话仅仅意味着，耶稣不想只让自己得到解脱就够了。当撒旦假扮成女孩想引诱他犯下七宗罪中的贪食罪、傲慢罪和贪婪罪，也就是想诱惑他暴饮暴食、盛气凌人和贪得无厌时，他当然不仅考虑到自己的安康，而且也心怀所有人的福祉。他绝不允许撒旦在另一个人身上附体，诱使另一个人偏离正道。因此他威胁撒旦要杀死他，如果看到他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最后他把自己表露为是救世主和传道士，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让这成为一种布道吧，我指的是我说过的每一件事，孩子，我决心已下，我宁愿看到你死。’只有当你在诠释学研究方面有所进步，你才会明白，恰恰是《橡胶灵魂》专辑的第二面在歌曲编排上是多么的奇妙。当然唱片的名字从整体上肯定就已经让人们对此有所意识，而且你也凭直觉感受到了，在这张唱片上蕴含着信仰的真正瑰宝。《橡胶灵魂》里的‘橡胶’与真正的橡胶也毫无关系，而是意味着：摩擦你的灵魂。为天主加热灵魂。但是这张唱片还有更多的内涵，它分十四个步骤来坚决果断地驱逐妖魔，把灵魂从邪恶的力量中解救出来。十四是耶稣受难之路上驿站的数量，也是天主教传说中救苦救难的圣徒的数量，或许对你来说那将是非常值得的练习，也就是把十四个不同的驿站和唱片上歌曲的顺序进行比较，或者把救苦救难的圣徒的名字与相对应的歌曲搭配起来。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诠释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能够做出什么样的

贡献。唱片的第一面是对陷入困境的灵魂所做的一种批评性总结分析，直到《米歇尔》那首歌里显出的精神错乱的征兆：也就是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说若干个单词，而唱片的第二面则完全是为了驱除妖魔而设计的。作为前奏那个关键性问题被提出：《发生什么事了？》在你心里发生着什么？你头脑里想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对黑色灵魂的数量和名称的提问。对此不假思索的回答是：女孩。现在又轮到教士出场了。他告知魔鬼，说他看穿了他的阴谋。《我正在识破你》

(I'm Looking Through You)。并描述了精神错乱的其他典型征兆：从表面上看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但他还是有所变化，他的嘴唇在动，但人们什么也听不到，然后他发出的声音非常悦耳，但是话语的意义却含混不清。接着教士把魔鬼原先的老位置分配给他：他不再待在凡界之上，而是到那儿下方。看样子这些话并非没有产生效果。那个着了魔似的人变得温和下来，他讲述自己的人生，回忆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和地点，谈起了自己的爱情。这就是《在我生命中》

(In My Life)。他大概已经被治愈了吗？但是《圣教礼典》上是怎么说的？在妖魔们被证明有罪之后，他们有时会躲藏起来，使身体免除所有的烦扰，因此病人以为自己现在彻底解放了。但是祛邪师不能停止工作，直到他感受到真正的解放迹象。这一点通过排在《在我生命中》之后的那首歌《等待》(Wait)被表达了出来。祛邪师暗示害病的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他应该一直等下去，直到天主完全与他同在并擦干他的眼泪。对此魔鬼用假嗓音做出了回答。他表现出很和气的样子。《如果我需要某人》(If I Needed Someone)，他说，假如我需要某人，那我会很乐意接受你的建议，但是现在情况恰恰不利，我没有时间，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试图用空话敷衍教士，劝他应该放松和休息一下，改天再继续工作。可是你知道：粪土不再继续控告驱魔人，目前尚未看到解放的标志。这种解放，正如我们已经探讨过的，是在最后一首歌里实现的，在那里他不仅驱除了魔鬼，而且还威胁要杀死他，如果他又侵害了一个人的话。因为魔鬼暴露了自己。为了用空话敷衍教士，他建议教士把他的电话号码刻在墙上，这样他就可以跟他联系了。但是这种表达是非同寻常的。人们不会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刻在墙上。因此它涉及的是另一个号码，那是魔鬼的代号666，是一个铁锚，这样魔鬼就能不断返回了，但是祛邪师从这些话里识破了恶魔，迫使他现在最终离去。”

志愿者汉斯-君特只是顺便提到魔鬼的精子是冰冷的，但是这一评论却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问触变性男孩，是否他也听到过此类评论。他笑了起来。“据说人们从这方面认出了魔鬼。例如在瓦普吉斯之夜（5月1日前夜，据传在这一夜女妖们在布罗肯山上跳舞）。当然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了。你只需足够长时间地克制自己不射精就行，你知道吗？不停地想其他事情，比如重复希伯来语字母表并休息一下。如果你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克制自己，那么你觉得精液会怎样喷射出来呢？因为精子已经从睾丸里活动到了上面。它已经准备很久了。然后它必须喷射而出，用尽所有的力量。然后精子也就冰冷了。只有当你很快射精并且用时很短时，精子才是热的。也就是说魔鬼在这方面更加擅长，你明白了吗？”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就跟看到那张纸条时的感觉一样，纸条是当时赖讷从他来自马丁斯塔尔的堂兄弟那儿抄来的。但是现在的感觉里还夹杂着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不是罪孽。我指的不是这个。也不是怀疑。它更像是一种悲伤的感觉。就像是我在想起克里斯蒂安妮时产生的感觉。

魔鬼们在跟耶稣交谈。他们说：既然你已经驱逐了我们，那就让我们到猪群里去吧。在此人们不免猜测，这是否也是魔鬼的一个伎俩？但是耶稣却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魔鬼们离开女孩的身体去往猪群。然后猪群就拔脚狂奔，从危岩上跌进海里淹死了。放猪人损失了他们全部的财产。他们跑进城里，向城里人讲述这件事情，于是城里人对耶稣说：我们希望你待在这里。可能是对他们来说代价太大了。但是必须要把魔鬼们打发到某个地方。人们必须威胁他们。必须改变他们。或者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那个被治好的女孩追随了耶稣。许多人追随耶稣。现在当我慢慢用希腊语再阅读一遍《马太福音》时，我注意到耶稣总说：你们竟然不知道？然后他会随意引用一些话。他会谈起他的父亲和所有可能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熟悉，但是当时的人们却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当时人们的感受肯定跟我的一样，当斯宾塞、盖耶和斯托尼在讲述一些事情或者当克劳迪娅说起他们的时候。此外耶稣不关心各种规定，不遵守任何规则。当法利赛人（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该派标榜墨守宗教法规，基督教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征求他对规章制度的意见时，他马上就会从

《旧约全书》里随便举一个例子，但是例子与他所做的根本毫无联系。人们必须把自己的路线坚持到底。

在主显节上重要的是，人们把启示给自己的东西不能讲给任何人听。即使教皇本人想知道也不行。伯纳黛特·封·卢尔德就是这么做的，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玛利亚亲自告诉她，那些启示仅仅是给她的，甚至都不允许被透露给教皇。当然那些启示最终都会汇集到教皇那里，但是经历过神灵显现的人必须首先拒绝和反抗，然后再让人智胜自己。在拉萨莱特地区情况要更为极端，因为在那儿玛利亚首先同时和两个孩子说话，然后才转向马克欣，和他单独交谈。尽管梅兰妮看到圣母的嘴唇一直在动，但她却听不懂说了些什么。《我正在识破你》里的那句歌词其实也挺适合这种情况的：“你的嘴唇在动，但我却听不清”，或许我应当明天把这一点告诉志愿者汉斯-君特，但或许最好还是不讲，因为否则这样只能再次表明，我没有理解一些事情，因为圣母紧接着会和梅兰妮说话，然后又会上轮到马克欣什么也听不懂了。当孩子们后来讲述圣母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被所有可能性的教士审问了好几个月。人们试图设计谋骗过他们，向他们提一些诱诈性的问题，但是孩子们甚至连“启示述及的是什么”那个问题也不回答。人们给他们提供玩具和钱财，最后用监狱甚至拿死亡来威胁他们。但是这些都不起作用。但是教会不让他们安宁。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孩子们不停地被审问，直到他们终于同意把他们的秘密写下来，让人把它们送交给教皇。在三圣泉地区的主显节期间，有轨电车检票员布鲁诺·科纳齐奥拉起初也听不懂，圣母对他的三个孩子都说了些什么。他看到玛利亚的嘴唇是怎样在动的，但是只有在他乞求上帝的帮助之后，他才能听懂一些。当时他们只是去特拉普修道院郊游，因为那里有巧克力。但是商店还在午休没有开门。于是孩子们就在附近玩耍，他们玩着玩着迷了路，结果发现一个岩洞，在岩洞里圣母显现在他们面前，答应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伟大的奇迹，尽管岩洞很脏，被用来做一些淫乱的事情。当这三个孩子的父亲在西班牙内战中在前线打仗时，他遇到一名德国新教教徒，教徒向他讲述，说教皇对一切不幸负有罪责，因此还在西班牙的时候他就给自己买了一把匕首，在刀刃上刻下“教皇必死”几个字。当他后来被教皇比约十二世邀请、为了和其他信徒一道进行念珠祷告时，教皇问是否有人想说些什么。这时布鲁诺走

到前面，失声痛哭，给教皇看了那把匕首和他的新教《圣经》。但是教皇早已知道了布鲁诺的计划，因为他当年作为红衣主教曾遇到过一位女士，玛利亚在三圣泉地区的时候也同样在这位女士面前显现过。玛利亚对那位女士说过，红衣主教帕切利将成为教皇，她将在同一个地方再次显现，为了使一个打算杀害教皇的男人皈依。一方面神灵显现是一些异常罕见的现象，但是一旦涉及这种情况，神明就会反复显现以干预世事。这就好比一次穿越时空的时间旅行，这种旅行可能将来的某个时候也会存在。可能是因为圣人们能够穿越时空，因此他们也就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即便他们向人们通知了一些完全可以继续转述的事情，可还是有某些事情始终显得非常神秘。就像在拉勒伯夏所发生的那样，当时孩子们一开始无法辨认圣母胸脯上的铭文，只能断断续续地读出“Ma.....cat”的字样，因为玛利亚是把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的，只有在他们得到了秘密启示之后，玛利亚才将双手分开，现在他们读到了完整的铭文《尊主颂》（Magnificat）。

许多玛利亚显灵都与革命和颠覆活动有联系，这难道是偶然吗？1917年的法蒂玛显现，它与十月革命发生在同一时期。1846年的拉萨莱特显现，就在1848年系列革命爆发前不久。1830年巴克街显现，它与巴黎七月革命同步上演。1871年的蓬特曼显现，正值巴黎公社起义时期。

人们可以为许多事情做好准备。为在埃布拉举行的联谊宿营活动。为革命。为神灵的启示。但是这些事情为什么、何时和怎样发生，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在这方面人们无能为力。克里斯蒂安妮·韦根会否和某人约会，对此人们无法施加影响。人们每天晚上六点之后可以在收音机上搜寻频道，尝试收听卢森堡广播电台的节目。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听到嗡嗡的声音。只有一次收音机里也播放了在德国还没有的歌曲《你好再见》（Hello Goodbye）。在赖讷的小房间里听到这个，然后回家吃晚饭，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整个乐团都在为这首歌曲伴奏。当我们以为曲终的时候，没想到它又一次从头开始。

在教堂里人们只读和谈论《圣经》里的某些段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地方显得过于混乱。特别是当耶稣在讲话的时候。那样的话

我就根本无法再读懂希腊语了。即使有译文也看不懂。许多地方让人捉摸不透，如果我们不通过注释对之加以讲解的话。援引的例子从来不对问题做直接回答。但或许用意正在于此。人们必须使受众独立思考。这样人们就会使他们不轻易放弃。例如《马太福音》12: 43。我不懂它讲的是什么。“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摆脱恶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一般只会更加强势地归来？以上出处过了几行之后又说道，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在外面想见他。但是耶稣却问道：我母亲是谁？我的兄弟们是谁？然后他通过用手指向他的门徒们的方式，自己回答了后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耶稣有兄弟的话，那么怎么解释玛利亚的童贞呢？永远的处女。帕提农神庙。处女分娩前，在帕蒂，产后。因为如果她一直是童贞女的话，那么耶稣根本就没什么特别的，那样的话他的兄弟们也和他完全一样，是由神灵圣洁怀胎所致并被带到世上的。这样一来就只有玛利亚一个人与神灵有一种特殊关系，并显得比耶稣更为重要。这就是“永远的处女”的含义吗？还是我在作弊，因为我在解释那些引用时所使用的逻辑恰恰是魔鬼惯用的一种工具？我是对魔鬼唯命是从的工具吗？而自己却没有预感到这一点。因为恶魔们不断地返回到我身上，即便是我清扫甚至清空了我的房间？因为最后一切都是事先注定的，因此圣人们才能够穿越时空，能够在各个地方显现，因为这个也是事先被计划和安排好的，因为犹大、该隐和替罪羊也都是事先被计划和安排好的，他们只需实现自己被确定的命运即可，因为人们最终也需要他们，否则就不会有原罪，不会有杀害兄弟，不会把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了，否则一切都还将像以前那样运行，整个一星期都是那样，没有周六的忏悔和周日的弥撒，虽然我尽管如此一直还不知道，对我来说命中注定的是什么，因为我不会那么容易对事情听之任之，不会简单地接受我的命运，不会留级并转到另外一个年级，不会简单地待在这里的天主教寄宿学校，不会像所有其他人那样成为童子军成员和辅弥撒者，甚至连埃布拉的联谊宿营活动也不参加，即使我去了那里，我也不会简单地待在那儿，而是因为上天的安排又会渴望他处，因为我不接受我的命运，不理解我的命运，因为我既不善良也不邪恶，既不热情也不冷漠，而是不冷不热

的，因此我被从天主的嘴里吐了出来，像是被泼出来的水一样躺在那里，浑身上下骨头像散了架似的，我的心就像是融化的蜡，作为碎片，一块又断裂成几瓣的碎片，就连应当给我的伤口带来凉意的风也从我身旁掠过，仿佛我从未存在过，它从我身旁掠过，仿佛我从未存在。

塞巴斯蒂安教士给我们讲述圣徒斯坦尼斯·科斯特卡，说他这个男孩赤脚从维也纳徒步来到德国，又从德国继续去往罗马。对他来说，塞巴斯蒂安教士说，生命就像是为一名等候晚点列车的游客而建的火车站，因为这名游客并不注意火车站大楼，而是只盼望那趟应当把他带往真正目的地的列车。虽然他英年早逝，留下了圣洁的灵魂，但人们很难说他在生命中没有抗争过。只是，塞巴斯蒂安教士接着说道，他是一名如此灵巧的斗士，以至于他在第一次出拳时就击倒了他的对手。他总是非常小心。和莫扎特或者拉斐尔一样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跟他俩一样他也很早就开始从事自己的艺术，他表演艺术的方式是祈祷和坚定自己的信仰。

塞巴斯蒂安教士给我们讲述被砍去头颅的圣徒狄奥尼修斯。人们刚刚将狄奥尼修斯斩首，他就站起身来，把脑袋捧在自己手里，沿着塞纳河走了5.5里的路程，一直走到他希望被葬在那里的那个地方。我禁不住想起那篇我在一本青年读物里看过的关于辛德汉纳斯的故事。辛德汉纳斯也被砍头了。但在斩首前他与对方商定，让对方把他帮派中的所有那些男人通通释放，只要他能够没有头从这些男人身边跑过。人们砍掉他的脑袋，然后他开始奔跑，在跑过第七名强盗之后他才瘫倒在地。一名强盗救了他的同伴们。圣徒狄奥尼修斯只是指出他想被埋葬在什么地方。为此他作为救苦救难的十四圣徒之一治愈了我们的头痛。

我应当列举其他救苦救难的十四圣徒，但我只想起了布拉修斯。我每年都害怕错过布拉修斯祈神赐福仪式，因为有一个男孩没有去参加仪式，结果他被一根鱼刺卡死了。我仰起头来，教士把两根交叉的蜡烛举到我的脖子跟前。我希望有一些蜡会淌下来，这样能使祈神赐福的效果更加明显。塞巴斯蒂安教士讲述，布拉修斯也被砍去了脑袋。但

是之前人们把他关进地牢，因为他帮助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去找他帮忙，因为一只狼把她唯一的一头猪叼走了。布拉修斯说：你不用担心，没过多久，那只狼就把叼走的那头猪又送了回来。当这个女人听到布拉修斯被关进地牢的消息时，她宰杀了那头猪，给布拉修斯送去猪头和猪蹄。布拉修斯把两样东西都吃了下去。我问自己，布拉修斯之所以吃掉猪头和猪蹄，是因为否则的话他就会饿死，还是他吃掉它们，目的是为了另一种诱惑。为什么那个女人偏偏把猪身上这些令人讨厌的部位送给他，这些部位我只在我们于意大利休假时在一家肉铺见过一次，但是从没有在位于行政区大街的冯克肉铺里见过，也没有在位于池塘巷的桑德尔肉铺里看到过，或者在桑德尔对面我不知道名字的那家肉铺，因为我们从未在那儿买过肉，或许是因为那家肉店看上去不太友好，而且肉铺师傅自己也经常穿着他那件带条纹的、溅有血渍的蓝大褂站在柜台后面。迄今为止我总认为，肉铺师傅们会把猪头和猪蹄扔掉，因为它们太令人恶心，人们无法食用它们。但是肉铺师傅或许会把他们肉店的猪头送到修道院给那些圣徒们。谁要是想变得神圣，他就必须吃猪头和猪蹄，忍受更多其他常人一无所知的事情。人们把布拉修斯从地牢里押了出来，把他吊在一根横梁上。然后侯爵的仆人们过来用铁梳扯去他身上的肉。我把仆人们使用的铁梳想象成铁耙，它们和阿希姆的那把铁梳不一样，他那把会在阳光下闪烁，当他用它梳头的时候。我以前有一把梳子，从梳子里伸出一个可下沉的铁销作为手柄，它甚至可以插在地上，如果人们把它像飞刀一样掷出去。在圣徒布拉修斯吊在横梁上期间，来了七位女士，她们把他的每一滴血都积存起来。侯爵让人抓住这些女人。但是这些女人们说道：如果要让我们崇拜你的众神，那就让人把他们带到池塘边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那儿给他们净身并朝拜他们。侯爵起初很高兴，但是一旦那些圣像被放置到池塘边之后，这些女人就索性把它们全都撞入水中。侯爵非常暴怒并捶打自己，这些女人太令他生气了，而她们则说道：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神灵，他们就不会沉入水底，就会事先意识到我们的计谋。这让侯爵无法忍受了。他让人把滚烫的铅、铁质的梳子和七副铁甲放在一侧，把七件柔软的亚麻衬衣放在另一侧。现在这些女人应当做出选择。但是其中一名有两个孩子的女人抓起那些衬衣，把它们扔进火炉。孩子们知道现在将会发生什么，因此他们喊道：不要丢下我们，而是把我们一同带上，为了让我们能够品尝甜蜜

的极乐世界，就像不久前品尝你的乳汁一样。当这些女人也被吊起来，当人们用铁梳扯去她们身上的肉时，从她们身上滴下的不是血液而是乳汁。她们的肉也不是红的。而是白色的。然后火炉被加得更热，人们把这些女人从横梁上解下来，把她们推到火里。可是火却熄灭了。从这群女人我不由得想起克里斯蒂安妮、加比和玛里昂，皮肤开裂坐在火炉里一定是很可怕的事情，无论现在火是否熄灭，因此当这些女人终于被斩首的时候，我感到彻底放松了下来。然后侯爵又转向布拉修斯。他现在应当如先前的圣像那样被投入池塘淹死。但是当他在胸前画了十字之后，池塘变得彻底干涸了。侯爵派出六十五个人追赶他，但是原先池塘里的水像洪流一样返回，使他们统统丧命。最后布拉修斯也被砍头。故事总是以砍头收尾。砍头带有最终的意思。就连上帝也对砍头无能为力。砍头之后人们只能没有头一直跑到他的墓地，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当我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圣徒卡塔琳娜和圣徒伊拉斯莫。我想象圣徒卡塔琳娜被绷在上面的那只轮子，还有把圣徒伊拉斯莫的肠子缠绕起来的绞车。也许圣徒伊拉斯莫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肠痉挛的痛苦。但是圣徒卡塔琳娜能帮助人们什么呢？

夜里我经常梦到一些我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地方。铁手。铁道枕木。猎舍。养鱼。这些都是去年夏天我们在假期出行期间下车停留过的车站。一切都已经隔了很远。我和其他人排成两队。12点面包被斜着切好。中午的时光没完没了，在我想起家的时候。山丘。穿过树林的轨道。下雨的时候我们就蹲在树下，凝望林中空地。我们家里的房子空荡荡的。看不到明爱会那位女士。摇篮里见不到我弟弟的影子。一个工人也没有。我母亲在厨房里。只有在午睡时她才会安静地躺下来。最晚4点钟她就又起床了。煮咖啡。坐在我对面。她吃一块蛋糕。我吃一小块酥皮点心。然后我又回到自己房间。做家庭作业。我坐在一大堆作业本前面。然后我从众多书籍里取出一本开始阅读。5点钟再次走出房间去吃晚饭。骑着自行车去找阿希姆。步行沿埃里希-奥伦豪尔大街向上去赖讷家。但愿他父母还没有下班回家。这样我们就可以听收音机了。他哥哥有时会早回家。给我们一支HB牌香烟抽。又回到家里。吃完饭。还看了会儿电视。如果第二天没有要写的作业。整理

书包。现在拿出那些标准A4笔记本。它们从上高级文科中学四年级时就有了。素描簿。百利金颜料盒。又忘记买一管锌白颜料了。画笔没有冲洗彻底。蓝色的颜料管已经被挤空了。因为咽喉炎一周没去学校。收音机在床边放着。一本《米老鼠》画册。10点钟我母亲给房间通风。放学后阿希姆来了。他带来了家庭作业。我只能勉强吞咽，不能正确说话。他身上闻起来有烟味儿。在回家的路上抽了一支烟。今天他去了弗里茨-卡勒大街他祖母家。在狭长的走廊里用气枪射击。可以想看多长时间电视就看多久。得到了买小人书的钱。站在庭院入口处吸了一支烟。凝视着石块路面。望着工厂围墙。或许去高处的费迪南德书店。转动摆着袖珍图书的书架。仔细观看那些书名。就跟我在休假期间每天在文具店里一样，当我父母坐在疗养公园里的时候。有时在上午我们组织一次郊游。紧接着在父母睡午觉时我就又去文具店那里。没有任何一家文具店能够像那位瘫痪者所开的商店那样拥有这么多小册子。他的文具店在毛厄夫人的商店对面，里面光线很暗。那些小册子全都堆在他的写字桌上。《尼克》《阿基姆》《蒂伯尔》《基姆》《西古尔德》《法尔克》。毛厄夫人的商店里只有《米老鼠》《费利克斯》和《费克斯和福克西》。我从不把整堆小册子翻看个遍。只是把摞在上面的几本稍微翻看一下。那些画册很好闻。它们都很新。如果有新一期的《西古尔德》我就会买。《法尔克》跟它有些相似。但是我觉得《西古尔德》更好。一名来自柏林的男孩叫法尔克，他和他的班级同学在罗腾堡度假。就像我们和我们班同学一样。我有两次在晚饭前和他交谈过。他只和他母亲住在一起。我们班也有一个只和她母亲住在一起的女孩。法尔克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尾的签名是“法尔克”。但是信封上写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我只在公园影院看过《温尼托1》《老苏尔汉德》和《银湖宝藏》。《温尼托2》我是作为专辑收藏的。作为四重唱专辑。科曼奇族人和法利赛人一样。温尼托试图说服他们。他站在峡谷中间的一块岩石上，像耶稣一样张开双臂，对科曼奇族人的头领说：朝我开枪。对方朝温尼托开了枪。但是温尼托站在那儿安然无恙。岩石后面到处都站着手执猎枪的科曼奇族人。温尼托一直伸展着双臂。朝我开枪，现在他向所有的科曼奇族人喊道。他们朝他开枪。但他始终安然无恙地站在那儿。科曼奇族人意识到温尼托说的是实话。人们欺骗了他们，卖给他们的

猎枪里装的是空包弹。在温尼托死前他们觉察到真相。法利赛人是在耶稣死后和复活之后才觉察到真相的。

询问类比推理这个话题

我们来谈一下贝尔恩德吧。您太过固执地坚持自己对于克劳迪娅的看法，真的，咱们关起门来说话，您把这个女人变成了一位圣人，您把自己一生中缺失的东西全都投射到她的身上。

一位圣人，不，真的没有。

哪里，哪里，就像您以一种循环论证的方式，把您自己的感觉也同样强加给她那样，也就是自认为她也同样在想您，在想您能够或者已经拯救了她，认为她在想象，您怎样能够随时出现在她身边，同时是她在暗中观察着您，由此可见这一切相当令人作呕。

您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

是啊，是啊，当然了。一句也听不懂。任何事情都不允许触动存在于你们两人之间的这种神圣的联系.....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联系，这就是事实。至多是我们彼此错过了对方。

可这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基础，这样的亲密关系恰恰在人世间无法如愿，只能成为人的幻觉。《彼得·埃伯特逊》（Peter Ibbetson），这是您最喜欢的影片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好吧，就算是最喜欢的影片。在很多、的确是在很多年以前我觉得这部影片还是不错的，但当时我很年轻。

是的，很年轻，人们总还是这样。

您说什么？

当然了，在此期间脑神经研究断定了这一点。人们只在外观上变老，内心却没有任何发展变化。

没有任何发展变化？这话又从何说起呢？我推测这又是您的一个不成功的激将法。

好吧，您仔细想一想。从那时至今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四十年？四十五年？然后呢？您内心发生变化了吗？您真的改变了自己？让自己得到了解脱？使您的人生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向？

就像您那样？不，这我承认。这里所说的转向可能也是一种幻想。

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又涉及您的养父海德格尔。在陷入极度困境和无法继续前行时，人们就会转向普遍人类，尝试从存在角度对人加以确定。

我觉得您之前所说的至关重要的转向要有意思得多，因为我不断地在问自己，这种情况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人们突然不再捍卫红军派，而是成了纳粹，或者像您一样供职于公司或者您说的那些机构。

随您怎么认为好了。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同样可以这么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内心里。

我们最好还是来谈谈贝尔恩德吧。那么，事情具体是怎样的呢？您在读大学期间去过法国，为了在他那儿接受一种短期或者周末治疗……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再没有见过贝尔恩德。

在那次治疗之后？

不，是从那个时候，从中学时代起，从八年级开始。我指的是这个。

在柏林也没见过？

我从未去过柏林。

您从没去过柏林？

我指的是当时，是您谈到的那段时期，当时克劳迪娅在柏林，她打算和贝尔恩德一道随便搞一次行动……

好的，我们来谈论一下这次行动。虽然您没有亲自在场或者参与，但您肯定是知情的？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一次什么样的行动。

我可以提供一些信息供您选择。我只谈那些尚未得到制裁的罪行。例如蒂莫·林内尔特劫持事件。

蒂莫·林内尔特，那是发生在1964年的事件，当时还根本不存在红军派。

但是那个男孩是在1967年才被找到的，当年最新一期《明镜》周刊的醒目标题恰恰是“叛逆的柏林大学生”。是啊，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当时就在柏林。

克劳迪娅是1969年年底才去的柏林，这又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贝尔恩德还要更晚，我觉得。此外案犯早已被抓获，他是那个叫克劳斯·勒讷特的家伙，是林内尔特家的一位熟人。

东德把这起劫持事件拍成了电影，您、贝尔恩德和克劳迪娅在影片里也出演过群众演员，那个克劳斯·勒讷特在片中由库尔特·卡赫里奇扮演，库尔特1978年年仅四十三岁时就突然去世了。就在克里斯汀·库比被逮捕后不久，她制造了一起致使多人受伤的相当血腥的事件。

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在红军派和蒂莫·林内尔特之间完全有联系，林内尔特劫持事件当时给您留下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它与判处必须向红十字会组织缴纳五马克罚金的判决一道（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判决非常可疑），导致了红军派的创立。很简单，因为您不想总站在受害者一边。

就像已经说过的那样，绑架和杀害蒂莫·林内尔特的案犯叫克劳斯·勒讷特，对他的判决是具有法律确定效力的。

您大概知道这起罪行还涉及第二名案犯的说法吧？

就像刺杀肯尼迪事件中的第二名射手.....

是的，蒂莫·林内尔特劫持事件也是类似的情况，克劳斯·勒讷特不可能一个人把男孩的尸体藏匿三年之久。

为什么不可能？他首先杀害了男孩，然后策划了劫持事件。

那个勒讷特也没念完高中，就跟您当年一样。他难道不是和您在同一所学校吗？

他比我大十五岁。您还想把我和谁联系在一起呢？

您看，情况是这样的，他碰巧在您出生那年失去了父亲，那时他十四岁，就跟您在1969年时的年龄一样，当时他想自杀，也跟您一样，因为您在同样的年纪失去了母亲，但是他不仅跟您一样产生了那样的想法，也就是在去牧区图书馆的台阶上用阿希姆的三刃匕首只在离手腕太远的上臂划一下，而且他还去了克莱因费尔登辛，跳进那里的游泳池，尽管他和您当年一样不会游泳，然后他干脆屏住呼吸，一直沉到池底。正巧一个男人站在那里看到了这一幕，他毫不迟疑地跳进水中去救勒讷特。接着他把他送回了家，送到他母亲、那位年轻的寡妇那里。生活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出于感激或者其他原因，母亲爱上了她儿子的救命恩人。没过多久两人就结婚了。现在勒讷特处于一种走投无路的境况，因为他不但没有出于对父亲死亡的悲伤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是彻底摧毁了对父亲的怀念，因为现在有一个新的男人取代了他的位置，就像明爱会那位女士取代了您的母亲一样，这种情况对他的打击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作为怨恨时刻伴随他的左右。您了解这种情形，首先是辍学，然后派送洗好的衣物，刮去陶努斯大街上高雅的旅馆阳台上的鸽子粪，用欺诈小伎俩提高微薄的工资收入，然后当他看到那个无辜的小男孩时，他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时

他脑子里再次浮现出那次不成功的自杀企图，然后他眼前发黑，他扣动了扳机。情况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

您问我什么？

不，我的意思是，既然生平如此相似，那您肯定能够为查明这起案件做出一些贡献的。

这起案件从1967年开始就已经被侦破了。

侦破，无论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被描述。您对案件侦破的辩证法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它不会使神话沉寂，恰恰相反。特别是因为案犯从1985年开始又重获自由了。

因为他服刑期已满。

啊呀，现在您突然对这件事掉以轻心了？当时您可是因为害怕而夜里睡不着觉。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是其一。其二当时案犯还未被绳之以法。

这也和今天一样。

是的，但是那个时候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案犯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作案原因人们从未真正查明过。

我只是想说，当时人们从整体上表现出的那种歇斯底里。人们在赫尔特百货商场给一个儿童模型穿上失踪的蒂莫·林内尔特的服装，并把它摆在橱窗里展览。然后人们定期路过威廉大街上蒂莫父母的房子，或者从位于瓦格曼大街的古董店旁边走过。

红军派也主要是从事劫持活动，同样经常残忍地杀害他们的牺牲品，就像小蒂莫所遭遇的那样，这难道也是纯粹的偶然、和您一点儿关系

也没有？如果仔细观察这一切，这些相似的情况，人们可以称之为证据链。

人们充其量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作感应性调查。只是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类比推理？有的，有的。但是问一些别的吧：在这种害怕被绑架的心理背后，难道不是隐藏着一种针对您家人的猛烈攻击吗？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在您的幻想中劫匪杀害了您全家，只是为了能够靠近您并把您劫走。但是整个过程并没有逻辑，因为应当由谁来支付赎金呢？

恐惧经常是没有逻辑的。

但有时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把这种情况和于尔根·巴尔奇联想到了一起。

他也没有杀害父母，而只是谋害了小男孩。

我说的是那种攻击性，那种杀人的意愿。

这难道不更像是在说您自己吗？您的全部家人必须死去，仅仅是为了您能够沉浸在自己对选定人质的自我陶醉的夸大幻想中。这就是您为什么去法国探访您的老朋友贝尔恩德、为了把这一过程以治疗的方式再整理一遍的原因吗？

我从未去过法国。

您从未去过柏林，您从未去过法国，或许也从未去过威斯巴登……

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从未去法国找过贝尔恩德。几个小时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法国生活或者在那儿生活过，也不知道他据说是治疗医师。

但我们却在他那儿您的病历中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材料。

没有关于我的病历，更不用说在法国和在贝尔恩德那儿了。

如果我比如提起“腹语术”这个关键词的话，或许您又能回忆起些什么？

您是从哪儿看到这个的？

我不是说了嘛：从您的病历中。

来自埃彭多夫的病历？

我们可压根儿没有谈到这个。

但是.....

您的朋友贝尔恩德，他在对待数据保护这件事上不是十分认真。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还应当对您讲多少遍呢？我们曾在一个班里一起学习过。

来自同一班级的两名同学，您也一直这么希望，和克劳斯·哈芬斯坦。
《你们肯定是十一个朋友》，这可是你们最爱看的书，还有《私人侦探蒂格尔曼》。

格列高利·纳齐安的辩解

写于即将离开天主教寄宿学校之前

霍伦索恩（Höllensohn），德文意译为“地狱之子”。

我是上帝的垃圾。我是魔鬼约翰内斯。我是格列高利·霍伦索恩^①，三位神学家和圣僧之一，作为地点与姓氏同名的格列高利·纳齐安的儿子出生在纳齐安，他的纪念日正好比我的早一天，也就是在一年的第一天1月1日被庆祝，而我总是作为第二个被排在1月2日，生前我从未成功地移居到雅利安，而总是被固定为纳齐安的后代，我在这个不幸的地方出生和死亡，正如我父亲也是在那儿出生和死亡的。我父亲在那里建造了他的八角形教堂，我从早到晚都在教堂里忏悔，为了以后遁入孤独，不像他那样结婚，因为他结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我母亲能够生出我，紧接着使他信奉基督教。因为我生活在纳齐安，我毕生都在这里，因为我总是我父亲的儿子，总是长者的晚辈，因此我必须与阿里安教派辩论，它剥夺了我作为神圣三位一体的一部分的权利，因为阿利乌宣称，受造的圣子永远不可能与非受造的圣父相似，更谈不上与他相等了。既然我是儿子，必须继承我父亲在纳齐安的遗产，我就要使尽一切力量，去说服那一千八百名主教，让他们相信儿子（圣子）是受胎而成，但不是被创造的，也就是说我不是造物的一部分，我也确实不是，因为我从未感觉自己是造物的一部分，而一直是创造中的异物，因为我过去是并且永远都将是父亲的一部分，是他遗产和他城市的一部分，我们俩都是以这座城市的名字被命名的，即使他已经死了，因此我想至少确认，我和他是用相同的物质构造的，也就是说本体相同的，既然不可能是阿里安教派信徒，那么我就是同性同体，是一个公开表明信仰的同性恋者，他不再像他父亲那样结婚，不需要使他皈依的女人，因为父亲用他的物质在纳齐安创造了我并把我留在那里，在那儿我绞尽脑汁抵抗敌人，不仅与那种异本体论的错误

信仰相决裂，而且也摒弃了上帝也就是天父创造了圣灵的思想，因为圣父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尽管他不断尝试让他的圣子相信这一点，但在创造圣灵方面却达到了极限。究竟还有些什么呢？圣子不是由相同的材料构成的，圣灵是被圣父创造的？那么他完全可以一个人在他的八角形教堂里做所有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谁说服他让他产生了这种思想，可能是因为他计划将三位一体扩展成四位一体，就像一些人已经在尝试去做的那样，他们将圣子清点两遍，一遍当作人另一遍当作神，而这原则上挺合我心意的，另一方面其他人想把圣母吸收进来，这不管怎样也会显得不好，因为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会显得有些伤风败俗，尽管这个女人是圣母，也就是说童贞女玛利亚，此外她也参与了“圣安妮三人一起”（圣安妮、她的女儿玛利亚、玛利亚的孩子耶稣）圣像描述的产生，也对另一种构造提出了质疑，总而言之，首先分别存在我们三个人，即圣父、圣子和圣灵，然后是三位一体作为第四个成员，反正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好吧，要是这样人们马上就会回忆起吹毛求疵的前苏格拉底哲学，那个年代阿喀琉斯永远也赶不上乌龟，因为一旦人们开始这么做了，人们就能设计出所有可能性的编组，例如圣子和圣灵作为分离的二重性等等，但是因为人们无法发展这种思想，也不愿意以牺牲知性的方式放弃这种思想，所以人们又开始慢慢地对所有的编组进行剥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上帝，他面对的是众多神灵和形形色色的编组，阿喀琉斯与前面乌龟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但他还是永远也赶不上乌龟，同样人们永远也赶不上上帝，一旦人们开始有了这种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马上重新跪拜在一头金牛前，或者站在泥足上朝拜另一名偶像，把信仰通通搁置一边，这样我也至少不必再费尽艰辛，不必总是继续保卫父亲在纳齐安的遗产免遭所有可能的攻击了。虽然我亲自认识罗马皇帝叛教者尤利安，令人尴尬的是这事发生在雅典，当时我暂时离开纳齐安，为了见识一下新柏拉图主义者有什么能耐，只不过我在普利斯库斯那儿报名听课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我想强调这一点，仅仅是装样子，但并不是带着像阿里安教派之于圣子所声称的那种假身，因为圣子被赋予了必须在自己身上感受痛苦的使命，亲身感受所有的苦难和折磨，即便他只是在装模作样地了解世上发生的事情，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物质，因为他是圣父和圣父从未创造过的圣灵的同性同体。但是一切都在按照天意发生，多神论者和叛教者尤利安早已发誓放弃了基督

教，为了献身于神通术及其奇特的仪式，通过与他的私交我能够更好和更巧妙地对抗他的邪说，也能致使叛教者尤利安的堂兄弟把他监禁八个月，以使他脱离歧途，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因为他早已把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以及各种神通术方面的戏法混杂成一种个人信仰，只是为了不必再信仰一个天主和他的一个圣子还有他的一个圣灵。我经常和巴西尔以及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一世讨论并揣测，叛教者尤利安究竟有什么打算，为何他作为唯一的皇帝非得坚决阻止罗马基督教帝国，宣布废止他叔叔的宗教改革，仅仅是因为康斯坦丁错过了把基督教明确立为国教，在对待异教礼俗时简直太过松懈，对异教行为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措施，尽管我们总是愿意接受异教徒的节日和仪式，归根结底我们全部的节日都是以他们的节日为基础的，复活节、圣诞节、万圣节，就连一些不太隆重的节日如瓦伦丁节也源自古罗马的牧神节，在这方面更大的迎合和迁就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无论是多大程度的不同信仰的调和。人们必须灵活处事，在这一点上我与克里索斯托（又称“金口约翰”）观点不一，对我来说有时他过于沉醉于某事了。让人把加沙所有的异教徒寺院通通破坏掉，非得这么做吗？当然他原则上是对的，但是这样做会很容易让人们与他为敌。相反巴西尔会从所有的事情里脱身，在遇有疑惑时他的肝脏又会出问题，然后他就会派他的小弟尼撒的格列高利前去处理，我已经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设定一种新的三位一体：三位格列高利，当然首先是我父亲，然后是我，再就是他。这种设定的实用之处在于，我们三人都有相同的名字，这就避免了在三位一体内部的名称统一方面产生那么多麻烦。好了，但是这些更多的是出于开玩笑才说的，因为此外我和巴西尔以及他的小弟一道出演了三位卡帕多细亚之父，此外我和巴西尔以及克里索斯托还一起拜访了三位圣僧，在我看来这就够了，虽然在三个总是每三人一起出现的编组当中当然是非常棒的事情。但是人们不能为这些全都要被处理的问题分散精力。我只说：多纳提鲁斯。或者诺瓦提亚鲁斯。或者以优诺米为核心的新阿里安教徒，他们又重新发掘出那种受造圣子的说法。现在还有那些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们提出的灵魂上层总是滞留在神界，灵魂上层在每个人身上也能出现，这样说可是相当严重地亵渎神明了，因为要是这样每个人都将有三位一体的特质了，首先是身体，然后是身体里的这部分灵魂，第三是另一部分灵魂，实际上是在圣灵身上。这是一种令人无法

置信的亵渎神灵，另外下一步也已经被事先确定了：很明显，如果总归灵魂的一部分总是神圣的，那么灵魂也就能够自我救赎，也就是通过自我认识，那么人们也就能够放弃上帝的化为人身和所有那些仪式了。只要一想到这些，我就可能忘却我的基督教博爱精神。多亏新柏拉图主义者自己彼此也闹翻了，杨布里科斯不久就解散了该团体，因为他不无道理地说，灵魂不可能在部分上是神圣的，否则人们就不会这么阴郁易怒地到处乱跑了，最终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论据，无论普罗提诺怎么说。为了接近神灵，杨布里科斯引入了一些礼俗，这样他又与我们非常亲近了。或许通过这段弯路他们又会回到他们的源头，即柏拉图主义者那里，毕竟他们就是以柏拉图主义者为依据的，因为纽曼洛斯也知道三位一体，当然是以一种好像作为三位神灵的木刻版画的形式，还不知晓三位一体的重大秘密。但是如果他最高层的神远离了物质而且也不作为，人们就可以很容易把这位神和圣灵等同起来。他的第二位神虽然是作为造物神出现，但他只有在观察第一位神的时候才能够创造，这位神就将是我们的圣父上帝，他的第三位神在物质内部实现了化为人身，他所体现的当然是我们信仰中的圣子，因为圣子不仅能够从事于伟大的思想，就像圣父或者圣灵那样，而且还必须做非常具体的基础工作，我只说：钉死于十字架、基督的葬仪、耶稣复活，总之都是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圣子们遇到的情况总是考验其信仰的试金石。牺牲自己，并且必须为那种美妙动听的理论承担后果的是我们。脏活都推给了我们，如果允许我说得再明确一些，所有那些压在我们身上的过分要求，继承“格列高利”这个名字，继承纳齐安这个地方的遗产，现在又用这种站不住脚的理论构想打发我们踏上受难之路。但是对我来说怎么都行，所有的妥协都不成问题，只要这种无休止的关于假身的讨论能够停止。我对整个幻影说已经感到腻烦了，不管人们采取何种论证方式，是否圣子现在仅存在于世人的幻觉中，也只是好像受过难，还是是否他没有降生、没有肉身、没有形状地在四处游走，还是一切只是幻想，正如马吉安所言，因为高贵的天主无法想象圣子会降临凡间，因为他无法想象圣子真的会受难，而且这种苦难涉及的真的是鲜血、汗水和眼泪以及在我看来的另一种东西，因为成为圣子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人们不可能用巧妙的论据让自己退回到精神的压抑中去，从而不使任何人遭遇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另一种荒诞无稽之谈，即认为古利奈人西

门不仅背负了圣子的十字架，而且还替他承担了整个钉死于十字架过程，而圣子则变得隐身，完好无损地升天了。在此人们可能会真正感到不舒服，但圣子不会感到不舒服，就像华伦提努所说的那样。他也是

上帝取之不尽的葡萄种植园里的一名空想家和小丑，他真的认为圣子能够吃喝但不排泄。是的，当然了，一切都没问题，人们把吃进去的东西索性扣留一生，因为那些饭菜当然在人的体内也不会腐烂，因为人们自己也是不朽的，但可能会膨胀得厉害。难怪这种情况人们正好能忍受将近三十三年，我不想知道当朗基努斯把长矛刺进耶稣侧腹时，从里面流出的真正是什么。但是算了，我只是有些激动而已。但是在涉及这个话题时，我就是无法保持平静。真的不能。

格尔妮卡认为以过去为导向是一个错误

格尔妮卡？

什么事？

你不是真的在场，是不是？

不，不是真的。为什么问这个？

最近我总觉得辨不清方向。

最近？

是的，我知道，或许我一直就有这样的问题。

那又怎样？你这一次又苦思冥想什么了？

为何这么问？

每次当你来找我时，你的情况通常涉及的都是些多愁善感的琐碎事。

这话听起来怎么这样。

是的，这一次你的情况听起来是怎样的呢？

或许你说的有道理。我刚好想起“无辜”这个话题。

你看，我说得没错吧。

是的，不好意思。

那就说吧，不要让人套出你的每一句话。

我只是在想，人们总给人一种印象，仿佛那是一种必然会被破坏的状态。我认为，当然它会被破坏，但是无辜，它也总是和无知有关，而无知又会和一种预感有关，也就是和另一种形式的知道有关。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可能你对一些东西没有直接的意识，但是你能更好地感觉它。恰恰是因为你无法对它进行分类，因为你不受知道的影响，你才能越发清晰地感受它。但是那不只是一种预感，确切地说那是一种感官的确信，尽管你不能命名它，或者说得更好：恰恰是因为你不能命名它。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任何下文了。我只是禁不住偏偏要想这样的事情，比如想到吉贝尔·凯尔伯游乐场，这种极度的期待，虽然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那儿究竟期待些什么。我的意思是，在我已经过了去那里只是想乘坐旋转木马的年龄时，我在那儿更多的只是在碰碰车和履带式玩具车辆旁边转来转去。但是恰恰是在那一年，就像阿希姆总说的那样，人们还不到找对象的年纪，还不到偷窥女孩的年纪，可不管怎样那种预感却已经存在了。然后是烘托了这种感觉的音乐，还有人们一知半解的歌词：《莉莉的照片》《我是个男孩》，这些也都只是预感，但是奇特的是它们都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像后来所表明的那样。仔细一想这只是一年当中短短的四天，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周五和周六放学后我马上就去了游乐场，尽管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热闹。那种不耐烦。那是只有一个孩子才会有得不耐烦，到了晚上又会如此失落，因为我必须7点钟、最晚7点半回家，而我最喜欢在那里一直待到最后再走，为了不至于错过任何场面。傍晚雾气从大黄荃菜田和对面的溪流上升腾起来，它吹走了爆米花和烤肠的香味，于是空中便弥漫着那股独特的味道。

你也总是把一切都想得非常合理，我觉得。无辜的男孩，不加过滤地吸收了一切，在超自然的领域里飘荡而去。但是一切并不是这样的。也总会涉及区分和划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只需想一下比如这种情况会令你多么尴尬，当你觉得比吉斯乐队的《五月的圣诞》（First of May）这首歌很好听的时候。表面上你仍在嘲笑买了《敖德萨》（Odessa）专辑的木匠，背地里你却把它借来录制，但你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你只想随便听听，把它包在一张奶油乐队和一张布鲁斯摇滚乐队的唱片之间，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你听这样的东西了。

是的，你当然说的对。但是那种感觉又从何而来呢？也就是感觉曾经有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人们完全独立地生活在自己未被开化的宇宙里，在那里他既不是儿童也不是青少年，更谈不上是成年人了。

那不过是感觉而已。

但是为什么人们想回到那里去？

很简单这是一个错误，相信我。

你这么认为？

是的，我这么认为。人们把渴望向前还是向后迁移，迁移到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苦难统统消失的世界，最终这都是一回事。

但是我可以准确地命名它。它是那次发生在1969年7月的庆祝会，不是之前的那次，也不是之后的那次。如果说所有其他的庆祝会都大同小异的话，那么那一次却非同寻常，尽管我也没做什么与平时不一样的事情。此外我也做不了别的。因为人们后来用特殊的日子、特别的休假、出游和节日所尝试的，那真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忙乱。或许某个时候，当人们根本不再想起这些，根本不再考虑到这些，人们又会享受生命中的幸福时刻，一个晚上，一天夜里。就像我们当时在犹太驱逐者广场对面的旅馆里那样。

这也没能帮助我们。

什么？犹太.....

简直是胡说八道，是在穆尔魏登大街上的那个夜晚。

是啊，当然了，无辜肯定不复存在了，我刚刚就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无辜。

但是对这件事我也一无所知，而只是预感的。

是的，你预感得对。

你不是吗？

一名未满六岁的儿童尝试对世界做出解释，并解释神灵是怎样进到袋子里的

我知道，科学家们在第三帝国期间就已开始制订、历经战争动乱在黑暗的地下室里继续整理、现在终于完成了一份旨在促进儿童早教和智力开发的项目清单，根据这份清单一名像我这么大的儿童据说已经诵读了四次有吟唱的弥撒，其中至少有一次是天主教主教级教士主持的大弥撒，他应当能够操作四种不同的炸药包引信，能够料理至少三种不同的伤情，在出现其中一种伤情时有必要截去一段肢体。这名儿童应当想象到生命是怎样走向终点的，死亡过程能够拖延多久，他应当知道人们怎样首先饲养三种不同的动物，然后把它们屠宰掉，剥去它们的皮，把它们肢解并做给他的游戏伙伴们吃，据说他观察过父母同房，观察过父亲虐待家人，观察过母亲保持沉默，观察过网球老师在更衣间手淫，据说他在墓地一个已经被掘开的坟墓里至少度过了一夜，坚定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再从里面醒过来了。据说他暂时使自己眼花缭乱，以这种状态穿越了两条主干道，他应当掌握三种魔术、至少两个独裁国家国歌的所有节段、此外还有三个谜语、三则笑话和一道绕口令。据说他经历过三次神灵显现，能够表演哑剧，据说他生产并隐形传送过外质，明白了停顿是音乐的一部分，但不是真正的学校时光的一部分，更不是为了用一块石头砸自己的脑袋，这样就能够带着一处裂伤提前回家了。他应当熟悉用德语和拉丁语进行的阶梯祷告以及长篇信条，他应当知道什么是秘密，并会保守秘密不把它告诉任何其他人，因为否则的话他就会感觉喉咙受到挤压，就跟现在一样，只是要更为强烈一些。此外据说他曾经穿了一件滑稽和胳膊底下被撕破的戏服，站在舞台上表演过蜥蜴人，为此他被人们起哄和投掷了西红柿，但即使是在回家的路上也没掉过眼泪。

很遗憾，对所有这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一概不会。如此看来按照学习心理学的教条，我是一个无能和被派不上任何用场的蠢人或者说得

更好白痴，这样的人一生只有一次，恰恰是现在，被赐予了多少能够自由说话的权利，因此在我说了我应当知道但却不知道的事情之后，我想利用这次宠信，来说说我不应当知道但却知道的事情。

范畴作为神的象征物降落到普通劳动者的住房里，它们（范畴）落到被涂了薄薄的一层黄油的面包中间，以至于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被多次抓取和世代代传递下来的香肠夹层，因此无法被认定为在我们日常生活背后坚持获得解脱的一种形而上学力量的标志，还在上述情形远未出现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人们可以把这样的事情理解为创立，在我看来也可以理解是对我们现在不得不生存其中的那种状态的解释。

为了参与发挥作用而把神的身体也就是那种有磨损的香肠夹层完全吃掉，事实表明这是后果严重和不容低估的错误，我们把自己人生的全部困苦，尤其把我们的死亡也归咎于这种错误，因为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带着一肚子神的标志四处游荡、自己却对此浑然不知更令人羞愧的了。那种腐蚀身体的疾病不仅仅（我要请求人们牢记这一点）是通过一块从城市肉铺买来的健康的加肉面包而产生的，就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因为只要人们把物体分开存放，使它们保持在一种分离的状态中，把自己感知为是与世界和意义相分离的，在所有的物体之前得知答案，在所有的物体之前获取希望，就不会出现任何差错，生命就像它本应的那样，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地流逝了，但是对于这一认识人们需要有遗忘的经验，即那种潜入虚无的体验，就像是在一个周一上午，在其他从更衣室出来之前，下潜到无人的游泳池里，但并不知道要憋多长时间的气，才能触到池底泛着蓝光的瓷砖，捞到那个带有更衣室牌号的小环链，与此同时水在挤压着耳朵和嘴巴。

我只能简单提及一下所有这些发生的事件，我只能把对这些事件的暗示播撒到世上，但是这样的暗示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为了不使它们再次作为被误解的象征物而流失，在所有这些事件远未发生之前（在此我向您透露的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就已经有了工厂、钟楼和城市。众神被吃力地缝在袋子里躺在一堵围墙后面，谁也不清楚他们将

会发生什么。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就更不清楚了。人们这样叮嘱我们：“不要爬到墙上！不要透过墙缝张望！遇到烧砖时亲吻它，但不要把它扔掉！”等等。这一切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内涵。我们跑着去上学，在课间操时间里我们从学校跑向山丘，然后再折返回来，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张嘴说话，我们就会受到责骂或者在钟楼里关学两个小时，而在家里姐姐则必须穿过黑暗的走廊去往客厅。

如果人们在被叫上讲台时再一次张嘴打探，他就会被用直尺斜着在手掌上抽一下，接着好像是不经意间尺子又会向上击打一下他的下巴。然后他被命令转过身去。太阳大声喊道：“看啊，我现在把你姐姐的双腿照得通亮。”我在我的本子里写下了对一个田鼠掘出的土丘的精确描述，一次，那是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我被这个土丘绊了个踉跄。远处那两辆市政装甲车轰隆隆地碾过高地，因为八点钟妓院就开张了。两名将军把人们拧紧在他们假肢上的铁钩抖落，借助这样的铁钩他们能够更好地从伤员的胸膛里拔出弹头，后来再从死者脱臼的嘴巴里拽出补牙。一切都有好的地方。我在黑板上的核心句下面没有点句号（黑点），而是画了一条线。

先生们！对世界做出解释，在今天晚上这对我来说显得多么容易，今晚我最后一次从山丘飞奔进城。首先我来到小溪边，然后蹦蹦跳跳地从桥上跑过，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当我感觉厚木板是怎样在我脚下摇摇晃晃地开始塌陷时。世界从来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合理，恰恰相反。房管员扇在面颊上的耳光，隔壁床上母亲的咳嗽声，同时感受一切，一下子让自己回忆起一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奇怪蜗牛是怎样漫游的，尽管在此说这个有些不大合适，很奇怪田鼠掘出的土丘从近处看会是怎样的，就像从远处看一个弹坑一样。人用武器来表明立场。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在课堂上深入了解武器类型，所有其他的事情在生活中都没有用处。无论是代数学还是几何学都没有用。在小孩子还不会爬行的时候，就把棍棒和皮鞭交到他们手里。实验证明，按照这样的方法身体发育的速度会是原先的四倍，大脑容积会随所摄入的成品食物成比例增加，以至于很快两岁的儿童就会以一种鲜亮的胡萝卜色调显得面色红润，就会嘲笑父母的担心，因为父母把他们抱在胳膊上举到交织着煎炸香味的厨房空气里，伴着儿童节目里顺

口溜的节奏把他们左右摇晃。但是这些都只是展望而已。那都是些幻景，描述了他们是怎样习惯于在吞食了多年的浆果和蝗虫之后去搅扰别人的。但我却获得了恩赐，也就是在我还不到六岁半的时候（为了也给您列举一个数字），我陷入了青春期前的那种不省人事的沉睡，这样我就用睡眠度过了战争的恐惧，也恰恰以此度过了个人的惊恐，对于这样的惊恐人们今天几乎没什么概念了。这里的关键词主要是：走廊、起居室、蛋花汤，从所有这些当中幸存下来，尽管我的人生在这个位置上来了个奇特的急转弯，使一种失忆围裹了我，为了让我能够继续思考、继续行走、继续站立和坐在午餐桌边。

当然我的生长发育以戏剧性的方式停止了。发育停滞是因为我不再领会任何事情了，就跟我失去了记忆一样。我在人们用自来水笔在一张方格纸上画给我的小路上瞎跑，总是去往相同的地方然后再掉头返回，这就是我做的一切。这真的就是我做的一切。人们把我放到一个盒子里，往我手里塞了一个开关，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外面缠绕在一起的记号——我指的并不是神明之路的标记，而是通过张开的咽喉落进胃里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缠结的形而上学的标志变异成权力的象征物和四方旗，它们很快就取代了面包上的香肠飘扬在工人住家的房顶上。就像以前火焰从年轻的心里喷射而出的那样，现在它们又从楼层和阁楼间里喷射而出，像草莓果酱浸入黄油面包那样钻进晾晒的床单。我们鼓掌并大声喊叫，如果时机成熟的话，我姐姐牵着我的手，把我斜拽过庭院，用沙子把我裹在箱子里，给了我铲子、水桶、木棍和自行车，我还是个不省人事的孩子，能够更快地奔跑、说话和解题，因为他缺失了记忆，因为仅仅是记忆使我们的生活沉重得令人无法忍受。在失忆的情况下我们无一例外地知道一切，我们会做一切，哪怕是把一张椅子放在下巴上做平衡表演，然后一跃跳到鼻子上，用牙齿咬住晾衣绳从院子上空滑过，在荡秋千时往裙子底下偷看，像一只小衣鱼那样爬到洗衣间，用安上的胳膊和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到了下面之后又从木桶旁边爬过，最后钻进一只歪倒的胶鞋里休息。

我的话题又回到那座城市，我在最后一次回家的路上终于在桥后面抵达那里。之前我还路过网球场，从铁轨旁边经过。最好我还是画一张

小图表吧：那边是被缝在袋子里的神灵，谁也不清楚是何原因，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对此当然有许多猜测和假说，那些更推崇理性主义解释的人说，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以生产和出口各式各样的材料为生。当然这座城市以它的物质性，几乎可以说是以它的物质浓度而闻名，这是对无生命、但也是对绝对性的强调，在这方面人们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否充分呢？其他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那种布袋命题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它是一种误译，是一种民间词源学方面的错误解释，袋子根本就不叫袋子，而是灯海或者光环，它们影射的是沼泽地区的鬼火，以前人们使神灵和所有人们喜欢及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沉入沼泽，这样一来沼泽很快就承载了一种在其深处震颤的意义，一种形而上的震动，它甚至准备使神灵的地位黯然失色，因此为了保住神灵，这对于城市的灵魂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人们必须把神灵和沼泽及其象征力量分开，由此沼泽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袋子，当然这种变化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就跟人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都跨越了好几百年一样，当然工人在他插上旗子的住房里是注意不到这一点即漫长的发展过程的，他只会一下子手里握着选票和饭菜票，但却不知所有这些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不知道发展历程是何等艰辛，直到现在那两辆装甲车在到处巡逻，在昔日的饲料萝卜田里举行射击训练，因为手里拿着钢盔作为餐具，站在野战炊事车前面，还要辨别所有的岔道，这当然给普通市民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此他应当在走廊上等候，直到被喊到名字，然后人们把单个的表格当面交给他，继而证明填写内容的正确性。

但是最后还需指出，那些袋子象征的是自己的死亡之身，当然同时也象征着城里纺织工人和裁缝所从事的活动，同时又象征着在沼泽边举行的古老的葬礼仪式。与此相反，在此我只想简要提及的那种精神分析学阐释变体却声称，使神灵与一开始给他们提供家园的沼泽相分离，这种做法不啻一种双重的否认，因为人们普遍把沼泽从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中清除了出去，这样也就清除了所有与沼泽哪怕有牵强联系的东西，例如谋害了一名商业代表，不管人们是自己干的还是至少参与了这样的谋杀，也包括清除了许多其他事物。使沼泽扭曲变形为纯粹的不再现有的象征，这又会以隐秘的方式把人和神重新连接起来，因为通过无论从神还是从自身出发皆否认沼泽的方式，人与这里

所说的神之间有了一种深刻的联系。准确地说就是：神和人在相互否认中相遇。

首先就说这么多。其他解释我就略过了，它们基本上只是已经提到过的解释的变体。那名在厨房用桌边（我自认为可以心安理得地这么假定）的工人反正对此也无所谓。他看着他的面包、配给券和日报，日报变得越来越薄，以至于不久甘蓝叶球就不再能够被裹在里面了，他在等着自己的名字被喊到，在走廊上或者在院子里的木板房后面。

但是还是回到我的小图表上来吧，那是我对人的无能以及由此产生的伟大文化的速写。也就是围墙后面袋子里的那些神灵。围墙本身的形象就十分壮观。它被设计得如此精巧，以至于人们可以沿着它走好几个小时，但却不肯定自己正好处在围墙的哪一侧，不肯定在什么位置是在城内，或者从我来说也不肯定在什么位置是在城外。那真是一种罕见的场景，我自己就拉着我姐姐的手沿着围墙反复走过，甚至在当时她腿上还缠着石膏绷带的时候。我们当时面颊赤热，对什么都很兴奋，尤其是处于不省人事状态中的我，当人们给我穿上那件棕色的西服上衣、在紧贴着身子的腋窝下给我搔痒时。在默默期待中我们迎着黄昏行进，为了能够正好在那一刻抵达围墙，当淡淡的月光以斑驳的碎块洒落到布满灰尘、只是被粗略测量的土地上、使四周景色沉浸在一片欢乐的光影里的时候。在道路两侧会出现小凉亭和僻静的橙树林，我是有些夸张，但所有这些都被探讨过，有些甚至已经在规划当中。就是这样的。从远处人们听到开阔的集会广场上的叫喊声。焰火升空，我们尝试借助其流星般的光线爬到围墙上去，尽管或者恰恰因为各种警告和禁令。但是围墙太高了。警报声马上响起，探照灯把平时僻静的道路连同每一根草茎都照得通亮。军人们开着那两辆装甲车出动。也就是说，他们半提着裤子，从妓院后面的停车场不加选择地朝着一个方向开去，其间他们不停地对着无线电步话机吼叫。我对此无所谓。我熟悉路。很简单我们向左转两次弯，人们就看不到我们了。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后院，坐到被转移出来的家具上，抽了两根每支五芬尼的香烟，我把烟吸进肺里，我姐姐只是乱呼一气，听被敲开的鸡蛋是怎样在铁质煎锅里发出滋滋声的。黄昏和刚刚开始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用手捂住眼睛，彼此领着对方不断进入新的走廊，

玩闻家具游戏。如果有其他孩子阻拦我们，我们就扯着他一直转圈，直到他像站不住脚的陀螺一样瘫倒在地。离我们必须回家的时间还早，这一点根本就不用去想。我把我的听写本卷起来装在了一个后裤袋里，一旦我们真的感到无聊，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我们就干脆用撕下的纸张玩沉船游戏，或者模拟城市、土地、河流。

谈到城市：我说起过那些神灵，他们被缝在袋子里，或许就像我解释的那样，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商品的象征，在一堵即使是对一个充分发育的人来说也很高的围墙后面的一个看不清的水塘或者池沼里漂浮着，某些人也说那是一个海湾。人们会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就连我也不容易回答，需要强调的是，我是从一种受宠的状态出发对您讲话的。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怎样用话语来表述，这让我觉得有些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尝试一下。您能回忆起来，那些猴子吃掉了城市缔造者的心脏，他在巡视土地时死去了，我们的城市就应当在这片土地上产生，那些猴子与被缝在袋子里的神灵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为此我必须要从更远的地方讲起了，我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我会长话短说的。某些人说，这样的人数量还不少，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从事于科研项目，他们的经费基础都来源于材料加工业，好了我再从头开始，某些人说，那些猴子不是真正的猴子——尽管我们在动物园里惊奇地观看这些猴子的后裔，在博物馆里观赏它们被剥制的标本——，更确切地说它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原始居民，我们今天不无道理地把这块土地称作我们的世界，而对于不属于我们世界的其他人来说它就是城市。如果从城市的材料加工业方面来观察，人们就不难意识到，以何种悲观的程度——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以一劳永逸的方式，至少是在话语交流中，克服了这种笨拙的接近事物的方式——，以何种惊人的程度上述论点对城市的经济基础提出了质疑。长毛绒玩具猴、塑料猴、猴节、失去的心之节、猴暴动节、胃起义日，整个商业部门都以作为我们文化的象征和起源的猴子为生，虽然当然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即我们在庆祝恰恰克服并摒弃了这种起源。尽管所有这些新的和令人折服的认识，我们现在应当怎样索性与我们的传统相决裂呢？用这些美好的节日？仅仅是想到孩子们，我自己也是个孩子，因此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总之有某些论点，我该怎么表达呢，就这么说吧，这些论点干脆就不能在社会上被传

播。上帝已死，这一论点比如说就属于类似的范畴。猴子是在城市建立之前的一种原始居民，或者：原始居民被城市缔造者根除了，这样的论点属于其他范畴。可以相互比较的还有：荒地在妓院后面开始延伸，事实上荒地根本就不荒凉，而是人们在上面建了许多棚屋。不，我们这样下去可不行。工商业联合会不久前才透露（对此政界毫无保留地大加赞扬），上帝应当被装进袋子里，就像猴子理应生活在树上一样。这可能会显得有些过于简短，但在本质上却并不颠倒。反正这对凝视着他的配给券的工人来说怎么都行，这些理论以及所有这些会产生什么后果只能让他不知所措，如果人们想一下，“原始居民”这个概念在意义上根本就不存在，城市居民是怎样产生的这一问题，迄今为止仅仅是在历史书里得到了令所有人感到满意的解答。

从这种关联出发需要提到一个女人，她是在一个箱子里被偷运到城市缔造者的船上的，城市缔造者在踏上这片土地时死去了，猴子们又从他的胸膛里掏走了他的心脏，现在该怎么说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又与他、这个既已死去又没有心脏的人发生了性关系，从这样的性关系中产生出一对双胞胎，这对双胞胎又生了另一对双胞胎，如此一直下去，直到住在插着旗子的房屋里的那名工人，他对这一切不是很感兴趣，我们在谈及这个话题时会偏离他的兴趣，如果我们毫无必要地使事情复杂化，因为他有权要求得到他的食物配给，而不是一块带有形而上夹层和暗示神的象征物的黄油面包，这样的东西也不会使人填饱肚子。因此我们对一种传统负有责任，不能使城市居民不知所措，通过我们让人改写历史书从而令普通人面对像“原始居民”这样的概念，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同时剥夺他慢慢喜欢上的节日和传统。出于满腔的热爱，也是为了对科学和研究尽职尽责：人们为城市历史的史料整编公开悬赏了高额奖金，当然这样的历史也完全可能是批评性的。艺术恰恰也包括科学不应当对日常政治负责，那样将意味着它们的终结，毫无疑问，只是现在涉及的正是框架问题，也就是那些研究规定自我划定的界限，因为这些对工人没有任何用处，工人不关心原始居民，尽管他每天要花八个小时用塑料和长毛绒来制造原始居民。背后议论声将会很大，提出异议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即认为这种原始居民不是玩具，不是玩笑，也不是人们放到小孩子床上的小丑形象，这样的异议完全在理。很明显要考虑其他可能性。产量受到了限制。最

后这样的原始居民根本就不再被生产了。然后可爱的灵魂得到了安宁。取而代之的是独特的单一经营，它仅仅局限于生产完全中性的材料。但是请您把这种情况向迄今为止每天用塑料或者长毛绒生产猴子的工人解释一下，同时也请您向他解释一下，为何所有的节日都被取消了，例如胃起义纪念日、猴子心脏节等等。那样的话他就必须去工厂上班，他就不能像未取消这些节日之前那样待在家里休息了。我根本不想谈及所有这些的历史进程，不想谈及人们会招致什么损失，抛弃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有那么多议论，说人们应当多为家庭做点什么，这样一来就会有两周的休假时间，但是这件事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工人在原先的节日里现在去工厂上班，如果他不能再用长毛绒或者塑料生产猴子了，那么他应当生产些什么呢？他应当不耐烦地坐着消磨时间和游手好闲，并意识到一种新的历史视角？请您想象一下这种情形，这真的很荒唐，那样的话每名普通工人都会抓抓脑袋表示不解，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是合乎常理的！人们在其他领域实施了改革，这一点您跟我一样都很清楚。城市还是城市，它会长寿下去。目前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必须往后放。也包括那堵我们晚上特别喜欢沿着它散步的围墙，人们不值得对它追本溯源，无论是从字面义还是从引申义上讲，在这一点上请您信任我。

虚构的友好2：关于自然之美

学校木板房。通道。停车场。自然是回忆。文化是记忆缺失。如果我转一下身，我就会失去平衡。几只愤怒之下被打碎的啤酒瓶的玻璃碎片。建筑工地前那些窗玻璃上带有白色横撑的窗户。阳光在领带别针上反光。一只鸟失去平衡，栽倒在无线电波之间的坡屋顶后面。然后风夹带着几片状如榛树叶的云从水面上掠过。某人用一把刀横推过地平线，又像切一块奶油蛋糕那样用它从精神病院被砍断的树木以及平屋顶上斜切过去。在车辆掉头处停放着带有沉降大灯的第二辆车。彩色的橡皮球从屋前花园一棵松树的树荫里滚了出来。床边放着配有谜语的电视报。

淡粉色在灰色上面保持了很长时间，它就像是在一杯精心调制的鸡尾酒里在电视光线的蓝色条纹上悬浮着。对面的房子被夹在另两栋房屋之间，那两栋房屋又被挤压在街区和街道里，它们就这样相互拥挤着斜穿过德国，一直延伸到一片沼泽地区，许多旅游巴士就翻倒在它里面。空荡荡的没有窗帘的黑洞，一道阳台门，它没有通向阳台，而是终结于一道栅栏：这是对一种建筑尝试的暗示。在威廉二世时代，这里的一切与我们今天这种混凝土化的空位生活有些不一样。楼房底层的树后面有一间浴室，它的天棚上布满了细碎的霉点。在秋日最后一缕阳光的球蛋白照射的刺激下，蚊群嗡嗡地从它们在梧桐树上的藏匿处里弹射而出，现在它们都消失不见了。窗玻璃上挂着细小的水滴。远处一棵白杨的树梢一动不动。为了存活，最好不再显出生命的迹象。变得越来越黑的是位于塌陷的烟囱之间的天线设备和卫星接收器张大的嘴巴，根据最新的排放规定，插在破损的烟囱接口里的是带有顶罩的双内壁钢管。屋顶天窗上几乎还看不到光泽。几乎听不到动静。小块的炭黑泡沫转着圈漂浮在凹陷窗台的积水里。风耗尽了最后的力气，躺在被挪走的栽花的木槽里。

猫灰色的寒冷拂过拐角处。令人着迷的是，在夏天去想那些在冬季的绝望中消散的自由。被束缚在鸡皮疙瘩、敏感的脖子和一种索然无味当中，即使拿酒精来与之对抗也是徒劳的。在这方面药片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能让人连续睡觉。在梦里天堂岛上下起了雨。人们站在沙滩上，眺望无边无垠的大海。事情结束了，人们作为孩子时就这么想，后来作为大孩子也这么想，现在还是这么想。在记忆中人们的相遇要更为温暖，房间里不是持续的低温，总而言之就是中世纪，那时候人们也都存活了下来，从一个城垛跳到另一个城垛，查看壕沟里他们敌人的尸骨，爱恋并用鲜明色彩装饰《圣经》的书页。厚厚的套头毛衫不一定非被解释为是拒绝的标志。但是确切地说手势却是。就像某人把头向后猛仰，如果他必须不喝水干服药片的话。干涩的嘴巴变成了习惯。在互联网上人们搜索那些跟他们长得很像的女人的照片。在照相馆里人们把长在这些女人身上的尾巴修饰掉。人们把那些照片旋转270度，直到它们盯着人们的眼睛在看。夜晚就这么过去了。其他人在为第二天做准备，不使自己吃力地为过去的事情而分散精力。在地下室里他们在被淘汰的车门上试验新的机械装置，为了更为有效地撬开门锁。直到最后一刻这些昔日的法律系学生还在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即这种意图还不到应受惩罚的地步。然后他们扣动扳机。这里涉及的是界限以及对界限的强制性遵守。移民政策。在这中间孩子们在四处乱走。

他在面对她时马上就让自己出了丑，因为七〇后的人对他来说如此亲近，八〇后的人则如此疏远，仿佛是他因睡眠而错过了他们。而她则的确因睡眠错过了大多数八〇后的人，像是才刚刚来到这个世上不久。这样你什么也没耽搁，他说道。灯光映在旋转门里。餐具碰撞时发出清脆的响声。一名中国侍者走了进来。他送来了一道印度菜。剩余的族群，其完整性人们只能在研究和考察中才会找到。因此人们也去听大学讲座。他甚至连到底什么是文化人类学都不知道，还是她正因为如此才和他谈论这个的？把他作为开发项目，为什么不呢？她将对数据进行分析，在一个相应的分布曲线图上展示之。透镜式投影仪。但是他又在说些什么呢，自己落在了后面，变得老迈，满怀思慕，白发苍苍，佝偻着身子。特别是在冬天。什么叫通宵达旦地欢闹？

人们描述的是楼房而不是身体，人们画下来的是走过的路程而不是思想。最后从分布在众多小纸条上的方程式里能够找到一种意义，它即使是对十四层高的大学生宿舍也足够了，有人在九月的一个晚上站在学生宿舍房顶挥舞一面旗帜。一种谁也没意识到的自杀企图。就连那人自己也没意识到。但尽管如此它是一次自杀企图。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技艺，是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在那里它以“自贬”这一名称而闻名。紧接着人们在一家商场餐馆里喝一杯咖啡，给自己往一个盘子上放两块从19点开始降价的不鲜亮的苹果蛋糕（以一块的价格买到两块），这一切都是为没落而服务的。与人们的预期相符那是黏稠的苹果酱，施普雷河上的油污在这里就是糖粉奶油细末，潘克河里的死鱼就是这里的葡萄干。城市上空变得昏暗。吸着烟的退休者们手里没有摇旗，在欣赏远处的景色。在打完淋病注射剂后他们当时也在一家这样的餐馆里吃饭。

跟许多年前一样大街上如此空旷。其实这正是设置弃婴保护舱或者美沙酮发放处的合适地点。垃圾桶隐藏在表面涂有砾石砂浆的混凝土基座里，一个穿着山羊皮夹克的女孩完全可以坐在一个这样的基座上，抽一支自己卷制的香烟。她在这里实习。或许他走得太远了。不，没错，前方就是。不再有点亮的灯光了。可能他们坐在后屋里，或者聚在小的煮茶室里。他进到院子里，在深蓝色的星空下突然像是站在一间古罗马王室的正厅里。流星把闪闪发光的点和线连接起来，从中他很快就看出了她的面容。她在微笑吗？如果她在微笑，那是同情还是冷漠？不是因为他在乎点什么，但是如果允许他提问的话，比如他们是怎样对待情感的，那些情感又去往何方，他们在危机过后、在返回时是怎么做的，怎么可能让住房不变得过于狭窄，而他们又搬到一起居住，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他也能得到一种真正的回答，而不仅仅又是些托词或者来自不同人生阶段的图片和明信片，它们最终像蛋糕块一样拼凑成一个整体，拼凑成一整块圆形大蛋糕，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以一块的价格拿走了两块，不是为了把它们吃掉，而仅仅是为了把它们摆放在别的地方，在那儿它们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用处，不会对那些退休者，也不会对厨房员工，他们平时是可以把剩余的食品带回家里的，就连对他来说也没有用处，他现在肚子不饿，先前也不感到饿，但是这里涉及的并不是这个，这里指的

是一些其他事情，这个其他事情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最终他为此付过钱，就是这样。如果付了钱，你就无须对为什么和为何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这就是付钱的好处所在。人们用钱给自己赎买了免于回答的自由，这也是所有其他相遇的复杂之处，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在一开始就谈论付钱，而是在结束时才谈。那样就为时太晚了。

在一种意念的驱使下，他晚上越来越频繁地来到大学生宿舍对面那个旧仓库的投影里。火车轰隆轰隆地驶过。夏天最后的味道附着在从房顶拉下来的油毛毡上。有时桥下会停一辆欧宝车，有人招手示意他近前。他花了二十马克买的安菲他明以一种特殊的无关紧要流经他的身体。天空以其透气的黑色好像离地面又近了一步，夜空里点缀着红色和蓝色的恒星。她刚刚挂在晾衣架上的不是天空，而是一条带镶饰的棉质紧身连袜裤。

通过采取一些姿势来麻醉自己，比如在夜里把头塞进她的两腿之间，为了忘却油毛毡和大学生宿舍对面那些破损的自行车轮胎的气味。在此没有比以为那个向自己倾诉的人可以高枕无忧更糟糕的了，在这里那个人就是这位女士，她在副驾驶座上事前毫无所知地把腿向上收起。她笑着从敞开的车窗看外面油菜田上的蓝天，油菜田上的草茎在风中摇曳，仿佛想指示栽有苹果树的小花园方向，它（小花园）将使这片具有欺骗性的田园景色显得完满。

没有比和那个向自己倾诉的人猜手势音节谜语更糟糕和更令人厌恶的了，这样的猜谜从下车一直持续到在铺上新床单的客床上的第一次舒展四肢，猜谜过程中人们可以随时停止，仿佛有人在山上“一、二、三”地呼喊公牛。归根结底生活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其他东西，只有原型儿童游戏的变量。耶路撒冷之旅（抢椅子），冷热交加，捉迷藏，抓人，我看到了一些你看不到的事情。剪刀剪裁纸张，纸张缠裹石块，石块砸坏剪刀。人们在瞬间尝试，把个人生活和他人生活中的所有心理状态都压缩为上述三种原理。这跟一个电视节目里旨在促使自我实现的建议和要求一样显得明白易懂，他们的祖母在下午就看这样的电视节目，而他们则无所事事地躺在外面的草地上。在距离租住的房屋还不到几百公里远的地方，人们就自认为已经长大而不再需要所

有应对生活的建议了。在一个村庄里人们给那个向自己倾诉的人买了一条裙子，在此人们也可以停止所做的一切，索性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人们在咖啡馆的露台上也可以坐到另一张桌边去找另一个女人。只有大学生宿舍在假期几乎没有一点儿生气，仿佛是隔了很远的距离，它从强制性变暗的城市里高高耸起，就像是一次偶然的阴茎勃起，一次不想也不必去往任何地方的去性欲化反射。除非人们在这次休养假里能够成功地为其他这种不可动摇的闹剧行为奠定基础，否则最晚再过两天就会要求重新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人们被要求回避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样做会耗费如此多的力气，以至于人们最后几乎不再剩有一丁点儿的精力来处理日常事务了，迫不得已时人们可以把这种情况重新解释为一种胜利。

相反其他人，他们都是品格高尚的人，他们在足球这个项目上有一只自己最喜欢的球队，在其他体育项目上还有一只。他们精确地区分州政策和联邦政策，为了发表政治观点他们还拥有一名理发师和一种发型，此外对操持家务和园地管理也有自己的看法。人们把新建大学生宿舍归功于他们的出资，如果地基不是因为地面潮湿而再次被撬开重新施工，那么也就会有资金剩余，可以用来拆除对面的仓库，把铁路天桥前面的场地改造成一种公共活动空间了。这样一来工程暂时被推迟了。这也就无异于意味着，人们无法再无限期地回避做出决定了。甚至还要更早并且是出于非常简单的原因，人们不能再回避决定了，因为冬天肯定会到来，那样的话在仓库边临时居住就不是很舒适的了。当然你可以给自己买一辆汽车，把车停在桥底下，把一台旧录音机与车载点烟器连接起来，播放声音时高时低的九十年代的磁带，上面录制的是在渐隐剪裁方面处理得很糟糕的八十年代早期的广播节目，直到电量警示灯发出闪烁的微光为止。车窗玻璃上蒙了一层雾气。视线受到阻挡。在不到一年之内人们就颓废成了流浪汉。

天上的延伸疤痕是因为世界及其连贯意义的不断再生。廉价果酱堵塞了冰箱里的位置。仅仅是因为我渴望有所调剂。塑料袋像三角旗一样在高高的树梢上飘舞。纯粹和真实的自然作为标签上的称号。

现实中生活是怎样被修剪的，这一点人们在陷入彻底绝望的时刻就会体会到，当一切都必须改变，但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未发生任何变化，而是一切都跟之前一样继续运行。同等程度地使用交点、胶卷和书籍，为了激起渴望和希望，而它们又在同样不被询问的情况下在一家具有科学水准的货物评定企业里消失了。如果你已处在癌症晚期，医疗机构就会接管你死前的这几个月时间，如果情况还不是特别糟糕，你就又会被允许出院呼吸户外清晨的空气，你会和其他人一起站在人行横道上和商店里，在那儿你用手指向焙制食品。对死亡的渴望突然有了另一种口感，它在刹那间变成了对独处的渴望。

一切都被嫁祸于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

沃勒和其他人走了，他们去印刷字模，然后在火车站和毛里求斯广场散发传单，在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只是继续在房间里转悠，那情形有点儿像精神上患病的样子，因为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尽兴地去做什么，甚至连走廊上都不能去，而是顶多很快去一趟厕所，但也得一个人站在门口望风，看是否正好有人过来。我们把收音机关了，因为只有对农村广播节目。贝尔恩德又打开了电视机，这一次电视里至少在上演一部动画片，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看懂，也因为在打开时它已经在播放了，所以我们不再能够跟得上它的思路。动画片讲的是一只小猴子，它应当在一个航天器里被发射到月球上，但是在它离开地球大气层之后，发生了一些奇特的现象，因为在运载火箭里他一下子使自己数量翻番。现在航天器里有了两只小猴子，它们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其中一只非常卑鄙、恶劣，总是尝试去激怒另一只并把对方关在某个地方。人们无法正确区分这两只猴子，因此最后人们不知道是否那只猴子是好猴子，它现在想捉住另一只，为了不让对方再对自己有任何伤害，还是那只猴子是坏猴子，它想愚弄另一只好猴子。最后它们俩抱在一起摔起跤来，就这样通过航天器的一个舱口飞了出去，飞到外面的宇宙里，但是在那儿它们感到非常恐慌，于是又很快划回宇宙飞船，共同从里面把破损的舷窗玻璃粘好。之后它们俩精疲力竭，在此期间人们认出了那只坏猴子，因为它变身成为一名调酒师，长着一颗光秃秃的脑袋，它突然把手递给另一只猴子，想与对方达成和解，另一只猴子也接受了它的示好，但是人们从它的眼睛里看出，它现在变成了邪恶的那只，然后整个情节又从头开始，只是角色正好颠倒过来。

六点钟新闻里终于播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新闻报道说，红军派1913承认对抢劫毛厄杂志和烟草制品商店事件负责，这个红军派1913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伙，它被人从东区操纵，是红军组织的分支，该组织一直没有停止与西方的对抗，只是现在采取了其他手段，1913这个年

份数字暗示的是俄国间谍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他在1913年身份暴露之后自杀，红军派1913继承了他的遗产，即为东区和红军组织从事间谍活动。但他们这是在编造，这些肌肉痉挛患者，克劳迪娅说道，这些人真是下流坯，我们专门写道，通过这起行动我们也针对来自东部的修正主义者。是的，他们就是些猪猡，贝尔恩德也说，我也附和说，他们是些肌肉痉挛患者和猪猡。此外，新闻里继续报道，红军派1913还为以下一系列事件承担责任：本月10号和11号分别发生在埃尔特菲莱和吕德斯海姆的抢劫储蓄银行事件、发生在索嫩贝格大街上的公交车事故以及发生在温泉公园里的井水投毒事件。这些猪猡，克劳迪娅又说道，现在他们想把一切都嫁祸于我们，索性把一切都推给我们。是的，最后也是我们绑架了蒂莫·林内尔特，我说道。是啊，贝尔恩德说，于尔根·巴尔奇也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因为沃勒和其他人九点钟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决定下楼到外面去，为了查看一下目前的形势。贝尔恩德认为，他们肯定被逮捕了，现在正在接受审讯，很快警察就会来这儿把我们堵在门口。在八点钟的新闻里他们又把更多的事情强加于我们，并再次强调我们是东德间谍。为安全起见我把我的背包随身带上。因为我们没有房间钥匙，贝尔恩德就用一块口香糖糊住门锁。另外我们只是让门虚掩着。下楼后我们朝朗恩大街方向走去，因为我们肚子饿了，想先随便找个地方吃些炸薯条。突然一辆瓦里恩特汽车在我们身边停了下来，一个穿着灰大衣的瘦长家伙下了车，但并没有让发动机熄火。该死，克劳迪娅说，这些人都是便衣。但是那名男子轻声向我们喊道，说他是沃勒一伙的。沃勒一伙的？我们问道，因为以其小市民式的大衣和短发他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此外他操着一种奇怪的口音，因为当克劳迪娅问他，沃勒最喜欢的乐队是哪个，为了检验他是否真的是沃勒一伙的，他回答说是奶油乐队（Cream），但是发音听起来像是Griehm。因为他也能说出沃勒第二最喜欢的乐队是什么，这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初来乍到的人是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个的，因此最后我们放下心来上了他的车。我们想知道出什么事了，是否沃勒和其他人被捕了，在他朝啤酒城方向行驶时他回答说，是的，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压迫者逮捕并关押了沃勒和其他人。我们被吓坏了，我突然害怕他们也会抓住我们，把我们也关起来。可我们应该去哪儿呢？贝尔恩德问道，那名男

子说：首先离开这里。但是去哪儿？克劳迪娅也问。我把你们送到柏林的同志们那儿，那名男子说。可是，柏林，我们说，我们应该怎样过去呢，我们身上根本没带证件？这个让我来解决吧，那名男子说，然后他打开汽车杂物箱，给了我们沙拉米香肠面包和一些喝的。

关于腹语和腹语术的插入说明

医院病历的副本

我父亲是人们以前称作录音带业余爱好者的那种人。除了宽敞的办公室之外，他还有一个墙上铺了软木、几乎隔音的小房间。他把他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录音机都摆放在这里，为了拿它们来做试验。他修剪我们家花园里的榛属植物，再把修剪的声音录制下来，这就是他在家从事的两项业余爱好。

他不断地让我作为小男孩有意识地对着麦克风说话，这样他也经常尝试偷偷录制我的声音。我回忆起这么一种情况，当时我大约五岁半，我注意到磁带的卷轴是怎样在运动的。我向他指出这一点，他却说不想录制我的声音，他坚持自己的说法，只说他正在删除一些东西。于是我用手指向猫眼管，它在伴随着我声音的节奏跳动，可他仍然声称没有录我的声音。后来他给我演示了这段录音，作为我倔强的证据，为了向我表明我有多少次顶撞了他。

因为我习惯了总是被录音，所以我从未像其他人那样感觉到诧异，这种惊讶通常情况下是在听到自己的声音时表现出来的。相比我在非常正常地对某人说话时听到的自己的声音，一段时间里这种被录制的声音甚至更令我感到亲切。我觉得这样一来我的腹语术，也就是用腹语说话的能力就练成了。

通常我听到自己的录音表达了一些观点，但我在监听的那一刻已经不再代表这些观点了，因此我相应地疏远了那种听起来很亲切的磁带录音，而把听起来陌生的自己的声音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虽然听起来陌生，但却不会说出那样的无稽之谈。由此一来，自我声音与他者声音之间的区分在我的脑子里就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这种情况又一次促进了我的腹语技能。

无法再对复制的声音进行调控，主要是这一状况引发了在听自己录音时那种令人不快的感觉。在说话时我们不停地努力，通过对喉头细致入微的调整使我们的声音保持平衡，另外喉头拥有体内大多数与肌肉纤维的神经联系。我们不断地检查我们的声音和说话过程。但是这样做还不够，我们也要审查这种检查。我们之所以要审查这种检查，是因为我们无法承认自己的无能，也就是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同时又不必对它进行调控。

后来在我已经步入青春期之后，我父亲又转而尝试越来越多地去录制他的女秘书们和女性职员的声音。当我父亲紧接着给她们演示那些录音时，她们会做出奇特的鬼脸，完成此前我在她们身上从未见过的肢体动作。她们不仅仅是与磁带上所说的话几乎保持同步地活动着嘴唇，而且她们还尝试通过使面部扭曲以及旋转和转动身体的方式，精确地再现人们在说话时对声音的持续调控，对她们来说现在借助于喉头进行这样的调控是不再可能的了。我父亲尽情地享受这种肢体的抽搐和扭曲，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女性下属们的身体对他来说显得是裸露和开放的，以至于他能够把他的女秘书们身体的蜷曲想象成在性交时身体的蜷曲。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女职员们参与这些奇特的活动。或许她们只是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天真样子，而事实上她们显然害怕，如果拒绝那样做会被解雇或者受到相应的刁难。我父亲给那些年轻女人让她们朗读的文字，据说是出于研究之目的，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还包含了像“舔舐”“吮咂”之类的单词。在少许情况下当我也在这样的录音和接下来的演示现场时，我看到了女秘书们身体上的分裂，感受到了她们的恐惧。相反，让我受到这种情境的刺激，正如我父亲所做的那样，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段关系导致的后果是那种习以为常的安排，即每一次的女伴在经过几个月的练习之后使我越来越完美地以口技发声，因此她一方面会变得越来越高兴，另一方面又会因为对她自己的积极反应而越来越感到无聊，那么从我来说我决不放弃在她的帮助下找回我自己声音的希望。这种声音的混杂暂时使我获得了某种轻松。因为我被不同的女人同时训练以口技发声，在我头脑里就不会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占据绝对地位，因此我几乎认为，在声音的混杂中有时甚至听到了我自己

的声音。此外在不同女伴之间的快速切换也适合于，把其中一种还在我耳边回响的口技声音展示给另一个人，这对我来说几乎接近于一种独立的说话。

腹语受训者可以实现和感受，但却不能诱惑他人。把我不同的女伴要说的话全部以口技发声法说出来，然后在空洞的状态下感受自己语言的涌入，抱着这样的希望我尝试尽可能变得隐身，尝试不与跟我面对面的人相对抗，而是仅仅向他提供满足和实现，为了通过这样的弯路找到我自己。通常在一段时间之后女人们就会失去兴趣或者大吃一惊，当她们发现我以口技说出的话并不真的是那种意思。在此过程中我一直在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普遍而言真正所指和意指都是什么意思。

我尝试以两种方式来逃脱对我进行腹语训练的安排。一方面我希望遇到一位女伴，她看出了我的状态，因此将会让我说出我“真正”所想的东西。我不理解为此她迫不得已必须以被我说出的话、也就是说以被她以口技发声法说出的话为导向，也就是只能重新找到她自己的思想，即便是她打算让我说话，但到头来也只是再次让她自己说话而已。但我不放弃希望，不断充满期待地建立起新的关系，因为我每次都相信，现在终于找到了某人，他会让我以口技说出我自己的句子，尽管这要持续一段时间。只有这样我才能想象一种解脱形式，想象一种向我大脑里那一领域的接近，而对这一领域我自己几乎一无所知。

对我来说存在于口技之外的是一种巨大的空虚。在另一个人在场的情况下独立说话，而不是说他的句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对我而言都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不断采取的旨在克服这种状态的尝试，其中也包括一段较长时间的精神分析治疗，最终都令人怜悯地失败了。最后我转向一种似乎是尼采式的问题解决方案，也就是我完全沉醉于腹语术，更有甚者，我尝试从我以口技发声的说话中辨别和假定我自己的话语。

在此或许这种情况也是值得一提的，即我母亲在瘫痪之后一段时间里变得对诸事漠不关心，这样她就被迫放弃了对我的腹语术训练。取代她的是明爱会那位女士。我尝试让自己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去抵制她的

腹语术训练，因为我不想允许她在我身上接管我母亲我的声音。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暂时经受住了这种如此产生的真空，而没有立即用另一种事物取代腹语术（就像比如用红军派取代教师，用流行音乐取代教堂等等）。这或许也导致了我的第一次精神崩溃。

我还想再谈一下另外一次经历，它并不直接与腹语术这个话题、但却与失语症有关。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礼拜仪式开始的稍微晚了一些。原因：其中一位辅弥撒者、一名十五岁左右的男孩，突然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他说不出话，麻木不仁地站在法衣室里，然后不得不被人带走。后来我听说他是被吓哑的，因为他父亲可能是在喝醉酒的状态下，在夜里拿着刀追踪他，并威胁要杀死他。我回想起当时我被那个想法深深地吸引住了，即人们受到如此剧烈的惊吓，以至于人们能够失去声音。

虽然我不接受明爱会那位女士，可我有时还是会想象一名木制的儿童，它由我父亲制造并在明爱会那位女士体内长大，它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能够跟我结婚。我难道只能想象一名无生命的女伴，并且还是一名不仅由我父亲为我挑选的，甚至还是专门由他为我创造的？或者这个木偶是一个腹语木偶，它应当为我充当表率，告诉我为了存活下来，我自己也要成为木偶和女人？因为我父亲把他的女秘书们称作玩具娃娃或者玩具小娃娃并非没有道理，而他把我则称作木头人。同时这一切又类似于一种阉割术，就像那种被我观察到的、当然要直接得多、但只是看似更为残暴的阉割术，用它人们只是来威胁那个年龄稍大的辅弥撒者。我们俩中的每一个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被剥夺了声音：他是因为没有构造话语声响的能力，我是因为没有构造话语意义的能力。

没过多久我被摘除了扁桃体，我看到那两块睾丸状的形体从我的咽喉里、正好是生产声音的部位被切除，然后人们把它们放到一个托盘上展示，作为我变哑和阉割的另一症候。

因此我的幻想不仅是退却，同时也是无能的表现，以及拒绝按照父亲的榜样把自己变成其他人的腹语表演者。因为我自己知道，通过别人让自己的话被说出来是怎样的情形，所以我也不想指望任何其他人有

这种感觉。但是因为除了这种关系，也就是其中一方是以口技发声者而另一方是木偶，我再不了解任何其他关系，因此我还是愿意成为木偶。一个有生命的木偶，它会自己坐到腹语表演者的怀里并拉着对方的手，为了使它能够产生一种真实交际的幻觉。

工厂主的委员会

在码头上躺着一只被掏空了内脏的动物，它的形体足够大，以至于人们可以在它身上走动。工厂主说，他没有射杀这只动物，只是发现了它。人们在哪儿能发现这样的动物呢？到处都有。我跑进树林里。天很冷。我忘记了穿外套。我忘记了道路的延伸方向，忘记了在走路时怎样摆臂。人们是干脆让胳膊朝旁侧晃动吗？如果是这样，那它们可以摆动吗？我感到更加害怕了，当我用这句话想使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这只是一片树林而已。所有“只是、仅仅”这样的东西总是比它们表面上显得更多。它们隐藏了一些东西。这仅仅是心灵而已。啊，那只不过是而已。

职员和女秘书们以一种列队游行的方式，抬着那只被掏空了内脏的动物穿过城市。我和明爱会那位女士站在窗边，她牵引着我的手，因为我还不会正确地挥手致意。她把我的手攥成拳头，往拳头里插了一面小旗。小旗是蓝色的，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圆圈，圈里描绘的是那只仰面躺在地上、被掏空了内脏的动物。在哪儿也看不到工厂主的身影。我知道，他正蹑手蹑脚地穿过偏僻的苗圃，在搜寻新的动物。列队经过的人群微笑着朝我们楼上的窗户望过来。人们挖掉了被掏空内脏的动物的眼睛，因为它们最先受到蠕虫的侵袭。人们在动物前面推着一辆小车，车上像雪白的甜瓜一样放着那两只被制成标本的眼珠。空洞的眼窝好像在凝视着它们。之后在市场上人们可以在付费的情况下，把头套在里面透过空洞的眼窝向外看，并让别人给自己照相。

傍晚树木会抖动，当动物们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整个白天都没有解冻的青草固执地妨碍了它们的脚步。它们舔舐石块、冰柱和被遗弃的蜂房，缠住窝巢，然后爬进它们的洞穴。

工厂主熟悉每一片土地的正面图和侧面图。他像蛇一样与河流扭斗，一旦战胜了它们，它们就得由他来命名。为每一只爬行的蠕虫，一旦

他的鞋尖制服了它，他的鞋跟压碎了它，他都会找到三种名字。第一种名字用希腊语说的是死亡的类型，也就是动物是怎样在他脚下死去的：被压碎、被磨碎、被裂碎、被捏碎、被粉碎，在此仅举几例加以说明。第二种名字用拉丁语描述的是感觉，也就是他在做这种事情时的感受：狂喜、痛苦、镇定、恐惧、恶心、无聊、厌烦等等。第三种名字一半是种属描述一半是想象，它往往标明为是对自己名字的颠倒使用，他热爱自己的名字并为之自豪，他在世上的创造物们也应当承载相应的名字，无论它们是活的还是死的。

工厂主只用手就把一根铁钉砸进结实的桌面。他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人们只需注意要用指根击中钉头。人们可以用剪刀剪开玻璃，如果人们把它放到煤油里。在联邦园艺展上他在一块牌子上发现了一处印刷错误。他在想：Atser（应为Aster，意为“紫苑”），这种花根本就不存在。成千上万的人从那里经过，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有一本古老的草药书，书里甚至还记录了各种堕胎药。当然人们必须能够从字里行间揣摩出意思。比如书里写着：每月的清洗能对女人有所帮助。它是什么呢？百金花属。起这个名字并非没有道理。他做的醋焖牛肉味道如此浓厚，因为他提前一天把牛肉从醋水里取出，让它在一块斜放的案板上控干水分，在它的正反两面上涂抹一层厚厚的芥末。如果牛奶烧糊了，他就用碳酸氢钠把它再煮一遍。一次他在下莱茵河里游泳时失去了知觉，他仰浮在水面上沿河而下漂流了整整六个小时，其间他既没有下沉也没有被卷入轮船马达的螺旋桨里。如果工厂主在一个半明半暗或者完全黑暗的房间里相互摩擦他的两个手掌，然后把一只手很快放到一块黑色的天鹅绒上，房间里闻起来就会有一股仿佛是擦着了一根火柴的味道。

工厂主把两颗黑色的珍珠抛向空中。它们是经过抛光的长颈鹿的眼睛，他从这样的珠子里预测未来。如果它们从悬钩子黑转变成兔子瞳孔那样的覆盆子红，委员会的报告就将产生有利的结果。如果它们染成了不透明色，就像驴子裹住眼皮的眼神那样，那么就算是我在岩石桥梁上的自我牺牲也无济于事了。来自工厂食堂的一块冰激凌蛋糕被推进房间来做鉴定。那两颗珠子从工厂主的手里弹落，像彩色的玻璃弹子一样滚落到地上，然后作为太阳和月亮在我的脚跟前打转儿。在

吸引与排斥的不断相互作用下最终它们交配在一起，为了生产出地球。在最后一刻工厂主把一桶冰冷的水泼在它们上面。他哈哈大笑，把右手深深地插入冰冻布丁圆蛋糕，把涂满香草冰激凌和拳头里握着一颗很大的樱桃核的手又拔了出来，把手上的冰激凌舔舐干净。那两颗黑珍珠又回到他戴在脖子上的天鹅绒小盒子里。天空有两个窟窿，那只长颈鹿透过窟窿俯视地球，但却没有眨眼示意。

在我准备上床睡觉期间，绳索从没有亮灯的浴室门里爬了出来，它缓慢地爬过地板，跟随着我双脚的影子。我几乎还未熄灯并把被子拽到头上，绳索就进入了我的房间，像是在游戏里一样缠住我的手腕和双脚。一条轻盈的没有牙齿的麻蛇。如果我挤压双手，它就会以如此快的速度一跃跳到空中，以至于在我的胳膊上留下红色的火痕。我的房间门通到壁柜里。工厂主的第一段婚姻很不幸，它以他第一任妻子的死亡而结束，当时他做出了近乎超人的努力，为了在她身体还微温的情况下获准提取她的器官，他与前妻所生的孩子们不认识他们的母亲，只是偶尔被指定了一个陌生人充当他们的母亲，这个陌生人据说拥有母亲的肾脏、左眼、肝脏或者膝盖骨，如果绳索突然不听使唤了，这些孩子们就会过来把我和我的床上用品缝合在一起。工厂主太过悲伤和激动了，以至于根本无法感知他们，特别是在夜里的时候。他们令他回忆起一段他想忘却的时期。他们是三个孩子，两名女孩和一名男孩。他们穿着睡衣和拖鞋，每个人右手里都拿着一根穿上线的缝衣针，左手高举着一个缝补用的蛋形木头托子。他们把我缝了起来，与此同时绳索咝咝作响地爬回浴室，作为按摩绳挂在浴缸的撑臂上，在那儿等着三个孩子在把我缝好之后、临走时塞给它的巧克力。线缝开裂的声音一整夜都让我醒着无法入睡。早晨我拿出一些我的巧克力给浴室里的那根绳索，为了以此让它回到我的身边，可它好像一下子没有嘴巴了。

工厂主微醉地躺在沙发上。他用牙从瓶颈里拔出木塞，以高高的弧线形式把它们吐到度假村模型的跳动的灯光画面上，这些灯光画面是幻灯机每隔二十秒投放到客厅墙上的。来自浴室里的那根按摩绳和着磁带上的笛子音乐在他身旁跳起了舞。当我走进房间时，它立即毫无生气地瘫软在地上，被工厂主的左脚好像是无意地推到了沙发底下。我

问他，今晚我在横越架在页岩岩石之间的桥梁时是否应当穿上我的圣餐礼服，现在穿它时感觉袖子开始变得有些短了。一开始他没听懂我想做什么，然后他只是咕哝地说：可以就穿你现在这一身。反正一切都已死去。这些十足的傻瓜。我走向阳台门，向外面的花园里望去。在工具棚旁边空了很多年的狗窝里，委员会成员们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他们的衣服被淋湿了，其中一名男子的头部伤口在淌着血。只是一处裂伤，工厂主走到我身边说道，这是一种令人非常不快的伤情。一个迂腐的人。其实我根本就不在意允不允许，但是没有人理解这个。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毕竟我要开销。至于士兵们，人们总会有办法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每隔几周投掷一次炸弹，这样的吸引力根本算不上是很糟糕。他走回到沙发那里，从地上捡起按摩绳，用它在空中抽打起来。关在笼子里的那个女人向我示意并做了一个动作，仿佛她要把一个瓶子送到嘴边。我觉得她是渴了，我说。活该。要是没有往肚子里塞那么多卡塞尔熏腌肉就不会渴了。工厂主一边嘟囔一边一口气喝干了又一瓶伏特加。他把手向后伸向幻灯机，调快了图片变换的频率。图片现在以他脉搏跳动的频率越过幻灯机透镜，啪嗒啪嗒地被投射到墙上。如果你愿意，他说道，我们今晚让那四个傀儡齐步从桥上走过，为了让他们看一下，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这样的话就我来说，你也可以穿上你的圣餐礼服。我也给你一条我的领带。是妈咪血红色的那条。他笑了起来。这是他以前开的一个玩笑，当时我询问我母亲的情况，而他则回答说他用一条领带勒死了她。我回到我的房间，从旧画报里剪切图片。

傍晚工厂主把委员会成员们从狗窝里放了出来。那些男人们默不作声，只有那个女人问道，能否允许她从笼子里出来喝些东西。再等会儿，工厂主说。为了遵守礼节，他让一名女秘书很快把这些先生压出褶皱的西服上衣熨平。他们可以用带柄小镜子把头发理顺，把领带重新扎好。然后这四个人被押上一辆车，朝页岩方向驶去。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对不遂心的事勉强顺从。一个奇怪的评论，桥出于解释不清的原因坍塌了，虽然他们在出事之后被再次用支架进行了加固，接受了城市方面的体检和收治。

保持平衡的块茎因为自身的重力而倒向一边。小船不也可以搁浅吗？我们把脸埋进去的那个枕头不也是地平线吗？在一座架在页岩之间的桥梁上生活，这不是给侏儒兔们创造了更高的生活质量吗？岩石渗出黑色不透明的水分，这些水分在风的吹送下一缕一缕地被挤压在房屋上。兔子裸露伤口上的颈毛在颤抖。两个男人抬着一根梯子沿田间小路行走。他们把梯子斜架在溪流上，腹部朝下爬在梯子上，从水里拽出一小捆东西。深绿色的草像一块布一样缠在它的顶端。他们在传递那捆东西的过程中突然停了下来，一声不吭地把头朝我的方向转动过来。在学校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一张地图因为空气的对流在固定支架上轻微地摆动。船只从陆地旁边驶过。在每一块大陆上都站着三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名儿童。他们在挥手示意，仿佛那些船只也应当搭载上他们，而不仅仅是运送黄金、热带水果和咖啡。

论真正的罪孽

《忏悔镜》对我来说好像是一种相当任意的案例汇编，它只应当产生一种效果，即在其背后隐藏真正的罪孽。我无法想象，上帝会对我可笑的违法行为感到难过甚至恼火。我忽略了一次祈祷，在教堂里偷偷讲话或者和我的弟弟吵了架，这些对这位造物神而言都不会显得重要。这一切与仪式和神话、与自我牺牲的殉教者们、与钉死于十字架自身、与鲜血、与孤独、与绝望都极不相称，这种绝望最终导致上帝抛弃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他通过感到被上帝抛弃而真正化为人身的时候。这一切不相匹配，一方面是这种狭隘的浅见，另一方面是那种慷慨的姿态。因此罪孽肯定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只是它是什么呢？我出发去寻找真正的罪孽。它不是有意识和积极的寻找，而就是一种简单的专注形式。我阅读成年人的《忏悔镜》，为了查明是否在这里有真正的罪孽。但是在这里也没什么不一样的。我阅读那些罗列的臆想罪孽，但是它们的平庸使其根本无法匹配一个不断犯错之人富有戏剧性的认罪过程。为何我应当为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乞求上帝并恳请他的原谅呢？看来是有一些东西存在，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有那种罪孽存在，我犯了那种罪但却不知道这一点，在我还未犯罪之前我在筹划那种罪孽，但却丝毫没有预感。我不想犯罪，因为沉陷在这样的堕落中肯定就如我所描述的那样非常可怕。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会不得已之下被迫犯罪。除非我遵守《忏悔镜》里事先规定的那些罪孽，定期犯那些罪，接着为自己的罪行忏悔。或许这样做将会使我避免真正的罪孽。

迫害和谋杀成年青少年

表演：埃彭多夫大学附属医院人格障碍专科门诊部戏剧小组

指导：作为让-保尔·马拉形象的安托南·阿尔托先生

第一幕和唯一的一幕

舞台展现的是一家医院的急诊室，这家医院建于20世纪70年代，在历经多年之后得到了应急性的整修。墙上贴着褪色的海报，海报上印有像“我们的目标：您的健康”和“发觉和预防血管疾病”之类的标语。急诊室里挤满了各种年龄段和社会出身的患者。许多患者是在一名家属或者邻居的陪同下前来的。某些人随身带了一个装有应急用品的提包，某些人是从工作场合或者运动场直接来的。这些人一开始好像自己并未参与表演，而是在等着被医院接收。不定期地每隔一段时间，扩音器里就会喊出一个几乎让人听不懂的名字，然后他们中的一位就会被请进左边的一个玻璃小房间，在那里填写一份履历表。之后那个人又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保持等候的姿势。这出戏持续将近一个小时，其间至多有五个人的名字被叫到。在不多的几个地方患者们作为候诊者合唱队齐声说话，类似于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歌舞队。人们把急诊室中央放有杂志的几张桌子向旁边稍微挪了一下，在那儿临时性地搭建了一个像超市收银台的收款处，收款处坐着一名女收银员，站着三名顾客。一位女士正在付款。在她身后站着那名成年青少年，在舞台帷幕拉开的同时，他正往传送带上放一根法式长棍面包、黄油、三个桃子、半干的古乌达奶酪、牛奶和带有红果羹口味的酸奶。在成年青少年旁边站着一名身穿黑色僧衣头戴风帽的男子，他是一名精神修道士。在成年青少年身后站着另一名推着购物车的男性顾客。在左前方的舞台边缘处，阿尔托作为阿贝尔·冈斯执导的影片《拿破仑》中的让-保尔·马拉形象，也就是赤裸着上身，头上缠着一条布巾，坐在一个旧的双把木浴盆里。在右前方的舞台边缘处，一名穿白大褂的男

子坐在一张狭长的桌边，在用最简单的辅助工具（放大镜、显微镜）检查一个大脑。他旁边坐着格施威尔茨特夫人。

医院经理（出列，说了以下开场白）：

谁要是害怕自己的思想，他来这里就是找对了地方，当然也包括那些人，他们认为萦回在他们头脑里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而是其他人的灵感，也包括那些人，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再有任何思想，彻底摆脱了思想.....

阿尔托：而且还摆脱了器官和内脏。

医院经理：没错，这一点我忘了。总而言之，在此我们热烈欢迎所有的人参加我们的小型戏剧表演，这应当能够缩短候诊时间，虽然他们可能早已没有了时间观念，因此也就不知道他们已经在这里坐了多久，不知道现在几点钟了，更不知道今天星期几了。我祝愿诸位参演愉快，同时也想简短说明一下我们的第四个健康日活动，它于一周之后的星期天从十一点到十七点举行。届时我们会给您提供一次通往人体世界的发现之旅。请您体验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令人兴奋的认识，获悉许多围绕您健康的有趣和值得知道的知识。敬请期待充满大有裨益的信息、促销和娱乐、为整个家庭设计的游戏和开心活动的一天吧。同样为身体的健康我们也安排了相关活动。现在请尽情欣赏我们的小型喜剧吧。

阿尔托：另外还摆脱了思想、器官和内脏。

医院经理：没错，我忘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第一个场景。超市里的一个收款处。我们看到那名成年青少年站在那里，我们紧张地期待现在要发生什么。另外，站在青少年旁边把脸蒙起来的那个黑色身影，那是他的（青少年的）思想。（医院经理说完退场。）

聚光灯照亮了超市收款处旁的场景。

成年青少年身后的男人：你必须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传送带上。

成年青少年：这就是所有的东西。

正在付款的女人：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传送带上。

成年青少年：这就是所有的东西。

精神修道士：我必须想着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传送带上。我也不能忘了，今天五点准时参加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学校的学校演出。

女收银员：您根本就没有女儿。

成年青少年：我还需要一个塑料袋。

女收银员：您需要凯讷塑料袋来装这几样采购的东西。对了顺便问一下：酸奶到底是买给谁的？

成年青少年：给我的。

女收银员：我在想您有一个女儿。

成年青少年：是的，请给我一个塑料袋。

女收银员：凯讷塑料袋，这个需要付七欧元。（女收银员在安装收银台旁边的三个带数字的白色框子里搜寻凯讷塑料袋的条形码。她是新人，对业务还不熟悉，因此整个过程花费了一些时间。）因为我沒有能替我工作的姐妹，也没有能替我思想的孪生兄弟，就像您这样。

〔人们看不清楚成年青少年的孪生兄弟，他站在后面较远处的冷冻柜和摆放白炽灯泡的货架之间。〕

孪生兄弟：您能告诉我从这儿怎么去十三殉教者教堂吗？

女收银员（头也不抬）：白炽灯泡已经取消了。但是我们在那后面有日光采集器，您可以买这样的东西，每只七欧元，您稍等，我查看一下条形码，为了不至于给您错误的信息。

成年青少年：我没有孪生兄弟。

女收银员：那您或许也没有一直还在为您而争吵的两对儿父母了？

精神修道士：我父母。对了。我父母究竟在哪儿呢？如果我六点钟应当去看展览，为了能够往我装在左后裤兜里的小本子上写点什么，那么我该怎样才能做到不耽误学校演出呢？尽管演出是在展览前一个小时开始。人们不可能把时间回拨，虽然有时这也是蛮有道理的。

女收银员：您知道您父母在担忧。所有的人都在为您担心。（她找到了条形码并用食指把它输入电脑。）

精神修道士：女收银员的食指有一块长长的涂有蓝色指甲油的指甲。在这块蓝色的指甲上有十三颗微小的珍珠作为镶饰。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可以从这十三颗珍珠里辨认出十三位殉教圣徒的面孔。它们只是被砍掉的那些殉教者的脑袋。虽然他们事先被绷在轮子上，或者被剥皮，或者被四马分尸，或者被钉上圣安德烈十字架，但最终这些殉道者们也还是都被砍去了脑袋。在童贞玛利亚踩烂邪恶之蛇的蛇头时，这十三颗脑袋就围绕在她的四周悬浮着。

成年青少年：它难道不能叫*Schlagne*（*Schlange*“蛇”的字母颠倒）吗？

女收银员：不，是叫*Schlange*（“蛇”）。这是一个德语单词。

成年青少年：他们是德国殉教者吗？

女收银员：他们都是我们的小伙子们。你们肯定是十三位朋友。只不过还在上半场时他们就把N.N.（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正好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名德国国足球员的名字）罚下了场。

成年青少年：您的指甲……

女收银员：这是一块还愿指甲。很漂亮，不是吗？位于威廉广场的还愿美甲店因为新开张营业，向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我很愿

意把它向别人推荐。涂一块还原指甲花费七欧元，这真是一件廉价品，用这样的价格您甚至连凯纳塑料袋都买不了。

成年青少年：为什么呢，我以为……

女收银员：不，那个塑料袋要九欧元，这我刚刚看到。

成年青少年：但这跟标明的价格不一样。

女收银员：它根本就没有被标明价格。您最终是想要一个的。

成年青少年：因为否则的话这些东西我拿不回家。

女收银员：但是现在请您不要在这里没完没了地抱怨了。如果我说了算，我就会给您一个。但是我被束缚了手脚。按规定不允许向超过五十岁的抑郁症患者出售塑料袋。

成年青少年：在孪生兄弟的陪同下也不行吗？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我们先是被恐怖分子劫持到西西里岛的一个临时木建营房里，然后我应当和我的孪生姐妹被驱逐到约旦的一个孤儿院里。相反这里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此外我不喜欢又作为群众演员参加一出戏剧的演出，并且这样的戏剧是在颂扬红军派和嘲讽受害者。

医院经理（从后面快速跑过来）：不，不，真的，我不会让这件事就这么发展的。亲爱的、尊敬的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我们这出戏绝不是对红军派的颂扬，更不是对受害者的讥讽了。它是一出完全没有任何危害的戏剧表演，红军派在剧中甚至都不会出现。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那么我想在这儿干什么呢？

医院经理：是啊，您当然说得有道理，这些都是阿尔托先生令人生疑的导演奇想，您是知道的，他这个人头脑有点儿不太正常。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甚至连红军派都不知道。

医院经理：甚至连红军派都不知道，非常正确。他是一个丝毫没有经验的单纯的人。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那他是怎么想到我的？

医院经理：可能这是魏斯先生的注意？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他也不在人世了。

医院经理：他也不在人世了，非常正确，1982年他就已经在斯德哥尔摩被瑞典秘密警察谋害了。当然他是了解红军派的，或许会给出可能性的指示。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或许、可能、大概，恐怖分子的辩护士们总是很快就会找到这样空洞的言辞。但是我和那些可疑的圣像生活过，必须生活过.....

候诊者合唱队：

我们听到，她把我们称作什么

因为她从内部了解这件事情

她从一开始就嗅到了此事

因为她是从它的怀抱里爬出来的

〔一对儿小双胞胎，大概七岁，女性，穿着同样的服装手拉着手来到前台：

以媒介和艺术的形式被弄得乱七八糟

我们现在渴望真实

我们不想作为气球爆裂

如果科雷斯尼克表演恐怖的鬼脸
不是又小又裸露地在河中小岛的沙滩上
在迈因霍夫影片中扮演肥大的肚子
不要爱父亲和恨母亲
不再谈论等级
谩骂和赞扬我们都不想要
在这部巴德尔-迈因霍夫-肥皂剧里
〔她们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退场。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我们又面临这种情况了。

医院经理：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完全符合您的意愿，难道不是吗？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谁会知道我的感官里是什么呢？

医院经理：不，但是现在您完全理解错了。虽然这样的误会在精神病院这个地方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刚才的评论绝非意在描述您感官的内容，也就是正如许多在场者所担心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透您的身体，为了描述您的感官所觉察到的内容，更不用说去分析甚至诋毁这样的内容了。我只不过是使用了人们普遍所说的那种表达而已。当然我也可以把它说成：符合您的兴趣。

阿尔托：诗人在写作时求助于字词，字词又求助于自己的使用规则。自动信奉字词的使用规则，这一点处于诗人的无意识之中。他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可实际上却不是。

医院经理：我想说的正是这个。但您还是让我们继续表演我们的小型戏剧吧。（说完走到一边。格施威尔茨特夫人坐了下来。聚光灯投向超市收款处。）

成年青少年身后的男人：你必须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传送带上。

成年青少年：这些就是所有的东西。

正在付款的女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传送带上。

成年青少年：这些就是所有的东西。

精神修道士：不，天哪，请不要让整个戏剧又从头开始。反正我也不再能够忍受下去了。在这种笑剧中参与演出是多么降低身份的事情啊。我必须说些别的，只是说什么呢？

成年青少年：我只是买了非常普通的东西而已。

女收银员：为了您父母去参加中学毕业典礼。这当然是一个重大事件。从现在开始您就一个人了。现在不会再有人照顾您了。您现在被社会福利网所遗漏。为什么您也有两对儿父母呢？今天没有人再能负担得起这个了。这些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对社会有害的。一分钱也不挣，但是却让一对儿接一对儿的父母来到世上。

成年青少年：重要的是，我能准时参加学校典礼。

女收银员：他们也在威廉广场让人给他们进行身体穿洞。我只听到关于这方面好的事情。

成年青少年：我不知道。学校典礼看上去是怎样的情形呢？

女收银员：今天早已不再是这种情况了。所有的父母身体上都有穿洞或者刺青。

成年青少年：他们也都是些年轻二十岁的父母。

女收银员：是这样的。您的父母到底多大岁数呢，如果能允许我这么问的话？

精神修道士：是啊，我父母。我不能忘记我父母还活着。还有五点钟的学校演出。或许通知不去参加展览会开幕式了。用手机通知。但是我没带手机。在学校前面立着一个圣安德烈十字架。它立在一个没有横木的铁路道口处。孩子们必须学会辨认记号和祛除危险。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我女儿的两对儿父母、为她担心并且像我父母那样长生不死。身体穿洞和圣安德烈十字架是不相匹配的。还愿指甲在男人手上看起来很矫揉造作。

女收银员：但您不是男人。

成年青少年：没错，我不是。但是您会建议我做些什么呢？

女收银员：把您的钱包给我。我看一下我们能否凑齐九欧元。

精神修道士：我不能把手伸进错误的后裤兜里，由于疏忽把那个笔记本给了女收银员。

成年青少年：（把手伸进后裤兜里，掏出笔记本递给女收银员。）

女收银员：啊，是一个笔记本。这几乎跟现金一样。我们看一下本子里写着什么。啊呀，这真不错嘛。这是您自己制作的日历本吗？

成年青少年：不，这是我女儿做的。

女收银员：太精美了。您总是往本子里登记一些东西，用这些能体现您感受的表情符号，不是吗？一个微笑图标，一个皱眉表情和一个中立符号，太可爱了。但是这里有太多的微笑图标，这不太对吧？在这方面您有点儿不老实，不是吗？

成年青少年：不，我.....

女收银员：您是为您女儿这么做的。这使您感到荣幸。但这最终并未让您在人格发展之路上走得更远。当然这是一种羞愧感。人们怎样向他的父母解释.....

成年青少年：向我的女儿。

女收银员：是的，当然了，您有两对儿父母，这样的话解释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的。完全没有可能。您的孪生兄弟……

成年青少年：他还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

女收银员：您把他放到他们那儿了？这样做是对的。这样父母亲就有了一种依靠。

成年青少年：我的孪生兄弟也患有抑郁症。只是他跟抑郁打交道的方式不同。

女收银员：服用氟西汀，这是抗抑郁的可选药物。

成年青少年：不，这是我服用的。

女收银员：您有这个必要吗？在光天化日之下服用药品。而您的兄弟则必须显出夸大狂症状。您可怜的父母。他们还没有因为悲痛而死去。

精神修道士：我必须记着我父母还活着，记着我五点钟要准时参加学校演出。

女收银员：您在这之前要去参加展览会开幕式吗？

成年青少年：我不知道是否还能赶上，如果仔细想一想，从那儿到学校还有挺远的一段距离呢。

女收银员：是的，去学校的路是最陡的。

成年青少年：人们不也说是耶稣受难之路吗？

女收银员：各个地区的叫法不一样。比如我们把去学校的路称作趣味低级之路，在以前。但是它也有十四个停靠站点。这对所有的上学之路来说都是一样的。

成年青少年：十四站。

女收银员：刚才提到了，在叫法上某些人这么说，其他人那么说。您女儿怎么说？也说十四站吗？

成年青少年：我觉得是的。她在税务局那一站上车。然后是前方售货亭旁边的那一站，它叫什么来着？

女收银员：是叫玛利恩大街，我觉得。

成年青少年：没错。然后是奥登瓦尔德林。然后是耶稣第一次倒在十字架下。然后是耶稣遇见他的母亲。

女收银员：这对您来说也很合适。您的母亲将会非常高兴。

成年青少年：然后古利奈人西门上车了。

女收银员：他和您女儿是同一个班级的吗？

成年青少年：我不知道，但他总帮她背书包。

女收银员：您瞧，孩子们根本不需要父母。他们自己也能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好。

成年青少年：您说得有道理，我经常毫无必要地担心。

女收银员：耶稣也是这么说的，当他遇到那些哭泣的女人时：不要为自己和你们的孩子们哭泣，而是为我哭泣吧。您应当为耶稣担心。我给您一本小册子，您可以心平气和地看一下，耶稣能够给您带来多少忧虑。（给了他一份宣传小册子。）这些都是真正的忧虑，重大的、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虑。但即使这些忧虑也只是对永恒王国的先期体验，忧虑在这样的王国里将不再有尽头。因为天主就是这么说的：的确，你们将会在我的忧虑王国里枯死。

成年青少年：枯死？

女收银员：是的，就像一株植物一样。在所有忧虑当中。

成年青少年：还有调味品出售吗？

女收银员：在我们这儿？

成年青少年：是的。

女收银员：没有。但您可以去我们位于集市广场的分店试一下。我们只有纺锤和碎屑。还有熬制的特级冰激凌。

成年青少年身后的男人：你必须把所有的商品放到传送带上。

女收银员：克勒恩曼先生请到收款处来一下。

精神修道士：我认识克勒恩曼先生吗？

女收银员：克勒恩曼先生是我们分店的新店长。您根本不可能认识他。

克勒恩曼先生（明显是由医院经理扮演的，脸上蹙脚地粘着髭须，身穿一件白大褂，这样的装束在周边环境里可能会产生矛盾心理）：什么事？

女收银员（把那个笔记本递给他）：这位先生不想支付这个笔记本的钱。

克勒恩曼先生：你必须付钱。我们这儿是在德国。在这里买东西就要付钱。还有：把所有的商品都放到传送带上。不只是酸奶和奶酪。所有的商品。也包括问号、地球仪、调酒师和海因茨·埃克纳。

精神修道士：没错。海因茨·埃克纳。是否他还活着？

女收银员：他还活着。

成年青少年：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您知道这个吗？

女收银员：他生活在乌丁根，他妻子在那儿经营一家餐馆。之前他参加过一次基督教民主联盟竞选宣传短片的演出，但是因为内容质量太差这部短片只播放了一次。

精神修道士：海因茨·埃克纳还活着。他肯定跟我父母一个年龄，我父母也还活着。

成年青少年：乌丁根，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呢？

女收银员：它位于迪伦。乌丁根，痛苦之城。人们在乡土课上学过这个，您肯定还知道那个句子：

乌丁根和德罗夫在我们这里下榻。

伯依希和勒沃斯巴赫早晨把我们叫醒。

最后还剩施拉格斯坦因，啊，我们这些孩子多么聪明伶俐。

我们就这样记住了德罗夫领地的五个村庄。并且：一、六、七，棒极了，德罗夫归属了于利希。您明白，1670年，德罗夫领地被判给了于利希。但是上施耐德豪森是什么时候从文登分离出去，并被划归给乌丁根的，这我就无法再告诉您了。

克勒恩曼先生：1857年。（说完向后走去。）

精神修道士：1857年。很快就距我出生前一百年了。就连我父母当时也还没有出生。或者我的祖父母。我的祖父母今天究竟还活着吗？

女收银员：这个我无法告诉您。另外在新一期的《喝彩》杂志里有一些可供粘贴的表情符号。这很实用，如果人们以日历本的形式来记录自己心情的话。但是皱眉表情要多于笑脸符号。尽管如此也要一直保持诚实。能保证吗？

成年青少年：行，我保证。那么这个我要了。

女收银员（把笔记本还给他）：需要付九欧元。

成年青少年：您这儿也能刷卡吗？

女收银员：超过五十岁的抑郁症患者不能刷卡。

成年青少年身后的男人：你把所有的商品放到传送带上。

女收银员：这位先生说得对，您当然也可以拿传送带上的商品来跟它交换。

成年青少年：这样行吗？

女收银员：当然可以了。怎么都行。您想得太多了。您认为这里所有的顾客当中有谁有钱吗？我指的是自己的钱？反正我的钱箱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您只需说您只有一张大额钞票，这样我就不得不把本子送给您了。

成年青少年：谢谢。

女收银员（充满期待地看着成年青少年。）

成年青少年：怎么了？

女收银员：对呀，您必须把话说出来。话我可不能再替您说。

成年青少年：啊，是这样，那当然：我想去十三殉教者教堂。您能告诉我怎么去吗？

女收银员：嗯，好吧，这么说还行。虽然这座教堂的名字叫作救苦救难的十四圣徒。现在请您收拾东西离开。我会把您的孪生兄弟留在这儿作为瓶子押金。

〔等候的患者们鼓掌。收款处旁边的表演者们鞠躬。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怎么？现在这就结束了？这么短的剧？因此我要专程来到这里？而且我身边的这位先生，他也是一句话都没说。我竟然来到这里在这出戏里出现，这完全是……完全是……

阿尔托：无偿。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正是这样。谢谢。“专断的”是我刚才要找的用词。“红军派”最终成了刺激人情绪的词汇，用它人们想激起好奇心，调动人非常低的脉冲值，而同时这个词又根本没有任何内涵。

阿尔托：我不想成为我诗人的诗人，这个本我想推举我成为诗人，而是想成为与本我和自我相抗争的创造性诗人。我回忆起旧时对那些强加于我的形式的反抗。

医院经理（一直还装扮成分店店长的样子）：只不过我们还有一些备用剪辑，就像通常情况下在片尾字幕之后播放的那种。口误、失误、轻微的不顺，这些当然也同样被娴熟地演练，往往需要更多的摄制时间，因此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我们在一两处地方又非常明确地探讨了红军派。比如在这个戏剧场景里。

成年青少年身后的男人（没有任何强调地向前方说道）：红军派狡猾和贪婪地抓取……

正在付款的女人（也仿效他的样子）：当天使长拉斐尔出现的时候。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还有，我是怎样被表演的……

医院经理：对此我也很高兴。您看，其实我们是想让您自己扮演自己，但可惜对于相应的询问我们从未得到您的答复。然后我们想到一个主意，让一位相应名声显赫的女演员来扮演您，她应当有能力胜任您形象的复杂性。比如豪斯女士就会很乐意承担这个角色。但是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来自您这一方面的刑法措施，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删掉了您的整个角色，并用格施威尔茨特夫人取代了您。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您真的认为这件事就这么简单？索性不指名道姓还远远不够，只要人们能从上下语境中推敲出相关人员的话。

医院经理：但是我在此无法辨别出语境，因为您不再出现了。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是我们医院一位非常受尊重的同事，多年来她参加过不同

的业余戏剧小组，在周边区域的小型舞台上很内行。此外恰恰是关系到社会普遍利益，我们不应当完全放弃残余的、反正已经被破坏的艺术自由的客套语，也因为而且特别是因为人们借格施威尔茨特夫人之口没有说出任何有损名誉的话。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这件事涉及的不是这个，我能够被辨认出来，这就足够了。

医院经理：令人遗憾的是这对于双胞胎来说永远也不会那么明确。万不得已时我们总能声称，这里指的是她的姐妹。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您……您……这种阴险的诡计，这是博西透露给您的……我可以将您……（把手伸向身后，想去抓住一些东西，结果手碰到了放在她身后的大脑。）

医院经理：住手！小心！天哪！那可是您母亲的大脑！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它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医院经理：是这样的，在这里这颗大脑是在精神病院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天都要与之打交道，它对于我们来说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我们专家，在此我明确地把我们的患者也包括在内，我们看待大脑的方式与普通外行人完全不一样。对外行人来说大脑是思想甚至情感的源泉，借助大脑他自认为能够感知事物，接收并描述印象等等。因此他也认为，人们必须从大脑辨认出自我，或者在大脑里分辨出一些能够推断其载体性格特征乃至精神错乱的东西。但是即使这种无谓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会有人想到这个主意，去研究一名死者的眼睛，为了查明该死者生前都看到了些什么吗？疯子们在这方面，请允许我这么说，要激进得多。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他们了解肠子的意义。请您想一下施陶登迈尔和他的肠勃起或者……

阿尔托：想一下我的《精神世界中的小母狗》那篇文章。

医院经理：没错。

那对儿小双胞胎（来到前台，现在两个人开始各说各的。）

双胞胎1：当时在妈妈于地下活动中失踪而我们必须前往西西里岛之前，我是怎样在采访中扮演你的，坐在钢琴边笑得很开心。

双胞胎2：不，那是我，是我扮演了你的形象。

双胞胎1：无所谓了，只是不管怎样我们使他们困惑不已。

双胞胎2：然后是在靠门的隔壁房间里，与此同时妈妈在另一侧断断续续地讲话。

双胞胎1：她用一只手卷了香烟，用一支铅笔记录了些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卷笔刀，她之前是用小刀把铅笔削尖的。

双胞胎2：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抑郁症，但是为什么其他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呢？我今天仍在这么问自己。

双胞胎1：她到了尽头……

双胞胎2：可事情才刚刚开始……

双胞胎1：我指的是她说话的方式：是否您能够领会思想还是不能领会思想，是否您能够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否您什么也做不了，我的意思是，确切地说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这么说话的。（说完用请求原谅的眼神向那些候诊的患者望去。）

双胞胎2：她搞错了。

双胞胎1：对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父母搞错更糟糕的吗？

双胞胎2：只是父母一般都会搞错。

双胞胎1：但是你仔细听一下这个：忧郁，忧郁，忧郁极了。是的，很忧郁。忧郁极了。

双胞胎2：在这里无法再确切地思考，至少在照相机和麦克风面前，在这里是纯粹的沮丧在说话。

双胞胎1：然后她终于达到了目的.....

双胞胎2：她认为她之所以终于达到了目的，是因为那也只是空话而已，令人遗憾的是关于政治工作的空话，在这样的工作中她事实上只是把在她脑子里所发生的事情供认出来罢了。

双胞胎1：内心分裂，痛苦。

双胞胎2：因此会话也是这样结束的，以一种供认的方式，当她说：他开始抛弃——停顿、停顿——他的家庭。

双胞胎1：是的，我们在隔壁房间里听到了这些，不理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却知道会发生什么。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但这些只是理论。我父母患有抑郁症。这真是岂有此理。

阿尔托：这真是岂有此理？一名抑郁症患者会立即认出另一名同类。就抑郁症而言，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像猎犬一样敏锐。他能看到隐藏在所有外表和面具背后的东西，认出在我们内心执行的上帝的裁判。

医院经理：请您不要对抑郁症患者对于任务的渴求有错误的认识，这种任务能让他摆脱抑郁症，在一定程度上使之转入躁狂状态。

格施威尔茨特夫人：您指的是恐怖主义.....

医院经理：正是，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恐怖主义是一项值得去做的任务。由此他给自己创造了一种总是对他提出过高要求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之下各种外界情况如此剧增，以至于他似乎不可能再变得抑郁，因为现实超越了他的抑郁妄想。

成年青少年：但是请你们听一下我喋喋不休的诉苦吧，

通过这样的诉苦我变得自由了。

成年青少年的母亲（和他父亲一起出现）：拒绝进食，连续几天躺着不说话，我们在他身上把荆条抽碎成了糠秕。我们把他关进地下室。不起任何作用。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成年青少年的父亲：当我咬他时他会反咬我。当我想把他吊起来时他就乱踢乱踹。当我朝他吐唾沫时，他就僵硬冰冷地躺在地上。

成年青少年：你们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

父母一起说道：这是事先规定的台词。

成年青少年：但不是由我确定的。你们不应该在这出戏里登场。

父母（一起说道）：但是台词是预先确定的。

成年青少年：就我来说我不在乎这个。你们究竟在这儿做什么？明爱会那位女士在哪儿？

父母（一起说道）：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保护你

免受更糟糕的诉讼程序。

发誓放弃红军派这个魔鬼吧。

不再流泪，够了，要适可而止。

成年青少年：把我们从我们的思想和观点中解救出来吧，不再使我们尝试去重构历史、每天总是不断重复相同的思想、以此使心血管系统慢慢衰竭。

〔落幕。

精神病和乌多·于尔根斯

教授说，治愈我的精神病（他甚至都不说神经官能症，但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主要取决于我是否愿意回忆。我无法满足于简单地对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做一番总结，因为那样的话虽然我会使自己获得片刻的轻松，但最晚六个星期之后我就又会站在精神病院门口，如果到那个时候我还有能力这么做的话。把戏剧搬上舞台是一个开始，晚上我有时自己也不外出，而是和其他人一起看看电视，当人们在电视上采访乌多·于尔根斯的时候，对我来说乌多·于尔根斯必须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因为他跟我父亲一个岁数，但看上去比我年轻，也就是说他正好实现了我一生都遭到指责的事情，也恰恰因为乌多·于尔根斯与我不同，他一直以来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就让人给他矫正耳朵，以此实际上在新联邦共和国开创了外科整容术并使之变得符合交际礼仪，因为人们不仅在克拉根福国立医院，而且在战后所有德语区国家截止到那个时候都不知道类似于外科整容术这样的东西，至少不是在这种程度上的了解，因为人们当然也已经尝试过，对从战场上返回的士兵的被枪弹打掉的鼻子和半张面孔进行相应的再造，用当时可供人们支配的简单手段，在乌多·于尔根斯已经成名、又不出名、然后重新出名并一直还和佩普·利恩哈德在路上奔波的时候，我却历经多年仍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宁肯把自己和罗伊·布莱克进行比较，当然不是从知名度方面比较，而是仅仅从这一事实出发，即罗伊·布莱克，就像他向乌多·于尔根斯倾诉的那样，不喜欢他演唱的音乐，但却无法演唱他喜欢的音乐也就是摇滚乐，因为他依循的节奏是1/4和3/4拍而不是2/4和4/4拍，当然人们必须知道，正如我父亲也包括乌多·于尔根斯所知道的那样，我父亲不关心演艺业，而是只关心他的工厂，但是工厂的运作方式与演艺业的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也就是人们必须知道演艺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谎言，而我一直还在沉湎于一个天真的梦想，但是甚至都不愿意像乌多·于尔根斯那样去更名改姓，以此宣布与父亲脱离关系，摆脱他的影响并开始做一些自己的事

情，虽然我不像乌多·于尔根斯一样对酒精有依赖性，他在三十岁时全年都在堕落，每天都要喝掉一瓶伏特加外加辅助酒类，也就是葡萄酒和就着饭菜所喝的其他东西，而是像女孩一样不能承受一点儿酒精，根本一点儿酒也喝不了，虽然乌多·于尔根斯一次在车里（那是在马德里）突然无法再抬起胳膊，幸亏随后被叫来的医生看出那只是缺钙而已，因此他给乌多·于尔根斯打了一针钙针使他重新振作了起来，相反即使所有的氟西汀药片也无法长期对我有效，因为它们只有与一种疗法、一种假定的而非持续受到阻碍的疗法结合使用才能长期见效，因此我必须至少在几次接受治疗期间放弃那种姿态，尽管我自己不认为它是一种姿态，也就是那种想自我治愈、把自己当作治疗医师而非患者的姿态，因为这种姿态另外也对我的状态负连带责任，最终也不会使我的病情有任何好转，因为我总是在用各种借口和转移兜圈子，而不是让自己坐下来，一劳永逸地对这一切进行加工处理，尽最大努力回忆从前，然后把回想起的事情记录下来，也完全可以把我的梦想记录下来，归根结底干脆把我能想起的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虽然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职业，但是在这里它可不是职业，而是在这里我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要屈服于程序，因此写作仅仅是一种写作，就像其他人也在写作一样，当然我也能绘画或者在一面鼓上乱敲一通，反正这一切并不相互排斥，但或许我会通过写作、有意识的回忆或者像在梦里那种无意识的回忆想到一条新的途径，想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非总是老套和惯常的做法，由此能够治愈自己，并且在职业方面有所进步，毕竟这也属于治愈的范畴。

我感觉每天夜里都会落入一种社会吞并的手掌，这种社会吞并第二天早晨又会尝试，额外用一整套对梦境形成补充的原型和象征工具使我开化。并非没有道理的是，我梦里的人物形象经常由电影演员扮演，人们可以将之解释为是被内化至睡眠状态的抵抗。比如今天夜里我是扮演成詹姆斯·邦德的杰森·康纳利，总是在尽力避免衔接错误。拍完一个场景之后，我可能会突然找不到刚才还穿在身上的衬衣等等。我给自己规定的工号是000，并解释说我的特许可以扩展到自杀。不再把颓废作为挑选的生活状况，而是无情地一直活到无意识。在头一天夜里我去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好几层楼的餐馆，那里只有用丸子做成的各种菜。我得到了一张摆在卫生间的桌子（布努埃尔影片中自由幽灵的变种）。当我走进进去的时候，里面正好有一名年轻男子正在割开自己的动脉。我想去找人帮忙，这时门开了，作案现场调查警官巴劳夫走了进来。我取出我的照相机为了给他拍照，但是每当我按下快门时，它都会向后倒卷一百张照片。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来说明电影语言早已为人的潜意识划分了结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一群男孩闲站在一块草坪上，时不时地踢着一个足球，不知什么时候足球掉进把草坪从中间分开的小溪里，于是他们纷纷朝小溪跑去，特别是其中年龄较小的，为了把皮球从水里捞出来。这一连续镜头就像是在一部20世纪20年代的纪实性黑白无声电影里一样，持续的时间很长，总是从不同的角度被拍摄，一个无聊的星期天下午，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在被展示这样一种梦境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准保会拒绝提供一种疗法，就像他对一位女士所做的那样，当时她向荣格讲述自己做了一个梦，梦里她仅仅是坐在一副秋千上在摆荡，据此荣格已经觉察到她无法再被治疗了。由此可见平庸是精神错乱的真正标志？——作者原注

由此可见都是幻梦^②

0. 我的嘴里塞满了被打掉的其他人的牙齿。它们都是我敌人们的牙齿，是我亲口从他们嘴里咬掉的。

1. 我坐在一堂人满为患的翻译研讨课上。课上探讨的是对一种石榴糖水饮料的翻译。我一直以为这种饮料是绿色的，但却被其他学员纠正了这一看法。我一下子意识到，所有的人眼前桌子上的杯子和瓶子里装的都是一种红色的液体，只有我不是。我听到其中一位在场者对他的同桌说：如果人们非常仔细地分析，人们就会遇到一个单词的皮疹。我打听什么是一个单词的皮疹。他回答说，它就类似于我能理解的区域居民称谓词。

2. 我沿着火车站附近一个长长的下跨道行走，被鲁迪·杜契克急匆匆地从后面超过，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沉重的提包。他在一个自动售烟机旁边很快停了一下，但售烟机不起作用了。在他之后我走到自动售烟机跟前，把他投进去的钱又取了出来：一枚五马克和一枚二马克的硬币。紧接着我四处寻他，为了把钱还给他，但却找不到他。火车站空荡荡的非常冷清。

3. 在步行区一家热闹的诊所里，我从一名医生那儿得知我患了癌症。只不过它是一种“非胶囊化”癌症。我在胃部区域随身携带了一种球状体，尽管如此我还能活很长时间。医生责怪我是我自己培育了癌症，使自己受体内肿瘤的约束，因为所有我做或者不做的事情我都要事先和它商量。作为疗法我必须一周两次、每次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待在一个房间里，里面人们都面朝墙壁坐在椅子上。那是一种候诊室里的氛围，许多人在看报纸或者抽烟。

4. 我站在一家餐馆的地下室里，一个城市监管部门的官员刚刚通知这家餐馆的老板夫妇，说在地下室墙面上铺设强电电线是不允许的。他们必须用一道防火钢门确保地下室的安全，在不太容易从地里和墙里扯拽出来的电线上涂抹陶土和黏土，为了以这种方式保证电线的安全。老板夫妇对此很伤心，但尽管如此还是立即开始投入工作。突然我看到那些电线都是有生命的，看到鲜血透过第一批黏土层渗漏出来。

5. 我来到一家花园饭馆，里面一些老嬉皮士们正在庆祝些什么活动。因为我口渴，我就在一张桌边坐了下来。格尔妮卡出现了。她一反常态打扮得很时髦，穿着一件新的皮夹克。她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坐在我旁边的男人缠着她聊起了那个孩子，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是她的孩子。我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那不可能是她的孩子，因为她做过绝育手术了。这时到处都是警察，他们在开始一场大搜捕。我镇定自若，因为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不是一伙的，觉得这与我无关。突然格尔妮卡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亮明自己是便衣警察的身份，用警察惯用的动作把我摁在地上。我对她怎么能够这样被收买感到气愤不已，在她把我带走的时候尝试与她辩论。

6. 我是一幢新建建筑的门卫，负责楼房底层的一个大厅。每天都会出现两名印度商人，他们仔细观察大厅，给我看一个宗教团体的书籍和文章。在第三次视察完之后，他们请求我允许他们偶尔使用一下反正也是闲置的大厅。我说我将要请示一下，但却不知我到底应该问谁。第二天我和平时一样来上班。当我打开大厅门的时候，大厅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装了玻璃的大花房。大厅中央一个挨着一个摆放着新的、被连续编号的木制窄柜。我自动想到的是，印度邪教的成员被关在这些柜子里并最终被杀掉。我走到户外。那是一个和煦的夏天的晚上。我低头看去，看到我的手里握着两个血淋淋的器官。我很快把它们扔到一处灌木丛后面。在这一刻一辆汽车开动了。车里坐着那两名印度人。我取了我的自行车，绕着街区向左骑去，因为我想再次从另一侧回到我的工作地点，以此使自己获得一种无罪证明。半路上我换了双鞋。我也尝试打上跟原先鞋子上的鞋带一样的结，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

7. 我穿过空无一人的大街行驶。到处都是禁止停车的警示牌，在哪儿也看不到一辆停放的汽车，因为教皇在死前要最后一次来这里访问。然后我看到他自己从一栋房子里出来，马上又消失在旁边的另一栋房子里。他一身白色的装束，两根长长的胶皮软管消失在他的鼻孔里。所有的人都对他的死做好了准备，可他就是不死。志愿者随处可见，主要是女性，她们在大大小小的医院里随时待命。我只想上一趟厕所，就已经被人们问及是否我愿意帮忙。作为致歉我举起双臂，它们

都被包扎了绷带。然后我观察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女儿和儿子，他们在陡峭的悬崖边的一处广告牌后面商讨儿子的未来。因为父母认为他是残疾的，所以他以后应当务农。他则说道，在社会主义不复存在的今天，他对当农民不感兴趣。

8. 我被一个总部委任为教皇的男妓。这是一项机密任务。我被装在一个密封的钢板箱里塞进电梯，电梯一直运行到教皇下榻的宾馆房间门口。房间门和箱子的一面同时开启，但是只开这么大，以至于我无法看清站在我面前的是谁。然后我必须满足教皇的性欲。

9. 一个面积很大的现代化的中心，它由一家专科医院和一个动物园组成。通道上有很多人。一名孕妇在仔细端详注射器、产钳和其他助产工具。一名女医生从布告栏里的一张纸条上读到，她最后一位患者的体内还是有一颗巨大的肿瘤。她笑了起来，不愿相信这一点，可紧接着还是陷入恐慌。

10. 一名留着胡须的来自汉堡的大学生躺在一副木担架上呈有意识的昏迷状态。在他四周围满了人，他们把他当作新的精神教师加以崇拜。旁边一位牧师脱去衣服，站到一面屏风后面，透过屏风人们能够看到他的内脏，就像借助一台X线设备一样。一名男子在表演变戏法。他的右胳膊延伸至手腕处时变成了一根木棍，用它他在一个圆盘锯里到处拨弄。我想搞清楚，通常情况下这名魔术师是否戴着假肢，就这一点我询问另一位观众。他支吾其词地回答说，一切都很容易，如果人们是在藻厄兰地区长大的话。他边说边指向一张海报，海报上展示的是两名年轻的长发男子，他们穿着七十年代的服装身处一片自然风光。

11. 我想去拜访我父母。在去他们那儿的路上我看到一只动物躺在机动车道上。走近一看我发现，它是一只非常漂亮的袋鼠，它的一条腿被车子轧断了。突然袋鼠醒了过来，四处张望寻找它的断腿。我朝父母住的那栋房子跑去。我母亲在家。我大声喊道，她应当给我一名兽医的电话号码。她说她不认识兽医，然后当我变得生气时，她又说兽医搬家了，最后当我开始大吵大闹并乱扔东西时，她又说兽医只在支付现金的情况下才外出行医。我高喊我不管这些，她只应把电话号码

给我，可她仍然继续故意拖延时间，直到我父亲回来，对我说我应当平静下来。我抓过一张椅子，把它举到我眼前。我父亲把我逼进客厅，说那只动物反正也将死亡，这对它来说也是更好的结局。我号啕大哭，说我宁愿当场死去，也不想在三十五年之后像他们这样。然后我跑出了房间。

12. 我在我弟弟的房间里，透过窗帘看到两个赤裸的女人站在大街上聊天。我母亲走进房间说，时间已到，我必须去充当辅弥撒者了。我进到厨房里，把三块奶油水果蛋糕最顶端的攒奶油通通吃掉，紧接着我大声问道，为何现在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为了保证灵魂的长生不死”，我父亲回答说，他背对着我坐在桌边。在火车站我碰见我爱恋的阿尼塔·莎尔拉。我们必须站在那里等十列火车。

13. 我在一家银行存钱，但这马上就表明为是一场误会。我想把钱要回来，结果得到两张面额非常大的钞票，每张的面额都是1250马克。我怀疑钱的真伪，因为它看上去不像钱，但是人们向我解释说，现在有人性化钞票流通，并向我指出印在钞票上的漂亮的题材。钞票上真能看到我父母的抓拍照片，他们正笑着穿过银行的门进来。

14. 格尔妮卡把所有可能性的东西都从地下室里清理了出来，也包括我的东西，它们现在躺在雨水里变得湿漉漉的。人们站在周围，他们中有的是房客，有的是对房屋感兴趣的人。一个操着浓重波兰口音的女人在打听一个戏剧小组，该小组成员破例地在这里集合过，并打听小组里是否有一位个头很高的Heer（“陆军”，发音有误，应为Herr“先生”）。在我们所有的人往地下室下面走的时候，她的德语更差的丈夫总在重复“个头很高的Heer”这一表达。我对他说，人们虽然能够听懂这一表达，但它不是正确的德语，他不必记住这样的表达。

15. 我和格尔妮卡以及一个橡胶骷髅去散步。我们都感觉不舒服，而我大约五十厘米高的骷髅感觉是最糟糕的。我把它拴在一根皮带上就像牵着一只狗一样。它开始在地上翻滚，尽管是一只骷髅，可它却开始呕吐起来。首先吐出的是一种液体，然后又是骷髅自身作为原浆体。之后它不再是白色的，而是很奇特地被染上了颜色。我们从使用

说明书上读到，现在我们必须用不同的药酒来清洗它。洗完之后它确实又变成了白色，但现在看上去却像是一件廉价的玩具。

16. 我穿过一个大厅。在大厅一端人们摆放了两个玻璃陈列柜。其中一个里面是一头真狮子的某些身体部位，在另一个陈列柜里是一头完整的狮子，嘴里还叼着一个已经被吞进去一半的土著人。在它面前其他土著人排起了长队，一边欣赏全景一边等候轮到他们自己的时刻。

17. 我穿过一家旅馆的走廊，从好多道敞开的房门旁边走过。在一个房间里正好有一位女士说道：“我们可不能马上就躺到床上去。”我在想：德语听起来多么优美啊。人们根本无须改变声调就能表达出，人们是否想自己做些什么还是不是。如果她说的是“上床睡觉”，那这就表明她自己也想这么做，而“躺到床上去”则清楚地说明，她是不想这么做的。当我来到一个被遮暗的大厅里时，我机械地知道这里在五十年代曾经定期举行过庆祝活动，当时我父母也来这样的活动上跳舞，而现在一切都早已变得荒凉，尽管还在启用，与此同时我在思考，动词“躺”在刚才那种语境下的准确含义何在，“躺”当然意味着一种体力的付出，但在那种情况下也可能意味着一种夸张的过程，我在想，格尔妮卡在认识我之前和其他人上过床，恰恰是这种思想，这种令人痛苦但又正好能够忍受的思想，使我一直保持对她的激情。

18. 格尔妮卡把我们的花园布置得很漂亮。里面有大片的草坪和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一只三条腿的小鹿在跑来跑去，一只刺猬从地窖里爬了出来，一条牧羊犬的头挂在树丛上作为威慑。可惜她忘记了使用血液喷洒器。地区烟囱清理工在我们的房门上写道，他来过这里但没有遇到我们，并且整个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写在这句话旁边的是针对犹太人的煽动性口号。

19. 一辆汽车停在一个咖啡馆门前标明位置的停车处，我从车后备厢里搬出一些小包裹放在路面上。另一辆车从拐角处驶来，车速不快，但它没有刹车，而是直接从包裹上压了过去并撞坏了我的车。我非常愤怒地朝那名司机走去，可他却显得无动于衷。这时他的车后备厢盖打开了，里面躺着一对儿赤裸着身子的男女，他们大汗淋漓，好像是刚刚在一起做完爱。女的还尝试把身上的精液拭去，然后他们俩从后

备厢里跳出来跑了。那个女的是格尔妮卡，但她对我来说显得很陌生，因此我也就没再继续理会这一场景。后来我才明白这件事的所有关联，也才感受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那辆车的司机在此期间消失在咖啡馆里。我想记住他的车牌号，但是前后车牌都已经被卸掉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地沿着街道往下走。在一个下跨道底下那辆车又突然冒了出来。现在它有一个牌照。我试着记住牌照上的数字和字母，但是奇怪的是我怎么记也记不住。虽说我并不瞎，可我就是看不清它们，即使当我尝试索性在我的记事本上记下一些东西时，我也无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寻找一名警察，来到一个园亭处，亭子里几位老师正在吃夹心面包。他们边吃边聊德语课程。我站在那里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聊天。我心里清楚，他们都是些酒徒。

20. 我在一个采砂砾场附近布满灰尘的马路上和我五岁大的弟弟吵架，他躺在地上用一把手枪威胁我。他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我，在我胸脯上打出了一个窟窿，但却并不使我感到疼痛。我害怕疼痛马上就会开始，然后我就会死掉。我拦住一辆载满一家人的汽车，为了让他们把我送到一位医生那儿去。他们起初不愿意，但是在我给他们看了我的伤口之后，他们还是搭载了我。可是半路上我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总体上不信任医生。一下子好像是在自身的驱使下，子弹穿过皮肤退到身体外面。

21. 我躺在一张行军床上死了，床摆在幼儿园的院子里，就在下跨道入口的后面。我能看到我自己。我已经成年，双腿蜷曲地仰面躺着，比平时睡觉时稍微僵硬一些。我又第二次躺在我旁边。我的身体必须被彻底分解和煮烂。这一点非常重要。蒸煮过程持续很长时间。我母亲接管了一会儿这样的工作。她站在一个小厨房里，在一口大锅里搅动。我走了过去。我的身体只剩下一些沙质的沉积物了。但是这样的沉淀也必须被清走。

询问青少年十字军东征运动

然后您就决定组织一场青少年十字军东征运动，如果允许我这样凡俗地表述的话。您从粉色的存钱罐里取走了钱，原本您是想用那些积攒的钱买一台电唱机的，然后乘公共汽车去了火车站。在那儿您与贝尔恩德碰面，从那里开始你们俩打了一辆出租车。

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出租车司机名叫格哈德·米勒。您能回忆起来吗？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么一个普通的名字您从未听说过？格哈德·米勒？我要说的是，谁都认识一个叫格哈德·米勒的人，唯独您恰恰不知道。

不认识，恰恰是我。很抱歉。

但这也不重要。我们有他的证词，这就够了。沿途您又搭载了几名不同的朋友，施特凡、阿希姆以及其他叫不上名字的，这一切看上去也蛮可爱的，就像你们身背小书包、手拉着手从家里走向正在等候的出租车的样子，那情形就像是圣马丁节的灯火游行一般，真的非常可爱。只是接下来你们就不太清楚该做些什么了。你们紧挨着挤在车里……

怎么？我们所有的人？

你们当时还都是孩子，还没有充分发育，身材矮小，天真无邪，头发一缕一缕地垂着，长着肿眼泡和热乎乎的小手。你们一个挤着一个坐在车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怀里，因为当时车里还没有儿童座椅，还没有扎安全带的规定，但是这种情况您自己最清

楚，毕竟您甚至被允许和您弟弟星期天躺在车后备厢里，当您父母在弗里克尔海鲜店里买挂糊油炸鳕鱼和土豆沙拉的时候。

弗里克尔海鲜店，有时那是在星期五，星期天它根本就不开门。星期天营业的是维讷瓦尔德海鲜店。

没错。吃晚饭时索性配半只鸡，人们当时肯定也能买得起这个。您母亲总要把骨髓吸干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跑题了。那辆出租车满载着十三岁半的青少年，就像前面说过的都是些青少年十字军东征的成员，漫无目标地穿过威斯巴登行驶。起初你们沿威廉大街向上行驶，但是蒂莫·林内尔特，他已经被找到了，他的凶手也已经被抓住了。然后出租车司机想把你们送到小施瓦尔巴赫，他要是那么做就好了，这样我们大家就都省去了很多麻烦。

我不明白。小施瓦尔巴赫.....

现在请您不要这么故作清白了。为何您要每周一次去位于毛里求斯大街的城市图书馆呢？

为了给自己借书。

这真是岂有此理，牧区图书馆里的书籍就足够了。或者去下面的比伯里希市政厅图书馆，在那儿您看见过张贴的通缉令，竟然还萌生了那种奇特的志向，即有朝一日也在那里被登广告悬赏通缉。

威斯巴登的图书要多得多。

但是主要还是在那儿有美妙的景色，或者说得更好是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因为人们好像不可避免必须途经小施瓦尔巴赫。就连只看过《业余爱好》和《很快笑三遍》的阿希姆，也就是说城市图书馆真的不是他该去的地方，就连他也总是勇敢地陪您去那里。只不过他的胆量要更大，因为在返回的路上他是直接穿过小施瓦尔巴赫回到基尔希大街的，而您则是乖乖地从外面绕了一圈在前面等他。利用这样的机会一天阿希姆也结识了与他同岁的维尔讷·格卢克，然后格卢克把他领到那

些女人那儿，而您则坐在毛里求斯广场上阅读刚刚借来的海因里希·伯尔的作品。《小丑之见》：当时就已经是您的人生格言。

我最近刚刚考虑过，是否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真的应该再读伯尔的作品。

为何？您自己就是天主教徒并受到抑制。但是人们总在寻找证明自己不幸的东西。因此您当时和您的青少年十字军东征成员乘坐出租车，原本也想去位于黑格大街的朗根贝格-奥伯波恩斯菲尔德，为了仔细查看那儿的防空掩体，在里面于尔根·巴尔奇……

请您不要……

是的，我知道，事情的失败当然是因为钱了。您从未真正下决心攒过钱，而是定期用小刀从存钱罐里抠出硬币来花，可惜这样做的效果现在显现出来了。出租车计价表在跳字时发出无情的咔嚓声。男孩子们乘车穿过黑夜，他们出汗的身体使得出租车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

您在说胡话。

历史、我们共同的历史，但是也包括世界历史，它们中的太多细节都被忽视了，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太过奇异。但是那次青少年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确发生了。

在一辆出租车里？

难道不是吗？

我不那么认为。

那您认为？

人们怎么可以那么说呢。此外那件事的前后细节都不对。

那我能问一下，正确的细节是什么吗？

比如那个格哈德·米勒，他来自德累斯顿，在六十年代的确开过出租车。至少在1967年。

可为什么两年之后他又不再开出租车了？

因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至还给他们往美国寄了一张圣诞贺卡。另外也因为他被美国人俘虏过，于是很快便产生了怀疑，说他.....

您知道是您的什么方面这么吸引我吗？

不知道。是什么呢？

起初您总是否认。是出于原则这么做的。但是如果人们不放松盘问，您就一步一步地承认所有的事情，当然总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那就是您说的跟人们之前向您描述的完全不一样。

您知道我特别欣赏您的什么方面吗？

这我可以想象到。

真的吗？

是的。但是我们把刚才说的归纳一下吧：您承认认识那名德累斯顿出租车司机格哈德·米勒。您了解他的历史，知道他通过与美国的联系而变得引人注目并引起了国家安全局的兴趣，知道他在鲍岑蹲了一年半监狱，然后突然被允许出境，并且奇怪的是去了威斯巴登，在那儿他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天夜里带领着你们那只小型十字军东征队伍。

对此我或许不必做出回答。

是的，您甚至连格哈德·米勒这个名字都没听过。但是无所谓。因为你们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你们就朝卡斯特尔方向驶去。到了下面克莱泽尔河畔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把你们都赶下了车。你们大约是多少人来着？十四个？

我当时是一个人，下了出租车之后乘坐6路末班车去了卡斯特尔。

但是您穿着您的用塑料制成的骑士盔甲，带有护胸甲的银色的那副，配有宝剑和插着红色缨子的头盔。

头盔上的缨子在那个时候已经脱落了。但是我随身带着宝剑，尽管我的年龄对于这样的东西来说其实已经太大了。

哟，您可不能这么说。在这样的青少年十字军东征途中人们必须带上相应的装备。当年的战争距今天也没过去多久。虽然又组建了联邦国防军，它.....

它是在我生日那一天组建的。

啊，在您生日那一天，这太有意思了。正好在您.....

是的，正好在那一天，那天我也来到了世上。

但是联邦国防军解散了。

您说什么？

是这样的，几乎是解散了。不再有兵役制了。也就是说昔日组建它的前提今天又被人们废除了。红军派也同样解散了，但是您.....

我不明白。您在严肃地指责我怎么没有跟着也一块儿消散？

从引申义上讲当然只能是这样的。

这就意味着？

意味着您最终要仔细考虑一下您存在的前提。

这样的前提会是？

您知道“永恒孩童”这个概念吗？

不知道。

这是分析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它的意思是永远作为小男孩，不想长大成人。

我应该是这个样子？

难道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您多大年纪了？与联邦国防军同岁，比红军派的年龄大一倍多……

您知道我正好注意到什么了？

我急于想知道。

红军派也属于27俱乐部的成员。

我不明白。

请您推算一下：红军派成立于1970年5月14日，解散于1998年3月，也就是说它存在的时间还不到28年，而是27年。

那又怎样？

就跟吉米·亨德里克、珍妮丝·贾普林、吉姆·莫里森、科特·柯本或者首先跟布莱恩·琼斯存活的时间一样。

然后呢？

再没有然后了。就这么简单，这是我刚刚注意到的。

我觉得，这马上从两个方面支撑了我的“永恒孩童”理论。

什么？

就是您刚刚说过的，因为这对您天真的本性来说又是典型的，即正好在我们会话中某一并非不重要的地方开始偏离话题，转而谈及您孩子般的对摇滚乐队的激情，如果撇开不谈您把流行音乐殉道者和恐怖主义组织相提并论的话。现在就差您把那个旧的披头士乐本取出来了，

在那里您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记了下来，还粘贴了报刊剪辑。同时您通过提到那些乐队成员的英年早逝证明了我的理论，因为“永恒孩童”当然是作为小男孩死的。因为他坚决拒绝变老，所以对他来说就只有死亡这一条出路了。

无论怎样现在我错过了这样的出路。

很遗憾，因为依照您自己的意识形态您早就应当不在人世了。我的意思是，谁五十九岁死亡的时候还值得一提呢？

比利·普里斯顿。

披头士乐队的第五名成员。您恰恰想起了他，这真有意思。一名同性恋黑人跻身于您的四位一体之列。您当时难道不羡慕他吗，当披头士乐队推出《回去》（Get Back）这首歌的时候？不考虑把你们俩联系在一起的笃信宗教，您与他达成了共鸣，是因为他正好是您的反面设计？您没有把这个看作是给自己的备选方案吗？您难道不想与他并驾齐驱吗？

我不懂您的意思。您说得这么煞有其事，说他是一名黑人同性恋者，这我直到刚才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他是一名黑人？

不，是不知道他是同性恋者。

您当时也有意于这样做，但是然后又随意地把这种倾向转变成了对那个克劳迪娅的柏拉图-同性友爱式的痴迷。您从未真正地敢于去做些什么，对一切只是空谈，但却从未公开承认拥护过什么，无论是对革命、同性恋还是英年早逝。当您得知，在披头士乐队于1970年4月10日寿终正寝后不久，比利·普里斯顿似乎没有经过等待期就又兴高采烈地参与了滚石乐队的演出，甚至还参加了滚石乐队《小偷小摸》

（Stinky Fingers）专辑的录制工作，这时您头脑中的一根保险丝干脆都烧断了，于是您在一个月之后的1970年5月14日创立了红军派。事情是这样的吧？

这完全是胡扯，《小偷小摸》那张专辑1971年才发行，几乎是在一年之后。

非常精确，就在披头士乐队解散一周年之际。这是一张庆祝胜利和嘲讽失败者的唱片。这在当时使您变得精神错乱，这种针对您心目中圣徒的嘲讽。滚石乐队的歌手们以此来取乐，也就是他们在每一首歌里都影射那四位留着蘑菇头发型的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坟墓，他们自己还把四方形活动前裤片拉开，在坟墓上表演他们的舞蹈病。比如《摇摆》那首歌里的“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墓地”，《死去的花朵》那首歌里的“我不会忘记在你的墓前放上玫瑰的”，《我很郁闷》那首歌里的“我想扯拽我的头发”，它描述了一种典型的古代哀悼仪式，在这里当然是讽刺手法，同时在其他歌曲里杰格-理查德把他们虚构的说话者直接投射到披头士乐队成员身上，例如在《吗啡姐妹》或者在《你听不到我在敲门吗？》里，它非常印象深刻地描述了一名被活埋者的痛苦，他尝试以此使自己引人注目。

活埋，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您最初也打算对米夏埃尔·雷泽采取这样的手段，当您夜里站在卡斯特尔的克雷泽尔河畔时。孩子们能够这么残忍。您可以十分镇定地旁观，看他是怎样在下面莱茵河畔的那个坑里慢慢死掉的。幸亏我们能够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

你们？

当然就跟所有其他纳粹完全一样，那个雷泽也为我们工作过。您不相信一个男孩会自愿阅读《士兵》连载小说？或者反过来说，您认为一个阅读《士兵》连载小说的男孩不会自愿为我们工作？

他的葬礼，在下面莱茵河畔的插花，就这些吗？

那是遮人耳目的行动。就类似于军情五处用“保罗已死”这样的诡计所采取的障眼法，此外两者在时间上几乎一致。

这种把戏应当转移人们的什么视线呢？

转移人们对约翰死亡的注意。

但是约翰确实死了。

但是当时还没有。

那么1980年12月8日被枪杀的又是谁呢？

当然是他的替身了。很简单他们必须使他不再抛头露面，因为他开始表现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此外他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即他还在小野生前就和她的替身庞凤仪出现在公共场合。一般您总会认为，在听到一起暗杀事件时，人们肯定会相信遇刺者是一名替身。真正的刺杀行动通常情况下都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

那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呢？

那是他的兄弟罗伯特充当的他的替身。

但他可是亲自被谋杀的。

您想说的是他的替身。

我简直无法把这个当真。

因为迄今为止您一直认为，现实是从属于文学的，而现在又不得不断定，您甚至都无法初步想象，现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这些都是如此含糊不清的借口，它们应当把一切重新挪正。但是您认为，为什么1966年2月18日美国军方的一家运输机会装载着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棺木飞向大西洋上空，为了把它从一百五十米的高空投掷到大海里，棺木里装填的是三个八十公斤重的沙袋，棺木四周还被钻了四十个孔？

这我不知道。

为什么正好在三十二年之后，小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也同样是乘飞机坠落在大西洋里死掉了？您知道的，就是那个在他父亲葬礼的照片上好像是在敬礼的小男孩，尽管他只是用手在保护眼睛不被太阳照射。

耶稣完成了三十三个奇迹。他正好三十三岁，在他死去的时候。

也是一个永恒孩童。

工厂主的童年时代

在战争最后几天的一次动用燃烧弹的进攻中，工厂主的母亲由于脸前突然亮起的镁光灯而双目失明了。当时她正在父母家的屋顶架上，为了把洗好的衣服挂起来晾干，尽管呼啸的警报声和日益临近的枪炮声她也不想中断自己的行为。在其他方面未受任何损伤，她在火光中摸索着下楼，穿过在此期间空无一人的房子走到室外，她的父母已经死在花园里，分别躺在水井旁边和莱茵克洛德李子树下，她经过他们的尸体继续往前走，其间一直结结巴巴地念叨着她未出生孩子的名字，穿过被爆炸的冲击波从枢轴里扯拽出来的大门，走到外面弥漫着浓烟的街道上。

她的未婚夫，一名在市政厅房顶上坚守在一架损坏的高射炮旁边的士兵，看见她像一个锡质人像一样急匆匆地穿过被撬开的街道，右手放在肚子上，像是在保护腹中的胎儿，披头散发，失明的眼睛就像是玩具娃娃的眼睛在睡觉时那样向内翻转着。未婚夫大声呼喊并挥手示意，因为他想指挥她朝市长家方向走去，这样她就能够地下室具有保护性的腌渍的酸泡菜木桶后面隐蔽起来，但是在被掩埋者的叫喊声和坍塌房梁的哗啦声中她什么也听不到，除了自己沉闷的呼哧呼哧的呼吸声。

在她穿过村落广场的时候她停了下来，在那儿几条耷拉着脑袋、瘦得皮包骨的狗围在堆叠的游击队员的尸体旁边站岗，因为她觉得在始终围裹她的白色光线里，看到了一只手和辨认出了她未婚夫的照片，照片像是装在一个被翻开的圆形的框子里，一动不动但却充满亲切。但是照片两侧捻过的髭须已经染上了夜色，一种无法穿透的、比先前的白色更模糊不清的黑色把她包围了起来，因此她只是改变了方向，继续跌跌撞撞地朝原野走去，在那儿一头离群的小野猪从一处灌木丛里跳了出来，就像从一扇快速开启的食物冷藏室大门里涌出的穿堂风一样从她身旁蹿了过去。

工厂主的母亲把脸朝向天空，仿佛是想辨别云层的情况，看天上是否还有过早被投入战争的飞机摇晃的机腹划破最后的阳光，在呈螺旋形和8字形旋转，为了把机上起火燃烧的货物运载到矮小的瓦屋顶上。空气寒冷，针叶树枝也冻僵了。各种声响仿佛在远去，喷嘴好像也烧空了。就这样她在田间小路的路中央生下了工厂主。

她侧身躺着，用一块页岩割断了脐带，把工厂主包在她的围巾里。然后她跑到河边，侵略者修建的拦河坝使河流干涸成了一条涓涓细流。她把孩子放下来，用折断的芦苇丛编织了一个篮子，并用现在从她体内渗出的胎盘填塞篮子的缝隙。然后她把工厂主放到篮子里，最后一次亲吻了他，把他托付给了狭长的小溪，多年之后据说小溪变成了湍急的河流，河上架设了一系列桥梁，它们全都在颂扬工厂主的崇高，赞美他是怎样驾着他的汽车从钢筋混凝土桥梁上驶过，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放掉一只鸽子，为了讨好围在未加固的引桥两边的人们，他随身带了个孩子放到驾驶座上，为了向他展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美丽是为了纪念那个女人，她把他生到了世上，自己却再也见不到这个世界的美丽了。

才过了几公里盛装着工厂主的篮子就被一道由茂密的灌木丛组成的水堤绊住了，在那儿浑身颤抖的他突然遭到生平第一次暴风雨的袭击。这个毫无所知的孩子大声哭喊，引来了一群被击溃的士兵的注意。他们把篮子捞到岸边，从里面取出新生儿，把他移交给了在一辆两边有栅栏的马车上陪同他们溃逃的五名妓女中的一名。士兵们猜测，离发现地不远肯定有一个居民点，于是他们摆渡过河，在两个小时的吃力行军之后，的确到达了工厂主的祖籍村庄，还在当天夜里他们就把村子洗劫一空并将之夷为平地。黎明时分他们返回到装载妓女的栅栏马车处，与先前计划的不一样，他们决定让这名弃婴活下来，把他作为吉祥物带在身边，因为是他使他们获得了这么一次意想不到的外出掳掠的机会。

指出这一点是不无道理的，即一种原罪与工厂主的出生和放逐联结在了一起，这种原罪导致了那个村庄的毁灭和全体村民的遇害。后来这个国家最有才华的人士把这种罪过重新解释为幸福的罪过，因为唯独

它成为工厂主伟大作为和创新的引擎和推动力。但是这是天意的秘密，同样也是无与伦比的力量，使得他能够忍受这种罪过所要求的所有厄运，因为父亲的头颅被刺穿在奥切森韦德的一根木桩上，这样的一幅画在战后装饰着山地教堂的还愿牌板，这幅画是一笔不容低估的遗产。

因此还在他的青年时代工厂主就经常问自己，他究竟能否成功地做到比他父亲活的时间更长，或者命运是否将会同样在他二十出头时，把他从市政厅房顶上扯拽下来，让他落入敌对士兵之列，为了让他在瓦砾堆和倒毙者之间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所有那些他将不会再经历到的事情，去想少许那些现在很快就会过去的事情，几乎就像是一首儿歌里所唱的情形，人们在回家的路上无忧无虑地唱着这首儿歌，手牵着手排成一行纵队，而在父母家的厨房里则是精神错乱占了上风。

工厂主的母亲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自己从路中央拖进一片树林里，她躺在林子里，耳朵贴近因远处炮弹落地而跟着抖动的灌木丛，倾听是否有谁路过，能够把她捎带到一个偏僻的茅草房里让她获得安全，在那儿她只需用一个杯子从屋檐接一些融化的冰水喝，在干草床铺旁边睡一觉，睡很长时间，为了把父母和未婚夫忘掉，三夜之后在一块灰色的岩石后面重新醒过来，岩石上未生长任何东西，只有牲口一年两次路过时在上面擦痒。当她终于听到一些动静并已经把手举起来时，眼前黑色的模糊裂开一道口子，工厂主的母亲看到那是敌方的士兵，他们通过时离她只有几步之遥，他们不会满足于给她致命的一枪，而是会沿着她几乎每天都要向下走一遍的路把她向上拖拽，或许她甚至欢迎这样，她很快这么想道，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一切再看最后一遍，包括围篱和草地，再用脊背感受一遍每一块她平时只是不经意踩过的石头，感受一遍路上的每一处坑洼。但总归她不再有选择了，因为喉咙无法再让她喊出最后一声，就这样士兵们从她眼前经过，嘲笑坠落的弹头和一架冒着黑烟翻滚而下的飞机，尽管那是他们自己人的飞机。

工厂主后来看到了这些被印刷在廉价纸张上的图片，把它们从人们丢弃在电车车厢里的报纸上剪切下来，粘贴到他的收藏集里，并用笨拙的手在图片上题了字。其中一张图片上的题名为“战争史”，其副标题的表述为：来自真实的生活。但是如果不是在暗中、即使在一次暴行之后也只是在被打碎的咖啡杯和撞翻的座椅之间用极其缜密细致的工作曝光某事的话，那么生活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呢？

负责照顾弃婴的那名妓女打心眼里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只是因为时代的混乱而偏离了正道。根据流传下来的人们对她童年的讲述，她显著和不可动摇的信仰早在那个时候就已得到了证明，这种坚定的个人信念也深深地影响了工厂主，他亲切地把他的养母称作姨母，让人给自己和他的亲生母亲一道画像，画像上还配有一些象征性的附加物，例如隐藏在他粗呢大衣褶裥里的一只秃鹫，它是童贞圣洁的象征。

这些生动的叙述仅仅是田园诗般的小型绘画吗？其他传说讲述了一笔被贪污的遗产和那名在一次围猎事故中丧生的佃户，工厂主的父亲接受了佃户的名字，他无法向他的第一个妻子提供任何财物，他们如此贫穷，以至于他们在办完婚礼后不得不在一个牲口食槽里过夜。孩子们几乎无法活过满周岁，他们染上白喉，或者出于解释不清楚的原因而身上发青，没办法人们只得不断掘开冰冻的土地，把孩子们狭小的棺木掩埋进去。很快母亲就不再能够从产褥期里起身了，她自己疾病缠身，最后在一个周日早晨六点钟死去了，还在督促人们做晨祷的钟声敲响之前。新娶的女人也就是工厂主后来的母亲，是父亲的一位和他拥有同一太姥姥的表妹，在他妻子日渐衰弱的最后几年里照顾她，从她怀里夺下已死的孩子交给收殮者。现在她得到了教会的特许，和她的表哥在奶牛供应市场旁边的小教堂里，走向装饰得非常寒酸的婚礼圣坛。三月的风把修剪过的榆树上还未生出树叶的枝条吹得四散飞舞，与此同时工厂主的母亲被戴上了那枚已经失去光泽和覆盖有绿锈的戒指，戒指是她表哥从还躺在敞开棺木里的他第一任妻子因患痛风而浮肿的手指上旋下来的。神父的祝福语话音未落，工厂主的父亲就冲出教堂去了酒馆，在那儿他喝着啤酒抽着雪茄，思考着自己的爱好即养蜂。

这个地区的蜂蜜尝起来味道很特别，这种蜂蜜是蜂群从变得荒芜的花园里吃力地采集来的，或许将来通过养殖和特殊护理，恰恰从这样的口感里能够获得一种异乎寻常之处，从而给他带来一种远远超出山谷界限的名声。他的新婚妻子站在外面，被她的亲属们围成一圈。男人们穿的西服上衣太短，在后背处翘了起来，袖口也都磨损了。通过折边缝合，人们尝试赋予婚纱一种自然的平整程度，但是八个月的身孕是几乎无法被否认的。工厂主的父亲忧伤地望着他妻子的侧影，因为他只是期待又一次死胎分娩，不再指望得到一位继承人，他（继承人）将会给自己的蜂蜜理念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为这个继承人他值得逃避一些向官方部门缴纳的税款，并把这些钱用于他日后的教育。

与人们所有的猜想相悖，工厂主是在耶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出生的，他挺过了第一年、第二年，甚至是第三年。在这个孩子几乎尚未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时，父亲在往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安放一个新的蜂箱的尝试中遇难了，因为他的双腿陷在一处多刺的灌木丛里，他不知道该如何使自己脱身。那块突出的岩石位置非常偏僻，因此无论是他妻子还是当地任何其他人都不知道，人们能够在哪儿找到失踪者的下落。此外他妻子正怀着第三个儿子，在救援她丈夫这件事上一点儿忙也帮不上。相反她和工厂主以及他弟弟坐在厨房里，给那些找寻无果归来的男人们斟上接骨木烧酒。工厂主的第二个弟弟早已在七月份的某一天来到世上，而在八月末的时候，突然一群蜜蜂聚集在房子后面一个被淘汰的蜂箱里，在完全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把它们采到的花蜜吐到蜂房里。除了三岁的工厂主之外它们不让任何其他人接近它们，它们落在他的脸上和手上，甚至在他的嘴里飞进飞出，但却没有对他造成一丁点儿的伤害。

第一次品尝新装灌的蜂蜜时它是那么的甜，以至于人们只需要一滴蜂蜜，就可以用它来涂抹一整块圆面包。被这种蜂蜜的甜美所吸引，很快整个地区的人们纷纷前来拜访，为了用一只普通玻璃杯的价格，买到满满一顶针的蜂蜜。这样一来突然变得单亲的工厂主的母亲就有了微薄的收入，这使得她能够亲自把他抚养到实科中学毕业，虽然不是她必须让别人领养的工厂主的两个弟弟，因为蜜蜂会有规律地在春天消失，为了在夏末带着甜蜜的收获再次返回。

这种蜂蜜的秘密许多年之后才被解开，当徒步旅行者偶然发现夹在岩石裂缝里的他父亲的尸体时。他的身体因为气候状况而成木乃伊状，人们发现它时就是作为薄如蝉翼的皮肤织纱的，而他的内脏多年来则一直充当了蜜蜂的食物和住所。虽然工厂主后来蔑视和反抗每一种宗教，仅仅容忍那种信仰取向，它使自己从各种神话附属品当中解放出来，摆脱了秘密忏悔，以此创造了完全符合他心愿的一种重商主义社会的前提，可他当时还是永远醉心于蜜蜂的象征，对他来说蜜蜂体现的是持续的更新和对死亡的克服，因为它自己懂得把遗体转变成食物。

食物来源于吞食者，甜美的生活源出于强者，直到最后工厂主信奉的格言都是这样的。他习惯于在那几次少许时刻大声信口说出这句格言，当责任和天意要求他显示出非凡的力量时，比如在他的婚礼之后，当时他把自己的新娘托付给了一名会计员，为了让自己集中精力去履行重大职责。但是工厂主从未反驳过外国心理学家们的诋毁，在这方面哪怕是一个字也没提过，那些外国心理学家们声称，蜜蜂的象征代表一种模糊和隐蔽的弑父。为了达到企业的顶尖位置和成为民众的主宰，工厂主比所有的人都更清楚弑父的神话责任，因此他也不会自己生儿子，只待在装有双层防弹门和防弹窗玻璃的房间里。

阴雨连绵的下午让工厂主觉得没完没了，当他在被称作大伯的昏暗的书房里坐在他的写字柜旁，好几个小时地把两个空的“世界”火柴盒放在一起相互穿插的时候。当时他就想象要为青少年开发一种插塞游戏，这种游戏将会激励青少年的想象力，而不是将之扼杀在萌芽中。透过厚实的窗帘，工厂主看到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举着撑开的雨伞，笨拙地穿过一条田间小路上滑溜泥泞的犁沟，并尝试保持身体的平衡。

对于他在城里上实科中学的那段时期，人们首先熟悉的情况是，工厂主习惯于每天穿街走巷地巡视，身后跟着一帮同学，他向他们描述他假想的新的城市规划的不同阶段，根据新的规划最紧迫的任务是公共建筑必须被拆除、被重新设计和被取代。用一根从树上折断的枝条，他在一座公园的沙地上绘制了他重建计划的初步草图。在他生命的最

后时刻，在最可怕的战争动乱里和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他还派出一队考古学家前往他当年上实科中学的那座城市，为了让他们发掘出那条被覆盖了好几层焦油和改变了路线的沙路，不管多么零碎也要使他当时绘制的草图重见天日。果真考古学家们在地下好几米深的地方发现了那些被刻写的保存完好的线条，他们让人把它们切割出来，制成标本装在箱子里，运往首都并送到工厂主的办公室里，工厂主一眼就认出这些草图是他当年亲手所绘，让人把它们转交给国内最优秀的规划师和建筑设计师，再由他们从中设计出一栋无与伦比的房屋，在敌机投弹期间和民众清苦的生活条件下，在与他上实科中学的那座城市相同的地基上建造了这栋房屋，它在钢铁结构中闪闪发光，顽强地把自己锃亮的铠甲迎向敌人的力量。

工厂主无法亲自参加落成典礼，但是他让人给他看了照片，这些照片由于描述了他早在少年时代就尽显无遗的能力而令他非常感动。没有人告诉他，这栋像穹顶一样被架设了拱券的建筑里没有任何房间，而仅仅有多重交织的通道，仿佛是一群飞离地面的等翅目昆虫，因为所有的人都把它视为意图和使命，并从中看出他们自己慢慢逝去的生命的象征。工厂主为他们把个人的终结提升到一种象征意义的高度。这种象征使他们感到幸福喜悦。因为他们不再拥有空间，只有一条最后的他们必须走完的通道。

有时候那些用从不同的捐款箱里募集到的钱财资助新建的战争纪念碑无法与监狱的无窗立方体结构相区分。这更像是一个偶然间得出的结论，建筑师们在开发他们的理念并把设计草图摆在工厂主的绘图桌上时并未想过这样的结论。浮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对人命里注定要受空间限制的描述。被建在山丘上之后，这些大型纪念碑俯视脚下的小城，在夏天往山谷里投下长长的阴影。鸟类和其他动物都会避开它们，就连常春藤也不愿沿着没有毛孔的碑身向上攀爬。在多雨的徒步旅行季节人们会选择这些巨石雕像作为远足目的地，面对在灰色的空气里变形为凹陷面孔的巨石吃着黄油面包，同时从保温瓶里倒一杯热麦芽咖啡喝，这样的感觉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将会忘却。

从实科中学毕业之后工厂主向一名动物标本师学习手艺，头两个月里他的任务是，上午站在一个满是污渍的水槽旁边，用一把柳叶刀切开头足纲动物的外套膜，把防腐液倒入它们体内。下午他要面对的是那种毫无希望的冒险，即从思想上领会本地全部两万八千种昆虫的差异和共性。

工厂主住在车间的一间后屋里，人们给他往屋里放了一个盥洗台、一张床和一个五斗橱以及桌子和椅子。在房间中央摆放着一个椭圆大木桶，它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标本师在木桶里腌渍了一头完整的母牛。工厂主的师傅是浸渍方法的拥护者，在这一过程中身体的柔软部分应尽可能以天然的方式通过腐烂与骨头分离。用手术刀和剪刀去除肌肉，这在他的门派里被认为是对手工技艺的粗鲁违背。如果这样做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在加工程序临近结束时，有时也允许使用一把小的金属抹刀刮去沬在苏打水里最后的肌肉部分。另外浸渍的好处在于，这一过程也同时自动促成了涡虫、绳虫、带虫、吸虫和线虫的繁殖。

工厂主还在当时就养成了那种不良习惯，也就是在展开他的思想时必须来回踱步，因此那个恰好只能让他走三步的大木桶对他造成的妨碍可能比对其他学徒还要更大。肉体腐烂的气味在夜里经常令工厂主喘不过气，他只有借助于服用一些在车间存放毒剂的柜子里能够找到的水合氯醛，才能让自己陷入应得的睡眠。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自认为在梦里能够听到那头母牛在大木桶里不安的辗转反侧声，以及它的蹄子触碰桶壁发出的有节奏的咔啦声，这让他回想起他母亲房子前面没有修剪的树枝，当秋风涌进山谷的时候，那些树枝也同样曾经摇着他入睡。

工厂主很难与他人建立起友谊，在他周边没有任何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倾诉衷肠的人。跟过往时期的那些最伟大的诗人一样，他也是从远处爱慕一位少女，那位少女他在工厂的院子里倒炉渣时就见过一次，她的画面如此深刻地烙在他的脑海里，以至于据说正是她的形象，后来成了所有妇女画像的榜样，这样的画像被凿进大理石里，装饰着城市公共花园和绿化地带。那些通常裸露的雕像在胳膊上抱着一只桶，对

此艺术史上也有很多猜想。虽然人们绝不能片面地领会艺术的表述，据此谈及正在汲水的女性也同样显得合理，她正在用桶从时间之河里汲取民族发展所必需的元素，但是炉渣桶可能也扮演了一个不容低估的角色，它同样也必须赢得一种象征意义，哪怕是暂时性的象征意义。

工厂主很少有机会去拜访他的母亲，这样老妇人经常好几个小时坐在那儿凝视花园，园子里的各种色彩逐渐转变成阴影并失去光泽。尽管她丈夫已经在多年前离她而去了，但她一直还保留那种习惯，也就是在谈起他时总要用手指向外面那个旧的蜂箱。但是对工厂主来说自由的大自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调剂。他终于能够深呼吸，不必再清点自己的脚步了。这里的女人也跟其他地方的不一样。虽然她们也提着桶，但是桶里盛的不是炉灰，而是牛奶。工厂主顽皮地跟在她们后面跑，让人用一把勺子给自己从桶里舀一口牛奶。他看到面颊上裂开的小血管和扣在眼睛上的沉重的眼睑，他扑到路边的一块草地上，开始啃咬一根草茎。

工厂主的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丧失了视力。情况的发生过程是这样的：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一名穿过各个村落游荡的旧货商贩敲了她的门，问他能否收购那个摆在花园里不被使用并遭受剥蚀的旧蜂箱。满以为会得到对方的同意，他还在提出请求期间就朝他渴望得到的东西的方向移动了几步，工厂主的母亲当然一生当中从未离开过那件能让她回忆起死去丈夫的遗物，对方的举动令她如此冲动，以至于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无助地把双手伸向旧货商贩，对方现在已经走到蜂箱旁边，正在评估它的价格。工厂主的母亲吃力和大口喘气地追赶那名男子，但却被横在地上的一把农耙绊了一下，栽倒时头撞在一块石板上，这样一来她就暂时失去了知觉。当她半小时以后在自己的床上醒来时，是女邻居喊来的医生把她放到床上的，她已经完全丧失了视力，只能呆视千篇一律的空洞。

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在此关于工厂主父母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讲述找到了交点。在两次讲述中母亲的双目失明难道不都是遵循这一目的，即逃避一种可怕的、可能无法被承受的现实，也就是逃避父母的死亡

或者最终失去心爱的丈夫？蜂箱承载了对后者的象征意义，旧货商贩也的确趁母亲昏迷时把蜂箱据为己有。工厂主从他监护人的一封信里得知了母亲的命运，监护人逼迫他返回祖籍乡村，为了在那儿向一名面包师学习烘焙手艺，或者像他父亲那样长期在一个公务部门供职，以此为他遭受失明和疾病打击的母亲赚取生活费用。工厂主正期待接受标本师同业公会委员会的第一次中期考试，他的内心非常分裂。虽然他已经预感到，标本师这一职业对他来说将不会是最终的职业，但他确信自己不适合做面包师或者公职人员，更不用说在他长大的那个村庄了。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把自由的土地连带山丘和原野感受为是令人窒息的，女仆们的笑容让他觉得虚假，他希望她们桶里的牛奶变成炉灰。

工厂主跑到邮局给家里发电报，说他想尽快返乡，但之前还须履行无法推迟的责任。今后十四天他的计划看上去是这样的：继续学习备考，然后把一批喜鹊制成标本。黄昏和夜晚的时间他将用于查找那名旧货商贩的下落，为了找到纪念他父亲的最后物件，甚至可能以此使他母亲恢复视力，并使作恶者遭受应有的惩罚。

喜鹊体形较大，羽毛上带有一种奇特的斑纹。工厂主用一块微湿的布片把喜鹊身上大量出血的部位洗干净，然后往鸟嘴、肛门和鼻孔里塞上药棉。紧接着他用一根缝衣针把一根结实的捻线穿过鼻孔，为了用它把鸟嘴束紧。工厂主小心翼翼地摊开羽毛，开始实施他早已熟练掌握的、沿身体纵向从胸骨直到肛门的制作标本的主要环节。他用一把镊子把皮肤从身体上除去，把两条腿尽力向后拉，把它们从翅膀处扯拽下来。在对身体进行肢解期间，他不断往身体上撒上马铃薯粉，为了避免羽毛被弄脏。小心翼翼并用为了避免撕破而采取的细致入微的一拉一拽的动作，工厂主现在把皮毛几乎完整地从尸体上剥落下来。接着他从皮肤上举起鸟头，开始对眼睛进行加工。几乎难以想象和被他人无法估量的是，工厂主现在以何等的自我克制和充满责任感，开始用一把镊子夹住喜鹊眼珠的下端，把它们从眼窝里摘除，在此过程中他脑海里一直还滋生着那幅新鲜的、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而更显残酷的母亲变瞎的画面。月光照进工厂的院子里，使存放在那里的箱子的影子扭曲变形成侧面黑影像，它们好像高举着胳膊排成行站在防火墙

边。工厂主用剪刀把喜鹊的枕骨部剪断，把颅腔清理干净。他走向工作台，按照鸟的身长切削了一根小木棍，从后面把木棍插入喜鹊的头颅，直到它能够被撑牢为止。他拿起装有白砷溶液的小瓶，往鸟头的内侧里滴了几滴。在一种灵感的指引下，工厂主没有把那个小瓶放回原处，而是仔细把它拧紧，顺手把它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里。

这天夜里工厂主没有躺到他的床上去睡觉。他站在腌渍母牛的木桶边，注视着它早已空洞的眼窝，和漂浮在表面的似黏液状的油脂和油污。那些气味来源于他童年时代的小屋，还有他在里面挂着的冬大衣之间躲藏过的柜子，以及他最要好的朋友长有痘疤的脸庞，朋友的手在一次发生在储藏草料的顶棚上的事故之后就一直残废了。他看到自己的母亲在那栋砖砌小房子里坐着。唯一一间能住人的房间，里面也摆放着床，上面是复斜屋顶阁楼，下面是地下室。工厂主看到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座新古典主义寺院，寺院两侧各有四根大理石柱，前面有一条铺设的砾石路。但是在工厂主着手把这幅画面转化成现实之前，他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必须完成。

他出门走进夜色，漫步穿过街道，用手电筒照亮商贩和旧货商人的店铺。有两次他自认为找到了那名偷走他母亲蜂箱的男子，但是当他第二天踏进商店质问店主时，第一个人能够凭借各种材料向他证明，所有在他店里待售的蜂箱皆出自当地一名与他相识的木匠之手，此外这些蜂箱此前从未被投入使用过，这一点人们从箱盖上未划破的绘有抗拒邪魔目光符咒的乡村题材画不难看出。相反，第二名旧货商人把他领到店铺后面的仓库里，为了向他展示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蜂箱，所有这些都是从去年冬天解散的地方博物馆的收藏中接管过来的。还有这么多数量的蜂箱存放在离这儿不远的一间地下室里，因此他自己派遣了一名店员下乡，为了给乡下的养蜂人和业余饲养者提供相应的蜂箱，因为他不可能把这么多蜂箱廉价出售给城里为数不多的收藏家。表面上工厂主不让人觉察到他一丁点儿的失望，他感谢店主提供的信息，然后离店而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继续完成他的任务，把剩余的喜鹊制作成标本，学习备考，继续一晚接一晚地搜寻城里的旧货商店。

终于在第三个通宵不睡的夜晚，工厂主在对最后一只喜鹊制作标本时实在是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没办法他只得吃力地从车间里出来，走到隔壁他的小房间里躺到自己床上。但是工厂主睡得很不安稳，因为他强烈的意愿一直在对抗身体所要求的休息，并不断给他带来最可怕的幻象，在这些幻象里他失明和无助的母亲去找寻那块突出的岩石以及她丈夫成木乃伊状的遗骸，而他自己则作为不能自理的面包店伙计，穿着一件过大的围裙跟在后面走，一次又一次被拖在地上的围裙带子绊得踉踉跄跄，因此他不得不一再停下脚步，与此同时母亲在远处修剪整齐的果树后面消失不见了。

为了摆脱这些幻觉，工厂主最终用尽最后的力气睁开眼睛，从他的床铺上起身，来到腌渍母牛的那个椭圆形大木桶跟前，为了半梦半醒地用右手从桶里舀一些腐水，把它浇在自己的脸上和右胳膊的脉搏上。但是从桶里能听到一种奇特的动静，它与关节发出的单调的咔嚓声或者气体的释放声不一样，当一块腐肉从骨架上脱落的时候。工厂主几乎觉得那种动静像是一种嗡嗡声，当他终于在黑暗中摸索到开关并把灯点亮时，他看到一群蜜蜂从水里飞起，带着潮湿的翅膀嗡嗡地朝小窗方向飞去，到了窗前它们列队保持飞行姿势，好像在等着人们给它们把窗打开。

工厂主抓起他的短上衣，把窗门推到一边，跟在蜜蜂后面跳到外面的院子里，跟随着它们穿过空旷的街道，蜂群就像是一条黄黑条纹的带子在夜空中飘荡，总是与他保持相同的高度。他不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有时觉得一直还在睡眠当中，而他的身体则陷入一种运动机能，这种机能半小时之后不再令他感到劳累，因此多年之后出于使青少年获益之目的，他把这一经验归纳成了十点纲领性意见，只是在日常训练中蜂群由一面固定在突前行驶的摩托车骑手头盔上的黑黄三角旗所取代了。

在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蜂群和工厂主来到城市的另一端，在那儿他们一道拐入弯弯曲曲的街巷，这样的街巷工厂主此前从未踏进过。最后蜜蜂们聚集在一栋不显眼的、两侧都已经破败的房子前面，自战争以来房子上没有任何一块砖石得到过修补，房屋外墙面一直还显示

出过去年代那种忧伤的铅灰色。在工厂主赶上蜜蜂之前，它们已经通过院门的锁眼钻了过去，走到跟前工厂主发现院门从里面上插了销，因此他借道下一条斜巷，从那里开始翻越了三道院墙攀上护航的蜂群，在此期间它们正在一扇地下室窗前站岗放哨。工厂主用手电透过因为灰尘和炭黑而几乎变得暗淡的窗玻璃往里照，在各式各样的旧货中间果然发现了他母亲的那个蜂箱。因为通向背街房屋的门只是虚掩的，工厂主很轻松就能进到屋里，并找到了去往地下室的入口。他发现那个蜂箱完好无损，它在一件大型的五斗橱后面潜伏着。

工厂主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在听到沿台阶下来的脚步声时才醒了过来，一个满脸通红、胡子拉碴的矮胖男人走进了地下室。他还没有把一根蜡烛点着，工厂主就无所畏惧地大步向前，质问他关于蜂箱的事情。那个窃贼企图反咬一口，责骂工厂主是侵入者和罪犯。于是工厂主检查了一下那只装有白砷溶液的小瓶，连日来它一直在他的上衣口袋里躺着。但是为了能够让窃贼尝一剂这种溶液的厉害，他必须首先制服他，把他摔倒在地。他朝窃贼走了一步，但又及时看到对方手里握着一根沉甸甸的棍棒，时刻准备着保护他的战利品。在窃贼拉开架势挥出第一棒时，工厂主弓身从棍棒底下躲了过去，从地上捡起一块随处堆放的煤块，把煤块掷向窗玻璃并把它打碎。马上人们就听到一阵越来越大的嗡嗡声，因为蜜蜂从砸碎的窗玻璃飞了进来，开始攻击盗贼，使得他丢掉手里的棍棒，捂着被蜇伤的脸瘫倒在地上，在这个恶棍的嗓子因为蜜蜂从里面的叮咬而肿胀堵死之前，工厂主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小瓶里的全部白砷溶液都给他灌了进去。

工厂主一直等到窃贼的最后一息，然后他扛起蜂箱离开了那栋房屋。天色破晓。第一批工人已经来工厂上班，他们把便帽拉得很低遮在脸前。在房屋之间的空旷场地上，几条瘦骨嶙峋的狗在四处乱窜。热面团的甜味从面包房里涌出，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工厂主与一名报童不期而遇，他正在号外当天的日期和报纸上的大字标题。

工厂主吓了一跳。过去的几天对他来说成了毫无区分的一码事儿，因此他忘记了参加标本师同业公会考试的日期。再次返回车间现在看来

是太晚了。他必须立即和直接去同业公会大楼，人们肯定已经在那儿等他了。

当工厂主疲惫不堪、蓬头垢面、此外肩上还扛着一个蜂箱沿着气派的大理石楼梯急匆匆上楼、为了进入会议厅参加考试时，考试委员会的成员们都相应惊呆了，他们起初根本不想允许他参加考试。尽管工厂主讨厌向别人陈述很久以来的私密细节，但他还是不得不提出他母亲的生病，作为请求原谅他放肆的出场形象的理由，并最终促使教授们改变了主意。现在人们还想知道，那个蜂箱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整夜都在忙于用一种新的方法制作蜜蜂身体的标本，众所周知蜜蜂的天然飞行姿势很难被描述，工厂主解释说。如果他希望用这种借口很快过渡到考试试题的话，那么他不得不很快意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些德高望重者饶有兴致地从他们的桌子后面走上前来，要求看一下他制作的标本。工厂主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想给他们看动物标本，给出的理由是制作体系尚未完全成熟。正式考试还没有开始，其中一位先生补充说，其他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工厂主别无选择，只能把蜂箱从肩膀上放下来，让考试委员会的成员们去打开它，而他自己则被过去几天的劳顿所击溃，瘫坐在一张椅子上。奇怪的是他听到的不是令他担心的疑问，即“那些标本到底在哪儿？”而是一片赞许的喃喃低语。工厂主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那些男人们中间，他们从蜂箱里取出以完全不同的飞行姿态呈现的蜜蜂身体的标本，频频赞许地欣赏着它们。不，人们真的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令人吃惊的是从任何地方都看不出刺孔和人工处理的其他特征。

就这样工厂主弥补了他鲁莽出场的缺陷，能够在最好的条件下接受对他的考核。首先人们向他提了一系列理论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怎样切除一只兔子的横膈膜，在切除过程中必须注意些什么。工厂主给出的回答是，沿肋骨和上部骨盆边缘实施一道圆形切割，这与他从他师父那儿学到的完全一样。考官们意味深长地面面相觑，他们很快写下了几行简短的记录，工厂主自认为从中看出他们在怀疑他回答的正确性。为了使自己的论据形象直观，工厂主走到黑板前面，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雄兔的草图，凭借这张示意图他说明必须从什么地方

开始切割。这时其中一位考官站了起来，直截了当地问道，他作为考生怎样评价从肚子上面开始的交叉切割。不怎么样，工厂主回答说，因为以这种方式人们很容易使横膈膜骨遭受一种不必要的损伤。先生们又交换了一下眼色，除了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那位，所有其他人们都在摇头。工厂主不可能知道，那位先生就是席勒伯尔德教授，他在很多年前就使在切除横膈膜时使用交叉切割成为同业公会里的必选方法，现在他自己不动声色，却在享受由他的同仁们去相应捍卫他的一种立场。骨盆圆形切割会带来多种多样的好处，这一点据说后来才得到相关专业人士的认可，而且是多亏了一项经工厂主交涉而颁布的相关规定。

但是现在通过这种对一个从根本上讲无关紧要的问题的回答，工厂主的考试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无论他多么巧妙地把交由他进行标本处理的狐狸的大脑在水下喷射而出，而绝不能切断膜状的大脑穹隆，立即识别那两根刚刚显露出来的锁骨，使它们与身体相分离，把它们分别装在两只单独的玻璃杯里，一旦杯里的水染成红色就马上换水，同时他又把非常敏感的、即使在一位灵巧的标本师的手底下也经常脱落的尾椎暴露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但这些都无济于事。这些思想僵化的官吏已然做出了判决，仅仅是为了不遭受人们的指责，说他们举行了一次不完整的考试，他们现在才并非真正感兴趣地补充提了那个事先准备好的诱诈性问题，即结合制作标本他如何评价马粪。总在怀念他农村家乡那种无情的气候，工厂主如实回答说，当人们比如说冬天在持续换水方面非常困难时，也可以把一具尸体在马粪堆里放两个星期，之后上面的肉就很容易脱落了。那些德高望重者几乎是违心地对这一回答点头称是，因为现在他们反对工厂主的没有别的，只有他在对横膈膜制作标本时那种偏离规定的观点。鉴于他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他实践方面的灵巧性，故而人们在商议时（商议期间工厂主和他的蜂箱一道在外面的走廊上等候）突然想到这一念头，也就是虽然拒绝向他颁发经由同业公会考核并获准的标本师资格证，但却证明他具有充当标本师助理的能力。这或许可能被描述为是一种让步，但仔细观察不难看出，它是对工厂主职业生存的毁灭，因为章程里明确规定，仅仅是为了与获准从业的标本师相区分，标本师助理不再被允许参加标本师资格考试。

当这些德高望重者走到外面的走廊上，为了把商议结果通知工厂主时，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做非常残酷。但是工厂主一点儿不动声色，只是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看都没看一眼由一名秘书递给他的那份标本师助理证明，拿起他母亲的蜂箱，正想朝楼梯方向走去时，结果在刚刚擦洗过的楼板上滑了一下，刚好用一只手撑在扶手护栏上避免了跌倒在地，但却失去了对蜂箱的控制，使得蜂箱从他手上滑落弹开。那些先前在接受委员会成员欣赏时只是装作僵硬和死亡的蜜蜂，现在成群地飞了出来把考官们团团围住，就连这些已经对所有的动物种类进行过肢解、截肢和制作标本的成熟老练的男人，现在也像受到惊吓的孩子一样挥舞着双臂，在他们的文件夹后面隐蔽起来，拥挤着退回到考场里。

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工厂主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但是使他产生如此极端想法的并非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的命运，而是一种僵化体制的不公正和骄横，它与新的体制原则上是相抵触的。

在返回工厂的路上，那些蜜蜂又一只接一只地回到蜂箱里集合，工厂主在进入车间时马上就把蜂箱放在了门边。被制成标本的喜鹊就跟他先前离开它们时完全一样，排成行站在工作台上上午的光线里。工厂主走进他的小房间，把他仔细、虽然现在看来也是徒劳地钻研过的教材打包装好。然后他走到那个大木桶跟前，用他的手电筒往里照。母牛的骨架几乎被完整地暴露出来。在它的肋骨之间工厂主能够辨认出老标本师的上身，他肿胀发白的皮肤也同样从颧骨处开始脱落了。工厂主从他那儿学到了浸渍技术的精巧，这种技术很快就将取得如此长足的进步，以至于工厂主将能够制作他的第一个人体标本了。

当然即使没有相应的资质证明，他也能跟现在完全一样继续照管他师傅的业务，只是这样做不符合工厂主的本性，他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此外从一开始他就感到个人的命运与他民众的命运以最紧密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他不断与尚存的标准发生冲突，这样的标准拒绝向他提供一个体面和首先为公众所认可的职位。

两天之后在一个上午工厂主朝集市方向走去，当他注意到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的时候。是什么使普通民众心绪不宁，在这一兴趣的驱使

下，他在人群中给自己开辟出一条路，为了最终来到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跟前，台上人们把一具男性尸体罩在玻璃罩下面安放在灵床上。工厂主立即就辨认出死者正是偷窃蜂箱的那名盗贼，尽管他的身体因为遭受蜂群的叮咬，以一种令人无法置信的方式浮肿变形，以至于人们费了很大劲儿才得以分辨出他的头部或者四肢。从一块固定在附近的牌子上工厂主能够读到，人们把这样的身体现象归结为一种迄今不为人所知的疾病，人们打算采取所有手段阻止这种疾病的扩散。出于这一目的人们即刻邀请了所有有名望的医学专家，但他们也全都面临一种无法破解的谜团，只能排除像鼠疫、流行性腮腺炎或者天花这样的疾病。为了走出这一困境，人们决定采取非常规手段，也就是把尸体向公众公布，因为人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找到一名高人，他能够识别症状，甚至可能懂得如何医治，对此人们当然要悬赏一笔相应的酬金。

工厂主无所畏惧地走上前来，请求那两名看守向旁边让一步，这样他可以更加仔细地查看那名男子的状况。人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工厂主俯身近看先前他敌人的身体。浑身上下裸露，只有生殖器为一块亚麻布所遮盖，窃贼就以这种痉挛的姿势躺在那里，就跟工厂主把他丢弃在地下室里的身体姿态一样。工厂主饶有兴致地仔细打量不同部位的肿块，尝试把它们与相应的刺孔联系起来。

好像没过几分钟，窃贼身上的肿瘤就突然改变了颜色，开始泛出红色，那样子就仿佛是它们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因为棺木的玻璃罩蒙上了一层雾气，工厂主无法再继续辨认下去了，所以他转过身来，向看守道了谢之后扬长而去。

对于工厂主来说这一意外事故并未因此而结束。当然他在考虑这样的一个政府，它能做到的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把解决最困难的任务托付给普通民众。这在工厂主看来是宣告了社会的破产。更有甚者，它真实地表明了政府对责任的一种深度恐惧。

或许是他自己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那天晚上工厂主几乎是自动萌生了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还在很晚的时候促使他离开自己的小房间，上一层楼去他师傅的住处，用一把匆忙之间制作的万能钥匙打开他的

房门，为了在那儿找到几张纸和一个铅笔头，这样就不至于使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构想被白白想出，并在夜晚梦境的喧闹中变得模糊不清。

只有唯一的一次，那是在他的学徒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工厂主来过师傅的住处，为了在铺有地毯的走廊里等他的师傅，那天师傅穿了一双跟平时不一样的鞋，以便领着工厂主穿过一片位于附近的小树林，因为他自称属于学习范畴的也包括收集昆虫和甲虫，以及把它们立即杀死并装入植物标本采集箱。在这次学术性游览期间师傅讲述了一些他的私人生活，因此工厂主才知道他是鳏夫，没有孩子，也没有任何亲戚哪怕是远亲也没有。至于为何要杀死标本师，工厂主在他后来的传记草稿里解释说，既要杀害一位好人即标本师，又要杀死一个恶人即那个偷窃蜂箱的盗贼，这对于他的个性发展和成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杀人这种经验，正如工厂主所表述的那样，只在各种情感联结以外才能真正被理解，才可用于促使个人性格的形成。

这样这种双重谋杀就属于工厂主成长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之一，这一阶段是与他亲密的圈子成员们在其常年的学习和培训过程中必须要经历到的。但是只有少量和被选中的人，他们自己也曾面临双重杀人的选择，为此必须挑选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只有这些人才理解工厂主当时可能处于何种感情危机之中，但也只能从最大的痛苦中才能发展出成熟。工厂主的其中一句格言是这么说的，但是成熟是那种可能性，它使人们自我拥有目标方向，想要那种必然性也就是意愿本身。

人们或许会认为，工厂主是在事后设计了这种解释，为了赋予其他动机一种特殊的假象。但是从某一特定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情况绝非是这样的。当工厂主在寻找纸张和笔具的过程中踏进标本师的住房、开始抽出几个抽屉打开柜子时，他有了一个令他震惊的发现。在那儿能够找到大量的纸张，只是它们全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标本师的字体。工厂主只需扫一眼那些纸张，就能看出它们都是些充满暴力、颠覆国家的诽谤性传单。传单上谈到了“推翻”，谈到了“个人统治”以及许多其他方面。个人，这个人应当是谁呢？工厂主直到最后在每一次演讲

结束时向人群里喊出的那个问题是不无理由的，它很快就成为人们对新秩序的普遍誓言。个人，这个人应当是谁呢？

但是即便这一问题，就跟工厂主所有的格言一样，也是向一种深度的内心震动索取的，因为在他用那些纸张给标本师的炉子生火时他不得不意识到，他性格的成熟来源于一种纯粹的猜想，因为事实证明标本师不是一个好人，而恰恰相反是一个坏人。这样他就杀死了两名恶人。在那天夜里他的英勇行为陷入了平庸的洼地，当工厂主在令人窒息的标本师的房间里、在温暖的炉火前的地板上睡着的时候，他没有预料到命运之路早已重新在他面前伸展开来。

几乎谁也想不到工厂主在考试委员会面前遭受失败之后，人们很快又到处都在渴望得到工厂主。当然人们还不了解他本人，但是所有的报纸都谈到了那个男人，说他在人群中给自己开辟出一条路，为了俯身近看窃贼的棺木。因为在工厂主离去并消失在远处的一条街巷里之后，看守们发现窃贼的外观彻底发生了变化。他们马上通知了医师公会，该公会最高级别的代表立即赶赴现场来确认同样的情况。肿胀已经消退，从皮下呈黑色上涌的血液已经退缩，就连脊柱因死亡的僵硬而非同寻常的弯曲程度也减轻了。是否那个男人打开棺木对死者进行了一番处理，看守们被这样问道，但是他们俩都矢口否认，此外都指向人们在棺木所有四个侧面上固定的完好无损的铅封。

尸体被送往病理学科，在那儿人们把它从棺木里抬了出来，对它进行更加仔细的检查。如果说此前人们是在揣测死因的话，那么现在一切好像都在表明它是一次因心力衰竭而导致的非常普通的死亡，当然这只在一定程度上使负责检查的医师们放下心来，因为那种希望，即他们在与这样的一种疾病打交道，其症状只在死后显露一段时间，然后便又完全消失了，那种希望并未特别减轻他们绝望地寻找病因的难度。

从专业方面人们对那种理论丝毫不感兴趣，即认为俯身近看过棺木的那名男子可能会和治病有一些关系。“是后来而不是后果”，这是医生们的座右铭，跟标本师同业公会的那些主席们相类似，医生们也无法通过他们自己学说的盲目无知，去解读现实中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

多亏这一次有民众在场。这样很快人们就传开了，说一名男子透过密封的棺木，仅仅是通过注视就对死者进行了治疗，倘若人们可以对一名死者谈及治疗的话。民众的想象力简直不可遏制，后来人们干脆相信工厂主无所不会。如果他的时间充裕一些的话，那名死者可能也就复活了。

在这种普遍的亢奋情绪中人们开始找寻那名男子，工厂主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当他一大早在标本师过热的房间里醒来的时候。因为他生火时烧掉了所有的纸张，就跟他担心的完全一样，他自己记录的思想也在夜里丢失了，可他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严重，因为他对标本师真实性格的发现反正也要求一个新的思维的出发点。工厂主站起身来离开房间。最后一张纸片夹在了他鞋底的凹槽之间，工厂主没有把它烧掉，而是作为勿要过度轻信提醒，把它插进上衣的里袋里。

工厂主几乎还未踏进明媚的晨光里、走到平时在这个时候一般都空荡荡的集市广场上，已经聚集在那里的人群就认出了他，把他围了起来并对他高呼万岁。神医被找到的消息在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非常快地传开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为了目睹设法做到那件难办的事情的神医的风采。警察和军队都无法控制民众的这种集体意愿，因此政府最终别无选择只能下台。现在工厂主必须承担起义务，投身于天意为他安排的那一职务。在所有的喧嚣吵闹中工厂主从未忘却，为了道德上的完美他还需要杀掉一个好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清除这一瑕疵，但每次他都不得不重新断定，他只是让又一个坏人遭受了他公平的命运。在他生命临近结束的时候，他才达到了他精神和道德追求的高潮，当时他很孤独并被敌人所包围，仅仅是为了直到最后也不对自己的事情感到失望，他通过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以此在经过这么多年无谓的找寻之后，终于杀死了他唯一能够找到的诚实的好人，这是对命运的何等讽刺啊。

询问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

当时情况对您来说肯定是糟糕透了：您儿时对克劳迪娅大献殷勤，当时您追踪她旅行前往柏林，在那儿发现她正与别人热恋。而且是跟谁来着？跟您最讨厌的竞争对手贝尔恩德，他在成绩上超过了您并使您相形见绌。

我真的不知道还要对您说多少遍：克劳迪娅去了柏林，如果您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后来贝尔恩德可能也去了柏林，或许他们俩也在那儿碰过面。

碰过面？好吧，您太善良了，他们俩有过一段充满激情的恋爱关系。如果我想象一下，您当时甚至连十四岁都不到……

您难道是想用您奇怪的年代排列错误来使我彻底疯狂吗？克劳迪娅，是的，她比我大两岁，贝尔恩德也是，但是现在一下子有了两名成年人，而我却一直还是一名十四岁的少年，这前前后后都不对。

我觉得是您在极力主张，把年月顺序作为限制性的社会机制加以废除，相反您赞成一种在时间上自由游动的历史编纂学。但是还是请您把年月顺序理顺吧，这才中我意，只能这样。您就干脆告诉我，事实到底是怎样的。我很乐意修正自己的错误。

我从未去过柏林。我和针对赖尼肯多夫城区会议中心的袭击事件毫无关系……

迄今为止也根本没有提到过这起事件。但是挺有意思的。它涉及的是一起什么样的袭击行为呢？

这我可不知道。

行了，来吧，现在您可让我失望了。

是您让我失望的，这种装腔作势就跟来自侦探片里的陈词滥调完全一样，它能够更容易地让人们坦白。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被控告者暴露了自己，通过他谈到一些他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

什么叫陈词滥调？您刚刚说起过发生在柏林赖尼肯多夫城区的一次袭击事件，现在可以证明对此我没有透露过一句话，此外不管您相不相信，对此我也一无所知。

不，您对所有的事情都一无所知。这一点很清楚。您只能把地点和时间搞得乱七八糟，把彼此毫无联系的事情胡乱堆砌。

在这方面我不是这么肯定。我的构思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您就是那个1969年在某个地方抓住某一任务不放的人，仿佛在那之后您就不会再变老，仿佛之后您就再没有活过，一直到今天。但是不，您这样做，仿佛当时一切都停滞了。克劳迪娅，贝尔恩德，他们都变老了，去了柏林和法国，去了太平洋地区，但是您，您一直还坐在比伯里希那个傻里傻气的厨房里，让明爱会那位女士给您涂抹一块黄油面包，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情。以这种方式您使这一切都合理化。以这种方式您偷偷地摆脱了责任。采取行动，这往往只是由其他人去做的。您只是那些可怕的权贵们的玩物，那些权贵由教会、父母家和国家组成，因此您决定干脆不再继续生长，因为这会让您感到很高兴。此外这也不是特别独创的想法。我们当时在学校里只看过《猫与鼠》。那个相关的描写……

行了，行了，您不用给我描述这些了。但是正如在我们刚开始会话时我已经说过的，您完全可以像霍格费尔德夫人那样成为红军派成员，如果您没有成为红军派的一员，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一次意外。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几年之后，您去了柏林，在那儿重新遇到了贝尔恩德和克劳迪娅，是您催促他们盲目地过急行动，是您搞到的炸药而且

不再顾及人的生命，这些您不能再矢口否认了。您尽管继续躲藏在您的小城田园生活背后，这不会对您有任何用处。您只管继续在我们面前表演疯子的角色吧，这样的疯子生活在一个有钟形玻璃盖的乳酪盘里，盘里总是不断播放当时那五六个月发生的同样的事情，为了让您意识不到这样的当下早已成为过去，让您像是行走在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一样。但是这样的出口根本也不可能存在，因为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因为否则的话您必须从过去走出来，进入真实的当代。这一切是多么有感染力，这一点您可以从我身上看到，在此期间我也跟您的说话风格一样了，因为人们禁不住想要尝试帮助您走出困境。但是另一方面，我说不清楚，不知怎么地……

什么呢？您尽管说好了。

好吧，不知怎么地，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准确地表述……

您就只管说吧。

我觉得您说的一切都是如此经过构思和索然无味的，并以奇特的方式被复杂化了，对我来说这与您总是自我宣称的精神错乱毫无关系。这更像是一种不知怎么地被误导的官僚主义。但是正因为您如此固守这样的思维模式，我才觉得您也以某种方式而显得精神失常。您理解吗？

是的，我当然理解这个。我的精神错乱就在于我显得非常正常。

您看，我指的就是这个。您总是对一切都了解得更多，自己也已经说出了一切，也已经进行过自我批评。所有这些都是策略，您把这些策略发挥到极致，为了让人们抓不到您。您就像鳗鱼一样又湿又滑，但不是人们所熟悉的伪君子或者骗子那样的圆滑，而是以一种充满精神生活的奇特方式，这样的方式更为糟糕。那部影片叫什么名字？托马斯·克隆恩真是不可理解。

米歇尔·勒格朗的电影音乐，配上那首无与伦比的名曲《你心灵的风车》，曲中一切都在不停地旋转，像齿轮一样相互耦合，人们彻底失

去了方向感，不知道听到的是鼓声还是仅为自己的手指敲击桌面的声音，人们能回忆起面孔和名字，但却不知它们是属于谁的，总是在隧道里还有一条隧道，在轮子里还有一只轮子，一切都在运动和相互推移，世界就是一个默不出声地穿过宇宙飞行的苹果，一切都在断裂成碎片，就连歌曲也是如此，人们从这种永恒的旋转和缠绕中苏醒过来，仅仅是为了注意到秋叶有了和她头发一样的颜色.....

克劳迪娅？

可能是吧。我不知道。或许人们自己也根本不知道他爱的是谁。或许人们一直认为那是克里斯蒂安妮·韦根，然后不知什么时候，当一切都早已被忘却和结束时，人们才意识到那是无法令人忘却的克劳迪娅。因此所有其他的事情人们也忘不掉。只有当人们采取行动、当人们在某个地方盲目和不加考虑地向人群投掷炸药包时，人们才会忘却，因为人们想把自己炸掉，想把自己从这种陷入僵局、被冻结的时代里炸出去，但同时又会产生那种感觉，即人们要透露一些事情，如果人们使自己摆脱它们、如果人们离去、如果人们不再去想、如果人们不总是继续在内心承载回忆的话。

那么您回忆起了什么呢？

回忆起她的目光。我看到她用一种眼神注视着另一个人，它.....

用一种爱恋的眼神？

是的，我是多么想看到她用那种眼神在注视我呀。但是因为我爱她，您明白吗？因此我不得不像是迫于情势去感受那种眼神，就像她对它的感受那样去感受那种眼神。您明白吗？因为我爱她，所以我必须去爱她爱的那个人，但恰恰是这一点对我提出了过分要求，恰恰是这一点令我伤透了脑筋，您明白吗？恰恰是因为这一无法破解的矛盾之处。

这种情况又让我更加迷惘了。

我知道，它也令我神志糊涂。这正好就是我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就是那种卡在肉里的刺，是在逃亡与攻击、爱情与绝望、你和我之间的不断切换，人们从外部观察、从内心感受另一个人，这样人们虽然独自一人，但心思却完全在他身上。

那发生在柏林赖尼肯多夫城区会议中心的袭击事件又怎么解释呢？

虚构的友好3：悲叹帝国

德里达对去/来游戏的跟踪

虽然我指责他人没有识别政治结构中的系统性，相反却在道德方面陈述理由，可我也同样很少识别出爱情关系中的系统性，却在道德方面陈述理由。

信仰、爱、希望，这些都是相互制约的道德审级，它们共同维持了整个不幸。

仅仅拒绝形式（低俗的文艺作品、平庸化、简单化等等）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拒绝运输这些形式的内容（爱情、英雄主义、道德等等），因为两者不是相互独立地存在，而是彼此制约。

或许用这个原因可以来解释，为何人们要有所作为，为何他们要找些事情来做，为何他们要枪杀别人，或者往图片上倾倒酸液，或者变得堕落、肆无忌惮和为达目的不管死活，因为他们通过这样的行为把自己弹射到一种生活当中，从这种生活中不再有退路可逃，它充满了客观强制力，这些强制力让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堆积行为，直到人们只是忙于承担其中一种行为的后果，在未加考虑、粗心大意和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人们让这一种行为发生了，人们实施这一行为跟这一行为发生在人们身上是一样的，这就好比是人们在柏林夏洛腾堡区的狼穴酒馆里花一千马克买了一把贝瑞塔手枪，在康德大街砸毁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汽车，从位于柏林米奎尔大街83号的德国社会问题中央研究所的底层窗户里跳出进入地下秘密活动。

最好最后所有的人都死亡，如果可能都被杀戮掉，因为否则的话通向平庸之门又会重新开启，无论电影、书籍和生活片段之间有多么不同。痴迷于拙劣的文艺作品的原因恰恰在于，从这样的作品后面不会

再有其他东西出来，人们已经到达了，而其他人还在排队等候：在门外，沿左侧排队，每一个人都与另一个人交错而行。

福柯是德里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教授，他从不知道应当在德里达的论文作业下面写上“很好”还是“不足”的评语。这就好比是去/来游戏一样。

洛特雷阿蒙把这个用于表述他有时有些简单，因为是下意识结构化的诗歌：《人是一棵橡树》，而对他来说宇宙就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秆。本章注释皆为作者原注。

很遗憾去年德里达没能和我去那家所有的东西都卖50欧分的商店，那里有一种注射器形状的圆珠笔，它带有毫升分配装置，笔芯四周还有一种红色的液体，可惜它很快就烘干了。德里达：我总是梦见一根羽毛，它是由笛子或者仙女变来的。为了逃脱潘神，绪任克斯让人把自己转变成一根芦苇秆，然后潘神用这根芦苇秆给自己切削了第一支笛子。绪任克斯笛再次出现时已有超过八十种昵称，用这些昵称亨里埃塔·沃格尔在她1811年11月的信里证明了克莱斯特的存在。或许这样她能够毫无顾忌地承认她的爱，或许这样她才能忘我地去爱，因为她知道克莱斯特还在当月就将枪杀她。对于帕斯卡而言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秆^②，也就是会思考的芦苇，这总是令我回想起《诗篇》第103篇，在那里人是一根草，是盛开的花朵，它被一阵微风彻底摧毁。帕斯卡之所以选择芦苇秆，可能是因为它通过风能够发出声响，也就是说思想是上帝呼吸的回响，帕斯卡描述了对上帝的疏远和对无限空间的惧怕，以此以最恳切的方式发挥了自己的效应。

1985年9月，一位爱上我的意大利姑娘在临别时送了我一本圣经《诗篇》。她正好把《诗篇》里描写青草和盛开的花朵的那句话抄写在了随书附上的卡片上。在临别的头一天下午她请求我帮他起草一份结婚通知书。当我没有意识到，她在结婚通知书上描述的是她自己和我时，也就是说当她不得不断定，我甚至连她的爱恋对象都意识不到时，她在第二天就启程回她的家乡了。在边境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她从一个公用投币电话亭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她在电话里说，我应该照顾好自己，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我当然知道

她的话是一种呼吁，那是在暗示我应该照顾她，应该把她请回来。或许我真的应当那么做。或许我应该让别人爱我，看是否从这种被爱中能够产生出一种爱情。如若不能，那么至少她会变得幸福快乐。

几乎整整十年之后，1995年5月2日星期二，晚上我在城市池塘旁边坐在另一位女士身旁。她领口开得很低的女上衣对我来说显得与在手腕处束紧的袖口不相匹配。我对她说，将来我就做她喜欢的事情，并且也真的是这么想的——或者表述得更好一些：我自认为是这么想的。我愿意放弃自我，尽管只是在这一刻，尽管只是出于绝望。当然这种放弃自我不是真的自我放弃，而是恰恰相反，它尝试始终不放弃自己，始终坚持我对爱情的设计。在痛苦中的她立即接受了我的建议。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我的建议不再是正确的了。如果她没有接受我的建议的话，或许我还能把它付诸实践。

互相质疑对方的爱。这是我恋爱关系中一种受欢迎的变体。属于此列的往往还有，同样相互之间以自杀相威胁。这是有一定逻辑性的，因为如果人们怀疑对方的爱，那么人们必须至少证明自己的严肃性和走向生命尽头的意愿。从一切迹象来看，爱情涉及的好像是一种非常孤立和孤独的活动，人们主要是单独体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第三者一道经历这种活动，但却很少是和自己渴望的对象一起去感受爱情。

令人气恼的是人们有时甚至必须把威胁的结果付诸实践，也就是当对方不再遵守约定、把说过的话当真，并已对威胁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也证明了爱情几乎仅仅发生在想象领域。

或许我应当接受耶和華见证人的邀请，他们每隔三个月总会派同一位和蔼的女士在他人的陪同下到我这儿来，那样的话我就能去参加一种活动，得知是否一切会真的随着死亡而结束。该诅咒的是为何事情总涉及我，以及我和我简陋的大脑应该想出的同样简陋的观念和愿望？为什么不遵循其他人的愿望？我之所以不幸福快乐，可能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真正想要和需要什么。

在影片《闪灵》里，斯坦利·库布里克也让杰克·尼克爾遜用一台鹰牌打字机不断写下“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要变傻”这句话。对库布

里克来说，鹰牌打字机是纳粹的一个标志。但我从未如此破译过这个标志，因为它是我的第一台打字机，是父母不再使用而淘汰给我的，它与我最初创作的诗歌和未完成作品联系在了一起。

我的第一篇篇幅较长的散文大概有六十页左右，我把它当作是一部长篇小说，它是我十九岁那年用一台鹰牌打字机^①写成的。我当时不会讲法语，但却不知从什么地方读到过，法语词glas是“丧钟”的意思，于是就给那篇文章命名为Glas。它讲的是一种对一次失败的双重自杀的狂热幻想，以克莱斯特和亨里埃塔·沃格尔为蓝本。男的枪杀了女的，但自己却活了下来，或者他过于胆小以至于不敢追随她而去。德里达阅读了他分为并列两栏、名为“丧钟”的文章，在栏目之间又插入了一些评述，用热内阐释黑格尔或者颠倒过来。热内那一栏以引用热内本人的一句话开头：“这是一本被撕成规则的方形纸片的伦勃朗之书的残余，扔进厕所里。”这一构想与艺术破坏者伯尔曼的主张不同，他虽然也是有计划性地进行艺术犯罪，但却想使毁灭本身能够被人们看到。伯尔曼追求的不是毁灭一些接下来不该再有的东西。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彻底消灭，而是对苦难进行描述。图画应当遭受苦难，这种苦难应当描述它们新的、被他所强加的思想内容。与热内不同，他看重的不是对作品的拷问，而是对他自己的拷问。（在爱情方面也存在这样的区别：恋爱中的一方用酸液攻击另一方的照片。）

最终变得言语烦琐，正如帕斯卡在逗留各省期间在他第十六封信的结尾处写道，这封信变得有些长了，因为他没有时间写一封短点儿的信。

《明信片》：几乎三百页厚，用时三个月写成，是写给他的情人、女哲学家雪维安·爱嘉辛斯基的情书。相比三年前出版的巴特的未完成作品《恋人絮语》，德里达给我留下了一种独特的冷峻印象，虽然他总是富有见解地变换描述他的情感，并把“我爱你”这句话思考成空洞的、和尚念经式的表述。与巴特不同，他（巴特）在《明信片》一书出版的那一年去世了，他的未完成作品，特别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记事短集》，显得是那么迫切、绝望、亲密和脆弱。我读了所有这些作品，通过阅读我感到自己被免除了那种义务，即必须亲自探讨爱情这

一主题处理手法，对那种极端孤独的话语提出自己的观点。为此其实我是应该放弃一些东西的，可我不愿意做的恰恰就是这个^②。我对他们的期待、要求和愿望，我却拒绝给予自己。我以微笑来讥讽他们的尝试，将之视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应当使我自己避免被别人以微笑相识，避免使自己以不能令人满意的形象出现。他们应当替我说话替我失败，从而使我能够继续隐藏起来。和我同一天生日的巴特或许也跟我更为亲近一些，因为他不会求助于情人，而总是从孤独者、等候者、被抛弃者和渴望者的境况出发进行写作。

在《明信片》一书出版四年之后，德里达与爱嘉辛斯基分手了，因为她想要那个他拒绝保留的孩子。后来爱嘉辛斯基嫁给了利昂内尔·若斯潘。德里达的儿子在《明信片》一书出版时十七岁，他从父母家搬了出去，放弃使用父亲的名字，和阿维塔尔·罗奈尔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即使现在我也会躲进这些细节，因为否则的话我会禁不住在此想起，我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听到格尔妮卡的任何音信了，想起每天在不寻常的时段里一种心跳过速总会侵袭我，我尝试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却做不到这一点，只得一直等到它（心跳过速）停止，有时等一个小时，有时要等两三个小时。

巴特和德里达两人都理解沉默的意义。巴特说过：每一种语言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因为它强迫人们说话，他的具体原话是：“语言简而言之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因为法西斯主义不见得要妨碍人们说话，也就是说它强迫人们说话。”为何在“法西斯主义”前面要加冒号呢？因为它应当表达的意思是：语言是简单的。在其简单的存在当中它是：法西斯主义的。相反德里达强调的是秘密：如果对于秘密的权利不能得到保留，我们就身处极权主义当中了。因此对德里达来说民主也总是处于形成之中，因为民主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在公共领域否定了秘密并迫使人们做出回答。恰恰是因为我在过去几周总是必然要研究公开承认这一问题，我发现一种特定的精神状况想要迫使我做出公开承认，但同时这样的公开承认恰恰在这种心境里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会充满了羞愧，以至于我夹在这两种冲动之间面临着被磨碎的危险。因此我必须首先把既强烈渴望自白同时又惧怕自白的冲动理解成问题，并与之达成一致，从而使心理疾病远离那样的做法，也

就是把特别疯狂的人跟从前特别野蛮的人一样描述为更好的人。心理疾病非常简单：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因为它强迫人们去采取行动，去破坏，去公布，去公开承认，去策划，去走开和想被叫来，去否认，仿佛它不是产生于最孤独的话语，而是受外界的制约。另一方面同样的强迫症也在告诉我，沉默就是否认，因为正如加缪所言，它让我相信我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感觉。我们在恋爱中通过沉默相互欺骗对方，难道不是这种情况吗？正是通过没有任何想法和没有任何感觉？如果我表露自己我就输了，但只有通过表露我才能赢？

乌利亚之信，典出《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15节。大卫王与属下乌利亚之妻有染，他派乌利亚送信给约押，信中让约押陷害乌利亚，使之阵亡。

海德格尔（他是法西斯主义的）认为，人们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才能思考，与海德格尔相反，德里达把他拥有的那种语言并不感受为是他自己的：“我只有一种语言，它还不是我的。”（因此他也把自己感受为是腹语者吗？）我付出的种种努力为何得不到回报，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贝尔蒙多在戈达尔执导的影片《女人就是女人》中这样问安娜·卡里娜。试图让对方做出回答的意图在于，紧接着跑出咖啡馆并用脑袋撞墙。爱情表白的不可能性就在于此，就像格尔妮卡不无道理地指责我的那样，我对她的亏欠之所以变得如此糟糕，是因为我向她表白过自己的爱情。假如我没有向她表白过爱情，她现在就不会怀疑我的爱情了。她指责我在她内心引发了这种怀疑。但是我该怎样对这一指责做出反应呢？我应当收回、改变和补救什么呢？当我在许多年前看到高达执导的影片中的那一幕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了那种矛盾，它产生于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通知给对方的愿望；因为如果我用我的语言把它通知给他，对他来说它就是无法被理解的，如果我用他的语言把它通知给他，我的想法虽然被传达了，但它却是支离破碎和不准确的，不再真正是我的想法，简而言之它对我来说是无法被理解的。那么我该选择哪个呢？还是最终选择沉默？或者像德里达那样选择保留秘密？秘密是中间道路，我可以说某事存在，但却不说它是什么。同时我希望能够表露。秘密必须得到表露，它不能被泄露。如果我泄露了秘密，那么离攻击也就不远了，因为我感到通过自己的泄露而不被

理解。通过泄露我犯了出卖罪。就如贝尔蒙多在影片结尾处所说的：你真无耻。对此安娜·卡里娜回答说：不，我不是无耻，我只是个女人。在影片《断了气》的结尾处，当贝尔蒙多被珍·茜宝出卖，中枪后奄奄一息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太卑鄙了。茜宝没听懂又重复问道：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这时警官回答说：他说你真是太卑鄙了。但是茜宝不理解那个词，她又问道：“卑鄙”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电影就这样结束了。这种情况把人们引向了乌利亚之信^②的困难性。或许每一封情书都是一封乌利亚之信。如果每一次表白都必须被误解的话。我可能是爱格尔妮卡，因为她保留了这一秘密，而我却无意中泄露了该秘密并由此破坏了我的爱情。

你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你，这是一个奇迹。恋人们如此虚构他们自己的传说，为了使这种奇迹在日常生活中重新蒸发并分道扬镳，因为确实有比奇迹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能够仅仅靠奇迹谋生。“你们在数百万人当中找到了我，这是我们时代的奇迹！我找到了你们，这是德国的幸运。”这是希特勒在1936年党代会发言中的一段陈述，人们应当把它写进所有恋人们的诗集，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奇迹产生了怎样的结果。爱情故事一般都以不好的结局收尾，这不是因为其中一个去爱而另一个不爱，而恰恰是因为发生了那种相互渗透的伟大奇迹，这样的相互渗透说白了就是相互误解。

或许最幸福的爱情表现为，其中一方欺骗另一方，只是假装出对他的爱，因为被表演的爱情能够完全自由地得到展现，并对对方产生影响。如果人们真正去爱，这种情况就会变得很困难，经常是不可能的。

有这么一则故事，故事里一名婚姻骗子迄今为止只是假装爱一个女人，为了能够被她所供养，但现在他意识到，他是真正爱上了她。现在他尝试让自己变得诚实，但却不得不断定，这种诚实根本不是对方想要的。相反，女人认为他将不再爱她了，尽管事实上他现在向她展示了他真正的爱情。

古希腊宗教让狄俄尼索斯也加入万神殿里众神的行列，藉此这种宗教把精神错乱也包含在内了，它难道不比一种试图排除精神错乱的宗教

更为理性吗？

祛邪术不排除精神错乱，而是把它包含在内，因为祛邪师让自己作为旗鼓相当、经常是占优势的对手去面对精神错乱者。在那些地方会发生排除现象，在那儿仿佛存在一种宗教、哲学或者科学，总而言之存在一种生活状况，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不会出现一些其他领域必须关心的事情。这是真实的谎言，这始终是黑格尔思想的真正核心。因为整体都是不真实的这一客观事实，不会因此自动废除上述思想核心的必要性。

人们并非总是精神错乱，而是人们时而精神错乱，然后又不是这样，就像人们爱一个人，然后又不爱了。带着这样的矛盾去生活，而不是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存在稳定性，仿佛存在爱情、妄想、恐怖和作为存在的主体。

把两者放在一起思考就是：整体是真实的，整体是不真实的。

或许私人电视台唯一的功劳就在于，把我们从每日电视新闻主观臆想的客观性和官方语调中解放了出来，后者（每日电视新闻）总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它是对事实情况和有代表性的世界事件的真实片段所做的客观描述。现在各大公共和国有电视台早已使自己适应了私人电视台的那种娱乐腔调，人们知道一切只是作秀而已，不再有人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即在这一切的背后还会估计到有一丁点儿的客观性。

幻灯机的光线落在她的后脑勺和我从她肩头滑过的双手上。地图上的许多箭头正在按圆规路线穿越各大洲，它们出于害怕而相互紧跟着。在树林里叶片落到她的肩膀上，像笨拙的幼蛙一样蹲坐在那里。她戴着一副墨镜，尽管秋日的阳光只是微弱地透过矮树丛和枝杈照射在我们身上。天色越晚，她的心情就越显得幼稚可笑。她伴着收音机里的一首音乐在运动。“人们最好仰面躺着死去。”她说。在很快思考了片刻之后她又说道：“不，最好人们就像在睡觉时那样死去。”她转了一圈，“最好人们啥也不想地死去。”然后她把我领进厨房去我的恐怖博物馆那儿：被祝福的断腿绵羊，在摆设有黑色圣母像的玻璃柜前面的

毛发蓬乱的布质玩具狮子，被翻转过来倒放的蜡烛，被罩上了一块绣花布的早餐桌和带有油渍的水碗。

恐慌性攻击引发还是阻止了恐怖主义呢？我从恐慌性攻击中看出了生活的真理，同时这种真理又阻止我想去改变，并且是用暴力改变生活吗？还是恐慌性攻击促使我，也想把那种感觉传达给自以为是的世界，在我最终能够起床之前，那种感觉每天早晨都要花费我两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恐慌性攻击预言人们有成为殉道者的资质？有成为饥饿艺术家的资质？

围着篱笆的花园一动不动，里面的青草没过了膝盖，我的目光越过园子向联邦公路望去，它在夜幕下变成了不均匀的黑色，好像有人用他的圆珠笔在上面胡乱涂抹，为了给公路后面挤在一起的树林添加一条小河。太阳向内翻转变成了月亮。

在不寻常的事情还没有与普通的事情区分开来的时候，对于太少的东西有着太多的解释。在阴暗的冬夜人们能够认出私生子，当他们穿过马路旁边灰白的雪堆跑步回家的时候。驱动成年人的那些东西如金钱、性欲和绝望，都隐藏在单户住宅的缸砖围墙后面。作为人最宝贵的财产，工作在当时尚不被问津，还比较纯净。宗教信仰也是如此。人们没有时间在夜里观测天空永恒的翻滚。如果人们在星期天感念一颗滴血的心，那么这肯定是在午饭前的一小时里进行，这样的午餐通过正餐前喝汤与平时工作日里的午饭有所区别。快乐的童年时代，那个时候人们听不懂成年人的玩笑，只是跟着一块儿发笑，因为以此人们感觉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刹那间从收音机里传来的沙沙声能够被听到，但或许那也是油脂在煎锅里发出的滋滋声，或者是一小股水流从水龙头注入盆里时发出的哗哗声。

工厂主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

马丁·路德所作的著名圣诗。

工厂主用过去完成时造他的句子。他唱着《上主是我坚固堡垒》^①。他把年份数字凿进壁柱的柱顶。他真正的残忍之处就在于此。而不是那一事实，即他从在施泰尔马克州出版的青少年读物和侦探小说里摘抄片段作为他的话语。没有任何深渊张开大口为了吞噬我们，而是恰恰相反，一切都被用混凝土牢牢地封住围起。公路地图记录了所有的岔路和停车场。

工厂主用两块由一家在此期间并入他企业的饼干厂生产的饼干，在同样由自家企业生产的苹果酱里捅来捅去。他用饼干在苹果酱里画出浅滩和小路。天上的云呈布丁色聚积在他的宫殿周围。在他少量的休息时间里他打磨各种型号的螺钉，这会令他感到放松。那些在受孕期被偷偷带到他那儿的女人，会在黑暗中得到一名炮手。在此期间工厂主站在镜子前面，阴茎勃起。他从不自己去触碰它。他没有必要这么做。精液自己从阴茎里喷出，一直射到瓷砖上。历史就像是一气呵成的一样，就好比人们站在山巅上，俯视下面的山谷。

黄色的天空从贫瘠的土地上漂移而过，天下雨时雨水会跟承载它的云一样是黄色的，雨滴落进路边狭窄的水坑里，没有人敢从这样的水洼里汲水饮用。到处都是死亡迹象，特别是在他们用死人的骨灰建成的学校里。学校里的孩子们面色苍白，感觉孤独，他们站在长长的走廊里，不敢相互触摸。有时他们当中的一个倒在地上，然后又会有另一个被拽出去，赤裸着身子站在校园里挨冻。在此期间城市一直继续一声不响地躺在寒冷的晚风里。看不到一只动物的影子，除非是那只牧羊犬。但它已经变得衰老，目光呆滞地盯着大海，期待会有一艘船只驶来。但是漂过来的只有一个纸壳箱。它漂上岸时已经被水泡软。箱子里装的是机密文件和罐装腌牛肉。天空就像滚烫的油煎糊一样在

海面上爬行，被波峰的白色泡沫拭去。一条鲸鱼闪着金属光泽的肚子迎着刺眼的阳光向上隆起，直到它红通通地从云里爆裂，身体变成黑色沉了下去。

广场就像一个定期集市的货摊上钉满钉子的木板一样。女人们的头巾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他们崇拜工厂主，根据新的夏季节食制把他的靴子踩过的卵石放在嘴里含三十个日日夜夜。他们把头浸入褐色的自来水里，屏住呼吸，直到反射性呼吸开始不加节制地把水灌进他们的肺里。这一过程叫作隆重的浸洗礼。某些人在仪式中丧命，他们以为通过这样的仪式使自己完全献身于工厂主。有从最高参谋部副官的私人钱柜里流出的摄影图片，它们在士兵当中被传看并激励着他们。他们穿着用粗亚麻布制成的冬装躺在前线崭新锃亮的铁丝网前面，而他们的未婚妻则披着丝巾从电影院里出来，去找那些身上洒着香水的职业男舞伴，他们通过轧断一段指节使自己逃避了战时动员。相关公告称工厂主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就算知道他也对此无能为力。他给妇女联合会供应的不是尿样，更不是扯破的紧身胸衣和用过的手绢。相反：垃圾和衣物将会被定期焚烧。尽管如此谣言还是屡禁不止。据说他来的时候血液会从他的鼻子里淌出。当鼻血滴到女人们的身上时如果她们做出怪相，他就会让人用一把专门定制的黑尔姆弗里德铁钳把她们的颌骨夹断。之后他会禁不住大声喊叫，急忙拉开冰箱把一瓶冰冻的果汁饮料灌进肚里，同时他因为责任的重担而诉苦抱怨，女人们则必须尽量轻手轻脚地在一面屏风后面穿好衣服。只有他知道在训练场后面还有空间，在港口前面横亘着大海，恰恰是这种种责任现在要干掉他，尤其是那种义务，也就是既要隐瞒一切又要把卑鄙之徒派往前线，为了让他在哪里学会受冻、挨饿和祈祷。受冻、挨饿和祈祷，这些字样写在磨损的牲口车厢上，士兵们的未婚妻把这些字样绣在他们的被子和假肢加热器上。女人是共同体的支撑。她们赤裸着身子伏在家里的椅子靠背上，收听收音机里工厂主的演讲，尽管没有人命令她们这么去做。谁也没有吩咐她们，所有的事情她们都是自己去做。这就是女人令人信服的地方。工厂主沿望不到尽头的通道穿过他的床垫仓库，他打开书房里的暗门，消失在拱顶地窖里。受冻、挨饿、祈祷。教会接受了这一观点，把祈祷作为主要的事情。储

蓄银行接受了这一观点，把挨饿作为主要的事情。公共学校接受了这一观点，把受冻作为主要的事情。

工厂主在他的青少年时代本想自己成为作家。根据每天在班级里被回忆记录的关于他生平的片段所叙述的那样，一天早晨他从被他称作“爷爷”的家里出来，为了步行去那家商务中心，当时他在那里结束了作为医疗器械采购商人的学徒期，早晨的阳光穿过祖父花园不均匀地插在地里的篱笆板条照射进来，光线把他的注意力引到两个男人身上，他们可能是刚从屠户那儿来，因为两人胳膊底下都夹着裹在白纸里的一小包东西，他们在公共汽车前面穿越马路朝他走来。两个男人一身城市官员典型的黑色装束，他们在这时刻对他来说显得充满了极强的使命感，以至于他暂时忘却了自己为何要来到门口。那一刻他最初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都断然丧失了。仅仅是受想要加入他们行列的那种愿望所驱使，无论人们打算现在押走还是表彰他，他又向前迈了一步，脸上现出一副充满期待的神情，而那两个男人却头也不回，朝舒尔贝格木框架房屋方向从他身边扬长而去了。为一种内心使命的价值所陶醉，前脚刚踏进商务中心，他就利用和他在同一个房间的顶头上司早晨注意力不集中的那几分钟时间，立即写下了简短的梗概，当天晚上他又把梗概誊写了一遍，为了在今后几天里对之修改润色。三周之后梗概完善成那篇独特的寓言，二十年之后它成为所有学校的必读课文。这是工厂主唯一富有诗意的创作，当他在最后一行下面写上“结束”之后，他意识到另一种更重要的义务正在期待着他。

由工厂主所支持的政府最初采取的官方行为之一即是，首先提高、继而冻结盛装土豆的器皿的价格。根据工厂主事先表述的简便法则，经济部的原话是，一只土豆器皿的价格不应低于装在里面的土豆的双倍价值。随后工厂主的竞争对手们极大地缩小了土豆器皿的直径，为了能够继续有盈利地生产，于是工厂主又让政府出台了一项附加条例，它统一了土豆器皿的大小，使得只有那种厨房器皿才可被描述为是土豆器皿，其规格符合一名家庭主妇弯曲的左臂的周长。这样一来工厂主淘汰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因为没有人能够对这项新的法令做出相应快速的反应。处于劣势的公司把这场冲突推高为一种普遍的力量的较

量，其间发生了许多骚乱和不法行为，这样政府被迫暂时没收器皿生产厂家的财产，把它们置于工厂主的管理之下。

工厂主宣称，他是从一种被迫执行命令的处境出发采取行动的。尽管如此关于解散历史的想法是不合适的，相反对战后诗歌进行研究却是人们所预期的，战后男性诗人还穿着西服上衣、女性诗人还穿着套装在从事他们的行当，并用沙哑的声音详细探讨整体的取消。工厂主一辈子都习惯于对别人发号施令，他自己是怎样陷入这样一种紧急状态中的，这属于天意无法解释的秘密。光阴荏苒，岁月的蹉跎压弯了树林，仿佛那是铺有绿色丝绒的赌桌上的纸牌。

没有真理，只有诚信，工厂主边说边用双手用力拉上客厅里厚实的窗帘，在过去几周他把客厅改造成了他的书房和卧室。然后他停了下来，侧耳倾听夜里的动静以及正在输电的架空电缆发出的营营声。让白天过去有时是一种考验耐心的游戏。雨水落入空无一人的游泳池里，把黄色的灰团泡沫像被撕碎的花环一样冲得七零八落。

钱当然不够用。企业毕竟不是金驴子。改革的贯彻执行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种要求从四面八方涌来。那些穿着带双层衬里的双排扣衣服的领主们在等待谒见，在穿过行政大楼望不到头的走廊时，他们从很远处就用画在仿羊皮纸上的卷起来的设计图纸挥手示意。每次工厂主都从不左顾右盼，而是急匆匆地走下露天台阶，仅仅是为了在出口前面偶然遇见那些大人物。不加考虑地随口允诺是很容易的，但这不是他待人接物的方式。一辆汽车在等候着。司机向他用他本人的签名复制的图章上呵气，用力往发票本上盖章。他新上过浆的衬衣领子有些蹭痛脖子。

有时工厂主也会感到内疚地说，他的老校友赫伯特多么令他感到遗憾，他一生没有任何出息，虽然他不断尝试去帮助他。但他的老校友赫伯特确实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是不现实的理想者和幻想家，他就是经验丰富的工匠们所理解的那种艺术家，当他们比如指着一道勾缝蹩脚的围墙说道：哎呀，这是什么样的艺术家的作品呢？还在上学的时候赫伯特就是这个样子，他从不敢去做些事情，从未有过自己的想法，甚至都没跟老师顶过嘴，而总是把黑板上写的一切都用他非

常仔细的笔迹抄在本子上。这种人们时不时也完全需要的精确阻断了他的生活之路。当然赫伯特也有一位过分胆小怕事再加上体弱多病的母亲，她的丈夫早早就抛弃了她，她也没有操持家务的能力，因此他很早就向赫伯特指出了一条额外的收入渠道，那就是不要把购物时找回的钱悉数交回家里。但即使在这方面赫伯特也是扭捏作态，后来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他把赫伯特招进他的企业，原本是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当然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在这件事上人们不能抱太多幻想，果然在这方面赫伯特也失败了，他在做重大决策时太过犹豫，因此他不得不把他的职务一降再降，最后甚至打发他去库房做了库管员，但并未中断和他的友谊。虽说他当然无法关心所有的事情，尤其是没有关心赫伯特的私人生活，但还是传出他与赫伯特的妻子有过一段情史，在不言而喻地享受完这段情史之后，他对此保持了沉默，遗憾的是赫伯特非常孤独地在医院里死去了，死因是肺部充水。出于多个理由恰恰这一点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赫伯特和工厂主碰巧拥有同一血型，正常情况下赫伯特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给他，尽管工厂主的肾脏还没出毛病，但是不像赫伯特的肾脏那么健康，因为他一生从不饮酒。但即便是这最后的姿态赫伯特也未能做出。

相反每过一段时间，工厂主就会拿不仅是他，而且也包括其他人特别是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已经做出和一直还在做的事情来责备我。例如这名年轻的中国小提琴手，或者那名同样来自中国、同样年轻的乒乓球选手。也包括莫扎特。还有那些我从未听说过名字的人，但工厂主却亲自认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商业伙伴或者供应商的儿子，他们做出了令人非常吃惊的事情，虽然有时那不过是一栋用乐高牌积木玩具搭建的房子，或者他们总在零点到校，因为他们还要上法语课或者收集包装葡萄酒瓶的锡纸，他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为了用锡纸在废品收购站兑换现金，然后给自己添置额外的学习用品。

早晨为了纪念他的三个失踪的兄弟，早餐供应的是配有枫糖的油煎饼。他自己喝着咖啡，在一旁观察那些海军部高官是怎样笨拙地尝试，在他们的餐盘上切开煎面饼。你们知道，我们以前总是怎么做的吗？工厂主情绪高涨地问道，把手里的杯子放到一边。我们切掉了田地和湖泊，切掉了整个大陆和海洋。看这里！他取过坐在他身边的副

官手里的刀叉，开始在对方餐盘里的油煎饼上切来切去。有时人们只需改动一个小角。在我有一次去大洋彼岸的美国时，我看到一个男孩用牙从软干酪里咬出美国各州的形状。瞧，现在它的形状看上去像是加拿大。现在黏稠的大洪水就要来了！说完这番话工厂主把枫糖浇注在被切成流苏状的面团上。洗刷所有的罪孽，净化人和动物，他像做祈祷一样嘴里念叨着。然后像是在内心灵感的指引下，他变换了话题并解释说：女人们声称，她们每生一个孩子就会掉一颗牙。但是现在即使不生孩子牙齿也很快会被打掉。此外我们不再与世隔绝，而是有了有效的药物，多亏了流水线生产和大规模动物饲养，它们能够以亲民的价格到达终端消费者手里。尽管我们早已将遥远的中世纪、也包括艰难的工业化初期阶段抛在了身后，可女人们还是喜欢用下垂的乳房、带不规则条纹的腹部和有皱纹的屁股来证明她们生育的辛苦。我把这些称之为有力的证据。在每一次监事会会议上我都无法应对这种情况。如果男人对此提出异议，他马上就会输掉辩论。然后女人就会以殉道者形象继续施压。她们必须承受的一切无非是：连续九个月每天早晨把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忍受临产前二十四小时的阵痛。她们未能证明的仅仅是这个。在工厂主吞吃了那块浸满枫糖的加拿大形状的煎面饼之后，他一边从锅里捞出第二张油煎饼一边说道：现在再来点儿咸味的。

为了明白一些事情，人们必须首先要看到它，凭借这个在此期间几乎成为谚语的句子，工厂主于两年前使得在城市东郊修建小型体育机场的方案得到了贯彻实施。

工厂主以前的佃户、后来被他称作祖父的那个人是黑尔姆弗里德咖啡壶保暖罩的发明者和研制者，它是一种咖啡壶套，不仅能够储存热量，而且还能通过一种半渗透的材料层系统根据不同季节的要求调控温度。黑尔姆弗里德是一种在每个家庭都能被找到的物品，五十年来它已经被应用在很多方面，例如作为热水袋或者煮蛋器。工厂主创建了黑尔姆弗里德厨房用具系列，它非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与古老的黑尔姆弗里德传统联系在一起，并使该传统发扬光大。黑尔姆弗里德厨房用具系列新推出的产品是：带有双层不锈钢护套的肌腱剪具。

工厂主在一张苏西贺卡上找到了制作他宝座的样板，卡片是一名跟随他多年的女秘书在他四十岁生日时寄给他的。在卡片上人们看到一只头戴王冠、身披红色丝绒斗篷的狮子醉醺醺地坐在一张沙发椅上。这张沙发椅有一个高耸的靠背，它的分格镶板装饰着雕刻的魔鬼。双头蛇从限定靠背的两根支柱里吐着芯子。这样的蛇饰在扶手两端也能找到。宝座的底脚由狞笑的头颅骨所支撑。当人们打开卡片时，它会响起一种奇特的音列。那不是通常的生日情歌，而是没有曲调、忽高忽低、短促刺耳的声响。或许是里面那块微电池的电量耗尽了。或许是芯片的二极管焊接不当。工厂主对音乐一窍不通，因此他不知道什么是时兴的什么不是，他如此喜欢这种他和其他人不熟悉的、不断重复的断断续续的旋律，以至于他让人给曲子填词并对外发布，在此期间它超越了城市界限，作为工厂赞歌为人们所熟知。

从十二岁时起工厂主就开始辛勤地工作。在接下来的二十八年里都是如此。他只是卖力工作，而没有过多地思考。他像田鼠一样挖洞掘土。他像戴着眼罩的马匹一样奔跑。但是在他过完四十岁生日的那天夜里，他一个人坐在写字桌旁的真皮转椅上。手里拿着一瓶喝了一半的威士忌，眼前的桌子上放着那张他一再打开又合上的生日贺卡。他听着卡片里传出的曲调，看到狮王的两只眼睛是怎样被填充了红色二极管的智慧的。然后他自己闭上双眼，坐在座椅上旋转了一圈。他早已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现在他终于要实现这个梦想了。

在工厂的实验室里研究活动进行得热火朝天。人们想做出重大发现，申请专利，推进发明创造。直接受工厂主领导的研发团队正在致力于拓展人的能力。每周三晚上最新的研究结果都要被提交给工厂主。这一次涉及的是男性的生育能力。一名昔日的上尉军医介绍说，凶门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构造，我们将要把它用在我们身上。通过它灵魂也会最终离开身体。但是认为通过头颅来生育不会产生疼痛的想法是天真的。它的专业表达叫开颅术。因为头颅很硬。相反阴道生育根本算不上什么。上尉军医向后面招手示意了一下，紧接着两名护士把一个仅穿了一条内裤的年轻男子带上前来。医生把他转向侧身，使得人们在他的右大腿上能够看到一条大约三十厘米长的疤痕。我们从这个部位切开，植入一对儿处于胎儿期阶段的双胞胎，让它们在里面孕育成

熟。然后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前，再让它们通过同样的路径从里面出来。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程序，人们必须断定的是，通过这种程序男人相比女人显出明显的优势，因为女人几乎无法忍受通过业已存在的创口生育孩子。上尉军医又转动那名男子的身体使他面部朝前，抓住他内裤的裤腰，把它一直拽到膝盖下面。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男子阴茎的顶端，把它向上举起。一道长长的、略呈红色的疤痕能够被看到。这样的构造我们都有，他解释说，所有像我们这个样子的人。每个男人都不例外。对此我们把它称之为尿道下裂，但是在外奔波的男人不必非要牢记这个。股骨妊娠、颅骨妊娠、尿道妊娠，我们的构想，即终于相应地去利用大自然赋予我们性别的可能性，就隐藏在所有这些概念之后。我们作为工具和器械的发明者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并不像女人那样依赖一处孔洞，而是依循生物进化的变种。腠窝、腋窝、阴囊，可能性实在是太多了。为此在用薄如纸张的铁皮锻造的黑尔姆弗里德系列当中有专为男人准备的生育工具。

人们普遍害怕参加那样的会议，会上工厂主宣布他最新的理念，期待与会者立即做出反应，但却不给他们思考的时间。嵌有内啡肽的土豆芯片。怎样对此进行评价呢？用高效磁铁取代三角皮带应用于小型发动机。这难道不是一种可能性吗？海洋捕鱼作为群众性体育运动。这是无法想象的吗？在此人们可以让人把我们的内陆水域从一定深度开始名义上宣布为海洋。你们当中有谁碰巧能够给海洋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吗？人们更期待在一个蓝色的纸盒里有一些人们想咬进去的固定的、尖棱的东西吗？相反在一个黄色的纸盒里则更期待有一些黏稠和滴状的、能应用在皮肤上的东西吗？

为了激发整个民族对工厂主新思想的热情，人们派出一个被赋予各种权限的议会任命调查委员会乘坐一辆黑色的普尔曼豪华汽车去全国各地巡视。委员会的费用账户上存了足够的经费。该旅行团利用每一次机会让人停车，往车上搬运肉类食品、水果、鲜花、葡萄酒和当地特产。在书报亭旁边他们向闲荡的孩子们赠送冰激凌。随着饱胀程度的提高，孩子们能够评估和判断事物的感觉也越发强烈了。蒙着灰尘和炭黑的工厂行政楼庄严地坐落在通往主要交通干线的旧通道的尽头，委员会就是沿着这条通道驶进第一座城市的，那些行政楼让组成委员

会的三位男士和一位女士立即觉得是值得保护的工业纪念碑，街边工人们居住的、像是感染了结核病一样消瘦的小房屋和院落对他们来说则显得地道和自然。这样人们彼此确保了能够让自己感到惊讶，并达成了初步的一致。刹那间天空变得苍白亮敞，略微摇晃地悬挂在那两棵瘦骨嶙峋的梧桐树上面，它们栽在工厂商务中心主要入口处的两旁。

委员会成员心情大好地上楼去来宾餐厅。工厂主肯定随时都会到来，他在一处工地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那是一个地下水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临时安装在就餐大厅里的板壁赋予空间一种惬意的氛围。靠窗的一张桌子上已经铺好了餐具。委员会成员尚未落座，盛装前餐的餐车就被推到了桌边。一名侍者把利口酒倒进高脚杯里。其中一位女秘书走到桌边，清了清嗓子说道，工厂主让她转告各位不用等他吃饭。透过窗户人们可以看到在工厂车队和私家车库之间修建的花园。一个旧的大理石基座立在一个栽有花坛的山丘上。

一片淡粉色的云层从天空挣脱，像一张从书法练习簿上撕下来、浸满蓝色墨渍的吸墨水纸一样滑进山谷，并在那儿落到苗床里。今天值夜班的两名工人和他们的孩子们一道来到后院，仰面朝天向上观望。从窗户里传出无线电节目的营营声，仿佛是想让自己重回太空。上一批晾晒的衣物上缝得不牢的织线留在了高高的晾衣绳上，被风笨拙地卷成了一团。孩子们伸展胳膊，睡眼惺忪地围着他们父亲的双腿转圈。某些人之所以永远学不会正确地行走，是因为跌倒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调剂。

委员会成员乘直升机在城市和页岩上空兜了一圈。他们用手指向下方，在那里工人们排成整齐的一列去工厂上午班。太好了，他们心里在想，如果一家企业首先能自动运转的话。然后人们就能从根本上开始规划了。一道像驴皮一样灰色的烟柱从病畜屠宰场的烟囱里升入高空。直升机的旋翼把浓烟剪切成砖头大小的碎片。太阳在飞行员驾驶舱的玻璃上反射出光谱色。游客们轮流从氧气瓶里吸气。如果像政府所计划的那样，把位于岩石之间的场地改造成一块投弹训练场，那就

太可惜了。飞行员如此灵巧地驾驶着飞机，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布满裂缝的岩石上跟随自己的影子。

工厂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家高档妓院的合伙人，妓院是他在军事训练场后面凭空变出来的，由被他称作爷爷的人的夫人经营管理。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向抚育过他的人做出报答，同时也完成了一项忠实于城市的使命。某些人说，他不成熟的性欲阻碍了他理解在妓院里所发生的事情，在几名高级部长的建议下他采取过行动，但他自己也从未去过那里，因为他的性实践行为仅限于让人把他捆绑起来，卷在自家企业的橡胶垫子里。工厂主对于弹性合成材料和塑料制品的偏好经常被人提及。他的房间，当然尤其是他的办公室，全都被铺上了橡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思考和制订旨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天才计划。如果比如谈判或者规划陷于停顿，他的表情和姿势中就会清晰地透出某种不安，于是他的全体工作人员就会找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退场，让他有机会脱去衣服，使身体与铺有橡胶的墙壁发生摩擦，直到他想出令人振奋的主意。

最初的三个工厂主用来自我保护的概念是：抑食欲药、情绪提振器和地面覆盖物。所有这三个概念描述的都是黑尔姆弗里德公司生产的近战武器。

一次在非洲，人们给工厂主端上来一只烤角马作为款待客人的礼物。通过在非洲完全陌生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工厂主使这只角马又活了过来，为了紧接着再亲手扼死它，因为他只吃由他本人或他的一名随从射杀的动物。

那是在同一个地方，在那儿他绕湖跑的速度比西风还要快，紧接着他扑到集会广场的泥浆里，留下他身体的印记，直到今天当地居民还在崇拜这一印记。他自己的克制力是无法形容的，他当时面临的痛苦也是难以言表的，当他必须制订计划以保护他的工厂不受各方影响，就连那些在异国他乡友好地接纳过他的人，他也不是同样友好地去对待他们，而是要与他伟大的计划相适应。恰恰是在世界气温较高的地区，那些万人坑发出的臭气令人无法忍受，直至今天他仍然向每一位当年参加过枪杀行动的指挥官表达他崇高的敬意。

工厂主玩一局纸牌游戏，得分三十，叫满贯。如果另一个人在出牌时想要查看工厂主按在桌边的纸牌时（按照通用规则他把这样的牌称作卡斯特暗牌），工厂主就会用“让死者安息吧”这句话来斥责他。如果有人把打出的一张牌再收回来，工厂主就用拉丁语说“此流明即流明”，在令人吃惊地停顿了片刻之后他又把它翻译成“灯光就是灯光”。用“森林啄木鸟皮库斯”或者“黑桃”“把手指插进屁股并发出尖叫声”之类的表述，工厂主完全是随心所欲地宣布他的出牌情况。每晚至少两次他会提出“把裤子脱下来！”这样的要求。

对工厂主来说没有私生活可言。当然他也收集圣像，蹩脚地复制8毫米胶片，他让人在他的地下室里不停地播放这样的胶片，直到胶片在放映机的齿轮之间牢牢粘住，随着跳动闪烁的警示灯而熔化。有时这种放映活动还被一名雇来的手风琴演奏者所伴随，人们用布蒙上他的双眼让他坐在一块帷幕后面。然后还有每天一次跨越卡莫斯山丘直到诺伊格布鲁恩咖啡馆的散步，在咖啡馆里他有时会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半个小时，眼前放着一杯不加牛奶的清咖啡，凝视窗外一望无垠的绿色田野。在离开咖啡馆的时候，他用事先蘸湿的手指滑过写在一面黑板上的菜单，并向老板娘微笑着，工厂主的一名随从往她手里放了一些钱。工厂主现在的生活境况就像是基座上的一具雕像。因此他也有眩晕感和恐高症。血液无缘无故地沉降到他的腿部，不愿再正常循环，因此他遵照私人医生的嘱托穿上长筒袜，但这样做仅仅是在他有限的业余时间里，而且是在估计不会有客人来访的情况下。如果工厂主被一种不恰当的亲近或者粗鲁的表述所打扰，他的目光就会凝结。他的牙齿类似于老旧的象牙，它不按操作规程、过久见不到阳光地被摆放在布满灰尘的陈列室侧翼的天花板下面。在重要的会谈期间他的表情显得无动于衷，相反他的姿势却是沉着镇定的。

作为濒临精神分裂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以及遭受资本滥用的傀儡，工厂主倒是非常高兴。如果他的意愿没能得到实现，他就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如此僵硬，以至于当他躺到两张椅子之间时，可以让五名身强力壮的男子在他身上保持平衡。

工厂主成功地回避了对于自己生命有限性的意识，这种有限性不是在战场上、不是在冲突中，也不是在把自己的武器对准太阳穴时侵袭了人们，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人们拿起一本书阅读，看到所有在书里记录他们回忆的人都早已死去，即便是过时的传记信息也仅仅指向他们担任过的教席职位和去过的地方，但从不指向窗前的落雪和春天到来时空气的变化。就像一根被遗弃在沙发椅缝隙里的头发，没有人会想念它，也没有人去找它。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在东西区界限的这边和那边

在离开福尔达后不久我肯定是睡着了，因为当一道刺眼的光线又重新叫醒我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边境了。天啊，那可是瞭望塔呀，贝尔恩德说。现在呢？克劳迪娅问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的司机雷德尔非常镇静，他再次说道：别担心，这事由我来办。警察早就知道这件事了，贝尔恩德说，他们有我们的照片，如果现在被他们看到，那我们就完蛋了。没关系的，雷德尔说，你们现在最好把身体稍微蜷缩一下。我们缩着脑袋向旁边挤了挤，与此同时我们缓慢地朝那些西德警官们开了过去，他们站在路旁友好地跟我们打招呼。通常情况下人们应该停车并关闭发动机，但是雷德尔开足油门，全速从警察身旁冲了过去，驶过卡车车辙继续进入封锁区。怎么样，你们会怎么说？他大声喊道。疯子，贝尔恩德说道。简直是疯子。我们向后望去，看到德国警察们在紧张地来回跑动。可是现在呢？克劳迪娅喊道，现在该怎么办？他们就在那边，他们可是有武器的，他们会开枪打死我们的。不用害怕，雷德尔说，人们已经在恭候我们了，说完他再一次把油门踩到底。

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就能驶过东西区界限。疯子，贝尔恩德又说道，简直是疯子。是的，太疯狂了，我也说。只有克劳迪娅一言不发。雷德尔朝一间临时木板房直接行驶过去，在门口停了下来。抱歉，他说，我对你们深表同情，但是我们绝不能允许你们通过无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越来越败坏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声誉。可是，贝尔恩德说，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干的。我们压根儿什么也没做。至于那些传单，在这方面我们……然后他不再继续往下说了，因为现在提及我们在传单上也反对东区的修正主义势力，这或许也显得不那么聪明。我在考虑沃勒和其他人怎么样了，是否他们在我们那边被逮捕了，还是也被送到了这里，但我不敢打听这事，因为否则的话情况可能会对我们更加不利。

我们必须下车，去木板房里并在那里坐下。该死，我把背包忘在车里了，我小声对克劳迪娅说。现在这也无所谓了，她说。胡说，那个标准A4笔记本就在背包里，如果他们找到那个本子，他们手里就有针对我们的有力证据了。但是克劳迪娅再次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反正都无所谓，在这一点上她肯定是正确的，因为这里的人们简直什么都干得出来。一个只想驶过边界去往柏林的男人抱怨说，因为他的证件卡在了从第一个检查哨所向第二个检查哨所传输的长长的胶皮软管里的某个地方，于是他们就把他关押了一个星期。当他获释出来时，他照了照镜子说道：我必须给自己刮一刮胡子，我看上去像是一名俄国人，于是他们马上又把他关押了一周，因为人们在这里不允许说俄国人的任何坏话，就跟在我们那儿人们不允许说美国佬的任何坏话一样，但是美国佬有营区贩卖部和美国海外驻军无线电网，猴子乐队（门基乐队）的成员也都是美国佬，吉米·亨德里克我觉得也是，还有草根乐队，但他们只是翻唱爱情歌曲，此外美国佬在我们那儿并没有把每一个生锈的螺钉都拆掉，许多参加过战争的老教师，比如给我们上数学课的荣格博士，他们倒是反对美国佬，因为美国佬总是嘴里不停地嚼着口香糖，也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黑人，尽管对于荣格博士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他是怎样不得不和他的部队解除意大利同盟者的武装的，他至少数十次这么讲过，但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讲述是什么意思，不清楚为何这种情况据说如此糟糕。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穿着制服走了进来，男人搜查了我和贝尔恩德，女人搜查了克劳迪娅，但是他们没有搜到什么，只找到了一些小玩意儿、几枚格罗申硬币和我的带有垂饰的钥匙，在此期间我往垂饰里嵌入了一张大卫·加里克的照片，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他，除了他的《不要出去到雨中》那首歌，因为用吉他弹唱的歌曲的开始部分与《今天没有牛奶》那首歌非常相似，但不是他的《阿普蕾贝夫人》那首歌，《喝彩》杂志刊出了他的一张照片，照片是圆形的，从大小来说也正好与钥匙垂饰相配，但现在情况令我很难为情，因为我早就想把照片取出来。如果我知道会有今天，我也会往垂饰里嵌入另一张照片，虽然我不了解来自东德或者来自苏联的乐队，因为在那里也根本没有什么乐队，而是只有合唱队，它们也跳哥萨克舞，这种舞蹈与勒特基斯舞有些相似，我是唯一会跳这种舞的，因为它也非常简单，但也很幼

稚，特别是因为人们在跳完舞后不用相互亲吻，但是勒特基斯舞来自芬兰，尽管芬兰与苏联缔结了友好关系，但是两国有多么友好，这我当然就不知道了，或许两国刚刚闹过矛盾，那样的话会跳勒特基斯舞或者熟悉伊凡·李布洛夫来到这里就是愚蠢至极的了，阿希姆的父母有一张伊凡·李布洛夫的唱片，他也不是真正的俄国人，但却能演唱极低的低音和特别高的高音，或许伊凡·李布洛夫事实上是一名间谍，但是说这些话毫无意义，因为这里的人们会更清楚，因此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太仔细地翻看我的钱包，然后发现那张约翰和小野的照片，因为当着克劳迪娅的面这也会令我很难堪，不知道她会对我有什么看法，但或许也没什么，因为她也知道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当人们突然必须参加一场戏剧的演出或者必须脱去衣服的时候，但这种情况当然与随身带着这样一张照片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些警察，或者他们也可能是军人，根本没有没收我们的任何东西，而只是把所有的东西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再把它们交还给我们。接着他们问我们是否肚子饿了，我们说“是的”，虽然我在想，我可不想要一块上面撒有可可粉的木头或者纸板，也不想要施普雷瓦尔德黄瓜，一段时间里阿希姆家在吃晚饭时总吃这样的黄瓜，因为他父亲带了二十根这样的黄瓜回来，据说是从柏林捎回来的，但阿希姆认为它们来自东区，还在当时他带着他的小情人想要逃到那里去的时候。但是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可可饮料还有色拉米香肠面包，根本不是那种在我们那里也有的带软骨的色拉米香肠，而是灌有精瘦肉且非常昂贵的那种，因为它也具有面包的形状，一点儿也不是突出面包边缘挂在外面的样子。我对其中一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说，这东西吃起来味道好极了，但这话听起来可能太过感情洋溢了，因为她问道：你们难道认为在这里没有可口的东西可吃吗？对此我马上回答说：不是，不是……可她又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些什么，因为她再次追问道：但是？不，我说，它比我们那里的要更好吃。我只是听说这里没有杏仁泥，因为人们没有杏仁，人们出售桃仁泥而不是杏仁泥，因为它用杏核制成的，而且就连这个也不总是有售，但这种情况肯定不对，这是以前有人讲给我听的。但是那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只是摇了摇头说：这么一点点事情也会使你们担心，仿佛你们能品尝出桃仁泥和杏仁泥之间的区别，当然有时我们也缺少杏核，因为并非所有的一切都

是我们完全从同盟国那里得到的，而是我们必须按照协调一致的计划经济模式自给自足，但我们也知道如何帮助自己应急，于是我们就用玉米碴儿取代杏核，这样制成的甜食就叫玉米仁泥，如果缺少玉米碴儿，我们就用土豆碴儿制成土豆仁泥，因为用一种独立的文化成就来对抗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这对我们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并且是用当地现有的条件。我一边说“是的”一边继续咀嚼色拉米香肠面包，因为我想显出一丝阿谀逢迎的样子，于是我就说，玉米仁泥和土豆仁泥听起来很好听，我很想品尝一下这样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我的心里话，因为桃仁泥的味道我就已经觉得很怪了，因为杏核原本是有毒的，不能被咬开或者吞进肚里，而玉米碴儿和土豆碴儿，这听起来更糟糕，因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喝麦碴粥，此外我觉得所有这些名字都傻里傻气的，我在想如果他们没有土豆碴儿，那他们就会拿切碎的纸板做原料，把制成的食品称作纸板仁泥，如果我们现在必须再次给自己想出假名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把自己称作桃仁泥、玉米仁泥和土豆仁泥，因为人们也能很容易压缩这些名字，就仿佛Pan是名字里的姓一样，这样的话克劳迪娅的假名就将是“玉米仁泥”，但她肯定会讨厌这个名字，因为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巴伐利亚人，我也觉得巴伐利亚人更加反动，虽然我根本不是真正了解巴伐利亚人，我只和班级一道去过一次贝希特斯加登，在那儿我们发现了外形巨大的仿造的“索丹博士”儿童止咳润喉糖，上面甚至还插着小三角旗，对此还有一张照片保留了下来，那是贝尔恩德用我的便携傻瓜相机拍摄的，照片是我冒雨穿着风雨连帽夹克站在青年旅社前面和巨型仿造的“索丹博士”儿童止咳润喉糖的合影，我在思考那块巨型仿造的“索丹博士”儿童止咳润喉糖后来到底怎样了，因为人们肯定不是简单地把它摆在那里的。还在我们继续吃色拉米香肠面包期间，那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说：你们还都是地地道道的孩子，你们在做这样的事情时是怎么想的？克劳迪娅想说，我们不是孩子，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我打断了她，因为我不希望她或许又谈及修正主义者，因为她被基层工作小组开除是不无道理的，基层工作小组成员认为东区所做的几乎一切都是好的，他们只听德根哈特，但是不听比尔曼的音乐，而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比尔曼，而是更喜欢德根哈特，因为我的磁带上录制了他的第一张慢转密纹唱片，《德国星期天》那首歌的歌词我也几乎能够背诵出来，我会用吉他弹唱《美妙的歌曲》，这是我自己听出来的，a小调，

C大调，E大调，比尔曼的歌曲中我只知道《士兵，士兵》那首，但是比尔曼根本不是在东区出生的，而是自愿越境去了西区，我觉得当时他的年龄不比我们的大多少，但我不想待在这里，因此我也附和地对那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说：是的，我们还是孩子，甚至连十四岁都不到，这个年纪符合我的情况，但不符合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的年龄，但是他们不会知道这个的，因为我们身上没带证件，我也无所谓克劳迪娅是怎样一下子用那种眼神看我的，就好像我是一名叛徒一样，但我不是叛徒，因为我没有泄露任何事情，但我不想在这里进监狱然后去军队服役，尽管可可饮料和色拉米香肠面包的味道很好，因为那样人们就不能听音乐了，就不能蓄长头发了，我在家也不允许留长发，但如果我到了十四岁，我就可以不用再去理发了，我就会让头发一直长到触及肩膀，就像斯宾塞的发型那样，尽管我的头发不是那么顺滑，而卷曲的头发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上去有足够的长度，但这对我来说无所谓。

可是你们到底反对东德什么呢？那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问道，现在贝尔恩德也开口说话了：根本没什么，我们一点儿也不反对东德。而我说道：我们对西德有些不满。因为在东区他们总是把德国称作西德。这我能理解，那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说，在你们的各级议会里也有些人是纯粹的纳粹。是的，克劳迪娅说，比如基辛格。不只是他，那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说，在你们黑森州三分之一的议员都是纳粹，他们不仅仅是纳粹的追随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是冲锋队或者党卫军成员，他们贯穿了各个党派，在社会民主党里也有，你们在任已经将近二十年的州长齐恩也是纳粹，不仅只是德雷格尔。什么？他也是？贝尔恩德说，我在想，古多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他认为所有的老师都是纳粹，不仅是荣格博士，为何我们竟然要听他们的吩咐，听这些猪狗的指使，因此随便掀起某些行动看来是正确的，但这时那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说道：即使是你们对西德不满，就像前面说过的对此我能够理解，但如果你们就这样不加选择地任意抢劫袭击人们，这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啊。或者也包括抢劫储蓄银行行为，当然贝尔特·布莱希特说过，抢劫一家银行与占有一家银行相比算不上什么，但最终这些行为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帮助。我无所谓克劳迪娅怎么想，但是我说道，所有这些我们根本就没有做，我们只是对此公开承认，因为……但是说

到这里我也顿住了，因为接下来我就不得不讲述和流浪汉以及伏特加有关的事情了，那样我们就会又回到东德，尽管他们自己对这一切都很清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但有时谈论这些事情只能是很糟糕的，如果人们什么也不说，那么其他人也会守口如瓶的，因此我也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然后又进来另一名警察或者军人，对那个女的小声说了些什么。我注意到那个女的感到生气，因为她变得满脸通红，但是在男的又离开之后她却什么也没说，而只是注视着我们，不知怎么地充满了同情。我困得要命，以至于眼睛一再想要闭上，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也身体完全后仰地靠在他们的椅子上，或许我们也都睡着了一会儿，因为突然那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不在场了，取代她的是一名肩背步枪的男子，这令我感到害怕，因为迄今为止虽然所有的人都穿着制服，但身上都没带武器，或者至少我没看见他们身上带着武器。然后人们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噪声，是汽车开到门前的声音，至少有两辆或者三辆，接着是车门被砰砰关上的声音，当屋里的军人听到这种情况时，他马上手执步枪站得直挺挺的，嘴里还说道：快点儿，你们都站起来！立正。我们从椅子上起身，就跟在体育课上也总要保持的那种姿势一样站得笔直，然后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但我无法看清楚她的面孔，因为从外面照射的汽车头灯很晃眼。尽管如此我很害怕。在女人身后跟着两名男子，他们在门口停了下来，女人走到我们跟前，男人们把门关上，这时候我第一次能够看清女人的脸，我吓得不得了，因为她是明爱会那位女士。

上帝受到魔鬼的挑战

殉教者墓穴里的黑风透过生锈的栅栏，继续吹过停放车辆残缺不全的颤动的车窗。你坐在咖啡馆里门和过道之间挪动了位置的桌边，跟我一样喝着同样的咖啡。裙子落在你敞开的双腿之间。你笑着牵着我的手。我的恐怖博物馆，这听起来几乎像是一句亲昵语。

冬夜里窗玻璃被冰层所覆盖，在这样的夜里我坐在令人不舒服的椅子上，兜里揣着没有标签题字的小筒药片，在一旁注视那些我只是肤浅了解的人们，看他们是怎样不停地用手在一张纸上描画着，用粗线条标识出拇指和小指之间的跨度，这样的夜晚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

魔鬼对上帝的挑战归根结底就是，创造一块如此沉重的岩石，就连他自己也无法把它举起来，这仅仅是未经思维训练的经院哲学大脑的一项发明而已。当然上帝的万能并非体现在任何其他方面，而仅仅在于能够把相互抗衡的力量统一起来。创造一些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我们无法再胜任这样的东西，它有能力毁灭我们，我们全部的追求不正是朝这个方向去的吗？

我们在睡觉时把旧画报垫在头底下，画报里的猜谜总是没有谜底，人们把画报的前几页撕了下来，为了用它们来盛接削掉的土豆皮。一张面部素描画，需要被填涂数字的空格，需要被连接起来的点，一个男人头向下着地，双脚挂在树梢上，他微笑着伸出双手，手里满是伤疤，风吹透了他没有皮肤的身体。两幅让人们查找错误的图片，在其中一张上他看似在睡觉，几乎像是死去的样子，而在另一张上他在用舌头说话。

直的和弯曲的。平的和圆的。被看似无限多的选择所迷惑，这些都是我曾经想要撰写的研究性文章。

当风沿水平方向从森林里吹出叶片，无翼的树针就像大黄蜂的尾巴一样唰唰落下时，吊桥对于眼睛来说就是一块静止的钟摆。坐落在这里是多少野外休养机构和疗养院的梦想啊。

搭载委员会成员的直升机在雨中疾行。雨点拍打在机舱隆起的玻璃罩上。长颈鹿闭上了眼睛。大象沿直线把它的鼻子向上伸展。在病畜屠宰场院子里堆放的驴骨旁边，雨绳把小的同心圆刻进黄泥水坑的泥浆里。两名伙计和学徒一道站在雨篷下面抽烟休息。水分已经浸入到斜坡的混凝土涂层里。他们向自己的汽车望去，车辆并排停放在院子尽头。这是一个近郊小火车站的氛围。在可行驶的行李架上擦着成堆的动物尸体。

那个孩子站在窗前，眺望外面阴雨连绵的庭院。塑料衣夹在晾衣绳上像水果卷糖一样闪着光亮，这样的卷糖人们必须在饭前从嘴里取出放到洗手盆边缘上。木质衣夹的金属丝眼孔有一丝不怀好意的味道。如果一阵狂风刮进院落，它们就像是用一根肌纤维被固着在老鼠头颅上那样来回摆荡。蓝色的塑料衣夹显得很满足，因为人们给它分配了一条旧毛巾。孩子的嘴里有口香糖的味道，口香糖是在一阵倾盆大雨之后从潮湿的自动售货机开口处掉出来的。雨水的味道尝起来跟一般的水不一样，可能是因为雨水是降落的而不是流动的。

下雨的天空就像一张双层床塌陷的床垫一样，在被锉平的屋顶上面垂得更低了，直到它挂满雨滴、中部下垂地在城市入口处教堂钟楼的两个塔尖上静止下来。光着腿的孩子们都跑进房子里不见了。他们坐在走廊石阶上，让雨滴通过厕所格栅和敞开的房门喷溅进来。长颈鹿只有跟我们的房子和住屋相比才显得奇特。它是一种任何房间都容纳不下、无法穿过任何楼梯间的动物，它只能总是待在外面，因此以其笨拙的身高是纯粹现象的象征。

嘴里有沙子或者被握在被雪浸湿的手套里的罂粟秆的味道，闻到指甲下面黏土的味道，感觉到荆棘对脚后跟的刺痛和冰块在胳膊上的刮蹭，看到围绕牲口饮饲槽的一道银光，听到灌木丛里一只牛犊哞哞的叫声。那个孩子在篱笆旁边把手伸进一个地洞里，他感觉里面有一条蚯蚓。蚯蚓爬了出来，就像那根他在吃午饭时还紧紧攥在拳头里的绳

子一样缠在他的手指之间。那个孩子闭上眼睛。蚯蚓用它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思考。只有这样它才能忍受痛苦的境遇，即被一把铁锹砍碎，被一股强劲的水流冲到地面而遭受刺眼光线的灼射，以及被一把钩子刺穿身体。孩子从地洞里拽出蚯蚓，把它连同一片湿润的树叶放进一个火柴盒里。

在沿山坡向上去往学校的路上，最后两颗悬钩子使自己转变成长颈鹿的瞳孔。那个孩子跳起来去抓高处的树枝，枝条上的刺划破了他的手指，他空手接住从树上落下来的果实，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小书包里。后来他想到，他自来水笔里的墨水渗出流空了。在橡皮旁边他发现了两个细小的手柄，小得就跟来自自动售货机里的那只长颈鹿头上缺少的小角一样。

我在自动售口香糖机器前面停了下来。在镶有红色框子的玻璃后面，一只塑料长颈鹿令人眩晕地头朝下被束缚在玻璃球之间。那就像是描画一头猎豹的素描画，图上猎豹的脑袋毫无轮廓地耷拉着作为加厚的脖子上的锁链。我已经观察了好几个星期，看那只长颈鹿是怎样每投一枚硬币就向下沉降一些的。终于它现在独自躺在一个被夹在四个红色和三个白色玻璃球之间的、盛装剥落糖漆的提桶里，穿过不断张开又闭合的环形路径。它笨拙地侧身躺着。那样子仿佛是它有了身孕，需要一处安静的居所，一个填充了稻草的火柴盒，为了让一只小长颈鹿从它伸长的两腿之间爬出来。我往自动售货机的开口里塞入十芬尼硬币。慢慢地我轻轻用力，把自动售货机被擦掉表皮铁质的手柄向右转动。我闭上眼睛，为了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仅凭声音我就能觉察出长颈鹿的降落情况，因为在自身重量和腹中孩子重量的作用下，它在转移重心的过程中几乎是无声地向下滑落。一种颤动贯穿了自动售货机机身。那些玻璃球朝着陷落活门快速滚去，它们超过了疲惫不堪的长颈鹿，它既笨拙又像是患病一样伸展着四肢。活门打开，接住一个白球，让它得意扬扬地向下滚落。一枚硬币太少了。中午的雾气一动不动地照在长颈鹿的身体上。我摊开两手给长颈鹿看，为了向它证明我无法再做任何事情。它躺在里面一动不动。我转过身回家。

在树杈上我只闻到擦蹭绘画毛笔的味道，它不再有米拉别里李子的气味。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尝起来味道很特别，因为母亲把刚切完洋葱的刀只是很快在围裙上擦拭了一下。

我的面包在水坑里漂浮着。它是从我手中的包装纸里滑落的，纸上写有模糊的钢笔字样“肝肠”。我连伸手去捡起面包的胆量都没有。在卡车嘎嘎作响的车轴的弯曲后面。

地下室和花园的迷宫。灰白的天空就像是刚从一名患者脸上揭掉的床单，在小声小气的房顶后面照射出微弱的光亮，穿透了中午热气腾腾的饭汤散发的大团蒸汽。时间什么时候已经是十二点整了？

被砍掉的树枝落到地面上，失去了敏锐深刻的灵魂，它们在树上就是用这种灵魂与天空对抗的。风现在终于可以把它们作为来回舞动的甲虫腿牢牢抓住，在被践踏的草地上把它们擦伤。

城市规划中被烧焦僵硬的鱼骨。

坟墓旁边那座荒芜的小教堂是用来堆放动物尸体的。一段时间里在小教堂对面有一处被搭建的钢质脚手架，仿佛是一具骨架通过狭小的入口门从教堂里逃了出来。当我从脚手架旁边驶过时，我从未上润滑油的链条的咔嚓声中，能够听到砖瓦碰撞时发出的咯咯声。

收集绿碎线和空黄瓜瓶的平淡无奇的日子。一把螺旋夹钳。砂石坑里的一洼牛奶。把拇指和食指压紧，猛一用力拽去洋槐小树枝上的树叶。我的鱼际在刷有绿漆的地毯拍杆上钝的锈迹上擦伤了。

在屋顶室里那个孩子用风景明信片搭建了一座塔楼。当他思考的时候，贴在他额头上的橡皮膏会拉长绷紧。被调换过并且棱角被撕破的地毯是多年前按照房间的尺寸裁剪的，现在它图案颠倒地铺在被找平过的厚木板上。当阳光透过坡屋顶的天窗照射进来的时候，被房间吸收的咖啡香味又变得活跃起来，它夹杂着布丁点心的余味，作为不祥之兆一直升高到未抹泥灰的墙上。

当那个孩子脱去他的套头毛衫时，他总要注意使带有大象图案的标签正确地颠倒过来，也就是说迎着 he 视线的方向并冲床头摆放。因为那个孩子注重这一点，所以他不再是孩子了，因为孩提时代的标志是，东西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放着，而人们不必自己把它们放到那里。

晚上熬洋葱、夹心面包和葡萄酒混合饮料的味道，以及黑夜里的各种动静：百叶窗零星的撞击声，橡皮球缓慢滑行直到停止的声音，钟表的嘀嘀嗒嗒声，地板的咔嚓声。

指尖闻起来有睡眠的气味，还有一股被擦掉的褐色药剂的味道。

一只被捕获的猴子向上斜仰着头。一束光线就像水平器的气泡一样总是悬浮在同一个位置，照射着笼子顶盖上的瓷砖。狗熊们四肢着地，一动不动地趴在用混凝土加固的坟墓前面。它们的呼吸从死水表面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

最伤心的是那只长颈鹿，它现在拥有一栋独立的房子，但房子不是给它自己，而是为它的脖颈建造的，它的脖颈一生都凌驾于它本人之上，作为不被理解的疲惫的标志。

无花果的外皮和大象的皮肤很像。大象用四条腿缠绕住脑袋，把自己转变成一小团黏糊的东西，人们在食用这样的东西时必须把它分散开来。如果把无花果切开，人们就会看到一条蛇的内脏，看到一种带有细胞核和唯一没有血管层的细胞组织。整个无花果只是大象的皮肤而已，大象在皮肤被切开时挥发了。

因为石块没有和樱桃的梗一块儿被拔掉，因此无论是用铁质去核器处理过的，还是由母亲在涂抹面包之前很快从密封大口瓶里取出并在拇指之间被挤开的，大多数蛋糕底部的樱桃都有两处伤痕，它们带着发黑的结疤边缘躺在淋巴糖衣里。如果人们把核和梗一道挤出来，樱桃就会有一个开口，它就像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鸟一样在找寻自己被剥夺的东西。因为这两处伤痕樱桃失去了颜面并变得憔悴了。

垂直尚未与水平区分开，线尚未与面区分开。一本画报被折起来放在餐椅上。一个黄色的塑料螺旋推进器在风的吸力下从窗户里飞了出来，拖着一条X形白线降落在人行道的铺石路面上。一块卵石从上面飞了过去，后面跟着那个单腿蹦跳的孩子，孩子还没有转变成男人或者女人，只是站在门框柱子旁边，为了测量一下脑袋已经长多高了。周边的事物没有远近之分：近的仅仅是胳膊能够着的东西，远的东西放在高处的橱柜上，母亲也要站在蓝色的凳子上才能触及它们。逝去的东西没有昼夜之分：如果带有奶油味儿的被子一直被盖到脖子上，音乐闹钟反射出关灯之后那种奶酪黄颜色的光线，那就是黑夜到来了，而如果水在撞击管道弯路时发出汨汨声，门砰砰地被关上，走廊衣帽间的镜子上蒙上了一层水汽，那就是天变亮了。

物品能够被观察，动物能够被屠宰，树林能够被砍伐，疯子能够被治疗。为了理解自我，认识在他者身上费尽了心力。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经验所拥有的，并向人们挑衅和挑战的东西：物品、动物、本性。

我是用暴力被生出和呈献出来的。紧接着就是关于描述新出生的襁褓中的耶稣的离题说明，耶稣被画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和圣母画像上，当时人们尝试在描绘他的同时也描述圣母的贞洁。青少年时期的岁月是黯淡的，除了别的之外那些日子也在探讨这一事实，即圣像学里我们的上帝主要是作为虚弱的儿童或者作为垂死之人和死者出现的。

最初是按以下书名出版的图书：《小孩嘴里出恐怖》，汉堡赖因贝
克，1977年。弗里茨·西格尔绍夫在书中作序。西格尔绍夫在序言里
指出，所有的短诗都是“支持国家的”，它们尝试保留或者恢复现有的
制度，诋毁恐怖分子的名誉，或者就像在第一个例子里那样挑唆恐怖
分子相互争斗，例中根据通行的陈规俗套的角色关系，男人巴德尔在
向女人迈因霍夫施加消极影响。这种陈规俗套在第四个例子里再次出
现，例中女人因为没有蓄留对浪荡子和革命者来说典型的胡须，因而
无法接受革命者的角色，并因此作为唯一的一个人被逮捕。这些陈规
俗套与红军派里的现实相悖，在该组织里女人的数量一度占到全体成
员的60%，她们从一开始就接管了活跃分子和领导者角色。因为正如
西格尔绍夫所言，淘汰和排除是数数歌谣的基本原则，因此这样的歌
谣只有把统治阶级的目光局限在社会边缘群体和局外人身上，它才能
够反映社会现实。（也可参见：《不要大呼小叫，否则鲁道夫·霍斯就
来了。纳粹儿童诗选集》，慕尼黑，1991年。以及《斜坡上的大肚
子。二十至四十年代数数歌谣里的时事人物形象。从哈尔曼到门格
勒》，法兰克福，1993年。）本章注释皆为作者原注。

反对国民财富 ^注

1

巴德尔驱车前来，
开的是一辆卡车，
他想抓住迈因霍夫。
因为她是一个女妖。
女妖从山上滚下，

巴德尔很快掘了一座坟墓，
迈因霍夫掉了进去，
那肯定是你。

2

里斯佩和罗斯佩带着钢锯
为拉斯佩完成了某事。
他们把法官的座椅锯掉，
他们把陪审员拖入泥潭，
他们会幸灾乐祸地窃笑，
如果你偷了国家的东西。

3

从前有一名警察，
他计划了一些非常狡猾的事情。
因为他很想组建一支国民军，
于是那天夜里他擦亮了自己的步枪，
把它交给他的儿子，
作为报酬而非零花钱。

儿子接过步枪，
四处瞄准比画，
他向父亲道了声谢谢
然后去抢劫了一家银行。
这听起来真像是嘲讽，
之后儿子得到了赦免。

4

在二十八个煤箱里
坐着十七名无政府主义者。
十六个人蓄着胡子，
只有一个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这个人是个女的
现在必须被关禁闭。

5

每天一大早
巴德尔就把我们的汤做得很咸。
当中午的钟声敲响时，

迈因霍夫也会感到很高兴。

但是到了晚上7点半，

警察就又要监视她了。

6

有一个从曼海姆来的侏儒，

他也想成为一名男子汉。

他往考斯特海姆郊外的桥上

涂抹软皂、盐和铁锈。

火车脱轨了。

侏儒成了孤儿。

因为火车上坐着他的母亲，

他在作案时忘记了这一点。

检票员说：去曼海姆，

不会再有去那里的火车了，小男人说：

我不用乘坐去曼海姆的火车，

我骑一根树干回家。

7

在莱茵河畔美丽的美因茨，
那里住着霍尔格·迈因斯。
他不仅想要他自己的东西，
他还想要你的东西。
因此他想象一些美妙的东西
给自己制作一些小的玩意。
在这方面如果失败了，那就好比是，
腿上的两根脚趾。
他的兄弟海因茨，
和他一起住在美因茨。
从这一天起在莱茵河畔，
人们把他称作霍尔格·凯恩。

8

在A青年团里
巴德尔只叫巴
恩斯林只叫恩斯，
仿佛她是一只岩羚羊。
在B青年团里

迈因霍夫养了一头鹿

莫勒养了一只猫，

仿佛他们有足够的空间。

在C青年团里

迈因斯感到头痛，

拉斯佩感到肚子痛，

在这首数数歌谣里西格尔绍夫指出一种可以追溯到纳粹时期的结构相似，从这种关联出发他引用了一首关于德国少女联盟（BDM）的诗，该诗出于对按字母排序的分类原则的考虑，更加明显地将表述的逻辑性搁置一边了：在德国M联盟里 规定不是那么严格。在德国O联盟里人们很快躺到稻草上去。在德国P联盟里 那个部位有短暂的疼痛感。在德国Q联盟里 转眼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孩子。在德国R联盟里 幸亏那是一位先生。在德国S联盟里 他把自己称作鲁道夫·赫斯。在德国T联盟里 梅塞施密特公司研制的飞机在飞行，好哇。在德国U联盟里 朝着伦敦敌人飞去。

这就是在那里的风俗。 ^②

红军派成员简短的圣徒传记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在一个孤儿院里长大，在那儿他必须睡在一名足球运动员的下铺，在雨水桶旁边洗漱。安德烈亚斯很早就有重新确定世界秩序的想法，但是他缺少书写工具。终于他决定成为一名飞檐走壁的盗贼，并拜他崇拜的偶像阿明·达尔为师。他学着穿越德国社会问题中央研究所的窗玻璃跳跃，事实上这样的窗玻璃仅仅是由糖玻璃或者所谓的效果玻璃组成的，就跟在酒馆斗殴过程中砸在头上的瓶子完全一样。即使是在美国早期的西部地区安德烈亚斯·巴德尔也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不过在犯下许多罪行的同时，他在那里也遭遇到一次倒霉的事情，当时他因为不小心而开枪打死了克雷基-佩特拉，他是温尼托的老师，在最后一秒扑到了他学生的身上。克雷基-佩特拉和枪杀他的凶手非常相像，因为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作为“不满者的领袖”参加了1848年革命。此外他能够“细致入微地证明，信仰上帝是毫无意义的胡闹”。革命结束之后他必须从德国逃往美洲，逃到印第安部落阿帕契族人那里。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迷惘，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常年游荡在不宜客居的异乡的荒原，直到他被两名年轻的印第安人剥去头皮溺死，也有人说是被射杀的。他最喜欢的颜色是橄榄绿，他的幸运数字是7。

霍斯特·索恩莱因是一位香槟酒工厂主的儿子。五岁时他就必须为拍摄广告照片当模特。后来他成了骗子。他是红军派中最讲究穿着的成员，戴着丝巾，有时也扎着豹皮绑腿，头发上搽着润发脂。他和托马斯·弗里驰长得很像，这在他于1968年3月实施了一次抢劫之后给他带来了好处，因为当警方在开往埃尔特菲莱的客车上进行检查时，他可以假托自己是在去参加在埃尔特菲莱开办的一家香槟酒酿酒工场的签名活动的路上。不过这样的好处很快就转变成了坏处，因为人们可以从《喝彩》杂志的明星剪切画中拼出他的第一张通缉照片。为了摆脱与自己长相酷似的刑事犯，托马斯·弗里驰让自己蓄起了长发，在电视连续剧《称号为“纸花凶手”的警官》第十五集里接受了一个角色。他在剧中出演一名嬉皮士，他生活在一个废料场，绰号为“茶壶”。虽然

这名嬉皮士象征的是与政治上激进的红军派相反的耽于幻想的和平运动，但是他也失败并最终自杀了，这样他就把嬉皮士运动揭露为一种空想。剧中使用的那朵纸花据说是人们通过《喝彩》杂志的一则广告，花了二十七马克从位于巴特梅根特海姆的托马斯-弗里驰-粉丝协会的女会长那儿买到的。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那朵纸花只不过是一件复制品，因为真正的纸花随托马斯·弗里驰一道被下葬了。

扬-卡尔·拉斯佩从十二岁开始就在他叔叔的工厂里作为日历生产工人。他叔叔拥有那种所谓的可移动多用途日历的生产专利，确切地说那是一种月历，每月的工作日能够用一个活动的红色塑料方块被框起来。扬-卡尔必须用冲压机在日期数字上固定细长的豁口，然后人们就可以把那个在顶端内侧边缘有一道被加宽的弧形的红色塑料方块插进豁口里了。因为红色方块经常丢失，不停的换插恰恰在手工业工场被认为过于烦琐，因此后来人们用一种透明的箔条取代了红色塑料方块，箔条围住一周的跨度，然后箔条上的一个黑色方块就能在相应的日期上被推移了。扬-卡尔·拉斯佩喜欢发烧树乐队和肝肠面包。

阿斯特丽德和托瓦尔德·普罗尔成为永不离散的一对朋友，他们也被称作两个小洛特或者小不点和安东，虽然他们不是同性双胞胎。还在上学的时候两人就喜欢交换角色，比如阿斯特丽德中午替托瓦尔德留下关学，而他则能够去他所在的曲棍球队参加训练。相反托瓦尔德去上阿斯特丽德讨厌的芭蕾舞课，而她则和女友们在一家冷饮店吃一份香蕉船，在自动唱机上不断地选按G8乐队，听她当时最喜欢的单曲《不会太久》。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也这样相互耍花招，而安保人员从来无法肯定站在他们眼前的到底是谁。两人在同一天夜里被赋予生命，但却是被两位不同的父亲，与托瓦尔德不同阿斯特丽德是长生不死的。当托瓦尔德因为在约旦的阳光下躺得太久而起火燃烧并化为灰烬时，阿斯特丽德出于悲伤而请求她的哥哥让她摆脱长生不死，这样她就能和他重新合为一体了。她被要求在以下两种可能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永远保持年轻，能够随时坐在冷饮店里，但却失去了哥哥，或者和她的哥哥一道作为尘埃雨在世间飘荡，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直到今天如果定睛细瞧，人们仍能在燃烧的森林和倾塌的城市上空看到他们俩在盘旋。

古德龙·恩斯林的姑姑是一名制女帽的女工，她必须很早就帮忙干活。因此她也对化装和假发情有独钟。一段时间里她作为怪诞舞蹈演员在柏林选帝侯大街上的一家剧院工作，在那里得到了君特·普菲茨曼的赞赏。后来她在巴特坎斯塔特的疗养大楼里与一名年轻男子订婚，他因为研究了丢勒铜版画《忧郁》中钥匙串的意义而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是众多的可能性导致了钥匙串女主人的忧郁吗？还是数量众多的钥匙象征了那种不可能性，即在异化的世界里找到了正确的门锁也就是说固有的位置？两个人共同成立了描写阳痿工作室，在这里他们出版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作为对性行为的揭露，他们认为文学创作不是用语言，而是靠被描述的事物。但是这一文学构想没有产生启蒙效果，相反却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普及，很快就涵盖了整个德语区文学界，因此他们俩不得不转入地下寻求一种新的活动范围。

乌尔丽克。我们在5月9日庆祝她的节日。当人们找到她的尸体时，却发现尸体上没有大脑。大脑已经在天主那里了。在她的身体旁边立着一个破了一半的器皿，里面盛着干涸的血液。当人们取出血液把它放入一个水晶碗里时，血液开始像金银一样闪烁发亮。在她的牢房里人们能够看到一朵百合和一棵棕榈，其次还能看到一个铁锚、一条鞭子和三支箭。人们尚不清楚这些物件意味着什么，只是把她的故事看作是三部相互独立的《再现罪犯的人》。乌尔丽克是小市民的女儿，在一座小城里长大。作为聪明智慧的少女她很快就引起了统治阶级，特别是某一位部长和昔日纳粹们的注意。那位部长奉承和威胁乌尔丽克，为了赢得她的示好，但这些都是徒劳的，她已经完全把自己许配给了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部长让人把她抓了起来，几乎把她鞭打致死。当两名天使在地牢里把她的伤医好之后，部长让人把她绑在一个铁锚上沉入内卡河。但是天使把乌尔丽克从铁锚上解开，把她抬上河岸。现在部长命令手下，用烧红的箭矢射杀这位虔诚的少女。但是箭矢却转而射向射手们，把他们通通射死。没办法最后部长让人把她绞死了。

在10月18日那天夜里将近零点30分，斯图加特-施达姆海姆监狱第八层楼的牢房灯火通明，一个陌生的声音向值勤警卫汉斯·施普林格保证对囚犯的监管不会出任何差错，就这样把他调离岗位长达三个小时。

一道光影进入编号为716的囚室，就好像该囚室没有被上了好几道锁，没有被安装报警装置，也没有额外被用加了软垫的刨花板堵塞。光影把里面的囚犯推向侧身位，把他叫醒并说道：“快点儿起来。”扬-卡尔·拉斯佩醒了过来，恍惚之中以为是末日审判降临了，但接着他认出那道光影是天使长米歇尔，明白了这才是被确定的个体审判，因为圣经上写道，每个人都要接受两次审判，一次是作为个体在他的死亡时刻来临的时候，还有一次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当灵魂在世界末日重新与肉体合二为一，当所有的人都被要求说明理由，当基督转变成基督再临，当基督确认或者也可能取消和修正个体审判的判决时。天使命令扬-卡尔·拉斯佩坐到床上去，扬-卡尔不知道他的手是被牵引着还是他自己在操纵他的手，总之他现在手执一把黑克勒&科赫品牌的手枪，把它对准自己的左太阳穴并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他的脑袋并穿透他身后的墙壁，它离开他所在的囚室进入719牢房，在那里它钻进安德烈亚斯·巴德尔的脖颈，击穿他的身体后又在地上弹了起来，再次穿透墙壁进入725牢房，在那里它用最后的力量击中伊尔姆加德·默勒心脏下方的胸腔，但是子弹只让他受了点儿皮外伤，人们可以认为伤口是一把钝刀留下的。然后天使长米歇尔就像他来时的那样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他堵住了那些在牢房里和在牢房四周站岗的警卫的眼睛，因此第二天当人们询问他们在夜里发生的情况时，他们仅仅自认为感受到一次短暂的停电。

第二代红军派成员是用死去的第一代成员的被打掉，并被栽在柏林舍内贝格城区一栋高楼后面的一处温室苗床里的牙齿培育起来的。这些孩子不再蓄长发和胡须，而是戴着太阳镜和留着短发发型。他们对炸药一无所知。他们把自己称作是宗师巨匠的模仿者，想要减掉资本主义的金羊皮。理论对他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去坐牢。

人们不再清楚关于第三代红军派成员的任何情况。

工厂主的桥梁

工厂主当然希望我从桥上走过。毕竟桥是为我建的，他这样说道。他从落地大座钟旁边的木箱里取出那个木偶，用钥匙打开他的书房把我推了进去。在写字桌上方横着那块木板，过圣诞节的时候会在木板上搭建铁路。现在木板上立着按照1:20的比例被精确仿造的那座桥梁。木偶跳到木板上，慢慢地朝桥梁方向走去。它穿着红方格纹衬衣和皮裤，瞪着向外鼓出的大眼，笑得如此夸张，以至于人们能够看到它嘴里白色的嚼板而非牙齿。它的关节裸露，残余的胶水在它光秃的头顶闪着亮光，两周前这样的胶水还把黑色的假发固定在它的头上。

在木偶快步走向桥梁的时候，它的眼珠子始终转个不停。对它来说整个生命是一次唯一的玩笑。是否人们从一座令人眩晕的高高的桥梁上通过还是整天躺在木箱里，是否人们戴假发还是不戴，这些对它来说都无所谓。如果这个桥梁模型至少跌入一道真正的深渊。但是桥梁的设计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因为仿造的桥梁建在顶多5厘米高的木桩上，而真正的桥梁则在一处深谷上空摆荡。大约是在50米的高空。或许也只有20米。我对距离的估计很不准。但是从桥上往下看，地面上的工人就像是蚂蚁一样，或者更像是作为斑点的、头戴黄色头盔身穿橙色防护背心的具有异国色彩的瓢虫。

工厂主站在他们当中调试麦克风设备。我应当一边唱着《告别的时刻》（Con te partirò）那首歌一边穿越桥梁，这是他在刚才开车来这里的路上才通知我的。他往车载录音机里放入一盘录有这首歌的磁带并说道：“你是熟悉这首歌的。这首歌谁都熟悉。它唱起来很容易也很上口。”我回答说歌词我不理解，此外我也不喜欢这首歌。“对安德烈·波切利来说足够好的东西，对我的公子来说也应该是够用的，”工厂主反驳道。他又说道：“一个人身体有这样的缺陷还能够经受生活的考验，这一点是令人钦佩的。医生们当时建议波切利的母亲堕胎。但她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这跟你的母亲完全一样。只是波切利的母亲在

生下他之后并未马上悄悄离去。不，正好相反，她又接受了第二份作为洗衣女工的工作，非常有牺牲精神地照顾她的儿子。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个孩子经常整日整夜地大喊大叫。人们也无法把小安德烈干脆束缚在电视机前。毕竟他双目失明，那些奇特的动静和声音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紧张。一次波切利的母亲真的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因为她的心力已经彻底耗尽了，这时女圣徒塞西莉亚出现在她面前。起初波切利的母亲吓得不得了，因为女圣徒塞西莉亚把自己被人锯掉的头夹在胳膊底下，但是然后她明白了这一暗示，给她的小儿子演示歌剧音乐，听到歌剧他变得非常安静，从此再也不大声喊叫了。他成了一个完全文静的孩子。沉默得令人害怕。他的母亲甚至在想：现在他也变哑了。但之后在他四岁的时候，在一个美好的春日他又重新张开了嘴巴，用他银铃般的高音声区唱了歌曲开始部分的音调，这就是后来《告别的时刻》这首歌。”

工厂主因为感动而声音中断。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从他西装上衣的内兜里抽出一张小纸条，把它向后递给坐在汽车后座上的我。“另外我让人专门为你改写了歌词。通常那句‘Con te partirò su navi per mari（就让我与你同航，在那越洋渡海的船上）’现在你要唱作‘Con te partirò su ponti sopra gole（就让我与你同航，在桥梁结束的尽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和你从桥上跨越深谷。这是很美妙的事情。”工厂主把磁带的音量调得更大了。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听歌剧音乐，而是根据不同的心情听REO快速马车摇滚乐队、38特别摇滚乐队或者空中补给乐队的歌。我盯着歌词，但一句话也看不懂。“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发音。”“你只需仔细聆听就行了。如果你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此练习从桥上走过，那你就同时让磁带播放这首歌曲，然后你尝试跟唱。儿童也是这样学说话的。”

1951年秋天一名患精神分裂妄想狂症的闹事少年创立了纳粹

借自圣十字堂区旁私立租书铺的一本成人小说

1951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一家疗养院里度过的。这家疗养院在当时是一栋相当现代化的建筑，它建在离马路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内院和几个多角的单体建筑，这些单体建筑由玻璃通道彼此连接起来。夜里我听到一列缓慢驶过的牵引机车沉重的呼气声，没过多久，在路轨刚刚恢复平静之后，我又听到马路上一辆驶近的卡车嘎嘎的喘气声。卡车上装载着空桶，它们被斜穿过城市运往一个仓库，在那里它们被从车上搬下来，再由装满龙涎香、血液、胡萝卜素、牛奶、氯化钠和自来水的实桶所替换，在回程途中这些东西晃荡着撞击斜旋上的桶盖。

通过从美国引入的电子休克疗法，我在几周之内就失去了大部分记忆。从医生方面人们当然不会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疗法的常规名称，而是把它委婉地称作直流电治疗。这种名称应当多少让患者放下心来。这就跟战地外科医生在抽拉针管时所说的战争咒语“吗啡”一样。当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早就不再有吗啡了。人们给伤员注射食盐溶液，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他们做手术。如果患者疼得大声叫喊，外科医生就对麻醉师说：“快，多打点儿吗啡！”然后麻醉师就会给患者再打一针食盐溶液。如果这样也不起作用，人们就把一个较粗的注射针头刺进患者的右侧太阳穴，为了以此分散他对于手术疼痛的注意力。当然这样的做法只有在他正好不是做头部手术时才会成功。在做头部手术时就毫无希望了。人们不可能使头部陷入瘫痪。更不用说转移患者对于头部的注意力了。

有报道称，人们给必须被实施手术的患者围上一块布，这块布往往是患者自己的围巾，为了用它送他们上西天，如果他们不能因为疼痛而

陷入昏迷状态的话。当然只是暂时送他们上西天。人们就是这样计划的。可是就连最有经验的麻醉师也无法精确衡量永恒和片刻之间的分界点，许多患者再也没有从手术中苏醒过来，因此人们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也普遍把麻醉师称作扼杀者，尽管他们自己对不熟练地操作围巾无能为力。相应地跟围巾打交道从未是他们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这怎么可能呢？职业教育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但扼杀却发生在战争时期。思想是在人活着的时候进行的。但是思想的结果却是在死后产生的。事实就是如此。对于这些原则性条件没有商讨的余地。

我自己从未上过那些应急性的手术台。至少我回忆不起来那样做过。而且那样的话在我身上肯定会找到疤痕。匆忙之中伤口不会被缝合得那么完美。此外缝线也很短缺。这就造成了更少的针刺次数和更大的间距。这是一个目测问题。小滴脓液的甘露在伤口的裂缝里眨着眼睛。很惊奇一个饿得半死的身体还能生产出多少脓液。就连那些肯定不是第一次看到此类情况的医生也都很吃惊。有时人们会认为，身体从内部把自己完全分解成了黏液和痰。

1951年这一年被煤尘所覆盖，它从烟囱里升到空中，通过永恒的循环再从空中落回到地面，取代了正常的天气情况。春天下着灰色的木灰雨。夏天弥漫着淡青色的油雾。秋天笼罩着淡绿色的石油雾霭。冬天到处都是黑色的煤砖尘雾。在少量因天气太热而无法供暖的日子里，煤尘会立即从废墟中升腾起来，落到端着牛奶甜饭杯碗的手上和为了亲吻而噘起的嘴唇上。1951年没有爱情。连唯一的一次都没有。只有滚动的木桶和被遗弃的房屋。与其说是有什么哪怕一丁点儿爱情的火花，倒不如说那是一次与死神的交易。

医生们使用直流电治疗方法是为了促进还是对抗我的记忆呢？“为了您的健康。”他们这样说道。我沿走廊去卫生间，早晨的光线稍微倾斜地透过暗淡的窗玻璃照在卫生间墙面的瓷砖上。瓷砖上的光线令我回忆起一些事情，在那一刻我感觉像是在家里一样，但却不清楚回想起的到底是什么。我站在小便池前，手里抓着我的阴茎。这个肉质的尖头难道至少不能回忆往事吗？如果它在回忆，它就会胀大。但它不会回忆。回忆是一种不安。我应当尽量避免让自己不安。在我等待尿液向

下滴落的时候，我透过倾斜的窗户缝隙向外看去。除了思想我的体内好像没有任何能够转化成咳出物的东西，就跟患者在死前往桶里吐出的东西一样，因此在周末我也被获准出院，这样我就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两天的时光。

但在上周五，当我离开医院时天色已近黄昏，最后一个工作日的炭黑再次渗露在城市上空，弄脏了日报的标题页。在人们用它包裹鳗鱼之前，我徒劳地尝试从报纸上辨认出几则标题。大陆板块开始不知不觉地相互碰撞漂移。但是边境线却未受到丝毫的影响。皇宫里的会谈也同样未受影响。在满目疮痍的城市后面横亘着休耕的田地。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吃鳗鱼。这条鳗鱼是给我母亲准备的。每周五我都要买一条鳗鱼，把它放在她的坟上。之前我用手绢把坟上的木质十字架擦拭干净，然后我把包裹鳗鱼的报纸除去一块，这样能够让鱼稍微探出身来散发它的气味。我坐在附近一块裸露的石头上等了大约半个小时。这大概是一次直流电治疗所需的时间。紧接着我把鳗鱼重新包好。我不希望其他墓地的来访者看到它时显出反感的神情。

我沿着墓地围墙旁边的铺石小路往回走，在行走时总是用手把鳗鱼摆向离身体稍远的地方，最后在路的尽头把它扔进一个狭窄的碎石坑里，如果附近正好没人的话。可能在夜里会有猫来享受这样的美食。

有时我会无缘无故地高兴，有时也同样会莫名其妙地悲伤。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坐在自己没有暖气的小房间里，尝试去回忆我忘记的事情。晚饭后我阅读一本从圣十字堂区旁边的私立租书铺借来的小说。

我的二十一岁生日正好是在1951年。我不再有家人了，唯一我熟悉的女人是洛尔辛，她是一名尚被监禁的同志的未婚妻。她碰巧遇到了我，当她为寻找自己的未婚夫或者为寻找认识她未婚夫的人跑遍当地的医院和疗养院时。她羞怯地走到床边，我在接受完初期的一次直流电治疗之后伸展着四肢躺在床上。因为我不再有思想，我就只能对洛尔辛说“是的”。“听从一切。”她越感到高兴，高兴她的未婚夫还活着，尽管是被监禁，我就越清晰地感到我以前的记忆在重新编排之后又流回我的大脑里了。

洛尔辛在一家牛奶加工厂工作，自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她每周一次都会定期来疗养院探视我。大多数时候她都是每周三来。她给我带来两小瓶牛奶和一瓶可可饮料，把它们放到窗前栽花的木槽里，木槽里反正不再生长任何花草了。在此过程中她稍微向前探身，向楼下的花园里张望。她每次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只有园里的小池塘泛起一道微弱的蓝色反光照射在她的脸上。

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洛尔辛不得不在一个被掩埋的地下室里度过了几乎两周的时间。令人痛苦的是饥饿，但更痛苦的还是口渴。最终她必须压抑住恶心，从一个肮脏的小池沼里喝了一些水，在半明半暗中她自认为在池沼里辨认出了一条鱼。她不情愿和半心半意地去抓那条鱼，当然没能获得成功。后来她不加考虑地往池沼里扔了一块大石头，然后才意识到一条被砸死的鱼因其血液和慢慢腐烂的尸体，只会使池里的水变得更加不洁净。一段时间里那条鱼消失不见了，但之后令洛尔辛如释重负的是它又作为闪闪发光的影子重新浮现了。

虽然直流电治疗令我精疲力竭，可我还是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千差万别的事物。在接受完治疗后的头两个小时里，我像失去知觉一样躺在床上僵硬的床单上。经常我真的会缓慢地从一种被医生估计的昏迷中苏醒过来。然后一种空洞好像浸入了我的体内。紧接着我身体的肌肉会一小块一小块地抽搐，它们会不由自主地绷紧，让细微的波浪流经我全身。我问医生这种情况可能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只说那是一种完全普通的反应，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反应在近一个小时之后又会渐渐消逝，并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减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形成了另外一种理论，也就是说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直流电治疗仅仅是从大脑里删除了我的记忆，但记忆却在我的身体里继续存在。如果我在病床上就像现在这样躺一段时间，这两部分，即我失去记忆的大脑和我不断回忆的身体，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彼此沟通。如果它们不能成功地沟通，那我几乎就是一个死人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对一切彻底麻木不仁。通过不由自主的肌肉痉挛，我的身体尝试把存在于体内的记忆归还给我的大脑。这种记忆的归还当然只在很小程度上才会成功，而且其结果往往还不确定。如果大脑根本不理解或者错误理解肌肉语

言所提供的记忆，那又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新的记忆、新的思想。那么怎样删除这些新的记忆呢？用何种电流呢？

在一个小时的相对昏迷之后大脑又开始亢奋地思考了。这也支撑了我之前提出的理论。现在我回忆起了许多思想碎片。但这不是指涉我本人的思想，就像是人们在担心自己，或者尝试去回忆他昨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确切地说这种思想是一种翻寻，一种探听，一种四处寻觅。我在自己陌生的案卷里翻腾。在一个负责全城文案工作的办公室的硕大的废纸篓里找寻。我翻查一家大型企业的档案室。搜寻一个国家的中央登记处。但是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被登记的项目，而且也包括很多漏洞。漏洞具有和项目同等的重要性和意义。

有时我很遗憾没能拥有必要的医学知识。因为我在设想人们有必要把直流电疗法的应用也扩展到身体上时，我的表达显得非常外行。人们不能仅对大脑进行治疗。即使悲伤是从大脑里产生的。人们也须把身体包含在内，为了能使记忆从肌肉里消失。只有这样患者才能被真正治愈。但是医生们也不傻。他们必须做的是充满信心地和我们交谈。他们不能一味地向我们说明他们医疗措施的欠缺。他们必须唤起我们对治疗的信任。同时研究工作在继续进行。人们对失败闭口不谈。但是我也听到了这种沉默。

没过五年，到了1955年，我又接受了另一种疗法，在这种治疗过程中人们同时也从我的体内切除一切东西。但是到那个时候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之前我还必须搜寻梳理上千个档案室和数千张中央索引卡片。这一切都未得出任何结果。

洛尔辛的未婚夫汉斯被关押的营地在设计方面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人们在那里找不到池塘或者类似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营地里必须有水，用来饮用的水，但是这样的水不能存在于湖泊或者池塘里。不能给鱼提供任何生活空间。在俄国池塘比如说可能会结冰，但这或许也不足以消除洛尔辛对鱼的厌恶感。最好是在一个热带地区。一片沙漠地带，在那里人们根本不会产生想到一条鱼的念头。水被装在大罐里送到指定地点。它是用水泵直接从深井里抽上来的。它是地下水，是泉水。鱼不会生活在井里或者直接生活在源头。但我只

是在洛尔辛直接问及的时候才会提到这一点。太阳的炙烤令人难耐。是的，人们根本不想这么认为，因为营地是在俄国，但是俄国也不是以前的俄国了。俄国幅员辽阔。俄国涵盖了四个气候带。就连亚热带……不，我不能夸大其词。我将只局限于三个气候带，让它们显得不那么确定。

洛尔辛不再追问。洛尔辛极度高兴。这些情况我究竟是从哪儿知道的？“从米勒同志那儿，”我像是附带地这么说道，“两天前他旅行经过这里，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情况。汉斯的境况很好。很快他也会回来的。肯定会的。”假如她心里一直还不踏实，我就把草图拿给她看。那是营地的平面图，我必须把它绘制出来，为了打消她最后的疑虑。“当然你可以保留这张平面图。尽管把它带走吧。”我将会这样说道，洛尔辛将会万分高兴地揣着图纸跑回家。她将把草图挂到摇晃不稳的桌子上方的墙上。她将在草图前面放两小瓶可可饮料，借着灯光仔细端详图纸。然后她会把平面图上所画的一切铭记在心：那边是一个训练场。存放洋大头菜的仓库。也可能是饲料萝卜。叫不上名字的块茎果实。这是那个地方的土壤里能长出的唯一的東西。伙食：总是一锅煮成的菜。他们用现有的食材所做成的一切一点儿也不差。很机智。带刺的环状物，顺便说一下那是巨型仙人草。令人无法想象。它们有两米多高。其实在这样的营地他们不需要围篱。但尽管如此他们当然还是建了一些。金属丝网。带刺铁丝网。监视塔。很快洛尔辛就能把图纸上的一切熟记于胸。比我记得更牢。比米勒同志更熟悉。他又继续前往北德到他母亲那儿去了。

但是在这样的营地里有多少人呢？昨天在我结束治疗躺在病床上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接着想道：干脆就以你以前所在的营地为例吧。我觉得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先前所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营地呢？还有：我在一个营地里待过吗？我干脆回忆不起来有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战争结束得太快了。真的太快了。

夜里我从一家制鞋厂出来，沿大街向下走。我刚走出二十米远，身后就有一辆汽车沿我行走的方向追了过来。它是在逆向行驶。我听到后面是怎样响起枪声的。一颗手榴弹被扔进制鞋厂的陈列橱窗里。接着

又是枪声。那辆汽车从我身旁驶过。我中弹倒地。子弹击中了肩膀。就仿佛是我在最后一刻把身子转向了围墙。制鞋厂在起火燃烧。女人们在大声尖叫。还有男人和孩子们的喊声。但是大街上空无一人。没有人走上街头。人们能经过院子从后面跑掉吗？这我就知道了。警察没有赶到。消防人员没有赶到。工厂烧毁了。

但是为何对我来说战争紧接着就结束了呢？毕竟我当过兵。我上过前线。对此我很确信。可前线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一块狭长的草地。一片寸草不生的原野。我在第一排。和其他人一道。我们一边奔跑一边端着步枪随时准备射击。然后我在远方已经看到它了：前线。它是一道长长的墙体。一道高墙。就像中国的长城一样，但是是用红色的烧砖砌成的。还有五百米。还有二百米。还有五十米、二十米、十米。然后我就站在它面前。我把头贴近墙面。静悄悄的没有动静。我转过身来。我后面没有一个人。我转向旁侧。也没有人。我又转过身朝前。一片寂静。绝对安静。这样的沉寂在拉伸和绷紧，就跟固定在汉斯伸展得很开的双手之间的那根鞋线一样。他在校园里用这样的造型想向我们证明什么呢？或者那是一场游戏，只是我忘记了游戏规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根鞋线。然后枪响了。是从后面开的枪。我被子弹击中肩部并栽倒在地。又是一片寂静。周围没有任何人。风吹过绵延不断的原野。但为何据说在那之后战争对我来说就结束了呢？

医生们很高兴我开始绘画了。他们不问我设计的那些不同的平面图都是什么意思。这样做还为时太早。他们把我尝试绘画的举动看作是治疗的成功。或者这的确是他们治疗的一个成就。

我决定放弃起初我为单人囚禁设计的那种狭小的井状构造。它是设置在看守营房旁边的一个斜面小木板箱。木板箱里恰好只能站一个人。一道陷在地里的坠门是唯一的入口。那是一扇包有厚重铁皮的钢门。问题是究竟怎样把这样的构造送到指定地点。它被装在火车上从高加索运来，但接着在一个小货运站堆放好几个星期，直到人们用一种临时搭建的滑轮组把它举放到一辆长途运输汽车上，再由汽车把它运到营地。连带门和门框。但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一个钢结构门框固定在干燥的荒原土壤里？门只应锁闭井状构造，在这样的单人牢房里那

些狂妄的囚犯坐满他们的刑期。通风情况呢？一道稍微靠右安装的棚栏负责囚室的通风。不，通过这样的设计构造我让自己听任太多不可预知因素的摆布了。这样一来我恰恰是挑起了矛盾和对立。而这正是我必须避免的情况。此外洛尔辛本人曾经在这样的井状构造里度过了两周时间。只是不要让她回忆起自己的命运。她的命运不能和汉斯的命运混杂在一起，而是必须清晰地区分开来。细致整齐地划分清楚。于是我又摈弃了设计井状构造的想法。如果这种井状构造将会唤起她对于当年自己被困在里面的地下室的回忆，从而唤起她对于小池塘里的那条鱼的回忆，那么整个灼热的周边环境将会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了。

一棵巨型猴面包树在营地的东北角上伸展着它的枝杈。它的树干耸立云霄，从许多树层上都长出结实的丫杈。这样的一棵树人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棵粗壮的橡树和它比起来显得极其矮小。在这样的树上经常生活着整个猴群。它也正因为如此而得名猴面包树。猴子们生活在树上，生下它们的幼崽，在树上嬉戏，给自己建造小型庇护所，采食树上的果实，在从事所有这些活动时它们从未从树上下来过。这样一棵巨树能够很轻松地养活二三十只猴子。树的名字也正源于此。当然在那里不再有猴子了。但是在人们想到建立营地或者发动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荒原或者沙漠地区的原始居民恰好发现了这种树的特别之处，并挑选它作为它们后来的栖身之所。尽管它们的居住地离得很远，可它们还是定期来到树跟前庆祝它们的节日。那些建在大树枝里的狭小的茅草棚也来自公元前的那段时期。那些茅草棚对原始居民有什么用处，对此人们已无从知晓。或许它们在里面寻求躲避暴风雨的避难所。在此期间丫杈已经缠绕在草棚的木杆上，以至于在叶丛和粗树枝的覆盖下两者几乎无法再彼此区分了。

在营地里那些茅草棚被用作单独囚禁。被判刑者必须顺着一根长梯爬到树上，钻进其中一个草棚里。紧接着人们从外面给这间草棚上了插销并把梯子撤走。当然这是一种严厉的惩罚。但是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树提供了很多荫凉，某些囚犯讲述道，他们在树上做过非常奇特的梦。在夜里天一下子变亮了，他们能够看到远处的沙漠和毗邻的荒原。在远方人们能够望见大海。海边有一座大城市：敖德萨。烤杏仁

的味道。用阿月浑子果实和蜂蜜做成的甜食。焦糖。牛轧糖。硕大的瓦罐被运至港口装载到船上。对于猴面包树上的单人牢房里做梦的囚犯而言，这一切距离他们好像只有一步之遥。一次微小的跳跃而已。商贩们稠密的行列又会立即在他身后合上。一只大瓦罐在一旁待命。它是空的。他钻了进去。工人们用勤勉的双手在瓦罐四周捆上绳子，把它放入一个填满有木棉的板条箱里。板条箱被一辆手推车途经颠簸不平的铺石街面运至港口，在那里被吊装到一艘船上。就这样早晨囚犯在他的牢房里醒来，觉得自己是在一只木桶里，在船腹里在黑海上晃晃荡荡。在全黑的板条箱里醒来的这一刻，比尽情地远眺荒原要更加美妙。

那座城市当然不是敖德萨。没有名字。没有太具体的想象。尽管那只是一名囚犯的梦境而已。他们可以梦见所有可能性的城市：阿尔及尔、菲斯、开罗，沿整个沉闷的北非地图。但是想象力不是这样起作用的。回忆也不是这样运行的。总要有一个名字，迟早洛尔辛会认为，她必须前往敖德萨，为了去那里寻找汉斯。但是洛尔辛不允许找寻任何人。她必须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安宁。只有对汉斯不离不弃，她才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汉斯可能每年会有一两次坐在高处猴面包树上的一间小屋里，因为他面对各种情况总是表现得很得体，而不像一个性情急躁的人那样。当然被关在小屋里他得不到吃的和喝的。但是三十六小时之后他就又能从树上下来了。除此之外汉斯都在厨房干活。而且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被关在这个营地里。只不过我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在此补充了这一客观事实。我简直无法想象，人们可以在唯一的一个营地里度过五年的时间。人们在那儿都做些什么呢？成百上千的日日夜夜。成千上万个小时。毕竟我必须对这个故事负责。在开始的时候他经常被转移地点。从1947年年中开始他进了那里的营地。这听起来还可以过得去。

我自己的5年时光很快就过去了。那段时光甚至可能要多于5年。我上过前线。我被子弹击中了肩膀。那是1943年。然后战争对我来说就结束了。但是动乱仍在持续。动乱在1945年之后也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到了1947年年中，确切地说是在年末，局势才慢慢开始恢复正常。1948年在许多方面还必须进行整顿。然后在1949年我母亲去世了。我们刚刚开始重新安顿共同的生活，一切对我来说就又发生了变化。接着在1950年我来到这里接受治疗。总体说来时间过得相当快。只是在医院的走廊上和病房里时间过得慢些，因为它在那里不能自由地循环。那里的窗户排列得太紧密了。卫生防疫措施太全面了。和病毒与细菌一道时间被挡在了门外。它被街上的鞋子撞得飞溅，流进牵牛花木槽旁边的污水沟里，它带着生锈螺钉的颜色，人们用这样的螺钉把亚麻布条带固定在床架上。这些亚麻布条带是用来绷紧未打麻药而被做手术的患者的双手的，为了不让他们于绝望中去抓外科医生的手术刀。

在一个营地里时间就像棚屋上面的天空一样是静止的。因此汉斯很高兴能在厨房里工作。在那个地区没有奶牛。但是却有山羊。汉斯负责给山羊挤奶，把羊奶煮开消毒，紧接着再把它装入桶里和罐里。最后再对装好的羊奶进行定量分配。他甚至还自己研发出一套冷却系统。用一些在那里随便摆放的线圈、金属丝和晶体管。

“那这样看来他跟我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了？也就是说几乎是同样的。”

“是的，洛尔辛。我想说是这样的，你们俩……”

在看守营房的后面朝厨房方向有一个简易仓库，羊奶就被存放在那里。汉斯经常在那儿逗留。当他透过装有栅栏的小窗向外看时，他能看到猴面包树的枝杈。可惜米勒同志无法报道关于冷却方法的任何情况。他对这样的东西简直一窍不通。但是他研制的冷却装置的确让人印象至深。营地看守自豪地向每一位来访者，也包括那些只是处在押解途中的囚犯们展示这种冷却设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奢侈啊：沙漠里的冰羊奶。他们也做凝乳。有时甚至做一种冰激凌。把猴面包树上的果实的果肉和羊奶混合在一起，这个主意是汉斯第一个想到的。一种巨大的享受。囚犯们把正餐后的这道甜点称作“猴鸡尾酒”。汉斯自己给这道配方命名为“按照敖德萨方式制成的果子露”并把它记录下来。不，不要又提到敖德萨了。干脆一次也不要再提敖德萨了。汉斯把他的配方称作“勒厄的夜饮”。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指的是汉斯？毕竟人们把许多人都称作同志。归根结底所有那些在人们身旁端着步枪以射击姿势朝前线方向奔跑的人都叫同志。稍不留神，当人们转过身的时候，发现其他人都已经不在。之前人们或许在一座兵营里，又在一列火车上，接着又在一个营地共同度过了一夜。人们几乎没有时间互相讲述些什么。一车精神失常的冲锋队队员。沿相反的方向朝街道下面冲锋。像白痴一样噼噼啪啪地胡乱射击。可能都是喝醉酒了。他们无所谓四周是否有人。然后就发生了这一幕：手榴弹被扔进橱窗。人们不谈论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有谁会听。不认识任何人。人们在抽烟。然后其他人走了。对他们来说战争也结束了吗？他们也有遗留在肩伤里的弹丸吗？尽管营地的草图已绘制完毕，我还必须收集更多关于汉斯的情况。

“汉斯到底怎样？”我在第二个周三这样问洛尔辛，在她还未把窗户重新关好并朝我转过身来的时候。她看上去很惊慌。我问得太突然了。太快了。

“为何要问这个？”

很快我用双手按紧脑袋。

“你头痛得厉害吗？”

“不，还可以。小毛病不碍事。真的。只是有时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她把我的床单抚平。我让挤压脑袋的双手又垂了下来。

“你为什么要打听汉斯？”

我耸了耸肩。“你不经常想他吗？”我反问道，但我马上也后悔提了这个问题。这问题听起来完全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是想断定自己的机会有多大。我想到了那个装有营地不同设计图纸的小文件夹，我中午就已经把它藏到柜子里我的衣服下面了。柜子上锁了，钥匙在我的床头柜抽屉里。

“请原谅我愚蠢的提问，”我说道，“你当然想他。我也想念他。想念你们。对你们来说这样的情况一定很煎熬。你们认识到底有多久了？”

洛尔辛尴尬地把目光移到一边：“不是很久。”我点了点头。不是很久可能意味深长。如果让我尝试去回忆的话，我的童年时代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毫无疑问还是有许多年汇聚在一起。我之所以把童年时代感受为是短暂的，可能是因为单调乏味占了主要部分。每天都重复同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把不同的日子区分开呢？因此留在记忆中的就只有那些特殊的日子了。那些日子确很不平凡。在学校里我和汉斯是同桌。不是和洛尔辛的汉斯，而是和另一个当然也叫这个名字的人。但是当我想到汉斯的时候，我会把叫这个名字的好几个人归纳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我缩短了回忆，使我的思想显得有些正常有序。

汉斯。就一个音节。因为更多的我也不去思考。我不会去想我的同班同学。也不会想到汉斯叔叔，他本应每年至少来看望我们两次，但实际上却从未来过。一个被我叫作“大伯”的人。他是我父母在休假时认识的一位熟人。汉斯叔叔。一开始还满怀热情地被说出这个名字，在历经多年之后逐渐变成了沉闷的呼噜声。人们从未见过或者谈到过的某人，在人们记忆中都能够占据特定的、往往还不是很小的空间，这一点是令人惊讶的。

在这件事上归根结底只有对一种期待的回忆。期待他的到来。或许我跟汉斯叔叔的感情，就跟其他孩子与可爱的小耶稣的感情一样。只是在那种情况下人们要等待一生而不仅仅是几年的光景。虽然人们不会感到失望，但人们也得不到解脱。尽管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思想。我从未怀疑过汉斯叔叔。今天我在思考，为何我父母从未自己到他那儿去过。为何他们没有看望过他。可惜我无法再向我父母提这样的问题了。总归只有当人们得到正确的回答时，提问才会显得有意义。但是我母亲会说些什么呢？

“你知道吗，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汉斯叔叔，他是一个有趣的男人。他很会逗人快乐。对所有的东西他都能说上两句。我们当时在阿尔高风景区度假。一天中午在膳宿公寓里，他坐到我们桌边突然问道：你们知道希腊国歌有一百五十八段吗？爸爸起初以为他是一名政客，你知道的，就是来自安全部门的那种。或许他根本不是效力于安全部门，

但尽管如此总喜欢探听别人的底细。因此你爸爸干脆没有任何反应。我也什么都不说。比如说十亿，我根本不清楚汉斯叔叔是怎样总想到这些东西的，这个数字如此普通，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法对之加以想象。如果人们在出生时就开始数数，并且不断地数下去，那么到六十五岁时人们可能一直还没有数到十亿。总之他说了些类似这样的话。但是你爸爸始终没有任何反应。相反我却禁不住微笑了起来。如果人们能够想象到这一点。十亿。这样的数字人们其实一辈子也数不过来。可它们还是存在。但是有谁数过它们呢？我有过这样的思想。如果某人拥有十亿钱财，他究竟能花完这么多钱吗？你父亲注意到我在对上述评论进行思考，因为他不喜欢我这样，于是他就稍微皱了眉头。在皱眉时人们牵动了四十三块肌肉，汉斯叔叔说。听到这儿我真的禁不住笑了起来。在笑的时候只有十七块肌肉被牵动，夫人。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真的。第二天中午他又跟我们坐在一起。慢慢地你父亲也变得和蔼起来。你父亲一向都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他不想被扯进任何事情。这在那段时期显得特别困难。因此我们几乎足不出户。可汉斯叔叔完全不一样。他很享受生活。在这次休假中我们几乎再分不开了。在最后一天晚上我们都喝了很多酒。你父亲在我们房间的沙发上睡着了，汉斯叔叔总是向我耳语那些事情。他从未碰过我。这种情况根本就无从谈起。甚至在梦里我们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但是就跟他对生活充满乐趣的本性一样，他也时常会开些玩笑。他唯一一次想看我两腿之间的地方，到最后还不忘彬彬有礼地说‘夫人’。但他是怎样说出这番话的呀。我不由得又笑了起来。他在表述期间总会不停地穿插提及一些新鲜的琐事，比如大脑容量的80%是由水组成的，女人大腿的周长比男人的平均多四厘米。他懂得把一切都纳入一种关联。正因为如此他想看一下我的大腿。他能够把所有这些话都表述得和蔼可亲。而且我们也喝了不少酒。于是我就把裙子撩了起来。只是那么一小会儿。一个不起眼的动作。同时我一直在笑。至于你父亲，我突然不再肯定他是否真的睡着了。因为我自认为看到他眯起了眼睛。第二天我们按计划启程离开。我们俩都跟他道了别。没有评论。什么也没有。你父亲邀请他到我们这儿来。之后我们互相通信，又多次提到邀请他来的事。好的，好的，他每次都这么回复说，但他总是在最后一刻又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办。他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想不通的男人。但却彬彬有礼和乐于助人。你父亲不愿去波鸿拜访

他。此外他从未直接邀请过我们到他那儿去。如果不请自来，这样做是不得体的。”

人们只需少量细节，就能构建出整个类型。标志越少，这样的类型就越精确。上学时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汉斯几乎无法逃脱与汉斯叔叔的比较。他也就是年纪较小的汉斯。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向我证明，长大后的汉斯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会把宽宽的脑袋转向我并说道：“人的心脏在二十四小时里会跳动十万次。”只不过凭这个他是打动不了我的。就算是他用“先生”来称呼我或者替我做家庭作业也不管用。即便那样也不行。但在这之后他突然站在我们家楼下，仰起脖子朝楼上呼喊。

“楼下站着你的一位朋友。”我母亲说。

“那不是我朋友。”

“真的吗？为什么不是呢？他看上去挺讨人喜欢的。”话音刚落她已经招呼他上楼了。我跑回客厅，刚才我就在那里做家庭作业，并砰的一声使劲把门关上。

“我叫汉斯。”我听到外面他的声音。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名字。”我母亲说道。然后他们进了厨房。我母亲给汉斯倒了一杯牛奶。我把客厅门打开一道缝，越过走廊向厨房那边望去。我看不到他们俩。“人体血管的总长超过十一万千米。”我听到汉斯这么说。

“真想不到。”我母亲说。我轻轻把门关上，又坐回桌边。我想把耳朵捂住。但之后我没有听到汉斯最后是什么时候走的。外面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我开始数数。或许我能数到十亿。然后我将冲进厨房，扯开嗓子宣布说所有这些都只是谎言。一切都是谎言。最后我听到开门的声音。我母亲来到客厅。

“我根本不知道你为何抵触他。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另外他给你带来了一本引人入胜的图书。《世界知识》。这本书他已经从头至尾看了三遍。”

“我不想看这本书，”我大声喊道，“他应当回到波鸿。走开，走开，走开！”

“可你在说些什么呀？他父母在这儿生活的时间比我们还长。波鸿，真是一派胡言。我把书放在书架的顶部，可能过一会儿你就又平静下来了。”

“怎么样，那本书你拿到了吗？”第二天汉斯问我。

“拿到了，”我回答说，“唾液腺每天会制造一升唾液，现在你就尝一口吧。”说完我往他脸上吐了一口。但是当然我没有这么做。当然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压根就不是那种对答如流的人。

“怎么不回答？”他又追问道。

“拿到了，拿到了。但是我不喜欢阅读。现在让我安静会儿吧。”

于是他再次登门来取回那本书。

“很抱歉，汉斯，”我听到母亲说，“或许以后会再借一次的。”

“最强壮的骨头是股骨。它是中空的。它的承重能力比用铸钢制成的一根结实的金属棒还要更强。”

“你真是无所不知啊。”我母亲说道。然后他们俩又消失在厨房里。现在他已经让她上钩了。这个小汉斯。手段比汉斯叔叔的还要更巧妙。很容易他就把话题引到股骨上来。于不经意间他就已经切中了主题。他肯定不是因为我才登门的。他来的目的仅仅是冲着我母亲。他也想看她的大腿。为什么不呢？现在很简单他只需假装不慎把杯里的牛奶泼到她的裙子上，这样他就能如愿以偿了。我谨慎的父亲在监狱里服刑，因为他们诬蔑了他。是谁干的？这人们就不知道了。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人们也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我知道这个。从波鸿寄来一封信。一名少年间谍挨着我坐在学校班级的邻座上，为了查看这里的情况怎样。人们派他前来检验女人的大腿。从波鸿坐火车赶来到底值不值得？

“希腊国歌有一百五十八段。”我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带走了。

“他们把他带走了。”当我从学校回家时，我母亲这么说道。我什么也没想，低着头用勺子喝我的汤。在这件事上我能想些什么呢？在上学路上有时我也会去接鞋匠的儿子贝尔恩德。然后我们一块儿去上学。事情恰巧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但他至少不像汉斯那样满口胡言。我在想，或许在跟汉斯的对抗中我能用得上他。在这方面任何帮助都是受欢迎的。

“唉，这样的事情你还不懂。”我母亲边说边抚摩我的头，而我则继续用勺子舀汤喝。汤已经不是很热了。

“他什么时候再回来？”我问道。

“他在监狱里坐牢，”我母亲说，“但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

“人们告发了他。”我想象告发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被绑在一张椅子上遭受电击，以不规律的时间间隔。电流强度要大于直流电治疗时的强度，尽管在这之后人们也总会闻到一股略微烧焦的味道。马上护士就会用酒精轻敷我的额头。因为我知道汉斯对此事负有责任，因此当我父亲一周之后一直还没有回家时，我就冲着他大声喊道：“我要告发你！”一位老师听到了这个。他问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想告发汉斯，特别是凭什么证据？

“我想让他死掉。”

“所以你想告发他？”

“是的。”

“那么他应该怎样死呢？”

“我已经说过了：用告发的方式。在一张电椅上。”

老师非常明智。他放学之后陪我回家并和我母亲交谈。

“他误解了一些事情。”母亲说。

“但为何偏偏是我们的汉斯呢？”老师问道。

“是啊，这我也不明白。汉斯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

周五晚上我和贝尔恩德截住了汉斯。我们把他带到赛勒大街的一个后院里。没有人会去那个地方。后排房屋都空着没有人住。我们用一根绳子把他捆在地毯拍杆上，绳子是我从母亲的厨房碗柜里拿来的。晚上我必须把绳子再带回家。我们不能让他就那么站着。汉斯不再说一句话。

“现在他什么也不再说了。”我边说边往他肚子上又捅了一拳。贝尔恩德起初一直在笑。他跟平时一样笑得总是那么急促。因为害怕。我总共往汉斯的肚子上捅了四拳。谁也不应当看出他挨打的痕迹。但是如果走运，他的肚子里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撕裂。这会让他一整夜感到疼痛，第二天也会如此。第二天汉斯不能一块儿做操了。这个胆小鬼。他坐在操场边上。夜里我梦见人们把我带到校长那儿了。

第二天我真的被带到校长跟前。我的班主任站在办公室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写字桌旁边的两张椅子上。校长坐在写字桌后面。那两个人是汉斯的父母。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打了他们儿子。我一言不发。校长站起身，扇了我左右两个耳光。我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他说起过一些告密的事情，”我的班主任说道。然后又稍微压低声音说：“他父亲在坐牢。”

“可是，”汉斯的父亲愤怒地说，“我们和这件事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请允许我这么说。”校长在安慰他。班主任也在安慰他。我被打发回家。当我第二天早晨到校时，班主任对我说我要转到另一个班级。那个班上也有一名叫汉斯的学生。到处都有叫汉斯的。我不理睬他的话。我

在想，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尝试我都不会上他的当。就算人们给我十万马克，或者给我十亿这个我连数都数不过来的数字，我也绝不会泄露希腊国歌有多少段。绝不。

“我最近刚刚想过，汉斯现在离开的时间已经比我认识他的时间多出五倍了。”洛尔辛说。

“也就是说一年。你们认识有一年了。”

“是的，比一年稍长，将近十三个月。”

“他从未戴过眼镜，不是吗？”

“据我所知从未戴过。”

学校里的那名汉斯也不戴眼镜。来自波鸿的汉斯叔叔也不戴。至少母亲从未说起过这一点。或许他们都已不在世上。他们中谁也不再活着，也包括校长。我的班主任。汉斯的父母。他们肯定都是政客。所有人都相互勾结。但是我该怎么做呢？不要再打搅汉斯。这话说起来倒挺容易的。现在我可以思考这件事。现在我有时觉得是贝尔恩德调唆了我。我不了解那个后院。我不知道人们在那里可以不受干扰。每当我又向汉斯的肚子上捅上一拳时，他都会突然哈哈大笑一声。

“唉，洛尔辛。”我想接着说。但我根本就不知道之后应当发生什么。

有时我被直流电治疗折腾得相当精疲力竭。但是今天我只是简单地躺在床上，不用去想某些特定的事情，或者去做由医生建议甚至是规定的肌肉练习。刹那间我在想，如果我现在完全保持安静，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运动也不做，不呼气也不眨眼，那么我的肉体就会和我的闻起来稍带硫黄味道的灵魂一道浸入一种虚无。它们共同滑进一个装有墨水的大桶里，滑入一种空洞，就像分出许多病房的长长的过道那样空荡荡的。但是然后我禁不住咽了口唾液。然后我闻到了为晚饭新冲泡的薄荷茶的气味。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只是躺在那里。没有知觉。身体浮肿。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越来越频繁地产生这种感觉，即电流不仅给我充电，而且也会给我充气，让我像一只大河马一样膨胀，人们用薄的和磨损的橡胶轮胎缝合出一只这样的河马，让它在—列身着蓝色制服的少女上空悬浮。“一路平安，我的小近卫军军官，”她们在我下面唱道，“一路平安。勿忘我。勿忘我。”她们列队正步沿大街行军。股骨坚定有力。嘴唇冻得发青。在这些姑娘们年轻的时候，人们自己也很年轻。人们无法保护她们。我被黏合在一起的河马身子向上飘移。它四脚朝天倒在背上。现在我甚至都无法看到我下面发生了什么。

医生们很喜欢我的绘画。他们想知道我画在写过字的废纸背面并一再修改的平面图是什么，那些废纸是他们从办公垃圾里给我取来的。他们无法想象我在设计一些东西，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他们以为我是在开始回忆。他们希望我把回忆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因为我必须专注于对营地平面图的设计，因此当他们前来查房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快就想出该怎样回答。于是我为下一次做了准备，事先画好了一只河马。配着图画我还给他们讲述了以下故事：“我父亲当过兵。”

他们点了点头。

“他和我一样当过兵。”

他们再次点头。

“我父亲在非洲作战。那时候我还是个小男孩。在他回家时我问他：爸爸，非洲在哪儿？很远，非常远。那个地方怎么样？跟这里一样，只是有很多河马。他说的原话就是这样的：跟这里一样，只是有很多河马。因此我想象那里的村庄跟这里的一样，有街道、许多人和植物。不，我压根什么也没有想象。我根本无须想象任何东西，那里的一切都跟这里的完全一样。唯一我必须想象的就是河马。我母亲从一本书上给我指了一只河马。在动物园里我们从未成功地饲养它。”

“现在我在思考，”我继续对医生们说道，“为什么我父亲要说这些？为什么他用了‘只是’这个词？非洲跟这里一样，只是有很多河马。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我母亲也一句话不说，而只是点头和微笑。或者他根本就没去过非洲？为何他没有向我讲过任何关于土著人、沙漠、原始森林、毒蛇和村庄的情况？他不想回忆那些情景吗？人们在一个村子里拘禁过他吗？或者他点燃了茅舍，开着他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朝所有东西射击，也击中了所有的东西，除了那只河马，它因为皮糙肉厚而不会受到伤害？

“您想成为这样的一只河马？”

是的，是的，是的，这样多好啊。河马军官。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作为河马军官人们会生活得很幸福。正因为如此我在设计畜养鸟兽的苑囿。

他们还未离开病房，我就迫不及待地又拽出我为关押汉斯的营地设计的平面图，在图纸上继续画了起来。我知道：这是一招回马枪。我也不那么傻。他们现在认为我比实际上的还要更蠢。但是当人们突然向我发问时，我从来也想不出合适的回答。还在上学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在军营里也是如此。最简单的问题我好想也无法胜任。到底什么叫无法胜任呢？我简直就是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对此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持枪致敬！”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都会有所反应，而不必做过多的思考。但是在我身上却不会有任何反应。

“您现在彻底精神失常了？”

“是的。”其实所有的人都会这么想。但是他们嘴上不说。医生们也不说。他们在直流电机上校准电流。一切就是这样。他们不说话，只是转动把手。他们把红色的刻度盘转向蓝色的。他们扳转套上了厚厚的实心橡胶的手柄。我觉得这听起来就像是其中一则疯子笑话里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一只河马来接受直流电治疗……”至少我还能清晰地思维。我能准确地思考一切。我必须在医生这里弥补缺陷。如果我过快地在走廊上跟在他们后面说些什么，这只能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至于河马的事我不会这么容易就再忘却的。另外如果我父亲满口这样的无稽之谈……一名儿童的理解不会好到哪儿去。当时，也就是说当时作为孩子，作为小孩子，我想有一只这样的河马。不是成为河马，而

是自己想有一只。因为我没有得到它，也就是无法得到它，所以我想自己成为河马。很简单我找不到其他解决办法。我别无选择。我只能那样做。

这是对精神错乱所下的一种非常实用的定义：除此之外人们别无选择。跟其他精神病类型一样这种精神错乱起初也把自己伪装得非常正常。然后它在等待时机。它在夜里屏住呼吸。这是精神错乱的早期症状：窒息。这就已经意味着：有你没我或者有我没你。但是他是谁呢？我又是谁呢？然后它会寻找一处小的空缺。一个非常狭小的漏洞，为了能够让自己钻进去。整个过程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至少先前的窒息症状会停止消失，因为它现在不必再屏住呼吸了。

因为是狂欢节。因此姑娘们身着蓝色的制服，裙子的贴边处饰有白色的镶边。一大桶啤酒被装在车上跟在她们身后。我身着化装服饰。河马的脑袋比我的更大。我透过两个鼻孔向外看。稍后他们会把啤酒灌进这两个鼻孔。这样眼睛就会有烧灼感。味道闻起来也很可怕。我无法反抗，因为我被打上了马掌而不能把手攥成真正的拳头。我不停地围着自己打转。出于绝望。我想脱掉服饰，但却做不到这一点。仅凭自己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母亲消失不见了。我父亲当时已经进了监狱。被人告发。他被绑在一张半没入水中的椅子上。小纸船漂浮着穿过办公室。一名穿制服的男子站在他面前。

“希腊国歌有一百五十八段，这个我们现在知道了。但是接着来看非洲。您对非洲有何看法？”

“跟这里一样，只是有很多河马。”他们又开始打他，尽管他的鼻子已经在出血了。为什么他不多留意一下呢？他身边肯定有谁带着相机。如果人们什么也记不住，那他至少必须让人拍一张照片。

“就是那边后面的那只河马？”

“啊，原来是这样，不，那不是真正的河马。那是穿着狂欢节服饰的我儿子。他的鼻孔里刚刚被灌进啤酒。这和非洲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另

外那边那个正在灌啤酒的人是鞋匠的儿子，如果您仔细看的话。因为整个画面有些模糊。”

“我以为他们俩是朋友。他们可是一块儿袭击了汉斯的呀。”

“是的，没错。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他们这个年龄。但是以后也会这样。有时人们干脆不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如果人们感到害怕，人们就会发疯似的四处射击。人们无法预知，偏偏是这个村庄会和德国国防军勾结在一起。人们怎么可能预先知道这一点呢？没有任何指示。没有任何准则。我们总说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在接近敌人阵线时所有的准则都作废了。’在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请问如果一个男孩问到这种情况，那人们应当怎样把这一切向他阐明呢？谁也想不到他会把河马这回事如此铭记在心。我必须把两件旧雨衣剪碎，我妻子再把它们缝合起来。在雨衣正面我们用自行车车胎拼出脸庞的形状。我们为这个男孩做了一切。为什么他不能站在路边也和所有其他孩子一样招手？为什么他开始跳起舞来、斜穿跑过随军女贩的行列、让人往鼻孔里灌啤酒？河马能够把嘴张得很大，容纳一名身高一米二的儿童。那个小汉斯，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我妻子在向我谈起他时说的都是他的优点。他甚至想把一本书借给我儿子看。尽管如此我无法相信，我儿子把汉斯捆起来并打了他。在塞勒大街的后院里。那个地区实际上我儿子从来不去。另一个人，鞋匠的儿子，那个小贝尔恩德，我更相信他有能力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一点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和他父亲完全一样。事情应该倒过来才对，如果允许我说出这种关联的可笑之处的话。是他唆使我儿子那么做的。事实可能就是这样。顶多是这样。”

这正好就是我要对医生们说的。在河马这件事上情况就是如此。唆使我干出那种事的就是贝尔恩德。因为我跟汉斯没有任何过节，从根本上说没有。非洲不是波鸿。医院不是营地。事情总有一天要有个了结。我从他身上能学到什么呢？我相信，如果汉斯去过非洲，和我父亲在一个营队里待过，那么一切就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那时他还很小。还太年轻了。他后来必须首先和我去参战。然后就我所知也不是去非洲。也就是说不是直接和我一道，因为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去

了另一个班级。但他跟我属于同一个年龄段。如果我们一直在一起，他就不会开着吉普车碾过幼小的黑人儿童，而是把他们放进河马嘴里。身高不超过一米二就行。那样的话他们还真有存活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我们却没有。我们必须从土豆地上跑过。一直不停地跑。河马有一个三米长的胃，它能容纳0.2立方米的青草。因此在非洲一切看上去都是光秃秃的。草都被吃光了。人们可以清楚地一直看到前线。

“是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感兴趣。”穿制服的人俯下身来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感觉到对方把满嘴的烟味呼到了从他的鼻子淌向下巴的那道细细的血流上。

“孩子们就是这样，他们总是瞎说一气。对他们的话人们大可不必在意。”

“不必在意？或许您会这样。但我们却把孩子们说的话当回事。这些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他们有朝一日将会替我们上战场。但他们可能不会再经历战争了。我说的是可能。现在进来吧，汉斯，把你知道的讲给我们听吧。”

“河马的皮肤几乎有四厘米厚。大多数步枪或者手枪子弹都无法穿透它。”

“太好了，小伙子。怎么样，您现在想说些什么？谢谢，小伙子，你可以走了。或者最好在外面等着，如果我们又用得上你的话。”汉斯朝门外走去。我一直在问自己他到底戴不戴眼镜，但我不相信他戴眼镜。贝尔恩德戴过眼镜。至少是在开始的时候。直到眼镜破碎为止。是在什么时候破碎的？也是在狂欢节游行时吗？当啤酒通过鼻孔流到我的西服上衣上时？不，我觉得那是发生在以后。

“现在再回到您身上，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不想让您在那个男孩面前丢脸。他是同一个男孩，您的饭桶儿子在塞勒大街的后院里把他.....但是算了不说这个了。怎么了？您显得很吃惊，不是吗？”我父亲只能吃力地说点儿什么。他被折磨得很虚弱。他嘴唇发干。他失血过多。再

加上电击的折磨。他被绑在椅子靠背后面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抽搐着。穿制服的人把他的耳朵贴到离我父亲的嘴唇很近的地方。

“您说什么？我什么也听不清。我请求您说话声音大点儿。证据可能是确凿的。您的儿子故意装作不知道。他更愿意让自己保持愚蠢和一无所知的状态。让自己躲在客厅里。不愿意看那本书。而现在呢？现在您必须通过第三方获悉书里的知识。四厘米厚的皮肤，这可不是小事。三米长的胃。然后呢？”穿制服的人透过铁门向外面的汉斯吼道：“你在哪儿，小伙子？”汉斯从板凳上跳了起来诵读道：“在所有今天生活在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当中，河马庞大的身躯仅次于大象。它的体型比犀牛的还要更大。河马的体重最大可达3.6吨。它和猪有亲缘关系。它能够把嘴张得很大，容纳一名身高一米二的儿童……”

穿制服的人又转向我父亲，用戴着黑手套的右手抓住他的颌骨并把它压紧。我父亲发出呻吟声。“您听到了吗？和猪有亲缘关系。好了，现在继续。或者您希望我们把您自己的儿子叫到这儿来？让他穿着狂欢节服饰？身上散发着啤酒的臭味？酩酊大醉？步履蹒跚？他在左侧马掌里握着一面小梳妆镜，用这面镜子他企图往随军女贩们反正也太短的裙子底下偷窥。用一把米尺他打算测量她们大腿的周长，为了从中计算出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空（我要强调一下是中空的）的大腿骨，也被称为股骨的直径。您到底觉得谁会站在您面前呢？”我父亲尝试说些什么。但从他嘴里出来的只有一声咳嗽和一些血液。

为什么我单单作为河马去参加了狂欢节游行呢？一切都是由此开始的。仅仅是因为我不想作为军人去那样的场合。也不想作为水手或者海盗。但我可以作为黑人去那里的。作为被烧焦的黑人。作为被吉普车轧扁的黑人。我的肚子被吉普车碾轧出三米长。我的嘴巴张得很大，以至于它能够容纳一名身高一米二的儿童。

河马知道尼罗河的入海口在哪儿。但它们不会泄露秘密。人们可以好几个月暗中守候它们。它们只是把沉重的脑袋转向人们，身体慢慢滑入水中。但是它们不朝入海口方向游去。它们会严加提防。它们知道自己早晚必须死亡。人们无法开枪射杀它们，但却能用一块岩石把它们砸死。或者用一个羽绒枕头使它们窒息而死。用一个大羽绒枕头。

用一个天堂枕。用一床鸭绒盖被。它们躺在通常只是中空的股骨上，让它承受巨大的压力。它们的股骨能承受比坚固的钢铁更大的压力。这不是在开玩笑。一名发育充分的男子可以把自己撞向它们的股骨。全力砸向股骨。当父亲在睡觉的时候。或者假装在睡觉。因为演唱希腊国歌而感到疲惫。我亲爱的歌咏协会。很快再往绷带后面倒一杯烈性酒。再倒一杯。然后像布吕歇尔号战舰一样向前划动。唰啦，唰啦。但是股骨，它能承受这些。毫无疑问。承受整个汉斯叔叔的重量。还有最上面小汉斯的重量。小汉斯总是让自己固着在上面跟着摇摇晃晃地前进。带着他的书呆子脑袋。里面装着世界知识。这些知识已经有几公斤重了。但他却对此浑然不知，这个侏儒。他不知道现在玩的是什么游戏。他先是跟着学说一切。然后再把一切泄露出来。当然为此他必须被痛揍一顿。我们没有把他折磨致死，对此他应该感到庆幸才是，这个无足轻重的家伙。这些毕竟都是秘密情报。我父亲只把这些情报告诉了我。只告诉了我一个人。河马。尼罗河。

星期天上午11点刚过，当常去做礼拜的教徒们参加完弥撒回来、人们在大街上不那么显眼的时候，我朝墓地方向走去。如果人们问我去哪儿，我就回答说：去我母亲的墓地。方向没错。但事实上我是穿过了法尔肯霍斯特大街，为了去查看制鞋厂破损的橱窗玻璃。我不熟悉法尔肯霍斯特大街。可能是有一次我在去墓地的路上碰巧走过这条大街。这完全有可能。两个女孩在她们之间手持一根卷起来的跳绳，一直等到我从她们身边离开。用这样的一根绳子我和汉斯把贝尔恩德捆得结结实实。晚上烤土豆的味道弥漫在院子上空。打短工者杯中烈性酒的蓝色蒸汽从黝黑的窗户里飘荡而出，像棉花糖的细纱一样缠绕在晾衣绳四周。虽然我只是捶打了贝尔恩德的腹部，但从他的嘴里却流出了一些血液。他让脑袋下垂，为了使我能够停手。当这样做不起任何作用时，他就干脆屏住呼吸。他一直屏住呼吸，直到我们给他松绑。然后他瘫软在地上。我们抓起绳子跑出了院子。在家门口我们分手了。我们再次见面是在手里端着步枪前往前线的路上。贝尔恩德省去了战争的烦恼，他也不用上前线和躺在伤员营房里。尽管如此我无法相信，人们会因为腹部遭受了四次击打而丧命。

第二天早晨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贝尔恩德的父母身着黑色西服上衣和黑色女套装坐在写字桌旁边的两张椅子上。母亲的眼睛哭得红肿。父亲没有看我。校长想知道我昨天是否看到过贝尔恩德。

“没有啊，”我说道，“怎么了？”

校长只是摇了摇头，把我打发回班级。然后汉斯也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我不再有时间向他悄悄嘱咐些什么。下午我们列队站在贝尔恩德的灵柩前面。他一直还在屏住呼吸。有人拭去了他脸上的血迹，给他穿上了他大哥的坚信礼礼服。礼服对贝尔恩德来说显得太大了。即便是挽卷起来的袖子也盖住了一半他交叉放在肚子上的双手。紧接着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一块由贝尔恩德的姑姑自己烘烤的上面撒有黄油、糖和面粉的碎粒发面糕点。她抚摸我们的头顶，用充满同情的眼神看着我们。汉斯咬紧牙关。我听见他的颌骨在咯咯直响。在外面的花园门口他把他那块碎粒发面糕点塞到我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在考虑是否贝尔恩德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是因为手底下有我在击打他时留下的伤痕。我在出拳击打时感觉他的腹部非常柔软。人们怎么可能往一些柔软的东西里打出一处创伤？甚至打出一个窟窿？人们可以在头上打出一个窟窿，但即便如此这样的洞往往也不会很深。人们绝不可能往窟窿里瞅并看到大脑。但为什么据说有人就是因为腹部挨了四次击打而死的？为什么有人应当打碎一家制鞋厂的橱窗玻璃？为什么人们应当怀疑这些事情都是我干的？

营地已基本设计完毕。它几乎可以说是完工了。我只需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以便把设计图纸展示给洛尔辛，把一切向她解释清楚。周一我也必须向医生们解释一些情况。特别是关于我母亲的事情。我能说我就是周五忘记去看她了？这样说可信吗？但是什么是可信的？在坟前我至少什么也不必解释。这是一个好处。一个细微的好处。坟墓作为解释就已足够了。所有其他的理由都会沉寂。在坟前人们不再想起任何事情。人们交叉双手挡在肚子上的窟窿前面，俯瞰鳗鱼的脑袋，它正从缠裹它的报纸里探出头来。然后人们做一番祷告。父亲在祈祷中现身，他被捆绑着坐在地下室的一张椅子上，在为我的罪孽而死

去。人们告发了他，为此现在电流正流经他的四肢。尽管那只是电流，但却有血液从他的嘴里淌出。就跟贝尔恩德的情况一样。

有时晚上我下楼去守夜人那里，和他一块儿抽支烟。“有这么一种情形，”我对他说，“我觉得许多人之所以死去，是为了使他们的生活恢复某种秩序。”他没有看我。“有时候在人们之间存在太多联系。亲戚。熟人。孩子。父母。最好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死去。否则其他人不会有任何成就。您不觉得是这样的吗？”他一言不发，只是抽他的烟。“但是也不一定非是死亡不可，”我说道，“在死前人们会患病。疾病也是一种秩序。另一种秩序，但尽管如此也是一种秩序。一切都有秩序。”我指的不是秩序，而是关系。但我没想起这个词。

我父亲死了。我母亲死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生活恢复了某种秩序。闻起来像是被雨淋湿的冷杉树枝的味道。我走在街道的另一侧。但是一切我都辨认得很清楚。他们把两大块木质板材放进橱窗里，再用木板把橱窗钉住。玻璃碎片被扫成一堆。没有烟的味道。常去做礼拜的教徒们盯着我看。他们在仔细打量着我。我在路过时朝他们点头示意。这时那名守夜人和他的家人走了过来。看来他是个虔诚的男人。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他都需要一种信仰。他试图和他的家人避开我。他有两个讨人喜欢的小女孩，年龄不超过八岁。她们手里没有跳绳，而是拿着用黑色护书纸包好的赞美诗集。他有一位和蔼可亲的妻子。她拎着一个带金色卡槽拉链的手提包。我的包里装着一条裹在报纸里的鳗鱼。我友好地微笑着。

因为我不再信任那些医生，于是夜里我从病房里溜出来去探访那名守夜人，他穿着轻便大衣坐在前面入口处的玻璃房里。一次我头晕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我不得不一直不停地往前走，直到我穿着浴衣站在外面门口的瓢泼大雨中。或许是因为直流电治疗的缘故我没有感觉到下雨，但尽管如此我当然还是浑身湿透了。这时守夜人赶来把我又领回房间，给了我一条毛巾让我把身上的雨水擦干。此刻他对我来说就像是那些英雄和神话英雄中的一员，他们不断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因其高大结实的身材和稍显单纯的本质，他令我回忆起希腊神话中囚禁了奥德赛及其随从的独眼巨人。我甚至还画了一张他的素

描。人们在画上看到守夜人坐在他的小房子里。只是后来我不得不毁掉这幅素描，因为当洛尔辛来看我的时候，令人气恼的是它竟然公然摆放在那里。她不当觉得这幅画和她的汉斯以及关押汉斯的营地有什么联系。营地平面图设计得非常成功。洛尔辛眼里噙着泪水。她无法再摆脱平面图的吸引力了。整个晚上都做不到。我不得不一再向她解释所有的细节。

“这里右下方是运送囚犯的卡车到达的地点。然后囚犯们必须从车上跳下来，被带到这里的两间临时木板房里。在那里他们必须脱掉衣服。他们必须上交自己的衣物。然后人们给他们理发。然后他们必须穿过一个被称作橡皮管的通道去除掉身上的虱子。这一切人们从外面是看不到的，因为人们用冷杉嫩枝从外部做了伪装。卡车的发动机被接在橡皮管上，它把除虱剂通过橡皮管吹进浴室里。之后他们必须上交镶补的金牙，因为营地里的气温会变得很高，这会使黄金熔化，由此可能对他们自己造成伤害。而人们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他们就可以休息了。休息时他们躺到一副大炉架上。这种炉架是按以下程序被生产的：人们不再需要的废旧铁轨被架在一个沟槽上。下面的沟槽里点着一堆火，囚犯躺在上面的铁轨上。”

我从洛尔辛的神态看出，我的讲述使她平静了下来。然后我们又审阅了其他细节。树上为单独囚禁准备的茅草棚。警卫人员的营房、厨房等等。高大的围篱。我感觉发烧。继而又感觉发冷。当洛尔辛打开窗户，为了把那两小瓶牛奶和那瓶可可饮料放到窗台上时，我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抚摸自己的上臂。后来在她走了之后，我躺在黑暗中感觉自己滚烫的脸颊。现在又多了一种秩序。她离开时把那些图纸带走了。所有的图纸。无一例外。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好处，因为现在不会再有人向我提出任何令人无法理解的问题了。我甚至还把我的迷宫草图也一块儿给了她。在那些草图的设计方面我没能取得进展。各个局部无法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地下室入口，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赛勒大街后院的一个地下入口。然后是台阶。许多台阶。多条通道。确切地说是竖井。带门的井状构造。钢门，或者门上配有沉重的锁头和门闩。随便在某处有一个小池塘，里面有一条鱼在游动。一条电鳗。一种危险的动物。不可食用。狂欢节结束之后封斋节又来临

了。虽然我父亲不信教，可那名冲锋队军官还是从池塘里捞出电鳗，把它淌着水举到我父亲的太阳穴旁边，他跟平时一样被捆绑着坐在椅子上。

1951年当然还远未结束。只是这一年剩下的时光我再回忆不起来了。或许我坐在我的房间里，等着有人来把我接走。我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如果我能坚持到岁末年初，一切就将因法定时效届满而失效。每一次岁末年初都像是一次升降级。达到年度学习目标并非完全不重要。它涉及的是秩序。如果人们留级就会产生混乱无序。不仅仅是混杂在其他事物当中的另一个年级和完全另一种生活。难怪那名党卫军士官会变得不耐烦。他是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男人，因此必须信赖规律性。使这样的人感到不安是很可怕的。就连医生也无法安慰他。至少他们上过大学。他们把直流电机上那两个刻度盘不断地反向推移。但这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填充表格和撰写报告，但他们也无法使我变得更加年轻。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当然人们希望会是这样。毕竟已经有了初步的构想。假设人们可以从我的记忆里删去一年，随便某一年。或许从每一年里拆去一个月可能也就够了。就像从今年里减去一个月一样。

摘自理论家们的观察记录

因为理论家们对世界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因此他们在这个世上待了下来，保留了对世界的最后决定权。

理论家们历经多年通过他们的思考形成了特有的脑袋，他们把这样的脑袋隐藏在飘垂的头发下面。他们在西服上衣的马甲里面穿着印有黑色蔷薇的衬衣，以示范性的形象穿梭于形形色色的社交场合，但也不会丧失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分析思维能力。

理论家们觉察到名称的意义，几乎是强行使自己屈从于这种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没有能力在任意一家餐馆从菜单上挑选一道菜，或者像每一个普通人那样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进一家商场，在那里给自己选购一瓶剃须后使用的香液。因为理论家们在四十五岁之前都和他们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之后又由一名昔日研究所的女秘书照管，这样他们的衬衣和裤子总是以熨过叠好的形式摆在铺了新床单的床上，所以在他们的思维关联里不会存在对某一种可能性欠缺的想象，故而他们也就不会全力考虑本体论需求。

当然理论家们知道，名称作为某一事件的名称是不会化为概念的，它不会同时凸显自己在意义方面的盈余和欠缺，但尽管如此他们有时也会谈到，在布鲁诺·瓦尔特之后所有对于马勒音乐的演出和录音，也包括对此强烈的批判都是垃圾。如果人们指出他们表述中的平民主义特征，他们就会立即反驳说，沉默仅仅是为了用客观事实的状况，使自己主观上的无能合理化，并以此把客观事实再次贬低成谎言。数字录音技术和新的演奏理论都同样拒绝了这样的认识。

对理论家们来说真实的历史消失在历史性背后。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解放，他们以一种放松的心态翻阅其他学界同行制作的相册，并自己把这种心态描述为是透光的，他们仅仅注意到不断发生变化的光线比

例和领带款式，但却感知不到在被拍摄对象看来那种不可避免的悲剧。这种每周五在吃午后甜点时所进行的欣赏旨在对建构世界的本我实施转移分权，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做法是史无前例的。

先前认识论方面的见解几乎一夜之间使某些体系变得不可接受，几乎尚未发展成熟，它们就使理论家们陷入那种存在危机，通常思想家就是因为克服了这样的危机而显出自己的不凡的。否则人们也可以马上去当海员或者成为车辆制造者，尽管车辆制造者的职业早已被铁匠的职业所排挤而变得过时。恰恰是车辆制造者和理论家这两种手工职业显示出了不容低估的共性。这两个行业生产的产品都承受了巨大的负荷，这就要求对材料的选取要谨慎细致。此外车辆制造者不仅制造轮子，而且也生产底盘，这也同样把他与理论家联系在了一起。“制造车辆骨架者”这个名称在不同地区代表的就是车辆制造者，它同样可以用来描述理论家自身。而且他们俩也都与街道清洁工有关联，如果人们把重音放在Kehre（转弯处）上，把街道理解为是通向转弯处的路径。

在第一次神经崩溃之后，理论家们谨遵医嘱在一家山地疗养院休养居留，在那里人们注意他们的饮食，对他们进行浴疗，使他们身体变得强壮。还没等到身体复原，他们就在返乡的时候和他们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父亲要把他们逐出家门。因为理论家们拒绝离家，并示威性地把自己关在浴室里，于是父亲仓促启程踏上一次旅途，但他再也没有活着从旅途中归来，因为他还在第一次乘船航行时就死于胃出血。理论家们并未通过此事受到太大的触动，但在随后的冬天却患上了失眠症。他们感到精神紧张，很容易变得激动，此外还倾向于间歇性发热。在装饰圣诞树时一种瘫痪无力的感觉在他们的胳膊和肩膀处扩散开来。他们被从狭窄的踏梯上搀了下来，在瑞士和意大利度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在那里他们上午开着一辆敞篷车以步速驶过街道，赞赏两旁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下午他们躺在旅馆的沙发上，尝试什么也不去想。几周之后他们的状况有所好转，他们鼓起勇气去翻看第一本书。那是一部消遣性小说，因为在这个时候看他们专业领域的作品可能会导致疾病的突然复发。

好像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坦诚，理论家们全都死于他们时代的疾病。他们在鸦片的作用下让自己在家门口被一辆汽车撞倒，有时也在听完歌剧回家的路上，胃里除了一杯基尔酒什么也没有。直到最后他们还坚持认为，不是死亡从他们手里夺走了笔杆，相反倒是他们迎着死亡让自己的思想深入死亡之内，这样看来步伐本身描述的无异于那些偶然性事件中的一件，反省必须用这样的偶然性事件来衡量自己的敏锐程度。此外理论始于死亡艺术是不无道理的，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就已得到说明，也就是身体在死亡状态下第一次静止不动，它不再用愿望、感受和欺骗性的想象来打断思维过程，因此完成了理论家们本来就开始做的事情。

当然这一切都是纯粹的理论，因为意识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过于软弱，而无法承受死亡的打击，因此它会陷入昏迷，往往根本就不再恢复知觉。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和宗教在死亡中再次碰面，因为理论家们思考的问题即他们怎样有意识地挺过死亡，在以前就是宗教问题，但是该问题过多地纠结于对彼岸的幻想，而不是以事实为根据。额外再把这一变戏法者的把戏作为对死亡的克服加以兜售，从那以后这对于理论家们来说有些过头了，因此他们脱离了宗教信仰上的行列，确立了自己的思维方向。要是人们能够赋予这一问题本身一种可能超越回答能力的价值，干脆咩咩地喊出“死亡，你的毒刺在哪儿？”该有多好，可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该发生的事情终究是要发生的，这一点理论家们当然已经预见到了：宗教必须为其思想逻辑上的错误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对于宗教而言死亡越来越坚定地成为他者的死亡。理论家们暂时吸收了这一思想，但在仔细考虑之后又摒弃了它。紧接着宗教在其最后的发展阶段蜕变为精神上的指导，具体说来就是人们为他者的灵魂担忧，在他者垂死之时坐在他的床边，把圣体递给他，通过对最后几件事情的处理让他对失去知觉不再觉得那么明显。看到这样的荒谬，理论家们感到非常震惊：在涉及意识方面宗教所鼓吹的恰恰是相反的一面。教会分裂已成定局。壕沟已无法填平。

尽管如此这一决裂对理论家们来说也表明为灾难性的，因为它是由一种举措导入的，这种举措已无法再被介绍给非常仔细地关注理论家们一举一动的观众。很久以来人们总归想要的是具体的建议，最好是一

种配有葡萄酒和酥脆饼干的生活艺术。如果不是具体的建议，那么至少应该是富有思想性的超验和形而上学，它们不能让每一个人一下子理解，但却令人神往，主要是令人惊异，以至于人们禁不住大声喊道：人们必须要想到这个。但是理论家们没有想到这个。他们所想到的丝毫不令观众感兴趣。因此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在宗教的帮助下人们继续死亡，为了使精神得到满足，出现了所有可能性的江湖骗子，他们往往以箴言的形式而出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古希腊人的翻版，只是融合了一些启蒙认识而已。这样的箴言适合做日历页，或者适用于那些通常在小市民氛围里探讨存在话题的场合。

但是理论家们也有哪些其他可能性呢？成为奥特尔塔尔公立学校的教师，在那里乡下学生因固执的榆木脑袋动辄被扇耳光？理论在传授方法上必须与学习对象相适应，这一点不论是学校的督学还是学生家长都不明白。可能在一所英国高级中学里被赏识的东西，比如在不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解释一种理论的思想过程，这在配有绿色写字石板的狭窄的木板房教室里更像是毫无目的的离题乱说，它与当地那位老教员的授课没有什么区别，他在开始上课后不久就不按教学计划的规定授课，而是聊起了战争和过去的时光。此外人们还要坐足足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一座小城，它在一个放映厅里每周一次播放一部影片。但是理论家们需要这样的影片作为对他们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教学活动的必要调剂。电影越无聊越好。只是出入带有封闭小间的娱乐场所当然是被禁止的。在美国西海岸的一次巡回报告期间或许人们想满足一下这样的兴趣，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操用一种与自己思想语言不一样的用语，用这种语言说出的名称显得像儿童般简单，而且还可以在一个铺设有黑色天鹅绒的迷宫里，在里面一只陌生的手突然抓住人们拖拽着他行走，人们不知道他将被拽往前面还是后面，这会在短瞬间使人们摆脱对彼岸问题的思考。

理论家们很少从可怕的梦境中醒来，梦里他们在高度现代化的医院里穿过镶玻璃的通道瞎跑，并使用相反方向的滚动扶梯。就像是被魔术师的手变回到童年时代，他们把小脑袋从一个地洞里透过一道栅栏挤出来享受外面的自由世界，在看到母亲扭曲变形的脸庞时已经太晚

了，她正手执一把木槌朝他们的方向拉开架势。旅馆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混乱，必须要由谁把这则关于一名失踪儿童的消息转达出去。

幸亏窗台上只积了几片雪花，书籍和笔记本跟平时一样都放在床边，理论家们一个人待着，再一次逃脱了命运的打击，但自己却回忆不起来有这么回事。只是一切看上去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未来对他们来说不再显得是可被巡查的了。在这方面涉及的不一定非是一位被仔细遮盖好，从外观看不出任何创痕，但尽管如此用相当熟练的手法被扼死的女士，理论家们虽然几乎手无缚鸡之力，但另一方面脖颈作为典型的身体和头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其构造又是如此敏感，以至于即使是一次软弱无力的抓拧和最低程度的推移也足以招致死亡。

鉴于一次由他们自己实施的谋杀，理论家们干脆开始陷入沉思，而不是采取必要措施，把案情通知警方，并告知给他们治疗和熟悉详细情况的医生，这样做对理论家们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恰恰在这件事上不是从司法、法医或者精神病理学层面，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讨论不断产生的辩解和问题，这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如果不是在这样的存在时刻，那人们应当怎样最终取得认识上的进步呢？究竟什么叫“神志不正常”？那种猜测又是怎么一种情况？即认为那名与理论家们多年关系密切的受害者早就暗示了她对生活的厌倦，这样理论家们可能只是满足了她的一个愿望，把一种潜在的对于死亡的渴望转化成了行动，无论那种渴望怎样来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把这种情况应用于反省的客观对象，可能会导致令人生疑的结果。或许客观对象渴望在概念层面上被保留，渴望从具体向一般的转变，因为它简直厌倦了自己的独特性，而理论家们恰恰让这样的独特性来支配他们，让自己成为实现一种蕴藏在客观对象内部的更大能量的帮手，这样的客观对象表面上看总是显得很无辜，尽管恰恰是它们在理论家们的思考中确保了自己的主观性特征。难道仅仅是理论家们因为找到了一具尸体和缺乏具体的回忆而表现出的那种玩世不恭，使得他们不想把不断涌现、越来越强的思维能力用于自我辩解和自我捍卫，而是把这种思维能力引向他们所熟悉的、被铺平的反省轨迹，为了赋予他们的理论必要的存在特色，使之摆脱那一指责，即理论是与真正的存在并行的

游戏？因为当理论家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应当通过思考而非行动的方式抓住这样的机会。

不知什么时候理论家们理解了一切。通过重新解释物质的理论要素，他们能够让神学为自己效力。更有甚者：想象并改造客体的主体被主体间性沟通的构想所取代。但这为最后一步做了准备，也就是说理论家们断定，客观事实都是语言构造，对它们的真正认可仅仅基于社会约定，总体来说是基于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而绝非是基于一些真实存在的东西。因此在九月份的一个下午，理论家们合上他们的草稿本站在窗边。房屋沉浸在一束黄色的光线里。院子里一个男人把被风吹落的第一批桦树叶扫成一堆。理论家们往唱机上放上一张唱片。播放的歌曲是《大地之歌》。他们抽一支烟，把用过的杯子放进厨房的水槽里。然后他们接连拨了两个电话号码。第一个号码占线，在拨第二个时对方的自动答录机开启了。理论家们在沙发椅上坐了足足一个小时，凝视着前方发呆。在一种特有的寂静中外面天黑了。理论家们站起身来伸展四肢。他们走到书桌边，从桌上拿起几本书，把它们分类放到书架里。因为他们的电唱机没有歌曲播放完毕后的自动关闭功能，因此他们突然注意到一种咔嚓声，这让他们回想起他们忘记了关闭唱机。但愿金刚石唱头磨损得不太厉害。为这种过时的产品系列买到备用唱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从唱机上取下唱片，把它装入封套。完全是七十年代早期的风格，唱片封套上印有马勒的青铜头像和一张照片，照片上展示的是树木的黑色剪影和被风吹进夜色的残云。乍一看几乎很抽象，但仔细观察会发现画面非常清晰。理论家们把唱片归类放好，并把放大器关掉。然后他们在写字桌旁坐了下来，为了把他们理论的一些细节刻画得更加清晰。

对谋杀的回忆不是梦幻

一天早晨我们在去上学的路上得知，人们在亨克尔公园里发现了一具被谋害的女尸，只有两路有轨电车通到那里，除了一处栽有几株白杨的草地、一个周围栽植了花坛的面积较小的青石露台、几张被嵌入地上的座椅之外，公园里再无任何其他东西。几乎还没等到放学，我们就跑到事发地点，自认为从地面上深色的污渍看出了遇害者的血液，从灌木丛里随风飘动的碎布片辨认出死者的衣物。从那时起我们到处都能看到死人和尸体部位：从拖拉机上掉下来的甘蓝叶球，脱掉挂在脚架上的工作服以及地下室入口处被卷起来的油毛毡。我们在晚上聚会时也把各自的发现物一块儿带过去：一个肯定属于遇害者的空钱包，一片凶手丢弃的折断的刀刃，一顶弄脏的帽子或者一个烟头。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圣人的遗物，然后又是间接证据，我们充满敬畏地把它们装在一个盒子里保存在工具棚里，只是有时把盒子从盛装土豆的破麻袋下面抽出来，为了证实一下我们对这起谋杀案的回忆不是梦境。

我们偶然听到一些讲述，说那名受害者是一位有声望的医生的夫人，她是市政广场演讲者协会最初的几名成员之一，事发时她赤身裸体，尽管被折磨得够呛却还是面带微笑。当时在观察我们的发现物时，我们在思考成年人的讲述里不断出现的“被折磨得够呛”可能是什么意思，很快这些令人害怕的阴森森的讲述就与性领域联系在了一起：紧抱在一起无法再分开的情侣，每月一次从女人的性器官里流出的血液，她们用绷带截取这些血液，并尝试在夜里偷偷地把带血的绷带随便扔到某个地方，人们从我们身上一些不知名的特征能够看出谁是私生子，在偷窥一个裸体女人时眼睛变瞎，在碰巧遇到一对彼此相拥躺在大黄荃田地后面的情侣时裆部被踹。但是前面提到的那种折磨要更严重，它是对无节制的欲望的处决，是剖开一只动物的肚子，是使人顺从，正如后来我在位于那两棵巨大的橡树之间的塔楼里、伴随着缓

慢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光脚步所想象的那样，当时我想到了带洗手盆的客厅，我看到血液流进了洗手盆，还有剩余的蛋花汤。

询问譬喻

我感到如此眩晕。

眩晕？

是的，您不知道这种情况吗？如果一切都在旋转，人们无法再找到辨认方向的参照，一切都在相互推移碰撞？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经常出现这种症状？

对，是这样的。然后还伴随着精神烦躁。还有心率过快。

或许您应该去找医生看一下。

是的，我应当去就医。很显然。

不要总尝试一个人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会使人们不堪重负。

是的，没错。我经常感觉对自己要求过分。

因为您把一些原本必须被说出来的事情憋在心里。因为您终于必须让自己摆脱整个过去的历史。我说的对吗？

您说的肯定对。肯定有道理。如果我确信自己真的能够彻底摆脱一切，那么.....

那么您也会招认的，不是吗？

什么叫招认。忘记一切是不可能的：公园、秋日的树木、收音机里播放的布莱恩·威尔逊的歌曲、雾气、周六公路旁边走不完的小路、傍晚时分，当人们穿过从城市里慢慢升腾起来的夜色走回到停车场时，当

人们还在对不同的事物表达看法时，人们意识到事情已经结束和过去了，尽管它还要持续数周、数月有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人们整晚坐在家里思考，是否同情或者任意其他一种感觉也就足够了，因为人们不想放弃希望，因为事情是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

您现在说的是一种譬喻吗？

一种譬喻？

是的，对红军派恐怖活动的譬喻，对您的恐怖行为的譬喻，对当年出现差错并让你们分道扬镳的所有事情的譬喻。我很愿意相信这一切都与最初计划的不一样，我甚至愿意假定您的意图是良好的，在我看来您也被附着了相当程度的单纯，它让一切都从您的指间滑落。

这不是譬喻。您知道，如果人们甚至都不能两人一起把事情做好，您理解，如果人们甚至都无法与他所爱的某人完成某事，即使人们认为自己的生命就取决于此也无法做到。如果人们甚至都不能在那种情况下把事情做好，甚至都无法在那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知道您指的是什么，但或许您的要求太高了。您知道布莱恩·琼斯.....

布莱恩·威尔逊。

没错，是布莱恩·威尔逊，布莱恩·威尔逊也接受过电休克疗法，布莱恩·威尔逊也常年病卧在床，布莱恩·威尔逊也不再有所建树。

正是这样，虽然布莱恩·威尔逊也没能成功地.....

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成功了。

是这样的。

但首先他必须跌入低谷，必须承认事情无法再取得进展，必须失去他的两个弟弟，就像您失去了贝尔恩德一样，必须被他妻子抛弃，就像

您被克劳迪娅和格尔妮卡所抛弃一样，必须走上所有的歧途和错路，吸毒，酗酒，还有真正的精神错乱，不是您自我标榜的那种，在那种状态下您一直还能同时过相当正常的生活，这种精神错乱伴随着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裂冲动，幻觉.....

您想影射什么？

如果他没有遇到尤金·兰迪，他为他冒了一切风险，他全部的事业，他的职业道德，因为他明白了在这里他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因为在这里他必须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照顾他的病人，把他逐渐引入一种新的生活，因为否则的话事情就会失败，绝对会失败，面对所有可能性的复发人们的心情已经足够沉重了.....

您想说的是，您对我来说可能会扮演尤金·兰迪那样的角色？

在此期间我们彼此也都很熟悉了，您看到了，我是愿意真正理解您的，此外这样做您又有什么损失呢？一辈子在恐惧和孤独中度过，把事情搞砸，对形势判断错误，被驱逐流放，伴有心率过快、眩晕和足痛风，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呢？为什么要抱定这些不放呢？

或许您说得对。仅仅是因为我无法想象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最后的回忆。《让我更强，金凤花》那首歌开始的节拍，我能向您描述1969年狂欢节的每一个细节。四旬斋前的星期一学校放假，星期二我们修学旅行，女孩们身着男士外穿衬衫，她们往衬衫上写上了“和平与爱”“滚石乐队”和“奶油乐队”的字样。

克劳迪娅也在？

克劳迪娅也在。然后我们去了爱思恩汉德。

但是您只穿了您的连帽风雪大衣？

是的，虽然我原本还要穿佩珀军士戏服的。

是明爱会那位女士给您缝制的那件红色的丝绸戏服？

不，那是在那次活动的前一年穿的，当时我母亲身体还很健康。那个时候她还织了很多毛衣。也给我班上的女孩们织过。她们都想有一件像我穿的那种套头毛衣，然后我母亲也给她们每个人都织了一件，但是当然不是给所有的人，而是只给克里斯蒂安妮、玛里昂和加比三个人。但是我刚刚意识到，她们从未穿过我母亲织的毛衣，而且我从未想过她们或许只是想拿我开玩笑。

为什么她们会那样做呢？

是啊，为什么呢？这我怎么知道。但是有这种可能。或许这是那些让我上过当的众多圈套之一。只是又多了一种，反正也无所谓。不管怎样我们在修学旅行那一天玩了躲避球游戏，或者类似于躲避球的游戏，用的是雪球，女孩对阵男孩，最后只剩下我和克劳迪娅。然后我让她向我掷球。

您本来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

不，我就是对一切都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不能向她掷球，这就像是一种模式，您知道的，我也刚刚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一生都在坚持这种模式。我总是让别人向我掷球。

您看吧？

什么？

您自己意识到了，在我们的会话中您是怎样想起越来越多的事情的，一切对您来说是怎样变得清晰的，这是每一次痊愈的前提。

痊愈？我不知道。已经有那么多人向我允诺过这个。

不是真的允诺，对吗？

不，不是真的。相反，就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没有人向我保证过这个。我总是把这个寄托在某人身上，寄托在某个女人身上，但她只是又一次把球抛给了我——从双重意义上讲的。

您认为这样您会得到奖赏？

是的，大概是这样的。

当然这是多么幼稚啊。

极其幼稚。

但尽管如此您不断地把这种幼稚的希望寄托在新的人身上。

正是这样。

并一再感到失望。

正是这样。

恰恰是这一点更说明了我们俩应当共同做出尝试。

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对我您不抱希望，您做好了对付我的准备，您不指望我做任何事情。您与我对抗，可您还是当着我的面才回想起所有可能的事情，比如那个狂欢节星期二……

是的，那个星期二，但是您想影射的是其他事情。

贝尔恩德，他也曾经尝试成为对您来说像尤金·兰迪那样的人物，把您完全置于他的羽翼之下，使您摆脱一切，和他待在法国，二十四小时完全受到监控，或者像其他人可能会说的那样，彻底洗脑？

事情就是无法成功。

什么事？

治疗的事，涉及我们俩的。不管您的建议出自多么美好的意愿，我甚至应该欣然接受才是，因为您在许多方面都说得有道理，但是它不会

成功的，请您相信我。对我来说不会，对您来说也不会。

可究竟为何无法成功呢？

因为您是男的。

什么？

因为您不会真的向我掷球。您不会真的打中我。您明白吗？

您这么肯定吗？

成年青少年从埃彭多夫大学附属医院人格障碍专科门诊部主楼居高临下的演讲

内容涉及之年月顺序已不复存在

尊敬的到场来宾，亲爱的病友，尊敬的教授先生，尊敬的诸位男女医生阁下，在此我想衷心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就像多年前阿比·瓦尔堡在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医院所做的关于蛇仪式的演讲那样，站在你们面前，同样是以演讲的形式，来证明我不断的康复过程。

你们可以相信我，我非常清楚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的意义，因此我充分利用了过去几周的时间，为了找到一个在效果影响，尤其在承载力上适合在这里向你们描述的话题，从这个话题上你们不仅能够认识它的内涵层面，而且还能重视我个人和它的关系。在这里展现的乍一看非常合适，而无须再次与那篇对《橡胶灵魂》专辑所做的分析建立起联系，那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当然是以当时不成熟的方式早在四十年前就已做出的分析，根据那篇分析人们会觉察到一种发展趋势，但却不会否定我个人的历史。

然后我又想，好像是为了纪念阿比·瓦尔堡，继续发展我对于“沼泽”意义的研究，以及我对于“门”这种现象的文化发展的思想，并最终尝试把它们统一在一篇报告当中，因为我认为这两个主题都同样有说服力，你们在这里看到了这篇报告的篇幅大约有写得密密麻麻的四十页。

只是在我昨天夜里最后一次对笔记做了浏览和补充之后，今天早晨临近五点时我带着一种奇特的感觉醒来，一种迄今为止我不熟悉的感觉，它在强度上彻底推翻了迄今我对自己所患疾病的看法，因为在醒来之后我无法再次入睡，于是这种感觉促使我在最后时刻改变计划，使得我想把这一直接经历到的认识融入我的陈述以便与你们分享。这

样一来你们一方面看到我做了最周密的预先准备，另一方面又显得完全没有准备。治愈只能意味着，不再以给定的模式和强制性程序为导向，而是让每一个思想和感觉的瞬间都相应地注入这篇报告里。因为只有这样我作为病人才能够意识到并承担对自己行为的责任。

我回想起一集东德的老电视连续剧《报警电话110》，那是几周前我在这这里的公共活动室里看到的。剧中一名犯有谋杀罪的刑事犯在被关押多年后正在谋求提前释放。在多次谈话中他企图把自己的罪行推卸给其他人和外部情况。就像他回忆中的场景所证明的那样，他在转嫁指控时不一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他在最后才明白，一种真正的改过自新仅仅在于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但是罪过只能意味着责任，否则它就只服务于由宗教和国家所实施的压迫。让自己面对并接受负罪感，而不想逃脱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责任，这属于一种内心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前提条件。

尼采在其《快乐的科学》中（请允许我复述他笔记里的一段，在这里引用我觉得非常合适）不仅宣称上帝已死，而且还叙述了佛陀的影子，在佛陀辞世后人们数百年还能在一个山洞里看到这样的影子，对此尼采评述道，佛陀的情况和上帝的没什么两样，我们肯定也能战胜他的影子。人们几乎可以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面临类似的任务，在此我不想把影子按照荣格的理解方式定义为被我所拒绝的消极成分，而是把它定义为一种自身不再存在的现象的继续作用。

如果约翰·列侬1966年3月4日在《伦敦旗舰晚报》上说了下面这番话：“基督教将要结束。它将萎缩并消亡。我无须对此辩论；我是正确的并且我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现在比耶稣更受欢迎；我不知道谁将首先逝去——摇滚乐还是基督教。耶稣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门徒太愚蠢太平庸。对我来说是他们的扭曲毁掉了基督教”，那么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列侬究竟是怎么想到要把披头士乐队和耶稣、把摇滚音乐和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这样的对比在这个地方经常发生，因此它们可能过于仓促地被解释为是精神畸变的标志，并被相应地加以对待。但是就跟当初人们只想把列侬的表述看作是亵渎神明的言辞一

样，人们把一名病人的表述经常也只看作是他疾病状况的又一征兆，而不是去全力破译他所言的真正含义。

在我看来，基督教和摇滚乐之间的真正区别好像在于一种对暂时性的基本态度，因为和其他宗教或者制度一样，基督教自然而然地在争取自己的生存，固守旧有的传统和价值观，而摇滚乐及其延续即流行乐则一直以来就被打上了解散的烙印。一支乐队几乎尚未组建完毕，仿佛就已经面临着分手和各奔东西的威胁。恰恰是因为这种情况，列侬所提的问题即基督教和流行乐谁将首先从画面上消失，才显得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说基督教将形式和内容等量齐观，那么流行乐则随时准备着解散并以此重新组建。在此列侬对基督教和流行乐所做的比较也显得是有意义的，《约翰福音》中不也说过吗：“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在此期间基督教忘记了，为了能够富有成效，重要的是死亡和解体，而流行乐则使这种解体、使这种死亡成为其存在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少量不愿意解体的乐队身上观察到这一点，比如滚石乐队或者现状乐队：它们在践行一种麻木而空洞的仪式，该仪式沉湎于那种错误的表象，即通过身体的在场宣称自己的真实性，可事实上它们早已蜕变为翻唱自己歌曲的乐队，它们把唯一的志向转移到制作一份完美无瑕但同时也是没有生气的复制品上。在此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的两句贴切的表述，第一句是关于在技术上可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第二句涉及他所提出的“光环”概念，这种光环仅仅见于消散之中。

“今天作曲家们拒绝死亡。”这是1921年7月埃德加·瓦雷兹的一句陈述，它出现在瓦雷兹参与创建的国际作曲家同业公会的成立宣言里。弗兰克·扎帕对这句话稍加改动，让它出现在自己六十年代所有的唱片上。但是扎帕的改动肯定不是巧合：“今天作曲家拒绝死亡。”在这里扎帕不是像约翰·列侬那样和宗教做对比，而是和所谓的严肃音乐，这种严肃音乐最晚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陷入类似的窘境，因为它和基督教教会一样坚持遗留下来的仪式，仅仅以此阻止了它的死亡。同时也阻止了自己的再生。

但是如果正如我们现在根据少量几个例子就已经看到的那样，流行乐的死亡完全具有积极的内涵意义，那么人们怎样理解尼采的这句陈述呢：“最重大的事件最难到达人的感觉层面：比如基督教上帝‘已死’这一事实”？或许尼采根本未将上帝之死理解为是对一个古老时期的虚无主义终曲，而是相反向我们指出，人们也恰恰包括那些假托信仰上帝的人，他们根本不理解基督教的真正核心，不明白在世界面前让人步入歧途的真正的障碍物，即上帝已死，真正的信仰表达能够在这种死亡中、而非复活中被找到？

今晨五点我醒来时的感觉，是与一切和每一个人、主要也是和我自己保持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的感觉，这种距离也涉及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所患的疾病，或者说是妄想症，如果在这里允许我描述的不太准确的话。我故意使用“妄想症”这个词，因为它不太特殊，可以公开接受人们的阐释。我躺在床上，外面天慢慢变亮了，感觉的空虚让我意识到，我的妄想症不能没有我而存在，也就是说不能没有我的观点、我的分析、我的阐释。在我看来妄想症与身体疾病的根本性区别也正在于此，身体疾病能够被分析，而妄想症本身就已经是分析了。只有这样也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也能够作为伪君子、骗子、婚姻骗子或者政治家吸引其他人。另一方面治愈也是一种再分析形式。我今天早晨获得了这样的认识，当我感觉刹那间摆脱了所有的关系、所有的社会 and 私人约定，以此也摆脱了我迄今为止的妄想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自已看作是痊愈了。这要由其他人来决定。

但为何尼采把自己表述的核心也就是“已死”放在引号里，仿佛是在引用别人的话？后来我们在列维纳斯的代表作《整体与无限》的开始部分里也找到了类似的情况，其中第一句话“真正的生活是缺席的”也同样被放在引号里，仿佛是哲学家提出这一句让其他人来分析。这两个好像是被引用的句子出自谁之口，这一点不得而知，人们难道不能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通过初步的尝试性解释声称，借助这两个句子人们能够解释缺席和死亡，它们之所以总是引言，是因为我们不懂怎样真正将它们据为己有？就像我许多年和几十年都不理解自己所造的句子，把我的疾病朝一个方向进行阐释，使得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认

识我患的疾病？或者正如尼采所言：“我们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还相信语法。”在面对上帝已死和真实生活的缺席时人们跟我今天早晨将近五点醒来时的感觉难道不一样吗？也就是说我们对无动于衷和冷漠感到畏惧，而为了真正认识事物这样的无动于衷和冷漠又是必要的？我们宁肯固执于模糊和妄想症，也不愿明白上帝已死、真实的生活无法被体验以及我跟一切和每个人都分离开来？此外这是我们生存的基础，我们无法通过治疗措施来减轻、无法通过分散注意力来削弱这样的基础，而是只能接受和认可它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像列维纳斯继续陈述的那样。

耶稣问道：“哪种做法更容易，是对瘫痪者说：你的罪孽被宽恕了，还是说：站起来，拿着你的担架四处走动？”相反尼采在对上帝和存在进行了思考之后，罗列了他的胃吃不消或者根本无法承受的东西，即土豆、火腿、芥末、洋葱、胡椒、所有在油里炸出来的东西、酥饼面团、花菜、卷心菜、沙拉、所有用动物油烹调的蔬菜、葡萄酒、香肠、肉上抹的黄油酱、香葱、新鲜的面包屑、所有发酵的面包、所有在炉竈上烧烤的东西、所有用火煮的肉、小牛肉、烤牛排、羊腿、羊羔肉、蛋黄、牛奶，也包括搅奶油、米饭、麦粢、热煮苹果、绿豌豆、豆类、胡萝卜、根茎、鱼、咖啡、黄油、棕色的白面包皮。他之所以罗列这个清单，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不同于在形而上学领域）从根本上为自己的不适表述一段解释性话语，因为我们遁入空想领域不是没有原因的，相比无法看到人的需求和感受性，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身体的全貌，空想对我们来说显得更容易从思想上被把握。

面对现实和自身的弱点，在妄想症里不也能找到某种固执吗？固执，但从来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到倔强。正如尼采在他的妄想症爆发前不到两年的时候给他的妹妹、亲爱的“骆驼”所写的：“第一我需要某人来监控我的胃；第二我需要某人和我欢笑并具有开朗的个性；第三我需要某人，他为我社交圈感到自豪，能够在合理尊重我的情况下去接受‘他人’；第四我需要某人给我朗读，但不会使书籍变得愚昧无知。原本还有第五，但我根本就不想再谈及它了。”这些愿望很平庸、单纯，还是正如尼采自己断定的那样，过于苛刻因而无法被实现？最大的伤害难道不恰恰是发生在那些我们无法如愿的琐事上吗？某人不借给我

一百万欧元，这我能理解，但为何他连十欧元都不肯借给我呢？格尔妮卡不能日日夜夜地悉心照料和护理我，这我容易理解，但为何她连来这儿探视我都做不到呢？因为她不想对我的治愈造成不利？但如果我自己都不参与治愈，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被治愈，那这又是什么样的治愈呢？”宁肯困苦、多病、担惊受怕地在随便某一个角落里生活，也不愿妥协和融入现代的平庸！”尼采在同一封信下面继续写道。因为人们拒绝让我们平凡，因此我们至少想轰轰烈烈地失败。

但是我怎样才能更好地证明自己有责任能力，而不是通过有意识地承揽责任？把自己设计成时代因素和个人经验的牺牲品，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为使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强迫症寻找证据，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但是逃脱压在我身上的诅咒的唯一机会难道不恰恰在于，接受使我遭受打击的东西，在我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妄想症？历史不恰恰是被保留在空想中的吗？或者换言之：肉体 and 灵魂不恰恰是在空想中反抗人的屈辱，即只能过一种生活，不管人们怎样让它转换方向，这种生活都只是沿直线向前滚动，为了在事后和跨越几代人之后（如果可能的话），去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童年之所以对我们来说显得无法挽回的珍贵，是因为我们在童年时代还没有被分割，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自己看不起自己，是因为我们不是向前翘起，同时又向后回望，这样一来总是耽误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最多使自己成为谜团。但是在空想中这一切都有了结局。在空想中一切都同时发生，我既经历了自己人生的整个历史，同时也体验了从两端超出个体历史范畴的事情。我同时潜入出生和死亡的黑暗之中，每一次动作行为都碎裂成一个由无限可能性组成的万花筒。

多亏精神错乱也总是尝试逃脱人所遭受的根本性屈辱，即不能同时过好几种生活，而是只能过唯一的一种。从表面上看可能显得是意识丧失、心不在焉或者心灵的缺失，但实际上这也总是逃脱生活一维性的尝试，因为只有伤残者才能够成功地发明一些以后被起草为历史的东西。

人们从牙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可恰恰是肺结核患者经常会有最漂亮的牙齿，它们当然是通过一种奶蓝色和某种透明度把自己泄

露给行家的眼睛的。水尽管有重量却能被水泵抽到高处，人们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自然界厌恶真空”解释了这一事实。当挖井人在佛罗伦萨发现，在水泵的吸管里水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十米以上时，据说伽利略用以下这番话捍卫了亚里士多德的原理：“对真空的厌恶也是有局限性的”。后来伽利略的学生托里切利在气压中找到了今天通行的解释。如果人们把灌满水银和上端开口的托里切利玻璃管放入一个水槽里，水银就会倾泻而出并下降到76厘米的高度，处在水银面上部的就是托里切利真空。知道人们命名了一种真空，这是对每天在自己身体上感受到真空的精神病患者的安慰。短瞬间他会把目光从这种危险的世界初始原理上移开，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尝试在自己身上定位托里切利真空。

绷紧在鱼嘴周围的水面，由瞪羚在树林之间扬起的沙尘，马鹿在矮树下踏出的林间通道，麦田里被踩出的大小路径：在人们理解测量学之前，对土地的丈量就已经开始了。他所看到的是直线和弧线的交叉，是嵌入三角和方块的图形。他从列队飞翔的鸟群中发现了双曲线和抛物线，在修建厩栏时发现了菱形和梯形，他还发现了蚂蚁的金字塔形、马蜂窝的截角八面体和被海狸啃成多面体的树杈。他将要首先创立的算术和几何的抽象概念对他来说从一开始就被给定了具体的转化，就连那些他要钻进去的洞穴也是通过侵蚀和石块的运动而产生的，在他之前动物在里面睡过觉。他用武器检验预先确定的线条，学到了长矛在水中的折射以及箭在空气中的减速。他所描绘的世界尽管抽象，但始终是动物的世界。那些陆续出现的神灵对他来说都是造物主和建筑师，他努力仿效他们，为了终于能够自己建造一栋房子、一座塔楼、一条定线、一座永远使两块页岩相互束缚的桥梁。但是在他的努力过程中人始终受到大自然的威胁。

这种威胁主要体现在很难被战胜的沼泽地区，人们把这样的地区重新解释为是通往地狱、有时也是通向天堂的路径。这样的解释也恰恰是为了应对那种软弱无能的心境，带着这种心境人们看到动物、物品和自己所爱的人无一例外都通通消失在沼泽里。最初的描述使人感到非常抽象，它们往往只展示一面没有写字的黑板，仅仅是一条细线在顶端三分之一处沿水平方向把黑板分割开来。

既非液态也非固态，既不能被穿越也不是深不可测的，鉴于沼泽经常在多年之后看似完好无损地把吞噬的东西再归还出来，因此它也总是“在这之前”的象征，是去往最终目的地的前院的象征，是炼狱的象征，因为它吞噬但不破坏，保证身体始终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缓慢下沉中被淤泥、泥浆和泥沼所净化，以此逃脱永恒的诅咒。也正因为如此（不仅仅是因为在它的表面像幽灵般出没的鬼火，用这样的鬼火它来吸引不稳定的生命），它是妄想的象征，因为妄想也经常被解释为向下滑进讳莫如深，被看作是失败的折返或者不成功的净化的后果。

人们想象沼泽里遍布着新生儿，他们还在身体热乎乎的时候就被无法控制自己生育能力的母亲们丢进沼泽沉了下去。这样人们比如在长在沼泽里的百里香的红色茎秆上，到处可见被割断和变僵的脐带。如果一个女人为了受孕而服用沼泽黏土或者把沼泽黏土涂抹在阴道里，可尽管如此她还是来例假了，那么她整个一星期都必须蜷缩着身子蹲在沼泽边缘，为了把她据说是从沼泽里提取的血液再还回去。

人们经常把老人丢弃在一处沼泽地带，希望他们会跟随泥潭的轻声吟唱而沉没，或者他们会受到带有咸味的水的瘴气的侵袭，遭受在那里腐烂的动物尸体的触染性传染，从而成为间歇性发烧的受害者并因此而死亡。凡是曾经见到过沼泽的人，谁都不会忘记一头处于妊娠期的母牛或者母马与泥潭的利爪绝望搏斗的场面，也不会忘记那些动物们在歪扭肢体时令人无法置信的姿态，当它们完全出于本能想要拯救自己腹中的胎儿而来回翻滚，为了能够让牛犊或者马驹很快离开它们的身体，为了在下一刻带着强烈的生存意愿把头向上拉伸并大声嚎叫和嘶鸣，而在岸边跑来跑去的小伙子们一开始还尝试，用他们的棍棒给垂死挣扎的动物提供支撑，最终他们因自己无用的尝试而绝望地愤怒，用相同的器具向动物身上打去，为了缩短它和自己的痛苦，最后当只有脑壳从淤泥里露出时，再对准它的双眼用力击打两下，因为人们一方面说，牛和马的灵魂位于它们的左眼后面，因此牲口贩子在购买牲畜时也会观察它的左眼，为了从中看出它的性情和寿命，另一方面据称一只垂死动物的右眼会把它看到的人一并带走，因此人们在用棍棒戳捅时必须把脸扭向一边，这样做很容易会错失目标，导致在动

物身上留下不必要的伤痕。这样的场景人们在农村题材画和街头说唱艺人的布告牌上能够重新找到，而不用眼睛去看便刺穿某一给定的目标则属于那些体育运动项目，它们正是从沼泽地周边的仪式里发展而来的。

在地域性基督教圣徒故事的形成过程中，人们把那种双重戳刺仪式和圣朗基努斯联系在了一起，他是罗马军团百人队士兵，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用长矛挑开了他的侧腹，里面流出了血和水。据说朗基努斯双目失明，是耶稣的一滴血液滴到了他的眼睛上，从而使他恢复了视力。沼泽地区的圣徒故事把这一不符合事实的部分又改成了那种双重戳刺仪式的初始传说，因为一名盲人是几乎不可能成为罗马军团百人队士兵的，改动后的故事是这样叙述的，不管是疏忽还是故意，朗基努斯在刺向耶稣侧腹的同时，也刺向耶稣的左眼，也就是蕴藏灵魂的那只眼睛，他的这种冒险行为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也就是说在这一刻他才变瞎了。因此加尔文主义神学也把这一解释看作是人的生存的矛盾心理的象征，因为朗基努斯一方面受命于他的统帅、另一方面也是受上帝的委托而行事，为了完成《圣经》的书写，他有必要用长矛去挑刺耶稣的侧腹，据《圣经》里记载，他不是腿部被刺破，更确切地说是被刺穿了身体。这种矛盾心理也表现在从耶稣体内同时涌出的血和水，以及受害者和案犯的同时受伤。

可能是为了纪念在沼泽里失踪的牲畜，人们在11月死者节日来临的时候，利用清晨的几个小时把新挤的牛奶倾倒在被大雾包围的地面上，为了从在地上出现的条痕和线条里，解释彼岸死者和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某些人声称，从这些曲线里发展出了我们的文字，而其他人又说，人们不知何时把交织在一起的线条理解成制造绳结的指令，也把它们理解成是沼泽自身的暗示，即人们怎样才能保护动物不被它吞噬。此外在火烧兰、冰沼草和茨藻属的叶片上也能重现人的血管纹理，从前兵卒们让人用沼泽龟鳖的甲壳制作他们的盾牌，以此他们想暗示，他们臆想自己已经到了死者的王国，因此不再惧怕任何事情和任何人了。

以前人们也把大脑想象成一种含有一块泥团的碗，一切被感知、感觉和思想的东西都仿佛是在一片沼泽里一样沉入碗里，为了再也不必以最初的形式浮现出来。那种完全得到证实的观点在这里显现出来，即感觉摧毁了被感知的东西，因为被感知的东西通过感觉发生了变化。就连弗洛伊德在关于他的第二种拓扑学的准备工作中还把本我描述成沼泽，“自我必须把沼泽里的水排干”，为了在底部建立起主体大厦。相反那一代表一种负投影面的沼泽（swamp）表达在美国的荣格思想追随者圈子里很快流行开来，这种投影面过于模糊，以至于人们无法准确地认识 and 命名它，人们把令自己不快、因而被排挤掉的成分通通随意和牵强附会地解释进该投影面里。

但是沼泽神灵往往是那些向人们转交文字的人，他们教会他用沼泽芦苇的秆子削出最早的书写工具。在此书写首先是一种归还被感觉破坏的被感知之物的形式，因此沼泽神灵不是简单地传授书写，而是要把书写作为义务强加于人。但是沼泽神灵既不是水也不是土，既非固态也非液态，既不硬也不软。他让对立面并列存在，彼此渗透。他的口号叫作第三种元素，是与非此即彼的背离。

一些早期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观念被打上了很强的摩尼教和新柏拉图主义图景世界的烙印，他们认为上帝自己就体现为沼泽，因为他即使是在违背我们意愿的情况下，也绝不会让我们摆脱他的仁慈。这种对吞噬一切的上帝的设想在中非也有，在那里人们把天空想象成一种透明的沼泽，在这种沼泽里恒星、行星和云代表着在真正的沼泽里流失的东西、动物和人。每年一次在雨季的时候，吞噬一切的上帝就会到来，把沼泽天空连带里面的财宝吮吸得干干净净。在此过程中他如此贪婪，以至于口水从他的嘴里淌出，作为雨水降落到地面上。已经提及的诺斯底教派信徒的见解和肯尼亚部落的神话之间的联系，好像在中世纪晚期出现的沼泽教派身上能够被找到。这些教派同样认为，人死后会进入一片沼泽，这片沼泽就是上帝本人。他们把祭坛和祭礼用品沉入沼泽和泥潭，在一旁进行祷告，把从沼泽里冒出的雾气作为天主的放射物吸入体内。在民间词源学里他们把同音异义词“沼泽”

（Moor）和“黑种人”（Mohr）等同起来，使自己主要与东方三国王中的黑人国王梅尔希奥融为一体，据说是他把永恒的黑金即沼泽送交给

了天主。相反同族的沼泽人把第四位国王推选为他们的守护圣徒，根据圣徒故事他因为返回而从未见证过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们声称，这位国王并未通过绕道朝拜人子（耶稣基督）而踏上圣徒之路，而是确切地说直接骑马跃进一片沼泽里，为了以这样的方式直接和不通过上帝代表的介绍与他的天主融为一体，埃克哈特大师和天堂的信使西理修斯也都拒绝过上帝的代表。

沼泽的时态是进行时形式，它使两种特性相互转化。但是因为这种进行时形式自身永远不可能是特性（通过德语中动词不定式的名词化它好像正在成为特性），从“拿走”意义上讲的运动必须被连带写进表达，因此人们能够谈及一种“迷路”。在被我们领会为特性的时态之间迷路的时态，第一会是从“误入歧途”意义上讲的迷路，因此没有走上位于两种特性之间的直接和目标明确的道路，第二会是从“模糊的掺杂和渗透”意义上讲的迷路，因此在自身的运行过程中无法被重构、折返或者理解，第三会是从“正在解散的人群”意义上讲的迷路，因此无法以一种自身一目了然的特性被理解。

关于这种“特性之间的存在”的一个例子在法国象征主义者雅克·萨尔蒙-博尔默的诗歌《你最后的生存》（可能性翻译：1. 论最后的存在，2. 最后的生存，3. 最后的本质，4. 亲近某人）中能够被找到。他在诗里描述了一名年轻男子度过的最后的几分钟，那名男子掉入一片沼泽，知道自己越反抗下沉、拼命摆臂或者尝试爬到岸上，他就会下陷得越快。于是他决定静止不动，有意识地经历自己的死亡。在此过程中他思索“尚未”和“不再”之间的矛盾性，其间对他来说“尚未”逐渐地转变成了“不再”。同时他意识到，期待产生于对过去的回忆，这让他最终用他者的眼睛看待死亡（大意是：再次迈出那几步，为了踩碎“尚未”）。在布洛赫“显露”概念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萨尔蒙的诗属于他的私人读物，人们对此已不再感到惊奇。后来反精神病学运动通过影射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中一处著名的口误，把“显露”概念拓展成“显龇”概念，其中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极端批判，“显露”概念在布洛赫最初的笔记里还被称作“深入”或者“骑越深不可测的沼泽”。虽然恐惧好像使我们瘫痪，让我们告别不断给人安慰的“尚未”，把自己交付给永远的“不再”，但我们同时也感受到，只要我们还能思

考一切，还能察觉到恐惧，就仍有最后的生命火花蕴藏在我们体内，这样在我们体内或许就会有最后的“尽管如此”发出声来，正如萨尔蒙-博尔默在他的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他在诗里写道（译文出自斯特凡·乔治）：

站着死去，轻柔地沉入

去往眼睛认不出路途的地方

不再预知周边的一切

感受不到离去的事物

在恍然悬浮中独自下沉

于不再和尚未之间

但又是什么从把我们不断拖向深渊的沼泽里延伸出了我们的感情、总的说来也就是人性状况，如果不是门，这一人类的根本性发明，它看似与其最隐秘的本质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倾向于把雅克·拉康的一句名言改写成：无意识的结构就像是一扇门那样。休伯特·费希特不想成为第四百五十位研究总督宫各门的白人，而是更愿意了解一些关于精神病院的情况。难道不是这种情况吗，即恰恰是门与精神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因为正是精神病患者看到自己的内心经常被一个开口、一个窟窿、一条通道、一片薄膜，简而言之是一扇门所损害。门标记出了他者的本性，因为如果没有门就不可能获悉门后的情况和他者的空间。只有小丑才会觉得门是房间或者房屋欠考虑的附属物，只有不细心的人才会觉得门是对结构的削弱，而在灾难来临时人们恰恰是在门框里寻求保护，因为能够保持站立的只有门。灾难过后不再有房屋，而只有一扇门。立在瓦砾堆旁边。立在街上。这种情况也符合精神病患者的生活体验，他只剩下通道，而没有了界石和围墙。他认为自己一下子变得无边无际，因为人们也能绕过一道没有被固定的门。但是谁要是这么做了，谁要是绕过一道立在野外地区或者空无一人的建筑工地上的门，他就会更强烈地感觉到门的力量，把自

己的行为感受为是对自然法则的违背。门是城市的象征，因此卡夫卡笔下想被允许通过大门的是一名来自乡下的男人，但恰恰是因为他来自乡下，他没有被允许入内，尽管门仅仅是为他而准备的，作为可以说是皈依之门，只有当我同时抛弃自己的出身和对门背后的希冀，我才能穿门而过，得到通道的赦免。一栋堆满食物的房子，里面的门被忘记安装了，一则儿童谜语里这么说道，如果没有门房子无法再思考世界，无法再仅凭能够被投射到一切表面的入口占领世界。没有任何通俗戏剧能够在没有门的情况下对付过来。门被上帝打开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我们在这里说的是所谓门的奇迹。对使徒彼得和保罗来说门自动开启。耶稣穿过关闭的门说道：我就是门。据说这是对阿拉米语最初文本的颠倒阅读，正确的读法是：我是牧人。即便是在“我是绵羊之门”（《约翰福音》10: 7）那句话上，约翰也坚持这样的解释，因为对他来说门的象征比具体易懂的关于耶稣作为牧人的表述更为重要。耶稣作为门，作为通道，不是作为终点。在《马可福音》中一些东西就在眼前或者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在靠近门的地方。门柱被涂上了血液，以便让惊恐从旁边经过。在希伯来语中门既是天堂之门，同时也是鳄鱼的嘴巴和轻浮的女人。墙和门成为相反的一对儿。“它是一道墙还是一扇门？”雅歌里这样问道。

人类文明的大多数发明创造都源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怕死又产生于人对自然的不理解。如果仔细观察，在青紫色的夜空下雨云层层堆积，树冠瑟瑟发抖，草地印在泥土里，仅仅是对这种夜空的模糊的回忆，就能让我们识别出所有文明作品的起源。因为我们逃离了大自然，我们在规划住房时就不会觉得塔楼太高，不会觉得竖井太深，为了能够把这种总是起因于大自然的恐惧纳入正轨。因此就有了门。恐惧创造了门。门早就先于棚屋和房子而出现，对此我很肯定。门从一开始就是人的内在需要，随着道德和禁忌规定不断发展。在人感知自然与自己相分离的那一刻，他在大自然中发现了门。两棵长在一起的树木，岩石上的一个窟窿，一根被掏空的树干，对他来说孔洞无处不在。他通过一道门迈进每一片树林，通过另一道门离开每一片原野，当他夜里露宿荒原时，他用几根细棍在眼前竖起一道象征性的门，因为不是帐篷式屋顶，也不是天花板，而仅仅是门给了他保护和安全感。早晨他穿过门外出，晚上也同样穿过门返回。门为他整理了混乱的世界，

很晚以后他才配着门给自己建造了一栋房子和一座城市。就连过着游牧生活的《诗篇》的撰写者也在第121篇里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从现在开始天主看护着你的出口和入口，直到永远。

数千年过去了，各族文化按其对于门的见解早已有了进一步划分。比如亚洲人和他们的拉门，这种门通过并非朝固定的某一侧开启而否认自己是门，在此一种对于空间的评价不由自主地被表达了出来，确切地说这种评价赋予了门前和门后平等的地位，它把门前的大自然融入门后的空间。另一方面帘幕在东方和非洲充当了门的角色，那是用珠子串成的绳线和帘布，人们在穿过时把它们分开，它们不会使人的脚步停下来，而仅仅是遮挡了视线，它们是对一阵雷雨和一团大雾的映像。而西方世界则很快沉醉于翼门，它深刻影响了宗教与哲学的两分法思维：天堂与地狱，善良与邪恶，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内部与外部，前面与后面，这些构造全都把自己归功于门，门用铰链促使我们思考，门或者朝屋里或者朝屋外开启，但总会要求我们做出决定，它不像东方的门那么软，不像亚洲的门那样让人看不见。

我们在门的设计上反复润饰，但却不曾偏离最初的构想。我们使它成为沉重的教堂大门，成为酒吧的弹簧门，但我们绝不可能脱离它最初的原则。我们失去了门的安慰，得到的仅仅是分隔。先前给我们安全感的东西早已堕落成恐惧的象征，即使我们的上帝也不得不因为这种恐惧而失败和死亡。我们歌唱天堂之门和地狱之门，胆怯地在门口等候着度过了我们的半生：在医生和律师的门口，在通往忏悔室、地下室和囚室的门口。门变得更厚了，它们被装上软垫，使得不再有声音穿透到另一侧，但这样一来分隔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因为门的另一侧远离了人们的视野。最终钢门使如此产生的距离变得无法克服，两个世界，两种生活，门变成了边界，人们无法再问：你是墙还是门？因为门现在只是墙的变种，门被上了锁和插销，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保护保险柜里的财物，以及把那些提出门的透明性要求的人关起来。

门作为希望的象征和所有目的论的目标继续具有现实意义，人们把去往天堂的入径同样想象成门是不无道理的。只不过我们经常根本不知道，位于这道门背后的是什么，因为想要到达门前的渴望对我们来

说应当既是有益的错误又是有利的动力，就像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只要他露宿过街头，在房屋入口处心情压抑地注视过所爱之人住所孕育着希望的门。

尊敬的到场来宾，亲爱的病友们，尊敬的教授先生，尊敬的医生阁下，请让我在这里中断一下提个问题：迄今为止我能证明我不想再把自己刻画成受害者了吗？也就是说由家庭、学校和教会构成的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后来又成为医院、疗养院和精神病院的受害者，我也不想再把自己刻画成那些反对上述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的人的受害者，那些人以此又设计出新的意识形态，即我所拥护的暴力意识形态，就像我在另一个时期可能会拥护其他暴力意识形态一样，这样的暴力意识形态的任务在于，把班级里的我行我素者捆在后院殴打，让他们在挨完打后被捆绑着躺在那里，表示赞同地接受他们的死亡，后来自己还怪罪那些被打者，埋怨他们好像是怂恿了人们去捆绑和殴打他们，因此人们又再次殴打他们，或者扔东西打破他们的橱窗玻璃。但是我不想再断然拒绝这些涉及暴力和被囚禁在意识形态结构里的话题了，为了取而代之描绘青少年时期和谐宁静的画面，带着通常的多愁善感以及对单曲唱片和乐队的回忆，因此我不想停留在对《橡胶灵魂》专辑的再次分析上，而是想提这样的问题，为何青少年，也就是说我，为何我总是不断地听披头士乐队的歌曲，为何我总偏执于披头士乐队，就跟其他人固守神圣天主教会和罪孽的减轻一样，为何我不想认识到，滚石乐队在某些领域要有趣得多、距离自我毁灭要近得多。如果正如我一直假托的那样，我真的在乎确立自己作为被开除者的形象，那么最晚从《第十九次神经崩溃》或者《涂成黑色》开始，最迟从《我们爱你》或者《一起欢度这夜晚》开始，滚石乐队就应该成为我的首选乐队。是的，我甚至想大胆地宣称，那次在“歌手之家”饭馆里的精神崩溃，那种据说是化身死神的幻象，死神像一名教士那样给自己披了一件紫色的圣衣，紫色是作为忏悔、改过自新和心灵转变的颜色，因此人们在封斋节、基督降临节、葬礼上、复活节之夜以及在唱颂歌时都穿这样的颜色，我想宣称那次精神崩溃暗示的是一种无法解决的内心矛盾，多年之后那名青少年还尝试把自己从那样的内心矛盾中搪塞过去，他假称仅仅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挂了一张滚石乐队的招贴画，假如克里斯蒂安妮要到他那儿做客的话，尽管他早已自

己意识到，相比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不失为一种选择，这不仅体现在更硬朗的音乐上，这种音乐他是后来通过齐柏林飞船乐队和奶油乐队才得以接受的，而且也因为更接近他风格的歌词，比如：我被淹死了，我被冲走了，最后只剩下死亡，或者：我头顶上钉着一根刺。当然那个年代的修士们也可以给他把这些重新解释为按照《圣经》观点所说的殉道者的象征意义，但是就《魔鬼陛下的要求》这首歌而言这样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更不用说《同情魔鬼》或者最后《任血流淌》那首了，这些歌曲推出的时间正好是对那名青少年来说一切都已经倾倒的时候，永远倾倒了，永远跌入一种无尽的悬浮状态。但是如果我所有其他的论据都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那么至少以下观点难道不是不容拒绝的吗？即相比披头士乐队滚石乐队更被他班上的女生，也就是被克里斯蒂安妮、玛里昂和加比所偏爱，因为滚石乐队的成员都是男人，而披头士乐队的成员则由男孩子、辅弥撒者、被改造过来的左撇子和艺术学校的毕业生组成，正如那名青少年还在当时就对自己以及从那时开始对余生的误解一样。披头士乐队成员是具有女性化倾向的雌雄同体者，即使他们蓄留胡须，他们看上去也像是戴了另一半缺少的面具似的。但是如果那名青少年依恋披头士乐队，他这样做就意味着不再留恋自己的性别，而滚石乐队则会将其目光转向那些迷恋真正男人的女孩们？这样的幻象难道不就是他性取向方面的决定性危机吗？在这种危机中他明白了自己不能再躲在借口后面，这种危机难道不是伴随着1967年6月25号那天的电视节目就已经开始了吗？在那一天十九个国家的电视台分别向三十个国家转播了一个节目，英国广播公司选中了披头士乐队，播出了一首新歌《你需要的只是爱》，那名青少年熬过了所有其他无聊的节目，熬过了那个西德的电视节目，它播放的是《罗恩格林和沃尔夫冈·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第二幕彩排的一段剪辑，熬过了那个东德的电视节目，它是关于耶拿西部格罗斯施瓦本豪森大学天文台的，直到披头士乐队长达3分48秒的节目终于出现，他们在混乱的录音室里、在来宾和管弦乐队之间演唱了他们的歌曲，米克·贾格尔的面庞一下子出现在荧光屏上，就像先前约翰和保罗的脸庞一样，他不可能看错，但当时就是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也很想把这些弄清楚，但他弟弟当然知道了，他父亲当然更知道了，在看完介绍拜罗伊特和耶拿西部格罗斯施瓦本豪森大学天文台的节目之后就从房间出去了，他母亲喜欢佩里·科莫，当时身体还很健

康，她当然也不了解这些而且反正也不会说父亲的任何不是，还在那天夜里他就久久无法入睡，因为他总在反反复复地思考，尝试弄清这些意味着什么，主要是想查明克里斯蒂安妮是怎样理解的。毕竟米克·贾格尔是做客披头士乐队，就像录音室里的一名观众一样，被披头士乐队邀请，哪个更重要呢，是邀请还是被邀请？恰恰对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此第二天他在学校里避开了这个问题，特别是避开了关于那个节目的流言蜚语，或者当有人在课间跟他谈论起这个问题时，他马上就说挂在那里的是两个傀儡，实际上他们是罗莱克和博莱克吗？然后其他人压根什么也不说了，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些傀儡，但他不仅臆想出了这样的傀儡，而且正好还看见它们挂在那里，虽然他把罗莱克和博莱克与斯比尔博和胡比涅克搞混了，因为后两个傀儡是父子俩，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而罗莱克和博莱克则来自波兰，跟他母亲一样，这一点人们从名字的词尾就能听出来，因为她以前有时会叫他哈索克或者茨察皮金德，这可能是西里西亚语，意为“兔子”和“小孩子”，虽然他从未向她问起过这个，罗莱克和博莱克是兄弟俩，其实他们太孩子气了，而斯比尔博和胡比涅克是傀儡，傀儡总是具有一些忧伤的气质，尤其是捷克傀儡，因为它们会自动耷拉着脑袋和四肢，但这一切都让他提不起兴趣，因为他只想用这样的傀儡转移真正的问题，但尽管如此他牢牢地记住了这些傀儡，后来他不由自主地把它们跟约翰·列侬戴在脖子上的狐狸头项圈联系在一起，在那张裸体照片上列侬就是这样站在小野洋子旁边的，因为当时他就起了疑心，他无法再摆脱这样的怀疑，这种怀疑来自完全不同和事先未被预见的方向，因为它无法被消解，它就蔓延并反抗一切，反抗那种神圣天主教会，反抗被定义过的性别角色，反抗不幸的恋爱感觉，总的说来反抗所有的范畴和借口，相反如果要求他不再固执于范畴和借口，他就会拒绝这样做，继续拒绝，直到两年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那次精神崩溃，其原因他当时无法理解，后来也不理解，那次精神崩溃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参见，引发了一段入院治疗的历史，正如保罗·麦卡特尼1965年6月14号演唱的《我很失落》，它在7月份出现在单曲唱片《救命》的背面，还在唱完第一小节时他就说了“塑料灵魂，天哪，塑料灵魂”这样的话，以此把灵魂第一次移入一种语境，这种语境能够允许这样的推论，即下一张同样在名字里含有“灵魂”字样的专辑应当被理解为是来自深处的呼喊（《我很失落》），一种所谓的“来自深渊”，被

撞入黑暗的灵魂的呐喊。封面照片上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头像几乎是全画面、但却是斜着被放置，这样的展示方式是不无道理的，就仿佛是他们站在一座坟墓上，向下俯视一名死者、一名昏厥者或者一名坠谷者，在他进入一种暂时或者持久超验状态期间，他在头顶上辨认出那些人轻微扭曲和模糊的面孔，他们准备作为灵魂的护卫者用他们的歌曲给他指明道路。塑料截止到同年12月转变成了橡胶，这有多种原因。一方面塑料和橡胶（塑料/橡胶）经常被用作同义词。其中一个例子比如说从1941年开始陆续出版的漫画集《塑胶人》中的主人公，他主要以能够像橡胶一样拉伸自己的肢体而出众。它具有所有橡胶的属性，也就是说从最初意义上讲的可塑性，但却不具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与塑料的相似性。在六十年代中期塑料还没有那种低廉和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制品的怪味，而是象征了耐久性和牢固性，也包括无菌性和无限的可复制性。但是塑料主要是不真实和替代物的象征，就像在谁人乐队的同名歌曲《替代物》里所出现的那样，即一次是作为与珍贵和真正金属（银）的对照，“我出生时嘴里含着一把塑料勺”，另一次又是作为无法掩盖事实的材料：“我能看透你的塑料雨衣。”弗兰克·扎帕两年之后即1967年演唱了《塑料人》，但是扎帕在具体的社会批判方面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塑料对他来说一方面是矫揉造作，另一方面是社会一体化的征象，他把这种一体化与秘密警察和纳粹联系在一起，他们成功地指挥和操纵被塑化、因而变得缺乏主见的人们。他本人在这样的塑料世界里找不到爱情，但是或者正因为如此他确信，“爱情永远也不会是一种可塑性产品”。扎帕在他的歌曲里把可塑性解释为纯粹的可变形性，这种可塑性在最新的理论里被解读为可描述性和可图解性双重意义，以此成为纯粹的造型可能性。卡特里娜·马拉布说过：“可塑性是一种改变形式，如果不抛开超验、飞行或者逃避。”这个定义也能用来描述幻想，因为疯子往往既感受不到超验，也感受不到逃亡或者回避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者对他来说以客观物体而出现，这些客观物体经常由塑料组成，诱发他采取行动。因此恰恰是我们，这家精神病院的病人，在直觉上非常熟悉那些思维模式，就像以客体为导向的本体论设计的那些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们当然倾

向于不仅仅给予物体一种同等的价值，而且往往赋予它们一种比给予人更大的价值。这样我更清晰地回忆起自己作为小孩用来玩耍的配有

明信片的汉高乐鼓，我长达几个小时地观察乐鼓，为了在这个看似不能被改变的物体上发现变化，以此发现不仅限于关系和描述的东西。但是扎帕《塑料人》的中间部分从音乐上看是对《路易路易》的借用，奇想乐队在其音乐生涯开始的时候凭这首歌获得了成功。雷·戴维斯感到那句“你认为我们在歌唱别人”说的是他自己，并在两年之后的1969年3月用他自己的《塑料人》做出了回击，歌曲以“但是从来没有从塑料人那儿得到真相”而结束。因此在一个时期里塑料显得无处不在，在那个时候那名青少年经历了青春期的变化，并同时遭受到瓦解和僵化的危险，这种危险在奇想乐队的《乡村绿色保护协会》或者扎帕的《美国小城》里都出现过，它们摸起来就像是一块包在玻璃纸里的金枪鱼三明治一样。1980年在经历了失败的个性化塑造之后，那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早已阴郁不堪，这时坠落乐队推出了单曲《我如何写弹性人》，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音乐沉寂之后（期间那名青少年用脉冲音符和蓝调唱片来填补这样的沉寂），坠落乐队作为第一个乐队又开始重新以摇滚音乐的形式对他当前的状态进行永远不可能完全被理解、却因此更具效果的评述，正如马克·E. 史密斯所唱的：“我永远感激 / 我过去的影响 / 但它们不会使我自由”。但是那名青少年既不会感激过去的影响，也认识不到它们不会使他自由，无法使他自由，恰恰是如果它还继续抱定它们不放，对新的影响不理不睬，对过去的影响时而崇拜时而憎恨，不让它们最终消亡。但他至少认识到，那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曲，而且还把自己作为探讨的主题，同时也强调了流行乐中语言行为的基本特征，区分了表述与被表述、所写与所说或者所唱的差别，因为虽然歌词里写的总是“弹性人”，但是马克·E. 史密斯在所有的工作室录音和现场录音中唱的却是“塑料人”。作为最后一个证明橡胶与塑料、柔韧性和耐久性之间联系的例子，我想回忆一下1961年的迪斯尼影片《心不在焉的教授》及其1963年的续集《飞天法宝之子》，片中由弗莱德·麦克莫瑞扮演的教授研制出一种新的橡胶形式，即飞行橡胶，缩写为“飞天法宝”（Flubber）。这种橡胶比如说可以用作运动鞋的鞋底，它使穿戴者有能力跳出惊人的高度，这样的高度接近于在失重空间里的运动。但是橡胶还有其他优点。那首著名的童谣里是怎么说的来着：我是弹球你是胶水，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从我身边弹开，然后紧紧地粘着你。橡胶提高了我自己的能力，保护我免受攻击，但就像披头士乐队在其文字游戏《橡胶灵魂》里所使用的那

样，这样的橡胶好像也影响了我的灵魂，使得灵魂面临堕落成日用消费品的危险，就跟非常实用，但随时可被替换的橡胶鞋底一样。莎士比亚在《维罗纳二绅士》里就赋予了鞋和鞋底一种特殊的意义。仆人兰斯指着他的鞋说道：“这只鞋是我父亲。不，左边的这只鞋是我父亲。不，不，左边的这只鞋是我母亲。不，那也不可能。是的，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它有更糟糕的鞋底。鞋底有洞的这只鞋是我母亲，这一只是我父亲。”在这里也出现了鞋底 (Sole) 和灵魂(Soul)之间的文字游戏，超然于明显猥亵的影射，列侬可能是回忆起了他母亲“更糟糕的灵魂”，在他的童年时代母亲就抛弃了他。正如交通乐队在其《鞋洞》里所唱的，因为鞋上的洞不仅会让水流入，而且也能让世界所有其余的影响涌入。在《橡胶灵魂》推出二十多年和《塑料人》推出六年之后，1986年5月保罗·西蒙再次着手研究“橡胶灵魂”的主题之一。被南非音乐家们的原始音乐也包括笃信所鼓舞，他录制了专辑《雅园》。这张专辑的名称也具有宗教色彩，恩典之国，迦南圣地，只不过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彩印画，因为这种迦南圣地无异于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别墅，类似于一种北美圣地，人们在影片和歌曲里不断地向他的别墅表达敬意。在《雅园》专辑里有一首名叫《她鞋底上的钻石》的歌曲。“橡胶灵魂”在这首歌里佩戴着钻石饰物再次出现。“那是一种免除走路时的忧伤的方法 / 我把钻石缀在鞋上”，副歌里这么唱道，不再有橡胶灵魂作为鞋底垫层把人们引向形而上学的远方，而是作为一种贿金和对渴望的补偿离去，如果人们认为西蒙是在援引罗伯特·约翰逊的《散步蓝调》，另外歌里也这么唱道：“她从头到脚趾都有埃尔金式的运动 / 无论她去哪儿都会破一美元。”如果一个女人的运动就像埃尔金手表的走时那样准确和优雅，并且无论在哪儿都会为一美元而工作，那么人们必须要给这样的女人提供些什么。不过还有一个版本的《散步蓝调》，里面这样唱道：“如果我有这样的布鲁斯，那么走路会伤到我的脚。”在这种情况下钻石给佩戴者带来的是轻松，抑或钻石鞋底指的是一种美好灵魂的象征，它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清白，但却没能获得存在，在世上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而是如黑格尔所言，仅仅流散在充满渴望的肺结核里，这与《橡胶灵魂》正好相反，后者（这一点我们还将看到）尝试克服意识探寻的辩证过程，为了挺进到超然于善良与邪恶的领域。但是保罗·西蒙那首歌的另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显得更具决定性，即：“她做了茶匙的标志 / 他做了波浪的

标志。/ 可怜的男孩换了衣服 / 涂抹剃须后润肤水 / 以补偿他普通的鞋子。”我觉得这里隐藏了多个暗示。女人做了一个茶匙的手势，男人做了一个波浪的手势，这让我回忆起一则趣事，它讲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争论怎样以最佳方式把一根绳子缩短。他认为用一把刀，相反她则认为用一把剪子。这种平庸的比较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并不断激化。最终男人把他的妻子推上一艘小船，为了在湖中央再次向她提出那个问题，希望她能够妥协，在刀与剪子之间优先选用前者。当她拒绝这么做时，男人不假思索地把她从船上扔了下去。女人沉入水中，但在她溺亡之前，她又再一次浮出水面，在肺部已经灌水的情况下，用食指和中指做了剪子的手势。在这一讲述背后隐藏着比描写无法控制的争执冲动更多的东西吗？比如指明由刀所象征的毁灭性切割的不同文化，以及指出由剪子所象征的保留性剪切的的不同文化？可惜在此不适合对这一问题进行更详尽的探讨，因为我还想谈及对保罗·西蒙歌词的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把我们引向奥古斯丁，他一边对信仰问题进行思考一边在海边漫步，在那儿遇到一个小男孩，男孩坐在沙滩上，用一把茶匙把海水舀到一个洞里。“你在那儿干吗？”对于奥古斯丁这一令人吃惊的问题男孩回答说，他在把海水舀干。把海水舀干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用一把茶匙，奥古斯丁教训他说。对此男孩回答道：想要通过思考领会上帝的伟大同样是不可能。有意思的是，奥古斯丁总是在他过于坚持思想的时候遇到一些儿童，他们提示他怎样能够真正和远离反省增强他的信仰。但是被象征为茶匙和波浪的男人和女人，在保罗·西蒙的歌里同样不能详尽地解释自己。此外女人在自己的鞋上缀上钻石，而男孩则穿着普通的鞋子，因此他换了衣服并涂抹剃须后润肤水。换衣服当然是作为引子，必须被理解为成年礼。但是在对普通鞋子的羞愧心理中还隐藏着第三种动机，它又将我们引回到披头士乐队的《橡胶灵魂》上。在1856年3月13日大约清晨5时许，夏尔·波德莱尔被一种声响从梦中唤醒，就跟我自己今天早晨的情况完全一样，他认为那种声响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描述了它。米歇尔·布托尔详细分析了那个梦境，梦里波德莱尔光顾了一家妓院。他意识到在他走进前厅时，他的阴茎吊在敞开的裤子外面，他自己认为在这样的地方这种情况是不恰当的。同时他的双脚感觉潮湿冰冷。低头看时才发觉他正赤脚站在一个水坑里。他决定上妓院的二楼去洗脚。还没有到楼上他就迷陷在不同的过道里，

在那里人们能够看到画有鸟类和不知名的无形生物的图画。他不敢跟任何姑娘打招呼，因为他对自己赤裸的双脚感到羞愧。在他继续往前走时他的一只脚被穿上了鞋子，然后又是另一只。最后他碰到一只活着的生物，它在这家妓院里出生并蹲坐在这里的一个小平台上。它必须蹲坐，因为从它的脑袋里长出一种橡胶状的阑尾，它把这种阑尾缠绕在自己的肢体上，这种橡胶蛇又长又沉，以至于它无法把它卷起来随身携带。波德莱尔和这个橡胶人聊了起来，得知它最害怕用餐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它必须带着它的赘生物坐在所有的漂亮姑娘中间。在此缺失或者不完整鞋子的象征被赋予了一种明显的性的隐含意义，它暗示对自己身体和性器官缺陷的羞愧。由此看来《橡胶灵魂》无异于一种使我们承受负担的阑尾，它以形形色色的宗教形式从我们体内长出，尤其让我们充满了羞愧和害怕？一个我们用以衡量痛苦的纲领，就像约翰·列侬后来在其对所有宗教和偶像的终曲里将要表述的那样？如果只是初步地对宗教及哲学批判的要义做出反应，人们就能发现《橡胶灵魂》涉及的是一种先于时代的纲领性专辑，在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都围绕唯一一个主题：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探究存在意义的本体论问题。披头士乐队成员强调说，他们仔细考虑了歌曲的排序（“我们在排序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此番强调是不无道理的。首先映入眼帘的当然是一首名叫《流浪的人》的歌曲，歌中人变成了海德格尔式的人物。因为如果人们在《存在与时间》里寻找海德格尔的相关定义，人们就会注意到在人与像“无人”“从不”和“不”这样的否定词之间存在着多么密切的联系。在此仅举几例。“某人（……）就是无人，所有彼此间的存在都已经把自己交付给了无人。”或者：“只是某人与存在一样都很少在场。某人的举动越明

显，他就越隐蔽和令人费解，也就越不是虚无。”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某人以非独立性和非真实性方式存在。这种方式并不意味着降低存在的真实性，跟某人一样无人也不是一种虚无。”披头士乐队以忠实的虚无主义方式也剥夺了无人的处所，彻底消解了既有的价值观，为了达到《为自己想想》这首歌的要求。在几乎每一首歌里旧有的价值观和协定都被揭露为假象，例如《我在看穿你》，它必须与《你不想见到我》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通过在各自唱片面分别作为第三首歌的位置，另一方面是通过两首歌所依托的逻辑，根据这一逻辑那个把自己

隐藏起来但我却能够看穿的人无法识别出我，因为他认为，我也会把自己隐藏在我事实上现身的地方。这是任何恋爱关系中的根本性窘迫，在治疗过程中的打交道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与情人不同，治疗医师不会通过相互脱去外衣和衬衣获得信任，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确定的那样，医生必须抗拒病人的幻想表演，即使他把这种情况解读为拒绝。但是乍一看没有宗教-哲学语境嫌疑的《橡胶灵魂》上的歌曲，在仔细观察时也会暴露为明显的，尽管也是加密的对上帝主题以及对权力和虚无主义意愿的表述。如果人们比如仔细观察《开我的车》这首歌，那么表面上看它好像是一种求职面试，面试中歌手表示愿意给一位女士当司机。歌里的各个节段也的确像是为一种口头上的工作协议而做的预备性谈判。人们在共同考虑是否能够启动一段商业关系，如果时机成熟并且人们达成一致的话，结果却表明那位女士根本没有车，在她购车之前她首先更需要一名司机，而现在她找到了这样的司机。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复杂。在这里司机果真是一个流浪的人，因为他没有处所但却需要一个处所，为了定义自己的功能。在这种窘迫中他似乎面临着虚无。他有一份作为司机的工作，但却没有能够用以发挥自己作用的汽车。更有甚者，他的女委托人希望的是通过确定他的功能而使自己有一辆车。我们必须从这种所谓人际关系的僵局中象征性地看出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在宗教里我们也赋予上帝各种功能，反之上帝也赋予我们各种功能，对此却不存在一种必要的行为框架。在披头士乐队的这首歌里整个主题还得到另一种映照，因为歌曲是以这个问题开始的：“问一个女孩她想成为什么。”所提的问题原本是她想从事何种职业。但她却通过给提问者分配了一个职位回答了该问题，一个应当使她受益的职位。这样一来无法再对施为者及其各自的愿望进行明确的区分，处所和功能第二次重叠在一起，它们因为互换性而在选取上显得更为随意。这是以被尼采批判为错误的虚无主义形式，对空缺但却存在的处所的一次成功的攻击。从形而上学层面对语言的不断拷问对于真实和极端虚无主义而言具有特殊意义，这不单单见于对这一主题来说纲领性的歌曲《词语》里，在这首歌里人们能够找到这样的自白：“一开始我误解了 / 但现在我得到了它：这个词真好。”“一开始”当然指的是圣经的创世故事，故事里上帝通过纯粹的语言行为让世界得以产生。这首歌是在旧约全书里的“一开始上帝创造了天地”和新约全书里的“一开始是词语”之间选取了第三条路，即完全按

照尼采意图的对错误的自白。“一开始我误解了。”一开始是错误。尼采把错误描述为“自己思想”的前提。对于披头士乐队而言的类似说法是，我首先搞错，然后理解。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听到它在继续述说，“在我读过的好书和坏书里”，这样看来词语既是好的也是坏的，因此我们已经远离了善、恶的范畴，已经处在不但一而二的领域。在对词语和尼采作品中作为概念范畴的错误进行明确的自白之后，接下来是给第一面唱片画上句号并暗示理论意义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米歇尔》。“美丽的米歇尔 / 这几个词语组合得多么动听”，名字取代了词语。但是现在“米歇尔”这个名字又有了一些特殊的内涵，因为它向人们指出了一种性别上的双重意义，这种性别歧义只是在书写时（Michel/Michelle，米歇尔〈男名〉 / 米歇尔〈女名〉）才变得清晰。也就是说，意义在文字里显出差别，但在声音里却是雌雄同体的并呈悬浮状态。如果对这个名字进行切分，人们就会得到 miche 和 elle 这两个组成部分。Elle 意为“她”，是表示女性的人称代词，它通过自己被写入名字而获得了在场，使原本应当描述“你”的这个名字不断地移向第三人称。在我说“你，米歇尔”的时候，实际上我说的是“她，米歇尔”，那边的那个。通过称呼他者的名字，我是在把它从自己身上移走，同时又在暴露出自己。但是如果我把 Mi 从 Michelle 上拆分，把它作为前缀来读，使它描述“一半”“同中心”的意思，那么我从 chelle 也能辨认出 scellé（“印章”）或者 sceler（“盖章、确认”）的意思：通过这个名字一些东西总是只被盖了一半的章，这种印章或者抵押同时又总是被清除。《米歇尔》这首歌的歌词里有一处乍一看奇特的思想逻辑上的错误。歌手对一个名叫米歇尔的姑娘唱道：“我只说我认为你会理解的话语。”这个句子指涉的是“美丽的米歇尔”那个人。如果我们认为被打招呼的是法国女人（这从名字就能看出），打招呼者是英国人，那么法国女人几乎不可能只听懂自己的名字和 ma belle 这一名称，而是将会理解广泛得多和数量大得多的法语词汇。更确切地说情况正好相反，即歌手只拥有非常少的法语词汇量，因此更正确的歌词肯定是这样的：这是我唯一会说而且你能理解的话语。只是这里预设了一种巧妙的意义游戏。因为在其他地方歌里唱道：“我需要，我需要 / 我需要使你看到 / 哦，你对我意味着什么 / 直到我真的希望 / 你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这首歌里出现过两次“意指”和“意思是”概念。一次是“我想让你知道，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另一次是“我

希望你知道，我意味着什么，我指的是什么”。意义在彼此混淆。语言无法使意义清晰，因此人们必须在语言以外去寻求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或者能够发生之前，他将会重复那些唯一的词语，他知道她理解它们，也就是能听懂自己的名字。所以情侣在说出对方名字的时候也总是表达出一种希望对方能够理解的隐含意义。当然《米歇尔》

(Michelle) 也能从音乐角度加以诠释，即作为Mi-Echelle，也就是以E音阶的形式。《米歇尔》(Michelle) 这首歌本身是F大调，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也就是说，E音阶至少在C属音里出现，但是B大调下属音还在第二个和弦里就降为B小调并过渡为降E大调，这样我们在和声上的确不处于F大调，而是确切地说处于不含E音阶的降A大调。在倾听这首歌时，大调和小调之间的来回摆动制造出一种特殊和奇妙的效果，这种效果只在副歌的结尾处得到了明晰，比如在“我的米歇尔”或者“不错的合奏”处响起了作为和声的C大调和弦，它又通过属七和弦G7得到了加强。也就是说类似于一首舒伯特的歌曲，音乐表述支撑了文字表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译相当于大调和小调之间的切换，仅仅是在提到名字时才产生表现为大调属音的清晰的和声，这是F大调和F小调共有的属音，其标记为E音阶，也就是Mi。慢慢地这张专辑清晰的结构和被精确计划的播放顺序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每一首歌都与另一首在主题和内容上相互关联。在描写人的作用和身份的教育歌曲

《开我的车》之后，荒谬性在《挪威森林》里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他拥有那个女孩，还是女孩拥有他？他应该坐下来，但是那儿没有椅子。最后她上床睡觉而他躺进浴缸，浴缸的中空形状能够让人回想起勺子的标志，大海或者至少弗洛伊德的海洋的感觉可以被指派给床，这样我们在不成熟的孤立无援之路上再次接近宗教范畴。但是男人和女人唯一的共性是对挪威森林的重视，这样的重视他和她都有所表达，但却带着完全不同的意图：她赏识木材是为了制作她的家具，他喜欢木材则是因为它具有良好的燃烧性能。在语言转向存在和处所之前，《你不想见到我》这首歌对时间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次又一次 / 你拒绝倾听”，在这首歌的过门里这样唱道。这里已经暗示出，时间作为概念是应当被看到的，好像有不同的时间存在，因为日期感觉像年岁，小时感觉像秒。然后时间又变成了一件物品，这样的物品人们能够找到但也能再次失去：“我们失去了时间，它很难再被找到。”一切都是为在《为自己想想》这首歌里借助纲领性的开头“我有一两个

字”、通过后几首歌导入的对语言的分析所做的准备，这种准备在指涉这一事实中达到高潮，即专有名词作为最初始的词汇代表着自我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它会过快地转移到第三人称。尼采在向妄想过渡时把自己描述为是被钉上十字架的人，跟他类似约翰·列侬早在披头士乐队解散之前就已知道：“现在看来他们想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大约在同一时期保罗在歌里唱到了我们欠缺反省的复杂之路，这条路最终经由丑陋的历史壕沟通向希望之门，门后便是思想的终点。在保罗演唱《蜿蜒长路》这首歌时，他已经死了三年半了，因为他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凌晨5点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佩珀军士》专辑的封面上他带有血迹的手套放在秀兰·邓波儿·玩具娃娃旁边，他的替身演员戴着一副印有OPD（正式宣告死亡）字母的臂章，也因为他在《艾比路》专辑上身穿着黑色西服上衣，作为乐队四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右腿朝前穿越马路，主要是因为他现在终于可以脱去带有橡胶鞋底鞋子赤脚走路，同时停在附近的大众车的车牌号是LMW 28 IF，它的意思不外乎是：琳达·麦卡特尼成为寡妇，保罗将会是二十八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但主要是他作为唯一的一个人所佩戴的黑玫瑰暗示出他的过早死亡，而其他披头士乐队成员则身着白色的西服上衣，在其影片《魔幻神秘之旅》中作为歌手

登场。他们唱的是哪首歌呢？是《你母亲应该知道》。因为保罗在他的车里被一个女人分散了注意力，结果飞速撞向一辆满载香蕉的卡车。跟杰恩·曼斯菲尔德一样他也在车祸中掉了脑袋。但是他的头滚出十多英里远，一直滚到她母亲的坟边。《你母亲应该知道》这首歌的歌词以矛盾的形式与这种朝向起点的循环回归有关，母亲就象征性地代表着这一起点，她是唯一一个能够超越自身存在朝两个方向瞭望的人，她也能觉察出什么已经先于她而发生并制约着她，因为歌里唱道：“让我们全体起立，配着一首歌跳舞 / 在你母亲出生前那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 虽然她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出生了 / 你母亲应该知道 / 你母亲应该知道。”或者就如尼采自己所说的：“我存在，为了以谜语的形式来表达，当我父亲已经死去的时候，作为我母亲我还活着并变老。”

以此我想结束我的阐述，并对你们费了很大力气专注倾听表示感谢，虽然大多数话题我当然只能简要提及，正如物质的复杂性所表明的那样。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回家

我们三人都没有睡个安稳觉，但是现在当我们沿柏林大街行驶并转入施特雷泽曼环路时，我们直起身来舒展四肢，明爱会那位女士朝我们转过身来，说我们马上就到了，问她能否让贝尔恩德和克劳迪娅在火车站下车。他们俩都说没问题，但然后他们想起他们身上根本没带钱，这时明爱会那位女士用一只手伸向她的手提包，打开包取出两枚五马克的硬币，把它们递向后座，我也更愿意和他们俩一块儿在火车站下车，站在那儿抽一根烟，而不是和明爱会那位女士单独坐在车里驶过最后的路程。现在竟然和她一块儿回家，这么早当所有的人肯定还在睡觉的时候，尽管第一班工人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也就是说门卫已经到岗了，他会挥手示意我们驾驶的欧宝舰长汽车通过，即使他看不到我坐在后座上。就连在火车站也还看不出一丝热闹，我在想，下周我索性赶在上学之前早些起床，出来骑自行车兜一圈，把一切都仔细地看一遍，因为早晨的时光如此独特，看不到成年人的身影，我想起自己只有一次这么早来过火车站，当时在我们班去罗腾堡郊游的时候，但这时明爱会那位女士已经在弗里德里希皇帝环路公共汽车站对面停车了。

东德的那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非常和蔼，临行时给我们提供了色拉米香肠面包，还有那些由施马尔卡尔登的一家奶油杏仁糖工厂生产的条状水果干，这样的水果干原本只是专供运动员的，因此它们也叫DTSB水果干，其中的缩写意为“德国体操运动协会”，该协会也有自己的标志，就像我为1913红军派所绘制的那样，但它的标志设计不是自上而下，而是从左向右，TS字样在突前的位置，很有立体感，但不像Supermann（超人）的字体那样朝一侧变小，而仿佛是人们从棱角出发审视一个盒子。此外她还送了我们一些纪念章。贝尔恩德得到了一枚带东德国旗的，下面写着“东德建国十九周年”的字样，因为这些新的纪念章是10月份才刚刚到的，我也得到了一枚非常精致的，中间刻着一种飞碟，飞碟四周写着“泥鸽—移动靶欧锦赛，苏尔，1967年”，

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不想去打听，因为那位女警察或者女军人非常和蔼，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很多问题。但是克劳迪娅得到的纪念章最漂亮，因为那上面有列宁像，以镀金的形式向上凸起，底面是绿松石色的，可我们一越过边境重新回到德国，明爱会那位女士就收走了我们的纪念章，把它们干脆从车窗扔了出去，我觉得她这么做讨厌极了，因为她没有一丁点儿的改变，我也完全无所谓她来自东德还是西德，反正我也不理解为何她又和我们开车回去，因为要么她来自东德，那么她在这里就会被捕，要么她是西德本地人，那么人们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地放她走。但或许她也干脆是阵前倒戈或者被收买了，现在我永远也不再可能和她分开了，因为现在我应该高兴如果不用再上寄宿学校，尽管这对我来说也都无所谓。我也不再那么害怕东德了，如有必要我就逃到那里去，虽然我不太清楚怎样做到这一点，不清楚是否人们可以这么简单地越境，或者是否他们也会向人们开枪。或者是否我们的士兵会向我开枪，但我还有时间搞清楚这些。

我禁不住很快想起沃勒和其他人，思考他们现在是否必须去教养院，他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因为我很想知道，是谁抢劫了毛厄夫人的商店并发动了所有其他的行动，但或许克劳迪娅也能在基层工作小组查明这一点，但愿她和贝尔恩德还记着我们周六在洛赫磨坊场碰面这回事。可能开始这段时间我不能再外出和其他人聚会了，因为明爱会那位女士说，这样的交往对我来说很不利，还说我父亲现在更信任她了，我母亲也是如此。我在想对某人来说一种不利的交往方式是怎样的，是否贝尔恩德和克劳迪娅的父母也这样说我，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尽管我其实一点儿也不在乎成年人说什么，肯定也不会在乎贝尔恩德和克劳迪娅说些什么。

在我们让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在火车站下车之后，我们沿林荫路继续向上行驶，现在天才慢慢变亮，不知怎么地我甚至有些高兴回到了家，高兴又从学校旁边驶了过去，但只高兴了一小会儿，因为我又回想起我留级了，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因为我不想像阿希姆或者赖讷那样学一门手艺，但也不想进寄宿学校，去东德也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因为我至少必须十四或者十六岁才行，无论如何也不愿返回天主教神学院，因为我无法想象成为牧师，也无法想象当天主教神甫或者

宗教课教师，因为我总归更愿意当演员，即使人们必须上骑术课和击剑课，必须背下很多东西。我母亲说过，想当演员人们就必须能够熟诵席勒所有的叙事诗，因此我也已经开始熟记席勒的《手套》，而且多少也记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又开始背诵《潜水者》那首诗，但背完前两节后就无法继续了，相反歌词我却记得很轻松，我能熟练背诵整个《橡胶灵魂》专辑，也包括《左轮手枪》专辑，其实所有披头士乐队的唱片我都很在行，只是特别早的除外，像《披头士待售》那样的录音室专辑，因为那张专辑上并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非常好听。但是当演员这回事也不是非做不可。也可能是随便其他一些职业，因为我也喜欢画画，如果我继续上著名艺术家培训课程，或许我能够走上绘画之路，虽然人们在培训课上不会学像雅弗林斯基或者鲍迈斯特那样的绘画艺术，也不会学像达利那样的艺术风格，他的画风太难了，就像他画的那幅《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从上面看如此有立体感，或者他画的那幅反映自然风光里滑稽造型的装饰画，因为喜欢我把它挂在我的房里，或者唐吉，其实我觉得他的画更好，因为他总画小人物或者石头或者类似的东西，但有人曾对我说过，他总是把一切都颠倒过来画，画完之后才把画作翻转过来，这当然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也未必这么做。

询问解释和澄清的区别

解释您这种情况.....

为了澄清某一事实情况，在东德的侦探小说里人们总是被询问或者被传讯。我觉得不管怎样这听起来都更富有建设性和更现实，它能以某种方式让人镇静。

在这方面请您不要曲解。您不会认为您在那边凭您的伎俩就应付过去了吧？

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审讯风格，这一点您可以相信我。但如果这要给您更多的允诺.....

“解释”（Aufklärung），在德文中也有“启蒙运动”之意。

我只是认为，“解释”^①这个词，或者整个解释计划干脆是失败的。

啊哟，现在又轮到您的蒙昧主义者表现自己了。

您指的是阿多诺？

他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从未真正走出过黑森州的乡村，这跟您完全一样。

是的，当他描写形而上感受的时候，原本甚至是人们从奥特巴赫、瓦特巴赫、罗伊恩塔尔和蒙布隆恩这些乡村名字上所感受到的希望。此外所有这些都不是黑森州的村庄，甚至连蒙布隆恩也不是。

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是指蒙昧主义？其实我不太清楚。除非您在指塞尔，这些我无法正确想象。

塞尔？

他曾经断言，福柯把德里达的工作方式描述为是蒙昧恐怖主义，但我认为这是不可信的或者是忽视语境的断章取义。

是吗？您是这样评判的？

就我而言不是。但是塞尔遭到了德里达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就跟您也没有其他办法一样。

这话是什么意思？

人们尽可能调唆所有的人相互争斗，声称有人说过另一个人的工作方式是不清楚和不准确的，然后当人们批判这种工作方式时，又说它是恐怖主义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宣称，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我觉得他那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挑唆人们相互争斗，是操纵。

您是这么说的。但“恐怖蒙昧主义”这个概念恰恰令我感兴趣。它适合很多现象，也适合您的红军派，当然也适合您本人。整个责任感的缺失都隐藏在这个概念当中，这种不准确的分析，它又导致一种同样不准确的批判，然后当人们一再询问时，人们就可以说是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

询问？您真有意思。“问询！”也没太大区别。此外您偏离话题了。

如早已承认的那样这是您擅长的专业领域。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解释。我在问自己，与澄清不同，是否解释不仅在辩证思想方面，而且总体来说在方法手段上也都失败了，因为它有太多的计划。假如我

们拥有一个澄清的时代，这难道不是愉快得多的事情吗？

借助这样的时代我们就避开了所有的革命？现在您在回顾过去的时光时还是脱离了您不成熟的思想，这很有意思。我祝福您。请您与过去决裂，请您清算和澄清，如果您不想解释的话。

我是别的意思。

我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人们当时看到了那种情况，一方面是残忍.....

您在说红军派？

不，我说的是警察、国家机器、当时整个无知的态度、欢呼的波斯人，您能回忆起，那些明显的不公，然后是在全球层面上，无论我想说些什么，都会自动引发人们想要对之加以反抗的条件反射。然后是全部的纳粹，他们装出一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

我刚才还以为我们前进了一步，可现在您又是这种官方通告的强调。

是的，当然了。您说的对。如果人们再回忆一遍当时是怎样的场景，而且最终人们只能从感情上这么做，那么人们就能理解，一切都产生于那种不精确，产生于那种感觉.....

正是产生于那种蒙昧主义。

您现在不知怎么地爱上了这个概念。但是就我而言，虽然，不，不是就我而言，因为它已经成为类似于政治标语的战斗概念了，它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人们故意使一些事情含混不清，为了使自己已经受得住攻击。

但是您过于使自己处于防御地位了。您想一下乔伊斯以及他是怎样与解释尝试打交道的：如果我能往主题上投下任何晦涩朦胧的话语，请让我知道。

是的，您说的有道理。我们最好还是谈文学吧。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我们还是停留在“解释”这个话题上吧——它与澄清不同。停留在失败的革命尝试上，停留在从混乱中诞生的恐怖上……

人们下了这么大功夫，为了从这种混乱的感觉中创造出一些东西，一些人们能够依附的象征性的东西，从而使自己根本不再对解释感兴趣。相反，人们想一再沉浸其中。

沉浸在这种感情的旋涡中？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您认为一对情侣喜欢解释吗？您认为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一名抑郁症患者喜欢解释吗？

那一名恐怖分子呢？

在我看来也不喜欢。他们都害怕解释就跟魔鬼害怕圣水一样。

您知道魔鬼是通过圣水才产生的吗？

知道，这您是从我这儿听到的。

我只是想再提醒您一下。

您想打乱我的计划。

这么说您有一个计划。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当然我有一个计划。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

为了缩短整个过程，不妨换一种提问方式：您喜欢解释吗？

是澄清。我想澄清。我想澄清一个事实。就我而言也可能是若干事实。我想澄清当时是怎么回事，今天又是怎么回事。

但就是到不了解释整个事件的程度？

您难道不理解吗？解释干脆就是一种新的谎言，它同样模糊朦胧，尽管它高举阐明的大旗。没有象征性的东西，没有形而上学的东西，只有公民，他必须摆脱自己咎由自取的未成年状态。

可这种未成年并非错在自身，您是想这么说？

这又一次显露出原罪的痕迹。

这种想象不知怎么地会伤害到您，不是吗？

您注意到了吗，大多数儿童游戏都与灾难有关？

我觉得，它们之间的关联我不是很明白。灾难？

抓人、捉迷藏、红绿灯游戏……

当然是以无危险的形式，但是人们更偏爱紧急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遭到威胁，不得不躲藏起来，逃跑，不露出一点儿动静。

最后必须要有随便一种刺激、一种挑战。

是的，当然了，这种挑战与生活中的各种危险有关。生活就是这么设计而成的。所有的关系就是这么设计而成的。恋爱中的人也是这么做的。

啊，原来您想说的是这个：一切只是一场游戏，但突然某个环节出现了差错。比如性爱游戏，用这样的游戏情侣们想使他们的关系更富有活力。再比如红军派的恐怖游戏，其实它们仅仅是游戏性或试探性的联想活动而已。然后这应当为一切开脱罪责？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象征价值或者更贴切一些是象征的意义被低估了，在我看来。

是您低估了这一点，我亲爱的朋友。是您没有意识到这个。现在您才恍然大悟，是的，现在.....

克劳迪娅或者历史的敏感性

克劳迪娅问自己人们怎样等候。

她把囚室称作铅室。

在此她指的不是卡萨诺瓦逃离的威尼斯铅室。

这样的铅室她不知道。

此外她无法合理想象怎样成功地逃亡。

克劳迪娅在思考，人们究竟能否等候，如果人们必须等候的话。

她看见伊卡洛斯跌入一个漠然的世界。

农夫目不转睛地盯着耕犁。

牧羊人朝另一个方向望去。

垂钓者只伸手去抓他的钓线。

就连太阳也开始下沉，仿佛它想让（伊卡洛斯的）死亡显得无益、荒诞，尤其是咎由自取。

克劳迪娅思考了片刻，任何死亡都是咎由自取的。

也包括在铅室里的死亡。

最终她还是逃离了铅室。

逃入太平洋。

逃进宁静的大海。

安息之海。

远离荒凉地区的岩石和城墙，前景处是露出水面的僵硬的腿。

克劳迪娅在考虑，在画面上的哪个地方能够找到代达罗斯。

代达罗斯，他创造了飞行和坠落的可能性。

有关的讲述是男人们的讲述。

那些失去儿子的男人们。

也失去了女儿。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因为他们过快地忘却。

克劳迪娅不会忘却。

因此她无法逃脱。

太平洋大的令人难以想象。

覆盖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地表。

人们可以未被注意地坠入太平洋，未被察觉地在它里面下沉。

克劳迪娅在思考，是否人们也能不知不觉地在它里面生活。

她在专心研究阿里阿德涅的神话。

这个角色好像被分配给了她。

尽管怀孕是不可能的，她这么认为。

自从她来到了岛上，她的月经就再没来过。

歌剧《纳克索斯岛上的阿里阿德涅》。

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生下了一个孩子。

虽然她生下了孩子，虽然那是她做的梦，可她却从孩子的视角看待一切。

孩子被拖拽到世上。

在孩子被拖拽到世上期间，母亲也就是克劳迪娅死了。

尽管如此克劳迪娅仍在继续做梦。

孩子被放到母亲的死尸上。

孩子感觉到母亲慢慢变凉的肚子。

只有在母亲完全消失之后，孩子才能独立思考。

母亲的腹部开裂，开始向内塌陷。

最后孩子一个人躺在一块蓝色的毛巾布上，在思考自己的第一个想法。

他想到了抢银行。

因为一名新生儿无法用他自己的第一个想法回忆一些事情，所以克劳迪娅又醒了过来。

现在克劳迪娅在回忆抢银行的事情。

她回忆这件事是为了转移自己对于孩子的注意力吗？

人们可以通过抢银行转移别人的视线吗？

在关于米诺斯和代达罗斯的讲述中不断出现的公牛象征的是人们无法逃脱的命运。

代达罗斯象征的是理论和神圣的东西。

他的名字意味着人工的和雕刻的东西。

他体现的是神像。

他体现的是自我取消。

代达罗斯为帕西法厄建造了一头人造母牛。

帕西法厄把自己藏在母牛体内并与公牛交配。

帕西法厄生下了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洛斯。

代达罗斯为弥诺陶洛斯修建了一座监狱。

它就是那座迷宫。

代达罗斯制造了各种外壳和形状。

没有内容。

内容挣脱了束缚它们的形状。

为了捉住那些失控的内容，代达罗斯又创造了新的形状。

他是人工的创造者。

代达罗斯向阿里阿德涅透露，她怎样能够凭借一根线把忒修斯带出迷宫，这样一来就取消了他自己的发明创造。

代达罗斯一边创造一边后悔。

只有在他创造出一些东西之后，他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但他没有从懊悔中学到任何东西。

代达罗斯为躲避米诺斯国王而逃亡。

他从一个岛上逃到另一个岛上。

米诺斯召集了周边岛屿的所有国王，给了他们每个人一枚螺旋形贝壳和一根线。

国王们应该把螺旋形贝壳穿在线上。

但他们都失败了。

只有西西里岛国王科卡罗斯在螺旋形贝壳的尖上钻了一个孔，把线绑在一只蚂蚁身上，让蚂蚁从那个孔钻了过去。

现在米诺斯知道了，是谁把代达罗斯藏了起来。

这是一种类比推理。

科卡罗斯没有看出贝壳的类比性。

米诺斯只是想到了她女儿的背叛和细线，以及那个把他女儿和细线联系在一起的人。

米诺斯陪同科卡罗斯前往西西里岛。

科卡罗斯无法拒绝这次同行。

在抵达西西里岛之后，科卡罗斯为欢迎米诺斯让人为他准备了一次洗浴。

当米诺斯在浴池里坐定后，科卡罗斯的女儿们把沸水倾注在他身上。

米诺斯死了。

米诺斯被埋葬在西西里岛上。

人们无法逃脱这个岛屿。

女儿们又必须做准备了。

克劳迪娅想起当地关于自杀天使的传说。

她问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这个故事。

她的语言知识不够好。

她不知道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正确理解一则神话。

尽管如此人们有可能错误地理解神话。

克劳迪娅想起贝尔恩德。

贝尔恩德说：人们不会和那些人交谈。说完了。

贝尔恩德取笑领导人员办公室楼层使用的肥皂。

他说：那些肥皂早已不再是用骨头制成的，而是用花粉做的。

尽管事情和计划好的抢劫行动毫无关系，可克劳迪娅还是必须上楼去管理楼层。

那是一种考验。

这样的考验使克劳迪娅大为恼火。

现在她也希望，那些人当中的某一个跳出窗户向下滑翔，降落在售货亭前面的一摞日报上。

同时她认为自己总是做出错误的思考。

同时这一切令她回想起她所在的剧团。

因此你不是行家，贝尔恩德说道。你永远也不会成为行家。

因为克劳迪娅不是行家，所以她在关键时刻站在那儿凝视着天空。

尽管时间在围绕着她的双腿抽打。

就像在跳橡皮筋时一样，如果一个人一言不发干脆跳了出去。

她只是在那儿站着，而所有其他的東西都在旋转。

人们面部扭曲。

贝尔恩德喊道：快走。我们必须离开。走啊。马上离开。快点儿。快跑。

克劳迪娅想再次转过身去。

不，贝尔恩德喊道。

如果人们再次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人们就会呆若木鸡。

人们必须把做过的事情忘掉。

否则人们无法建立新的共和国。因为克劳迪娅无法忘却，她至少想使得她的家人全部死掉。

她想促使国家灭亡，而国家是那些能够忘却的人建立的。

克劳迪娅极其缓慢地抬起头来。

克劳迪娅极其缓慢地把头转向高处。

克劳迪娅极其缓慢地望着天空。

仿佛那是另外三十天中的一天。

众多试跑当中的一次。

仿佛她还一直能回来。

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游戏。

玩笑可以成真，人们随便这么说说。

以此人们想随便说说的是，严肃的事情不是从自身出发而存在的，而是以玩笑为前提。

因此人们应当拒绝玩笑吗？

也许吧，克劳迪娅在想。

或许这就是禁欲的意义。

从而使玩笑不能成真。

因此对禁欲主义者来说一切都是玩笑。

我要是能这么做该有多好，克劳迪娅在想。

说得更贴切一些：我要是这么做了该有多好。

取而代之的是她只会严肃。

极为精确地重复着每日流程。

仿佛那是跟什么有关。

一直这么做，直到它跟什么有关。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每天巡视路线。

每天都站在银行分行门口。

真的每天都是如此。

克劳迪娅把这样做当成纪律。

克劳迪娅把这样做当成禁欲。

可是已经太晚了。

这样做已经变成了严肃。

如果这样做是严肃的事情，那么禁欲就不再有意义了。

人们必须重返玩笑。

然后人们才能成为禁欲主义者。

这是神秘主义者的秘密。

克劳迪娅跨越岛屿。

同时她看到了一切：草席、裹在脖子上的绷带、体温计。

她躺在棚屋里，隐约感到屋前有背着书包的孩子们。

孩子们在互掷雪球。

克劳迪娅必须一直躺着。

在吞咽时她感到嗓子疼痛。

然后她醒了过来。

一下子又醒了过来。

被灭火器里的东西又弄醒了。

那是房管员在栽倒并躺在地上之前，从背后扔给她的灭火器。

刹那间感觉像是在下雪。

白色的雪花，里面夹杂着房管员的血迹。

雪白和玫瑰红。

克劳迪娅在思考，如果和一个同龄的姐妹而不是弟弟在一起会否是另一种情况。

一个姐妹，她拥有人们缺少的一切。

但她还是和人们很相似。

克劳迪娅问自己什么是相同的。

克劳迪娅问自己什么是陌生的。

她问自己，为何在醒来时她总以为自己是在家里。

在她孩提时代的家里。

她已经三十多年不在这个家里了。

至少。

这个家根本不再有了。

这个家只在她的梦里还有。

克劳迪娅问自己，是否物品在梦里不容改变，因为否则人们就认不出它们了。

她问自己，梦之所以显得那么不真实，是否是因为人们在不变的事物中运动变化。

她问自己，梦里的恐慌感是否产生于变化和不变之间的矛盾。

克劳迪娅认为，即使是陌生的东西肯定也附着了一些熟悉的因素，为了总的来说能够被觉察出是陌生的。

陌生和熟悉产生于客体之于语境的张力关系。

语境好比是苍穹。

它填补空虚。

它渗入空隙。

即使无法解释的东西也有语境。

例如空中光的反射。

克劳迪娅在想：也许那是一架来接我的飞机。

她只是在想：为了来接我。

而没有考虑它来的目的是拯救还是抓捕。

她把这种思想称作没有语境的思想。

它是一种安慰，如果人们不再有希望的话。

人们让自己的句子不受质疑。

仿佛这些句子是另一个人想出的。

人们不再问用这些句子想表达什么。

克劳迪娅在想：那么奇迹呢？

该怎样解释奇迹呢？

奇迹也需要一种语境，在这种语境下它才能变得神奇吗？

一个事物有一种无法被看到的语境：或许人们可以这样定义奇迹。

奇迹以创伤作为语境。

所以看着某人伤口流血并因此而死亡，这样做不仅是残忍的。

同时这也是奇妙的。

白色泡沫中的红色伤痕。

伤口的奇迹。

圣徒身上无数的伤痕都在流血是不无道理的。

他们甚至从木头和石头里流血。

跟创伤一样奇迹也很难令人忍受。

如果克劳迪娅不受任何人打扰，沿岛上的小路从女人、儿童和男人身边走过时，她就会感觉自己是隐身的。

因为她对居民来说没有语境。

没有语境的东西是不能被看到的。

没有语境的东西会漂浮过去而不被认出。

因为我们甚至都看不出它是隐形的。

因为我们甚至都猜不到它竟然是存在的。

它是令人敬畏而又向往的。

被抓住就意味着被拖入一种语境。

那是国家和权力的语境。

那是警察和特工的语境。

当局所做的无非就是创设语境。

日复一日。

语境就是它们的网络。

代达罗斯接受了他十二岁的侄子作为学徒。

很快他就意识到，侄子比他自己更有天分。

或许他更有天分，是因为他不仅想到了形式，而且也能想象内容。

这与只会盲目行事的代达罗斯不同。

代达罗斯担心他的侄子将会超越他，于是把他从一座堡垒上推了下去。

但是帕拉斯·雅典娜还在空中就把他侄子变成了一只凤头麦鸡。

代达罗斯由此产生了制造翅膀的念头。

代达罗斯不会思考。

他只能理解他看到的东西。

因此他必须创造一些东西。

或者仿造一些东西。

通过翅膀代达罗斯不会真正使伊卡洛斯发生变化。

伊卡洛斯没有通过翅膀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他没有通过翅膀变成另一个人。

他跌入海里淹死了。

他的尸体被冲到伊卡里亚岛岸边。

他也没能逃脱岛屿。

当代达罗斯在那里埋葬伊卡洛斯时，变成凤头麦鸡的侄子出现了并嘲讽他。

自身就在一座岛上的克劳迪娅思考岛屿的意义。

她思考神秘和超自然的东西。

为何米诺斯国王在神秘的中央处游泳。

克劳迪娅低头看自己夜里被抓破的双腿。

跟代达罗斯通过他的创造一样，克劳迪娅也通过伤口来理解。

因此她站立不动，当那个男人倒向一旁的时候。

她转过身去。

她惊呆了。

她想弯下身子。

正好在这一刻贝尔恩德把她拽走了。

克劳迪娅在想：修女和护士俯身查看伤残人员或许不是出于谦恭和善良，而是因为她们愿意观察伤口，为了从中发现奇迹。

既然已经被翻译过来了，那么伤口就必须叫作被施加的东西。

因为它连接了外部和内部。

因为它穿透了外部。

成了内在的东西。

在自身没有参与的情况下。

这就是奇妙之处。

人们不会有这样的愿望。

即使人们特别想要它。

人们不能挑衅它。

即使人们对看守高声怒骂。

即使通过清苦修行也不行。

自我致残。

自我放弃。

自杀。

因为它涉及的始终自我。

人们不能借助自我而变得忘我。

这就是奇妙之处。

宗教是在高度设防的重刑犯监狱里被创立的。

这就是奇妙之处。

克劳迪娅在想：囚室里的沉默（在那儿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够和我交谈）、走廊上和院子里的沉默（在那儿我不能讲话，尽管或者恰恰是因为人们可能会听懂我的话）以及在这里的沉默，这三种沉默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三角洲另一侧，树丛的窄枝杈在沙沙作响。

流水映照在树叶银光闪闪的底面上。

鸟儿拍翅飞起。

克劳迪娅尝试去感受它们的振翅。

但胳膊却一动不动。

肩膀在抽搐。

翅膀称起来肯定很沉。

飞行的声音听起来是多么轻柔。

克劳迪娅被呼唤。

不是真的，但却是在她的梦里。

如果变化的和不变的东西再一次相互抗衡。

她看到那条窄街和街上的高楼。

雪花从房顶上以未雕凿的碎片形状突出在檐沟上方。

一根生锈的晾衣绳被绷紧横穿过院子。

它的另一头是在后屋的底层窗户之间。

靠左在入室门旁边的地方。

在这间住房里百叶窗总是关闭着的。

如果上午没有衣服挂在高高的晾衣绳上，克劳迪娅就会想象自己在绳子上保持平衡，从高处越过院墙看外面的小街，夜里在街上会停着那辆不熄火的黑色的公务车。

她穿过由晾晒的湿冷衣物组成的迷宫跑回到房子里。

克劳迪娅认为自己搞错了。

在走廊尽头的不可能是母亲。

一个胳膊上搭了一条被单的裸体女人。

左脚穿着一只高跟鞋。

屁股上有许多小的压窝。

小腿肚在颤抖。

门厅里有烟味。

有人在吹口哨。

找一个电波发射器。

她根本不可能看到那种情况，因为她甚至都没转过身去。

因为她从未转身。

当时也没有。

尽管如此她跑到外面穿过原野，但却总是到达铺有鹅卵石的同一条小街。

铺石路面因为下雨而发光闪亮。

然后她昏厥了过去。

倒在马路中央。

有人把她送回了家。

肯定是有人把她送回了家，因为她再次醒来时是在自己刷有白漆的木床上。

她穿着一件新洗过的睡衣，脑袋四周缠着绷带。

她只能吃力地喝一口水。

什么东西从外面带着一种咔嚓声在敲打着窗玻璃。

窗帘是拉上的。

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

当她母亲来到房间时，她还以为可能是晚上了。

母亲坐到她的床边。

她在出门时化了妆，闻起来有香水和浆衣液的味道。

母亲往克劳迪娅的嘴里塞了两颗花生。

她亲吻了一下克劳迪娅。

她的嘴唇因抹有口红而感觉粗糙。

克劳迪娅看到她哭了。

当克劳迪娅询问何故时，母亲一句话不说，只是指了指手上的痛风结节。

然后母亲笑了起来，把头发高高盘起在克劳迪娅的床前跳起舞来。

在一个盘子上放着一块烘焙的带坚果的蜗牛形面包卷。

微红色的光线照进院子里。

在母亲正想要走的时候，外面开始下起了雨。

克劳迪娅说：雨水会让你的发型走样。

母亲说：胡说，我事先做了防备。

母亲亮出一个灰色的麻袋。

这种麻袋通常装的都是死人，在他们被埋进土里之前。

它是为普通人准备的一条普通麻袋。

为那些没有钱的人，他们买不起棺材也雇不起棺侧送葬者，恰恰就剩几个马克给拿锄头挖土的人。

他的锄尖嵌入一块根杈并卡在里面。

那个男人利用挖土中断的间隙，点燃了一支方头雪茄烟。

一根光秃秃的蕨类植物的枝杈冻得硬邦邦的悬挂在墓地围墙上端。

一小片纤细的叶子滑落掉进一个绿色的插瓶。

那个拿着尖嘴锄的男人站在火葬场旁边，喝着他的第一瓶啤酒。

他用打火机打开酒瓶。

那个男人在等小费。

母亲把灰色的麻袋又重新叠好。

她把麻袋像围巾一样对角折叠。

母亲说：如果下雨，我就把这条麻袋套在头上。

然后她离开房间。

克劳迪娅从枕头上拽下套子，把头塞到里面。

雨下个不停。

克劳迪娅窒息而死。

母亲塞给拿尖嘴锄的那个男人五马克。

为此他应该挖一个小而舒适的墓穴用以埋葬小姑娘。

树根像栅栏一样在克劳迪娅身上生长。

谁也没能把那个麻袋从她的头上取下。

有人说：我认为，我们可以用土来填塞它。

克劳迪娅想大声叫嚷，但是麻袋在她的头上挤压得更紧了，窒息了每一个音节。

克劳迪娅想从1数到12，但最终只数到9。

因此她没能复活。

有时候会因为最小的事情而失败。

她又一次从头开始。

克劳迪娅在想：我曾经是1吗？

她在想：我曾经是2吗？

在每一个数字上她都这么想。

她必须保持清醒。

不能陷入片刻的打盹。

不能对尖嘴锄失去警惕。

她不能陷入沉思，而是必须要盯紧尖嘴锄。

克劳迪娅想到牺牲自己双手的主意。

或者这样她能够继续活下去。

她把双手伸向尖嘴锄。

尖嘴锄很轻松地就穿了过去。

母亲眼里噙满了泪水。

她随身带来的花生掉进洗手盆下面的小桶里。

拿尖嘴锄的男人被告知，现在需要挖两个墓穴：一个用来埋葬手，另一个用于剩余的身体部位。

剩余的，那就是克劳迪娅。

或者克劳迪娅和她的双手待在一个墓穴里？

毕竟是手构成了人。

用手去抓取构成了人。

没有抓取就没有概念。

克劳迪娅无法做出决定。

拿尖嘴锄的男人说道：以前这种情况很正常，您所想的绝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情况，它是屡见不鲜的，它是常见的。

在面临死亡时人会回忆起古老的习俗。

人最古老的风俗之一便是剥死兽的皮。

克劳迪娅在拖延时间。

也就是说，克劳迪娅在剥去时间的皮。

时间的皮是什么呢？克劳迪娅在想。

时间的皮到底可能是什么呢？

雨一直还在下着。

埋葬手的那个墓穴里灌满了水。

水来自四面八方。

水从土壤里涌出来。

双手被安放在一个红色的天鹅绒枕头上，被放入专为其准备的墓穴里。

双手还是热的。

通过下葬期间的摆动，双手最后一次触碰在一起，像是在相互安慰一样。

母亲站在埋葬手的墓穴前面。

或许她更喜欢克劳迪娅的双手而不是克劳迪娅。

埋葬克劳迪娅的墓穴在此期间被填平了。

她想大声叫喊，但却做不到。

她想思考，但却做不到。

一铲土接着一铲土。

一层接着一层。

最后她又看了一眼那根晾衣绳，以及晾衣绳上端蓝色的夏日天空。

然后就只有由新土构成的没有手的残余身体耸立在那儿了。

像是无头花梗一样。

风还没有拂过，它们就已经不见了。

克劳迪娅对自己说，事情也只能这样了。

她沿着一条路行走，走出一片树林，看到了大海。

她无法在阿里阿德涅和她的姐妹淮德拉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

雪白和玫瑰红。

阿里阿德涅和忒修斯一道逃离了她的父亲米诺斯。

在纳克索斯岛上阿里阿德涅在海滩上睡着了。

当她醒来时，发现忒修斯失踪了。

因为忧伤阿里阿德涅自缢身亡。

或者她意识到自己因忒修斯而怀孕，于是便生下了孩子。

在分娩期间她因为中了阿耳忒弥斯之箭而身亡。

阿耳忒弥斯因为同情杀死了阿里阿德涅，因为她知道，阿里阿德涅将摆脱不了与忒修斯的分离之苦。

忒修斯娶了阿里阿德涅的妹妹淮德拉。

通过阿芙罗狄蒂的魔法淮德拉爱上了希波吕托斯，他是忒修斯和一名仙女所生的儿子。

当希波吕托斯拒绝了她的爱时，淮德拉便自杀身亡了。

阿里阿德涅不能爱忒修斯。

淮德拉不能爱忒修斯。

原因是不同的。

最终会有太多的人死亡。

最终会有太多的人死亡，当时克劳迪娅在长达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也是每天晚上都把这句话轻轻说给自己听。

尽管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位理解迟钝的先生，他拒绝交出他的汽车。

房管员头部受伤，但还活着。

或许是雪花治好了他，克劳迪娅这么想道。

更详尽的情况她也不感兴趣。

她不想看大字标题和报刊文章。

第二天克劳迪娅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出城，坐在一座乡村小教堂前面的一个小山丘上。

她这么做，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但晚上她又坐车返回了。

同样的疼痛不断侵袭克劳迪娅。

来自腹部的彻骨的寒冷。

脖颈疼痛。

无法活动双腿。

然后她的额头又狠狠地撞在了门上。

走廊里急促的脚步踩着磨损的地毯从她身边经过。

她躲在楼梯下面的小房间里。

之后她又藏在桌子底下，一直数到20。

然后藏在床底下，一直数到10。

然后藏在炉子后面，一直数到7。

然后藏在厨房水槽下面，一直数到3。

最后是藏在摆钟里面。

整个过程结束。

克劳迪娅在想：不管是谁来，他都会把我带走，把我像被猎杀的动物
的皮毛一样绑在他的马脖子上，带着我跨越耕地追猎。

在这一想法上她无法与剥去死兽的皮建立起联系。

镜子前面的那盏小灯还亮着。

唇膏放在香水瓶旁边。

玛利亚木质的面孔在闪烁的烛光里扭曲着。

串着祷告小纸条的细针插在旁边的木板上。

影子投在纸条上，扯拽着祈祷词的字母，在它们身上擦来刮去，随意
画涂祈求，直到愿望仿佛得到满足为止。

一直咕咕叫的鸽子生着珍珠母颜色的眼睛，宛若救世主一般飘落下来。

它把祷告小纸条浸入圣水盆里。

麻木的熏香味道。

擦拭过的潮湿地面。

墙面上的冰晶。

盐垢。

霉菌。

忏悔室里紫色的圣衣。

克劳迪娅闭着眼睛在圣餐凳前面走过长长的暖气栅栏。

下面的地下室很深。

比教堂高高的殿堂还要更深。

人群喊叫起来。

那匹马沉入河中。

它的鞍具拖拽着它下沉。

和它一起下沉的是人们从它身上剥去的柔软的皮毛。

克劳迪娅唱道：我们城里有儿童死亡，啪啪。

人们首先切掉他们的小手，啪啪。

人们把他们脸朝前按着，人们挤压他们的脖子。

在他们的屁股上擦拭醋和动物油。

啪啪，啪啪，啪啪。

她歌颂的这些儿童被扔到卡车上。

一个，两个，小天使在飘扬。

他们躺在白色的面袋中间，总是两人一组并排躺在一起。

雪白和玫瑰红。

阿里阿德涅和淮德拉。

他们的血管里被注射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看上去是蓝色的，有时是绿色的。

现在他们不必再去上学了。

这情形有点儿像是在夏令营里。

早晨他们必须挖坑，中午他们可以建造沙垒。

一些东西顺着他们的腿流了下来。

它闻起来像是水、葡萄酒和面包。

像是馅饼和圣餐饼。

玫瑰花饰的尖从镶铅的边缘处脱落。

它们作为红色的碎片落入蓝色的天锅里。

甜粥被煮开，在锅里不停地流动沸腾。

克劳迪娅在祈祷：圣母玛利亚，请制止你的儿子吧。

约束他的渴望。

喂他皱叶甘蓝。

坚果和屈指可数的屈膝礼之母，空床之母，新发型和浓香水之母，马尾结和剥皮之母，黑暗的走廊、十七处凹痕、湿冷的床单和生锈的晾衣绳之母，黑莓丛和带围墙的庭院之母，请为我让一个陌生的男人拥抱，请为我在院子后面的小巷里现身，请为我站在永远关闭的窗前，请为我和我写在祷告纸条上的被阴影扭曲的名字出现在去往塔楼的冰冷的门边，请为了我。

淡绿一灰白色的跳动。

一块石头堵塞住了窗口。

克劳迪娅的疼痛从颌骨延伸至胸腔。

谷仓后面的溪流发出半窒息的汨汨声。

青草在风的吹拂下倒向一边。

右拳里一直还攥着一张纸巾。

指甲一直还钻在鱼际里。

一道缓缓下沉的弯月。

建筑师对地牢的一次圆规设计。

一台小型玩具机器用以定位的压痕。

大理石板上一个带有发光刻度的旧木盒，缠绕在上面的线圈已经不见了。

意大利流行歌曲。

发黄的壁纸褶皱。

在克劳迪娅的舌头上出现了一道椭圆形灵光。

一只雀鹰绕着被扔向空中的木棍飞了一圈。

一根短而灰色的尾羽落在克劳迪娅的前额上。

两个男人扛着猎枪朝树林方向走去。

一、二、三、四，基石。

一切都必须被藏起来。

克劳迪娅说：但我是建筑工人丢弃的那块石头，结果成了基石。

广阔的原野面积，中间夹杂着城市和乡村的痕迹。

大海像是一个被切开的胃。

更确切地说像是肾脏的横断面。

或者像一个蜜瓜。

不，还是更像一个胃。

泛着淡红色的亮光。

里面有一条蠕虫在蜿蜒爬行。

人们从铺了瓷砖的房子里出来。

站在狭窄的街道上。

克劳迪娅异常缓慢地离开了地球这块狭小的地方。

异常缓慢地远离了蛋花汤。

但她四个月之后就拥有了武器，识别出真正的敌人。

然后又过了四个月，更确切地说是三个半月。

然后是坐牢。

克劳迪娅用睡眠度过了在监狱里的头两个星期。

或者她假装这样。

她看着一小片天空，记录下一个句子。

然后又记下一个。

然后那张纸被抽走了。

一种囚犯的秘密通信出现了。

于是她闭着眼睛躺在木板床上，轻轻说句子给自己听，直到她把这些句子熟读成诵。

为了在铅室里安慰自己，一开始克劳迪娅用“你”来称呼自己。

因为没有人和她说话。

因为人们和她说话仅仅是为了让她沉默。

让她顺从。

克劳迪娅有这种感觉，仿佛她同样只是想用“你”来使自己顺从。

好像是另一个人想用“你”这种称呼来使她顺从。

一系列男性名词在她脑海里浮现，因为她用来跟自己说话的“我”是男性的。

男性的“我”在对女性的“你”说话。

这就是“你”这种哲学的困难所在，即“你”总是女性的而“我”总是男性的。

最终所有的安慰都会因此而失败。

克劳迪娅撰写了一段对武器的描述，把它称作“你”的新型哲学。

步枪：一片蓝灰色的云飘了过来。仅此而已。没有子弹。没有流血。某人穿着蓝色的短上衣突然把胳膊高高举起。步枪是无辜的武器。死亡总是离它很远。它躺在尸体上，仿佛将要入睡。

绳子：绳子可以用所有的东西搓成。我在窗边自由地摇摆。被卷起来的床单。睡衣鼓了起来。腹部膨胀。红色的伤痕。从这儿高处可以看见那间棚屋。一个男人在里面睡觉。头枕在一张桌子上。旁边是沙坑。

金属线：金属线把陶土分割成光滑的薄片。从它里面不应当产生出任何东西。不能是夫妇。只能是木块。再没有其他东西。

斧头：斧头是一种在冬季使用的工具。它靠在一棵树上。

刀具：刀具是母亲的武器。就像步枪是父亲的武器一样。母亲总是把刀具的刀刃朝向自己。

克劳迪娅在想，当时他们并没有说太多的话。

从未谈论过理论。

车库里停放着一辆旧欧宝车。

偏偏在那个时候。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开车出发。

武器放在汽车的杂物箱里。

戴上墨镜。

铺着鹅卵石的街道。

左转，然后右转，再次左转，沿林荫路向下行驶。

发动机转动不均匀，车辆停了下来。

一个人朝他们走来。

贝尔恩德变得非常偏执。

这些猪狗特务，他说道。

是便衣，他说，接着又说：我要干掉这家伙。

那个人只想检查一下发动机。

他站着抽烟，把双手弄得污黑，

贝尔恩德在方向盘上敲来敲去。

方向盘上罩着仿皮套子。

手指上套着带气孔的赛车手手套，手腕处缀有白色的按钮。

胡施克·封·汉斯坦。

踩一下油门，那位游手好闲者喊道。

贝尔恩德踩了油门。

欧宝车猛地向前冲去。

贝尔恩德把方向盘转向一边。

差点儿撞到一位骑自行车的退休者。

那位游手好闲者砰地关上汽车引擎盖。

贝尔恩德连声谢谢也没说。

踩油门开走了。

实践看上去是这样的：紧接着继续开往银行。停车。下车。随身带着枪支。但不采取行动。周四银行里没有足够的钱。工作日理论覆盖了资本理论。工资袋理论。在大理石桌旁填写汇款单。贝尔恩德不知道到底怎样办理。克劳迪娅也不知道。我能帮您吗？又来了。人们只需在夹克衫下面藏一支枪到处乱窜，这样每个人都会变得乐于助人的。不，谢谢。重又走出银行。返回车库。回到家里。吃罐装小香肠。听收音机。没有理论。实践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克劳迪娅写了一张明信片：亲爱的爸爸，我想念你把手放在我头上，以及你的尾巴在我嘴里的情景。

同志们发现了这张明信片。

他们说道：这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情？

他们说道：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父亲。

他们说道：我觉得你母亲离婚了。

他们说道：我觉得他是坐飞机在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空坠毁了。

他们说道：我觉得他被海里的鱼吞吃了。

贝尔恩德说道：只是不要把它寄出去。我们缺的正是这个。你明白吗？不要再做这种反革命的心理胡扯了！你难道不明白吗？这个卑鄙的家伙，只知道一味地自我爱抚，干脆不再意识到社会矛盾。这是彻底的蒙蔽。洗脑。该死。真是瞎胡闹。我在问自己，你在这里究竟想做什么？是的，我真这么问自己。或许你也扪心自问一下吧。

克劳迪娅什么也没想。

她站在窗边，看外面那辆在此期间被重新喷涂了油漆的欧宝车。

四只轮子和两个车轴：这是先前的法西斯主义原则。

每一台发动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任何法西斯主义都需要发动机。

实践看上去是这样的：早晨去银行，但这一次是真正采取行动。不再犹豫不决。接下来的七天每个人自由支配。不要再写明信片了，克劳迪娅！你听到了吗？不能写明信片！只能吃罐装小香肠，听收音机，下翻窗一打开就马上射击。卧倒，起立，卧倒，起立。国防军训练。手不离枪，即使在睡觉时也要这样。你必须把枪这样握在手里，使得手一旦滑落你就会立即醒来。什么也别说。更不用说在睡眠中了。一句话不说。什么也不说。不对任何人说。决不讲任何话。实践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克劳迪娅又写了一张明信片：亲爱的爸爸，我不再有所成就了。我干脆不再有所成就了。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再有成就。我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我让那个男孩给我看手纹，只有三条手纹，三条短的手纹，一根小型梯子。然后就像其他人和天使摔跤那样，我和他摔跤并赢了他。我的奖品是头部负了一处伤。或许是被从空中飞来的木块伤到的。但他却面露微笑，就像其他人在睡眠中才有的那种微笑。

因为她自己也感到疼痛，所以克劳迪娅发现了疼痛与飞行愿望之间的共性。

当她在自己的棚屋里蜷曲成一团时，她恰恰在呼吸开始不畅的那一刻产生了这种感觉，即现在能够从狭窄的窗户飞出去。

克劳迪娅在岛上四处漫步。

他开始画那些遭受疼痛的人的姿态。

为了绘画她坐到一家临时代用的野战医院的角落里。

在席子上躺着病人。

垂死之人被抬到棚屋后面。

他们应当首先经历到雪天的到来。

克劳迪娅在想：或许雪天指的就是死亡。

或许雪天只是一种隐喻。

就像基督的归来一样。

就像即将到来的革命一样。

所有这些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够被实现。

一种被雪封住的感觉。

身体姿势在不断重复。

不受患病的身體部位的影响。

不受疾病的影响。

不受疼痛的影响。

克劳迪娅看到一群狩猎的男人在围着一只鸟站着。

男人们在仔细打量那只鸟。

他们分析它的死亡姿势。

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在寻求一个共同的概念。

第二天克劳迪娅尝试，以类似的方式分析疼痛姿势。

哪种姿势会导致死亡。

哪种姿势会导致痊愈。

亲戚们阻止特定的姿势。

尤其是那些预告死亡的姿势。

他们偏爱其他姿势。

亲属们经常在好几天之前就已知道死亡何时来临。

他们知道这一点，因为病人的姿势无法再被纠正。

克劳迪娅自认为发现了一种特别的姿势，它可以作为道岔发挥作用。

这种姿势表明了两种状态：第一，灵魂没有力气继续生活在肉体里；第二，灵魂不愿意离开肉体并消散。

那些出乎意料以这种姿势死亡的人会变成幽灵，并继续骚扰死者家属。

因此死者家属会相应地对死者迁葬。

或者他们在死尸僵硬之前使死者采取另一种姿势。

如果一只动物以这种被克劳迪娅称作“道岔”的姿势而死亡，那么人们必须停止对它的同类的猎杀。

通常情况下死兽会抹去它同类的痕迹，使得对它们的捕猎永远也不可能。

克劳迪娅在想：或许这是从生态学角度来看一种完全有意义的规定。

死者被赐予某种休息状态，为了使其同类得到再生。

克劳迪娅在思考“灵魂”这一概念，意识到她找不到画面来对应这一概念，但尽管如此能对此想象出一些准确的东西。

一幅没有表明任何内容的画面，但总是以相同的方式重复出现。

或许那也只是一种感觉。

克劳迪娅预感到，灵魂概念也包括幽灵和厄运概念，它们严格说来在岛上是不存在的。

她没有预感到，灵魂概念也包括幽灵和厄运概念，它们从广义和普遍意义上讲也是不存在的。

克劳迪娅不知道，在狩猎中虽然有这样的规定，即如果动物以某一特定的死亡姿势被发现，那么该动物的种属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允许被捕杀的，但是如果同一种属的一只被猎杀的动物以另一种死亡姿势被发现，那么这一禁猎期也就可以结束了。如果说一开始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一名猎手被派出，为了让他猎获一只动物并从它的死亡姿势看出，人们能够获准再次捕猎，那么当地人很快就利用这一规定，为了规避法律并持续和不受控制地查看，是否一只动物以一种新的姿势倒毙，这样人们就能够重启捕猎或者根本就不再中断狩猎了。

克劳迪娅同样不知道，虽然大多数亲属不希望让垂死者陷入克劳迪娅所描述的那种“道岔”姿势，因为这样一来会存在死者的幽灵骚扰他们的危险，但其他亲属恰恰偏爱这种姿势，因为他们从一种类比推理出发，认为他们作为相同种属的成员跟动物碰到的情况一样，在一段时期里将会免于死亡。在此必须区分免于死者幽灵的迫害和暂时摆脱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克劳迪娅刻画、命名和描述了以下疼痛姿势：

1. 乌鸦

脸朝下把头深埋进地里、席子里或者草垫里。病人好像是用一个鸟嘴把自己插进土壤，无法再使自己解脱出来。胳膊稍微弯曲，手背轻轻地挤压臀部，双腿收缩。重量都压在膝盖上。身体好像给自己添上了黑色。仿佛是黑夜沉降在身体里并在体内溶解。同时一种暗淡的光线在围绕着病人跳动。

2. 伊卡洛斯

他与乌鸦相似，只是双臂以一种方式伸得很开，这让它们显得不真实，好像不属于身体的组成部分。他也腹部朝下趴着，他也把头向下伸向地面，但他的后颈好像受了伤，几乎像是被灼伤一样，他朝上的脚掌也是如此。

3. 穿墙而过

病人用弯曲的四肢把自己挤压在墙上。在一定程度上他好像是成功地把一条胳膊或者一只脚挤了过去。但事实上只是肢体被剪断、折断、朝着他掉转了方向。他渴望看到另一种情况，渴望看到彼岸，因此过早牺牲了当下的安宁。

4. 被遗忘者

看上去几乎像是她自己在疼痛中忘却了自我。她四肢伸展仰面朝天，人们无法判断她是在睡觉还是醒着。她的脸庞表现出陶醉的神态，就像在女圣徒和女殉道者脸上所能看到的那种。但她的手指内翻，双脚的脚趾凑在一起。人们几乎可以认为她又把自己装扮了一番，因为她的乳房明显上翘。为了不被色情因素所干扰，人们必须有意识地回忆起疼痛。

5. 物品

某些人把一件东西紧紧握在一只手里。他们把它握得那么紧，以至于指甲深深地嵌入鱼际，即使人们把他们手里握的那块木头、那根麦秆或者光滑的卵石强行取出，手里也会留下相应的印记。

当地人讲述道，有些生物在人与神灵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就跟我们的天使有些相似。这些天使中的每一个都代表着一种死亡类型。最受尊重的是那些自杀者天使。他们来到垂死者身边，用他最喜欢的刀割断他的喉咙，在他身边一直待到死亡。他们缝合好伤口，擦去血迹，让自杀者的面部冲着升起的太阳。如果自杀者被找到，他的伤口已经愈合，身上也看不到血迹了。但是一旦天下雪，所有的人都会被天使接走。

克劳迪娅梦见下雪。

她又回到家坐在院子里。

天开始下起雪来。

克劳迪娅把头缩进脖子里。

雪花首先挂在晾衣绳上，然后慢慢朝庭院方向滑落。

一片接着一片。

雪花之间闪烁着一架微型飞机的探照灯。

克劳迪娅做出七次描述下雪的尝试。

第一次尝试：那是在夜里。父亲竖起大衣领子。我把广告牌上的数字指给他看。你没看到吗，我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雪花像微小的鸡骨一样飘落。我穿越田野跑回家里。走廊里很冷。楼梯处一片黑暗。

第二次尝试：崇拜父亲遗留的东西。一件衬衣。一片皮肤。一个他从前喝过酒的碗。人们带来一些装在一个袋子里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把手的东西。即使他们把身体指给我看，我也知道它实际上是完好无损的。

第三次尝试：人们把我塞进没有被鞣制的皮革里，疯狗吐着白色的泡沫，风把它们吐露在外面的上唇的下垂部分刮进卷起的报纸里。我用冰凉的指尖清点些什么。我倾听风的坠落，倾听小船掉入冰冻的湖里的声音，倾听裹着星星的厚厚的云层的坠落。

第四次尝试：我在黑暗的走廊里坐在锁闭的门口，把那根木工铁钉在我的围裙上磨得锃亮，然后把它钉进我的玩具娃娃的头里。

第五次尝试：一种棉絮般的感觉在我的嘴里扩散开来，就像我想象的面包师陈列柜里的那些黄粉色的泡沫团，我在年纪特别小的时候曾经

用手指过它们，但却并未得到。

第六次尝试：圆圆的乌黑发亮的眼睛扯拽着她的发丝。花园里雪花从木槿上飘落。湿衣服冻得有些僵硬挂在晾衣绳上。血迹几乎已经看不到了。剪碎的头发黏糊糊地贴在我的前额上。有人给我披上了一条围巾。我看到两个男人在一条船上，他们打算把一些东西沉入水底。

第七次和最后一次尝试：我的未婚夫是那个带有彩色条纹的水球，它泄了气干瘪地躺在玩具箱里。在它旁边的是积木块和魔法石。

克劳迪娅的尝试都失败了。

早晨克劳迪娅感到不适。

收音机已经开始广播。

贝尔恩德站在厨房里。

对着瓶子喝烈性酒。

能够使人击中目标的烧酒。

其他人也想同行。

太引人注目了，贝尔恩德说。

就我们俩。

克劳迪娅低头看着地面。

贝尔恩德把胳膊搭在克劳迪娅的肩上。

然后呢？

什么然后？

在这之后。

我已经说过了：每个人自由行动。

七个星期。

至少。

然后呢？

我们看情况。

什么看情况？

然后我们就见面。

外面的天灰溜溜的。

克劳迪娅一口东西也吃不下。

面包反正也发霉了。

不再有肥皂了。

谁现在会想到用肥皂呢？

至少洗完手之后去抢银行。

还是把牙刷带上吧。

贝尔恩德递给克劳迪娅一把枪。

给你的。

不要。

你也练习过怎么使枪的。

无所谓。

必须带一把。

我不想要。

你必须掩护我。

我掩护不了你。

克劳迪娅走到外面的门厅里。

一摞一摞的报纸堆在左右两侧的墙边。

我们不能先做点儿别的吗？

做什么呢？

不知道。

就是嘛。

我们需要钱。

你就干脆这么想，那是你父亲的银行。

他把他的钱都存在那里。

那又怎样？

钱只能使人们不幸福。

胡说，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只是为了钱。

他们这么想而已。

贝尔恩德往克劳迪娅的大衣口袋里塞了一把枪。

她对此浑然不知。

尽管如此后来她也不会说她对此一无所知。

克劳迪娅问道：你准备好面具了吗？

贝尔恩德点了点头。

他们五个人站在厨房里。

其他人都在冷笑。

外面下起了雾。

轻声下楼因为怕邻居听到。

克劳迪娅翻了翻白眼说道：但是在这里就要卑躬屈膝了。

贝尔恩德说：你就不要再为银行的事生气了。

贝尔恩德发动汽车开走了。

其他人开车去野外。

彼此睡在一起。

至少是相互紧靠着睡。

不是相互紧靠着睡在睡袋里。

时不时有人在去上厕所的路上从你身上跨过去。

临近四点时克劳迪娅经常会醒来。

当天气又湿又冷的时候。

她在想，窗户跟当时一样是开着的，当它们被炸弹炸成碎片时。

天空挤进屋内。

外面又平又黑。

那就是银行。

还有七分钟。

为何只有两个人一起行动？

难道不应该有一个人待在车里吗？

为何没有再来一个人呢？

他们只能把事情弄糟。

那我呢？

你不会的。

两分钟，然后我们就又出来了。

把面具给我。

没带面具。

但你说过的呀。

我们干吗需要面具？

谁都能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不会躲藏起来。

小市民的害怕。

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了。

呼吸困难。

克劳迪娅必须下车。

贝尔恩德也跟着下车。

他们刚刚把门打开。

穿越到马路对面。

几乎没有来往的车辆。

两三名等候者马上挤了进来。

其中一个穿着白大褂。

他是想换零钱的商人。

腿像是被钉子钉住了一样。

贝尔恩德撞了克劳迪娅一下。

玻璃门开了。

热气迎着克劳迪娅扑面而来。

她再一次感到眩晕。

然后穿过第二道门。

举起手来！

闻起来像是咖啡的味道。

人们在想：只是个玩笑而已。

他们微笑着转过身来。

看到贝尔恩德手里的武器。

克劳迪娅向前迈了一步。

我们甚至连一个袋子都没有，她这么想到。

贝尔恩德重复道：举起手来！

现在他们把手举了起来。

举得笔直。

保险柜开了。

一个人把身子靠在上面，为了把它推着关上。

住手，不能这样！

先把钱取出来！

贝尔恩德僵直地举着枪。

他看着克劳迪娅。

因为袋子。

去，把那个袋子拿来！

把所有的钱都装进去！

所有的人都站着别动！

克劳迪娅也站着没动。

只是在那儿站着。

一句话也没说。

什么也没做。

银行职员把袋子拿了过来。

还有窗口里的钱！

职员把所有的钱都倒了进去。

他把袋子递给贝尔恩德。

贝尔恩德碰了一下克劳迪娅。

她接过袋子。

袋子从她手里滑落散开。

克劳迪娅用另一只手去抓袋子。

她想转过身去。

倒着后退，贝尔恩德嘶嘶地说。

克劳迪娅倒着后退。

外面很冷。

克劳迪娅的手指紧紧抓着袋子像是瘫痪了似的。

突然马路上也有了过往车辆。

他们无法过马路到停在那边的车辆那儿去。

但我们必须这样，贝尔恩德说。

你看见了，过不去的，克劳迪娅说。

否则他们随后就跟来了。

很快向右转。

转过街角。

一个男人刚好从他的车里下来。

我们就开这辆。

贝尔恩德从后面猛击那个男人。

克劳迪娅向马路对面他们的车辆望去。

它傻傻地停放在那儿。

马上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或许我们还是过街？

没时间了。

那个男人开始反抗。

把钥匙交过来！

那个男人根本不愿从命。

贝尔恩德把枪直接直挺挺地顶在他的胸前。

那个男人一直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贝尔恩德从他手里夺过钥匙，从他身旁挤了过去。

克劳迪娅从另一侧上车。

把装钱的袋子夹在腿中间。

那个男人扑向贝尔恩德。

贝尔恩德端平手枪扣动了扳机。

那是一声轻弱的枪响。

克劳迪娅起初以为子弹根本就没有射出。

那个男人一边咳嗽一边从贝尔恩德身上滑了下来。

贝尔恩德把他踢开。

踢到大街上。

上车。

发动汽车。

踩油门。

那个人怎么办？

王八蛋。

贝尔恩德开车离开。

克劳迪娅往后视镜里看去。

她看不到那个男人。

王八蛋。

贝尔恩德开得很快。

他变换车道。

拐弯。

再次拐弯。

又拐了一次。

从怀里掏出手枪把它插进腰间。

王八蛋。

克劳迪娅在起草一份传单，它应当对一切做出辩解。

她写道：账目很简单。国家。家庭。教会。你在一种不明确的罪责中艰难度日。你在一种无法形容的无生命中艰难度日。你拖着自己艰难地穿过一种异化的生存。因此谋杀是每一次革命的核心话题。即便意外的谋杀也是。即便最后行动失败后的自杀也是。因为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不愿意杀人的人。

克劳迪娅又通读了一遍她起草的草稿。

她在想：贝尔恩德也会这么写的。

克劳迪娅一边撕碎草稿一边考虑，是否可能在政治公告内部存在一种自己的语言，或者在政治公告里涉及的恰恰不是这个。

她又一次认为自己想的都是错的。

这种思想的确是错误的。

但是克劳迪娅指的不是这种思想。

克劳迪娅在思考戒律。

一条戒律应当减轻思想的负担。

一条戒律是人们无法转向其反面的东西。

例如你不应该杀人。

贝尔恩德说：那些不愿杀人的革命者很快自己就将被人枪毙。

克劳迪娅一言不发。

克劳迪娅不想讨论杀人。

不想把这个话题岔开。

剩余的一切都是空洞无物的言辞。

贝尔恩德说：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

对此克劳迪娅也一句话不说。

后来也什么都不说。

在法庭上也不开口。

在监狱里也不开口。

克劳迪娅不想谈论人们不能谈论的事情。

她想保持沉默。

因此克劳迪娅进了监狱。

因此贝尔恩德得以幸免。

克劳迪娅记录道：一名被判死刑的囚犯的头颅在宣判后四十八小时之内必须一下子被打开。就像人们切开一个熟透的甜瓜一样。因此甜瓜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它不能和其他食品一道被保存。它被放入一个单独的婴儿围栏。人们对不听话的孩子说：我们把你关进瓜棚。

尚未结婚的情侣聚在一起时必须把目光朝向天空并相互挤压面颊。他们不允许交谈。他们必须从颌骨及额头肌肉的运动中看出对方所说的话。

象征婚姻幸福的动物是两条甚至不到三厘米长的蠕虫，它们拥有非常不健全的神经系统，处于海绵和海蜇之间的发展阶段。如果一对情侣决定结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把一条这样的蠕虫送到接生婆那儿。接生婆把这两条蠕虫放到一个碗里，坐到她的棚屋后面观察蠕虫，从它们的行为中看出能否建议那对情侣结婚。

采集的水果只能煮后被食用。采摘的水果总是被生吃。

一名美国游客声称，有人在他的饭里混杂了一只被肢解的青蛙。那只青蛙现在在他的肚子里又还原完整，使他的肚皮破裂。

如果人们把一条脐带挂在一根树杈上，那些人们平时很难捕获的动物便会自己高高跃起，把脐带套在脖子上让自己吊死。

通常情况下当地人把疾病认为是器官、血管、肌肉、肠子等的缠绕。因此脐带能够治愈疾病，它被放入病人的嗓子里，因为它自己就有螺旋和结节。

如果有人找到一条脐带，它的长度正好与他肩胛骨之间的距离相一致，那么脐带就会赋予他飞行的可能性。他只需用双手把它绷紧，然后从一个山丘上跳下去。这种情况一再发生，但并未削弱人们对脐带赋予飞行力量的信仰。当一次飞行尝试失败时居民们会声称，那是一条被伪造的脐带，这样的脐带广为流通。既有更好又有更粗笨的仿制品。更好的仿制品是用狐狸肠子或者家兔的肌肉和肌腱肉制成的，更蹩脚的干脆就是由卷绳组成，人们把这样的卷绳在沼泽或者淤泥里存放了几天。

存在这样的想法，即只有在体内形成一种与舌头相应的对比物，人们才能开口说话。这里所说的是睾丸或者卵巢，它们直接通过一条渠道或者一块肌肉与舌头相连。

如果一个男孩或者一个女孩到了十三岁这个年龄，他们就会被父母带到教士的棚屋里，让他们单独待在那里。不是呼唤鬼神、向正处在青春期阶段的孩子传授文身技法或者用新宰杀的母鸡的鸡血溅污他，而

是教士仅仅向孩子鞠躬，把象征教士尊严的项链戴在他的脖子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孩子必须连续三天做他自认为一名教士通常所做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教士被允许说话，做出儿童般的行为举止。那是一种独特的场景：教士坐在棚屋前，用一个玩具在娱乐消遣，四处乱跑，对过往的岛上居民做恶作剧，他向他们身上扔黏糊糊的小树枝，或者从他们的篮子里偷拿水果。与此同时一名十三岁的男孩表情严肃一言不发，他在努力实施一些他认为是神圣的行为。在这三天期间在孩子心里所发生的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人们把他当回事，因为他被要求有自己的想象力和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被迫自己想象宗教和仪式。教士在做他看似放松的游戏时一直在非常仔细地观察着那名儿童，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是他认真考虑孩子的每一个动作行为，并在他以后的仪式活动中采用它们。这样一来在民众和教士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联系，因为每个人在其一生当中都会有三天的时间自己成为教士，能够通过他的行为活动参与构建这种职业。如果教士死去，那么最后在他那儿经历入会仪式的男孩就将接替他的职位。

人们用一种表达来描述教士之死，按字面翻译它的意思是：他变成了孩子。在他的葬礼上场面非常热闹，很像儿童过生日的情形。尸体面临的好处是不再感受到痛苦，它现在被赐予了享乐，这样的享乐在身体生前是被拒绝的。人们用一块帆布把教士的尸体紧紧裹住并系牢，紧接着拖着它穿过村庄，把它从山丘上推下去，把它吊在树上、浸泡在海水里等等。干尸在长达三天的时间里在岛上的各个地方出现，比如突然蹲坐在一间棚屋旁边，或者在堆满块茎和根茎的高高的手推车上驶过。然后教士才被抬到墓穴处下葬。

克劳迪娅在想：一种仪式的目的是为了吓唬参与者。因此有意识地引入和践行仪式是无稽之谈。仪式总是对暴力的表达。我不会选择这种仪式。它被强加于我，仅仅通过强迫起作用。它是父亲的仪式。至少克劳迪娅不了解其他仪式。

有人讲述了如下的故事：从前有一头公牛，它从海里耸立起来，希望能够用它的脊背触到天空。多年来它一直在等待自己变得足够强壮，现在它立起身来，把大海连带水藻一起高高拽起，用从它身上滴落的

海水淹没了岛屿。公牛显得很孤独，因为它想要接触天空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尽管它身躯庞大可天空仍然无限遥远。它凝视前方。它尝试唱歌，但却发不出声来。它尝试说话，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它尝试跳舞，但蹄子在异样的土地上感到疼痛。

另一个人以另一种方式讲述了这个故事：从天空掉下来一颗孢子。它有两个翅膀，人们说它以前被囚禁在一座岛上，只有在它借助人工翅膀飞到空中之后它才逃脱了那座岛屿。它落到地球上把自己埋在那里。孢子躺在树林的土层下面呼吸着。它想仅凭自身的力量创造地球。但是地球已经存在，因为否则的话公牛会生活在什么地方，在它投入大海、为了有朝一日重新浮出海面之前呢？

对此克劳迪娅提了以下问题：为什么诸侯的行宫在每一条街道的街头和街尾都能找到？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树根就是树木附着在天空并伸向地球的枝杈？为什么其他人认为，公牛夺走了人的语言，自己又不知道怎样使用语言，就跟它不会说话一样它又把自己淹死，为了使自己摆脱负担？

克劳迪娅撰写了一种描写性解剖学，把它称作你的古老哲学。

头：必须首先到外面去。必须首先到灰尘里。保持头部姿势，为了拖着身体穿过院子。被按进皮垫。

头发：被用蝴蝶结扎在一起。然后解开蝴蝶结。自己把自己剪短，从而使得不再有蝴蝶结合适。

耳朵：被堵上了。母亲的耳朵在有耳沙发上，她在那儿用烟嘴儿吸烟。圣母玛利亚：也是聋的。尽管如此要求自己被别人听到。更确切地说是被耐心倾听而不是被听到。

眼睛：被眯起。

鼻子：折断了。不是故意的。

嘴巴：尾巴。

嗓子：被勒紧。只有在呕吐时才是开启的。

胳膊：向后。

手：在胳膊下面吊着。

手指：为了清点分钟。

腿：张开，否则是麻木的。

脚：套着连裤袜。

肚子：有被抽打过的鞭痕。

阴道：只能容两根手指。

肛门：容一根手指。

按顺序思维。

逻辑思维。

着眼于结论的思维。

男性思维。

阿里阿德涅在设想男性思维：1. 迷宫，2. 忒修斯，3. 米诺斯，4. 半牛半人的怪物弥诺陶洛斯。她在设想父亲谈妥了什么。七个年轻男人，七个年轻女人，父辈留下的遗产，他们必须承担遗产的后果。遭到破坏和刚刚又被重建的国度。继承顺序。主导思想成了铅锤。通向阴间地狱。否定接替。通向纳克索斯岛。

无穷尽是空想。我们在寻找边界。必须知道里面在哪儿和外面在哪儿。克劳迪娅在行走时寻找记号。石头、枝杈、树墩。一道围篱。一座封闭花园。即使没有独角兽。就像在院子里随便走走那样。只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克劳迪娅尝试再次以其他方式来理解她的故事，她把个人情况纳入普遍情况，以此转向母亲的诅咒：

每一个故事都以“从前……”开头，每一次“从前……”都有一位生产的父亲，和一位把生产之物扔到地球上的母亲。我问自己，为什么孩子们不大声哭喊并四肢着地保持不动，一旦他们开始感知世界。在我们没有供暖的后院舞台上度过的下午和夜里也没什么大不一样的，在那里我们模拟表演自己的童年，不知疲倦地一再相互挤压爬行并大声吵闹，直到我们声音嘶哑说不出话为止，而演出却被一再延迟并最终完全取消。我们应当对台下那些人说什么呢？我们想对自己说些什么。我跟在贝尔恩德后面上了车，我们一直不停地驶过城市，总是在围着银行兜圈子：不再四肢着地。他们在我的床边放了个铁桶，因为在这期间他们知道我又要呕吐。关键是在那一刻谁也不要碰我，因为否则的话我会喘不过气并高声尖叫，然后他们又会从工厂里跑出来，手指上沾满了油污，站在我们四周围观。那个可怜的女孩，头发凌乱并且总穿着工装裤。不，这没有任何意义。再来一遍：母亲咒骂父亲。诅咒起了作用。但却反过来针对她自己。因为得病的恰恰是那些他睡过的女人。这事流传开来。出租屋被挂上了黄旗。晚上人群在酒馆后屋里围绕着自己的命运唱歌。同样是那些空气污浊、烟熏火燎的房间，我在不到十六岁的时候就从那里面搬出去。那辆黑色的汽车在用砖砌住的院墙门口等候着，我的脸被最后一次压进皮垫里。母亲的诅咒。母亲，当你张开双臂站在银行楼顶的时候，你的诅咒对你来说又有什么用呢？黑夜在火车站后身的灯海上面淌着口水。我们当时要是把他拖上我们的法庭就好了，把他拖上我们的木偶戏舞台，舞台刚好容得下他的大头面具，然后对他判刑并立即执行，用木槌行刑，直到他鼻血喷溅。但是他跑了。他捆紧小背包去往城市，为了在那儿的场地上击败敌人。他从小瓶子里喝烈酒，身上带着小时候玩的弹弓，此前他在家里徒劳地寻找这些弹弓，为此让眼睛哭了个够。唉，小家伙，就连你也没能摆脱我的诅咒。相反。当他们把我的腿打断时，你比我哭得还厉害。直到最后还总是听话地做家庭作业，夜里把你的被子给我盖。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最不恨的人就是你。看见他妹妹裸体躺在酒吧桌子上，在同一张桌子上父亲签署了法案，然后把啤酒浇在上面，吸了口鼻烟并握手，桌子后面是脱下连裤袜的腿……

很快把书包挡在脸前就像是听到炸弹警报时那样，很快跑到前面喝一杯柠檬汽水。我马上接你并送你回家。你不明白在这里看到的事情，不明白是因为没什么可明白的。抱歉，我其实很想让你避开这一切。与此同时她坐在靠背椅上，用烟嘴儿吸烟，凝视白兰地酒杯上幽暗的微光。不再倾听自己的脚步声，当我必须到过道那头去取蛋花汤，然后去钩织协会。随身把包和短上衣带上，这样你就不必再回来了。夜里在厨房火炉旁边的长椅上我一再用手锤击瓷砖。小家伙把耳朵堵上。然后他在一把裹着包装油纸的梳子上吹奏父亲的曲子，父亲用右手握勺舀蛋花汤喝，同时伸出左手去抓我的小腿肚。天空开启又闭合，玛利亚显现。她十六岁，衣服下面什么也没穿，为了让酒馆里的那些人有一些笑料。这是我儿子，这是我的心，这是我完好无损的阴道，这些话直接出自最近男人们粗俗的玩笑。我儿子向我讲述了这个玩笑。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我想终于感到不适，然后枪支在我手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分量了，手指干脆就那么像是完全附带地扣动了扳机。

从德国无线电广播里大声播放着流行歌曲。

父辈的流行歌曲。

现在也有了立体声版本。

经过严格训练的合唱队队员。

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梳理的头发上涂着发油。

举起蛋花汤调羹打招呼。

左手里握着裹有包装油纸的梳子。

长久的轻声哼唱变成雷鸣般的响声。

克劳迪娅把头向后仰起。

她闭上眼睛。

她在等候。

她在等候贝尔恩德驶向某个地方。

等候他驶离马路。

等候他们在行驶中翻倒。

等候一切都被烧得精光。

等候一切结束。

终于结束。

讨论文化结束。

克劳迪娅还是以官方通告的语调写了一个关于肮脏的父辈遗产的句子。这个句子的原文是：你们没注意到吗，肮脏的父辈们强迫你们以这种方式交谈，强迫你们谈论一切，强迫你们互相理解，这是肮脏的父辈遗产，毫无疑问，总是毫无疑问，这样他们就能够享受清静，不被打扰地签署法令、用勺子舀蛋花汤喝、破除我们的贞洁、决定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法定时效期满。

克劳迪娅又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院子上的天空带有横纵条纹，夜里它沿逆时针方向旋转，往我的床上用品上投下奇特的图案。你们的用意都是好的，你们都跟我在路上不知怎的丢失的小家伙一样可爱，一整夜他都把头靠在我的肚子上，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能够被听到，除了在里面胡作非为的父亲的蝎子、百足虫和蠕虫。诅咒。为了入睡我翻过身侧躺，两只胳膊交叉叠放在耳朵上。慢慢地蜡烛烧完了。现在又是冰雹和风暴，以及一架掉入一片田地的飞机，一个头部受伤的男人从飞机座舱里跌了出来。但是父亲也有父亲和母亲，也有一道魔咒。生活不可能是这样的，但它就是这样的，就像一加一那么简单，总是像一加一那么简单。一头公牛和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儿子，儿子永远否认公牛，但心里却一直装着它。

对他来说它将白花花地从潮水中耸立起来，杀死它的亲生儿子们，直到它自己有一头公牛作为儿子。就像一加一那么简单。

克劳迪娅坐在一张白纸面前。

她手握一支彩笔在纸上画来画去。

一直在画来画去。

那都只是些线条。

然后是图案。

刹那间她辨认出些什么。

然后整张纸都变成了黑色。

因为画来画去而变成了黑色。

除了画来画去再没有什么可做的。

在来去之间不存在任何东西。

父亲的父亲。

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克劳迪娅的喊声传得不够远。

它到达不了真正的起点。

因此它也到达不了终点。

克劳迪娅坐在一张白纸面前。

她在写一篇关于假期的作文。

她写道：这就是我的假期。

我父亲去参加一次为期两周的训练。

那是美好的假期。

我不必再把蛋花汤送到那边去。

我不必再把头压进皮垫里躺着。

我体重增加了三磅。

每天晚上我只呕吐两次。

母亲对我很满意。

她把我从厨房窗户扔了出去。

我一下子能够悬浮起来。

我飘浮到树莓上空。

我飞向苍穹。

我撕开天幕。

从里面流出液态熏肉。

这是童贞女玛利亚为她唯一的儿子做的。

我用张开的嘴接住它（液态熏肉）。

我带着它飞回家。

我把它喂给小家伙。

喂给没有头的玩具娃娃。

直接喂到嗓子里。

炸弹在夜里轻声爆炸。

伤者也只是在小声地叫喊。

他们在死亡时显得很体面和有教养。

自己把自己排成一排。

为了不打扰父亲。

在路过他们的死尸时，父亲用刚刚擦亮的皮鞋把这个或那个人的衣领理顺。

克劳迪娅坐在一张白纸面前。

她在写一份代替宣誓的声明。

她写道：这是一种美好的人生。

我可以对此发誓。

所有的人都尽力了。

直接喂到嗓子里。

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走进后屋。

躺到桌子上。

每个人用两根手指。

这样可以。

已经十六岁了。

代替猪猡我宣布自己不受法律保护。

谁都可以把我的头打掉。

当我从商场楼梯下来的时候。

把装营业款的银箱举在手里。

或许我的喊叫声一直传到了六楼。

那是卖玩具的柜台。

父亲在那儿刚刚买了一套厨房设备。

为他的新女儿。

还买了一个熨斗。

被套总是向左偏转。

系衬衣时从领子开始。

然后是袖口。

克劳迪娅坐在一张白纸面前。

她在画一把枪。

她用彩笔和阴影线把它画得很漂亮。

她很有天分。

她以后应该会有出息的。

克劳迪娅把那只画好的漂亮手枪剪切下来。

她拿着它下楼跑到大街上。

她向四周噼噼啪啪地射击，击中散步的人，让他们倒在街边排水沟里丧命。

风把克劳迪娅的纸枪吹向左侧。

现在开始散布射击。

又有更多无辜的行人瘫倒在地。

有人用昨天的报纸给克劳迪娅折了一顶帽子和一艘纸船。

克劳迪娅肚子痛。

她总肚子痛。

总是到了关键时刻她就肚子痛。

人们为圣诞节戏剧表演把她打扮得如此漂亮。

父亲感到如此自豪。

院门口整齐摆放的尸体和穿着粉红色小孩衣服的克劳迪娅。

现在：肚子痛。

我们还有活性炭药片吗？

甘菊茶也没有了。

天已经黑了。

那辆黑色的汽车在等候着。

克劳迪娅往窗外看去。

窗前挂着一张白纸。

上面画着一个没有轮廓的黑色造型。

不断地用彩笔重画，直到什么也看不到为止。

窗户突然弹开。

童贞女玛利亚让融化的熏肉像雨点般落在克劳迪娅的眼睑上。

那是一种祝福。

一种永恒的祝福。

工厂主的游戏

工厂主的另一个游戏是给我看一个火柴盒，里面生活着两只非常小的动物，他把它们称作萎缩的山羊。其中一只山羊是白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当这两只动物被从火柴盒里抖搂出来时，它们把脑袋彼此对在一起，长时间沉重地呼吸，仿佛它们此前一直在睡觉，现在是第一次见面。工厂主现在拿起盒底，把它倒扣在那两只小羊身上，把盒子在桌上推来推去，并要求我说出盒子下面两种颜色中的一种。如果我说黑色，他就停止推动，笑着把盒底掀开，给我看那只白羊。如果我问黑羊在什么地方，他就回答说：“它在白羊的肚子里。被吃掉了。”然后他把火柴盒重新扣在单个的羊身上，又把盒子在桌上推来推去，最后把两只动物指给我看，它们又在沉重地呼吸，完全跟刚开始一样面对面站着。

作为在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环状珊瑚岛上进行的原子爆破的发明者，工厂主强迫我和我的同学钻到桌子底下。我们把书包紧压在头上，躺在地上祈念主祷文。人们拿进来新的卡片。你们的学习结束了，女教师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改学另一种方法。因为先前工厂主暗中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他自己算出并发布的辐射值，这是一张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纸条，因此我被人用“您”称呼，在新教师的讲台旁边得到了一张自己的小讲桌。在校园里人们在打扫死麻雀。不再有课间休息，根本没有放学的时间了。没有任何图片的走廊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我们吃夹心面包片，用一根吸管从包装袋里喝牛奶。有时从空中会落下灰絮。

工厂主在塔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存放着一个用沉重的金属饰物锁闭的箱子。从未有人见过箱子里装的东西，它们替代了他的良知。如果他产生怀疑，他就会想到那个箱子，这会令他精神焕发，给他增添新的力量，以至于他能够忍受看着来自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不穿衣服从他面前列队走过，而不至于躁狂症突然发作。

此外工厂主还是弗里德斯坦饮食自动售货机的发明者，这种自动装置曾于五十年代在拉恩-迪尔县引起轰动，在那个地方的每一个街角都能找到。当时人们还饱受严格的商店营业时间的奴役，弗里德斯坦饮食自动售货机使得人们能够在白天和黑夜的任何时候，在投入一马克硬币的情况下买到一块夹心面包和一种他们喜欢的甜食，在位于郊区的少量加油站也是如此，在那里人们通常只能找到汽油、机油和汽车配件。

工厂主从我的悲痛中提取内啡肽，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我的痛苦越大，他的生意就越红火。在一些大陆人们的身体状况远好于以前。他们靠我的抵抗力生活。不久产品要计划上市。为此我被考核了一些伦理问题：一个人的生命称起来分量不像两个人的那么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达成了一致。一个反正天生倾向于悲伤和无所事事、倾向于虚度人生和白白浪费生命的人（或者无论人们怎样描述，就像我现在所做的这样），应当把他的身体提供给那些人以服务其身体的健康，他们只是短期和在紧急情况下才被迫悲哀的。

在这期间人们在校的操场上把我来回推搡。人们强迫我把雪茄烟往肺里吸，把我关在卫生间里。如果我沿走廊行走，低年级学生就会假装仰慕地拜伏在地上，而高年级学生则露出胳膊，让我看上面的酸液腐蚀。在此期间我觉得老师们也是令人生疑的。他们在我背后窃窃私语，在人们把我推下刚上过蜡的楼梯时也不干预。

只是一场常规战争，我总是这么自言自语地说，当我们从学校礼堂里的彩色幻灯片上看到成功爆炸的画面时。我们在体操馆里围绕着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跑步热身。某些伤员从结痂的绷带下面露出微笑，其他人一把掀开盖在身上的布单，向我们展示他们裸露的肢体残余。还有一些人在大声吼叫，一切都像是雪花，像是雪花，像是在某一个星期天的黄昏落在屋顶上的雪花，那是工厂主为了安息而为世界安排的某一个星期天。

我让蓝色的墨水从一个被咬破的自来水笔的墨水囊里滴到膝盖的伤口里。我烧掉所有的恐怖图片，最后只保留一张，然后把灰烬埋掉。一夜之间我把雪橇放置到花园里。

城市后身页岩附近的山谷最终被转变成了一处度假天堂。两只眼睛一闪一闪的机器兔每隔十五分钟就从桥上驶过，为了娱乐观众桥梁在一种机械装置的操纵下从中间断成两截，以至于那两只动物坠入深谷并化为烟火。有一个挂在树上的工厂主的造型。如果人们从它下面穿过去并突破一道光栅，它就会有勃起反应，开始手里握着一根用泡沫塑料制成的巨大的飞廉恐吓人们。杂技演员们像是处于失重状态在飘荡着棉花糖、汽水粉和爆米花香味的空中滑翔。在一个帐篷里人们可以通过放大镜观看火柴盒里的那两只微小的绵羊是怎样在彼此争斗的。一个布告栏上解释说，火柴盒有一个双层底面，根据倾斜程度它可以首先向左或者向右打开，用这样的底面工厂主就能够决定争斗中表面上的胜者了。现在才得知这一切，而且知道原来是这种情况，这让我感到很难堪。我们家厨房也同样得到了复制。涂油的木桌，总是不停拍打的门，透过它人们可以眺望外面冰冻的黏土痕迹和远处的山岗。被挤压在厨房后面角落里的小凳上，那个人应该就是我了。被画上的龇牙咧嘴显得很滑稽，因为那个长得像我的人嘴里衔着一个堵嘴。至少我想解开他手腕上的绳索，但是安保人员切断了电源，这样我必须和其他参观者一道排成两列出去。

工厂主说：教育是一种双重束缚外加电力。他计算出一名十三岁半的普通少年的发展阶段，并把它们用图表的形式加以描述。相比较而言我缺少维生素和新鲜的空气。我被送到乡下。因为罗圈腿我不能正常行走，因此其他孩子最喜欢把我装在一个桶里沿山丘往下滚，人们通常都是把喂猪的厨房垃圾倒在这样的桶里。晚上我收听儿童广播节目，写一张不会寄出去的明信片。

一次我偷偷观察了一个女人，看她是怎样在工厂主离开之后跪在一个浅蓝色的塑料盆上面，看从她体内是怎样流出一些东西的。当她走到隔壁房间时，我蹑手蹑脚地进到屋里，从圆木桶里取了一些样品。我从液体里过滤出一些布满针刺的小鱼，把它们装进空的自来水笔的墨水囊里，在那里它们和密封球嬉戏了半天之后死亡了。我一口气喝下了这种精炼的汁液，随后我失去知觉，梦见了以下情景：一间产房，但是躺在产床上的不是女人，而是一个大木球。医生们在用锯和锤忙碌着，为了把球体打开。我不想看里面是什么，但最终不得不看。

在农村寄宿学校的食堂里人们搭建了一座小型舞台。工厂主小声对我说，我应当为其他孩子们模拟表演《圣经》里的场景，然后他们应当猜出那是什么。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时，他就从我身上扯下衣服，用我的衬衫卷绕成一条绶带：这就是基督的葬礼，他边说边把我推上舞台。孩子们大呼小叫，乱扔纸团，嘴里喊着：看啊，这个人。真叫人绝望，工厂主说道，因为他意识到，这种闹哄哄的场面也不再使他获得真正的消遣了。

周五我们学习把水变成葡萄酒、把蛇变成棍棒、把石头变成面包以及把面包变成玫瑰，但我们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可应用这些技能。吃饭时每个人得到一颗米粒、一小片洋葱、一滴油和一小块帕尔梅干酪。我们必须用这些原料给自己做一顿烩饭。周六我们又学习滴血的墙壁、哭泣的雕像（泪和血）、伤痕（永久的和那些只在隆重的节日里才能够被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显灵、主显节当然还有幻想。最后在周日我们学习用舌头说话，使死者复活，对猪群、盲人、瘫痪者和聋人的着魔。午饭后我们必须决定是相信圣体共在论还是圣餐变体论。我选择了圣餐变体论：既来之，则安之。紧接着提供咖啡和蛋糕。据说谁要是想要点儿别的，他就应当自己把它变出来。幸亏那个已经来这儿两次的男孩对我说过，那实际上是一种结业测试，因为他们想看一下是否人们准备把自己的能力世俗化。有两个人真的很白痴，他们把干巴巴的脆皮奶酥蛋糕和麦芽咖啡变成了香蕉船甜品、可乐和苹果馅饼。他们没有得到合格证书，不得不在门口长达两个小时地号哭并气得咬牙切齿。我是在嘴里和马上就要下咽之前，才把麦芽咖啡变成了真正的咖啡，把脆皮奶酥蛋糕变成了黑森林樱桃蛋糕。

工厂主坐在院子里，让孩子们往他身上扔石块，自打我能记事起这就是他的一种怪癖。他让成年人用步枪和手枪子弹向他射击，用刀和其他工具刺他和砍他。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对他造成伤害。他在每隔一周的星期天从13点到14点半都要这么做。这一次我带来了我的小弓，用一根熊的肌腱把它绷紧。我从树莓上取下那根细小的树枝，根据工厂主儿时的噩梦，它是当时唯一向被称作爷爷的人和黑尔姆弗里德器具的发明者郑重保证让他的养子安然无恙的东西。人们当时拔掉了那丛黑莓，以为它死了就把它不在意地丢在一边。但是在夜里仅

仅是靠最后的力量，它又把一根狭长的根须按压进土壤里，以此使自己获得再生。我轻轻地拂过枝条上的刺，把弯曲的树枝作为箭矢慢慢绷紧在弓柄和弓弦之间。

L教授访谈录

代表《荒诞心理玄学》杂志

对精神分析学家伯恩哈德·吕克里希特博士、教授的采访

未经编辑的录音副本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在您的同意下我们最好把采访当作是一次会议，也就是说我们以关联的方式进行谈话，事后我再对全部材料做相应的加工和整理。

吕克里希特：好的，好的，当然了，这也正合我意。相比按照固定的模式这样往往会产生有趣得多的观点。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当然我要简短地从您的履历开始，也就是：1953年出生于黑森州的威斯巴登，从小在那儿长大并上学，然后在柏林上大学，读的是社会学和哲学专业，正是在七十年代末去往巴黎，经过培训成为精神分析师。这样的介绍非常简短，或许我们的谈话也从那个地方开始，以此为出发点如果您没有其他建议的话。

吕克里希特：没有，这对我来说完全合适。毕竟采访主要涉及的是我的工作，实际上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或许我们可以从我的第一本出版物开始，您看如何？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那篇论及歌特施密特的文章？

吕克里希特：正是。我觉得从那篇文章里可以产生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太好了。我只是再简要地强调一下，为了让您大概知道，我还想谈论哪些话题：首先当然是您的工作方式，由您

所创立的疗法等等，然后，为了不让我们的谈话显得过于枯燥和理论化，我想探讨一下您刚刚出版的自传……

吕克里希特：自传，这样说当然有些夸张，那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些随笔……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那好吧，但恰恰是围绕题为“叶琳娜·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夫人的乳房”那一章节爆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讨论，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探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您在那一章节里使用的“同性恋阶段”这一概念……

吕克里希特：哎呀，好吧，我认为这件事弄得有些满城风雨，但它慢慢又已经平息了下来，或许它根本就不再那么令人感兴趣了，也根本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了。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我不这么看，毕竟它涉及的是一场进行得相当激烈的普遍性辩论，也就是说同性恋是受基因决定的还是……

吕克里希特：是的，当然了，但是我所说的同性恋阶段……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在一个地方甚至谈到了一种“同性恋解决方案”，说实话对此我也不敢完全苟同。

吕克里希特：这是从双重意义上讲的解决方案，即一些事情得到了解决，但人们也同时脱离了一些事情，这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种最终的解决办法……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是的，我们当然也应当探讨这个问题，即在辩论中又出现了针对您作为德国人的非常粗暴的怨恨，您战后十多年……

吕克里希特：八年。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什么？啊，原来如此，是的，没错，战后八年，这段时间也足够长了。

吕克里希特：那当然是很棘手的一个章节，在我写这一章时我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对我来说那些记述首先是对个人事务的描述，个体经验，可说是并非总是想完整的思想，因此我在写作时有所保留，并非对一切都从理论层面加以论证，这样做也根本是不可能。如果我讲述说，我在那次谈到过的学术研讨会期间和一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度过了几天的时间.....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在您参加研讨会期间，您把他囚禁在一个旅馆房间里。

吕克里希特：囚禁，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从未把房间门锁上。他随时都可以走。不是这回事，这件事被媒体彻底歪曲了。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当然了，这样的事情自然会唤起人们对耸人听闻事件的欲望：一个老男人.....

吕克里希特：如果我也能获准马上插一句嘴的话，当然我那个时候也不再年轻了，但我连五十岁都不到。我在那一章里刻画了年龄这一主题，探讨了 my 健忘，但主要是涉及变老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年轻时也能侵袭人们。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您肯定比您年轻的朋友大二十岁。

吕克里希特：当然了，这一点没错。我也根本不想否认这一点，但如果您读过这一章的话.....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我是读过。

吕克里希特：那么您也知道，它是对我祖父母的回忆，尤其是回忆我祖母的死亡。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回想起您的祖父，是因为您的阿拉伯朋友跟他一样抽雪茄烟，因此您也把他称作大卫多夫。

吕克里希特：他抽的是一只海泡石做的烟斗，但是没错，这令我回想起我的祖父，在假期里我经常晚上和他一块儿坐在阳台上，与此同时他在抽着他的雪茄。那是让人感到安宁和有安全感的时刻……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样的时刻突然被您祖母的死亡打断了，那是一起自杀，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吕克里希特：当时我当然不知道那是自杀。就像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祖母的死亡，因为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也就是我的姨姨们不想让我知道一些事情，因此她们对我讲道，我祖母居留在海边，将会在那儿得到休养。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当然不是这回事。

吕克里希特：不，当然不是。恰恰是这一点我也感觉到了，当然是无意识之中，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平时跟祖父在一起时的那种令人愉快的沉默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它的性质变了。但这仅仅是一种感觉，没什么特别的。归根结底是跟在梦里一样的情形，梦里人们所处的情形一点儿也不显得特殊，它非常平常，人们甚至可能经常经历到它，但它却承载了完全不同的感情。是的，大致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生病了，做了这个有些乱伦的梦，梦里我来到母亲的卧室里，她给我看了她的乳房，上面就跟贴画一样能够看到我连环画和儿童画报里的人物形象。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在学术研讨会上想起了这种情形，当您看到叶琳娜·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夫人的乳房时？

吕克里希特：我恰恰没有看到她。她的位子实际上是空缺的。那也是我当时作为孩子感受到的内心矛盾，无意识之中感受到的，也就是被欺骗，有意识地被家庭中的女人们所欺骗，而我祖父则对此保持沉默。我祖父迄今为止令人镇静的沉默，现在却有了一种让人不安的特性，我独自一人感觉到这种特性，却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因此我生病了，因为我无法解决这一内心矛盾，此外试图在自己身上寻求罪责。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罪责？

吕克里希特：是的，罪责，一切都不再是一直以来的那个样子了。我觉得这是我造成的。当然也因为我祖母不在人世了。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它涉及的是隐藏的东西，也涉及发现裸露。

吕克里希特：是的，因为我母亲的乳房归根结底是被遮盖的，是用图片盖住的，我祖母的也是，她在自杀前患有多年的老年痴呆症，经常赤裸着身子穿过房子乱跑，也会跑到外面的花园里，她总称自己穿着带网眼的睡衣。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她的带网眼的睡衣？

吕克里希特：是的，这是她的表达方式。可以说她是在用一种服装术语描述她的裸露。我母亲和我的姨姨们沿用了这种做法，这种表达在我们家成了一种固定习语。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是您所谓的同性恋阶段是怎样适应这种情况的呢？这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如果我没读错的话，您和那名年轻男子没有发生过任何性接触，同时您又在详细地分析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夫人名字的意义……

吕克里希特：因为这属于同一范畴。因为两者不能彼此分割。这也就解释了那种误解，解释了那种对我的指责，说我这样做仿佛同性恋是一种自由决定的事情而非……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是您说了……

吕克里希特：严肃地讲，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出现了，现在它应当以我为例得到解决。一方面我们多年来和几十年来一直在说，性别是一种社会约定或者社会分配，从真正的意义上讲性别是不存在的，我们极力主张让越来越多的中间阶段得到认可，主张从总体上消解对性别的定义，另一方面就我们的性取向而言，我们又追随一种非常简单的基因遗传模式。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这是无法理解的吧？恰恰是同性恋者过去和现在始终面临这一论点，即那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性变态，人们可以对之加以改造……

吕克里希特：这我当然也知道，这让整个事情变得如此困难。只是我认为，人们不能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样论证，仅仅是因为社会的共识每次都不一样。或者我们解放我们的性别和我们的性生活……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您恰恰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吕克里希特：您说的完全正确。我没能成功。我想描述一下这种情况。但这样做我既不想说那一般是不会成功的，也不想说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听起来也会有些矛盾），因为我们的遗传属性已经相应被确定了。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然后您通过对叶琳娜·卡瑟古埃特·斯密格尔夫人名字的分析尝试这样去做。你从德语、我认为也是从英语字形出发，把“叶琳娜”（Janine）分析成“是一非”（Ja-Nein），也就是说分析成一对矛盾符号，这样的矛盾符号几乎在所有当时对您来说能致病的领域里都有所反映：性、回忆、童年、亲近、死亡、年龄等等。

吕克里希特：是的，没错，然后是对“卡瑟古埃特”（Chassequet）的分析，Chasse当然是“狩猎”的意思，我被追赶，而且是被我的感觉和恐惧追赶，但是我也反过来追捕，我猎获了一些东西，出于情感的宣泄把它扔到我旅馆房间的床上。Guet令人回想起“埋伏”，因此我害怕下意识的东西，害怕狩猎过程中的埋伏，担心可能会在摸索中掉入自己设置的陷阱，担心会弄巧成拙，以至于我精心策划、所有的人都要听我指挥的演出会暴露出戏剧原形，而我自己则无法胜任这样的戏剧。一场演出也必须总要以现实为导向。最后“斯密格尔”（Smirgel）让我回想起“磨光”“摩擦”，也就是“性交”，但也包括“手淫”。此外它也能拼写成Schmier-Gel（“润滑凝胶”），这是人们对于同性性交所必需的东西。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整个过程您可以大致归纳如下：“我担心在追踪我的过往历史的过程中掉入一个陷阱，也就是说掉入同性性交的陷阱。”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很抱歉，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跟不上您的思路。我简直无法理解，您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

吕克里希特：如早已承认的那样我对这件事的解释不是特别清楚，如果我事先预料到由此会产生何种误解……对我来说此事从根本上是要指明我当时面临的那种内心矛盾，指出我作为异性恋男人或许不得不承认，只有在一种同性恋关系中才能找到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我在与女人的关系中徒劳地寻求了一生。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也是这样分析“大卫多夫”（Davidoff）这个名字的，您给那名年轻男子起了这个名字，此外您在语言上甚至都无法与他沟通。

吕克里希特：是的，我知道自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虽然他吸的是用海泡石做的烟斗而非雪茄烟，因为在这个名字里恰好能够找到我对这一认识的反抗。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小大卫与我创造的歌利亚战斗，最终不得不失败。因此我虽然把他带进我的旅馆房间，但我马上就用一个拒绝性的名字“大卫多夫”（Davidoff）来称呼他，也就是David off！可以说是“大卫，走开！”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怎样评价这一论点，即认为您的讲述涉及的根本不是您真实的经历，而是把加缪的《局外人》中的讲述据为己有？某些相似的情况是不容否定的：在那里是母亲之死，在您这儿是祖母之死，在那里是谋害阿拉伯人，在您这儿是囚禁阿拉伯人，同时警方的调查被精神分析反省所取代。

吕克里希特：说实话我对此非常吃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加缪，这种情况的确经常发生，当人们在自己的传记里徘徊时，人们干脆就忽略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共性。只不过这一点也驳倒了那种论据，即认为我用一种殖民主义的眼光看待美丽、未经驯化、性开放的蛮族人，这当然都是胡说八道了。毕竟最终是那名年轻的阿拉伯人战胜了我。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并不一定是对一种殖民主义眼光的驳斥。

吕克里希特：当然了，您说的有道理，可是.....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那一章节以一段简明扼要的描述收尾，它描写的是最后一天在您位于圣艾蒂安的旅馆房间里的情景，您的阿拉伯朋友或多或少自愿和以一种迷醉状态在那里度过了最后几天的时光，但直到那时你们从未有过性接触。在您答应他还要给他买一件告别礼物以及共同进餐时，他站起身来脱去了衣服。我引用您的原话：“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他说一口流利和纯正的法语，让我明白在我们分手前他现在想和我性交，而且他这样做不是无偿的，而是要以一笔一定数目的金钱为报酬。我尝试对他的要求不当真，但当他不依不饶时，我只得以严厉的措辞和姿态予以还击了。对我的反应他丝毫不以为然。相反他脱光衣服站在我面前，在他大声向我表明他不容拒绝时，让我吃惊的是他的阴茎以一种令人称奇的结实有力的勃起竖了起来。这一幕不仅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而且让我陷入极度的困惑。我感到眩晕，我马上就要至少用手去握住他的阴茎，如果不是把它放进嘴里的话。我在我的西服上衣里搜寻钱物，把身上带的所有的钞票都递给他，大概有四百或者五百马克。他对我说，我应该把钱放到一边，一旦我们完事他就会把钱拿走。对此我回答说，他应该干脆把钱拿走不要再打扰我，因为我没有兴趣和他性交，虽然我也完全在意他。但尽管如此他不断膨胀的阴茎还是刺激了我，我有些尴尬地意识到自己的阴茎也开始勃起，尽管相比而言勃起的力度较小，但我的阴茎至少在蠢蠢欲动。他把我扔到床上，用阿拉伯语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他脱去我身上的衣服。我感到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他想怎样对我，但同时我也感到某种刺激。他再一次用严肃和克制的声音对我说，他需要钱，但只有在我们先进行一次无论怎样的性行为之后，他才愿意把钱拿走。我不知道为何我在这一刻仍固执地拒绝满足他的要求，尽管我受到刺激而兴奋，当时的情况逻辑肯定也告诉我最好对他让步。我甚至开始抽噎和啜泣。不是因为害怕，而更多的是感到自己被那种抗拒的感受压得喘不过气。他把我转过身来让我仰面躺着，从我掉在地上的裤子上抽下腰带，用它把我的双脚牢牢捆住。然后他走进浴室，把那两根用来挂手巾的绳子从墙上扯下来，为了用它们把我的双手捆在

床上。紧接着他给自己穿好衣服。他挨着摇晃不稳的桌子坐到椅子上，往海泡石烟斗里塞上烟叶把它点着。他在那儿坐了半个多小时，抽着烟往窗外看。我一句话也不敢说。最后他把烟斗放到桌子上，起身离开了房间。他没有碰床上放在我身边的那五百法郎。我把钱给了清扫房间的女仆，她在临近中午时发现了我并把我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

吕克里希特：是的，这种剧情的反转……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从这样的反转中某些人也看出波德莱尔的痕迹。

吕克里希特：波德莱尔？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里的那首诗，他在诗中描写他是怎样攻击一名乞丐的，直到对方终于还手并把他打倒。紧接着他和乞丐分享他手头的现金，因为他们现在彼此都是平等的。

吕克里希特：可能是吧，但是人们也过多地把我置于文学的参照系中。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不曾有过文学创作的志向吗？

吕克里希特：以前有过。当然是在我来巴黎的时候。但是用当时我非常崇拜的布莱士·申德拉斯的话说：作为如此糟糕的诗人，我不知道已经走到了尽头。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不乏这样的声音，它们评判说您在文学领域拥有比在治疗学领域更多的才华。

吕克里希特：或许因此我们还是最好来谈论我的工作吧。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是的，这样最好，我们再从您的第一本出版物开始吧，它是一种对乔治·阿瑟·歌特施密特思想的发扬光大，歌特

施密特跟您一样出生在德国，然后同样来到法国，虽说是因为完全不同和比您更戏剧性的情况，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也用法语写作。

吕克里希特：在他的《当弗洛伊德看到大海》那本书里，歌特施密特还探讨了怎样把弗洛伊德术语翻译成法语，他建议不用迄今为止的Ça、而用代词En来翻译“本我”（Es），因为“本我”在指涉事物时既模糊又精确，但又不提到（En）。我觉得这一建议非常可信，更有甚者，它朝类似的方向开启了我的思想，于是我在我的文章中似乎是建议对他的倡议进行扩展，即在法语中用扬抑符（^）来描述弗洛伊德心理动力论中提到的“本我”。这种重音符号代表了文字也包括语言中的一些东西，它们以前是能够被看到的，但在此期间却缺失了，也就是S（Es），就像在一些法语词里一样例如île（岛屿）、même（相同的、自己）、être（存在、是）等等。类似于歌特施密特提出的En，“本我”指向一些东西但并不直接命名它，但它已完全消失，压缩成一种变音符号，与另一个字母、另一种层级联系在一起。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所谓的外语疗法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吕克里希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后来，在这里我很想提及一下，我把扬抑符不再划归给弗洛伊德的“本我”，而是把它分配给内隐记忆，这种记忆有别于我们的叙述性记忆，也无法进入我们的语言系统。但这只是顺带提一下。是的，然后我开始拿我的病人们来做如下实验，我对他们说：好了，我们现在学一种新的语言，我们学这种语言仅仅是为了能够表达我们的疑问。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人们必须怎样想象这种情况呢？

吕克里希特：如果有人来找我，我就对他说，我们用德语来做治疗。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如果他一句德语也不会说呢？

吕克里希特：这甚至是治疗的前提条件。这就好比是一堂使用浸没教学法的语言课，也就是完全沉浸在外语当中，从第一次治疗开始。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起作用吗？

吕克里希特：在这方面我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就。只是，这一点我必须补充，那是一段我自己对任何实验形式都持开放态度的时期，或许在做实验时我也经常有些过分，因为对每个人来说这样的一种治疗形式肯定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那又是一种真正令人动容的感觉，它只能与人的内心感受相提并论，当母亲第一次听到她的孩子说出自己的词汇时，当病人用这种对他来说全新和陌生的语言谈论他的疑问时。您凭自身的经验可能也知道，这种实验的一个巨大的好处在于，人们用一种外语只能很蹩脚或者根本不可能撒谎，也不可能拐弯抹角地说话，因为人们同样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样我往往会很快取得初步的成功。后来我对方案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和调整，或者把它只作为疗法的一部分加以应用。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后来又是怎么产生治疗—发展—治疗的？

吕克里希特：一位来自德国的昔日的校友拜访了我。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他是已经谈到过的蒂莫，他后来让您的著作《提摩太世代情结》使用了他的名字。

吕克里希特：是的，没错。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除此之外他在您的生活里也扮演了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角色。但我们肯定还会谈到这一点。

吕克里希特：嗯，这我不太清楚。不管怎样在他来拜访我之前，我们肯定有二十五年没有再见过面了，因为从我七十年代末移居法国开始我就再没去过德国。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一次也没有？

吕克里希特：是的，一次也没有。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或许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或者为什么一直还是这种情况，如果我得到的信息准确的话？

吕克里希特：我不知道这究竟有无必要，但我现在想在我的疗法这个话题上多停留一会儿，而不是马上又把它搁置一边。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当然了，很乐意。

吕克里希特：这位校友可能是听说了我的情况，因为他长期患有躁郁症，这种症状很难被治疗，因此他专程来探访我。这样就发生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因为原本我也能用我的语言浸没疗法来对他进行治疗，只是正好颠倒过来，也就是说用法语，但是说实话我干脆没想到这一点。后来我经常思考为何当时没想到那样，在这期间我认为，在我和我的老校友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认同，尽管我们很久没见过面，但归根结底我无法对他进行治疗，也不应该对他进行治疗。但是当时，是啊，当时不知怎么地我的视线受到了阻挡。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尽管如此从这次相遇中还是发展出一种从本质上看全新的治疗形式。

吕克里希特：是这样的。那是我同时遵循的两条途径。一方面是所谓的治疗—发展—治疗，在这种模式下我和病人共同拟定一种治疗形式，更确切地说，患者自己研发出一种治疗形式，它能够使他解决自己面临的矛盾。同时我又创立了语境疗法，在这种治疗过程中患者想象一种历史或者地缘、家庭或者社会语境，在这种语境下他生成一些似乎是虚构的回忆。例如如果您允许一名患者回忆纳粹时代，尽管他当时还没有出生，那么就会出现一些令人惊奇的事物，由此人们经常到达真实心灵创伤的本源。历史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框架，为了让人们能够讲述通常无法分类的事情，因为个人的回忆无法被划归某一特定的时态。一方面它是对他者历史的接收.....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是这样一来您极大地远离了传统的精神分析，可您好像一直还感觉自己属于这一学派。

吕克里希特：在我的大学时代.....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在此我们或许可以谈论一下您的青年时代和您的政治纠葛？

吕克里希特：如果您能让我把刚才那个思想表达完整的话。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当然可以。

吕克里希特：正如已经说过的，在我的大学时代人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做出选择，把两者兼而有之的尝试很快就被认为是失败的。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仇视精神分析，虽然当时就跟阅读其他文献一样也至少阅读了流行的弗洛伊德的作品，但尽管这样也要仇视精神分析。《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梦的解析》《关于歇斯底里的讲座》，所有这些在《蓝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之前都曾是重大发现，即便如此我后来也不得不反对精神分析。现在我自己也是精神分析师，但我认为最好的精神分析师恰恰是那些不觉得对精神分析负有义务的人，就像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是那些不觉得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更不用说对其思想和现实的践行负有义务的人，就像最好的基督徒恰恰是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总之就像所有不需要意识形态和信仰的人，但尽管如此他们也能认识到各个学说的力量。因为无信仰者不必捍卫学说，因为任何学说都被烙上了“你不应当知道”的戒律，因为每一种学说都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只有那些能够看到这些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信仰这种学说）才能真正践行并继续发展这种学说。我信仰教会的学说，艰难地尝试去解决历经千年聚积在这些学说中的矛盾，我相信弗洛伊德的作为世界解释模式的学说，尝试把他学说中的矛盾和盲点、把他的社会误判连同他往往可疑的继任者们一道并入一种统一和协调的学说，通过上述做法我成为一种妄想系统的牺牲品。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要把这种情况表述得这么清楚？我只是问一下，因为您在图书终稿里可能想要表达得委婉些……

吕克里希特：不，不，可以就这样。人们必须看到弗洛伊德的观点当然并不完全正确，但尽管如此精神分析仍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思维模式，马克思的话当然更有道理，但却不适用于意识形态，基督教当然

也不在理，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在所有其他的困难方面我为我这代人看到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知道或者在我看来预感到我们没有一种可以信赖的制度，因为我们经历到的是祖父们的谎言、是父母的隐瞒和老大哥们盲目的行为主义，预感到我们至多是把这一切融入一种无知的状态。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想到了我创立的唯一真正的新理念，那就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让每一名患者自行研发疗法，通过他想象和虚构的移情和认可协助他治愈疾病。是否某人患病，这从根本上说是次要的，因为他被折磨，或者因为这种折磨只是他想象甚至是完全虚构的，因为他在患病。如果我使他有可能不被自己传记所限地去思考，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意识和感受，如果我能对接受精神分析的对象说：“好吧，讲述一下你的童年，就仿佛它是在纳粹时期发生的，讲述你的孩提时代，就仿佛它发生在一个童话般的国度，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那么我就往往最接近真实情况了。疯子自比为拿破仑或者耶稣的陈词滥调，这些一般会导致把某人送入精神病院让他接受治疗的状况必须首先得到认可，为了查明这个作为拿破仑或者耶稣、作为纳粹少年团团员或者柬埔寨难民的人将会说些或者感受些什么，为了使它能够构建自己的世界，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一种治疗才是可能的。这样我也就不必再像许多人那样否认自己的过去了.....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明确地提到这一点，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因为人们刚刚指责您.....

吕克里希特：当然我那个时候是个王八蛋，所有当时不是王八蛋的人往往更难接受过去，因为他们受过磨难，必须捍卫这种磨难和受害，因为人们往往无法像否认罪行那样很容易地否认痛苦.....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罪行是一个非常好的关键词.....

吕克里希特：这也必须被克服。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什么？

吕克里希特：这种受害人与罪犯之间的严格区分.....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是请允许我打断一下，这压根儿……

吕克里希特：我可不想对二者进行均衡，或者就一种主观臆想的罪责而言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而是我想指出这两种状态都能导致心灵创伤，心灵创伤的标志就是排除对外显记忆的回忆。但是如果我创造了一种相应的语境，我就能够进入内隐记忆，使因受到创伤而分裂的记忆以一种虚构形式通过叙述对外显记忆重新开放。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种情况其实也适合于您吗？我指的是，这种情况适合于每一个人，还是只适合那些受过严重创伤、显现出相应疾病症状的人？

吕克里希特：后来我在我的《提摩太世代情结》一书里使用了我校友的名字，因为我在提摩太的历史里找到了一种对于整个一代人的譬喻，也就是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代。一方面这一代人的父母在纳粹时期自己都还是孩子，另一方面他们（父母）又远离了学生运动，该运动成员的父辈们大多具有纳粹背景。我将把这一代大致划定在1953至1963年的十年跨度上，因人而异当然也可以提前或者延后几年。简而言之这一代人患上了所谓的提摩太情结。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也跟巴德尔-麦因霍夫情结以及您自己的过去有些联系吗？

吕克里希特：您说什么？我觉得我没听太懂。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不知道《巴德尔-麦因霍夫情结》这本书吗？

吕克里希特：我听说过，但没看过那本书，如果您指的就是这个。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就奇怪了，或者可能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您凭自己的经验知道那种情况，也就是说无须间接了解那种情况。

吕克里希特：虽然我不肯定您想影射什么，但我猜测您暗示的是我在德国的历史……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正是，由此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即您说的能否应用于另一个国家.....

吕克里希特：您这么说很有意思。当然您很幸运很晚之后才出生，如果我对您的年龄估计正确的话，但或许事情涉及您的父母，因为您知道，凭借维希政权和根本算不上辉煌的抵抗运动，法国也拥有一段完全相近的历史。类似的现象您在所有的国家都能找到（当然稍有不同），不仅仅是在那些经历了独裁统治的国家，有时这不会让事情变得简单，而只会让它变得更加困难。您想象一下，您不仅经历了没有明显罪责的一代，而且还面对看似清白的两百多年的过去，这样人们就必须换一种行事方式，或许变换一下方位。或者人们进入神话、童话和臆想之中，然后往往就会发现它们根本就不那么奇幻。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跟提摩太又有什么关联呢？

吕克里希特：我对提摩太这个人物形象的好多方面感兴趣，一方面是他的名字，可以说是“恐惧神”的意思，它由timao（恐惧）和theos组成，缩写为蒂莫（Timo），但只保留了“恐惧”的意思。这个提摩太几乎只在《路加福音》的《使徒行传》里出现，此外还出现在保罗书信里，其中有两封是写给提摩太本人的。在论及这些书信时每一位精神分析师当然都会想到拉康针对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的著名讲座，我在我的书里用两个章节探讨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和坡的《失窃的信》之间的联系。请允许我在此从中选取一个方面，因为它会把我们引向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也就是说我让自己没有从真正的词源出发把purloined的词义（失窃的）分解为purluigner（拿走）、prolong（拉长）和postpone（延缓），而是从粗俗词源角度把它解读成pure loin，也就是“纯臀肉”的意思。Loin就跟Lenden（臀肉）一样也总是生殖器的同义词，事实上保罗真的把一封失窃的信写在这样的臀肉上寄了出去。他把这封信亲手写在年轻的提摩太的身体上，提摩太在《使徒行传》里出现的目的也仅在于此，也就是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在《使徒行传》里发生了一些独特的事情，任何圣经批评都无法真正解释这样的事情，我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无法解决的

历史矛盾被转移到提摩太的体内，此外保罗在第一封哥林多前书里把它描述为“天主体内我可爱和忠诚的孩子”。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是怎么理解“被转移到体内”的？

吕克里希特：把某人身上携带的和整个社会排挤掉的东西转移到孩子们的身体记忆里，也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内隐记忆里。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里这么说道：“之后他（此处指保罗）也去了德尔贝和吕斯特拉。看啊，在那儿生活着一位门徒，他的名字叫提摩太，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女人和一位希腊父亲的儿子。保罗希望在传教途中把他带在身边；因此他出于对生活在那片地区的犹太人的考虑对他行了割礼；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父亲是一名希腊人。”在此发生的令人无法置信。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涉及的是一位门徒，也就是一名已经信教的年轻男子，保罗很想把他带在身边作为陪伴者。这名年轻男子未行割礼，虽然他有一位犹太母亲，而犹太教实行的是母系继承制。但正如记载的那样，母亲已经“变得虔诚”，很早就变得虔诚，毕竟她反对对她儿子施行割礼，因为犹太男孩都是在出生后的第八天被行割礼的。保罗自己是在大约三十二岁时成为基督徒的，他在五十岁左右去了吕斯特拉，在那儿他遇到了提摩太，提摩太的生日不详，但可以推测他当时大概是十六到十八岁，因为保罗很快就把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他，其中包括从一座罗马监狱里再偷带一封信出来。也就是说，提摩太的母亲在耶稣死后不久就已经“信教”了，提摩太作为基督徒的时间和保罗本人的大概一样长。但现在保罗却对提摩太施行割礼。一名基督徒实施一种旧约中的仪式，通过这种仪式一名男子被吸收成为犹太教区教徒。一名基督徒对另一名基督徒行割礼。这种割礼被用同一个词即perietemen（切、割）做了描述，《路加福音》在几个章节之前也用这个词命名了以撒的割礼。为了真正理解这一令人无法相信的过程并能够对此做出解释，我们必须简要回顾一下使徒保罗的历史。他是一名享有罗马公民权的法利赛犹太人，与提摩太完全不同，他经历了一段成为妥拉教师的学习时期，成为最邪恶的基督徒迫害者之一。在犹太教区内部他也坚持对皈依的异教徒施行割礼，为了使皈依变得容易这样的割礼经常被执行。如果人们从老保罗的历史出发，那么他针对提摩太所采取的行为是完全可被理解的，但是在他皈依之

后几乎过去二十年了，在这期间洗礼取代了割礼，更有甚者，那是对信仰的精神理解，它比遵守仪式更为重要。对此保罗在第二封《罗马书》中写道：“天生未行割礼并履行法律的人将成为你的法官，他判你拘泥形式、接受割礼和触犯法律”，稍后又写道：“心灵的割礼是发生在精神世界里而非形式上的割礼。”因此他的态度很清楚，保罗不是拐弯抹角讲话的人，既不是作为使徒保罗也不是在他皈依之后。因此他对提摩太施行了割礼？因为可能对未受割礼的人表示不满的犹太人？这不大可能。不，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想把自己的遗产、把受过割礼的人自己的身体记忆转交给他“可爱和忠诚的孩子”，转交给他最喜爱的门徒。在此过程中保罗非常有意识地忍受了这种情况，即他通过这种行为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在此我只能笼统地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对提摩太情结的理解，按照一种类比推理可以表述如下：我所命名的这一代人的父母不是纳粹，但他们是在纳粹统治下长大的，就跟保罗一样，他是基督徒，但却是作为犹太人被教育的，两者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遗产转交给他们的孩子，这让这些孩子感到困惑，正如令提摩太感到困惑的是，他被一个男人施行了割礼，而这个男人自己却宣称割礼是多余的。在提摩太事件中一切都是相对未知的，在提摩太那一代人的情况里当然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对他们的经历保持沉默，他们努力成为正直的民主主义者，跟他们的父母他们不发生冲突，他们的父母往往已经死去，本身就在战争中经历了许多磨难等等。这样一来他们就对他们的孩子施行割礼，把他们被排挤的经验和创伤转交给他们孩子的内隐记忆和身体记忆，如果他们愿意这样的话。现在我要问您，人们应该怎样接近和怎样达到这种被转移的、这种被无意识传授的经验，这种“心灵的割礼”，就像保罗贴切描述的那样？从这一关联出发，我给我的治疗—发展—治疗这种治疗形式又补充了有意虚构的回忆语境。我可以在自己身上充分尝试这种方案。我向自己呈现不同的历史或者地理语境，为了从中生成自己的回忆，由此我意识到，我怎样能够生成来自纳粹时期的“回忆”。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是这样的回忆有多可信，如果人们在一般性回忆中就必须总要产生这种怀疑，即这些回忆涉及的是所谓假记忆体综合征？

吕克里希特：您将会发现以下观点在所有的治疗医师身上都很普及，恰恰是在解离性人格疾患领域，即认为在治愈方面重要的根本不在于回忆是否真的正确，而在于严肃认真地对待患者，相信并安慰他们。至于我的观点，是的，人们可以简短截说，人们可以马上认为那都是错误的回忆。但是这里涉及的不是回忆，而是回忆制造的冲动。精神分析认为，被分析对象通过治疗进入一段无意识的回忆，他产生相应的冲动并由此得到治愈。但这只能借助某些回忆才能成功，这些回忆必须供受试者的外显记忆和叙述记忆支配。所有的身体记忆和内隐记忆都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被复制。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借助拓宽后的记忆语境您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吕克里希特：至少我有机会。当然在我的主观尝试方面我不能列举数字了。但那是达到多方面被排挤的身体结构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您想一下记忆也包括叙述记忆和外显记忆是怎样起作用的，想一下记忆是以怎样复杂的形式重叠成不同的历史层次的，那么我相信这种治疗方案也能在其他领域得到有益的应用。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是怎样理解历史层次的？

吕克里希特：举个例子：在我的故乡有一处阿道夫高地、一条阿道夫林荫路、阿道夫大街等等。这里所说的阿道夫是指拿骚的阿道夫公爵，他于十九世纪出生在比布里希宫殿。但在战后德国“阿道夫”当然是一个承载了太多元素的名字，恰恰是因为人们普遍用“阿道夫”

（名）来称呼希特勒（姓），人们无法对回忆进行划分和诉说，如果我穿过阿道夫林荫路，那么我不会想到那个阿道夫，而是会想到拿骚的阿道夫公爵。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您原先的故乡，也谈到了您刚刚实施的治疗方案，那么您不应当也对您的过去表明态度吗？因为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过去不是私人的事情，因为人们把过去也转交给另一代人，以此使他们承受压力。

吕克里希特：您指的到底是什么？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啊，您是知道的，过去一段时间指控您的声音变得高涨，说您于七十年代在德国参与了恐怖主义行动，说您在法国潜伏了起来，接受了一种新的身份。

吕克里希特：我听说过这样的指控。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对此您怎么评论？

吕克里希特：据我所知截止到现在人们没有拿出任何针对我的具体证据。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对您来说就够了？对一个像您这种地位的男人？特别是考虑到您创立了这样的解释和治疗模式.....

吕克里希特：您的意思是，我这人不值得信赖？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另外也有这种意思。

吕克里希特：这是一种人们自很多年以来在我的家乡以海德格尔为例进行的讨论。讨论的问题是，一个曾经是反犹太主义者和纳粹的男人的哲学是否会有价值。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那您是什么态度呢？

吕克里希特：这必须由每个人自行决定。人们必须相应地研究哲学，如果哲学坚持自己的标准.....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也能谈及一种补偿或者更贴切是一种排水系统吗？也就是人们对真正的事情闭口不谈，相反却建构一种哲学，它看似在研究其他一些东西，但其实却明显是在研究自己。因为如果海德格尔批判笛卡尔以来的哲学，认为它干脆把现实割裂为两部分，即一方面是精神，另一方面是与精神相对的世界，同时他尝试用他的“存在”概念重新消解这种割裂、这种任意的划

切，那么他事实上是在又一次进行割裂，也就是把现实割裂为政治现实和哲学现实，最终割裂为私人现实和哲学现实，因为至少从1935年开始他隐瞒了，他之所以对纳粹们感到失望是因为他们对他来说显得不够纳粹，他隐瞒了自己继续是而且直到最后始终是一名血液与土壤思想家和反犹太主义者，但尽管如此他尝试劈叉，撰写一种不抽象的哲学，尽管它最终必须还是抽象的，因为它排斥了遭到谴责的部分。

吕克里希特：啊哈，被谴责的部分。巴塔耶。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是我想停留在您的问题上，探讨您被谴责的部分，如果允许我这么表述的话。有趣的是恰好是这名患者，您昔日的校友，从他的名字里您发展出了整个一代人的心理情结，恰恰是他被捕了，而且他也好像提供了您的许多罪证。

吕克里希特：我已经说过了，这个蒂莫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他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您用您的疗法治愈了那些心理问题，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

吕克里希特：治愈，这只是一个概念。您看，如果福柯比如说描述那些医生，他们对患者的病痛.....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无论治愈与否，请您不要偏离话题。这个提摩太指责您，在柏林参与了针对一个会议中心的恐怖袭击。

吕克里希特：您瞧，这是一件相当复杂、此外也是非常隐私的事情。我和这个蒂莫，我们俩曾经爱上过同一个女人。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警方也同样已经在通缉那个女人。据说她在美拉尼西亚群岛的某个地方。

吕克里希特：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认为，当时在我们三人之间肯定有一些事情出了问题。克劳迪娅，那个有觉悟的女人，她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童年，或许遭受过虐待，蒂莫当时就已经患有抑郁症，重度

抑郁症，伴有短暂的躁狂间歇期。此外两人还在青年时代就接受过多次精神病治疗。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说的我理解对了吗？您想暗示他们俩不是真正有责任能力的人，他们的供词没有任何价值？

吕克里希特：我不会这么说的。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它听起来却是这样的。它听起来甚至给人这种感觉，仿佛您是这种三角关系中唯一正常的人，这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即您不仅从德国逃到法国并在这里潜伏起来，而且您还逃进精神分析的世界，为了似乎在它里面躲藏起来。

吕克里希特：我觉得您现在有些过分了。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这么认为？

吕克里希特：当然。如果我们把话题重新转向我的专业能力，我觉得这样要有意思得多……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些难道不属于一类吗？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迹象反对这一事实，即您在您的青年时代也做了一些在此期间使您……

吕克里希特：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这真是岂有此理，尊敬的教授，恰恰是您想要这种割裂……

吕克里希特：请您不要再使用这样的嘲讽口吻：“尊敬的教授”……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很遗憾我禁不住使用了这样的口吻，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您用这种态度质疑了您自己的治疗观点。

吕克里希特：您必须让我来决定自己的态度。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恰恰不能这样，因为否则的话您的整个详细解释，一切.....

吕克里希特：什么是一切？您究竟期待我做什么？我为什么应当.....我觉得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不，真的，这样一来我的忍耐.....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您的忍耐？

吕克里希特：是的，我的忍耐。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但或许我们刚刚对您有所触动.....

吕克里希特：您现在还想以我的治疗师自居吗？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我绝不会这样的，我只是认为.....

吕克里希特：那么就请保留您不恰当的言论吧。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啊，我现在明白了您说的那种无意识的承受指的是什么，这种您现在突然采取的官腔.....

吕克里希特：我不允许这样.....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可以理解。

吕克里希特：不，和您这样下去丝毫没有意义。彻底毫无希望。您想激怒我。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我还什么都没有做。

吕克里希特：您又来了。不。结束了。这场谈话.....

《荒诞心理玄学》杂志：谈话？

吕克里希特：结束。完毕。您也正希望这样。

为何字母表能够被写进话语并篡改话语的意义

A 字母表以这个元音字母开始，这是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在语言中永远无法和解的原因也仅在于此。我们所认为的开始可能是中间。而最初的终点，完整的、无缺陷的、环状的大写字母O即希腊文字的最后—个字母，却是语言真正的开始，从它里面产生出的孩子首先是U，然后是A，最后是E和I。—开始从后面束缚我们的不是混乱，而是洞穴或者深渊，是大海和感到无聊的波娜女神的哈欠，因此我们持续和绝望地探寻我们的开始，它（开始）逃脱了我们并将—直逃脱我们。字母A代表欺骗和背叛，它是脱离现实的理论字母。

B 谁要是说了字母A，他就进入语言的束缚之中，必须模仿A把B也说出来。模仿某人说话就意味着，宣称所说的话属于他自己。同时人们重复他的话，也就是照他的话再说—遍，这样他自己已经不在现场，人们不再对他本人说话，而是对第三者。通过另—个人对第三者说话是语言的基本原则。语言仅仅是出于这一原因而得到发展的：因为不在场（创造语言的人和语言所论及的人的双重不在场）。A迫使我说出B，B把我推入语言，使自己和A联系了起来。第—个介词产生了：ab（脱离、离开）。处在起始位置的就是Ab-kehr（背离、背弃）、Ab-gleiten（滑倒、滑下）、Ab-rutschen（滑落、滑脱）、Ab-winken（示意拒绝、示意通过）等等。我们的语言朝着世界旋转。字母B代表过境和过渡，但却是朝着由外力所决定的终点。

C 字母C构成了三位—体。我们的字母语言是—种基督教的语言。字母C从不单独出现，而是固着在H和K上，在S和H之间移动。如果我们发现它孤零零—人，那它就是他者的标志。它听起来像是K和S，但从来不是它自己。如果A是圣父，B是圣子，那么C就是圣灵，这样在ABC这个神圣的名字里C也只是表面上显得不受牵累，但它自己并不存在，将会立即重新消失在文字里，成为纯粹的符号。字母C代表灵魂、空气和细菌。

D 字母D的意思是双倍、重复、结巴和迟疑。因此它自己不能被加倍（我们的文字保留了否认过程）。它是指示世界见解的象征。它说“那边的那个东西”和“那边的那个人”，好像是在回答“在哪儿”和“谁”这样的问题。它伸出食指说“你”，只是太亲密和太快，尽管它又立即退回到自己的迟疑当中。人对面的物与人通过字母D被描述了出来。尤其是动物。T是从D当中发展而来的，就跟P是从B发展而来的一样。在方言中两者又返回到那里。T尝试有意识地执行由D所进行的有欠缺的与外部世界的划界。它们俩都是人造字母。字母D代表他者和周边环境。

E 字母E是与世界的背离。它的意思是过饱和恶心。E不像D那样结结巴巴地迟疑和不断重复，而是让语言河流无关紧要地继续在自己内部回响。它只是表面上具有深度，实际上在成倍出现的地方却缺少阐释行为。双写E是意义匮乏的标志，这种意义匮乏应当通过广度或者深度的感应作用加以掩盖。大海、海洋、空虚、灵魂，所有这些描述事物的概念，我们把这样的事物理解为外壳，它们里面除了我们的想象再无任何其他东西。这样E就是表示数字的字母，它几乎总是隐藏在这些数字的名称里，哪怕是作为变音的附属物。从8这个名字里缺少字母E人们可以推断出，8无异于是数字系统里的一个停顿，作为“小心”的呼声，它应当提醒我们，在7这一最后一目了然、具有“超越”象征意义的数字之后，在数字的个性化方面再无新的东西出现，而是它会向任意多数、向无法区分的大量、然后当8倾倒时向无限过渡。字母E代表外壳和箱子。

F 字母F的意思是不自在和裸露。它与嘈杂声的距离要比和语言的距离更近。它是野性的欲望，愤怒和死亡能够在这样的欲望里被找到，因为与F一道涌出的还有呼吸。F是语言的薄弱环节，因为粗野的叫骂、诅咒和漫不经心地说出被文字神圣化的名字都和它一起成了否认。它无法通过V的伪装或者P的哑谜——自身是作为遭受文明化奴役的字母从B里产生出来的——连同从属的H（代表沉默的字母）被排挤掉，而是像幽灵一般毫无重点地穿过文字和语言出没，尽管人们慢慢尝试通过替换或者删除的方式，剥夺以F打头的词汇（Firmament/苍穹、Fee/仙女、Freiheit/自由，等等）。字母F代表未被驯化。

G 字母G隐含着善良和仁慈。它是柔和、母性和理所当然的付出，它永远无法像B和D那样通过委派文明的字母而被削弱。相反，K的发明增强了G无懈可击的地位，给K自己分配了一个局外人的地位。

H 前面已经说过，字母H的意思是沉默。它代表的是缺失的兄弟、阴影、愿望、所有从一开始显得被诅咒和消失的东西。它是穿过花园的上帝的气息。它是一个没有开始和不结巴的词汇。

I和J 它们俩是一对双胞胎。

K 字母K是守卫者。它站在岩石之间一句话也不说。

L 字母L位于软字母三位一体的起始位置，其中L是最软的字母，N是最硬的字母。L标记的是一种不出声的歌唱，它只是做出舌头滚动的样子，但自己却什么也不说。同时它位于三位一体的前列，其中自指性的M在被N排除的过程中指向O里的上帝。这样一来它也是置身度外的标志，是P的翻转，后者在另一侧结束了三位一体。相反它消极和狐疑不决的鲜明特征使得它是代表懒散的字母，这样的字母既不热也不冷，为了还能够参与到一打（十二个）当中，它不敢占据中心位置。

M M就其本质而言是表示占有关系的字母。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指向胸脯，而自己又好像要从上面飘落。它在哼唱中使身体振动，避免了嘴唇和喉咙的发音。

N N是否定的字母。它有M的四分之三大，断然拒绝了M的方言发展趋势。这样它必须保持否定，除非它在M、N和O的三位一体中从否定的自身指向神圣。

O O是上帝的字母，不仅是因为它原先作为希腊文字的最后一个字母结束字母表，而且还因为上帝从不是能够被看见的上帝，而是在他的画面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因此人们把上帝（Gott）写成GOtt。上帝的仁慈让神圣的O跨越人的死亡的双重交叉而照耀，以此体现了上帝创世过程。而到了今天，在任何可能性信仰的另一侧信仰自身只能是思

想形象，人们必须把上帝写成gOtt。仁慈缺失了，相反它成了永恒的循环，死亡和画面作为其切线在原地保持不动。

P 它是文明化的B。同时它也是M、N和O这一三位一体框架的另一部分。P是深入到静止不动的文字自指内部的开端。

Q 字母Q的意思是例外，为了能够存在它迫切需要每一种规则。Q实际上不是字母，它是从字母表中逃出来的无任何意义的东西（正如Y意为“什么也不再”）。它被拽了进来，和其他字母一并罗列，但它的存在是一种抽象概念。它是一种必须存在的基本粒子，但绝不会被人所隔离。更有甚者：相比在其他字母里，在字母Q里门更容易向空白页即无文字状态敞开。这样Q作为一种外来和其他文化的残余物可能会对我们的文字构成永久威胁，以至于我们永远也无法像魔像前额上的那个字母一样把它擦去，而不至于剥夺我们自己的文字，为了统治我们这种文字跟魔像一样使自己独立，并凌驾于我们的语言之上。

R 它是代表背叛和失望的字母，就像从革命中产生了俄国、从法律中产生了复仇那样。字母R像是避雷针一样消失在土壤里，它未完成的动作引发了反应，为土壤和血液做了准备，把自己的能量导入血液。字母R里映现了反射。视网膜上的刺激。

S 诱惑。任何事物所面临的困难。缠绕在手腕和脚踝上的锁链。战胜我们的蛇。没有被完成的东西。两只手抓向虚无，无法闭合成8字形，无法进入无限的睡眠境地。字母S站得笔直，但却没有支撑。它在摇摆。

T 字母T代表黄昏/破晓和欺骗性的安静。白昼从它开始，黑夜以它结束。时间和永恒都同样导致它这一结果。它被从“警察”这个词里删除，但尽管如此也同样统治着这个词。

U 它不仅作为半圆连接两条线段。它还连接词语。单独作为缩写已经足够有力，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喜欢跟在其他元音之后。

V 就如同从B发展出文明化的P、从D发展出占优势的T一样，字母F那种不受限制的欲望、疯狂的愤怒和极度的兴奋又被增添了高贵和成比例的V。与P和T不同，V甚至在声响上也没能与产生它的F区分开来；如果它通过做出说外语的举动尝试这样做，那么它就会倾向于默不作声了。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否认和歧视F不受阻挠的声响，给它（F）掺和一种书面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拦截和重新解释F所散发的一切野性。字母V代表的是灰色理论、阴谋、否认和间谍活动。

W W是提问的字母。在结束前有三个字母，就像回答它的D一样，在开始之后能够找到三个字母。它是思考的辅音，是在语言展开之前的停止，一股吹动音节的微风。

X 字母X自己什么也不说，尽管它好像代表一切。它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交错配列，其逻辑仅仅基于它不断以一种循环论证证实自己。它是异国风情的象征，尽管它在删去一些东西，但它恰恰证实了如此被标记的东西并强调了它。

Y 字母Y的意思是失去和忘记，但也意味着流传下来的东西和古代。Y曾经有一种意义。今天它成了毫无意义的符号、树杈或者交叉路口，在这样的路口儿子们杀死他们的父亲，为了把自己从语言中解脱出来。它是未完成的十字架的符号，是沙漠中呼喊者的符号。曾经它是一切，现在它什么也不是。

Z 字母Z不知道怎样自己说话。它位于字母表的末尾，但尽管如此感觉自己并不属于那个地方。它只能跨越所有其他字母与A交谈吗？还是有一种更快的连接？从头到尾（从A到Z）或许就是意味着头和尾（A和Z），因为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其他字母在两者的连接处都消失了？字母Z代表不确定和对自己的声音一无所知。

虚构的友好第四和最后部分的自传体前言

(这一次真的是自传体)

我总是几乎上瘾地不断搜寻作家的传记，他们都是长年患脑闭塞症、最好又同时患有抑郁症的作家，比如乌韦·约翰森，在此我不断增长的年龄对我来说显得是缺陷，因为其他人除了或多或少完成的作品之外，至少还必须证明自己的死亡，而我自己则作为叛徒继续活着，左胳膊下面夹着一本包在塑料袋里的艺术画册走过长长的行列，右手里拿着一块莱比锡果仁蛋糕，后来在喝茶时表明，蛋糕几乎没有底部，而是仅仅由一种覆盖了一层杏仁泥的核桃奶油组成，因此它对于我的口味来说有些不平衡。我在用勺子吃蛋糕时读到，约翰森1979年，也就是在距离他死亡还有五年的时候，必须重新吃力地教会自己写作，我边吃边考虑，我怎么能够重新（在我来看也是吃力地）教会自己写作。为何要这样？我问自己，并马上找到了三种回答，但它们不是真正令我满意，此外它们好像还彼此矛盾。一方面我首先想到，我不必总对“我写什么以及是否我会写作”这个问题撒谎。另一方面或许通过写作，哮喘和有损形象的皮肤病将会得到缓解，据说我青少年时期的主人公现在也在患皮肤病，我患的是一种所谓无法被治愈的老年痤疮，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玫瑰痤疮，而他患的则是一种寻常型痤疮，能被治好，但可能导致初步的疤痕和毁容。从一般心理学角度我在想——在此感受到的不是心理学，而是把自己感受为粗俗，从单纯和幼稚意义上讲的粗俗——，那种带着鼓出和凹陷的水痘、像红色火焰一般写在我脸上的东西或许会逐渐褪色，最终甚至会消失不见，如果我重新教会自己写作的话。第三我认为必须要叙述一些事情，尽管我一直都是相当短暂地这么认为，大部分时间又不这么认为，因此人们也可以把第三点删去。

艺术画册跟果仁蛋糕或者最好跟蛋糕的名字一样碰巧也来自莱比锡，来自那里的博物馆，它将维利·鲍迈斯特（Willi Baumeister）和卡尔·

霍费尔（Karl Hofer）进行了对比。出于完全个人的原因我觉得这种对比很有意思。在此又有三个不可思议的理由：第一，两位画家在我出生那一年都已死去。第二，在舍费尔艺术品商店（像我的主人公那么大时我在那儿为我的艺术明信片收藏买一些卡片）主要出售维利·鲍迈斯特的明信片，这样的卡片我也会买，尽管他的画作我不是特别喜欢。此外我不得不说，维利·鲍迈斯特的画片所在的领域代表的是现代派，这在当时主要是抽象艺术，因为我对所有现代派艺术都感兴趣，我就连带买了他的图片，因为他至少不是我所拒绝的具体和现实风格。当然我不排斥超现实主义和维也纳虚幻现实主义流派，但我拒绝一切被我纳入庸俗忧伤范畴的东西，比如也包括我很讨厌的卡尔·霍费尔。第三，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欣赏品位发生了变化，但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年里我不再去想维利·鲍迈斯特，也没有再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因为他在七八十年代被人遗忘了，在这之后我又一次回想起他，翻出旧的艺术明信片，再次感到对他的画片的兴趣，尽管当时我只是对这些画片进行了分类而没有继续加以欣赏，但我却感觉它们离我特别近，令我回忆起一种图画赏析的感觉，总的说来令我回忆起一种与艺术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我肯定有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卡尔·霍费尔也同样更加亲近，但我并没有刻意这么去做，特别是他用以描摹战前世界的那种忧郁在当时可能是离我太近了，在当时经常很相似的战后世界里，在此期间通过时间距离他的画作的氛围与略微伤感的情怀融合在一起，我在六十年代或者东德七十年代的黑白电视连续剧里也在寻找这种情怀。同时我觉得维利和卡尔这两个人物对于战后德国的二元世界来说是典型的，战后德国自身也按照二元制模式被划分为东部和西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在小说临近收尾时应当有一段长篇独白，我想让我笔下主人公的父亲即一位工厂主在独白中详细介绍一下这种二元性，在他用他的思想观点（那是一种为新自由主义蓄势的态度）尝试废黜这种二元性之前。战后世界二元性的幽默之处恰恰在于对我来说现在才变得清楚的那种相似性，即相互抗衡的力量之间的相似性。霍费尔和鲍迈斯特之间的对立绝非是无法克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立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最终现出真正的构造，就像马勒和布鲁克纳或者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之间的区别和敌对一样。

除了这一编目和约翰森的传记之外，我还阅读了菲利浦·索莱尔的《时间漫游者》。我偶然把书翻到某一处，它讲述的是艺术家们的母亲，普鲁斯特的母亲，她使自己患哮喘的儿子窒息身亡，阿尔托，他不断受到自己母亲怀孕的迫害，莫扎特，不为母亲的身亡所动（《依旧一首美妙的奏鸣曲》），赛琳，当然也包括索莱尔没有提及的约翰森的生平，在此母亲都扮演着一个成问题的角色。一方面母亲尝试，很实用地用一个眼罩来果断治愈左眼的斜视，另一方面她又总重复说：你像是一只公绵羊一样在斜视。但约翰森的母亲据说是出于关怀才说的这番话，因为她为自己的儿子设想出外科医生的职业，如果要把一个人剖开，人们就必须有一种准确的目光。但是哪一种灵感在这里使另一种灵感合理化呢？是职业愿望使母亲在面对痛苦时表现出的无情合理化，还是母亲的无情使职业愿望合理化？因为母亲们干脆不剪断她们孩子们身上的脐带，因此她们显得如此残忍，因为她们早已不再是养活孩子，而是通过孩子在养活她们自己。这样第二次和真正的背叛就发生了：约翰森被崇拜希特勒的母亲从祖母勒赫尔所在村镇的安全氛围中，打发到位于波兹南附近的科斯滕德国寄宿学校。我笔下主人公的母亲显然不拥有这种权力，因为她身体瘫痪。但在她瘫痪之前当然也有一段时期，意外瘫痪是在一天中午降临到她及家庭头上的，当时她正在充分尝试新的搅拌器。突然她的双腿不听使唤，她不得不把按在搅拌器上的双手移开，因为压力盖子自行开启，当她瘫倒在地上时，从搅拌器里喷出的生面团遍布在刚刚贴了墙纸的厨房里。

总之最后几年我无法记述，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在面对自己人生时的那种尴尬感觉。我的经历对我来说显得如此欠缺和平庸，以至于这种欠缺构想也扩展到了我的思想和感觉上，并且从那里继而扩展到我的见解和想象上，因此最后我根本不再有任何东西，只感到一种空虚，在这样的空虚里有时我会得到某一项任务，受到某种询问，为此我能够撰写一段文字，因为好像是另有他人使我坐到了打字机旁边。贝尔恩德·诺依曼在他的约翰森传记里写道：“从事写作的人都在隐藏自己。写作在隐藏中演变为不情愿的传记，成了写作的原本话题”，这段话正好道出了我所遭遇的内心矛盾，因为我在写作中甚至连隐藏自己都做不到，因为这种隐藏变成了我人生的主旋律。也就是说人生阻止了写作，或者说得更贴切是我在面对自己人生时的感觉，前面已经

提到的尴尬和欠缺阻止了我为了记下一些东西而足够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青春期和不洁净的皮疹余威不减，它确定了我的命运，像一具石棺一样覆盖在失控的增殖反应堆上。

菲利浦·索莱尔写道：“我的身体，它是聪明的：它知道它不是一幅图像，它应该在这个时代的投影终端。也就是说，它想待在主人身边，它是火山熔岩，持续不断，注重仪表，穿着礼服，被人认可，受宠若惊，有所希望，需要抚摸，受人喜爱。它喜欢说话，并尝试不停地诉说自己的位置。它有时喜欢自己进行回忆。然后梦几乎总是一样的”，然后他又列举了诸多我在梦里也经常会碰到的平庸琐事，汽车找不到了，手机丢失了，这在我的梦里还从未出现过，身份证件，与此同时人们身处很远的陌生地方。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常年在写有关梦境的日记，在记录了上千次梦境之后又搁笔不写了，但不是因为我做的梦越来越少，而是因为越来越多。

比如今天夜里我迈进一家灯光昏暗的钟表店。店里表面上看空无一人，但然后我在一根柱子后面发现了一名男子。他一声不吭，但却用敦促的眼光看着我，因此我向他慢慢走去。现在我看到他的后脑勺缠在一种钟表装置里，他自己无法使它从里面挣脱出来。我用双手抓住他的脑袋，但不是向前拽，而是用力旋拧它，把它拧紧在钟表装置上，而不至于使它从身体上脱落。现在他又可以正常活动，行使自己作为售货员的职能了，以便服务一位在这一刻急急忙忙地进到店里的先生。在售货员与那名男子进行普通的销售会谈期间，我清楚了这名顾客实际上是一个疯子，他想把我们作为人质绑架。每当售货员转过身去，为了从其中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块新的手表给那名男子看时，他就会跑到窗边，伸出胳膊朝外面瞄准，嘴里模仿枪响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反复了几次之后，他手里真的有了一支猎枪，但却是反过来持枪，也就是把枪口对准自己。尽管如此为了躲避他我们还是逃到柱子后面，之前售货员就站在那里。当那名男子用猎枪对准自己继续在店里跑来跑去时，售货员用眼神示意我，我应当把钟表装置从他的后脑勺里再拧出来。但我无法成功地举起胳膊。现在那名谋杀犯开始大喊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命令，虽然命令是用德语喊出的。突然店门被撞开，两个身着白衣的小姑娘在秋叶的簇拥下走了进来。她们举着一面

过大的横幅标语，我能在上面辨认出几个相互之间毫无联系的词语：
锌壶、橡木桥、鲤鱼眼睛、锈蚀和挥舞镰刀。

虚构的友好4：从平缓本体论到心跳停止本体论

(一般叫作：大脑电气活动静止)

世界慢慢从我身边沉沦。或者我从它身边沉沦。或者气泡从我身边沉降。或者我从它们身边沉降。终于那种恐慌的感觉消失了。我一边下沉一边思考，但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思考不会马上停止。因为我所想的比其中一个气泡还要更空，它没有内容，形式如此脆弱，以至于我根本不敢真正去思考所想之物，而只是把它在我脑后脑中保留片刻，直到它自行解体，向下沉入肺部，把我肺里的空气挤出。我从那些植物旁边沉沦，它们都是用灰色的毛毡制成的。有人把它们从青年旅社的床罩上剪切出来，因为我在它们叶片上的有些地方能够看出“脚端”字样。其后能够隐约看出一只钟表的轮廓。它是一只带磷光指针的红色闹钟，就像我在自己临终床边的床头柜上希望看到的那种，因为在我们家世代代通行的做法是，人们给将死之人把这只红色的闹钟放到床边。母亲们不再能够认出挥着手朝她们跑来的自己的孩子们，孩子们也不再能够认出他们的母亲，当他们放学后靠着母亲们的汽车在等她们的时候。我承认，在我到达地面时我还在想这些事情。降落是有终点的，我可以让自己蹲下来，与此同时最后的气体从我的肺里涌出，我的右手像一只木偶的手一样再次从我身边向上飘荡，仿佛它是想挥手致意。奇特的是，整个一段时间里我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待着。就连我的右手也再次向下回落，与左手一道放在我怀里。我正在惊奇人们不呼吸能够坚持多久时，我被人揪住拽了起来，人们猛晃我，捶打我胸部，扇我耳光。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然后又是左耳光。我原本不想再分开的嘴唇被强行掰开，一股热乎乎的气流挤进我的口腔，使我的肺部重新膨胀起来。

当我把眼睛又睁开一条缝时，我看到格克汗先生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坐在我身旁的一个凳子上。是他把我放回到行军床上的。透过窗前两条毡毯之间的缝隙，一些傍晚的阳光夹杂着几片绒毛照进屋里。像是

为了使自己找准方向，我想起了格尔妮卡。然后我试图大声斥责格克汗先生。但是从我的嗓子里只出来一种可笑的嘶哑声。尽管如此他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一名徒步旅行者，”他说道，“他在旅行期间在路边休息并睡着了，然后他被粗暴地叫醒。起初他以为是在做梦，但当他睁开眼睛时，他看到一名骑手从他的马背上下来，用一根棍棒来揍他。他尝试反抗，尝试避开击打，最后他吃力地站起身来跑向一棵苹果树，为了藏到那里不让袭击者发现。但对方尾随而来，从地上捡起熟透的苹果，把它们塞进被痛打者的嘴里，越塞越多，强迫他把苹果通通吞下去，直到他的肚子不能再装下一点儿东西为止。旅行者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但是那名骑手一直还不放过他，而是再次用棍棒揍他，把他从左向右、从右向左地赶来赶去，直到太阳落山。”

“您是想用这样的谎话为您对我的所作所为辩解吗？”我用略微嘎嘎的嗓音问道。

“你是代表上帝仁慈的天使加布里尔。上帝赐福于你看见我的时刻。因为我先前已经死去，是你赐予了我生命。你就像母亲寻找她唯一的孩子那样寻觅我。我在你面前逃跑，就像驴子试图逃脱它的主人一样，就像小丑自认为能逃脱风那样。请不要惩罚我的错误。假如我知晓你的计划，我从一开始就会赞美你的，被打者就是这样回答抓住他的那个人的，就像我现在抓住您一样。”

“我始终不理解您的寓言，但这或许也是因为您的击打一直还使我有些昏昏沉沉。”

“这则寓言很容易破解。骑手在接近沉睡者时看到，一条蛇是怎样通过他张开的嘴巴滑进他体内的。假如他叫醒他，告诉他自己所看到的情景，那么恐惧感就会马上涌上旅行者的心头并令他丧失勇气，还在同一时刻他就将倒毙在骑手脚下。与此相反他一直殴打对方、喂他苹果吃并再度殴打他，直到他精疲力竭地把内脏里的所有东西连带那条蛇呕吐出来。”

我沉默不语。对此我应当说些什么呢？说他尽管让我沉陷下去好了，否则他就应该早点儿出现并给我把药拿来？

“穆罕默德教导说，如果人们给弟子讲述他体内的黑暗，他就会感到害怕，精神崩溃并死亡，当他想象这种黑暗时，他就不再有能力进行斋戒和祈祷。”

“反正我几乎无法再下咽任何东西，至于我体内的黑暗，在此期间我已经非常熟悉它了。但是祈祷，我不知道在最后几周里您是否将会教会我祈祷。”

“鲁米也不再是最年轻的弟子，当他遇见沙姆斯的时候。只有沙姆斯才使他走上正确的道路。”

格克汗先生走后我继续那么躺着，但我还是想起了一句祷告。祷告词是这样的：“亲爱的上帝，使我虔诚吧，让我升入天国。”起初我很难为情，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简单的儿童祈祷，但紧接着我认为，这句祈祷是多么美妙啊，因为它表达自无信仰，但却承载着最崇高的信仰，即对上帝仁慈的信仰。当我对格克汗先生说他将不再能教会我祈祷时，我说话的口吻是如此卖弄风情，仿佛我从未祈祷过，仿佛我不必非常吃力并经过很多年的训练才使祈祷技能退化的，因为这样做对我来说如此轻松，太过轻松了。但紧接着我想起了下面这番话：“希望只不过是一名江湖骗子，他不停地在欺骗我们，因此对我来说幸福在我失去它时才刚刚开始。我很乐意把这个句子固定在天堂之上，但丁就曾经用这个句子给地狱加了标题：弃绝一切希望吧！入门者！”但尽管如此尚福尔还是自杀了。虽然他不仅看穿了一切，而且也能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加以表达。还是其中一件事与另一件事毫无联系，也就是看穿与人们必须生活的生活毫无联系？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在想：“为何人们总说，一切都是一个圆？一切也同样可能是一个正方形。还是正方形是一种太过人性化的设计？如果涉及形而上学的话，人最终会因害怕角和棱而退缩吗？自身的傲慢潜伏在角度里吗？就像是处在交叉路口时的那种不自在，因为这样

的路口总是要求人们做出决断，而圆则无须做出任何决断地围绕着自己旋转？”

追忆人生是一件奇特的事情。在自己面前人们不能像在其他人的面前那样如此惬意地用数据总结人生。然后人们又会产生一些奇特的想法。为什么我没有至少偷过一次东西？为何我没有策划过任意一场骗局，无论它是怎样收尾的？就我而言也可以以入狱作为结局。不一定非要是谋杀。

我们所收集的只不过是另一个地方拿来的，这样一来每一次结合也同时是一次分离。

我来到诊疗室。雨水以长长的条痕沿窗玻璃流淌。我坐了下来。我的验血血样慢慢沉入一个试管里。我在思考是否人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称作凝集。我的两管脊髓采样变成了灰色，它们看上去像铅一样。在夏天长达三周的时间里，我的双手手背必须与锁骨相齐的高度被缝在胸脯上。我被带进邻室，在那里人们把治疗椅和两台器械指给我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我必须在病床上躺着，”我心里在想，“其实我是想今年夏天去海边。在撒满钉子的沙滩上漫步。木板箱在海面上漂浮着。从远处驶来一艘船只。”

疾病发作之后我睡了过去或者变得昏迷，在我的脑海里只剩下宽敞空旷的房间图景。换言之我感到无比空虚。不仅仅是我的脑袋空虚，但尤以它最为空虚，因为身体的感觉都是以它为出发点的。因为我的脑袋空虚，在那儿也就无法形成对我身体的感觉。一个粉刷了白色涂料的房间，一种耀眼的白色，就像在六十年代的科幻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白色在角落里稍微减弱，几乎不留缝隙地过渡到我逐渐平息的脉搏的黑色之中。在这间无限的房间中央有一个赭色的盒子，上面捆扎着一根灰色的细绳。我自己完全歪斜，就像据说存在于我们大脑中的那种身体感受图片一样扭曲变形，生有硕大的手掌和膨胀的嘴唇，只是反过来长着微小的脑袋、圆圆的乌亮的小眼、招风耳、向内翻转的鼻子、向内翻转的胳膊和腿、向内翻转的尾巴。房间在围绕着我运动，同时我也在它里面运动。但是那个盒子却显得非常独特，它对我

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不想去碰甚至打开那个盒子，只想这么观察它。

格克汗先生拿走了我随身带来的那几本书。他坚持自己的鲁米-沙姆斯前提。沙姆斯和鲁米在一个房间里隐居了四十天，而外面的一切都陷入厚厚的积雪里，弟子们一个接一个慢慢离开鲁米的居所，首先是印度人，然后是阿拉伯人，最后希腊人也离开了。然后在四十天之后门又打开了。沙姆斯和鲁米走了出来，开始馈赠、出售鲁米丰富的藏书，并用它们交换乐器。鲁米学习弹奏鲁特琴。因此在这里也是摒弃分析性思维而转向歌曲，歌曲是神秘主义者真正的表达方式，只是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也不会再学到了。

格克汗先生谈到的鲁米房子四周的积雪让我禁不住想起了披头士乐队的《救命！》专辑。不是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没看过的影片，而或许是因为在过圣诞节时赖讷得到了《救命！》专辑作为礼物，并带着它在第一个圣诞日来找我，穿过当时总能保持很久的积雪，而专辑唱片上的歌曲却都很短，总计十四首歌里只有唯一一首演唱时间达到了三分零几秒。

毫不迟疑，或许这里面蕴含着整个秘密：毫不迟疑。

在那幅画面从我脑海里消失之后，我一直还闭着眼睛躺在格克汗先生放置我的那个地方，我有这种感觉，仿佛我会在睡眠过程中醒来，不是真正变得清醒，而只是意识到自己在睡觉，然后我立即想到那个盒子可能代表着什么。在它里面安息的是我的思想吗？还是一种思想被保存在里面，迄今为止它使所有其他的思想都陷入不安？又是眺望一处景色的无辜的眼神，一片覆盖着白雪的原野，一条小路构成了原野的顶端，它可能会引发一段痛苦的回忆，因为我曾经和一个女人在那条路上走过，途经在原野上劳作的农夫，当时已经是周六的傍晚，天空逐渐褪去了冬季的灰色变得幽暗，不顾寒冷我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目光经过光秃秃的树木向下望去。或许那个盒子就像是“克尔白”天房一样，而我自己却不清楚“克尔白”天房象征着什么。如果我记着这回事，我会向格克汗先生打听的。

今天我穿过毗邻的房间走了半个小时，在一个柜子里发现了一台老旧的便携式电视机，对此格克汗先生可能一无所知。很多年前我在一处度假公寓里见到过一台完全一样的电视机，只不过我回忆不起来具体是在什么地方，以及我是一个人还是和其他人在那儿。为了调台人们必须转动一个小轮子。只是那台电视机只能接收一套节目，一套当地电视台的节目，电视台可能就在附近。有时在午夜过后我也能收看到德国电视二台的节目。一段时间之后黑白画面会变成绿色，然后转播会中断一刻钟，但又会自己重新开始。

在世界青年大会上的一次讨论。与会者当中有一名无神论者。有人被安排成无神论者。有人有这样的思想，即相信他自己否定的东西。在特里尔一位接受电视采访的牧师站在大教堂门口，讲述人们是怎样促使魔鬼参与修建教堂的。人们欺骗他说修建的是一家酒馆。径直走了进去。人们聚集在中殿。因为上一周的事情我一直还感到精疲力竭。从一名神经病学专家到下一名那儿去。其中一名专家给我的头部装上铁丝网。另一名只是打量着我。地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楼梯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猫。阳台上晾晒的衣服。八月份的寒冷。八月份的雨天。晚上。失去知觉。正如福柯所说，现在开始了知道和沉默的游戏，患者接受了这种游戏，为了始终主宰与自身死亡的神秘关系。

有时我在想，至少现在我必须再次质疑并推翻一切：性心理发展、无意识、天才和精神错乱、心身医学、被排挤物、十二步项目、自助团体、爱情的拯救力量、解脱性的跳窗、自我证实，然后自我宣称，当然还有自我袒露，以及对自我袒露的害怕，然后是那种同样神经错乱的感觉，即置身局外，作为没有任何参照的拟像。简直就是为了无任何负担地离去，就像其他人整理他们的证件那样，从吕肖-丹嫩贝格县离开，我们作为童子军成员时总这么说。

相比死亡其他关系要复杂得多。第三国就像在以前蹩脚的B级片拷贝里那样向西方指出，核裂变试验还在继续进行。核裂变。这让我回想起某些事情。或许让我回想起我在体内的某个地方到处携带的真正核心？这就是问题的要点。对此我为何会想起托马斯·曼？托马斯·曼已经死了。我活了这么久，而他已经死了。他把自己理解为德国人的代

表。人们也必须首先想到这个。其他人不加疑虑地就相信这一点。代表。一种分身（面貌极相似的人）。德国人的代表。我将表达如下看法。短时间内我自认为从电视机的沙沙声里听到了卡内蒂高亢的声音，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卡内蒂同样已经死了。到底什么是第三方供应商？难道三位一体已经在象征层面上解体到了这一步，以至于第三方就代表了威胁本身？

“你没有足够的自信”，有人从白色的电视机的沙沙声里说道。“你不相信你自己的叙述能力”，另一个人这么说。是这样的。我也不相信神圣的天主教会，不相信其中一个神圣的天主教会。即使该教会也不相信它自己的叙述能力。为了叙述它还需要另一个人。需要你。需要魔鬼。需要撒旦。需要新教教徒。需要无信仰的人。需要精心设计的矛盾。需要天与地。需要天堂与地狱。需要天堂与炼狱。我看到了我这一代最优秀的人物。我不是很清楚我这一代是什么。不清楚它应该是什么。我只看到了脑袋。它们向远处滚去。最终也包括我的脑袋。

电视画面上是一名正一瘸一拐行走的牧羊人，然后是其中一名必须总演所有亚洲女人的女演员，她和另一名负责演土耳其女人的女演员一道在一家高档妓院里。周围变得安静下来，周围是安静的，周围一直都很安静。夜幕降临，我和任何人以及任何事情都没有联系。特别节目《您理解玩笑吗？》临时清洁工被骗。时而是一头大象站在昂贵的瓷器之间，时而是一头棕熊。当女人们去求援并在帮手的陪同下返回时，那些动物已经通过一道暗门消失不见了。我能够观察到，人们多快就会怀疑自己的理智或者怀疑自己的感知。明天我也会再次生疑。今天我没有力气再去怀疑了。

一个女人刚刚修完指甲回来。人们怎样称呼做这种事情的女人呢？也干脆把她称作女修指甲师（Maniküre）？还是女美甲师（Manikeurin）？或者女美甲员（Manikeuse）？只要我不知道答案，我就无法继续思考。

午夜过后三辆警用车辆驶上大街，因为斜对面有一个女人在失控地喊叫和哭泣。是过路人报的警。站在窗边的男人说，她喝了太多的酒。我们想看一眼那个女人，过路人朝楼上喊道。可以，楼上的人向下喊

道。没有一点儿动静。楼里的其他住户也不出声。警察来到现场，听取过路人的汇报。然后他们走进楼里。稍后一名警察提着一个蓝色的衣服袋子从楼里走了出来。紧接着是另一名警察和那个女人。她在手指间夹着一个烟头。走路时显得缺乏自信。身子摇摇晃晃。

这名患者在计数心跳、脉搏以及盲人手杖在房屋外墙面上摸索前行的击打声，对他来说数字就代表了某种意义，因为他自己不再有任何思想了，对这名患者而言中午麻木的天空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一切静止的东西好像都已做好了手术准备。被包扎了绷带，被注射了镇静剂，带有被清空的肠子和麻木的大脑。如果患者向天空望去，他会看到苍穹被向两边拉开，被白杨像用线夹一样在两边固定着。他向屋顶看去，等候着外科医生的切割，害怕透过裂开的伤口看到内脏，害怕如雨般倾泻到他身上的血液。唉，如果那种灰色只是蝗虫和青蛙就好了。

在两年前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我在美茵茨大学附属医院看完病之后在我出生的故乡做短暂停留，在那儿我沿莱茵河河畔散步，以前我和父母在那个地方走过了无数个星期天，突然一名男子朝我迎面走来，问我是否知道那个阿道夫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打算买他的房子。那名男子好像并未饮酒，此外也给我一种普通、更确切地说是平庸的印象。他大约有六十五岁或者快七十岁的样子，但是好像不习惯于穿西服。我尝试一言不发地避开他，但他不依不饶地跟在我旁边走，最后往我的大衣兜里塞了一张二十欧元的钞票，为了像他所说的奖励我费心的思考。这种孤独无助和夸张的姿态感动了我，因此我把那张钞票退还给他，告诉他这附近既有一处阿道夫高地又有一条阿道夫林荫路，但是起名者是另外一个阿道夫，即阿道夫皇帝。我话还没说完就猛地意识到，当然不存在什么阿道夫皇帝，而是我指的是拿骚的阿道夫公爵。我想更正我的错误信息，这时那名男子指向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他很想邀请我去那儿喝杯咖啡。还没等到我回答，他就穿越马路向对面走去，我多少自动地跟在他后面，为了不使谈话就这么简单地中断。但是那名男子好像没有听到我关于阿道夫皇帝的评述，因为还未等到我们在衣帽间附近的一张圆桌边落座，他就讲述说他打算对阿道夫的房子进行改造，因为他不是纳粹，他自己也是在那一天出生

的，在那一天阿道夫在元首地堡里熄灭了灯（自杀身亡），因此他以某种方式强制性地感觉自己与阿道夫结成了姻亲，特别是因为他也曾经爱上过一个叫埃娃的姑娘，但是这段恋爱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因为他最终娶了住在行政区大街上的绘画大师舍恩布拉特的女儿布里吉特·舍恩布拉特为妻，当然这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使他拥有了一份稳定和能够抗拒危机的工作，因为人们总想在墙上挂点儿什么，无论他们的境况有多糟糕，外面的情况看上去越糟糕，人们就越想把室内布置得更漂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过去四十年里负责处理的正是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在他六十五岁生日的时候，生日庆典本应于昨天即四月二十号在市政厅地下室酒店极为隆重地举行，他却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搬进了怡东酒店。“我自己有七个孙子，尽管儿孙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继续经营我的家业。”他补充说。但是凭他对他妻子的了解，她是几乎不会让庆典泡汤的，因为已经为将近五十人预订了宴席，他也给她在那共有账户上留下了足够多的钱，以便能够支付庆典账单，此外她除了那栋可以部分转租的大房子之外，还有一套出租房子，那是她从她父亲那儿继承的，因此她不会受穷的。他对家里所有的财务状况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他已经筹集了一百五十万欧元，用这笔钱是能够做成一些事情的，尽管一幢别墅就像阿道夫的那样当然价格不菲，这一点他已经知道。只是现在在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恰恰是这么一幢破败的别墅会不断要求人们对之进行修葺，归根结底他实际上能够对别墅的所有地方进行维修除房顶之外，因为他有恐高眩晕症，至少是从某一高度开始，在梯子上他站了一辈子。在他继续讲述期间，我们俩各自喝了一小壶咖啡，我很吃惊这个男人绝不是令我讨厌的那种类型。我甚至在听的时候突然发觉自己在为他的说辞辩解，因为我也说过阿道夫皇帝之类的无稽之谈，人们不能责备这名男子把元首的生日和元首的死混为一谈。

“因此您说，”我还来不及再次纠正先前言语上的过失，在短暂的停顿之后那名男子就出乎意料地又说道，“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个阿道夫？人们知道关于这个阿道夫的一些情况吗？另一个阿道夫是因为与第一个有关联所以才选取了同样的名字吗？因为如果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男人，那么从根本上来讲我不在乎要使哪一幢别墅成为纪念馆。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到处都有一些事情可做。”我看了一眼通向卫生间的那道门

上面的钟表，掏出我的钱包为了给自己喝的咖啡付账。“所有这些都在我的差旅费上。”那个男人一边说一边把那张二十欧元的钞票压在玻璃烟灰缸下面。当我站起身时那个男人也跟我一块儿站了起来，但他那样做是为了起身与某人告别，而不是也为了自己离开。“我现在每天早晨都会在这儿筹备规划，”他说道并跟我握手，“如果您得知一些新的情况，无论是关于哪个阿道夫的，前面已经说了一百五十万欧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除了房顶所有的工作我都自己做，也包括电和煤气，验收方面也不成问题，我认识以前的很多同事。”说完这些话他又坐回到椅子上，从他的夹克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开始研究一些数字列。

我在黑暗中不断听到一些不连贯的语句。“如果明天天公作美……”“当然这要取决于是否……”“一开始我认为……”我想象日光照进我的房间，我将会闻到其他一些东西，而不是这个房间的气味和我睡眠的味道。或许闻到的是一丛盛开的灌木或者一棵树。此刻在我脑子里完全是自发地产生了一种死亡和复活的哲学。它是众多来世哲学当中的一种，基于那种对今生的徒劳渴望。形而上学是从疾病中发展而来的，而健康的身体更确切地说是致力于研究物理法则并设计出一种运动哲学，人们可以这么说吗？人们必须使物体运动，物体的功能就在于被移动。人的功能就在于移动物体，这样是为了能够用一个公式来表达人生，这个公式是由物体阻力的大小和物体在人手的作用下移动距离的大小所决定的。

即便我尝试去回忆女人的身体，但这也只是招致了不同季节的画面。就连断断续续的旋律也只让我回忆起不同季节，仿佛季节的交替是人存在的本源话题。对日本诗人来说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那种自我异化在我内心过于根深蒂固。这样我也只能想象一种异化的死亡：即殉难者之死。在死亡中还在否定自己，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一件事情、一种思想、为任意假托的一种解释而死，最主要的是让其他人来分析自己的死亡，这是自我异化的巅峰。其他人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他们来说自身卑微的存在可能会在殉难者之死中得到

超越，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殉难者之死的真正残酷之处恰恰在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否定自己。

另一方面殉难是一种许多人无法得到的恩宠。相反他们必须屈辱地躺在床上死去，因为殉难不能也不允许被激发。

还在诊断前我就无法再让自己离开了，这与诊断毫无关系，或者与此也毫无关系，即我已经感觉或预感到它非常乏味地与离开自身有关。人们说的就是这么简单。我根本无法再换一种方式来描述。离开。放弃。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在此期间这已成为普遍的说话方式。对医生来说也是如此。在性高潮到来之前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而且也仅仅是伴随着疼痛。脐带缠绕。复发。出于类似的原因萨德开发出他的施虐淫行为。我压在身下的女人被我所爱。因此在上述前提下产生的亲密使我感到更加苦恼。我这样表述，就仿佛是医生把我说的话作为一种供词加以记录，然后把记录放在我面前让我签字：在此说明，在上述情况下亲密令他感到苦恼。他看上去惊慌失措和缺乏自信。不停地摩擦自己的小臂。在别人的询问之下解释说，一段时间以来在那里（小臂处）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瘙痒，但从表面上却看不出任何东西。在此说明，他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哭。在别人的询问之下解释说，角色都是被分配好的，这样也最好。在此说明，他虽然有过那种想法，但事实上对他来说尝试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他能够想象和另一个女人的问题不必以这种形式出现，但他马上又补充说，那样的话将会有另一种问题出现。他不自信地笑了起来，再次摩擦胳膊，补充说现在反正一切都不重要了，现在反正一切都无所谓了，他想现在了结此事，必须了结此事，因为她的女伴有了另一个男人。

卷帘门在八月的风吹下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月份 + 天气 / 天体 = 里奥·雷瑟的歌曲。里奥·雷瑟已经死了。现在再谈荣誉已经太晚了。对于快乐而言也是如此。这样的时代都过去了。飞机穿行在云层之间。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在来回兜风，他在自行车上安装了牌子，牌子上讲述的是政治家们的谎言。谎言。一切都是谎言。这完全符合

我的观点。一切皆谎言。神经病学专家在撒谎。精神病医师在撒谎。精神分析师在撒谎。她在撒谎。我也在撒谎。

平静的水面。沙拉。从药店里买来的药。我社会保险方面的漏洞。未被开启的信封。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叙述能力。走向街头。观察人们。不同的情况。写下来。返回。坐在厨房里。交谈。恰恰是鸡毛蒜皮的琐事。恰恰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没有任何结果。人们待在一起。不想像其他人那样掉入同样的陷阱。这一切都太费力了。感到绝望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这一点归根结底是令人惊叹的。或者人们不向外袒露自己的绝望。不可思议。人们现在也不再抱什么希望了。倒退十二步。加深自己。这话是什么意思？使自己变深？躺得再深些？失去自我？太好了。我参加。

药方。药片。副作用。其他药方。其他药片。其他副作用。可以忍受。这样没问题。人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安置好了。休养几个月。然后奇特的是，身体有了抗药能力。也就是说我有了抗药能力。我和我的身体。疗效成了泡影。加大剂量？在您这种情况下不是很有意义。某些现象得以保留。请您不要离去。您必须一块儿活下来。向下走十二步。地下室楼梯。潮湿。湿冷。墙皮脱落。

我和一位年轻的、我不认识的女士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一家私人快递公司的邮差手执一个狭小的包裹来到我们桌前。他问我们是不是那些人，他们在这家咖啡馆里坐过然后跳了窗。他指的是我们俩作为抑郁症患者从窗户跳了出去并摔死。我们确认了他的猜测，然后他把那个小包裹递给我们，我们在他的电子板上签收了包裹。纸板盒里放着两粒硝化甘油胶囊。当我把其中一粒拿到手里时，它变形成一种类似胎儿状的东西。出于某种原因我认为我要再次逃跑。

我从手机上接听电话。一个声音说道，人们根据对我过去十二次谈话的内容分析查明，我是阿拉伯人，是侯赛因医生的三个儿子当中的一个，因此我才接到的这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没有道出他的名字，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说道：他们现在又顺手牵羊地拿走了我的自行车。我猜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的自行车被偷了。我自己正推着我的自行车走下山丘，去山下一家被遗弃的工厂。当我在山下想把自行车锁住时，我

意识到人们偷走了我的车锁。起初我感到惊讶，然后我认为或许他们先偷了我的锁，为了紧接着能够把自行车偷走。

我沿一条大街行走，途经不同的餐馆，穿过一个好似在疗养地的长廊，从那里接着去一栋阴暗的房子，进去之后我沿楼梯上楼。我想去楼上一处犹太人居住的住房。那里的氛围就像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一样：书籍上满是灰尘，深色的木质书架，锁闭的玻璃门。我待在走廊里等候。一个男人走了过来。我问他在这儿我能否学一些关于犹太教的东西。他想知道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的名字，然后他说维策尔是一个犹太名字，还说他有一个小包裹给我。那是一个包着钉子的小口袋，口袋上真的用希伯来文字母写着我的名字，但奇怪的是我却能读懂这些字母。我下楼上了我的汽车，可是车却无法开动。我给全德汽车俱乐部打电话，他们也马上派人来到现场。装配工人很快往汽车引擎罩下面看了一眼，说在一天之内修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老式欧宝车的发动机根本不再被允许出售给犹太人了。

我从一家宾馆餐厅出来上楼。起初我开错了房间门吓了一跳，当我看到房间里一个男人躺在床上，我不知道他是在睡觉还是死了。我关上门继续沿走廊前行。我的房间门是敞开的，因为清洁人员正在打扫房间。我说我的房间根本用不上打扫。于是一名女清洁工问我，是否我希望至少让人很快用吸尘器把房间吸一遍，因为她看到了我的喷雾器，说灰尘对于哮喘病人来说是不利的。我表示同意，于是另一名清洁工拖着一台吸尘器走了过来。她直接走向衣柜，在我的短上衣兜里乱翻一气，大声朗读她在兜里找到的药品的名称。她对此大加嘲讽，说人们被医生开了这些药，是为了在自己的母亲面前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如果人们不是真正生病的话。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非常生气，大声呵斥她应该收回说过的话，威胁说我要让她尝尝厉害，将会让人把她开除掉。但是她很倔强，即使我用力把她挤压在门框上她也不服软。

尽管我不愿意，但我还是采取了主动。尽管她愿意，但她还是保持被动。我们对此达成了一致。有时其中一个人大叫，然后又是另一个人。总是交替进行。很少两个人同时这样。太让人迷惑了。否则的话

情形几乎会跟以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有时还会聚在一起。现在顺序被确定下来。其他人一辈子独身不婚。也未尝不可。我甚至认为教士也可以戴耳环。为何不行呢？谁要是给自己买了一张火车票，他也就连带买了赎罪券。这很划算。我不再信任我叙述的对象，就连我的幽默我也不再信任了。简而言之：我对什么都不再信任了。

我对卡尔·迈小说的故事情节所反映的美国风光总是有不同的想象，在电影院里看第一部根据卡尔·迈的作品改编的影片时，我惊奇于那些不具代表性的草地、树林和岩石，在它们当中只是偶尔散落着一株苍白的仙人掌，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卡尔·迈影片都是在克罗地亚拍摄的，影片中的仙人掌都是用木头刻成的模拟物。当我后来得知这种情况时，我感觉自己上当受骗，就跟被那些老师所欺骗完全一样，他们本人就曾经是纳粹，却又装出一副仿佛是他们亲自创立了民主制度的模样。人们系统地教会我们去猜疑各种嗅觉、各种直觉、特别是想象力，恰恰是在诸如艺术、音乐和宗教这样的教学科目中，这些科目看似处在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范畴之外，能够更加紧迫地给意识形态注射疫苗。

上帝想把巨大的恩宠赏赐予谁呢？我注视着这些快活的战士们的脸庞。当然他们都是些年轻人。但是人们不也曾经怀有理想吗？现在他们拿着一个十字架穿过德国瞎跑。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人们用战后历史上最严厉的安全防范措施使这座城市变得安全。如果教皇在人群当中洗澡，他会认为站在周边的所有的人都被搜查过了。同时是竞选活动。同时休假季节接近尾声，我们又返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带着较少的时间和稍多的谈资。白天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不是发生在这里。是在其他地方。在企业里。失业的残酷之处在于，人们无法再去往另一个地方。人们只得待在家里。残酷的是没有可被处理的琐事了。人们现在可以坐在那儿直接等死。非常直接。电视向人们展示该怎样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首先是私通。其次还是私通。第三是重新回到第一个伴侣身边。最好是带着孩子。如果还有一些可让人大叫的事情就太好了。谁大声叫喊，他就不是死人。

这名患者认为使他生病的是那些混杂在一起的事物，并尝试从痛苦中查明一种导致他病情的原因。但是他越深入和清晰地分析他生命的不同时期，他越细心和精确地在昏迷的睡眠和痉挛之间埋头于自己存在的各个细节，他对于不被留意的渴望就会变得越发无法满足和令人痛心。这名患者渴望的东西，就是他同时自认为识别出的造成他病情的原因。他渴望的不是其他一些东西，而是相同的东西。他渴望他的生命的回归。但那只是他生命的片段和碎片。即便是现在他仍在说，他愿意“忍受某事”，但却不清楚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这是一句天生就被赋予我们的古老的法律套话，仅此而已。再一次漫不经心地步入大自然，在大自然中闲逛，仿佛它从未决定过生命。笑着过完自己的生命，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最后他应当惊讶得简直说不出话来：死亡作为最后一次狂欢节日，节日期间一切都在摇摆和旋转，各种颜色就像火箭一样从物体和身体里嘶嘶地射出，在他一直还高举的手中的灰色草莓波烈酒酒杯上方倾泻而下。如果他现在听到有东西在敲击一只玻璃杯，那么它不是被自己的手指握紧的甜点勺，用这把勺子他正在预告马上要发布一段祝酒词，而是长颈鹿造型的鸡尾酒搅拌条，它在家用酒橱里在外面一辆驶过的卡车的作用下震动颤抖。孩子们手里紧握着湿漉漉的小花束列队而来，匆忙单调地背诵他们的祝福。他用手拂过他们的头顶，往他们被花梗划出线条的拳头里各塞了一枚十芬尼的硬币。然后他向乐队打了个手势，在镶木地板上开始了第一支舞曲。他用右手紧紧搂住那位年轻女人的腰身，左手和她的手一道举得比平时更高，仿佛他想挥手致意。光线透过社区会堂棕色的窗帘照到成团的雪茄烟雾里。

最后当人们把治疗仪器移到患者的床边，为了让淡绿色的光线把他暖热，或者当整个住房里都变得安静下来，仿佛不再有人做任何工作了，这时那名患者想做些奇特的事情。他要了一张纸条，用一种无法形容的吃力用人们裹在他手里的铅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那是一种难以辨认的潦草的书法，更像是一幅草图而不是一个单词或者一个句子，或许它应当是一段路程或者一幅平面图。他用最后的力气往一个人的耳朵里小声说了些什么，这些话他好像是故意保留到现在的，但是他的话已经无法再被听懂。最后的情景就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人们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一直以来就想这么做，早在第一天夜

里就想这么做，当人们感到口渴，还不知道喝水已不再是补救办法了，早在那些夜里就想这么做，当人们赤裸着身子在走廊上又找到自己的时候。它好像是一种矛盾，但又不是矛盾，很简单，那种奇特和特别的事情只是被感觉和想象的，但从来不可能被体验。如果我把它说出来，它就会失去任何特性，因为在我尝试使无法理解的事情变得可被理解时，这样的事情就会永远消失不见了。或许我们故意等这么长时间，直到人们无法再阅读或者理解它，恰恰是因为我们预感到人们无法阅读或者理解事情本身，就算它被清楚地写出或被表达出来。它是一些奇特的事情，因为它奇特，所以它很快就结束了，它使用的是对一个火车站站前广场或者一条铺石街道的混乱回忆。事情的过程被说得很快，但是如果让我说的话我就会弄错，我将会掩饰事实真相，将只会认为我认真调查了这件事情，觉得它一点儿也不奇特，而更确切地说是自然和易懂的。我们所表达出的那些童年时代的闹剧蒸发和消散在一种理性的现实当中，我们不断地使自己清醒地进入这种现实。童年时代的闹剧之所以消失了，仅仅是因为我们犯了给它们命名的错误码？患者知道了他作为孩子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奇特的事情是没有名字的，是不能够被描述的。出于这一理由患者派人去请一位神父，因为他现在把上帝理解为是这种奇特事物的象征。神父对他说，上帝是爱，是复活和生命，如果患者在这一刻微笑，那么他的微笑不是因为充满幸福的喜悦，而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他知道上帝恰恰不是神父所说的一切，而仅仅代表奇特的事物，这样的事情他作为患者也同样能够很容易地随便说说，尽管是用其他的话语来说。他将会这么去做，但只有当人们不再理解他时，然后当他自己也不再理解这件事的时候。

在八月份的诊断快要来临时我又爱上了一个女人，她在马路尽头的面包店里作为帮工工作了十四天。因此每天中午三点半我都要去那儿买一块脆皮奶酥点心，事实上它尝起来味道糟糕极了。我把这块脆皮奶酥点心带回家，在四点过十分的时候就着一杯咖啡把它吃掉，与此同时我收听德国广播电台，为了得知在文学世界里都发生了些什么。我自己用圆珠笔在伍尔沃斯打字机专用纸张上画眼睛。这种打字机专用纸张我是在伍尔沃斯大楼里买到的，尽管我总的来说害怕进入伍尔沃斯大楼。伍尔沃斯大楼里唯一让人快乐的东西就是那种每隔十分钟响

起的广播通知：“请到7号收银台来一名商场侦探。”我在想，商场试图用如此简单的手段控制光顾这里的人们，而我则在商场后面的敏利得先生收款台处结账，因为那个地方从来就没有人。

说爱上某人可能过于夸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词汇。就像酗酒。或者抑郁。或者癌症。或者恐怖主义。它们都是些了不起的词汇，然后它们在灰暗的医院走廊里被限制在一个可被忍受的程度上。医疗改革的目的无异于要把死亡理应得到的正常和平庸归还给它。在这这里的西方世界。住在两居室住房里的没有工作的人对死亡的期待变得平庸，同样变得平庸的还有在相应医学管理的死亡疗养机构里所发生的一切。拒绝心肺复苏术。毫无意义的繁文缛节。没有别的。最终反正不发表任何见解。

此外教皇和红衣主教们认为，天主教最特别的地方是这种情况，即人们不能给自己指派和设计意义，而是这种意义是自上而下的。在这样的时刻罗马教廷对我来说显得有些过于单纯。每一名偏执狂患者、每一位普通作家以及每一个坠入爱河的人都认为，他的意义是上面分配的。几乎没有人会产生这样说的想法：很明显，一切都是自己设计和想象的。就连我也不会。我指的是我作为这一内心独白的叙述者，这一过时和再次被搅拌在一起的自白散文，它与用圆珠笔画在打字机专用纸上的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只是不那么具有强制性。因为战争就是这么产生的。刑讯和迫害。每个人都认为他存在的意义是由上帝或者自上或者自下或者不管从哪个地方给定的，而其他人则带着他们悲惨的意义构造在相互绕行。我不是巴伐利亚人，甚至我的叙述者都不是巴伐利亚人，但是人们干脆无法用其他的表达方式。或许可以用其他的表达方式，但不会表达得更好。

因为在垂死的孤独中儿时的孤独再次赶上了我，所以在从众多的睡眠状态中醒来之后我做了如下思考：位于洛厄磨坊场公园边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殿，在那里医术神在一名孕妇怀胎第十一个月的头几天里现身，到了这个时候这名孕妇仍无法分娩，医神把她的怀孕诊断为是假妊娠，为了紧接着从她体内把一名男婴的假体剪切出来，他给男婴取名叫蒂莫，给他穿上棕色的灯芯绒裤、蓝色的高领毛衣、绿色的尼基

套头毛衫和棕色的皮鞋，并打发他去游历世界，目的是在他未满六岁的时候，他应该反复被一位紧挨着他的邻人绑架和杀害，这就不至于使否则的话依靠他的假体将会被实现的事情实现，即成为躲在一个纸箱里的刺客，刺杀对象是国家的统治者们。提摩太成为代表腹痛的圣徒，因为他整个童年时代都患腹痛，他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者的象征，因为他作为年轻男子仍被保罗施行了割礼，因为耶稣使徒们当时一直也在寻找一名年轻男子作为传教旅途中的陪伴者（吉贝尔凯尔伯文化节期间幽灵列车车身上的牌子用希腊语和阿拉姆语两种语言预示着，他们在哪儿给人们允诺工作和殉难者之死）。

在此期间“克尔白”天房真的空荡荡的，格克汗先生说道。但是以前它里面填充了三百六十幅神像，其中包括胡巴尔的画像，画像由红色的玛瑙组成，有一只镀金的右手，人们在画像前用七支箭矢来预卜，因为“克尔白”天房最早是由亚当作为神居的映像所建，但之后它被大洪水毁坏，最后由亚伯拉罕重新修建。亚伯拉罕也是从天使长加布里尔那儿得到那块黑石的人，黑石就位于门边左侧的角落里。黑石最初从天上掉落时是白色的，但通过人的罪孽而变成了黑色。它在水中不下沉，是一种被冻结的天使，在最后的审判时它将保护所有那些触碰过或者亲吻过它的人。穆罕默德毁坏了“克尔白”天房里的所有神像，格克汗先生认为，我也应当像穆罕默德那样毁坏我头脑中的所有神像。当我问他，接下来我是否应当把我的脑袋也奉献给真主阿拉，他只是微笑了一下。“巴亚齐德·比斯塔米说：我花了三十年时间找寻天主。突然我意识到，他就是在找寻我的那个人。当我像一条蛇离开它的皮那样离开巴亚齐德时，我看到了：被爱的人、恋爱中的男人和恋爱中的女人是一致的。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使天主成为我的镜子，现在我是我自己的镜子。”

又谈到了蛇。或许我真的应该多读一些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亚维拉的德兰，圣十字约翰或者安哥拉斯·西勒辛斯。巴亚齐德·比斯塔米或者鲁米听起来也不错，但人们只在自己的宗教信仰里才能亵渎神灵。渎神的可能性是所有信仰经验的基本前提。事情的幽默之处恰恰在于，人们不能变更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只能克服它。如果宗教有一种意义的话，那么其意义就在于被克服。许多宗教为皈依者设置了种种障

碍，自己却不再清楚为何要这样。真正原因在于皈依者的性格特征，通常情况下皈依者都非常敬畏和保守，无法为废除宗教做出任何贡献。当然信仰的守卫者们会认为，这里涉及的是划界、选择和专一性的形式，最终可能还涉及一些非伪造（为了不说“纯粹”这个字眼）的形式。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皈依者们反正都会不加考虑地接受、相信一切并不加批判地跟诵一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跟诵一切。那句经常被随便说说的话“耶稣是唯一的基督徒”这样看来真的是正确的，因为他是犹太人并克服了犹太教。事情的错误之处在于，给克服宗教的过程起一个新的名字，以此又把它提升到宗教的高度。使徒时代的基督徒们还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或许保罗对提摩太施行了割礼，只是为了以此对他说：“你要回忆起你真正的宗教信仰并克服它。”这就是事情的关键。宗教信仰至多说明人们不相信什么。照这么说我信仰天主教就意味着：我不相信天主教会。因为人们只能不相信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不相信印度教或者神道教神灵，这反正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不是不信宗教。我只在我信仰过的领域才会不信神。

学者们对鲁米说：“我们和你听到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我们不为所动，不会因此而兴奋若狂，陷入心醉神迷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对此鲁米回答说：“因为我听到的是通向天堂的门开启的声音，而你们听到的是那扇门关闭的声音。”在此这位神秘主义者难道不应该对尚福尔的话进行改写，把他说过的句子颠倒过来这样说：“我陷入心醉神迷的状态，因为我听到通向天堂的门关闭的声音。”

卡尔·拉内：“如果死亡天使把所有那些我们称作历史的毫无价值的垃圾都从我们思想的空间里清除出去，如果死亡制造了一种无比寂静的空虚，而我们满怀信仰和希望、默默地把它接受为我们真实的本质……”剩余的话我又记不起来了。就跟帕斯卡说过的话相似，从他的作品里我也只回想起对空洞的恐惧，可能是漏看了他对信仰的自白。

屋前花园感染发炎的甲床在边缘处化脓形成黄色的水仙花。前面是街道带有开裂的焦油气泡的多磷的皮肤。后面是板材建筑发红的、渗水的和结痂的病变症状，伴随复发性炎症的天空软骨每晚都会从这些板

材建筑上面飘过。行列式住宅的窗户带着肿胀的眼睑凝视着夜晚。黄色的厨房灯光作为颗粒状的分泌物从木质十字架和窗帘之间透射到外面。后院的老茧上盖满了蕨类植物的管圈。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会发生以下情况：大自然被经历为是自我的外衣或者身体，气氛的变化被感受为是对自己心理波动的表达，自身的死亡被视为是世界末日。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精神病医师所写的。把自身的死亡视为世界末日，精神错乱者就是这么感受的吗？我们自己呢？不是世界末日？世界继续存在，只是我要走了。那位精神病医师就是这么想的吗？可惜在他临终之时我不在场。我很愿意听他的忏悔。我们会经历很多可笑的事情。但那是另一个时代。那是科学信仰的黑暗年代。天主教会最重要的教条尚未对外宣布。查理一世还没有因为使用毒气而被行宣福礼。如前所述，当时是完全不同的时代。精神病医师在精神病院的花园里把自己装扮成鬼怪，往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泼洒墨水，为了发现他们是否有能力在他们的胡思乱想和这样的玩笑之间进行区分。归根结底是一个荒唐的念头。

“正想做某事。”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表达啊。我决定采取行动，仅仅是通过这种决定到达概念层面。行动自身是从属的。日常生活中的化体论。

我再重复一遍，没过八十年之后，年轻人戴着十字架游历各地。八十万万人将会到达安全防范区，在那里共同欢笑和祈祷。最后是祝福。此外人们发现，患有某种大脑畸形的人在股市上要比人们宣布为正常的人有更大的机会。我现在是怎样想起这个的？不知道。

死亡使对人、物或者情境的具体想象和回忆越来越陷入停顿，这一点比如说也可以写在我的讣告里。现在我也能看懂由克劳尔出版社出版的《抽象绘画百科全书》里的插图了，该书摆在电视机旁边我父母的书架里。鲍迈斯特、温特尔、康定斯基或者特鲁科斯的画作是先于死亡而产生的。就连哲学和宗教的尝试，即看到事物背后的东西和解放所有偶然事件的本质，也不是在彼岸才可执行，而是在现世的死亡当中就能实施。我现在明白了在祈祷练习期间尽管教父热心的努力我也没理解的东西：宗教无异于在具体物化之外给事物指定位置的尝试。

但是这种来世指的并不是另一个世界，而是指现世的对面。人们只能在死亡中经历现世的对面，当颜色和气味向前涌去、然后才出现画面的时候，或许因为如果没有画面我们就无法思考到最后时刻。现在我很遗憾，当初在舍费尔艺术品商店买了许多印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明信片，回家后把它们插在我的相册里，而没有多挑选一些抽象派图片。此外我自己总是反过来欣赏少量的几幅抽象画，不断尝试化抽象为具体，而不是尽可能长久地不被保护地忍受抽象。

事情也取决于人的日常状态。比如今天我用尽所有的力气紧紧抓住我可怜的余生。因此在讣告中对死亡本身只字不提或许是更好的做法。因为死亡的确是一个漫长和多变的过程，根据人们对垂死者进行询问的不同时间，他（垂死者）将会谈及他的恐惧或者一种解脱的感觉，谈及死亡的抽象以及自己对来世的理解。事情确实有两面性，使我对死亡的当下无法忍受的主要是回忆。在活着的时候我总可以以此来安慰自己，即我能再重复一遍经历过的事情。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再仔细聆听一遍《橡胶灵魂》专辑。我又一次去宫殿花园，看看夜莺路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如果他们砍去了树木剪掉了灌木丛，那么人们什么也做不了了。或许这种情况甚至让人感到安慰：夜莺路不见了，反正我无法再返回到那条路上，它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因此记忆不一定非令我感到痛苦。无法忍受的仅仅是这种思想，即一切都在继续存在，只有我无法再返回到那里去了。我忽然觉得自己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但不那么做我又该怎样呢？我坐在床上对着空虚发呆的那些下午时光，即便我不这样而是出门，或者经常与赖讷或者阿希姆碰面，但现在这也同样成为过眼烟云了。

医生们用粉笔在白色的身体上画圈。他们用磁石和传感器巡视身体，为了发现生活在它水分里的是什么。死亡不是根据垂死者的信仰戴着不同的面具、头上插着小束羽翎来临的，它既不是作为裹着一个无面披肩的女人，也不是作为无法放下手中镰刀的农夫而出现的，它干脆什么也不是，是从骷髅骨骼之间钻出的一些东西，是一种发出绿光的零线图 and 一种被延长的声音。病床被来回推移，人们一开始用蓝笔、后来用红笔描画病人的体温变化曲线。

历史不是通过否定被根除的，而是通过使自己成为一种时尚导向。永恒的生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外出战斗的人作为被清空的外壳返回到杂志和宣传册子里，他们如此空洞，以至于人们现在终于可以把一切都塞到他们里面，每一个愿望和每一件产品。曾经作为玩笑开始的事情，即广告让自己学会了一种心理学知识，现在看来好像能够像一种历史声明一样得以实现，因为发现无意识的漫长历史并未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意识，更不用说导致了本我向自我的发展，而是完全合乎逻辑地招致了一种设计在广告中的社会无意识。

如果官方的历史书写未能成行，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即在于把自己的历史赋予过去。

如果意识令人痛苦而无意识又不再供人们支配，那么人们很快就会到达死亡的境地。人们应该向何处掉转方向，如果不是去往死亡之乡？这样一来转变反向就成了切断电源。谁若想逃脱这种情况，他就会选择在一个板材建筑居民区里用假名否定自己，躲藏在他一生都想通过成长而脱离的地方只能令他感到羞愧。

在某一特定时刻修建居民点是那么毫不掩饰的真诚，这样一来它同时也具有了社会象征意义。它就像资助它的政治制度一样真诚。人们不害怕在这些被精确测量过的居住区域里培养投放炸弹的人。人被错误地当作金钱和其他资源被估量。在样板间里被推来推去，他们还必须为人们用来关押他们的囚室支付门票。修建居民点和政治之所以是那么毫不掩饰的真诚，是因为它们向人们承诺在它们对面的只有死亡。不剥夺他们的这一绝对权利是那些高年级学生得出的认识，或许是他们唯一的认识。谁能想到制度真的会从一开始就摊牌吗？但是这种坦率之所以会显得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人们肯定谁也不会去探问纸牌的内容的。当那些高年级学生不遵守约定、恰恰做了这样的事情时，制度便陷入了恐慌，试图在一种精制的仪器后面掩饰迄今为止显然的东西。这样的话制度的实质果真就被暴露出来，坦率被揭露为是一种伪装。

我想返回到牢不可破的二元性时代吗？在最开始话语刚一出现时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然后是：披头士乐队还是滚石乐队。紧接着不断这

么循环下去。自来水笔的二元性是：百利金还是戈哈。交际用表的二元性是：荣汉斯还是杜格纳。电唱机的二元性是：博朗还是刁佬。录音机的二元性是：根德还是飞利浦。电动火车的二元性是：迈尔克林还是弗莱施曼。画册的二元性是：《米老鼠》还是《费克斯和福克西》。冰激凌的二元性是：和路雪还是优帕。电视报的二元性是：

《请听》还是《电视听与看》。罐装牛奶的二元性是：幸运的三叶草还是芬达。电吉他的二元性是：吉布森还是芬达。高级文理中学的二元性是：人文学科类还是新语言类。后来还有舞蹈学校的二元性：比尔还是韦贝尔。当然还有俄罗斯或者美国。红军派或者纳粹。问题或者解决方案。此外对于边缘群体来说还有第三种选择。安德烈的父亲因为是理发师，所以他选择了自由民主党。汉斯-彼得·格策属于新使徒教派，他在上宗教课期间必须坐在学生公共休息室里。也有卖莫哈冰激凌的，但它不是特别好吃，人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吃它，比如因为位于莱茵河畔的那家售货亭没有别的可提供。有时我也看《费利克斯》画册。我父母买来《铜锣》作为电视报，因为里面总写着从何种年龄开始一种节目适宜被观看。还因为它是由天主教会推荐的。

时代摇曳和预感的元素仅仅在摇摆画和果冻里才会出现。在被成年人称之为儿童不受控制的领域里，他们被包装得五颜六色的怀疑得以表达出来。一幅画用手指向未来，然后又马上弹了回来，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块颤抖的甜点，能够感觉不到痛苦地被切开，好像总还是完整的，无论人们从它身上切去了多少。就跟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背心哲学一样，对于五十和六十年代而言人们也必须创立一种摇摆画哲学。摇摆产生于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好像把第三者元素排除掉了。总而言之是摇摆这个词：它在其中一侧总是具有口语特征，而在另一侧则把摇摆提升到踌躇不决的高度，指出了优柔寡断性格中的道德失败。

当一台手提收音机第一次播放《苍白的浅影》

(A White Shade of Pale) 那首歌时，我能再一次返回埃尔特菲莱游泳馆吗？或者去赖讷·施密特家的小房间，当我们从他父母的乐柜里收听歌曲《便士街》(Penny Lane) 的时候？汽车收音机里播放着《红宝石星期二》(Ruby Tuesday)，当我父母去他们新的平层别墅里拜

访格雷格一家、而我们则必须在车里等候的时候，借来了《星期六的孩子》（Saturday's Child）这张专辑，当我父母周六下午短暂外出时在客厅里播放这张唱片，忏悔星期二在乡公所聚会上听了《金凤花，让我更强》（Build Me Up, Buttercup）或者在贝尔托德的庆祝会上听了《等风来》（Waitin' For the Wind）：它就像是人们一再寻求的初吻，但只在幻想中才能重构这种初吻。所有的电影和所有的书籍讲述的都只是这种情况，但生活自己却不是这样，因此人们很容易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想用暴力来反抗这种生活，反抗被遗弃和千篇一律的重复，而不是去回忆人们曾经有过的那些瞬间，尽管它们后来在忧郁中也会对抗人们：是的，格尔妮卡的一个吻，尽管在这之后不久她就辱骂我，最终毫无理由地离开了我。是的，《平装书作家》

（Paperback Writer），尽管你们（披头士乐队成员）解散、死亡、让人开枪把你们打死并变得不重要。是的，这一瞬间。是的。正因为不合情理，所以我才相信。

巨大的建筑和用橡皮膏费劲地粘在一起的汽车。统治和压迫原则，该原则被置于一切之上，在所有的事物背后都能被发现。空旷的广场，夜里巨大的火车站大厅，狗在大厅里游荡，我坐在一个显得太小的行李箱上，箱子上印有格子图案，还贴有来自达沃斯的行李标签。

那是回忆而非生命的继续前行。我回忆起明朗的中午光线，它就像是从一个卷筒上被扯下并遮住太阳的玻璃纸。眼睛玻璃体里的小脉冲星。嘴里只有一道神经束。为了辨认永恒，视野必须变得更小。在那边其中一根篱笆桩上、在最下面的钣金环上有一条木缝，除此之外再无别的。为了看到那条木缝，人们必须跪下去，把双手放平撑在地上，胳膊弯曲，然后弯下上身。这是一些只有孩子们才会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其他打算。禾秆的嗡嗡声，金属线的轻微振动，几乎觉察不到的地面的坍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可被报道的。只有在回忆中我们有时才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的平淡：道路、灌木丛、灯影，而且真的一切都在我们脚下塌陷，因此事物仍然存在，而我们无论有多执拗都在消逝。

血管里还留有对比液，我就这样在那儿躺了一会儿之后，人们又把我推进另一个房间，给我展示拍自我头部和腹腔的图片。那些已经死亡的部位却还完好未损，其他活着的部位却受到损伤。人们给我展示的这些图片证明了，我还在孩提时代时身上就已背负了所有的印记，比如我用力抓住姨姨的手，再比如斜歪着脑袋的姿势，所有这些都早已指明了上述身体部位的状况，只是迄今为止没有被正确地解释而已。疾病就是钥匙，它使生命倒回到出生并变得可被解释。我现在消瘦到只剩皮肤和骨头，只能喉部发出呼噜声，一句话也说不出：一切都能够被理解，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被放到一边的茶，其中一块蛋糕，蛋糕旁边的叉子，钝得没有任何光泽，狭窄的茶托边缘，茶水表面一个微小的气泡在旋转，紧紧抓住这一切，同时又因为它的渺小而仇视它。

小教堂前面的台阶，低矮的围墙，一个人工修建的池塘，其后是用墨汁和水彩画成的云朵，用笔尖刮出一个月亮的轮廓，火车的轰鸣声。

“一名启程去印度的商人问他所有的家庭成员，是否 he 可以从那里给他们捎点儿什么回来，因为他很大方，他也问了家里的雇工甚至包括宠物。他最喜欢的鸚鵡生活在一个非常漂亮的笼子里，它对他说：请你去丛林里问一下生活在那里的鸚鵡，它们可以自由地飞翔，而我却生活在这里的笼子里，必须远离它们而死亡，这样是否公平。这名商人在印度处理完业务之后，他走进丛林地带，在那儿遇到一只鸚鵡，他把自己鸚鵡所提的问题又提给了它。在它听完问题之后，它开始浑身颤抖，跌落在商人脚前，停止了呼吸并死去。商人回到家里，在分发完所有的礼物之后他也来到他的鸚鵡跟前，向它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鸚鵡在听的时候也同样开始浑身颤抖，从它所站的杆子上掉了下来，停止了呼吸并死去。商人大为惊慌，开始为失去他的爱鸟而哭泣。最后他把它从笼子里取出来，为了把它葬在花园里。在他手里拿着死鸟还未走出房门时，那只鸟突然从他手里跃起身来，振翅飞到一棵树上。当商人问它为何它会表现出如此奇特的行为举止时，那只鸚鵡回答说：我只是在仿效丛林里我聪明老师的榜样。我通过模拟死亡使自己获得了自由。”

我在思考，格克汗先生用这个故事想告诉我些什么。我只是在模拟所有的事情？我应当仿效故事里的例子，浑身颤抖，倒在地上，不再呼吸，因为通过这种做法我会获得自由？但是自由到底是什么？或许它是那种好处，那种神秘主义者所拥有的巨大好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使用所有那些我早已不敢再上嘴的概念：自由、爱情、真相、解脱、极度兴奋等等。联系到故事里的鹦鹉我又回想起那只大山雀，它一头撞在我郊游时光顾的那家咖啡馆的窗玻璃上并落在地上，回想起那种感觉，即我是怎样把它拾起来放在手上，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向上跃起飞到冷杉树上去了。跟这段回忆一道我又想起了所有其他情景：缸砖建筑、旅馆房间、落雪、灰色的保暖腕套、浴室里的灯光和闪烁的微光，所有这些都是我相信过的东西，现在我把它们永远地抛在了我身后并克服了它们，因为我想独自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刻，一直都想这样，最终也必须这样。然后我又想起一句不连贯的话：“因为你没有爱”，我在思考这句话出自何处，但就是想不起来，尽管它肯定是一首歌的歌词，因为“没有”这个词是升调，“爱”这个词被拉长，而我根本就不喜欢唱德语歌的乐队，如果播放的是德语歌，我总是马上就停止磁带的运转，即使刚开始是碎石声响摇滚乐队

(Ton Steine Scherben) 的演唱。因此我更要问自己，为何偏偏现在我想起了这样的歌词，而不是来自《铁轨上的血迹》

(Blood on the Tracks) 或者《迟到的天空》(Late for the Sky) 中的某一行，直到二十岁时我仍在反反复复地听这两张专辑？“当你笑时，你不是在笑。当你哭时，你不是在哭”，那句德语歌词之前是这样唱的，然后就是“因为你没有爱”这句。现在我也知道了这首歌是谁唱的：是东京饭店酷儿摇滚乐队唱的。现在我也明白了，没错是现在，真正的认识、真正的情感认识只能来自二十岁的人，这种认识只被十四岁的人理解，因为他们都还在说神秘主义者的语言，因为他们富有活力，因为他们还相信，位于我们面前的长路一步一步地通向天堂，因为他们不知道期待他们的是什么，就跟我不知道期待我的是什么一样，当时在凯尔伯文化节上，因为信仰、爱情、希望还未经过滤和未加剪切地决定着人们的感受，还未被拉直成真、善、美的东西，即那种被文明化的垃圾，那种最小的公分母，那种神经错乱的过于天真的蠢话，隐藏在这种蠢话后面的只有恐惧。恐惧在统治。恐惧在披着理性的外衣统治，它催生庞然大物。不：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怒

斥吧，怒斥光的消逝。怒斥机器。怒斥人类机器。怒斥笛卡尔和任何本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中的分裂，因为会思考的物质实质上是被延展后的物质，它不断蔓延扩散，制造越来越多的二元对立概念，我们跌入这些概念的漏洞之中并在里面沉没。尽管天色已晚，天空早已拉上了帘幕，云层还是又一次短暂地散开，使得雪花旋转着落下，雪花如此晶白，以至于它们几乎又已经变成了蓝色。在它们后面是一道光线，只是一刹那间，然后……

……然后是布袋木偶。刺猬，脑袋过大的魔术师，尤其是那些塑料面庞融化成畸形鬼脸的布袋木偶，因为有一次出于疏忽我让人把它们放到了暖气上。它们的眼睛汇流成巨大的疮疤。我辨认不出它们的嘴巴在哪儿，但它们却一刻不停地在讲话。它们的声音非常尖锐。它们想在我这儿抱怨我。它们说的有道理。我在一生当中做了太多错事。首先我让生命过快地结束了。这是我最大的罪责。我甚至激励生命从我身边扬长而去，把我甩在后面。我躺在墓穴里盯着它们看。我的嘴里满是沙子。

我父母乘飞机从房子上空飞过。我独自坐在厨房里，坐在洋槐树枝跳动的光影里。浅蓝色的橱柜门因为没有关严实而发出敲击声。工厂散发的灰色尘埃在缸砖烟囱上空缓慢飘落。房管员拖拽云网把它罩在钢质脚手架上。教堂司事把教堂握在他伸出的左手里，因为他被解雇一事而哭泣。尽管我父母离得很远，我还是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说我应当自杀才对。我应该给自己把动脉割开，或者最好从窗户跳下去。不是从前面跳出去，而是跳到后院里。

我一直还躺在幼儿园院子里的行军床上，院子就在下跨道的入口后面。锅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没有人来把我煮开。星辰沿它们习惯的轨迹从我头顶驶过。很快孩子们就会过来，为了在院子里玩耍。他们建了一座沙垒，对那个男人不感到吃惊，他躺在那边，觉得自己还是一名青少年，尽管他早已死去。孩子们在沙垒里钻了洞，非常小心地在里面修建了过道。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下午。太阳在平房后面倏忽而过，他们的冲锋衣就挂在平房里的小衣架上。一切都很小，卫生间、桌子、椅子。他们必须把几乎所有的桌子都挪到一起，为了把我放在

上面。他们往我的眼窝里塞上塑像用的黏土，用指画颜料给我的脸涂色并且给我梳头。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失去了兴趣，重新回到外面的院子里。他们围坐在沙垒四周，让他们的玻璃弹子一个个地从上面穿过沙垒里的过道向下滚动。如果一颗玻璃弹子消失在其中一个洞里，那么等着看它是否从下面又重新出现是奇特和令人兴奋的事情，尽管整个过程只持续几秒钟的时间。

那是一条灰色的麻袋，如果没有钱买一具棺材，死者在下葬前就被装入这样的麻袋里。死者家属把所有拼凑的钱都支付给了搬运工和那个男人，他清晨五点钟就开始用锄头翻掘冰冻的土地，直到锄尖陷在一块树根里卡住不动。他站在那儿抽半支香烟。墓地围墙上挂着冰冻枯死的黑莓树枝。一颗干燥发黑的浆果掉进一个绿色的插瓶里面。那个拿尖嘴锄的男人十点半就已经吃午饭了。他站在火葬场旁边啃一根热香肠，香肠是另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用一把木钳从一个银色木桶里夹给他的。熏香的香气在拐角处缭绕着。悬垂的踏板让管风琴像狗一样狂叫不止。男人在等他的小费。他的蓝色的工作服一年只有一次送到洗衣店让人清洗。有人把那条灰色的麻袋又重新叠好。他像叠围巾一样沿对角折叠麻袋。

天在下雨，天在下雨。我感到窒息。我死了。拿锄头的男人从我的存钱罐里得到了那枚五马克硬币，用这些少量的钱他可以买香烟抽。他必须挖一个埋葬男孩的墓穴，一个小小舒适的墓穴。然后树木的根茎像一道栅栏一样在我身上生长。就连医生也无法从我头上取下麻袋。你必须鼓起腮帮子，他喊道，但是我的肺里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听不到我们，医生对我父亲说，可我却非常清楚地听到他说的话。没有用，看来只能做手术了。乙醚透过麻袋滴了进来，流到我的前额上，最后淌进我的脖颈里。我现在要把麻袋剪开了，医生说道。请小心一点儿！我母亲喊道。我一直还清醒着。手术刀虽然很小，但却比墓地上那个男人的锄头更为锋利。尽管麻袋里很黑，我还是把眼睛紧紧闭住。没有起任何作用：头也跟麻袋一块儿被剪掉了。我母亲眼里噙满了泪水。她让人偷偷把随身带来的配有可可糖稀的切片香蕉丢进洗手池下面的小桶里，桶里放的是用过的创可贴和绷带。那个拿尖嘴锄的男人被通知，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两座坟墓，一座埋葬头，另一座

埋葬身体。这在以前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一边说一边用夹克衫袖口擦鼻涕。屡见不鲜。司空见惯。天一直还在下雨，水在继续填充埋葬头的那座坟墓。水不仅从天上掉落，它还从不同方向的土壤里涌来。他们把我的双手叠放得很整齐。但是麻袋吸足了雨水，直到我的脸被挤压为止。因为我母亲无法忍受我的微笑，那个拿尖嘴锄的男人就用锄柄把麻袋向下推进水里。我向上一看到十米高的跳板，接着继续仰望夏日的蓝天。

我的头和身体分别躺在埋葬头和埋葬身体的坟墓里。我说不出来疼痛从何而来。树木的针叶落进月光里。夜晚马路转弯处的路面上闪烁着光亮，仿佛是在夏天一样。我闻到电热暖枕的味道，当它被调节到第二挡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雨后火车站东出口前面鹅卵石路面的味道。时间是周六的晚上。我在那儿等着，只有孩子才会那样等候。公交车停车场上空笼罩着一团由铁锈色调组成的浓雾。拿尖嘴锄的那个男人有些分心，因为他在盯着一个女人看，女人用一个发夹把她的头发向上盘起。雨在一瞬间下大了，雨水打在他未受遮挡的前额上。他诅咒土地，用力用锄头翻掘土壤，仿佛我并未早已被永远埋葬。我最后看到的是他扭曲变形的脸庞，他的面容显得不清晰，因为麻袋布而变得模糊不清。在他的头顶有一根震颤的树枝，好像刚刚有一只动物从它上面跳开。

安布罗修斯说，死亡总是一些好的事情，因为它把灵魂从牢狱中解放了出来，死亡是我躲避尘世各种灾祸的安全港湾，虔诚地生活过的人都不必害怕死亡，因此我不应该现在在我马上就要获得宽恕的最后一刻怀疑，必须克制自己不提这样的问题，即为何上帝把灵魂塞进我的身体，把我的灵魂恰恰塞进我的身体，如果它（灵魂）在那里只是被囚禁起来的话。奥古斯丁说，不，灵魂和身体不是彼此区分的，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灵魂是身体的形式，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不想让我待在神学院里，不想让我待在医院里、学校里和家里，为什么谁都不想见到我，高年级学生不想，克里斯蒂安妮、我父母和格尔妮卡都不想，因为我干脆什么都不懂。我既不懂灵魂也不懂身体，既不懂安布罗修斯也不懂奥古斯丁，因此我没有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什么也不是，我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像克劳迪娅那

样躺在我的舞台即人工草坪上，它内衬了我坟墓的第一米见方，我不明白死亡本身其实无异于一种测试，也就是说我即使在死亡中也必须证明我的状况如何，如果我现在出了毛病，现在在我咽气之前，在我停止呼吸和心脏停止跳动之前，那么我就会失去一切，如果我现在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观察我自己的死亡，我就会赢得一切，我就会像少许人、像极个别人那样享受永恒之光。

格克汗先生一整夜都坐在我身旁，用一条毛巾布浴巾擦拭我的额头，它闻起来有一些发霉的味道，这让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回想起我浅蓝色的毛巾布浴巾，我在想，我在整个成人时光里都没再使用过浴巾，总的来说“浴巾”这个词或许只在引申义里才存在，或者当人们发烧和死亡的时候。然后人们又会想起浴巾，或者人们正好取来一块亚麻布，用它浸蘸凉水擦拭额头。但是这种情况只见于影片当中，片中一个充满同情的女人坐在一个男人身旁而男人则躺在床上，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而不是行军床上，但这归根结底也无所谓，因为这些画面只令那些人感兴趣，他们或者留下来或者想象他们自己将是什么样的情形，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像我这样好的运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某人就像我拥有格克汗先生一样，他在照管我，现在又开始唱些什么，因为他意识到时机已经到了，因为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我在额头上感觉到毛巾布浴巾的每一个小颗粒，我自己不再认为现在一切都会很快过去，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只听到格克汗先生轻声、非常轻声的哼唱声。

我的嘴唇干涩，我的喉咙沙哑，但是我也想从我来说唱点儿什么，哼唱些什么。或许唱些《橡胶灵魂》专辑上的歌曲。或者是奇想乐队的歌曲。但我只想起《宗教诗歌集》中的第四百八十七首：《我们只是尘世间的过客》。以及：《健康幸福的小鹅》。

但是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人们没有挑选的余地：

生命不是舞厅，

生命非常严肃。

它会带来某些内心烦恼，

如果你了解了它。

格克汗先生微笑着跟着哼唱，同时他在把浴巾的水挤干。无论鲁米还是恩斯特·内格尔，无论东京饭店酷儿乐队还是碎石声响乐队，最终重要的仅仅是，人们真的把自己说的话当真，最终人们会把一切当真，至少在我尝试去哼唱那首歌的时刻，但然后我又被分散了注意力，因为我注意到那些品行可疑的明星们在我脚头被调至静音的电视机的这期娱乐节目里坐了多长时间，他们在轮流传递一件物品，把那件物品在他们手里转来转去，同时一边笑一边做出各种怪相，因为他们肯定猜到了人们干嘛需要那件物品，因为他们在大半个节目里都必须要做这样的游戏。我认为人们需要这样的物品，是为了用它让你们头上挨一下子，这当然会破坏那一瞬间，那一和平、和解的片刻，但或许死亡没有任何和解的特征，而只是简单地依循某种机械原理。一种非常简单的机械原理。没有别的。依循死亡的机械原理。

于是我尝试再次回顾我的人生，为了能够让自己完全听凭这种机械原理的处置，但恰恰是现在，当我应当再次回忆起我生命中的美好时光，在我看来也应当回忆起不太美好的时光，但至少是我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恰恰是现在我想起了那个女人，那个显然是虚构的女人，她在我们教士的一次布道里反复出现。因为那个女人总是很晚来教堂做礼拜。然后她遭遇了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当教士带着圣礼赶到出事地点时她已经死了，因此在布道里是这样说的：上帝来到这位女人身边时已经太晚了。还在当时我就觉得这件事非常卑鄙，无法正确想象这样的事情，尽管另一方面人们不会知晓此事，因为我在另一则故事里读到，一个男孩不断地违反星期天弥撒规定，在一次雷雨天气里他甚至被从教堂钟楼顶端掉下来的一个十字架砸死，尽管我尝试回忆自己的人生，回忆任何一些事情，可我还是依恋着那些布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没有一次再想起它们，现在我必须认为，教士也曾经对现代人进行了布道，他在布道里提到了《等待戈多》，但在说的时候总是在最后连发两遍T的音，当时这让我感到很糊涂，因为我在订阅的戏剧杂志里也看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否则的话

他无法引起这种出人意料的高潮，即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等待戈多，等待上帝。现在所有的人齐唱：健康幸福的棉花糖，一百年后一切都将消散。

1969年7月3日夜里真正发生了什么

我所说的全部关于红军派1913的胡扯都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不希望人们查明我真正做了些什么，为一些人们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受到指控要更容易一些，我最愿意把这些事情一直保留到最后，也就是说永远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为它非常可怕，的确是一些人们根本不会相信一名儿童或者一名青少年（我还不完全是）能够做出的事情，特别是因为我也无法再撤销它或者以某种方式对它加以弥补，这其实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当我不小心弄坏阿希姆的磁带时，人们还可以对这样的过失进行修复，也就是把买新磁带的钱从我每个月的零花钱里扣除，只有那期带有《银湖宝藏》收藏图片的杂志人们无法再用其他东西替换了，阿希姆把它借给了我，而我又把它忘在更衣室里了，因为那些图片不再有售，即便有人们也不可能再把它们收集齐全了，因为图片被装在小袋子里，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从售货亭买来的小袋子里装的是哪些图片，因为其他人也早已不再彼此交换图片，其实事情也没那么糟糕，因为我们其实也不再那么对《温尼托》感兴趣了，但尽管如此这件事也令我很遗憾。但是相比周三我在吉贝尔凯尔伯庆祝会上的所作所为这根本不算什么，那件事真的非常可怕，也正因为如此我当然不想承认，因为我害怕然后会发生什么，因为事情不像人们承认、为此做出道歉然后就过去了那么简单，因此我也更愿意承认所有其他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有关红军派和明爱会那位女士的事情，也包括其他人对我的根本不正确的说法，因为一切都不像我真正所做的那样糟糕，但现在我也想承认这件事，因为这样下去没有意义，因为我无法做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干脆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也会讲述1969年夏天的那个周三我在吉贝尔凯尔伯庆祝会上、也就是在那次我已经谈到过的吉贝尔凯尔伯庆祝会上做了些什么，那个周三我坐在一个纸板箱里飞往伦敦，接着从伦敦机场坐火车去维多利亚车站，在那儿吃了一份和路雪巧克力酒吧冰激凌，我感到惊讶，因为插在售货亭上的小旗看上去和我们家乡和路雪冰饮

店的旗子完全一样，我惊讶于周围任何地方都站满了人，可惜的是我必须乘坐的那趟火车不是从滑铁卢站出发的，因为《滑铁卢日落》（Waterloo Sunset）是我最喜欢听的奇想乐队的歌曲，也就是说和《日子》（Days）以及《见到我的朋友们》（See My Friends）一道，但是然后我在售货亭给自己买了最新一期的《披头士图书月刊》，那是第72期，封面上披头士乐队成员乘坐一艘划艇穿越泰晤士河，这已经让我感到安慰了，此外我在画面上看到了一些真正奇特的东西，因为在船的侧面刻着弗里茨、奥托、玛丽亚、安娜这些名字，起初我认为，这些名字是披头士乐队想象出来的，因为这正好也是四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们或许是从明星俱乐部里知道的这些名字，如果这样他们就是约翰·弗里茨和保尔·奥托。但是乔治·玛丽亚和林戈·安娜，这不管怎样也搭配不在一起，尽管披头士乐队的一首歌就叫《安娜》，但我不是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也根本不是他们写的，此外这些都是老旧的名字，今天没有人再这么叫了，只有我祖母的姐姐还叫安娜，奥托和弗里茨，这两个名字只在玩笑里才出现，然后我又想，这四个德国名字很简单就是一种标志，象征着他们想从德国得到帮助，这多少平息了一些我的疑虑，因为我当然已经产生了怀疑。于是我乘坐了开往克劳利的那趟火车，乘车期间我又更加仔细地观察了期刊里的照片，然后我睡着了，因为去克劳利要花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当天早晨我也起得很早，从克劳利开始我搭便车旅行，也一直坐到了上哈特菲尔德。然后我步行走完了去往度假农场的剩余路程。当时已是下午很晚，天已经变黑了，当我看到那间农舍的时候。我首先绕着农舍蹑手蹑脚地走了一圈，然后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当天完全黑下来而且不知怎的也让人觉得阴森森的时候，我几乎是在最后一刻又退缩了，因为我干脆害怕了起来，但是然后我在树篱后面听到从房子那边传来一声动静，在黑暗中看到他从房子里出来向花园里走去，他穿着浴衣，手里拿着一只酒瓶，他看上去根本不像在照片上那么英俊，而是脸庞要宽阔得多，然后他在游泳池边坐了下来，但只是把双腿浸入水中，继续对着酒瓶喝酒，同时身子在来回摇摆，这时我没有再多想，索性越过花园篱笆，穿过荆棘丛（期间我还划破了胳膊），在黑暗中从后面慢慢靠近他。是的，然后我把他撞进游泳池里，就这么简单，我自己也完全没有想到整个过程会如此轻松，因为我只是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他就向前倒了下去，没有一点

儿动静，也没有说任何话或者发出任何喊声，真的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并且他也同样悄无声息地沉了下去。接着我根本无法再做出任何举动，因为我身子一点儿也动不了，也无法进行任何思考。我也不想思考任何事情，在这一刻我还能想出什么高尚的事情呢？如果我思考了一些事情，那么肯定又会产生某些怀疑，这是最糟糕的，如果人们做了些什么，然后产生怀疑，而人们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别的，因此我只是简单地站在那儿盯着游泳池看，从房子里射出一些灯光照在水面上，这时我又一次感到非常惧怕，因为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房子里可能还会有人，某些追星族或者他的经理人或者随便是谁，因为我只看到了他，于是便越过篱笆穿过荆棘丛，然后我就站在那儿什么也没想，只是看着他的手是怎样松开酒瓶的，看着他是怎样腹部朝下斜着漂过泳池的，看着他的浴衣是怎样吸满了水并在他上面像一朵云一样漂浮着，然后我尽快离开泳池向篱笆方向走去，但我必须再次折返，因为那期《披头士图书月刊》从我裤兜里滑掉了，起初我担心我在黑暗中找不到它，但然后我发现它躺在草坪的正中央，现在我终于离开了那里，没有再回头看一眼泳池，因为我害怕他还活着，虽然我也同样害怕他死了，我最希望有这种可能性，即他又苏醒了过来，或者房子里有人找到了他，假如那里可能还有其他人的话。然后我沿着乡间公路往回走，直到来到一片小树林跟前，我躺到一棵树下睡着了，尽管在此期间天气相当冷，而我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衣，没有穿风雨夹克。第二天早晨我又沿同样的路线返回，也就是说至少返回到伦敦，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而已，因为我无法再飞回去，因为那个纸板箱在降落时破损了，因此我只得乘坐从多佛尔到加莱的渡船，乘船过程中我感觉很不舒服，渡船上只有从自动售货机里提供的饭菜，为此我不再有必需的零钱，因此我只有在开往德国的火车上才能够吃些东西，因为车上人们也收德国马克，我能够用身上最后的两个多马克给自己买一根小香肠，配着香肠只有一片面包，不是小圆面包，但尽管如此味道还不错，在火车上我也睡了觉，因为夜里睡在树林里时我总是不断醒来，因此我现在困得要命。在我真正到家之前又过了很久很久，然后我从火车站坐4路车沿林荫路向上，时间已经是周四傍晚，一切也都已经在凯尔伯草坪上搭建好了，幽灵列车、履带式车辆和碰碰车，这一切我是在赖讷家附近的高速公路桥上从公共汽车里看到的，然后我在公爵广场站下了车，因为我还想路过毛厄夫人的商店取

一下新一期的《流行音乐》杂志，它也已经到货了，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开始翻看它。当然里面还没有刊登任何新的消息，因为就连我在火车站看到的那些报纸上也没有刊出一些特别的，至少在前面的几版里没有，但相反在每月只出一期的《流行音乐》里却登载了一些事情，一些令我恐慌到极点的事情。因为里面登出了一张滚石乐队的照片，照片上布莱恩·琼斯站在最前面，其他乐队成员站在他后面，所有的人都在笑，他一边笑一边用手指向其他人，照片下面写着，布莱恩·琼斯六月初退出了滚石乐队。当我读到这则消息时，我感觉它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震惊，这真的非常可怕，我几乎要号啕大哭起来。但之后我让自己平静下来，把整篇文章又仔细阅读了一遍，但是文章里只写道，这个消息千真万确，他在录制新唱片时就不再真正参与了。这时我开始剧烈发抖，尽管天气还很热，比英国的天气热得多，我必须在裴斯泰洛齐学校附近的台阶上很快坐一会儿，因为我意识到一切都是徒劳的，完全是徒劳的，因为我只希望滚石乐队当中唯一能够与披头士乐队竞争的人，唯一原本应当属于披头士乐队的人，因为他跟乔治·哈里森一样也演奏西塔琴，他想到在演唱《红宝石星期二》

(Ruby Tuesday) 那首歌时使用竖笛，在演唱《在我的掌控下》

(Under My Thumb) 那首歌时使用木琴，在演唱《魔鬼陛下的乞求》(Satanic Majesties Request) 那首歌时使用摇摆画，他让给《佩铂军士》拍照的同一名摄影师拍摄这样的摇摆画，我只希望他不继续待在滚石乐队。但是如果他现在离开滚石乐队，那么他也可以加入披头士乐队，这样披头士乐队就将有五名成员而滚石乐队有四名，尽管这也很滑稽，但这样一来所有的成员就将聚在一起，他们会相互协调共同出色，这样克里斯蒂安妮也就不会再嘲弄我的披头士乐队了，因为那样的话披头士乐队就将是无与伦比的了。但我现在弄糟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我恰恰阻止了这一点，因为我干脆没有想到在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之间会出现一些情况的变化，没有想到一个人会离开或者甚至死亡，一个年龄正好两倍于我的人，因为文章当中也提到他二十七岁，而我十三岁半，也就是说几乎13½岁，但是布莱恩·琼斯也要更老一些，因为他是二月份的生日，只是现在他不再会变老了，我在考虑如果我也不再会变老该是怎样的情形，那么现在一切都将结束，世界将不再发生变化，如果我不是正好在毛厄夫人的商店里买了那期

《流行音乐》杂志，我

甚至都不知道布莱恩·琼斯退出了滚石乐队，那么我也就不会知道谁人乐队即将推出的摇滚歌剧，《弹球奇才》（Pinball Wizard）也是该摇滚歌剧中的一首，它或许跟《摘自一出少年歌剧》那首歌相似，后者在两年前就已推出，但从未以慢转密纹唱片的形式，从未是一部完整的歌剧，或许《弹球奇才》也是这种情况，但我永远也不会得知这一点了，我想起了高大的杰克，高大的杰克，就像童声合唱队所唱的那样，又在思考为何他们竟然要用德语来唱：高大的杰克，高大的杰克，妈妈说的是真的吗？你不想回来了，啊，不，啊，不。或许他们在布莱恩·琼斯的葬礼上也会唱这首歌，尽管他不叫杰克，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大，但是有这么一张单曲唱片《跳跃的杰克·弗莱士》

（Jumpin' Jack Flash），唱片正面上布莱恩·琼斯在一只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支三叉戟，就像原本是海神尼普顿所执的那种，仿佛他知道自己将在一年之后死亡，端着威士忌泡在水里，知道他将溺亡，但不知道有人会把他推入水中，不知道有人将专程从德国赶来，一个甚至连十四岁都不到、年纪只有他一半大的男孩将会把他推进水里，因为他想拯救披头士乐队，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他这样只能把一切弄糟。布莱恩·琼斯现在甚至成了像殉难者一样的人物，因为乐队中还从未有谁死过，现在他是作为唯一一个死去的。这样滚石乐队就可以对此大加想象，让人像对待圣臬玻穆那样崇拜他，他也是被人从一座桥上撞入伏尔塔瓦河溺亡的，就跟我把布莱恩·琼斯撞入游泳池一样，只是在他四周没有像发生在圣臬玻穆身上那样出现五团火焰，但是滚石乐队完全可以这么声称，对此我不能有任何反驳，因为否则我就会出卖自己，然后他们也可以把他的行为假定为是一次殉难，仿佛他一切都是计划好的，先是退出滚石乐队，然后是游泳池里的殉难者之死。五团火焰也不再象征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身上的五处伤痕，而是代表滚石乐队的五名成员，但同时他们也和所有其他正派的乐队一样仅剩四名成员，不仅是披头士乐队，也包括谁人乐队、奇想乐队、小脸乐队和猴子乐队。事实上当我在周六下午的凯尔伯庆祝活动期间站在后面的一辆履带式车辆旁边偷偷抽一支塔林牌香烟的时候，米克·贾格尔正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放飞一千只白色的蝴蝶并朗读一首诗，诗里出现的正是我担心的事情，因为他尝试宣告布莱恩·琼斯为圣徒，甚至给人一种琼斯像耶稣一样仿佛又已经复活的印象，因为在此期间距离我把他撞进游泳池里正好过去了三天，现在

米克·贾格尔一袭白色的戏装站在那里，戏装看上去有点儿像人们在主持《节奏俱乐部》（Beat Club）音乐节目时所穿的那种，他朗读的那首诗也开始与《圣经》里的完全一样，因为诗里也是这么说的：他没有死，他不在睡觉，他从生命的梦想里醒来，而我们却迷失在暴风雨般的幻象里，徒劳地与幻影抗争，在出神的恍惚之中用我们精神的刀刃与无懈可击的织物争执，皮特·汤申德也说过，尽管他不是在海德公园，而是在自己家里说的，说他以前曾经想成为像布莱恩·琼斯那样的人物，但现在不了，因为他不想死，但对布莱恩来说那是非常普通的一天，对摇滚乐来说也是如此，对布莱恩来说那之所以是非常普通的一天，是因为他是每天都会死去的人，这也只意味着死亡对他来说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他能死亡也能重新复活，也就是说他其实跟西门·马吉斯或者其他创造奇迹的人以及那些假先知们一样，他们在滥用他们的能力，但谁也不敢这么去说。此刻我想起了披头士乐队，他们其实也有一名叫布莱恩的成员，即布莱恩·爱普斯坦，一个也已经死去的布莱恩，但不知怎的他并不显得那么重要，令人尴尬的是他们会把他重新掘出，仅仅是为了与滚石乐队保持同步，要是我我不会这么做的，因为那个人仅仅是他们的经纪人而已。我又闻到溪流后面大黄荃叶的味道，我感觉非常不舒服，虽然我顶多只抽了两支烟，但也是因为我自周三以来睡得太少的缘故。因为我还不想回家，我就沿溪流方向走了一段，突然我禁不住想起了那名在这里溺亡的男孩，当时那个男人越过围篱朝我家花园里张望并且那么奇怪地看着我，当时那个男孩的年纪正好是我现在的一半大，他还不到七岁，而是只有60岁大，据说他是在浅水溪里淹死的，但这肯定不正确，因为事实上是那个男人干的，他越过篱笆朝我们家张望，就像我在布莱恩·琼斯家所做的那样，我在想，如果那个年纪是我一半大的男孩当时死去了，而现在年纪是我一倍大的布莱恩·琼斯也死去了，那么最好我现在也应死去，当然也是跟他们俩一样溺亡，那么我们三人就构成了三位一体，60岁、十三岁半以及二十七岁，或许我可以重新弥补这件事，如果我沿溪流再向上走一段，朝洛厄磨坊场方向，当天完全黑下来时，我就在那儿躺到溪流里，在那个地方溪水也更深一些并积聚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在那儿溺亡了，这样所有其他的事情就都无所谓了，也包括留级、和克里斯蒂安妮以及摇滚歌剧的事，这样我也能再抽一支烟，尽管我现在已经感到眩晕了，不管怎样这也无关紧要了，因此我又点着了一支

烟，反正是最后一支。然后我扔掉烟盒，跟在履带式车辆后面跳到溪流的另一侧，穿过没有剪割的草地和正在开花的大黄茺田朝洛厄磨坊场方向走去，与此同时天黑了下来，旋转木马的音乐声也变小了，我在想事情其实很可惜，因为我可以事先在家把一切再仔细地看一遍，我的宝物箱和从皇冠马戏团买来的披头士乐队的画册，也包括那期《披头士图书月刊》，因为它特别珍贵，但接着我就感到难受极了，我很容易就从斜坡上滚了下去掉进水里，水不是特别凉但也不是很热。我看见披头士乐队成员乘坐的那条刻有“弗里茨、奥托、玛丽亚、安娜”名字的船驶来，我向他们招手，但他们从我身边驶过，好像没有看到我一样。然后我看见西门·马吉斯站在凯尔伯游乐场方向的一侧，在洛厄磨坊场方向的另一侧站着彼得，西门·马吉斯对彼得说：你瞧，我可以杀死这个男孩，现在你再把他的唤醒。我朝彼得那边看过去，彼得手里拿着一把钥匙，我问道：您是用这把钥匙为虔诚的信徒们开启天堂之门，也是用它把不信教者推下地狱的吗？但他摇了摇头说：不，这把钥匙是他们于1971年5月6日在汉堡从阿斯特丽德·普罗尔手里夺下的，警察将会花三天时间把它插入2166个门锁，但没有一个门锁能够被打开，只有试到位于吕贝克大街139号四楼一套住房的第2167个门锁时才成功了，在那里人们将会找到你的尸体。在他说这番话时我吓得不得了，因为距离那个时候还有几乎两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是死的还是活着一直躺到那个时候，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两种情况都很可怕，但最终我也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不比那个约瑟夫·巴赫曼好到哪儿去，他于去年四月专程从慕尼黑坐车去了柏林，就跟我专门坐车去了伦敦一样，在那儿他卖掉了自己的手提收音机，为了用卖得的钱买一把手枪，然后他用这把枪朝鲁迪·杜契克开枪射击。那个约瑟夫·巴赫曼紧接着说道，他很伤心鲁迪·杜契克没死，如果他有钱的话他甚至会把他锯碎。我永远也不会这样谈论布莱恩·琼斯，因为我事实上会感到高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绝不会有把他锯碎的念头，因为这样做既恶心又残忍，因为他们也以这种方式对待了那个西门，当他在波斯宣布自己信仰的时候，因此在有这个想法时我就已经感到非常奇怪，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起了明爱会那位女士，突然她也站在刚才彼得站过的位置上，因此我很快朝另一侧的西门·马吉斯望去，但现在站在那里的只有来自全德汽车俱乐部的那名男子，起初我根本不理解他突然来这里做什么，但然后我明

白了当时那一幕不是偶然，当时我父亲的汽车半路抛锚了，明爱会那位女士脱下她的连裤袜，把它交给来自全德汽车俱乐部的那名男子，为了让他把它用作三角皮带，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两个人事先商定好的，因为这样一来明爱会那位女士能够继续清白到最后一刻，而所有其他事情都是来自全德汽车俱乐部的那名男子做的，包括突然袭击、伪造忏悔书以及针对我们散布的全部谎言，其次他也对沃勒和其他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他用连裤袜把他们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扔在一条荒凉的高速公路上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除了他没有人去，然后他又马上返回，根本不去理会所有那些发生故障的车辆，因为他还要安排更多的事情。他也能开着他那辆黄色的甲壳虫汽车去往各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很高兴看到他并向他挥手示意，因为他们认为他会帮助大家，可事实上他只是又抢劫了一家杂志商店，并声称那是我们干的。我又回头向明爱会那位女士看去，但是站在那儿的又只是彼得，就他一个人，就像牧师看人们的眼神那样盯着我看，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牧师）在想什么，但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何要想这些，为什么他们总认为人们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尽管我现在当然真的是一只迷途的羔羊，我又向另一侧看去，因为或许来自全德汽车俱乐部的那名男子最终还是能够帮我的，但他也同样不见了，因此我可能只是想象出了这一切，因为站在那儿的一直还是西门·马吉斯，他再次对彼得说他杀死了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怎样使我重新复活。我想说我根本不是真正死亡，但或许这样做压根儿算不上是聪明之举，因此我表现得非常安静，静待彼得做些什么，但彼得又一次只是摇了摇头，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的，他不会让我任凭西门·马吉斯、这个假先知摆布的，突然我四周的溪水变得非常冰冷，这肯定是西门·马吉斯使的一个魔法，或许彼得认为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只是一场游戏，或者可能他也在等待我真正死亡，但是我害怕真正死去，因为在正确和错

误信仰的争执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人们无法准确地区分这两者，这也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一名儿童很快在一个地下室里躺了很多年，一名正好年龄是我的一半大的儿童，人们也不知道他为何要在那里躺很多年，那个约瑟夫·巴赫曼也躺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他在行刺完鲁迪·杜契克之后服用了二十片安眠药，但是人们马上就发现了他并把他送进了医院，因此他存活了下来，如果鲁迪·杜契克和刺杀他

的人都存活了下来，但布莱恩·琼斯却没有，那么刺杀他的人也就是我可能也无法幸存，那么我就不必再抱使自己复活的希望了，地下室里的那个小男孩也没能成功地复活，尽管他后来成了圣提摩太，人们因为腹痛而呼唤他，因为他总是腹痛，跟他一样我也总是腹痛，但尽管如此我无法再成为圣人，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一名专司腹痛的圣徒。但我可以成为咽峡炎圣徒，因为我也总患咽峡炎，或者最好这样：我让人摘除我的扁桃体，然后我就可以像圣西门举着铁锯那样把它们举在眼前，或者最好像叙拉古的圣露西那样把她的眼睛放在一个碗里举在手上，或者像卡塔尼亚的圣阿加莎那样把她的乳房放在一个托盘上举在身前，但这让人感到非常恶心，比眼睛还要更恶心，因为人们无论如何想要看过去，我起初也认为那是某种形式的布丁或者类似的甜点，但他们不会那样举着扁桃体，因为肯定也已经有了一名扁桃体圣徒，如果还没有，那么圣布拉修斯也会接管这一角色的。但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在我看来他们可以私下里把这一切都商定好，因为我正感觉到我是怎样变得极度疲倦，我的四肢是怎样变得沉重，越来越多的水是怎样涌入我的嘴里的，我仍在认为，彼得或许也根本不可能再使我复活了，不仅是因为我通过杀了一个人而犯下了深重的罪孽，而且也因为我今天在星期六没有去参加忏悔，而是去了凯尔伯庆祝会。即便去参加忏悔反正我也不会坦白自己的罪行的，因为这根本没有写在《儿童忏悔镜》上，上面没有写：我把一个人推进一个游泳池里，甚至在《成人忏悔镜》上也没有写明这种情况，在那上面只写着：我打了其他人吗？以及：我杀害了成长中的生命或者在公路交通中危害他人了吗？但上面只字未提一起真正的谋杀或者一起杀人罪，或者类似于从背后把某人推进游泳池的罪行，尽管它当然是一起深重的罪孽，虽然它没有写在《忏悔镜》上。它的确是一种如此可怕的罪孽，以至于它甚至都没有被写在《忏悔镜》上。在《儿童忏悔镜》上只写着责骂或者殴打他人，但我既没有责骂也没有殴打过他人，但是在《成人忏悔镜》上也写着：我有自杀意图吗？这似乎也是一种罪孽，只是它听起来如此滑稽：自杀意图，在这方面我只想到了那个男孩和布莱恩·琼斯，但那并不是什么意图。如果人们想要死去，人们不会故意这么去做，尽管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深重的罪孽，知道自杀者也不会被葬在神圣的土地上，或许彼得之所以也无法使我复活，是因为我自己杀害了自己，是因为西门·马吉斯只是利用了这一点，给人一

种仿佛是他杀害了我的印象，因此彼得也一句话不说，不知怎的反正我不喜欢彼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不管怎样所有的耶稣使徒我都不喜欢。他们总是那么严厉，就跟老师一样，根本不像耶稣，在他们那儿人们必须严格地遵守一切，而耶稣则时不时会宽恕人们，但是耶稣使徒们不会宽恕人们，如果你躺到溪流里，那这就意味着你有自杀意图，那么你也就无法再复活，即使你还是个孩子，尽管自杀和意图这样的话语根本就没有写在《儿童忏悔镜》上，但是这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人们要么做家庭作业要么不做，就是这样，没有借口。或许彼得会给我父母写一封信，说我自己杀害了自己，因此也就无法复活，并要自行对此负责，就像在留级和所有的事情上一样，因为我总是对一切负有责任，但现在我也不在乎这些了，我也不在乎他们会把我葬在墓地的围墙墙边，那里的泥土是没有被神圣化的，他们也不会为我演唱《生命中的一天》那首歌，就像我在自己的葬礼上所希望的那样，谁也不知道我的这个愿望，虽然我曾经对赖讷说过，或许也对亚历克斯说过，但是他俩肯定不会被询问的，他俩甚至连辅弥撒者都没有做过，因为也没有牧师来，教堂不想跟自杀者有任何关系，因为自杀者不再能够忏悔和悔恨，因此他们比杀人犯更加恶劣。而我，我甚至集两者于一身，因此对我来说根本不再有救了，绝对无救了，但现在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

论远处的噪音

1. 许多年之后一名记者坐在他父母的客厅里，正在为一段公司简介挑选照片。当他母亲来到走廊里时，她对他低声说道：“你父亲的脸变得有孔了。”他没有机会打听她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站在他父母和那名记者身后，越过他们的肩膀欣赏那些铺在客厅桌子上的照片，这时他自认为能够把他母亲先前所说的话归结为涂了黑漆的头发和黑白照片的光滑轮廓，这些照片和他父亲很不像，以至于他甚至都回忆不起来认识照片上那个在他童年时代拍摄的男人。

2. 他走进地下室。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在明爱会那位女士住过很多年、现在闲置的客房里冲个澡，为了在稍后进城赴约时显得精神焕发，这其实是比较务实的做法，他故意把约会定在那个时候，为了缩短在他父母家的拜访时间。但他没有勇气在这里脱去衣服。他没有勇气打听毛巾在哪儿。

3. 在想毛巾的同时他四周被各种令人麻木的声响所包围，轻微的刮蹭声、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行走的声音、从其他楼层传来的敲门声，这禁不住令他回想起父母及其雇员的持续活动。当时他从未有意识地感受到从地板、天花板和墙壁后面传来的那种勤勉的活动声，慢慢地那种声音使他麻醉并渐渐使他入睡。

4. 他走进昔日明爱会那位女士的客厅，他父母把他们在楼上不再想要的各种家具都推到了这里。他在墙上发现了一些小窟窿，它们或许是在固定架子时留下的。他把它们解释为是明爱会那位女士在这里留下的神秘记号，为了以此保持她对这个地方的影响。就跟他当时在迁出别墅时把自己最喜欢的印第安人造型藏在顶楼一根屋梁后面一样，但实际上却不知道为何要那样做，尽管那个造型只是单一的棕色并用铸塑制成。

5. 他和他母亲是唯一参加为期三天的全体员工去柏林郊游的家属，这次郊游同时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再次与他父母独处的机会（他弟弟待在家里由一名护理人员照顾），尽管他们不断地被公司职员所围绕。员工的在场并不妨碍他，相反更令他感到愉快，因为他们的在场保护了他免于被过度关注，就像地板、天花板、墙壁和门同样保护了他一样，因为当他躺在自己房间里时，它们过滤掉了所有的噪音。

6. 他不由自主地把这次全体员工郊游和一张照片联系在了一起，那张照片是他母亲铺在客厅桌子上的众多照片中的一张，在记者走后他又第二次浏览了它们。人们在照片上看到他年轻的父母站在一处商店通道里，他认为他自己拍摄了这张照片，当时他父母在通道上的一家珠宝店里给他为参加圣餐仪式挑选了一块荣汉斯手表。当他向他母亲提起这件事时，她却反而给他讲述说，在晚上的庆祝会上一些公司成员是怎样不守规矩的，此外他们是怎样通过不断补订、然后又只呷了一口便搁置一边的昂贵的葡萄酒和香槟酒导致了一笔巨额账单的。

7. 情况表明那名记者根本就没有走，而只是去他的车里找寻三脚架和闪光灯，因此他决定再在周围区域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为了不让自己也成为新闻报道的一部分。街道几乎没有变样，尽管人们对房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修葺。当他意识到自己接近了那块地区时，以前工厂和他父母家就位于那个地方，今天矗立在那里的是又一幢配有长长的滚动牌的过时的购物中心，它空置的底层空间曾经被设想作为停车位，在接近那块地区时他掉转方向，沿墓地背后往回骑。两夜之后他梦见自己又沿那条路线骑行了一次，途中在林荫道向下倾斜的地方他被阿希姆超越。阿希姆骑的是他那辆旧的红色的比赛用自行车，他停在公爵广场站等我；在老公爵广场旁边，在法国梧桐树下，在小电话亭附近，可以看见艾伯哈德·考夫曼父母的瓷器品商店，那里现在一个超过真人大小的蜘蛛侠在一家也已经又过时的影碟出租店上面正沿外墙面攀登。他很高兴见到阿希姆，尽管阿希姆不再关注他，而是干脆从他身边经过朝主教堂方向骑去。醒来之后他回忆起，在那个地方的拐角处有一家烟草店，它也出售公共汽车票，他曾经陪阿希姆到那儿去过一次。在他的梦里阿希姆很瘦、有雌雄同体特征、年轻、不到二十岁、穿着黑色的皮装，而且他有乳房，就像梦里出现的情形，他能

够透过衣服看到阿希姆的乳房，能够看到丰满的半圆形球体，它们可能符合他天真的想象，在当时。

8. 就好像是梦要尝试填补漏洞，它又引领着他从公爵广场返回到他父母的新家，那里一切都和他两天前所看到的一样，只是他在地下室里遇到了明爱会那位女士。她一丝不挂，但没有乳头和阴部，而是看起来就跟早先照片上的女人一样，她们的性特征通通被润饰掉了。他向她打听时间，她从墙上的小窟窿里取出一些手表，但它们的指针都不走。然后她在他面前表演了一支据说是罗马天主教的圣餐舞。但是音乐与舞蹈不配套，因为那是一种德语摇滚乐。当他向她指出这一点时，她假托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但却重新穿上了衣服。

9. 结构化的周作息时间，在特定的日子里总是重复出现的饭菜（周二：面条、番茄沙司和鸡蛋，周六：大杂烩等等）以及远处摆脱了自身噪音、自身结构的声响。人们可以随时打听毛巾在哪儿，总有一条熨烫过的毛巾挂在那里，一场叛乱总是已经在结构自身中被安置好并在结构里被保存。比如高年级学生在他们活动的那座小城的结构里被保存，在高级文理中学的结构里被保存，红军派被保存在西德的结构里。在此重要的是，创立结构的那些人却意识不到结构。就像父母意识不到他们在远处制造了哪些噪音，因为他们自己只感受到附近的噪音，并且是联系到招致这些噪音的具体活动。红军派的终结是1969年11月在巴黎开始的：巴德尔和恩斯林，被阿斯特丽德·普罗尔在花神咖啡馆拍了照。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反叛是由远处西德的噪音决定的，反叛在其结构里也孕育了爆发，也孕育了巴黎的放荡生活。

10. 从实际考虑出发，明爱会那位女士在卖掉工厂而且他母亲相对康复之后也随他们迁入了新居，住在地下室的客房里，就跟红军派在保护性并使人入睡的远处的噪音中一样，历经多年发展出某些妄想。由主观臆想的西方经济制度的崩溃、伴随着银行破产和所有在此期间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所引发，她多年来第一次从睡眠中被唤醒，这样的睡眠是远处父母的噪音传介给她的，现在她尝试去保留这种睡眠，但却不清楚自己事实上是在担心何种损失。她在一段时间里避免与人接触，甚至更确切地说是蔑视他父母之后，就像红军派蔑视决定其自身

的结构、高年级学生蔑视高级文理中学的结构那样，她现在寻求与人会话。因为母亲从未关心过财务事务，所以对她来说首先必须让父亲相信，取消人寿保险、消除所有的银行账户是多么有益的事情，这样做是为了用钱来投资黄金，投资尽可能小的金条，它们在后货币时代将适合用来交换。父亲作为商人断然拒绝了她的建议，主要用以下论断驳斥了她提出的上述建议的合理性，即如果发生可能性的经济崩溃所有的人都将面临相同的境况，那样的话谁都不再拥有财富了。也就是说他相信结构，而明爱会那位女士则不信任这种结构，因为与父母不同，她早就不再自己经历结构，而只是把它作为远处的噪音加以感受。事实上她是第一次（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面对死亡这一思想，也就是面对结构的危害，只有这种危害才使得她的生活和她与普通生活的划清界限——自从工厂被出售和搬家以来她就再没过正常的生活——成为可能。因为父母拒绝把她的担心变成他们自己的担忧，于是她被迫自己采取行动。她开始储藏食物，敢于想出这样的念头，即在金钱经济制度崩溃之后，在黑市上主要是享用品和成瘾性药物将会构成一种绝佳的交换商品。因此她又额外储藏了甜食和酒精饮料。但她不理解的是，通过使她的系统完美她永远也不可能满足最初引发她恐惧的东西，即对于因为远处的噪音而丧失结构的恐惧。相反她把精力转移到使自己的预防体系趋于完美上来，最后被警方在李斯尔厂房里的一次例行检查中逮捕，当时她正准备购置数量较大的海洛因。接下来对她住处的搜查——父亲的一名律师得以阻止使搜查范围扩大到其余的房子和父母的房间——正好导致了其所担心的事情：她失去了自己的住处，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在场但又遥远的父母的结构，因为他们觉得常年同意并连带资助了她的毒品消费。

11. 远处噪音的结构提供了如此大的保护，以至于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必须把自己引向惊恐。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只有大自然的结构。因此他每天都要在日记里记录关于高度的情况说明。他在一种难以想象的无聊中等待革命，但是跟所有其他人一样他只是在等待自己的死亡。

12. 或许也因为他们还没有冰箱或者从父母那儿学得了这样的习惯，以前人们把东西放在外面对着院子的窗台上。主要是食品，但也包括人们不想放在屋里的东西，比如用破旧衣服包起来的颜料罐，或者还

有那些想被扔掉、但还不应当被扔掉的物品。有时这些东西被人忘却，整个夏天都堆放在那里，当他站在院子里向上看时，每一栋他永远也不可能踏进的住房都会泄露一些它自己及其房客的情况。

13. 所有这些都在他的脑海里穿梭，当他临近傍晚朝火车站方向走去时，风正从田埂的桦树上面吹过，云闻起来有一股蓖麻油的味道，他看到一个牵马的男人就像是定格在他的童年时代一样。男人走在马身旁，那是一匹高出他的步履沉重的老马。然后大黄茎叶垂下了头。一道长长的阴影越过街道，从空置的居民楼一直落到市郊小果园的窝棚后面。他理解对于结构的渴望，这种渴望把明爱会那位女士赶进精神错乱，把那些高年级学生赶进叛逆，把他自己赶进忧郁。

14. 他再次尝试回忆那个梦境，梦里阿希姆骑着他那辆红色的比赛用自行车超过了他，回忆期间他禁不住必须想起那个他们彼此失去了联系的夏天，因为阿希姆连续第二次留级，不得不退学离校。可能是为了在阿希姆的父亲返回之后开始一段新的人生历程，同时他父母从过道上面带有卫生间的狭窄的旧宅住房里搬出，迁入城市另一端的一栋高楼里。在此期间阿希姆在梅赛德斯公司开始了一段学徒期，阿希姆再次邀请他去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尽管他只比阿希姆大几个月，尽管他们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没有见过面，但当他拿着由明爱会那位女士包好的送给阿希姆的礼物出现时，他显得要比对方年轻得多。在来参加生日聚会的其他男孩当中他谁也不认识，所有的人都抽烟，也允许在阿希姆父母的住房里抽烟，这让他觉得很奇怪。他和其他人坐在一张低矮的桌边，吃一块蛋糕，从窗户向外眺望城市全景。他本人买的，但是由明爱会那位女士包装好的礼物是单曲唱片《徽章》

(Badge)，他把唱片放在他的方格纹挎包里。阿希姆好像不再对音乐感兴趣了，其他人也没有送他任何东西，因此从包里掏出单曲唱片送给他将会令他很难为情。在其他人笑着谈论他不知道的事情时，一种对黑暗狭窄的楼梯间的渴望侵袭了他，那是通向阿希姆原先住房的楼梯间。一种对狭小门厅的渴望，门厅里立着摆放电话机的小桌，为了去往客厅人们必须穿过门厅，阿希姆的房间就在客厅旁边。在搬家时阿希姆肯定把所有的画册都扔掉了，或许甚至扔掉了他的唱片。不过他不惊讶于他们坐在客厅而不是坐在阿希姆的房间里，他也没有机

会再看到他的房间了，因为阿希姆的父亲来到客厅，提醒阿希姆和其他人到了该走的时间了，他现在可以捎带他们进城，因为他反正也要驾车去那个方向。阿希姆和其他人跳了起来，相互讲述他们在城里要喝些什么，而他则害怕必须跟他们一道去他不熟悉的酒馆，必须在那里喝他不想喝的烈性酒，因为他喝不了烈性酒，因为阿希姆的新朋友们不理睬他，在他们当中他反正也感到不自信。因此他说，他必须六点钟回家，不能跟他们同往了。阿希姆的父亲说，他可以把他捎到火车站，让他在那里下车。当他在走廊里穿他的风雪衣时，阿希姆给了他一本红色格子图案花呢格纹式样的满转密纹唱片纪念册。他打开纪念册，在二十个透明塑料封里看到了那两张《乌马古马》唱片、《艾比路》（Abbey Road）专辑、《最后的尼斯》，还有其他他和阿希姆一道在朗恩大街的音像品商店里买过的唱片。阿希姆说，这些唱片可以归他所有了，他向阿希姆表示感谢，但恰恰通过这件礼物感觉自己的预感得到了确认，即阿希姆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可能再也不会再见到他了。他也没有打听满转密纹唱片封套的下落，因为他已经知道，阿希姆在搬家前肯定把它们都扔掉了。在返程期间天已经黑了。他在汽车后座上挤坐在三个男孩之间，把那本唱片纪念册放在膝盖上，没有人理会他。阿希姆的父亲和其他人交谈，仿佛他们是同事一样，在一个红绿灯处停车等候期间他向其他人发放香烟，问他们具体想去什么地方。当他们一声招呼也不打就让他从铁路路堤处下车时，他一方面感到心情轻松，另一方面也感到伤心和无助。他绕道从阿希姆原先的住处旁边走过，它与他父母的房子只隔了几条街远。先前他们总在房子底层的文具店里买小画册，现在它已经关门了。楼上在阿希姆的旧房间里点着灯。窗户前面没有窗帘，人们可以看到房间还是空着的。一根涂满颜料的梯子靠在右侧墙壁上。因为人们还没有料到他这个时候会回家，所有他能够不知不觉地路过明爱会那位女士的房门口，接着上楼去自己的房间。他坐到自己的床上，从包里取出单曲唱片《徽章》把它打开。他此前已经把它录制到了磁带上，但是把它作为单曲唱片而拥有当然要更好了。他尝试以此以及用阿希姆赠送他的那些唱片来安慰自己，尽管他知道那是一件分手礼物，但或许一件分手礼物也正是为了安慰人们摆脱分手的痛苦。

15. 1969年夏天无意识发展成了有意识。秋天开始了青春期阶段。无意识（披头士乐队）用《艾比路》专辑与人们告别，有意识通过《齐柏林飞船II》而产生。强节奏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变成了摇滚乐，嬉皮士变成了红军派。他自己被捆绑着躺在手术台上，在打麻药的瞬间看到当代史从自己的脑海里轰鸣而过。

16. 他阅读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那是汉斯-于尔根·劳帕赫买来给他一并送到医院里的（三大洲出版社，双卷本，1985），同时还阅读彼得·汉德克的《大黄蜂》（罗罗罗出版社1098，1982）。这两部作品他都不理解，既不理解汉德克的《大黄蜂》也不理解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他仅仅是依赖于一种长期决定他意识的对于理解的预感。

17. 之前的时期仅仅是录音，虽然是一种跟唱，但却与披头士乐队、谁人乐队、奇想乐队、小脸乐队等处于同一水平，它是安全的时期，是天主教时期，是一个上帝的时期，他也同样跟唱对他的赞美。在他理解了不理解的那一刻，他不再是孩子了，他使自己疏远披头士乐队的单曲专辑和其他联合成所谓超级乐团的乐队再版专辑中的那种熟悉的元素。小脸乐队变成了脸庞乐队或者硬摇滚乐队，披头士乐队变成了羽翼乐队或者塑胶小野乐团，奶油乐队变成了盲目诺言乐队，其中一位不被质疑的神灵变成了一位神灵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也就是不可能性），而他自己则在迷失方向的那一刻第一次面对自己的历史，面对那种发现即这样的历史竟然存在。据说是他创造了这些年月。形成中的有意识的遗产是这些年月的无意识。难怪他无法想象另一种生命，难怪他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18. 汉德克小说当中不同寻常的表述，他继续不知疲倦地阅读汉德克的小说，仿佛它们里面有一种必须要被破译的预言，比如他不把小说中对助动词sein和“站立”（stehen）、“坐”（sitzen）等其他动词的使用看作是奥地利特质，而是把它们阐释为对一种更大的惰性和身体惯性的表达，而另一方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切·格瓦拉能够很容易就忽视身体的需求如饥饿、睡眠、乡愁或者孤独，但却没有意识到那是类似的令人惊叹的事情，即还在几个月前他是怎样向温尼托展示这

些需求的。切·格瓦拉已经死了，但是彼得·汉德克却成了刚刚解散的披头士乐队的接班人，也因为扬·布赫霍尔德和雷米·金施把《大黄蜂》和《小贩》的袖珍版设计得很相像，尽管其中一部小说是在罗沃尔特出版社、另一部是在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并且书里的插图看上去跟他由阿兰·阿尔德里奇设计的披头士乐队的歌集里的插图是一样的。音乐变成了文学。乐队变成了单人。歌曲的混乱在过渡中通过汉德克既迷人又令人费解的语句变成了具体的散文表述。

19. 他在他《通往天堂的阶梯》（Stairway to Heaven）那盘磁带上是从“欢笑”（“树林也将报以欢笑般的回响”）开始录制的，这样一来他实际上是缺少发展、开端、结构和起源，这难道不也属于从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过渡、这种在两者之间的常年摆动吗？磁带和唱片之间的真正区别难道不在于总是缺少的信息、肢解和缺失的开端和结尾吗？

20. 使用打击乐难道不是摇滚音乐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吗？它同时不也象征着造反和在传统结构中得以保存之间的矛盾吗？在终于使用打击乐之前，燃气罐（Canned Heats）乐队的《油炸摇滚》

（Refried Boogie）难道不仅仅靠压力而存活吗？通过使用打击乐人们难道没有意识到，期待是真正的而非被期待的事情？人们不会不由自主地明白，在使用打击乐的那一刻，当打击乐演奏者重新找回预先规定的节奏并强调它时，那种期待的紧张虽然会消除，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因为那种紧张不复存在了？人们不想一再听打击乐演奏吗？使用打击乐是特别的事情，而它导致的却仅仅体现了早已为人们熟知的结构，它通过对节奏的划分暂时破坏了这一结构，为了同时指向这一结构，因为它只有指涉该结构才能发展自己的特色？打击乐的使用难道不是跟许多造反和起义一道分享这种现象吗？从这种误解、这种对真正和非真正、改变和依赖的混淆中不是发展出了政治和音乐结构吗？这样的结构象征了错误，比如那种打击乐独奏，人们之所以经受住了这样的独奏，是因为人们在此就跟在《伊甸之园》（In-A-Gadda-Da-Vida）那首歌里一样，也只是在等待返回结构，人们在独奏结束时用掌声欢迎这种结构，而打击乐演奏者则可能会认为，他是因为自己完成了表演而被报以掌声？人们当时能觉察到，使用打击乐是欲望所犯下的有益的错误吗？也就是认为被期待导致了被渴望，而

事实上被期待就是被渴望自身？欲望在打击乐的使用中始终是空洞的，它在未满足中得到了满足。可惜的是只有少许打击乐演奏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其中一个来自普洛柯·哈伦摇滚乐队（Procol Harum）的巴里·杰姆斯·威尔逊，他在歌曲《打破路障》

（Broken Barricades）的结尾处表演了这种期待，让一段打击乐演奏持续了1分17秒的时间，一段没有得到满足的打击乐演奏，而是通过工厂遮光板而结束，以至于人们可以不断地继续想象这段演奏，把它想象为永不停息的运动，这种运动之所以具有动力和魅力是因为它永不消散。但是我们所寻求的满足却是回返，这样一来就成为失望，它意味着运动的终结。

21. 人们对巴德尔的唱片收藏有什么感兴趣的？其中超过平均水平的埃里克·克莱普顿的一张专辑是在电唱机上播放的最后的唱片？相反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却翻开摆放在乌尔丽克·麦因霍夫的囚室里。那是不再从她主观臆想的目标，而是从自身出发解释形而上学、欲望和希望的尝试。

格尔妮卡朗诵卡尔·迈的作品

格尔妮卡？

怎么了？

你不是真的在那儿，是这样的吗？

不，不是真的。为何这样问？

我感到如此疲倦。

那就睡一觉。

我害怕做梦。

那就醒着。

那样我或许也会做梦。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它在那里放着。

《哈姆雷特》。

是的。

一直还是那个忧郁王子？

别说了。

我可以做些什么吗？

没什么可做的。只是.....

只是什么？

我感到如此精疲力竭。

那就休息。

是的。忘记一切。

忘掉一切。

不要再从头开始一切。

不。不要再从头开始。

历史，你知道吗，它有时仅仅对一个人来说就足够了。

是啊，因此也专门有负责历史的专家。

是的，专家。历史学家。

正是。

那负责精神心理的专家呢？

那是精神病医师。

没错。对所有的东西都有相应的专家。我根本不必紧张不安。

是的，你没有必要那样。你可以非常安静地入睡。

对呀。没有历史。

没有历史。

也没有精神心理。

完全正确。

没有无意识，没有梦境，什么也不再有了。

只剩下空虚。

还有雪花。

是的，雪花。一种一直延续到天边的雪景。

还有你。

嗯，好吧.....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我不是真的在那儿。

没错。但是天也不是真的下雪。

在这一点上当然你说得对。

那么人们就可以说.....

是的，人们可以。

请说吧。

好吧，我也在那儿。

这样太好了。

是的。现在睡觉吧。

好吧。

我兄弟还有什么愿望吗？

兄弟？

我在想，如果我们做不了情侣.....

那就做小兄弟和小姐妹。

也不是真的不成问题。

兄弟，这是一个奇特的字眼。

结拜兄弟。

是的，我也刚刚在想这个。奇怪。孩子们在今天还这么做吗？还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吗？

我不知道。

我们以前这样做过吗？

不是真的做过。

太可惜了。但你会唱那首歌吗？你知道的.....

是的，我会。

谢谢。

生命的光线想要离别 / 现在死亡之夜降临。灵魂想要展开翅膀 / 它肯定，它肯定死了。

太美妙了，请继续。

最后，在最后时刻，你得到的爱等于你付出的爱。

这太棒了。

是的。

你的声音也很美。

是的。现在睡觉。

格尔妮卡？

怎么了？

我相信救世主。

救世主？

温尼托是一名基督徒。

为何是温尼托？

就这么说的。

什么？

温尼托在谈到自己时总是用第三人称。

也就是说，你是一名基督徒？

那只是一句引言。

啊，我明白了。

不是当真的。

我明白了。但是，你为何要说那句话呢？

因为我至少想说一下，在最后，当我已经不相信它的时候。

嗯，这个我能理解。但是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话也真的都说过了。此外真正的悲伤是不能用言语来诉说的。

是的，那一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到那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这些血腥的历史都是些古老的传说。

是的。

格尔妮卡？

怎么了？

如果一切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呢？

我的身体，这纸，这火

1

我听说过这件事，说的是一次上千名男子聚集在一起，
尝试去回忆一个果园。

2

下雪了，雪花以数得清的片状物飘落，
它们在清晨通过敞开的门吹进房间。

3

一切，男人们，都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但是男人们，
“一切都在熊熊的火焰之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果园在熊熊的火焰之中，樱花在熊熊的
火焰之中，草地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5

来吧，男人们，来到这块灰色石头的阴影里，
为了保护你们自己免被火焰吞噬和埋葬。

6

还有什么，男人们，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你们
看见果园和樱花的眼睛也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7

所有在你们眼睛里出现的、让你们高兴
或者失色的东西，所有这些都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8

任何思想都在熊熊的火焰之中，男人们，也包括
果园和你们在熊熊燃烧的花丛下面看到的人。

9

一切都在起火和熊熊燃烧，你们的双手，它们在起火和
熊熊燃烧，你们触摸过的一切都在起火和熊熊燃烧。

10

触摸本身就是起火和熊熊燃烧，
被触摸的东西在起火和熊熊燃烧，也包括触及他物的东西。

11

你们钻进、过晚地钻进那块灰色石头的阴影里，
石头也同样在起火和熊熊燃烧。

12

雪、每一片被清点过的雪片都在起火和熊熊燃烧，
接住雪片的舌头也在起火和熊熊燃烧。

13

没有接住被清点过的雪片的舌头，
它也同样在起火和熊熊燃烧，因为一切都在起火和熊熊燃烧。

14

因为你们回忆起的东西在起火和熊熊燃烧，
你们忘却的东西也同样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15

因为你们说过的在起火和熊熊燃烧，
你们隐瞒的也同样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16

因为你们想要的在起火和熊熊燃烧，
你们拒绝的也同样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17

因为一切都在起火和熊熊燃烧，都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就连棉花糖、就连湖泊、就连
花丛和果园也不例外。

18

就连目光、无辜被听到的事情、就连
通向湖泊的街道、就连落在街道上的雨水、
就连花丛和雪花也不例外。

19

就连露水、就连露水倒影、就连
在露水中被映照的露水、就连在被映照的露水中
被映照的幼蚊的翅尖也不例外。

20

因为一切都在起火和熊熊燃烧，都在熊熊的火焰之中，
就连火焰的火焰也早已被吞噬。

被询问者劝阻对方重新开始

我认为我们必须慢慢结束这场谈话了。

暂时结束还是完全结束？

这完全取决于您。

真的吗？

当然。

我不是特别肯定。

您就是缺乏信任。

信任，这听起来就像是来自自我体验课程上的说教一样。

同时您尝试用控制来取代信任。

我？控制？说这话的偏偏是您？

或许我比您更不相信人们能够控制某事。

因为您只是简单地那么做了，就是这样。

人们恰好有自己的任务。

也就是说您是这么认为的？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您难道不是吗？

那些任务是人们给自己挑选的吗？或者表达得更贴切一些，人们能够给自己挑选这些任务吗？

人们可以接受它们。

现在说的是尼采还是耶稣的观点？或者干脆只是反动的思想？

或许最后甚至是革命的？

您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有时这一切很难被准确地区分。

啊，现在又来这一套了，向右，向左，分析式的，解构式的，一切都无所谓，只有中间、温和以及压制性的宽容是重要的。

不，您完全误解我了。我说的意思正好相反：人们必须重视细微之处，注重细节，就像您在您的囚室里所做的那样。

囚室？

或者随便您怎么称呼它，您整天坐在那里，在纸张上写满了东西。

是的，囚室，这样说没错。

我的一位同事，凯勒警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无法向自己做出解释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也是这么看的。

您说什么？

我们想解释一些事情，因此我们专注于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这样做就是为了最终对它做出解释。但事实却表明，如果人们仔细观察的话，事情的意义正好在于无法解释、无法消解、主要是无法控制它。

在欺骗、爱情、妄想、渴望这些事情上也是如此。

没错。正如肉中刺一样。人们想把刺拔出来，但却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人们也不应当这么做。

我正好有这种感觉，我们应当再从头开始一遍。

现在您又开始怀疑了。伴随怀疑的是控制强迫症。把一切重新再修订、防范、夯实一遍，扼杀一切不精确的萌芽……

不，恰恰相反，我感觉跟当时一样，当我做了那个梦，梦里见到穿着短裙、戴着墨镜的格尔妮卡，起初我不肯定那究竟是不是她，然后我醒了过来，又一次特别想吃多层奶油蛋糕，至少在那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

这样说就对了。

那种感觉，我觉得它持续的时间连一整天都没有，还在中午的时候它就又消散了，但它如此令人愉快，如此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虽然我不清楚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但那种感觉肯定是令人愉快的。

就像我认为其他人总是那种状况一样。

您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其他人总是那么容易地得过且过，比如您。

在此我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

不，我真的有这种印象，觉得您的工作让您很开心，您肯定有一位妻子、一个家庭，您有一种业余爱好、朋友圈、养老保险……

我觉得您的想象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如果我也有那样的感受，即使只在梦醒之后，即使那样的感受只持续几个小时……

那么情况可能就要更为复杂了，您再从侧面看待一下这个问题。

我感觉现在我可以非常准确地描述一切，也就是描述事实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将重新开始，在比伯里希，在胡贝图斯大街，可以说是以黑白元素开始，然后.....

然后呢？

然后.....我就知道了。

因为它是一个错误，一种空想，一种幻觉，一种泡影，一种光的反射.....

对，可能是吧。无论如何我经常在想，它反正是无法被理解的，至少无法那样被理解。或许作为歌曲，在歌词与音乐的摆动之间.....

这又是那种美丽的灵魂，它流散在渴慕的结核病之中，但却无法到达存在状态，无法招致世间的任何事情。存在也必须是这种情况吗？“招致”，这又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您需要镇静。最好您躺下休息一会儿。请您想一想那个美好的梦境。或许您又会梦见如此美好的事物。

没错，梦见格尔妮卡，看到她是怎样站在那儿的。还有雪。

雪？

是的，雪。那辆黄色的NSU Prinz汽车。克劳迪娅、贝尔恩德、沃勒和其他人。还有汽车杂物箱里的水枪。当时，在一月份那个被白雪覆盖的日子里。

I sat me down to write a simple story

Which maybe in the end became a song.

The words have all been writ by one before me

We're taking turns in trying to pass them on.

Oh, we're taking turns in trying to pass them on.

歌词大意为：我坐下来写一个简单的故事，最后它也许会成为一首歌。那些话语在我之前就已有人写下，我们正轮流尝试将其传递。啊，我们正轮流尝试将其传递。——普洛柯·哈伦乐队

Procol Harum 

致谢

我想向所有对于本书的成稿起到重要作用的人表示感谢。感谢黑森州科学和艺术部、伊丽莎白·阿本德罗特、埃娃·德姆斯基以及授予这部小说的初稿2012年罗伯特·格恩哈德奖并使它的最终完成成为可能的评审委员会。感谢托马斯·梅尼克，在我写作期间他不断给予我鼓励，并致力于书稿的出版。感谢英戈·舒尔策，他属于本书终稿的第一批读者，从此便无私和不间断地支持这部小说。感谢我的代理人伊丽莎白·鲁格，她尽了所有可能性的努力，使得这部书稿找到了合适的出版商。感谢安德烈亚斯·罗泽尔，他毫无疑问就是在这里提到的出版商，感谢他毫无保留的坦诚和同样毫无保留的责任心。感谢我的编辑扬·弗雷德里克·班德尔，他善解人意地给了我许多重要的指点，使我不断专注于我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感谢美克·罗泽尔细致入微的阅读，和她对于文体雅致和处理最后疑虑的直觉。感谢霍斯特·森格尔一如既往的支持，当然也要感谢玛雅，多年来她一道及时并直接经历了所有对书稿及其撰写者的拒绝。谢谢。